Contribution of Gardens to City Life and Culture

■ [法] 米歇尔 · 柯南
■ [中] 陈望衡
主编

城市与园林

——园林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贡献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与园林:园林对城市生活和文化的贡献/(法)米歇尔·柯南,陈望衡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0

ISBN 7-307-05235-0

Ⅰ.城… Ⅱ.①米… ②陈… Ⅲ.城市—园林艺术—研究
Ⅳ.TU98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6122 号

责任编辑:朱凌云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杜　枚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24.5 字数:352 千字 插页:1

版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7-05235-0/TU·64 定价:40.00 元

目　录

导　言

园林对城市生活的历史贡献

现代城市中的园林

导　言

城市园林，交流与文化

[法]米歇尔·柯南　[中]陈望衡

有人或许对这一事实感到遗憾，即绝大多数旅游者，即便他们非常欣赏园林，但却几乎不去关注它们。历史学家可比为对过去进行游历的旅游者，尽管他们有着与过去的旅游者相类似的局限，但是他们的成果往往更为系统。与后者一样，他们对于他们所游历的城市而言也是外来者，而且冒着对生活在该城市园林中的市民所持有的观点进行误读的风险。然而，他们将历史问题的某些方面重新唤醒，并且赋予我们对于园林进行某些精确描述的特权——毕竟这些园林，它们的功用、发展与意义，在现今的城市之中，尘封已久。

城市园林中的神秘氛围

为何许多旅游者当发现一座城市被园林所环绕、当这座城市具有如此众多的园林或整座城市浸浴在园林所营造的氛围中，并以之作为城市的卓越标志时，会大加赞叹？是否园林所带来的幸福能够使一座城市更具有经济发展的潜力或更加具备审美的趣味？抑或是园林传递着某些可被旅游者下意识感受到的城市生活的活泼潜质？著名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1304～1368/1378？年）于1344年乘坐小船来到他称之为Zaytun的中国某城市。[1]在断定该城市必定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并盛产绸缎之后，他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评论："如同中国其他的城市，在Zaytun中，每一位居住者在其住宅中央都拥有自己的田地与园

林,如同我们的斯基尔玛萨(Sijilmasa)(摩洛哥的某城市,译者注)一样,而这恰好可以解释中国城市规模如此之大的缘由。"[2]在接下来的评论中,伊本·白图泰指出:穆斯林生活的领域相互隔离。伊本·白图泰对中国园林所具有的优越性的评论,着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他自己的兴趣与其说是关注于城市生活与园林,还不如说是关注于穆斯林宗教行为与宗教历史。1325年,伊本·白图泰曾独自一人离开自己生活的城市远赴麦加进行朝觐。[3]他宁愿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城市生活的舒适性上,因为中国人在这些园林中的生活非常具有说服力。

伊本·白图泰在其评论中重复着这样的类似论断。"十天之后,当我们来到Quanjanfu(现泉州附近,译者注)时,这座坐落在广袤平原上,风景优美且规模庞大的城市便映入我们的眼帘,Quanjanfu被果园所环绕,如同勾塔绿洲(Ghouta)的大马色(Damas)……这座城市四面便是城墙……中国人就在这城墙所圈定的区域内生活:这是四座城市中最大的一座……如同我们先前所提及的,每一位居住者都有自己的园林、田地与住宅。"我们不要感到惊讶,他对于扬州的赞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我在世界上所见到的最大的一座城市:要花三天才能走完全城。扬州与中国的其他城市一样,都依据相同的原则进行建造:每一名居住者都有自己的果园和住宅。"[4]

伊本·白图泰来自摩洛哥,在他们那儿,最大的果园是阿蒙哈德王朝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元首的称呼,译者注)财富的来源(如穆罕默德·埃·法耶兹在本论文集中所论述的),因而,中国城市中这些园林就被顺理成章地比做果园,或许他更多地意指这些园林的内在含蕴,而非它们的外在表象。他游历中国的时期是中国的元朝(1279~1368年),此时的中国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伊本·白图泰明显倾向于蒙古人的统治政策,这使得他对园林的赞美有些过誉。但他为了歌颂元朝政权制度,而对中国所有城市中的居住者的由园林而赋予的生活进行赞美,却饶有趣味!

这并非伊本·白图泰对园林进行赞誉的唯一案例。他对大马色(Damas)中所有的园林都进行了极度的赞誉(他游历的时间是1326年)。

那里的居民在周末都会有一个令人愉悦的散步。[5]1352 年,伊本·白图泰在到达其短途旅行的终点——安达卢西亚的格拉纳达后,对那儿所拥有的富饶的果园赞赏有加。[6]然而,中国确是他对整座城市所有园林进行高度赞誉的唯一国家,并且也是他从艺术和科学层面考察最为详尽的国家。[7]从伊本·白图泰这里,我们能够了解到城市园林如何成为一种构成卓越成就文明的符号,尽管他不喜欢这些文化的其他方面,如宗教习俗与宗教信仰。[8]

其他旅游者——西班牙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 ~1412 年),他在就任使臣的期间曾羡赏撒玛尔罕(Samarcand)帖木耳(Timour)的王宫(1402~1406 年)。[9]而伯纳尔·帝亚治·德尔·卡斯蒂洛(Bernal Diaz del Castillo)则对 Tenochtitlan(古阿兹台克首都,墨西哥城前身,译者注)的园林异常惊叹——在这些园林面前,他感到困惑,仿佛它们的建造有着不同的目的,彼此间也大为迥异。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花园的赞美似乎并非导致其对建造这些园林的人民的文化或政权的赞美。伊本·白图泰认为园林是表明中国财富的证据,他欣赏中国的园林,但并不欣赏中国的文化;克拉维约认为园林是城市卓越福利的一个构成部分,但对其所在的城市,却从一个大使惯有的冷漠的视角进行审视;而卡斯蒂洛,尽管欣赏城市园林的庄严宏大,但对阿兹台克的宗教习俗不甚认同。这似乎表明他们对园林的欣赏超越了其本身的形式和功能,以及其中所蕴含着的文化。因此,旅游者对那些拥有众多园林的城市的热情之中,似乎更加注重园林对城市福利的贡献,而不甚关心这些城市园林为何和如何改变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与文化。

世界历史性的视角

为了审视上述问题,我们需回溯到一些稍微浅层面的研究中去,即关于城市园林对城市生活与文化的贡献。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视角,我们研究园林的案例将涵盖从古地中海世界、宋朝及之后朝代的中国、土耳其帝国、安达卢斯(Al Andalus)统治下的阿尔摩哈德王朝、巴洛克时期的意

大利与法国，直到 19 世纪的美洲。这些案例都表明，园林能够对文化的诸多层面的改变起作用，并在对城市个性、文化与经济的保存上有着一个确定明晰的功能。

本书将从一个非常特殊的城市案例入手，案例中所描述的城市在维苏威火山爆发(AD79)后被毁坏，并且完全被火山灰所掩埋，直到 18 世纪才被发现。威廉敏娜·雅舍姆斯克(Wilhelmina Jashemski)是第一位发现这座城市的考古学家，她试图系统地对这片遗迹与周边区域进行挖掘。她介绍了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根本上修正了一些关于古罗马世界的城市与园林的看法。在过去文献的记载中，自公元前 1 世纪以来，园林的建造与功用只是作为罗马别墅中奢侈生活的延伸而已，而且绝大多数位于城市之外。但雅舍姆斯克对于庞培城(Pompeii)的研究却暗示出园林占据着城市内的许多土地，如同公共道路和公共空间那般，甚至占据着整座城市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园林对整座城市的结构和密度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不同层面上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公众与私密生活，甚至与死亡也有着形而上的紧密关联。这些大小不一、形制与功能各异的园林构成庞培城中罗马生活的方方面面。雅舍姆斯克的研究表明罗马文化与城市园林的发展密切相关。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到与我们西方文化较为疏远的东方世界中去。乔治·梅泰理(Georges Métailié)、奚如谷(Stephen West)和肯尼斯·J. 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做出了这样一个论证：尽管在中国和罗马之间有着诸多不同，尽管庞培城与那些在洛阳、开封和南京的园林的建造时间不一，但是这些园林对城市生活的影响与罗马的同样丰富多彩且至关重要。但更为有趣的是，梅泰理等人阐明了这一点，即中国园林对城市生活的贡献完全是中国所独具的，并就其对文化的改变和更新而言，中国园林表征着历史性的推动力。因为在洛阳，城市园艺的非凡发展是地中海周边国家植物选种培育所无法比拟的，洛阳花卉展中所展示的以及市民在审美欣赏中所呈现的城市文化生活，必须视为是世界文化的重大发明之一。这些文化推动力似乎建立在园艺的独创性的基础上，如同(市民在日常生活)炫耀性的挥霍上。

在另一方面，奚如谷对开封城市文化与公共园林功能的转变的研究，以及肯尼斯·J.哈蒙德对南京市民建造城市文人园林，以作为寻求城市中远离纷争、安隅一方的场所的研究，都表明了中国园林与“城市生活的活力”存在着相互关联的诸多途径。在第一个案例中，作者通过阐明公众能够参与到园林建造过程中，来论述开放的皇家园林可以为公众提供一种全新的平民间交流的平台。而在第二个案例中，作者论述了私家园林的建造与使用，以此表明平民阶层中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内在区别。尽管本书中所探讨的园林种类千差万别，并且城市之间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但是我们仍可以通过这些园林，看到中国社会不同群体相互间以及内部交流所持有的新形式，而正是这些新形式，在较大程度上对社会所经历的变革起着稳定作用。

劳诺·玛格兰尼（Lauro Magnani）和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分别论述了与上述中国园林建造时间有一个世纪之隔的热那亚共和国的园林，以及17～18世纪的巴黎皇家园林。他们都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尽管城市有所不同，但园林的使用都毫无疑问地在形式、政治与经济条件层面上，促进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并且激活了某些新形式以促进社会中的互动。热那亚的金融寡头发明了园林城市并创造了商品交换。白天，在市中心，这些家族生活在忙碌而又具有竞争力的氛围中，晚上则抽身回到休闲化与富有贵族雅趣的园林中，特别是当他们款待从其他城市中来访的客人时，借园林表达他们优雅的生活方式。

在热那亚，建造园林是用来巩固该城市的银行信贷的经济霸权的，而园林本身也成为城市领导自我炫耀的资财。进而，这些园林将整个城市联结成一个整体，但这并未能弥补法国国王行使暴力的丑态以及随后城市形势的动荡不定。

而在同时期的法国巴黎，一连几任的国王纷纷将他们的园林向市民公众开放——有点像在中国的开封。五百年后，在园林之中的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教士、贵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新的发展。新观念、新做法、新文化通过园林的制度化，从而在两百年期间向前稳步发展。这种现象完全出乎意料，并且在18世纪让几乎所有的学者困惑不已。如同在热那亚

所看到的，园林生活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形象，并促成城市与公民间对话的氛围。

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与欧洲的所有案例当中，园林（的建造）似乎源于人们希望在其对自然的传统观念中去寻求某些新的实践，之所以这般，是因为园林（的建造）本身就是要赋予自然一种文化的形式。新式园林为自然赋予某种形式，并以此论证园林中不同使用群体之间的某些行为和实践的合法性。这些论文所采用的案例涵盖中国、意大利、法国，并阐明了园林与城市文化生活改变之间所具有的惊人联系。无论在哪个层面，园林都为研究市民的社会互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而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市民对文化习俗的转变进行探讨、协商乃至激烈争论，从而使得所转变的文化习俗能够得到市民的普遍认同。就这点而论，园林堪称城市文化的大熔炉。

席琳·哈马德（Shirine Hamadeh）和罗伯特·罗滕博格（Robert Rotenberg）则从社会与文化变迁及其与自然相互联系等层面上，探讨了园林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上得以精细呈现的。两个相邻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和维也纳，由于其所属的两个不同帝国相互战争，使得这两个城市的园林建造陷入困境，并且这种困境持续到了伊斯坦布尔的整个18世纪，以及维也纳的19世纪前半叶。更为有趣的是，两座城市开创了两种不同的方式来促成城市园林的发展。在伊斯坦布尔，苏丹以及他的宫廷试图通过向市民开放园林和在园林中建造喷泉与咖啡屋来实现控制中产阶级的目的；而在维也纳，中产阶级也开创先河，以某种不受既定计划约束的方式去建造新的私家园林，以躲避国家在公共场所的政治控制。尽管上述两个案例都无法证明私人园林或公共园林能够履行明显的政治职能，但我们仍可看到，伊斯坦布尔和维也纳两者不同的园林文化，使得它们表现出一个共同特点，即新型的社会交往的习俗或仪式化的实践，能够建立某种新的生活方式，并有助于形成新的社会特质。以上这些都证明了园林能够加速创造城市中的市民文化。

公园与城市设计的开始

在 19 世纪，热心的几位园林评论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在精心策划下的公共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健康发展，是城市实现广泛的文化与社会改革的保证。继约翰·克劳迪亚斯·劳顿(John Claudius Loudon)之后，英国、德国和法国相继出现了许多改革者。有些人做得更为激进，从而引发国际竞争。

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篇论文，其所采用的案例取自 20 世纪之前，在该案例中，园林建设首次尝试应用在城市发展规划之中。大卫·斯凯勒(David Schuyle)阐明，某位著名的美国景观设计师为解决城市生活中最迫切的问题，即公园和园林的公共政策的问题，花费一年时间，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 1868 年，由于美国工业城市都在快速发展，因而出现了大量的贫穷与健康问题、交通问题、个人压力过重以及社会动乱。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即在整个市区和郊区中建立一个公园和公园道路的综合网络。这一建议在 20 世纪初期，被许多美国城市大范围地采用。这些问题及其提供的解决途径引起了当今世界所有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城市的极大兴趣。

不过，在公园和园林政策上，上述案例并非首创。事实上，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以下两个例子的启发，即受到英国利物浦附近的伯肯黑德城的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1 ~ 1865 年)以及 1852 年的路易斯·拿破仑(Louis Napoléon)政变后吉恩—查尔斯·阿道夫·阿尔封(Jean—Charles Adolphe Alphand)发动的巴黎城市改革的启发。从此以后，在伯肯黑德和巴黎，园林在改善城市的生活方面似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奥姆斯特德认为他可以利用这些案例来改善美国城市的公共福利。然而，这一简单的想法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这些被英国一位非常重要的园林学家威廉·鲁宾逊(William Robinson，1838 ~ 1935 年)详尽阐明。根据其在法国的游历，鲁宾逊于 1869 年在伦敦出版了一本关于巴黎公园、游园与园林的著作，该著作与英国的城市特别是伦敦市的需求

密切相关，我们计划在本书中再版此书的绪论。在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些开场白，这些开场白为城市园林规划以及借鉴国外城市的优点提供了理念与思路。它们还强调了一些现今仍常出现的难题：

> 没有必要对一个富裕而又文明的大城市中的良好的公共园林系统的必要性进行阐述了；也没有必要对其在我们现今情形下的稀缺性进行描述——我们面对着城市那些成百上千的华丽浮躁却苍白贫乏的城市园林，好比将活跃的大脑和心脏集中放在一个地方。伦敦不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民族的聚集点，这不言自明。我们其他伟大的城市几乎紧随其成长，但没有人可以看到一种善意去为他们的工人的生活和健康做出一个实实在在且有益的任何尝试，以便与这些人群密集的社区的需求相一致。[10]

在对公园的需求进行确认后，鲁宾逊承认，虽然在伦敦已经有公园，但无法始终如一地满足全市人民的需求。“法国人有他们自己的公园和公共园林，而且面积非常广阔并得到良好管理，不过，与我们本国某些园林类似，其园林的建造借助了昂贵和柔弱的植物，而这些植物的种植明显浪费且不必要；但是他们种满树木的道路、小广场和公共场所，远远多于他们的公园和天竺葵属的植物，这样做使得市民从易引发瘟疫的过度拥挤中拯救出来，并且能够承担建造这些构筑设施的费用，除了某些区域以外。”[11]

这引发的第一个问题：巴黎公园政策源于一位皇帝，即拿破仑三世的政策，他实行了一种与英国的传统与期望背道而驰的独裁政府制度。因此，鲁宾逊要求国会给予各个城市为公园、花园、长廊作发展规划的权力。这种公园规划的政治因素显然不可避免，它使景观规划成为公众讨论的一个重要领域，而且如何对不同目标和项目的公共资金进行分配也应成为公众讨论的一部分。这正是鲁宾逊在他长达 644 页的书中所要阐明的：“非常希望我们在军舰库、陆军舰队和防御工事的庞大开支中，能够有一天拿出一部分用在城市生活的改善上。”[12]这引发了“公众评判”这

一话题。鲁宾逊深知,尽管伦敦中央有宏伟的公园,并且得到了非常周到的管理,但是,这些公园只为少数有特权的人服务,它们的维修费用可以用来更好地服务于更多市民。因此,城市有必要在设计、种植、管理城市公园上考虑经济性:“在摄政花园(Regent Park)新的林阴大道公园里,有狮身鹫首的怪兽和人工雕凿的形体,它们所花费的成本足以在一些易爆发瘟疫的区域和东伦敦修建一整块绿洲。”[13]他坚持认为,一个普通的城市政策不应仅限于市内公园的创立,而应更好地分布在城市的整片区域。街道要栽种树木,建造新的市政设施,并改善人们住所附近的交通状况。因此鲁宾逊认为,公园及海滨公园政策应作为城市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仅作为附庸而已,也只有这样才可以独立解决问题:“在伦敦某些区域和郊区某些比较拥挤的地方种植树木的创新举措,不应仅仅局限在那些人流频繁出入的街道之中,而是应尽可能突破这些惯例。”[14]这显然是受到哈斯曼(Hausmann)对巴黎市区重建政策的启发,我们可以从斯凯勒的篇章中看到奥姆斯特德是如何将其适用到美国城市的。鲁宾逊接下来解释,这样庞大的计划需要设立公共托儿所和发展专业的园艺城市,而这些在英格兰都没有,尽管英格兰在园艺领域,如杂种树的种植及异质树种的栽培上有不错的能力。虽然,鲁宾逊清楚明白英国的园艺要超过法国的园艺,但他指出,这不能阻止英国人从比自己差的国家中学习一些专门领域的知识。[15]鲁宾逊呼吁国人前往巴黎,自己去看看园林是否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论文开篇第一章便将法国人所持的怀疑态度一扫而光:“在所有城市中,如果巴黎现在不是最明亮、空气最清新、最漂亮的城市,那么它也即将成为这样的城市;而巴黎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它的园林和树木了。”[16]

公园与园林设计的两难

本书的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20世纪以来不同城市和不同国家的海滨公园、娱乐政策。有些文章所介绍的一些案例,以及案例的局限性方面,比起鲁宾逊——他主张别国应该仿效巴黎奥斯曼的城市美化政

策——的论述更为详尽。而其他的人则认为,现今有些城市如果完全没有公共政策的指导,将可能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而过去之所以没有公共政策的指导城市活动也可照常进行,往往源于它们以往的卓越成就,即在一个广阔的领域内,城市活动与园林维持了某种比较显著的均衡。这些正是值得政治决策者和规划师考虑的有趣问题。

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阐述了20世纪中叶在斯德哥尔摩市制定和执行的卓有成效的公园、海滨城市的政策。比鲁宾逊优越的是,安德森详尽地阐明:在实施公共福利改革中,城市园林可作为一个基本手段。他说明了在公园规划方面瑞典是如何为大城市中市民文化的发展贡献了一个更加开放的政策。安德森还阐明,斯德哥尔摩的海滨公园如何被构思成为瑞典现代化精神与文明的工具,以及它们如何尝试将一个充满等级和虐待的社会导向至一个平等进步型的社会的。但同时安德森也描述了与之相对的政策的诸项特征——在一个有着光明前景的平等的社会里,如果公共管理者存有"独裁"的行径,其结果最终只能是自欺欺人。斯德哥尔摩市的公园仍在使用,而且为人们所欣赏,但仍然可能被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只是实现了原初设想(独裁的公共管理者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译者注)的目的罢了。

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Nicholas Dagen Bloom)所关注的案例涉及美国最主要的60个新城市,如哥伦比亚(马里兰州)、FGDC(维吉尼亚州)、埃尔文(加州),案例证实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观点,即希望通过一个新的园林和公园政策的执行,就改变城市生活的计划的做法似乎既无所谓成功,也无所谓失败。如同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公园规划者一般,在这60个新城市中,美国的景观规划者希望在市民和自然之间发起一场依据南北战争奴隶解放后所预言的文化变革,一种对自然应该负起的责任。因此,城市园林的文化目标和景观方法显然不同于瑞典人。

美国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与农业景观所表现出来的关注,是为了在美国郊区居民中建立一个新的自然道德规范,而不是仅凭借美国荒野来抽象地表述一个为追求平等的理念而已。布鲁姆指出,在城市建成后很久,尽管大片空地用于自然保护,并且当地社团和文化团体也积极致力

于介绍都市人对大自然所阐发的评论,但是,每年在公共景观区和城市人行道里的行人仍然稀少。他提出了一个有启发性的评论:"一个犯罪、绑架、青少年犯罪少的社会,会发现市民在居所周边的自然区域所受的威胁较小。"

该评论之所以具有启发性,是因为它帮助我们理解城市公园规划的局限性。它表明了文化变革与美国公民之间存在着互动,而这种互动仍不可被城市规划者所预计和改变。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斯德哥尔摩的情形:社会民主党规划者未曾预计的是,尽管他们的结果得到大批人的赏识,但是这些带着良好意愿的政策却由于他们的"独裁"政见而受到抨击。不过,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园林规划者能够正确地预测未来使用者对自然的兴趣和态度,而非瑞典中世纪和美国20世纪后半期那样。这为大批市民在园林里交流和相互影响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些活动是由市民自发组织的。集体交流和个人选择彼此加强,并不断促进新的问题的产生,并借此促进市民与自然的接触。例如我们知道,美国新城镇中许多优美风景的人工湖景观并不能离开人而独立维持。从而,维持一个没有污染的自然界将会遇到不可预知的困难,这反过来又使许多人团结在一起为之奋斗。努力维持水质被看做是环境质量的标志,并且自然与园林使用者以及使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应考虑进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城市事实上被建设成为一个对当前荒野能起到保存作用的公共园林,这是观念的转变,而这种观念的转变能够使人们团结在一起,而这又取决于自然环境本身及其所处的文化和政治环境的改变,以上便是园林规划者的原初本意。这些园林政策的成功,部分是因为当地成群居民参与到对园林建设的相互交流。但是,同样的互动做法对新的实践活动、自然遗产继承和预期城市生活的文化也起了作用,而非之前一味盲从规划者的初始目标。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为我们对园林和城市的研究带来了更重要的论述,这些文章警示我们应面对肆意毁坏园林所带来的危害。埃里克·J.赫吉拉(Eric J. Heikkila)和穆罕默德-埃-法耶兹(Mohammed El Faiz)提醒我们关注两个城市,即北京与马拉克奇(Marrakech),几百年来,它们各自

具有丰富优美的园林环境，但为了城市现代化的建设却忽视乃至摧毁了它们。赫吉拉的主张偏向于理论层面，而埃-法耶兹则更注重园林环境遭受破坏的进程中的历史层面。之前布鲁姆已经论述了这一观点，即在美国新城镇建造可持久的荒野的尝试可能性很小，但更有趣的是，阿莫拉维德统治者900多年前所创造的人工绿洲却一直能延续到20世纪中叶，这使得马拉克奇市在800年间一直被大棕榈树绿洲的独特混合林所环绕。埃-法耶兹解释了在何种政治体制之下，人们能够有组织、有意识地建设人工绿洲，以及在何种情形下，人们会为麦地那（Medina）这个传统的市中心的发展创造条件。埃-法耶兹还指出，从1912年法国摄政政体到现在，由于城市规划的新途径和经济发展的原因，外来移民被允许进入城市并不断侵犯麦地那（Medina）城市周边的园林，因而破坏了城市与自然的平衡关系并破坏了维持绿洲的水压系统。埃-法耶兹当然赞同赫吉拉的观点：城市和园林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日常生活文化，但埃-法耶兹仍坚持：在经济条件完全改变的情形之下，公共机构和政治领袖在寻求新的生态经济模式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许亦农（Xu Yinong）以及S. 博苏（Sylvie Brosseau）在各自的文章中很好地表述了城市中文化连续性的论题，在这些城市中，如同目前的马拉克奇，城市居民与其园林中存系着一种极为美妙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却正在逐渐瓦解之中。这些城市园林尽管建造在同一时期，但是它们对于城市文化的贡献却有所不同。在对20世纪苏州古典园林保存的研究中，许亦农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就西方的专家学者而言，通过物质形式维持连续性的方式来实现城市文化的保存，可谓是一种普遍规律。此外，许亦农还表明，通过维持苏州古典园林这一物质形式的连续性，一方面，保存着城市的精英文化并促成其持续的变革与深入；而另一方面，保存着城市中的大众文化，而市民在欣赏园艺时所获得的愉悦感恰恰孕育在这种大众文化当中（就此，乔治·梅泰理在前面进行过论述）。

S. 博苏通过一种类似的行文风格，讲述了东京地方环境保护主义者与政府当局之间的互动作用已经导致了新形式的城市园林的发展——在这些园林中，古老的文化习俗能够与新的日本生活方式与时俱进。在城

市范围内所采取的这些园林保护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当局对新园林或公园创造所起到的作用、个人主动创造新的文化习俗以及家庭或群体能够参与到社会或文化的转变中。公众计划与群体的主动导致了不可预知的推动力和结果。许亦农所论述的历史上的苏州正是东京的现今情形——园林的建造与实践正成为一种手段:在一方面,对根深蒂固的文化习俗尝试作一种转变或担当转变的媒介,在另一方面,则探寻城市生活的新形式。

在本书许多文章的论述中,城市园林已经承担了一种文化体验和转变的媒介,而在论文集的最后一篇论文中,U. M. 查得拉塞卡拉(U. M. Chandrashekara)与 S. 珊卡(S. Sankar)将我们带回到园林作为经济资源的重要性上来。他们所举的案例——印度的喀拉拉邦(Kerala),距离庞培城非常遥远。喀拉拉邦为世界 20 世纪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最为成功的案例,该案例可作为园林所能发挥的经济角色的佐证,其大体表明,园林能够在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作用。并且,U. M. 查得拉塞卡拉与 S. 珊卡的论述,也能够描述出在面临城市工业化的蚕食进程中,宅园对于保存经济多样性与式样上所做出的贡献。他们也说明了宅园的实践对于男女在家庭中实现平等,女性在家庭劳动力的融合以及住宅区的社会凝聚力的加固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但是,他们也注意到这种(因宅园所取得的)可持续发展,事实上非常脆弱,受到耕作分工这一全球性农业模式的威胁。

园林作为主体间交流的资源

我们在阅读本书之前,有必要留意以下三个重要论述。第一个论述:不存在园林所谓的某个普遍本质,没有任何一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园林的特征能够实现普遍功用。第二个论述: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 20 世纪城市规划中非常具有趣味性的案例表明,在城市范围内,没有任何园林政策或园林规划能够保证在某个特定时间段内,达成某种确定的城市福利的模式。这可能使得人们在企图发挥城市园林功用的尝试受堵。我

们可以看到,园林在它们各自的发展历程中,的确在某些时候发挥了一个非常具有成效的角色,但这不并受我们所预期观点的左右。第三个论述:我们可这样认为,园林不能总是在同一层面上满足所有市民的需求,并且在文化层面上,园林尽管允许非常重要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局限在某些特殊群体上,这些群体具有自由进入城市公园和城市园林的权利。就是这样一个论述,为我们阅读本书以及如何理解全书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线索。

饶有趣味的是,在巴黎的 17 和 18 世纪,在斯德哥尔摩的 20 世纪,在南京的文化生活和苏州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庞培、洛阳和开封的普通平民的乐趣和经济生活中以及在热那亚贵族和美国的新城镇的中产阶层中,城市园林对这些时期的公共生活的发展起到了一种工具的作用。城市园林的建造和使用往往是处于同一个文化体系内的众多主体之间相互交流所导致的结果。这些人在两种文化之间,即从父母那里继承的传统文化与城市新文化之间,起着某种调节作用。在 18 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当人们在私家园林和公共园林中彼此交流时,他们对自身所属的文化群体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有必要指出,人们与自然之间所达成的共同情感,使得他们在欣赏园林时所获取的乐趣彼此间相同。因此,我们能够将园林视作主体之间交流的资源:一种共享的文化在逐步创造,其使得一个更大范围的群体——整个城市范围——去参与到一个情感共同体,并使得整个群体获得辉煌成就。这种共享文化的创造进程有助于形成社会实践的新形式、判断的新系统、相互交流的新类别,知识、观点以及形而上学的全新表述。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园林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时,这种可能性不仅使得许多人一起去参与到创造性的互动中,并且使得他们对其自身的存在具有全新的集体意识,并且推动人们将文化以一种全新方式植入到自然之中去。

参考文献

[1] Charles-Dominique, Paule. *Voyageurs arabes*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95).

[2] Conan, Michel, Jose Tito Rojo, Luigi Zangheri (eds.). *Histories of Garden Conservation. Case Studies and Critical Debates* (Florence: Leo Olschki, 2005).

[3] Ibn Battuta. "Voyages et Périples", *Voyageurs arabes*. translated and commented by Paule Charles—Dominique (Paris: Gallimard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1995), pp. 369-1050.

[4] Robinson, William. *Parks, Promenades and Gardens of Paris, described and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wants of our own cities and of Public and Private Gardens* (London: John Murray, 1869).

[5] Xu, Yinong. "The Making and Remaking of Cang Lang Ting, Attitudes towards the past evinced in the history of a garden site in Suzhou," *Histories of Garden Conservation. Case Studies and Critical Debates*, edited by Michel Conan, Jose Tito Rojo and Luigi Zangheri (Florence: Leo S. Olschki, 2005), pp. 3-62.

注释

[1] 现福建的泉州或周边城市，该城市可能是中国13世纪最大的港口城市。马可·波罗(Marco Polo)称之为开通。Zaytun一词在阿拉伯语中意味着橄榄树，伊本·白图泰指出："在穿过海洋后，我们在所见到的中国第一座城市，即Zaytun上登陆。在这里没有橄榄树，在中国和印度也没有橄榄树，于是，Zaytun与这座城市名不副实。"(Ibn Battuta 1995,980)Zaytun一词使得人们对橄榄树下意识产生联想，也使得一个地中海富饶的城市与一个中国的城市之间产生关联。伊本·白图泰在他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听说过许多关于中国的事情，并且盼望能找寻到这样一座城市，该城市也是被一条能与尼罗河相比拟的河流所划分："在其两岸，有着村庄、田地、果园市场，如同尼罗河两岸的场景一样，所不同的是中国更加富饶。河岸上有很多水磨。中国产出相当多的蔗糖、葡萄和李子。我相信这李子比我之前尝过的更加美味……"(Ibn Battuta 1995,975-976)。

[2]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航海与游历》，巴黎：伽里玛尔图书馆1995年版，第981页。

[3] 按照查尔斯·多米尼克(Charles—Dominique)的观点，在东方，伊本·白图泰为人所熟知，他将沙姆斯丁(Shams—ad—din)——宗教意义上的太阳——作为自己的外

号。他旅游的大部分记录都是致力于拜访穆斯林的圣人及对宗教或神秘行业的描述。

[4] 他称这座城市为 al—Khansa。马可·波罗称之为 quinsai,并且认为它是"在世界上所能够找到的最大一座城市,在那里一个人可以享受到许多乐趣,如同在天堂一般。"(Charles—Dominique 1995,1198)。

[5]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航海与游历》,巴黎:伽里玛尔图书馆 1995 年版,第 447 页。

[6] 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航海与游历》,巴黎:伽里玛尔图书馆 1995 年版,第 1019 页。

[7] 他赞美中国的陶瓷器,培育家禽的技艺,丝绸的生产,纸币的发展,煤炭的开采,这些对于他来说都非常令人惊奇。通过航海通商,公众的纳税体系被应用到各个组织机构,而且有趣的是,在肖像画上,中国人对艺术的掌握发展得如此尽善尽美,并用它来描绘并管理外国旅游者!(Ibn Battuta 1995,976-979)

[8] "即便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但是我不喜欢居住在这里,因为我被中国的这些异教徒所恼怒。当我离开我的住所,我对许多不为人所接受的行为感到震惊。我甚至被惹怒到这一程度,即我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时候才离开住所到外面去。"(Ibn Battuta 1995,986)

[9] "撒马尔罕(Samarqand) 位于平原之中,并且被土墙所围,四周有深深的壕沟。这座城市比赛威(Seville)要大;但是在撒马尔罕外面的是许多房子,形成了广阔的郊区。这些区域被果园和葡萄园所环绕,并且这些果园和葡萄园向外扩展 1 至 1.5 里格(里格,长度单位,一里格相当于 4.8 公里),甚至是 2 里格。在这些果园之间有着带露天广场的街道;这里的居住密度很高,并且所有类型的商品与面包、肉类一起待售。因此没有城墙的人口要比有城墙的高出许多。在撒马尔罕外面的果园中,能够看到许多高贵和美丽的住宅,并且提莫(Timur)自己就有许多宫殿和游乐场。许多政府官员也有自己的房地产和乡村别墅,它们都坐落在果园之中,并且数目如此众多,以致初来乍到的旅游者只能看见郁郁葱葱的山体和由树木环绕的住宅。"

[10] 鲁宾逊(Bobinson):《巴黎的公园、散步场所和园林》,伦敦:约翰莫里出版社 1869 年版,第 97 ~ 98 页。

[11] 鲁宾逊(Bobinson):《巴黎的公园、散步场所和园林》,伦敦:约翰莫里出版社 1869 年版,第 98 页。

[12] 鲁宾逊(Bobinson):《巴黎的公园、散步场所和园林》,伦敦:约翰莫里出版社 1869 年版,第 21 页。

[13] 鲁宾逊(Bobinson):《巴黎的公园、散步场所和园林》,伦敦:约翰莫里出版社1869年版,第23页。

[14] 鲁宾逊(Bobinson):《巴黎的公园、散步场所和园林》,伦敦:约翰莫里出版社1869年版,第23页。

[15]“我从来没有这样断言过。如同先前所假设的,在整体上,法国园艺堪称我们的老师,因为我知道就园艺、农业以及乡村事务方面,如同在新闻业和杂志方面一样,法国领先我们,但是在特定的水果和蔬菜培育上他们和我们持平。”并且他加了这样一段有趣的评论:“在美洲未开垦的土地上,即便我手头有着可以节约人体力的农具或是高效率的器具,我也会明智地拒绝采用,因为粗鲁无礼的发明家怎能体会到那朴素到极致的存在物的华贵之美?”(Robinson 1969,25)

[16] 鲁宾逊(Bobinson):《巴黎的公园、散步场所和园林》,伦敦:约翰莫里出版社1869年版,第1页。

(陈李波　译)

园林对城市生活的历史贡献

公元1世纪的庞培花园和花园生活

[美]威廉敏娜·雅舍姆斯克



威廉敏娜·雅舍姆斯克(Wilhelmina Jashemski),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古代史专业硕士,1942年获芝加哥大学古代史专业博士。其学位论文 *The Origins and History of the Proconsular and Propraetorian Imperium to 27 B. C.* 1950年在芝加哥出版。从1980年开始执教于马里兰大学。1955年第一次参观庞培古城让她的事业获得一种新的动力。她结合多学科的实践与国际合作,开始了一项园林考古学的计划,让庞培古城消失了的园林重新焕发光彩。她的著作显示了园林考古学给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的多方面的贡献。她第一部主要的作品是 *The Gardens of Pompeii, Herculaneum and the Villas destroyed by Mt. Vesuvius*(相片、绘画、规划图来自 Stanley A. Jashemski)(New Rochelle, N. Y.: Caratzas Brothers, 1979-1993)。接着她和 Frederick G. Meyer 一起编辑了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ompeii*(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A Pompeian herbal: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inal plants; Plant portraits by Victoria I and Lillian Nicholson Meyer*(相片由 Stanley A. Jashemski 和其他人提供)(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9)。最近,她完成了在对

罗马园林产生兴趣时就计划展开的主要工作——两卷本的对罗
马帝国园林的首次也是迄今最完善的描述与阐释。

庞培是个位于维苏威大火山脚下的小而繁荣的罗马城市，公元 79 年，它受到了维苏威火山爆发的破坏，被掩埋在几米厚的火山石砾和灰烬之下。18 世纪它被考古学家重新发现。20 世纪早期，在它的五个花园都有发现植物根腔(root cavities)的报告，但是因为人们假定花园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所以在 20 世纪后半叶之前花园很少受到注意。与这些先见相反，我发现这个城市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花园[1]，我们甚至可以计算出用于花园和其他目的的空间百分比：建筑物占 64.7%，花园和耕地占 17.7%，而街道则占剩下的 17.6%。这个被发掘的城市的三分之一多的地方是露天场所。[2]

花园形式和功能的多样性

公元 79 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后留下来的庞培城遗迹(图 1)使我们能够以一种不同于研究罗马帝国其他城市的方式去研究这个城市的布局——它的公众建筑的位置、商业区、住宅、花园和露天场所。为数最多的是住宅内部的花园。此外还有寺庙花园和圣林(sacred groves)、公园，与沐浴场、体育场、体操场和学校相连的花园、葡萄园、果园、商业花园，与通往城门的道路两旁的坟茔相连的花园。

庞培的城市规划利用了自然地形。围墙顺着古老的熔岩流的轮廓呈现出不规则的椭圆形(图 1、图 2)。墙壁的周长是大约 3 000 米，围住的面积约为 63 公顷。广场建在城市西边的平坦地区。公共建筑物大多分布在城市的三个区域，而所谓的三角广场(triangular forum)及其周边则是每个罗马城镇的核心，城市的东边则是古罗马圆形剧场和大角斗场的所在。唯一不在这些地区的公共建筑是公共浴室，它位于城市的入口和主要的十字路口，以图方便。

与住宅相连的花园

庞培的住宅都是联立成排的。每幢住宅方向朝内,有一个或几个柱廊花园(peristyle gardens,花园的庭院完全或部分被柱廊环绕)(图 3)环绕中庭。庞培最雅致的住宅是萨姆尼人(the Samnites)在公元前 2 世纪建造的[3],在那里也有不带柱廊的庭院花园。

但那里决不是典型的住处,只是一个不同于罗马公寓式住宅的普通家庭的房子。然而,中庭—柱廊式住宅也并非如以前所想的那样典型。迄今为止,在发掘出来的地区只发现大约 240 座中庭—柱廊式住宅,它们中有的有三个或四个列柱走廊。庞培还有许多不规则设计的小房子,大多是地位卑下的市民的住宅,这些住宅也有花园。位于洛色拉(Via di Nocera)的这幢较低级的房子(I. xiv. 2)是贫民聚集的城市东南部的典型住宅。我在 1972 年发掘的那个花园,显然为家庭提供了许多食物。一些果树为家庭提供了各种水果(橄榄、无花果、柠檬)和坚果,并为下面种植的蔬菜如蚕豆遮阴。荫蔽餐桌的葡萄藤则为人们提供了葡萄。这个花园,就像庞培的其他大多数花园那样,既不能将其看成一个小型果园也不能将其看成一个菜园。[4]

许多住宅都明显具有商业的特征,起居室一般安置在店铺的上一层、后面或旁边。与店铺相连的起居室通常较小,但是店铺的主人通常会利用部分宝贵的空间建造一个小型的花园。一点绿色,或者一棵小树或者一个夹竹桃树丛,少许蔬菜或花,有时甚至是一汪泉水,都将给这些狭小、阴暗和闭塞的住宅带来不可估量的舒适感。因为庞培没有分区的制度,店铺和宿舍混合型的店屋(Shop-house)遍布整个城市。在北部的斯塔比亚浴场(Stabian Baths)有典型的两个房间的店铺,起居室就在店铺的后面。我们相信主人非常重视他的小花园,因为它占了比住处的一半还多的面积。

一些店屋实在太小,连小花园也容纳不下,但是主人会想方设法设置一块很小的绿地或是在天井中放上几株盆栽。渴望哪怕仅有的一点点的绿色似乎是罗马人个性中的基本品质。

与商业场所相连的花园

散布城市各处的是与商业场所相连的花园。在这个城市的最后时光，许多商业是在住宅里进行的。最有趣的是一个在住宅里(I. xii. 10)经营鱼露的厂家。人们早就知道各种不同的鱼露在庞培一直很流行，但是这次却是第一次发现与之相关的商业场所。这个厂家搬进这个古老住宅的柱廊式花园里，在那儿有许多巨大的容器和瓦罐，里面有许多小鱼骨和贝壳等鱼露的残余物。在通往后面花园的门口两边各有一幅美丽的花园风景画。我们不会把花园风景画与这样气味难闻的商业场所联系起来，但是这些画是在房子改变为商业用途之后才制成的。更令我们惊奇的是我们发现了花园种有两棵无花果树的证据(图4)。[5]这些树为坎帕尼亚地区(Campania)热辣辣的阳光下的工人们提供了阴凉，而且花草的美丽也为这个花园增添了生气。建在花园一角供工人们使用的一个厕所附近有一棵无花果树，它的位置反映出至今仍在意大利南部农村留存的习俗。这棵无花果树的浓阴不仅维护了个人的隐私，它的大叶片一直以来还为农民提供了手纸的替代品。

有大量的证据显示，只要有可能，商人就把舒适的起居室(包括一个私人花园)和他们的商业场所结合在一起。

和旅馆、饭店相连的花园

旅馆和饭店遍布整个城市，但是它们趋向于集中在城门、广场和圆形剧场附近。庞培的多数旅馆和饭店有美丽的花园，在那里客人可享受一位不知名的诗人所写的轻松小诗所带来的同样的乐趣，这位诗人邀请疲倦的旅行者在此停留并在葡萄藤架下休息和享受一个小酒店的各种乐趣。这首小诗描绘了由汩汩的流水和荫翳的藤萝组成的花园的迷人景象。[6]这个城市最大的旅馆(VII. Xi. 11/14)坐落在广场附近一条蜿蜒曲折的街道上，与繁华的阿庞丹查大道(Via dell' Abbondanza)相距不到两条街。这个可住五十多个客人的旅馆，有个大的隐蔽的花园，花园里有三个葡萄藤架。尤辛努斯的饭店(caupona of Euxinus)是一个更乡村化的有

房间可租的饭店,位于圆形剧场地区。尤辛努斯在柜台、餐厅和花园为那些参加剧场盛大演出的人提供食物和饮料。我们发现许多花园都安置在葡萄园内。在花园的西边有两个为客人提供服务的亭子,葡萄园大树的遮阴下有一些桌子,也可以为客人提供服务。

与公共建筑相连的花园

在城市各处也有大面积的公共绿地。在一种有大量户外活动的文化中发现与公共建筑相连的花园并不令人惊讶。庞培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来查看与这些建筑相连的花园,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原貌,而不是像其他大多数地方那样只能看到一些孤零零的建筑结构。坐落在城市的东边、圆形剧场对面的大角力场就是个好例子。这个区域的北部被门廊包围,西部和南部按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议栽了两排大树,其中心是个大游泳池。这样的布置赋予这些区域某些公共花园的特性,为那些来庞培参观圆形剧场的人群提供了一个令人愉快的休息之所。

花园也与剧场相连。维特鲁威建议在舞台后面建一个柱廊,万一有雷暴,则可以在此躲避。他建议柱廊之间的空地应该留作绿地并种上树木和灌丛,还要有用于散步的小径。

寺庙花园

古代文学常说寺庙被圣林所包围。多利克神庙(Doric temple)很可能就是被圣林所包围的,但是在1767年至1797年这座寺庙被发掘出来的期间,人们并没有寻找植物根腔的兴趣。20世纪早期,当斯班诺(Spano)还是庞培发掘工作的主管时,他在寺庙的周围种植了美丽的常绿橡树林。18世纪发掘出来的埃及伊希斯(Isis)女神庙,也可能被宗教花园(sacred garden)所包围着。伊希斯女神庙的两幅画显示寺庙的周围是有植物的。埃及的寺庙经常被花园所包围。一些证据显示维纳斯女神庙(the temple of Venus)的周围也有植物。有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位于离剧场不远处的城墙之外的迪奥尼索斯庙(the temple of Dionysus)就是与一个花园连在一起的。

与公共浴场相连的花园

我们从文献中得知花园是与浴场相连的。没有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证明庞培的浴场中有花园,但是毛(Mau)相信广场浴室中的健身房肯定就是一个花园。面积较小,没有游泳池和更衣室的事实以及相信是在花园中间发现的巨大的大理石水池,使他得出这一结论。

生产食物的花园

在庞培还发现了其他类型的花园。我们的发掘显示城内各种面积较大且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东南部,都用来生产食物。这些区域大都与小型住宅相连。除了圆形剧场北边的贫民区种植的规整的大葡萄园(图5)之外,我们在欧罗巴船之家(the House of the Ship Europa)发现的一个较小的花园的一部分也种着整齐的葡萄树。庞培第六区第七贫民区西北部的一个庞培酒商的葡萄园(IX. Ix. 6-7)和进入坡塔·迪·诺拉(Porta di Nola)之后左边第一个入口的角斗士饭店(Caupona of the Gladiators)(L. xx. 1)的葡萄园,以及店铺宿舍混合式住宅里的花园(I. xx. 5),种植的树木就不那么规整了,经常是以桩为界,有时也会修整一下园内的树木。

我们发现一个大的商业果园。果园一般种植水果和坚果树。宅园(Home gardens)则和今天的庞培地区一样,通常种植很多水果和坚果树,就像洛色拉第 I. xiv. 2 处的花园那样。我们还在庞培城墙内发现了一个大的商业花园(II. viii. 6)。

死者的花园

庞培五个城门所延伸的道路旁的坟茔多数有花园。这很正常,因为对古罗马人来说花园在其生活中是如此重要,因而他们的最终的休憩地也应该种上植物。

种植地和露天场所的面积的大小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这个古老城市的生活质量的信息。拥有众多露天绿地——装饰性花园,菜园,公园,葡萄园,果园和大的商业花园——的庞培古城一定是很美丽的。这个城市种

植植物的面积在火山爆发时可能比在地震前要多，[7]因为在我们发掘出的几个大花园里发现了被地震毁坏的建筑已从地面清理掉了。还很难说这是否会从实质上改变种植植物的面积的百分比。

花园中的生活

由于维苏威火山而保存下来的数百个家庭使我们获得了一幅关于花园在日常生活中的角色的清晰画面。[8]即使是穷人，只要有可能，也会在他们并不宽阔的家中为一个小的花园挤出地方。也有一些房子没有花园，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一个有大花园的邻居时常会在隔开两所房子的围墙上开一个窗口，这样贫穷的家庭也能享受邻居的大花园的乐趣。

花园充当了房屋的多用途的空间，因为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明净的天空和暖和的坎帕尼亚地区的阳光使得大量户外生活成为可能。花园是一个工作和游玩、午后聚餐、礼敬家中神灵和与亲戚朋友共享户外宁静的欢乐的地方。

室外的进餐和娱乐

花园中发现的大量的石制躺椅证明了户外进餐的普及，不仅是在众所周知的贵族家庭，就是在那些为数更多的卑下的居民中也是如此。一天中最主要的那顿是在下午，在一天的工作已经完成和沐浴洗涤之后。进餐时间会随季节而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始于三点钟，而且在一年中的多数时间，对多数家庭而言，进餐都是在花园中进行的，现在的庞培地区还保持着这种习俗。在庞培发现的花园中的躺椅大多是简单的 U 字形结构，由三张长椅组成，每张椅子都能坐三人，因而一次用餐的理想人数就是九人（图 5）。最初罗马人是坐下来吃饭的，但是后来希腊的斜躺着吃饭的习惯被采用。花园躺椅通常是由混凝土制成，但也发现有腐烂的木制躺椅的痕迹。硬椅加上垫子和枕头并且有葡萄架或牛皮纸遮阴，会更加舒适。

阿尔布修斯·色尔索斯（Albucius Celsus）的房子有三个饭厅（V. ii.

i),包括一个正式的宴会大厅,但是这个家庭在僻静的大花园享受其夏日的进餐。花园有一个石制的躺椅和一个以圆形的白色大理石作顶部的桌子,桌子中间有孔,孔中有水流出,因此在进餐之外这个桌子还可充当喷泉。一个靠近南边长椅的管道将水导入到花园。在躺椅的前面有个大的矩形水池而水从较低的圆柱注入水池,因而这个家庭能在附近清凉的水声中用餐。当水注满水池,水就通过靠近水池顶部的一个大洞流到花园并流经花园中的各种小的管道。这个花园种有花草和蔬菜,它为这个家庭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食物。无疑在漫长的夏日里会有许多客人在这令人愉快的花园里受到款待,当正餐延长到夜晚,他们可以享受习习凉风和泉水奏出的音乐,还有花的芬芳。

一个像阿尔布修斯·色尔索斯家那样的僻静的花园,是室外进餐的最佳之处,但是没有这种花园的住宅通常在柱廊式花园中有一个室外躺椅。庞培保存得最好的室外躺椅在艾菲波家(House of the Ephebe)的美丽的花园中(I. vii/10)。这座住宅由几个小的房子联合而成,在富裕的商业阶层中很典型。石制的躺椅在四个有力的柱子撑着的藤架的荫翳之下。后面的墙壁是巨大的动物装饰画,就像庞培地区流行的那样。正对着这面墙的是一个果树女神的雕像,她手持一个装着水果的贝壳,从那儿水流过四个大理石台阶注入下面一个小水池。从这里它一直向低处流直到从长椅的中央喷出来。花园的东边的犁沟显示出这是一个菜园。花园末端的水池有两个开口,它们能交替地打开或关闭。奢侈的家庭拥有一张与菜园相连的精致的躺椅一点也不奇怪。

但是更多地位较低的市民也在他们的花园里进餐。洛色拉一间不太大的房子后面的花园(I. xiv. 2)告诉我们这些构成人口绝大部分的贫民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在东南角我们发现了一处躺椅和两张桌子:在长椅中间的是圆桌,另外一张粗略建造的矩形桌子靠着南边的墙壁,桌子的东边整洁地堆放着一些木头,可能是用为烹食的燃料。这个躺椅被葡萄架荫蔽着,我们甚至发现了此处最后一餐的证据:蛤的外壳和美丽的蜗牛外壳——大家不要认为这是一桌美味,这是这一地区的穷人们吃的东西——就是那晚的晚餐留下来的。也有许多大的骨骼——家养的母牛和

野猪——这些显示出他们也曾享受过更美味的佳肴。当躺椅旁堆积起残骸时,古代的庞培人只是简单地将它们丢弃到花园中。这个并不奢华的家庭很明显会在他们的花园中消磨很多时间。一年中有好几个月他们是在葡萄架下的荫翳中享受进餐的乐趣的。进餐的时候会礼敬家中供奉的神灵。我们还发现喂养鸟或小动物用的陶制器皿,这表明花园中养有宠物。

即使是花园中没有躺椅的家庭也会在凉爽的花园中进餐。住在第 I. xx. 5 处商店之上的粗陋住处的这家人没有躺椅,但是他们显然会在西边围墙那个粗陋制成的壁龛的附近,也就是花园背后的空地消磨很多时光。泥土夯得很结实,而这里发现的东西表明人们在这里烹食。我们还发现一盏小灯和一块带柄的小盘子的碎片,像是奉献祭品的东西和玩具。[9]这盏灯的发现暗示这家人在天黑以后还会在花园逗留很久。孩子们可能在这里摆弄他们的玩具盘和玩具灯,其中一个被扔在了花园的后面。不难想象在凉爽的傍晚和刚入夜的时候这家人聚集在这里,以逃避二楼住处的浑浊燥热。我发现从四点钟开始在西边围墙的阴凉处工作是很愉快的事情。在古代,附近那三棵树的树阴会使这里成为令人愉快的场所。

在凉爽的夜晚,从花园传来音乐声对庞培人来说习以为常,因为音乐是宴会的重要部分,即使是在与朋友相聚的简单的餐会上。在 M. 卢克莱修家(house of M. Lucretius)发现的那两幅迷人的、但保存得不好的壁画描绘了室外进餐的欢快情景。一幅描绘的是丘比特(Cupid)和普赛珂(Psyche)在阴凉的躺椅上欣赏一个女孩在单管旋律的伴奏声中翩翩起舞(图 6)。第二幅也是描绘单管音乐给这样的场合增添的欢乐(图 7)。第三幅画来自同一住宅,但是比前两幅要保存得好一些,它描绘的是一个在竖琴伴奏中翩翩起舞的女孩。庞培人经常描绘丘比特和普赛珂的日常活动。在公元 1 世纪,一个有教养的罗马人能演会唱是很平常的。壁画和马赛克,以及发掘出来的乐器,证明了庞培地区音乐的普及。用不同长度的芦苇制成的排箫,经常出现在庞培的艺术作品中。一个在庞培发现的美丽的蓝色玻璃浮雕花瓶上,丘比特们用排箫、竖琴和双管演奏,而他们

的同伴则在葡萄上翩翩起舞。

戏剧表演也是宴会上最受欢迎的娱乐节目。塞涅卡(Seneca)说几乎每一处私人住宅都有自家的舞台。金色丘比特之家(House of the Golden Cupids)的美丽的柱廊式花园(VI. Xvi. 7)明显带有剧场的特点。雕刻的装饰以戏剧性的主题为多。

宗教崇拜

礼拜是花园中的重要活动。在花园中发现的大量罗马家神神龛和祭坛可以作为礼拜家神的证据。神龛的两个本质要素是被参拜的神的肖像和献祭的供品。这里有自立式的祭坛,或置于神龛内的小的祭坛。小的神像或是放置在祭坛内,或是被描绘在附近的墙壁上。住宅的神祠有不同的形状。它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壁橱,壁橱可能以壁龛(像寺庙的形状)为外框(图8),有时它就是一个壁龛(像寺庙一样的小结构),或就是一幅壁画。有时壁画是与壁橱或壁龛组合在一起的。有时小的房间或建筑物(古罗马的露天庙宇)用做宗教礼拜的场所。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在各种各样的花园中都可以被发现。在公元62年的灾难性的地震中被破坏的住宅中的神祠很快就被重建起来,这雄辩地证明了家庭宗教的活力。考古学家几乎没有在神龛中发现小雕像。恐慌中的庞培人在逃避维苏威火山的愤怒时仍停留了足够长的时间将家里的神像随身带走,这一事实告诉我们这些小神像是多么的重要。

在这些神龛面前全家人用祈祷和牺牲顶礼膜拜,期望神的力量能够保护他们的日常生活。礼拜在家庭用餐时进行。家长主持家庭礼拜,虽然他的妻子甚至孩子也可能参与。献给家里的神灵的祭品通常是朴素的。拉丁作家最常提及的一些祭品是谷类食品和食盐,葡萄酒和小蛋糕或是专门供奉用的蛋糕和熏香。在庞培的伊希斯神庙的深坑中我们发现了祭品的残余灰烬——烧过的枣子、无花果、松仁、松树球果和坚果。动物在家庭祭祀中很少用做牺牲,但是有时小猪也被当做献给祖宗神灵的牺牲。神灵受飨了自己那份祭品之后,余下的就由家庭享受了。除了家神以外,维纳斯、花园女神、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黛安娜和巴克斯都在这些

花园里接受礼拜。

在意大利,赫拉克勒斯(Hercules)变成了商人的保护神,他们将其利润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商业性花园中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神祠和大的躺椅似乎不可能仅仅是给较卑微的人家使用的。这个花园可能是大的商业活动中心。在靠近躺椅处发现的金币可能是那些将这座花园作为他们的总部的商人落下的。在祭坛附近发现了两件供品,一件是修长的丘比特肖像,一件是慵懒的女性肖像,都是精雕细刻而成,表明它们是富有人家用的祭品。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黛安娜(Diana)也在花园中受到礼拜(图9)。黛安娜也是历史悠久的意大利神灵,一般在坎帕尼亚地区的树林中被礼拜。她的最著名的圣殿是今天涅米(Nemi)地区附近的小树林,在那儿她先有一个祭坛然后有了神庙。罗马人充分意识到"树曾经是神灵的庙宇"。

神秘宗教的礼赞

对希腊的迪奥尼索斯(或巴克斯)的崇拜很早就在意大利南部被接受了,而且在维苏威种植葡萄的地区他特别受到尊敬。第二次迦太基战争(公元前218~201年)[10]后崇拜迪奥尼索斯的神秘仪式在这个地区很受欢迎。在神庙前的两个大躺椅上,与神秘仪式有关的饮酒和筵席在葡萄园这一背景下发生。这座神庙是地震之后修复的少数几座神庙中的一座。

对萨巴神(Sabazius)的崇拜是我们在庞培发现的除迪奥尼索斯和伊希斯仪式之外的另一种神秘宗教。它出现在一个大的柱廊式花园中,这个花园占了庞培东南方的一个建筑物(II. I. 12)的大部分面积。在花园入口处有四棵成排的树和一座祭坛,左边则是宴会厅。用来礼拜色雷斯-弗里吉亚的萨巴神的祭坛适合祭献香料、熏香、奠酒或血祭。

在祭礼的夜晚,祭礼者坐在地面的兽皮上并用糠和泥这些象征死亡的事物清洗自己。[11]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背诵重生的咒语。最后他们庆祝自己和神灵的象征性的结合。接下来的宴会预示着那些死后可享受的永恒的快乐。这个带有神祠、祭坛、宴会厅和为夜晚仪式准备的

大量的照明灯的乡村花园，使我们能够描绘出礼拜萨巴神时的场景。萨巴神的宗教仪式发生在比较简陋的花园，这儿是小商人和外国人居住的地方，他们构成了这个港口城市人口的大部分。

那里每天都有两次精心准备的礼拜仪式，分别是在庞培伊希斯神庙每天“开放”和“结束”之时。神庙发掘出来的时间太长，因此关于花园的证物很少留存下来，但是在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城的伊希斯神庙发现的两幅画为我们描绘了午后礼拜的情形，礼拜发生在朱鹭漫步的花园场景中。对迪奥尼索斯、萨巴神和伊希斯的仪式——这些神灵的崇拜者期待着永恒的祝福——来说，在惬意的花园中进行具有重大的意义。伊希斯在庞培是受欢迎的神。在摩罗李斯特家(House of the Moralist)(III. Iv. 2-3)的花园中——其花园几乎与房子一样大——有很多大树。花园中央的高台上有一个受崇拜的大理石女神雕像——伊希斯或黛安娜。这个雕像底部有一只绵羊模样的青铜香炉；羊后面是一个圆柱，上面放着盛熏香用的容器。在雕像前面约三米处有一个用青铜和铁制成的燃烧供品的筒形火盆。

普世的崇拜

旅馆主人尤辛努斯甚至让离家的旅客在他的饭店的花园做礼拜(图8)。除了在一个为前台顾客服务的葡萄酒销售间里的神像之外，在他的花园里还有两个通宵为客人所用的祭坛。在尤辛努斯的花园中受到礼拜的有不同的神灵。人们在神龛前面的祭坛附近发现了一个供奉的祭品——一个比较粗糙的有胡子的宙斯一类的陶制头像(6.5 厘米长)。或许我们在花园里发现的小心掩埋的猪骨是在一个客人献祭并享用之后给狗吃的。

由常春藤制成的花环在宗教崇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被挂在灶台上，祈祷者在古代罗马历中的每月初一，三、五、七、十一月之第七日和其他月的第五日，三、五、七月或十月中的第十五日和其他月份的第十三日，并且只要是宗教日就要向家庭守护神祈祷。在许多神龛上都发现了花环的画像，而在这些神祠和萨巴神的大祭坛上至今仍存的钩子表明鲜

艳的花环曾在此处挂过。

家务

花园也是工作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女人的许多工作是在花园的荫翳或柱廊下进行的。庞培的经济是建立在羊毛基础上的，在那里大概很少有家庭中的女性成员不花一些时间在纺纱或编织羊毛上。依照这里的天气还有什么地方比在花园或柱廊下进行这样的活动更好呢？在我曾发掘过的每个花园中我都发现了织布机的痕迹——这显示出在花园中编织是很普遍的。花园或阴凉的柱廊也是一个从事更多重要工作的愉快的地方。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说当逗留在他的托斯卡那别墅(Tuscan villa)时，只要天气许可，他习惯于思考他的工作并在他的花园或阴凉的柱廊里将其口述出来。

孩子的游戏

花园也是孩子们的地方。当他们唱歌时花园一定有他们的回声。小女孩可能会安静地和她们的洋娃娃以及玩具餐具玩耍。要想知道一个小餐具——如我们在洛色拉(I. xx. 5)的店屋花园发掘到的——到底是玩具餐具还是献祭的供品是很困难的。然而，孩子是不允许到所有的花园玩耍的。用栅栏围起的精致的花园和那些带深水池的花园可能一早就设计来保护植物和防止幼儿进入的。但是沿着花园的柱廊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游玩和工作的场所。

对动物和宠物的爱心

罗马人对动物的爱心一直为人所知，证据显示庞培人与他们的动物分享了他们的住宅和花园。有只好的看家狗是至关重要的。庞培有几个住宅门口前的看家狗马赛克图案是为人所熟知的。我在庞培发掘过的每个大的花园都发现过狗的骸骨。这些花园栽有贵重的葡萄藤、水果和坚果树，因而花园和住宅都需要狗的保护。让小偷恐惧的看家狗也是它的主人的忠诚朋友(图10)。小狗也同样被当做宠物豢养。无疑在多数花

园养有宠物猫,也有一些豢养海龟的证据。

兔和鸭子总是令人愉快地出现在庞培的壁画上,它们也是养在花园里的宠物。猪在古代的城市比我们一般所认识到的更加普遍,而它们也是孩子非常喜欢的对象。花园的绘画证明了鸟也在花园里出现。[12] 人们能看见它们栖息在枝头,或是飞快地穿过天空,或是在起泡沫的泉水边嬉戏,或是在泉水边歇息。野鸟——金莺、画眉、松鸦、斑鸠、撒丁莺(图11)、燕子、黑耳麦翁、灰色伯劳鸟和欧洲的知更鸟等全部都在这里发现过。据猜测,在不同的廊柱上的支架就是为鸟的栖息所准备的,因为瓦罗(Varro)也曾用这样的方式使用过支架。

在花园壁画中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野鸟是美丽的苍鹭和白鹭。它们在绘画中是如此常见以致我们获得这样一个印象:它们本身就是花园场景中应有的一部分,而且在迁徙的时候它们会在海边的别墅花园里驻留。

在花园绘画中最常出现的家鸟是凶猛的鸽子,也叫做原鸽(图12),它们是罗马人的最爱。高贵的孔雀,也在一些花园绘画中被发现,无疑是比较富有的罗马人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而豢养的。花园绘画中的孔雀,总是栖息于高高的墙壁上,表明高声鸣叫的孔雀充当了"看家狗"的角色。

在拉丁文作家那里提到鸟的机会比其他全部宠物加起来还多。这样的鸟通常被教以各种不同的把戏,并能被教会说话。另外一些鸟的价值在于它们有美丽的歌喉。在前门(Prima Porta)的利维尔别墅(Livia's villa)的花园绘画中画有一只柳条笼中的小鸟。在阿波罗神庙后面的一处住宅的花园中有商业性的鸟类饲养场(VII. Vii. 16),大概是为庞培的一些花园提供宠物鸟的。最受欢迎的是会歌唱的夜莺。阿庞丹查大道一个两层楼的居民曾将其凌空伸出的阳台改为大约2平方米的鸟舍。三个窗口可能曾用网遮挡着。阳台上有九个完整的喂鸟的水盘和其他一些碎片。或许没有比在这条繁忙大道的公寓上建造的这个鸟舍更能雄辩地证明庞培人对鸟的喜爱的了。

将鱼当做宠物、食物或观赏对象饲养

鱼也被当做罗马人的宠物。我们从古代作家中了解到鱼会回应它们主人的召唤或从主人手中抢食。罗马一个演说家 Q. 霍腾色斯(Q. Hortensus)——他的别墅有一个鱼池——曾为他的宠物鱼鳗鲡的死而哭泣。[13]富有的罗马人在他们的住宅中花巨大的费用建造人造的鱼池,因为这些被认为是其社会地位的标志。鱼也作为食物饲养在家中的水池里。庞培的两个水池有一行行的圆形开口,是建在池边的陶罐的罐嘴,这是用来让鱼排卵的地方。同时也是章鱼、鳗鲡和其他鱼类寻找荫翳的理想之所。朱丽娅·菲利克斯(Julia Felix)花园里(II. Iv)那长长的水池尽头的凉亭也用于同样的目的。在庞培两幅花园绘画中出现的资源丰富的鱼池表明鱼池被认为是花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赫库兰尼姆城门外有个狄俄墨德斯别墅(villa of Diomede),别墅的三角形柱廊的后墙中央面板上画有一个资源丰富的水池。在斯塔比那大街(Via Stabiana)一间小一些的住宅(I. ii. 10)里,一个水池占据了小花园的大部分空间。池的上方是一幅以资源丰富的池子为题材的画。旁边的面板则是典型的花园绘画了。有关海洋动物的最精致的绘画是在世纪之家(House of the Centenary)(IX. Viii. 3/6)的蓄水池中发现的,其装饰显示这是一个豪华的花园。

享受夜晚的凉爽

太阳落山后花园里的活动并没有停止。在炎热的夏夜,凉爽的花园和它的柱廊比闷热和浑浊的房间更加令人愉快。一些花园的主人为夜晚的照明提供了特别的设施。艾菲波家的主人将一个大烛台的支架放在一个贵重的青年雕像手中从而将它变成了灯具来照亮花园。我们在庞培发现了花园照明的各种不同的方式,例如在大喷泉之家(House of the Great Fountain)(VI. Viii. 22/1)的花园中,装饰马赛克小型建筑物的那两个张大嘴巴和眼睛的英俊的石膏面像就是用来把持照明灯的(图 13)。夏夜里当它们照亮泉水时就会呈现出一幅奇妙的景象。

但是多数花园并没有这样精致的照明手段。在大多数花园中发现的

大量的小灯一般放置在花园桌子上,或放在花园的小壁橱中。大多数灯只有一条火焰,但是偶尔也发现有多条火焰的灯。

这些考古学的观察表明花园不但像公共空间那样在庞培城中占据许多空间,而且它们在追求美好的家庭生活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是礼拜、家务、进餐、孩子们的游戏、客人的娱乐和豢养野生和驯化动物的地方。由于它们在家庭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不会惊讶于它们同样为公共生活和各种形式的礼拜(包括对死者的礼拜,人们可以在花园——死者们的长眠之所——与之进餐)提供了庇佑。除了经济价值和让人赞赏的气候调节之外,花园似乎还为古代庞培人提供了生活意义的形而上慰藉。

参考书目

[1] Wilhelmina Jashemski, *the Gardens of Pompeii*: *Herculaneum and the Villas Destroyed by Vesuvius* with photographs, drawings, and plans by Stanley A. Jashemski. New Rochelle, N. Y. : Caratzas Brothers, 1979-1993.

[2] Wilhelmina Jashemski and Frederick G. Meyer, eds, *The natural history of Pompeii.*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MacDougall, Elisabeth B. and Wilhelmina F. Jashemski, eds. *Ancient Roman gardens*, Dumbarton Oaks Colloquium on the Histor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VII (1979). Washington, D. C. : Dumbarton Oaks 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 1981.

[4] Reese, David . "Marine Invertebrates", in *Natural History of Pompeii* edited by Wilhelmina Feemster Jashemski and Frederick G. Meyer.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5] Van Buren, Albert William. "Further Pompeian Studies", *Memoir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10 (1932): 10-13.

注释

[1] 雅舍姆斯克(Jashemski):《庞培的园林》,纽约:克纳萨斯兄弟出版社1993年版;

迈克当高(MacDougau)和雅舍姆斯克:《庞培的自然史》,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只有大约75%的城市被发掘出来;人们认为露天场所在剩余的25%中所占的百分比会更大。

[3] 这种类型的住宅起源于希腊。然而,当意大利人把廊柱加入到他们的中庭住宅时,他们将其改造成一个花园,而不是像在古希腊那样留下一个夯土而成的庭院或用水泥、圆石或马赛克加以铺设。

[4] 作为一个比较,注意到这个花园与今天意大利庞培地区的许多花园的类似是有趣的。我们参观过的其中一个工人的较大的花园也供应他的家庭所需。我们在他的密集地种植了的让他流露出骄傲神情的花园数出了33种不同的植物。他的果树包括了苹果、桃子、榛子、无花果、柠檬和胡桃,所有古代庞培人所熟悉的和在古代庞培地区能找到的众多蔬菜和药草在这里都能见到。6棵葡萄藤被整理成一个藤架覆盖在庭园上,并为人们提供了葡萄。

[5] 当这个古老的城市被破坏时,植物根部逐渐衰坏,而火山砾流进腔洞中。我们用特制的工具小心地移走火山砾并且将腔洞装满水泥。三天之后当水泥变硬,我们小心地移除周围的土壤而获得古代的树的铸件。然后我们给铸件的顶端涂上了白色而根部则加上覆土圆盘。

[6] 弗吉尔的小调诗歌。

[7] 在维苏威火山的致命的爆发前几年,即公元62年,这儿有一次大的地震,破坏了城市的部分地区。

[8] 有关维苏威地区的花园生活的讨论细节和相关的参考见雅舍姆斯克:《庞培的园林》,纽约:克纳萨斯兄弟出版社1993年版,第4~5章,第8~10页。

[9] 雅舍姆斯克:《庞培的园林》,纽约:克纳萨斯兄弟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194页。

[10] 发生在靠近现在的突尼斯城的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一场战争,以迦太基的完全毁灭和罗马人在非洲北部的胜利结束。

[11] 根据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Clement of Alexandria)所述。克莱门出生于公元10年,在变成一个基督徒之前对异教的神秘仪式十分熟悉。

[12] 见《庞培的自然史》中乔治·沃森(George Watson)关于维苏威地区花园绘画中发现的鸟的详细目录和讨论的章节。

[13]参见大卫·里斯(David Reese):《海洋无脊椎动物》;雅舍姆斯克和美耶:《庞培的自然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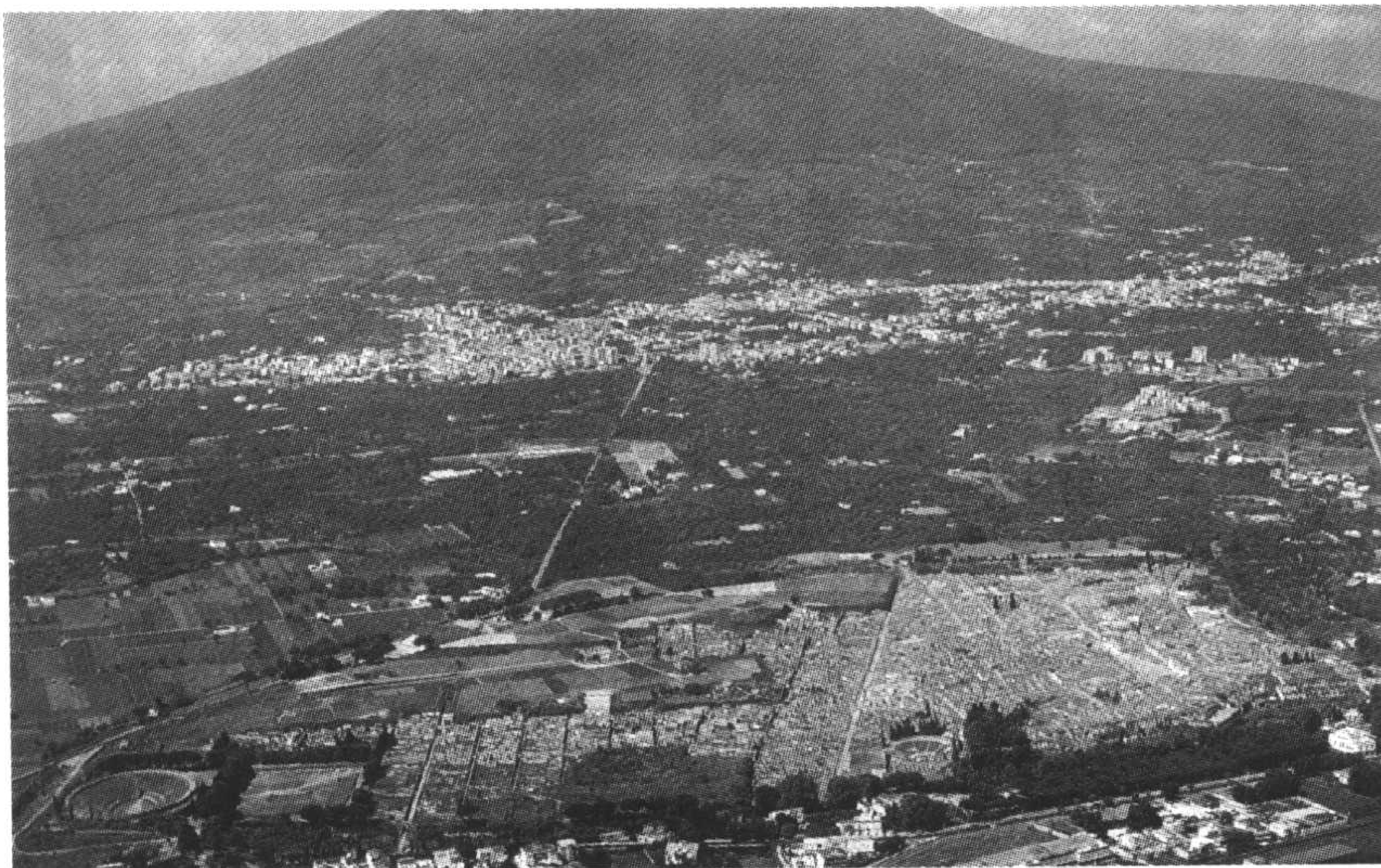


图 1　维苏威火山和庞培古城的空中俯览图。



图 2　庞培的计划：当 1880 年 Giuseppe Fiorelli 成为负责挖掘的主管时，他把这座城市分成九个部分。每一部分再分成一些经过编号的区，并且每个区的每个入口都被指派一个数字。这样每个房屋的地址都可以通过三个数字表示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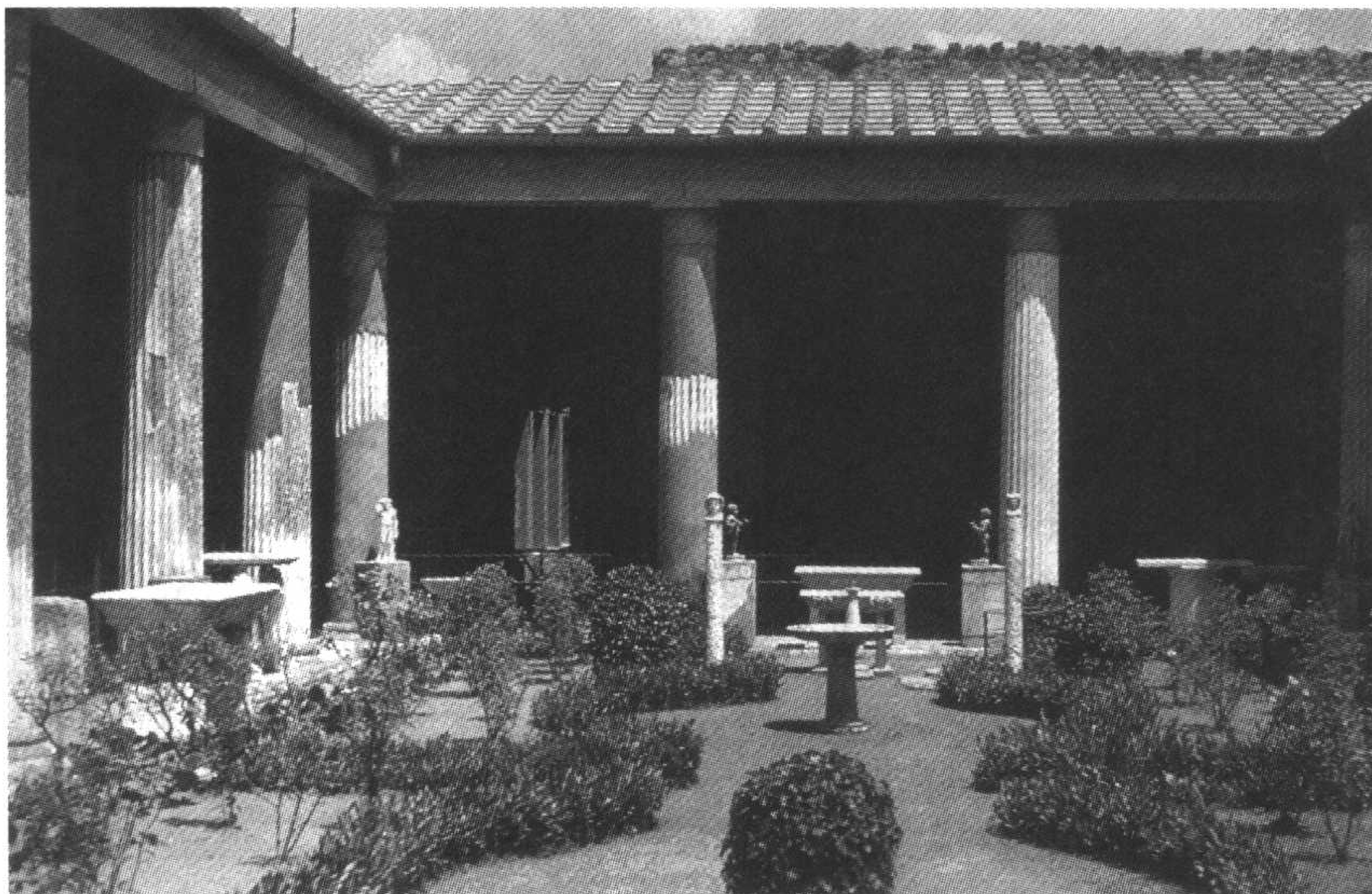


图 3　韦蒂(Vettii)之家的绕柱式花园。图片来自斯坦利·雅舍姆斯克(Stanley Jashemski)。



图 4　Garum 商店的绕柱式花园。图片来自斯坦利·雅舍姆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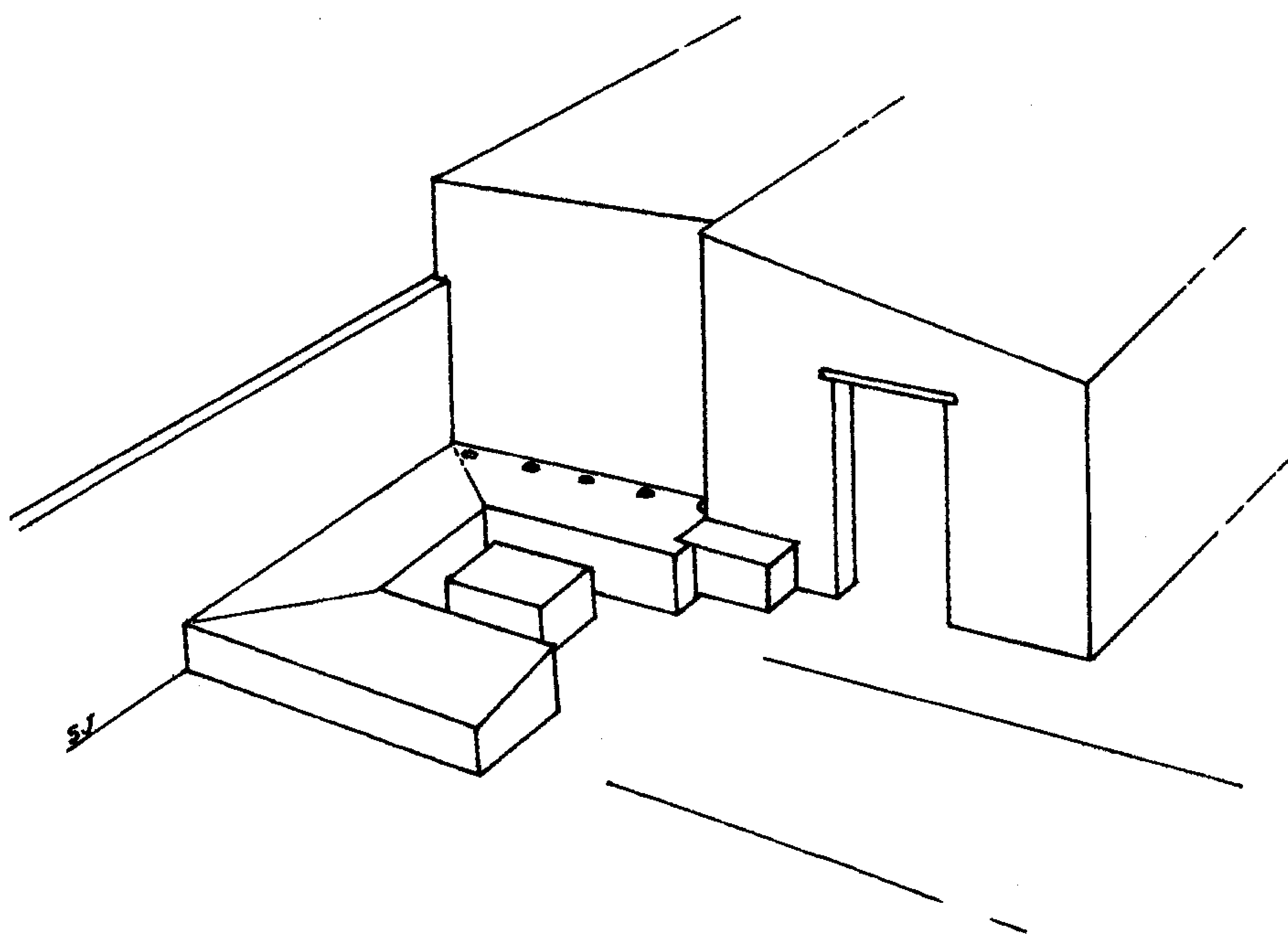


图 5　在一个巨大的商业性的葡萄园发现的石制躺卧餐桌。由斯坦利 · 雅舍姆斯克绘制。



图6　在卢克莱修(M. Lucretius)之家发现的一幅已经损坏的壁画,此画表现的是一个跳舞的姑娘在花园中取悦其客人。



图7　在卢克莱修(M. Lucretius)之家发现的一幅已经损坏的壁画,此画表现的是客人在享受音乐。



图 8　Copo Euxinus 花园里一个前面有祭坛的神龛。图片来自斯坦利 · 雅舍姆斯克。



图9　在庞培一个花园发现的黛安娜大理石像，它的尺寸要比常人的大一些。图片来自斯坦利·雅舍姆斯克。



图 10　在庞培发现的一幅画，画面是一条狗。图片来自斯坦利·雅舍姆斯克。



图 11　庞培 Bracelet 之家一幅花园壁画中的撒丁岛鸣鸟和玫瑰。图片来自莎拉·格莱登(Sarah Gladden)。



图 12　庞培 Bracelet 之家一幅花园壁画中的鸽子。图片来自斯坦利·雅舍姆斯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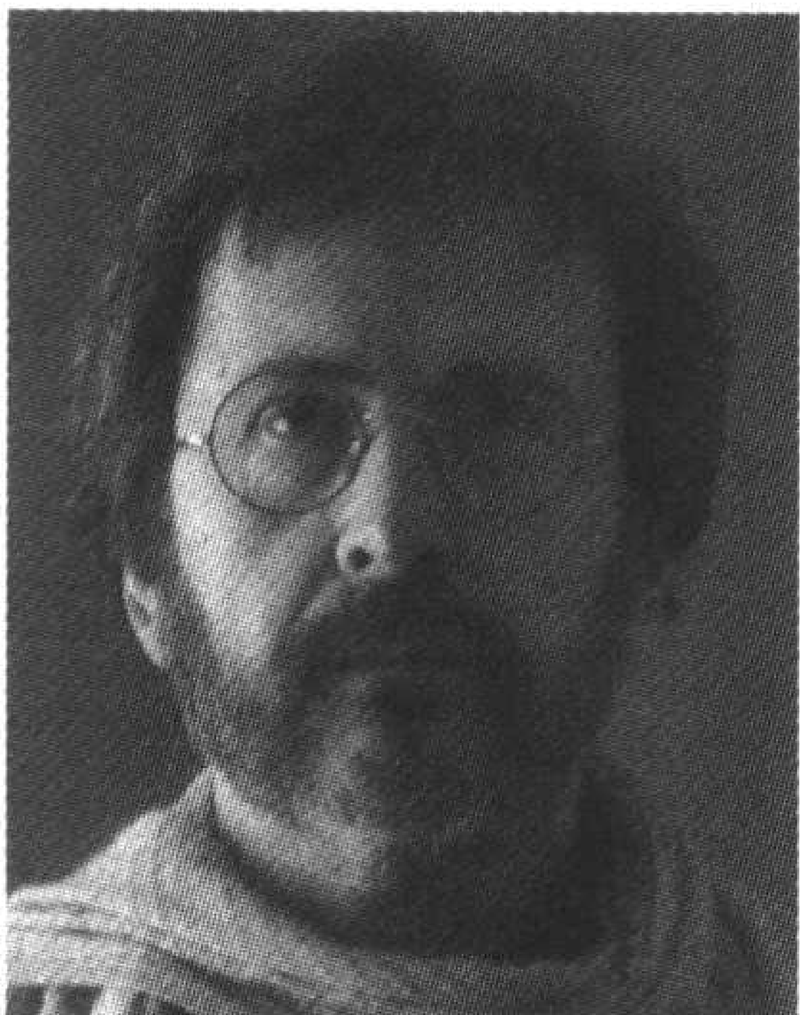
图13 大喷泉之家花园中的马赛克喷泉上的面具。图片来自斯坦利·雅舍姆斯克。

(作者单位:美国马里兰大学)

(张黔 聂春华译)

洛阳园林:城市文化的精华

[法]乔治·梅泰理



乔治·梅泰理(Georges Métaili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人员,巴黎亚历山大·科瓦雷(Alexandre Koyré)中心成员。他主要从人种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和日本的动植物知识史。这项研究主要包括:古代中国植物学的历史、中国和日本现代植物学的形成、园艺史、中国园林花卉的历史等。

乔治·梅泰理是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的名誉会员,*Anthropozoologica* 和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EASTM)的编辑。他还是法国中国研究协会前主席、东亚科技和医学史国际协会的创办人和前财务主管。

洛阳曾是中国中古时期数个朝代的首都,不但如此,这座城市还以公元6世纪的佛教寺院而闻名。当时,一个叫杨衒之的小官写了一本书,书中不仅描述了这座著名城市的佛教寺院,还描述了当地的政治、人物、风景和掌故。这本书,即《洛阳伽蓝记》,写于公元547年并一直流传至今,现在仍然是历史学家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

这座城市依然享有很高的声望，此外，它的花卉，特别是牡丹，一直到16世纪都引起很多文人的注意。有几部专著是专门论述牡丹的，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有两部特别有趣的北宋时期（960～1127年）的文学作品保存了下来。一部是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此书描述了洛阳最有名的几处园林；另一部是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它描述了园林植物的多样性。除了这两部著作，还有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及前宰相司马光（1019～1086年）用优美的文辞所描写的他在"独乐园"的生活。[1]同时，住在长江下游的其他学者也写了一些有关他们的园林的回忆录。我们可以很容易就读到后来的一些著作，它们显示了园林文化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2]小说方面，我们可能会想到明代小说《金瓶梅》的主人公西门庆为声名和享乐所盖的花园（《金瓶梅》第19回）。在冯梦龙（1574～1646年）编辑的明代短篇小说集《今古奇观》中，园林在其中几个故事里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曹雪芹（？～1763/1764年）的《红楼梦》（它可能是中国最著名的小说了）就是以一座美丽的花园为核心背景展开的。

正如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1996）所说的，备受称赞的园林之美不时让我们想起著名的风景或者画面，因此，园林就如纯粹的艺术品一样受到高度的重视。本文不可能提交一份有关中国园林的完整书目，但我们想提及一些我们认为会有所帮助的资料。陈从周（1984）在如何看待中国园林方面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指南，就像马吉·凯斯维克（Maggie Keswick）的书在另一方面所作的那样。斯坦尼斯拉斯·冯（Stanislas Fung 1998）详尽的《中国园林论著指南》是进入这一领域的金钥匙。此外，从张家骥（1986）和王毅（1990）的书中我们也可发现两种不同的历史观点。

经过上面简单的交待之后，让我们回到北宋早期（960～1126年）的洛阳。李格非，字文叔，山东济南人，其《洛阳名园记》一共描写了19处名园的盛景。实际上，这本写于1039年之后的著作在洛阳遭到女真族人洗掠之后很久才出版（女真族于1115年建立金朝，1125年开始向南侵伐宋并于次年虏宋朝皇帝于开封）。因此，《洛阳名园记》及那篇写于绍兴

八年(1139 年)(应为 1138 年,译者注)的序言让人想起李格非游览洛阳时的盛况以及此书出版时洛阳已经繁华丧尽的萧条。

尽管每一座园林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描述——李格非坚持每一座园林都有自己的独特之处——但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共同点。首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些园林都非常庞大,因为司马光那座一公顷大小的“独乐园”都被认为是“园卑小,不可与它园比”了。李格非经常引用各种各样的亭、台、池塘等的名称,这些名称暗示它们与儒家学者的命名密切相关。[3]他还指出一座园林是什么时候由唐代的旧园发展而来的。然后,作为一名真正的导游,他坚持在园中观望时选择适当位置以获取最佳景色的重要意义。有几处他甚至为了获得最佳游览效果而提供了一份精确的旅游指南。一般来说,读者对该地的主要结构、池塘、建筑物、阳台、植物丛(例如用来为溪流和岩穴制造特殊效果的竹林)获得的是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但在其他一些地方,作者也提供了十分精细的描述。比如在“董氏西园”中,他注意到在竹丛环绕的一个石芙蓉花瓣中有水自其间涌出。园林中的植物经常作为整体来称呼,即“花木”。当用到它们的专有名称时,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例如,同样在“董氏西园”这篇中,他提到一棵颇为壮观的栝树,此树大小六围,实小如松实,而甘香过之。①他还注意到“刘氏园”“廊庑回缭,阑楯周接,木映花承,无不妍稳”;“丛春园”“桐、梓、桧、柏,皆就行列”。对花卉的描述最值得注意的无疑是在“天王院花园子”这篇,他写道:

> 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凡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与此。至花时,张幕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今牡丹岁益滋,而姚

①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董氏东园”云:“东园、北向。入门有栝,可十围,实小如松实,而甘香过之”,出处、内容与本文作者所引略有出入。见陈埴、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1 页。——译者注

黄、魏花，一枝千钱，姚黄无卖者。

如果我们想知道这种独特的花的样子，我们只须翻开周师厚的书即可找到答案：

> 姚黄千叶黄花，色极鲜洁，精彩射人，有深紫檡心，近瓶青旋心一匝，与瓶并色，开头可八九寸许。其黄花本出北邙山下白马司坡姚氏家。今洛中名圃中传接虽多，唯水北岁有开者，大岁间岁乃成千叶，余年皆单叶或多叶耳。水南率数岁一开千叶，然不及水北之岁也。盖本出山中宜高，近市多粪壤，非其木性也。其开最晚，在众花雕零之后，芍药未开之前。其色甚美，而高洁之性，敷菜之时，特异于众花，故洛人贵之，号为花王。城中每岁不过开数朵，都人士女必须倾志往观。乡人扶老携幼，不远千里。其为时所重如此。

因此，当我们读到欧阳修(1007～1072年)在《洛阳牡丹记》中所说的"岁遣牙校一员，乘驿马，一日一夕至京师，所进不过姚黄、魏花三数朵，以菜叶、实竹笼子，藉覆之使马上不动摇，以蜡封花蒂，乃数日不落"也就不觉得奇怪了。[4]

这里我们注意到洛阳的私人园林大概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向游人开放。

李格非十分简要地描述了"归仁园"，他认为在当地诸多大园林当中，要以归仁园为冠。归仁园北面，有牡丹、芍药千株；中间有竹林千亩；南有桃李相望。

至于"李氏仁丰园"，李格非集中描写了它的独特之处。此园不但建筑精奇，而且搜集种植的花木每年层出不穷、益奇且广。有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有百余种。还有来自远方的奇卉，如紫兰、茉莉、琼花[5]、山茶之类。他说此类远方奇卉难以种植，但是种在洛阳，就和土产无异，大概洛阳的土壤有其独特的特性。这种看法可能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认为专业花匠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利用了自然的

馈赠，因为当时在洛阳栽植的花木的种类实际上远远不止上面所说的数量。要准确地了解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比《洛阳名园记》大约早50年出版的《洛阳花木记》。

这是一篇五十多页的专著，附有一篇写于1082年的序言。作者周师厚，[6]字敦夫，鄞(今浙江省鄞县)人，宋皇佑进士。他说他在1068～1077年间第一次游览洛阳名园，后来在1082年又莅官于此。出于对花卉的喜爱，他利用吏事之暇寻览群芳。周师厚在序言中承认自己所寻访的园林不过十分之一，所见花木之名品也仅有二分之一。但不管怎么说，成果依然引人注目，周师厚按照自己的分类法将530多种花卉归为以下几类：牡丹、芍药、杂花、果子花、刺花、草花、水花和蔓花。

一种园林文化如何刺激创新的能力，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欧阳修曾在1034年提到24种牡丹，但到了1082年李格非就能够说出109种牡丹！

根据欣赏的标准(花的结构和颜色)，这些牡丹被分成不同的亚群(subgroups)。“重瓣花”，即“千叶”，是最具欣赏价值的。周师厚在《洛阳花木记》中提到的“千叶黄花”有10种，“千叶红花”34种，①“千叶紫花”10种，“千叶绯花”1种，“千叶白花”4种。接下来是栽培变种“多叶”，“多叶”的重花瓣(由雄蕊演变为假的花瓣)数量较少。周师厚提到32种“多叶红花”，14种“多叶紫花”，3种“多叶黄花”和1种“多叶白花”。

至于芍药，周师厚提到41种“千叶”，包括16种“千叶黄花”，16种“千叶红花”，6种“千叶紫花”，2种“千叶白花”和1种“千叶绯花”。

“杂花”下面列出的82个品种，同样可能是根据人的欣赏程度来确定顺序的。其中，我们可以鉴别出50多种，包括2种瑞香，6种海棠，4种梅花，1种腊梅，1种海石榴……3种玉兰类植物(辛夷、木兰、木笔)，3种茉莉以及各种杜鹃。

---

① 周师厚《洛阳花木记》“牡丹”条下云：“千叶红花其别三十二”，与本文作者所引有出入。——译者注

“果子花”这一类揭示了通过选种而达到的多样性。这一类包括桃30种,梅6种,杏16种,梨27种,李27种,樱桃11种,石榴9种,林檎6种,柰10种,木瓜5种。

“刺花”这一类共有37种,其中有一半是不同于蔷薇的品种,有一些是“千叶”花瓣(重瓣花)。

“草花”这一类共有89种,包括兰3种,水仙花1种,菊24种,萱8种,金灯6种,石竹2种,罂粟1种,丽春花2种,凤仙花1种,玉簪花1种,曼陀罗花3种,蜀葵8种(包括单瓣花和重瓣花)等。

在17种“水花”里面,我们注意到有6种莲花。

“蔓花”的数量最少,只有6种,其中包括凌霄和牵牛花。

毫无疑问,对花木的兴趣以及园林的存在为城市创造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市场,吸引了大批的专业人员,而专业人员又极大地增加了在最具欣赏价值的花木中进行选择的多样性。值得注意的是,对花木的兴趣并没有被限制在唯美主义的范围之内:李格非至少提到两处园林种植药用植物,一个是文潞公的“东园”,另一个是司马光的“独乐园”。李格非在这方面没有发表更多的言论,但幸运的是司马光在其散文《独乐园记》中对自己为何栽植药用植物做了解释。对司马光来说,这些药用植物比装饰性的植物要重要得多。装饰性的植物,司马光每样只种植两个品种,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识其名状而已,不求多也”。与此相反,野生的草药更受关注。司马光派仆人到山中采来草药并移植到园中一百二十畦大小的地上,以便闲暇时作研究、鉴别和分类之用。显然他也曾在地方市场上出售这些草药(Métailié 1998,250)。虽然司马光的这篇散文无法精确地再现他的园林,但是通过这篇散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司马光对植物的欣赏与使用。在这篇散文中,我们可以发现,竹子是景观设计中用途最多的材料。在敞开的窗户之后,它们是一道移动的风景并为夏日带来清凉的气息;将它们种植在一小块地上,它们就为建筑物的存在注入生气;一小块圆形的小竹丛,就可以成为渔人暂栖的小屋;将它们密密地种在夹道两旁,并以药用蔓草覆盖,它们就成为一道走廊。所有的花木和草药都种植在形状整齐的园圃中,以形成和谐有序的系统的四方形,这更像是现代植

物园的观念而不是“中国园林”的传统观念。最后,以药树作为篱笆将园林划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在这里我们确实感受不到“天王院花园子”里牡丹像花海一样的盛景。

在同一时期、同一地理环境,一些富有的人可以拥有巨大的园林,栽种价值昂贵和风靡一时的花木,但另一些人,如司马光,却用他们的小得多的园林作为读书和思考的地方,作为反思植物本性的方式和零星收入的来源(Métailié 1998,249-250)。

城市园林为社交活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洛阳确实如此,而且我们在众多文本中发现了更多的材料。就像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说的,园林引入了一种礼物和回礼的文化,这种文化建立并加强了馈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社会联系(Mauss 1954)。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话题”,也是社会关系的发生器。有关园林的笔记经常提到嫁接中的插条或者幼枝的交换。连18世纪的皮埃尔·勒·席隆·丹卡维尔(Pierre le Chéron d'Incarville,1706~1757年)——一个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同时也是一个优秀的植物学家——在和一位皇家园林的园丁交好时,也用来自法国的植物种子交换中国植物的种子。

现在很难想象一座像11世纪的洛阳那样的城市,以及它的私人园林给它的居民带来的感受。在现代都市中能够最充分地体现这种感受的可能就是日本的京都了。这座城市几个世纪以来深受中国的艺术、生活方式和园林文化的影响,甚至它在古代的名字也是从洛阳借来的。除了世界闻名的京都御所,众多的佛教寺院和金阁寺(图1),还有佛教寺院里为数众多的小园林以及神社周围所谓的野生植被。这座城市的一些地区仍保留着许多小型的私人园林,有些规模甚小(图2),就在房屋的前面(图3、图4和图5)。当人们被邀请进入这些古老的房屋,会先经过一个或者两个小一些的园林。打开接待室的滑动门后,人们就能感受到屋内那个大园林所给予的神奇感觉了。在一些小巷里面,居民好像在竞相比赛创造绿色的走廊(图6)。尽管当地的居民没有什么空暇来参观这些著名的园林,但和这些花草朝夕相处,他们的生活也变得充满光彩了。当为某事而奔走时,人们会为了快乐的缘故而选择一条沿着围墙,而墙上又爬满了

植物的小径，或者选择神社背后茂盛的小树林旁的一条小路。至于这些花草——例如春天开放的浅紫色的瑞香，冬天开放的橘黄色和白色的桂花，以及最不寻常的、在冰雪覆盖大地时散发着淡淡幽香的腊梅——所带来的嗅觉上的快乐，那就更不用说了。

结　　论

就生命在古代中国（不仅是在宋代）具有的超越纯粹物质利益的方面来说，植物和园林在市民生活中的重要性非常引人注目。当然，现存的资料涉及的大多是富有的官员或王室成员的园林，但是经过仔细和广泛的梳理、阅读，我们得知：在中国，从皇帝到贫民百姓，都对植物（无论是经济性的、药用的还是装饰性的植物）有着浓厚的兴趣。陈淏子［《花镜》(1688年）的作者，此书在中国和日本都颇有影响］指出，每个人都希望在山林之间拥有一处广阔的庄园，但由于城市居住空间的不足，甚至是上层阶级的人也用盆或罐栽花以创造一处小小的风景。

毫无疑问，市属公园种植树木的服务对市民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如上海世纪大道两旁的一系列公园那样，但是它们无法取代私人园林——即使规模很小——对文化进步作出的贡献。在洛阳和后来的一些城市——最著名的是杭州、苏州和扬州——私人园林促进了植物文化（botanical culture）的成熟和园艺实践的发达，使一种格外精致的审美文化的兴旺成为可能。一部分园林被用来研究药用的或其他用途的植物，除此之外它们首先是用来吸引市民前往参观风景名胜的。通过交换种子和嫁接的枝条，园林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中国文化有着非凡的再生能力，即使城市完全消亡，所有古代园林被破坏，它也能从死灰中复燃。洛阳园林为后世许多城市所效仿，我们希望对洛阳园林的回忆能够对本世纪中国城市花卉文化和其他观赏植物文化的复苏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中文

[1] 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园综》,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2] 陈淏子辑,伊钦恒校注:《花镜》,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5 年版。

[3] 陈埴、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年版。

[4]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说郛》卷二十六,据明钞本,涵芬楼藏板。

[5] 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6] 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说郛》卷二十六,据明钞本,涵芬楼藏板。

外文

Watelet, Claude-Henri. *Essais sur les jardins*. Paris: Prault, 1774. English translation: *Essay on gardens: A Chapter in the French Picturesqu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3.

参考书目

中文书目

[1] 陈从周:《说园》,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2] 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3] 张家骥:《中国造园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外文书目

[1] Clunas, Craig.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 1996.

[2] Fung, Stanislaus. "Guide to Secondary Sources on Chinese Garden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18, no. 3

(1998):269-286.

[3] Keswick, Maggie. *The Chinese Garden*. London: Academy Editions, 1978.

[4] Li, Hui-lin. *The Garden Flowers of China*. New York: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1959.

[5] Makeham, John. "The Confucian Role of Nam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Garden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18, no. 3 (1998):187-210.

[6] Mauss, Marcel.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54.

[7] Métailié, Georges. "Some Hint on 'Scholar Gardens' and Plants in Traditional Chin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18, no. 3 (1998):248-256.

[8] Needham, Joseph, Lu Gwei-dje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6:1, *Bot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9] Wu, Xin. "Yuelu Academy: Landscape and Gardens of Neo-Confucian Pedagog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 Designed Landscapes* 25, no. 3 (2005):156-190.

注释

[1] 它可能是最早为西方人所知的关于园林的中国文本。它可能被一个叫皮埃尔·玛迪亚·希博(Pierre Martial Cibot)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翻译并由华特莱特(Watelet)在1774年第一次出版。

[2] 已经有人把这类散文收集和编辑成书,见陈埴、张公弛选注,陈从周校阅:《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陈从周、蒋启霆选编,赵厚均注释:《园综》,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关于这个主题,见梅约翰(Johu Makeham)的《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儒家命名》,载《园林与景观设计史研究》1998年第18期第187~210页;吴欣的《岳麓书院:理学教育中的景观与园林》,载《园林与景观设计史研究》2005年第25期,第156~190页。

[4]见李惠林(Li Hui-lin,音译):《中国的园林花卉》,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59年

版;李约瑟、鲁桂珍:《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5] 见李约瑟、鲁桂珍:《中国科学技术史》,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431 ~ 433 页。

[6] 此文的另外一些版本署名为“周氏”。



图 1　日本京都金阁寺,按中国式园林风格建造,从它的大小我们可以对古代洛阳园林的规模有所了解。



图 2　京都大学主校区附近一个小街道里的普通住宅前的微型"园林"。



图3　祇园一处小街道旁的精致的景观庭园。祇园是京都的一个区，现在仍是艺伎的居住地。



图 4　京都植物园附近一座私人住宅的围墙内外的小型花园。



图 5　京都植物园附近的居民区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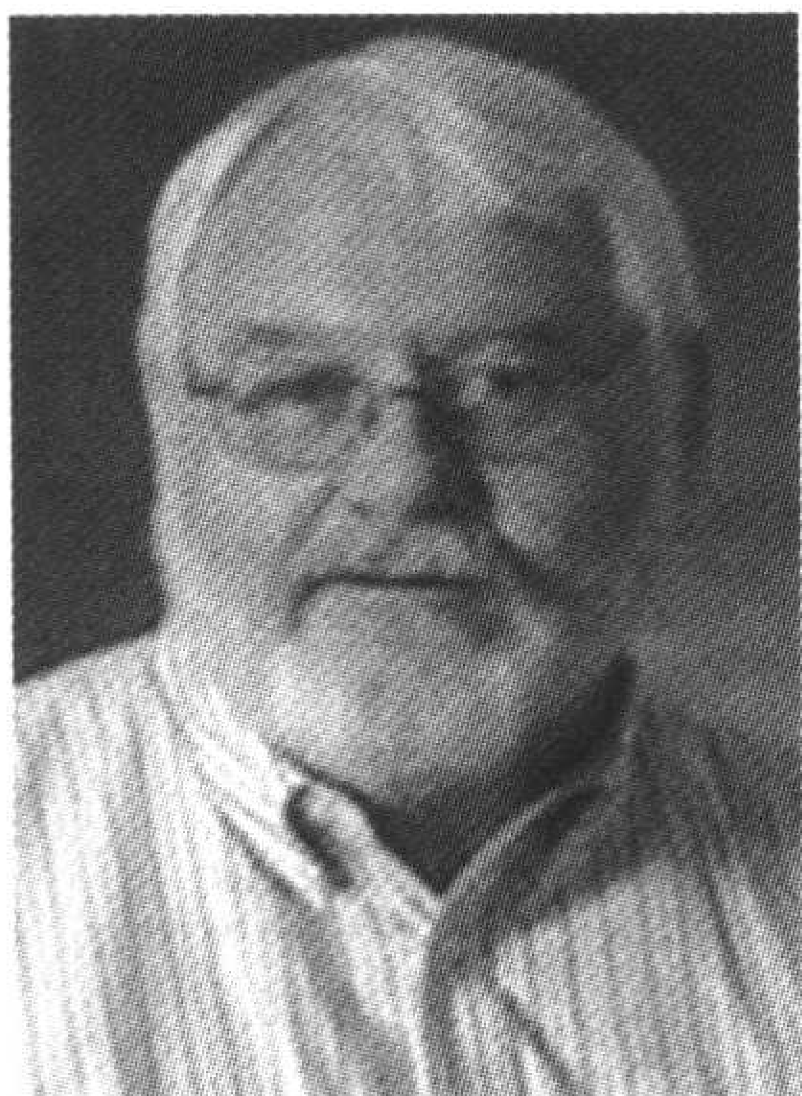
图 6　京都大学主校区附近的一条小巷。

（作者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聂春华　译）

奇观、仪式、社会关系：北宋御苑中的天子、子民和空间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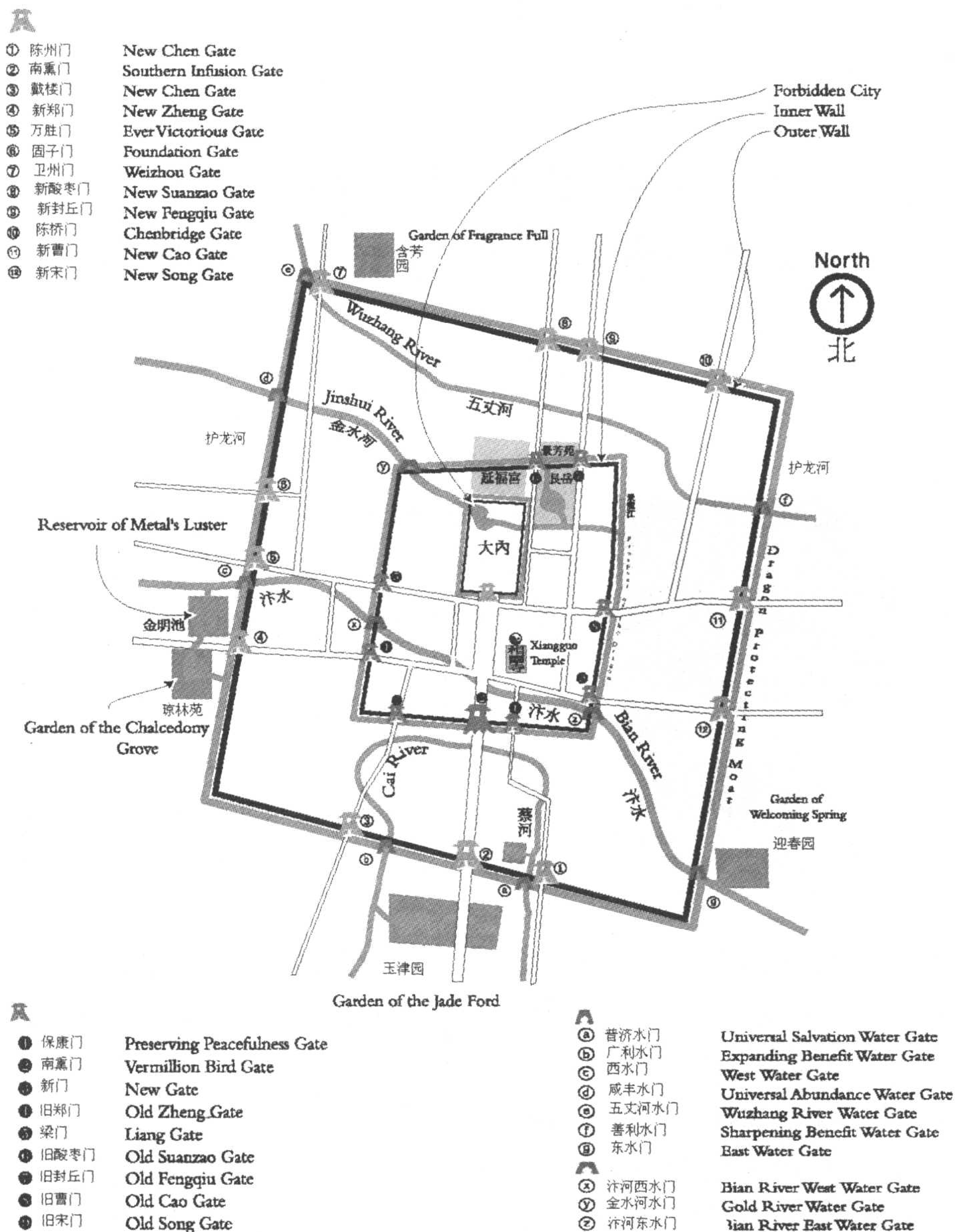
[美]奚如谷



奚如谷(Stephen H. Wes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全球研究学院语言和文学系客座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前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中国及东亚语言文化教授;敦巴顿橡树园委员会资深成员、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11至14世纪的中国戏曲与文化史,特别是园林和城市空间。

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园苑有三大类:御苑、寺庙之地以及私家园馆;其数量之大,有学者曾列出近八十座,并指出此外可能还有上百座。[1]这些著名园苑中包括四大城门处的四座皇家苑囿,以及大内旁边的艮岳。艮岳在历史上名誉不佳,某种程度上成为北宋王朝的缩影:这里聚集了各地的奇花异草、奇珍异兽;而这种穷奢极欲的搜罗,最终造成了北宋王朝经济上和道义上的崩溃。[2]除艮岳外,其他御苑都定期或因特殊情形的需要而供朝廷和官员们使用;其中城西的金明池,一年中还对普通民众开放六周。

从实用角度来说,皇家苑囿兼有菜园、马苑、动物驯养处等多种职能,



开封及其名园,约1100年

但最为重要的是,园苑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空间:通常的观赏、游宴活动之外,对文人而言,它提供了诗文唱和、感时会友的必要舞台和契机;与庶民有关的,则是御苑对所有民众开放时宫廷奇观的登场。这些宗教仪式和宫廷庆典,在庶民眼中的意义未必是神性至上或天子至尊,而是都市生活中感官享受和物质享受的节点,标示着娱乐、饮食、博戏与狎妓混为一体的社会空间。园苑由此成为生产性空间,创造出一套削弱皇权展示的社会关系。换言之,本应被这种展示慑服的观众,创造出了一种意义的转换:对庶民来说,宫廷奇观被感官和物质愉悦所颠覆。这种社会空间的建构,用消费和欲望这一社会力量,消释了以结构等级秩序——具体地说,就是以皇族、贵室、僚臣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为初衷的皇家展览。

宋代中国以园苑著称的,大概首属拥有五百多种牡丹品种的洛阳。但汴梁似乎也并不逊色。袁氏《枫窗小读》如此描写都城汴梁及其外围的苑囿:[3]

> 先正有《洛阳名园记》。[4]汴中园囿亦以名胜,聊记于此。"州南则玉津园。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景初园。陈州门外园馆"最"多",[5]著称者奉灵园、灵嬉园。"州东宋门……麦家园、虹桥王家园……州北李驸马园……西……郑门"外"下松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西水门外养种园。"州西北元有庶人园"。城内有芳林园、同乐园、马季良园,其他不以名著,约百十,不能悉记也。[6]

这段文字中有一部分直接来自记录1117~1125年汴梁生活的《东京梦华录》(下简称《梦华录》)。《梦华录》最早的版本见于1189年,但数据表明,其稿本早在1147年就存在了。这部书前五卷横向记录平民和宫廷活动的重要场所,后五卷则纵向记录了一年之中汴梁这个都市舞台上上演的节庆活动和重大事件,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一段描写一年一度的"探春"活动的文字:

> 收灯毕,[7]都人争先出城探春。州南则玉津园,外学方池亭

> 榭，[8]玉仙观。[9]转龙弯西去：一丈佛园子、王太尉园、奉圣寺[10]前孟景初园、[11]四里桥望牛冈、[12]剑客庙。[13]自转龙弯东去：陈州门外园馆尤多。州东宋门外快活林、勃脐陂、[14]独乐冈、[15]砚台、[16]蜘蛛楼、麦家园、虹桥王家园。曹宋门之间东御苑、[17]乾明崇夏尼寺。州北李驸马园。州西新郑门大路直过金明池西：道者院，院前皆妓馆；以西宴宾楼，有亭榭、曲折池塘、秋千、画舫，酒客税小舟帐设游赏；相对祥祺观，直至板桥，有集贤楼、莲花楼，乃之官河东、陕西五路之别馆，寻常饯送置酒于此。过板桥有下松园、王太宰园、杏花冈。金明池角南去水虎翼巷，水磨下蔡太师园、南洗马桥西巷内华严尼寺、王小姑酒店。北，金水河两浙尼寺、巴娄寺、养种园，四时花木繁盛可观。南去药梁园、童太师园、南去铁佛寺、鸿福寺、东西柏榆村。州北模天坡、角桥、至仓王庙，十八寿圣尼寺、孟四翁酒店。州西北元有庶人园、有创台、流杯亭榭数处，[18]放人春赏。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阒地。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杏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于是相继清明节矣。[19]

这段文字用奇特的语言拼图，将历史上最重要的四座御苑与郊外亭榭、宴饮楼舍、寺院甚至尼庵放置在同一层面上，虽然始于对皇家苑囿的描述，最终却创造出了一个由花、乐、博戏与女妓共同构成的艳逸风景。换言之，在这段文字中，皇家园苑从原本存在于公众视线之外的仪式地点，渐渐转变为由物质和感官享受定义的公共消费空间。在一种细微的文字姿态中，花卉与女子叠合在一起："万花争出"是妙曼女子巧笑的红颜，"莺啼芳树"是按乐歌者的暖律娇声，"细柳""燕舞"是舞者柔软的腰肢，蜂蝶作为陈陈相因的对媒人的隐语，在"白面"与"红妆"中穿梭，"折翠簪红"是男女交合的经典意象，而绮陌芳草，则将欲望从深闺轻移缓铺在园苑之中——"芳"香在这里同时指花卉与欲望的释放。

对御苑的这种展现与历史文本、诏诰、奏疏以及诗文中的叙述截然不同。朝廷大臣拟订的文本文献中,天子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无形中制约了文本的视界。而就诗文写作而言,文人悠长的文学交流也形成了一种有规范性的传统;这一传统既为当下的社交性(sociality)所主宰,也为对文学传统的记忆所驱动。换言之,只是在有限的士大夫阶层中创造流传的诗文传统,本质上成为一种可以获取文化、社会与政治声誉的货币。在这一背景下,叶梦德(1077~1148年)在北宋末年从历史的视界如此总结御苑的功能:

琼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园谓之四园。琼林苑,干德中置。太平兴国中,复凿金明池于苑北,导金水河水肴之,以教神卫、虎翼水军习舟楫,因为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园,[20]因以皇城宜春旧苑为富国仓,遂迁于此。玉津园,则五代之旧也。今惟琼林金明最盛。岁以二月开,命士庶纵观,谓之"开池"。至上巳[21]车驾临幸毕,即闭。岁赐二府[22]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金明水战不复习,而诸军犹为鬼神戏,谓之"旱教"。玉津半以种麦,每仲夏驾幸观刈麦。自仁宗后,亦不复讲矣。惟契丹赐射为故事。宜春俗但称庶人园,以秦王故也,荒废殆不复治。祖宗不崇园池之观,前代未有也。[23]

上文明显透露出,对于朝臣来说,四园的主要功能是仪式性和实用性的。这一点也见于类书中集辑的史料中。比如12世纪的类书《玉海》中关于玉津园的记载,就具体地列出了御苑的这些功能:

建隆四年四月幸玉津园,阅近卫诸军骑射。(十八日宴从臣。一本云,建隆元年夏四月十六日乙酉幸至津园。)干德四年二月幸,至玉津园,阅卫士骑射。九月又幸玉津园,观刈麦。(元佑五年三月,即玉津园宴饯太师文彦博。)

园在南熏门外,夹道为两园,中引闵河水别流贯之。周显德中

置,本朝因之。三班及内侍监领兵校隶及主典二百六十六人。岁时详物进供入内。仲夏驾幸观获麦。(玉津园半以种麦。)赐从臣饮宴及赏赉园官,啬夫有差。又进麦穗五百秉,麦十斛,面百囊,命分赐中外。凡契丹朝贡使至,皆就园赐宴射。凡皇城司诸园池入官者属焉。

杨侃《皇畿赋》:"景象仙岛,园名玉津,珍果献夏,奇花进春,百亭千榭,林闲水滨,则有麒麟含仁,[24]驺虞知义。[25]神羊一角之祥,[26]灵犀三蹄之瑞,狻猊来于天竺,驯象贡于交趾,[27]孔雀翡翠,白鹇素雉,曲屈沟畎,高低稻畦,越卒执耒,吴牛行泥,[28]霜早刈速,春寒种迟。何江南之野景,来辇下以如移。雪拥冬苗,雨滋夏穗,当新麦以时荐,故清跸而亲至。辇从千官,郊陈万骑,既亲获〔=观获〕以云罢,亦宴犒而后已。"

太祖自建隆元年四月十六日,至开宝九年五月十四日,凡十三临幸。太宗自兴国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己未,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再幸。真宗自咸平五年四月七日观麦,至天禧四年五月七日,凡十幸。仁宗自天圣三年五月十二年〔=日〕,至庆历四年五月十一日,凡三幸。[29]

从上文可以看出,玉津园主要用来:(1)供天子检阅近卫诸军骑射;(2)宴犒大臣;(3)举行与农业耕作有关的仪式;(4)驯养象征祥瑞及皇权的动物,包括仪仗所用的大象;[30](5)为皇城提供菜蔬及谷物;(6)为契丹使者设宴;(7)与宠臣宴聚。这些仪式上和实用上的价值,也见于文献中对其他御苑的记载。比如,琼林苑就不仅是游赏之地,也是凿冰井之处;[31]金明池最初则是为操练水卒而开凿的。[32]不过,操练最终流于一种简单的娱乐活动。[33]随着时间的推移,汴梁西部逐渐垄断了宫廷的各项活动,并从11世纪中期开始,成为逸乐的主要场所。这里每年都举行皇帝亲自参与的各种仪式和活动,并成为天子将自己展示于民众之前的少数地点之一。

对朝廷来说,这些场合是显示皇威浩荡的绝好机会。除了向庶民开放御苑之外,这样的机会也包括新年期间的庆贺活动。届时灯山和乐棚

将在都城最壮观的城楼——宣德楼——前搭建，而天子本人也会在宣德楼上公开露面。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的宣德楼成为天子公开露面的专用城楼。正是在宣德楼上，天子或与民众共赏歌舞百戏，或颁布大赦（开封府的犯人届时将被排列出来），或奖赏表现出色的商贩。在新年期间的庆贺活动中，一块标示整个活动主题的匾额还会被醒目地高置于灯山之上——“宣和与民同乐”。

“与民同乐”的姿态，既有政治宣传上的意义，又与传统观念中的血族观念息息相关。周朝以来，政权机构的基本组织原则之一就是“天命”。从理论上来说，任何道德完善的人都可因亲承天命而君临天下；而子民之听命于君王，也被视为是君王道德威望使然。这种逻辑暗示出，君王不道，“民”有罢君权之权。在这种政治语境中，园苑成为结构君臣关系、标示天子之道或天子对其子民进行笼络和置陷的场所。早在《孟子》中，就有下面两段对应的文字：

>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34]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35]
>
>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36]

《孟子》认为，苑囿中“与民同乐”时节上的规律化，表征着统治的稳定。这种看法充分肯定了苑囿内上演的各种活动的仪式性质。从朝廷的

角度来看,这些活动具备仪式所有的特点:秩序性、规律性以及可预知性。而这些特点都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重点讨论论据、传为张择端所绘的《金明池争标图》(图1,以下简称《争标图》)中(当然,张氏最著名的作品是《清明上河图》)。虽然此图的绘制年代不详,但它无疑地绘制于画家对相关事件仍记忆鲜明之时。

《争标图》以细腻的笔触将我们的视线集中在金明池的中心:水心殿和舟船整齐地排成横跨池面的两列,其两端各被体积庞大的构造物固定着。天子的龙舟(图2a)之庞大与其他船只形成了鲜明对照。画面所见,是建筑的整饬,船只的排列有序,以及龙舟的泰定;而砖石砌成的堤岸与围墙,则在树木点缀中引导着宽窄不一的通道。

画面整体上反映出争标赛事的高度仪式化,重点则是人们视觉触及不到的坐在临水殿前彩楼下的天子。整个“舞台”的设计,使天子可以将各项活动、景观(从虹桥边的百戏、傀儡船和乐部,再到竞标的军校)都一览无余。画面呈现的似乎是表演与音乐之后竞标即将进行的瞬间。参加竞标诸船排列上的些微错乱,透露出比赛的一触即发。结论似乎是,《争标图》以画面的程序性和建筑的宏丽表达了天子隐形于视觉表象之外的无处不在的在场。

但是,这个结论在进一步的解读中受到挑战。事实上,画面上只有乐人和其他准入中心事件控制范围之内的部分是凝重稳定的。聚集在建筑、围墙和园门周围的、代表观众的人群,则被处理成鬼魅般的人的漩涡。这种处理方法,无疑地划出了社会阶层的区别,将因地位或仪式中的角色需要而进入仪式舞台的人们从芸芸众生中划分出来,但另一方面,鬼魅般的人群的不能细辨,又暗示出一种与中心事件不同的社交性和意义。金明池作为“地点”(place),是庞大、稳固、正式甚至是不动的(由龙舟体积之大表达出来);它被中规中矩、逐渐减小的各种框架(围墙、堤岸等)圈固起来,成为仪式按程序进行的场所。画面的“空间”(space)则被这个固定的“地点”及其周围漫流的各项活动所决定;原本空白的空间,也被这些活动渗入。比如,图2b和图2c中,本来毫无二致的模糊人团,被“硬”性的物体或细节的出现赋予了一种叙事节奏:推车、担食物的人、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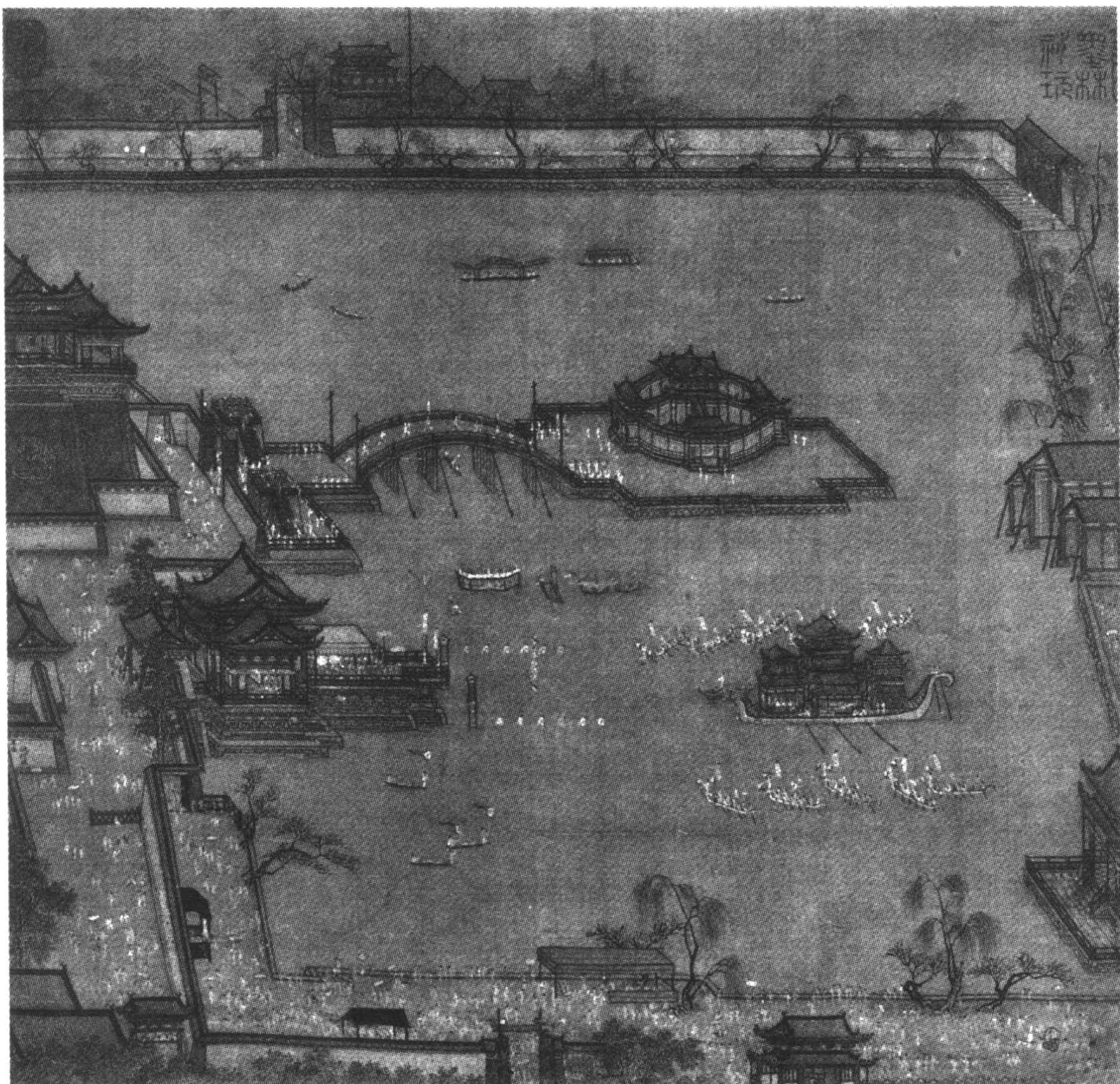


图1　张择端:《金明池争标图》(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谈的人、观看表演的人、准备饮宴的人。这种“地点”和“空间”表现的二元性,一方面通过把如此众多的人物及其活动控制在几乎不可见(至少是极为不突出)的视觉程度,来认可社会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又暗示出园苑作为一种空间存在,是可以被另外一种社会力量创造、使用、并被赋予崭新的诠释的。

如果没有宋代的“迭游录”(perigraphy)——《东京梦华录》的话,上述对北宋空间建构中的“抵抗叙事”(resistant narrative)的解读或许会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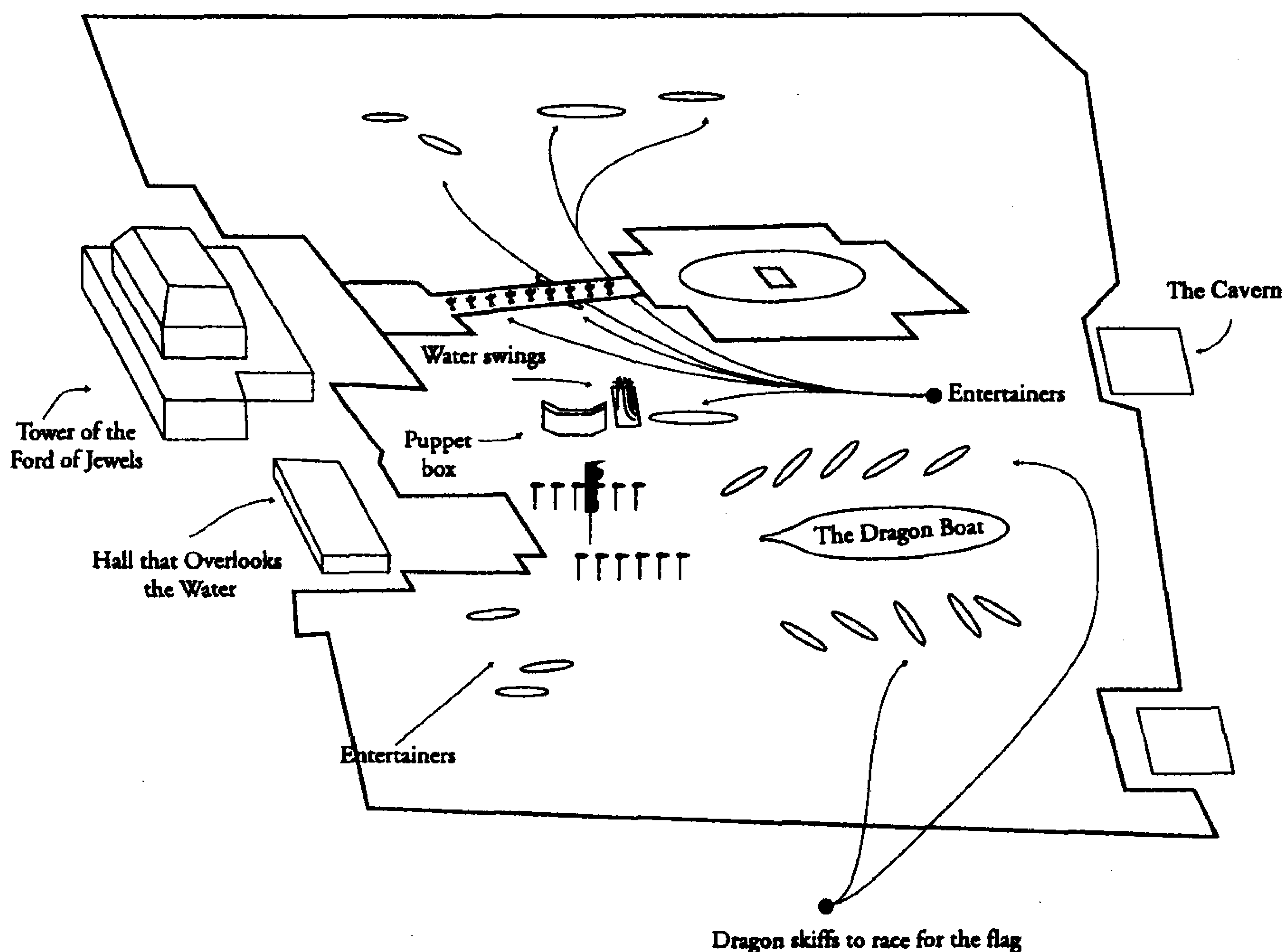


图2 金明池示意图

于空泛。[37]这部"迭游录"的存在,证明了《争标图》中这种微妙的姿态,是同时代文本书写的平行发展。这一发展,既认可都城作为物质现实及皇权象征的存在,又建构出一种抵抗性的诠释(resistant interpretation),见证着新的空间性在固定的地"址"之间的产生。《梦华录》第七章中对金明池和琼林苑有下面一大段的记述:

三月一日开金明池琼林苑

三月一日,州西顺天门外开金明池、琼林苑。每日教习车驾上池仪范,[38]虽禁从士庶许纵赏,[39]御史台有榜不得弹劾。池在顺天门外街北,周围约九里三十步,池西直径七里许。[40]入池门内南岸,西去百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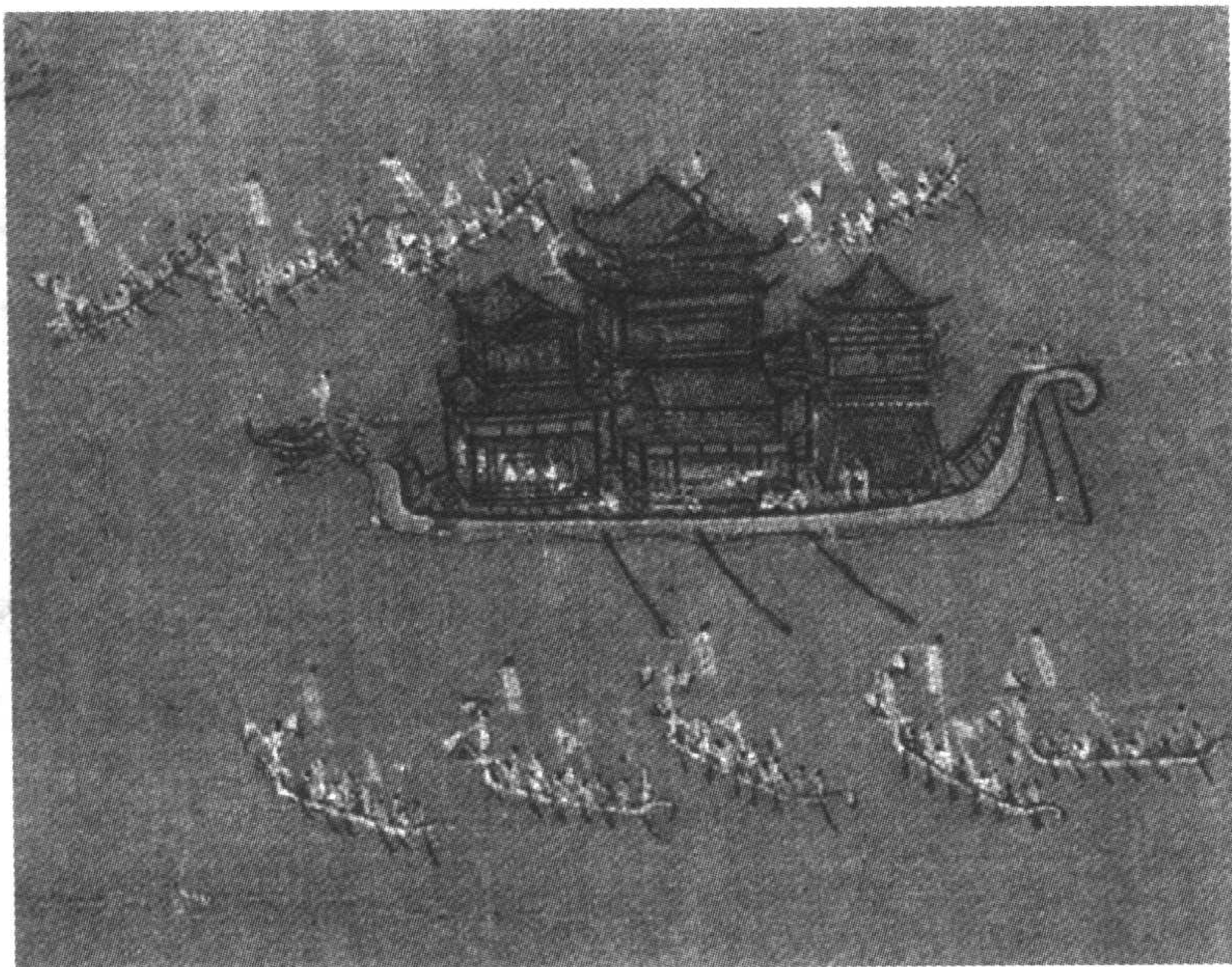


图 2a 《金明池争标图》局部(龙舟)



图 2b 《金明池争标图》左下局部(金明池东北角)

步,有面北临水殿,车驾临幸观争标锡宴于此。往日旋以彩幄,政和间用土木工造成矣。又西去数百步乃仙桥,南北约数百步,桥面三虹,朱漆阑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谓之“骆驼虹”,若飞虹之状。桥尽处,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41] 向背〔=北〕大殿,中坐各设御幄,朱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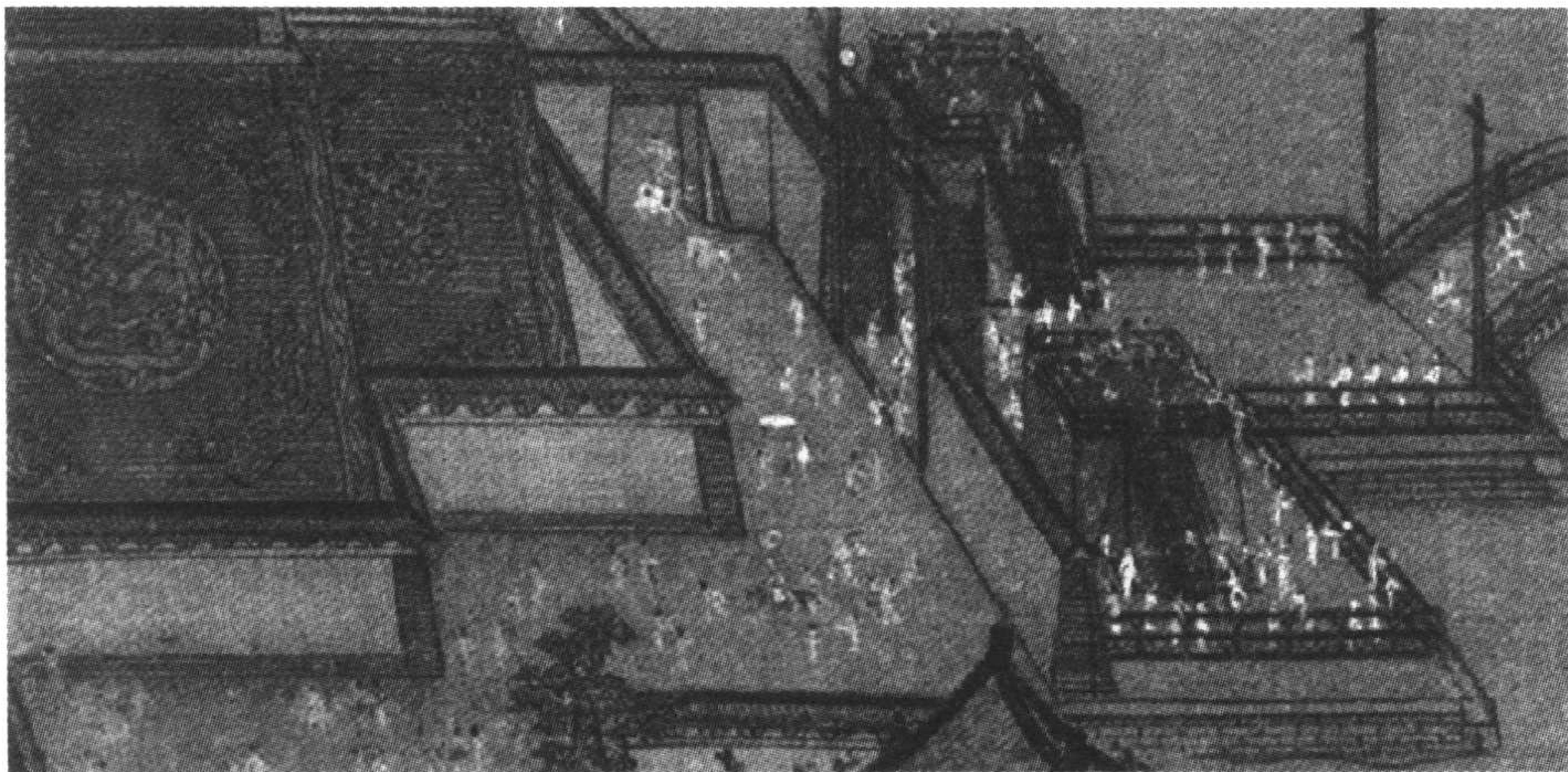


图 2c 《金明池争标图》左中局部(金明池正南)

明金龙床,河间云水戏龙屏风,不禁游人。殿上下回廊皆关扑钱物、饮食、伎艺人作场,勾肆罗列左右。桥上两边用瓦盆,内掷头钱。关扑钱物、衣服动使、游人还往,荷盖相望。桥之南立棂星门,门里对立彩楼,每争标,作乐列妓女于其上。门相对街南有砖石甃砌高台,上有楼观广百丈许,曰"宝津楼",前至池门,阔百余丈,下阚仙桥、水殿,车驾临幸观骑射百戏于此。池之东岸,临水近墙皆垂杨。两边皆彩棚幕次,临水假赁,观看争标。街东皆酒食店舍,博易场户、艺人勾肆、质库;不以几日解下,只至闭池便典没出卖。北去直至池后门,乃汴河西水门也。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信〕其价买之,临水斫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习水教罢,系小龙船于此。池岸正北对五殿,起大屋,盛大龙船,谓之"奥屋"。车驾临幸,往往取二十日。诸禁卫班直簪花,披锦绣捻金线衫袍、金带、勒帛之类结束,竞逞鲜新。出内府金枪、宝装弓剑、龙凤绣旗、红缨锦辔,万骑争驰,铎声震地。

这段文字铺排出仪式举行地点的其他活动:关扑、表演、饮食、聚会乃

至捕鱼等。和其他章节相似,这段描写着重渲染场景的物质华丽,其中最典型的是对服饰与仪仗装点的痴迷。和上面所引"探春"一段文字一样,行文的兴趣集中在诉诸感官的东西:质地、样式、颜色以及禁卫们华丽的装扮。

这种对细节的注意也反映在对娱乐活动的描写上。历史文献中,表演活动常常被一笔带过,表明表演的位置,在于它是整个事件的一环。《争标图》的摹写方式也是如此,表演似乎凝固在一种动能中,但画面强调的依然是对称与秩序。在《梦华录》中,实际演出活动则漫流在页面上活动的湍流中:

驾幸临水殿观争标锡宴

驾先幸池之临水殿,锡燕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仪卫,近殿水中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又有一小船,上结小彩楼,下有三小门,如傀儡棚,正对水中。乐船上参军色进致语,乐作,彩棚中门开,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垂钓,后有小童举棹划船,辽绕数回作语,乐作,钓出活小鱼一枚;又作乐,小船入棚,继有木偶筑球、舞旋之类,亦各念致语、唱和,乐作而已。谓之"水傀儡"。又有两画船,上立秋千,船尾百戏人上竿,左右军院虞侯监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秋千,将平架,筋斗掷身入水,谓之"水秋千"。水戏呈毕,百戏乐船并各鸣锣鼓,动乐舞旗,与水傀儡船分两壁退去。有小龙船二十只,上有绯衣军士,各五十余人,各设旗、鼓、铜锣,船头有一军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挥兵级也。又有虎头船十只,上有一锦衣人执小旗立船头上,余皆着青短衣,长顶头巾,齐舞棹,乃百姓卸在行人也。有飞鱼船二只,彩画间金,最为精巧上,有杂彩戏衫五十余人,间列杂色小旗,绯伞,左右招舞,鸣小锣鼓、铙铎之类。又有鳅鱼船二只,止容一人撑划,乃独木为之也。皆进花石,朱缅所进。诸小船竞诣奥屋,牵拽大龙船出诣水殿。其小龙船争先团转翔舞,迎导于前。其虎头船以绳牵引龙舟。大龙船约长三四十丈,阔三四丈,头尾鳞鬣,皆雕镂金饰,楻板退光,两边列十合子,充合分歇泊,中设御座、龙

水屏风。楻板到底深数尺,底上密排铁铸大银样如卓面大者压重,庶不欹侧也。上有层楼、台观、槛曲,安设御座。龙头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桨,宛若飞腾,至水殿舣之一边。水殿前至仙桥,预以红旗插于水中,标识地分远近。所谓小龙船列于水殿前,东西相向,虎头飞鱼等船,布在其后如两阵之势。须臾水殿前,水棚上一军校,以红旗招之,龙船各鸣锣鼓出阵,划棹旋转,共为圆阵,谓之"旋罗"。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而为二,各圆阵,谓之"海眼"。又以旗招之,两队船相交互,谓之"交头"。又以旗招之,则诸船皆列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见旗招之,则两行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并虎头船之类,各三次争标而止。其小船复引大龙船入奥屋内矣。

《梦华录》与《争标图》既相应又相左的关系提醒我们,无论文字还是画面都不是对同一复杂事件的真实再现。启蒙主义之后的文化倾向,赋予绘画(特别是模拟性的)一种"现实"性;现代摄影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对视觉艺术的这种认识。但是我们应当意识到,文本与画面所呈现的,都是不易界定的、包含多重价值的世界。这个世界一面在仪式与奇观两个重点之间游移,一面展示着在仪式与奇观周围流动着的社会活动。注重细节和厚重的渲染是《争标图》与《梦华录》通用的修辞手段,诱使我们以为它们在对复杂的事件进行全面的呈现。但其实二者都是片面的,这从它们的互补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争标图》在视觉上证实了《梦华录》中对某些建筑与舟船的记载,《梦华录》则将《争标图》中起主控作用的几个庞大建造物减弱为在时间中展开的一系列活动的简单标点。

"迭游录"的针对性读者与《争标图》不同,也因此更为具体地阐释了园苑在庶民生活中的作用。也就是说,《争标图》中泄露庶民生活信息的潜在姿态,在《梦华录》中成为显在的重点。书中用一次次的"谓之……"结构,引出"都人"和"游人"的口头语汇;而"都人"、"游人"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在正统历史和官方文献中,几乎总是没有声音的;《梦华录》里

"谓之"句里介绍的关于园苑的语词,在别处则毫无踪影。可以说,《梦华录》所见证的,是都市居民("都人")这个社会阶层所创造的新的历史性。"都人"语汇中的名词几乎都指向"游"动中的"物",暗示出这些术语本身即是一种语言遗痕,一种创造了苑囿这个社会空间的行动的具象。

这个社会空间充满了闲适和逸乐。描写天子驾幸金明池时,《梦华录》中插入了这段旁白:

池苑内纵人关扑游戏

池苑内,除酒家、艺人占外,多以彩幕缴络铺,设珍玉、奇玩、疋帛、动使、茶酒器物关扑。有以一笏扑三十笏者,以至车马、地宅、歌姬、舞女皆约以价而扑之。出九和合有名者任大头、快活三之类,余亦不数。池苑所进奉鱼、藕、果实,宣赐有差。后苑作进小龙船,雕牙缕翠,极尽精巧。随驾艺人,池上作场者,宣政间:张艺多、浑身眼、宋寿香、尹士安,小乐器;李外宁,水傀儡;其余莫知其数。池上饮食,水饭、凉水菉豆、螺蛳肉、饶梅花酒、查片、杏片、梅子、香药脆梅、旋切鱼脍、青鱼、盐鸭卵、杂和辣菜之类。池上水教罢,贵家以双缆黑漆平船、紫帷帐,设列家乐游池。宣政间亦有假赁大小船子,许士庶游赏其价有差。

赌博通常是被严令禁止的,例外的只有两种情形:新年和金明池开池期间。届时其他类似的禁令也会被解除。借此时机,青年女子也可以走出深闺,参加博戏或在酒家这样的公共场合饮宴。性别的界限在这些特定的时节得到了放松,不同社会阶层也在共同的追欢求乐中有了触碰的机会。官方对这些事件的记载,总是维护着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划分——当然,这种划分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考虑过程。即使在《争标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自上而下的阶级差异:仪式的井然有序和天子的无形在场占据了画面的中心,普通民众则微小到几不可见。《梦华录》恰恰颠倒了这种秩序,只是在讨论了庶民的快乐——游戏、酒食、性以及歌舞之后,才将笔触转移到对"贵家"的描写。所谓"贵",就自上而下的人伦结构而言,意指"珍贵"或"贵族";自下而上而言,则简单地指富人或上层

社会——这样,一个"贵"字,将朝廷、其廷臣贤士以及富商都笼统归为既得利益的一群。也就是说,《梦华录》中被模糊化的,是贵家,而不是庶民——这与《争标图》形成鲜明对照。

闲适总是潜在地威胁着仪式的原本意义,而正是"奇观"(spectacle)连接了闲适与仪式这两种状态。以凸显天子之威为目的的"奇观"在城市大众眼中可以轻易地转变为感官上的一种炫耀或成为一种消费力量的表达。"迭游录"着墨最多的是衣饰、饮食、仪仗用品的质地质量(比如金银之分等),并常常用钱来标示这些物品的价值。这说明中国早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就萌生了一种植根于消费主义的文化。

对仪式的颠覆,消释了高雅文化所表达和维护的等级秩序。《梦华录》如此描述在三月份的庆典接近尾声时天子的"驾回":

驾回仪卫

驾回,则御裹小帽簪花乘马,前后从驾、臣寮、百司、仪卫悉赐花。大观初,乘骢马。至太和宫前,忽宣小乌,[42]其马至御前,拒而不进,左右曰:"此愿封官。"敕赐龙骧将军,然后就辔。盖小乌平日御爱之马也。莫非锦绣盈都,花光满目,御香拂路,广乐喧空,宝骑交驰,彩棚夹路,绮罗珠翠,户户神仙,画阁红楼,家家洞府,游人士庶,车马万数。妓女旧日多乘驴,宣政间惟乘马,披凉衫将盖头背系冠子上。少年狎客,往往随后。亦跨马,轻衫小帽,有三五文身恶少年控马,谓之"花褪马"。用短缰促马头,刺地而行,谓之"鞅缰"。呵喝驰骤,竞逞骏逸。游人往往以竹竿挑挂终日关扑所得之物而归。仍有贵家士女小轿,插花不垂帘幙。自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闭池,虽风雨亦有游人,略无虚日矣。是月季春,万花烂熳,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幙高楼,宿酒未醒,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最一时之佳况。诸军出郊,合教阵队。[43]

这里,妓女的出行形成对天子回驾的拟讽(parody)。前者具备了后

者的所有必备条件:一伙随从、特定的衣饰以及特别的驾乘——马。《梦华录》用同样的风格和语法来讲述二者,所不同的只是巡行中服饰、道具的质量而已。对《梦华录》的作者和由他代言的城市民众来说,天子和朝廷可以被拿来作为对世界进行编密的便利体系。高雅文化中天子在仪式、政治中的作用并没有被拒认,但也未被凸显。《梦华录》所做的,是将天子及其仪仗放置在一种新的、建立于日常消费和物质欲望之上的意义体系中。传统的中国史地文献是按等级来结构的,往往从天、天子开始,顺序谈及皇族、大臣、制度、贤良和名胜、地理、农业,而以代表"它者"的四夷和一般平民的风俗作结。这种与农业社会息息相关的写作秩序,与仪式一起,在北宋受到了一种新兴的城市文化的冲击。

从这一角度来说,《梦华录》以及《争标图》的某些方面,可以被视为是对这种新兴文化的评注。苑囿作为皇家场所之一,成为话语生产的场址,就权力展示的意义而创造出了挑战性的话语。对朝廷来说,权力展示的意义源于与农业社会密切关联的古老仪式传统,正如天子在收获季节观获麦、春分时亲耕一样,他在"开池"时的现身标识着春夏的交替。"开池"作为季节性的仪式,象征着统治者、季节、阴阳交替、与农业节气之间的特殊联系。各种典志及史书不厌其烦地用几乎一字不差的短句(天子某日临幸某地)传达着上述信息。如《争标图》一样,这些文献试图将"天子某日临幸某地"标识为一种永恒往复的特定时刻,将皇权与农业运作粘合在一起,以此告示臣民天地之间诸事和谐,而天子作为天地之气的完美传承者则意味着王朝将永恒存在。

对"迭游录"的作者而言,"开池"意味着创造世俗的、民间的公共空间的机会。在这里,享乐、消费与欲望趋向于抹平等级秩序。这也许置空了"开池"的仪式意义,但也加强了城市居民与天子的联系。居民们定期参与宫廷仪式,用《梦华录》的话来说就是组成了"如堵"的"观者",注视着天子在都城中的穿行。"奇观"是"开池"的两种阐释(世俗性或礼仪性)的中心环节,因为"奇观"的表演性,既成全了它作为都市剧场的存在,又成全了它作为皇家典礼的意义。《梦华录》中所渲染的,显然是以天子为主角的都市剧场。与此悖反地,在文本的日常性破坏了仪式的等

级性时，围绕着宫廷活动展开的闲适与表演的季节性，与仪式本身一样仍然为都市庶民传达着稳定与权力的信息。子民们爱戴着他们的天子，因为天子提供了一套稳定的闲逸活动；而当这些活动将仪式变为节日时，提示权力和权威的宫廷姿态已在大众心理中被颠覆为幸福时光了。

如此，金明池成为各种经验、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累积地。这些不同的经验漫流在金明池中，经营着经验与记忆的波纹。同时，这些经验在视觉和文本创作中的作用，使得这些作品成为种种意义层面的人工制品。对御苑的文本考古既得益亦受损于此。记忆非历史，总是破碎的、置于某个人群的某种“思”的纹路（或曰“文”）之中的——而这种“思文”在重构过往经验中也再造了空间。若非《梦华录》这本从记忆中走出的“迭游录”，我们的视野中将只会留存历史文本对高雅文化的反映、对人伦教化的提倡及其对仪式的注重。没有这一记忆文本，金明池只会是一个抽象的、知性化的或美学上的一个建筑物，而与使用它的人群的真实感受相割离。

注释

[1] 刘益安：《北宋开封园苑的考察》，《宋史论集》，郑州：中州书社 1984 年版。

[2] 对此园的描述，见何瞻（James Hargett）：Huizong's Magic Marchmount：The Genyue Pleasure Park of Kaifeng。《华裔学志》（第 38 期），1990 年版，第 1 ~ 49 页。

[3] 朝廷和宫廷是界限分明的两个实体：一个由经科举进身的廷臣组成，一个是皇宫本身，包括皇室以及一套直接对天子负责的机构。

[4]《洛阳名园记》，李格非著。李格非，李清照之父。

[5] 引号内的文字直接取自《东京梦华录》。

[6] 袁褧：《 枫窗小牍》，《唐语林外十一种》（四库全书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8 ~ 230 页。

[7] “收灯”，指农历一月四日将新年期间展列的灯收起。《岁时杂记》中“拆山楼”一条说：“正月十八夜，谓之‘收灯’。诸神御殿献曲彩楼，最后一曲毕多就拆之。”见陈元靓《岁时广记》所引吕希哲之《岁时杂记》（丛书集成本）。

[8] 玉津园以其亭台楼榭建筑之美著称，此外还兼任大内的菜园和动物驯养处。其麦田除了供农耕仪式使用外，也为这些动物提供了饲料。宫廷仪仗中使用的大象就养在

此处。

[9] 仁宗朝陈道人建于陈州门外七八里处,成为名园之一。苏轼(1036~1102年)流放黄州造访安国寺时,回忆起玉仙观的"花如海":"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城南古寺修竹合,小房曲槛攲深红。看花叹老忆年少,对酒思家愁老翁。病眼不羞云母乱,鬓丝强理茶烟中。遥知二月王城外,玉仙洪福花如海……"苏轼:《安国寺寻春》,王文诰辑注,孔凡礼校点,《苏轼诗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035页。玉仙观被金人毁于1125~1126年间。见周成:《宋东京考》,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0页。

[10] 城外约一里处,1125~1126年间汴梁陷于金兵时被毁。李濂《汴京遗迹志》中提到。见《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29页。

[11] 孟景初,教坊使,对其著录仅见《东京梦华录》。此处外,卷九记其为教坊副使,卷十记其在大傩扮神中身品之魁伟。见《东京梦华录》。

[12] "望牛冈":"在城西南十里。汴京城形势如卧牛状,登是冈以望之,则居然可见,故名。"见《汴京遗迹志》。

[13] 朱亥,屠户之神;历史上是战国时期梁(古开封)国侠士,隐于屠市。秦攻赵之时,朱亥受使杀魏将晋鄙,夺其兵而救赵。其墓址在城南屠儿墓园:"朱亥墓在都城南,过所谓四里桥之道左;旁有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为屠儿墓园。清明则众屠具酒肴祠之,出于人情也。"见王得臣,《麈史》(四库全书本)。

[14] "勃脐",一般认为即植物荸荠,现读为biqi。见周成《宋东京考》;李濂《汴京遗迹志》用"荸荠"。师图尔(G. A. Stuart)正确地指出,其读音应为boqi,是"脖荠"(意即肚脐)的谐音。见师图尔:《中草药》;《植物界》。上海:美华书馆1911年版,第399页。

[15] 李濂:《汴京遗迹志》。

[16] 挂多国相印的连横家张仪(卒于公元前309年)之冢,状似砚台,故名。据《太平宇寰记》(四库全书本)。张耳(卒于公元前202年)乃汉代早期的大臣。释惠洪(1071~1128年)的《王裕之求砚铭为作此》,对此冢有更为奇特的记载,见觉慈编,《石门文字禅》(四库全书本)。

[17] 东御苑,又称宜春苑,或迎春苑,其址原为御射之处,后荒废。1061年已很凋零,可证于王安石同年诗作《宜春苑》:"宜春旧台沼,日暮一登临。解带行苍藓,移身坐绿荫。树疏啼鸟远,水静落花深。无复增修事,君王惜费金。"见《临川文集》(四库全书本)。后为粮仓。徽宗被虏北上途中在此暂住。见周成《宋东京考》。

[18] 在石面或木桌上刻槽以行水流杯,宾客要在酒杯顺势漂到水流尽处之前作诗

一首(一般为四言或八言)。

[19]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20] 秦悼王:太宗之子,因反逆而被软禁。

[21] 古时举行祓除畔浴活动的日子。

[22] 指分管文武官员的中书省与枢密院。

[23] 叶梦得:《石林燕语》,侯忠义编,《唐宋史料笔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7页。

[24] 传说中的麒麟,似鹿,牛尾、马蹄、独角,不伤人,不踏花草,故称"仁兽"。孔子在世时出现,故被认为是圣人之世的征兆。

[25] 驺虞:文献中一种白虎黑纹之兽,仁义,不食活物,只吃自然死亡之物,也是贤德的征兆。

[26] 指传说中的獬豸,可以其独角分辨是非善恶。

[27] 交趾,位于今越南。

[28] 越,今浙江;吴,约今江苏。

[29] 王应麟:《宫室苑囿园》,《玉海》第6册,浙江书局1883年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重印本。

[30] 见伊沛霞(Patricia Ebrey):《北京开封的帝国奇观与视觉文化》,《亚洲专刊》(第3期),1999年版,第33~65页。

[31] 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册18,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癸丑,相度在京诸司库务利害刘永渊言:'近准诏于琼林苑藏冰一井,校其消释,多冰井务才十分之二。苑中二井,除四分以备消释,实收三万八千段,而岁支三万八千三百,所少才三百。乞于金明池西北岸更置三井,则冰有余用,岁宽民力及减辇载人工请给之费,罢冰井务及监官,命苑官管勾。'从之。"

[32] 见上。1013年操练被复置,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癸丑,诏在京诸军选江、淮习水卒于金明池按试战棹,立为水虎翼军,置营池侧。其江、浙、淮南诸州,亦令准此选卒置营。初,太祖立神卫水军,及江、淮平定,不复振举。上以兵备不可废,故复置焉。"

[33]《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日,幸金明池,观习水战,谓宰相曰:'水战,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复施用,时习之,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讲武台阅诸军驰射,有武艺超绝者,咸赐以帛。还登琼林苑北榭,赐从臣饮,掷钱于楼下,俾伶人争取,极欢而罢。"

[34]《诗经》。

[35]《孟子》。

[36]《孟子》。

[37]"迭游"一词,见《东京梦华录序》:"仆数十年烂赏迭游,莫知厌足……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目之曰《梦华录》……"

[38]《东京梦华录》"驾幸宝津楼宴殿":"宝津楼之南有宴殿。驾临幸,嫔御车马在此。寻常亦禁人出入,有官监之。殿之西有射殿,殿之南有横街,牙道柳径,乃都人击球之所。西去苑西门,水虎翼巷。横道之南,有古桐牙道,两傍亦有小园圃台榭。南过画桥,水心有大撮焦亭子,方池柳步围绕,谓之虾蟆亭,亦是酒家占。寻常驾未幸,习旱教于苑大门。御马立于门上。门之两壁皆高设彩棚,许士庶观赏,呈引百戏。御马上池,则张黄盖击鞭如仪。每遇大龙船出及御马上池,则游人增倍矣。"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咸平3年癸酉":"三月癸酉,枢密院言,准例春季金明池习水戏,开琼林苑,纵都人游赏,又大宴于含元殿。上以太宗忌月,命有司讨详故事以闻。史馆检讨杜镐等引晋荀讷、唐王及善、韦公肃所议,以为礼有忌日无忌月,其春宴及上巳金明池、苑,并合举乐,从之。"

[40]这里的数字显然是不准确的。

[41]《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平兴国7年癸巳":"三月癸巳朔……金明池水心殿成。"

[42]"乌"是此马的全名的简称。"乌护兰",阿尔泰语音译,意为"红"[此结论来自詹姆士·伯森(James Bosson)给笔者的来信]。见张知甫,《可书》(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43]《东京梦华录》(静嘉堂本)。

(作者单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何予明 译)

明江南的城市园林
——以王世贞的散文为视角

[美]肯尼斯·J. 哈蒙德

肯尼斯·J. 哈蒙德(Kenneth J. Hammond),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以论文《历史与士大夫文化:王世贞的文人生涯,1526~1590》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晚期中华帝国特别是明代(1368~1644年)的文化史上。他最近在撰写杨继盛(1516~1555年)的传记,追溯其入仕、被捕、处决和死后成为儒家烈士的经历。他也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导　言

明朝——特别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飞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加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城市中心的发展意义特别重大(Brook 1998;Meskill 1994)。中国东南地带的江南——明帝国人口最密集和最富庶的地区——是受到这些发展影响最大的地方。江南的城市扩大了它们作为经济发展中心和文化精英(即士大夫、文人)活动中心的角色的内涵(Johnson 1993)。商品经济的拓展给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带来了压力,也带来了新的发展,包括城市居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消费

机会的增加，并且助长了新兴的富商和传统的文化精英为争夺权力和地位而展开的竞争。

这不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旧的、正在衰退的农耕社会精英阶层之间简单的二元对立。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它是名门望族在商业上的大范围投资，这种投资往往伴随着自然而来的商业利益。同时，这些依靠商业活动聚敛财富的家族耗费大量财力用正统的儒家课程教育他们的子弟，希望他们在科考中取得成功；此外，他们还参与其他可利用的活动或者公众慈善事业以换取和士大夫们同等的社会地位（Brook 1998）。

尽管这些都集中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但许多士人家庭和个人都十分关心身份边界的消融以及他们在文化和政治上的支配能力（hegemonic power）受到的压力，并寻找方式（通常是通过多种形式的身份展示以及强调他们在品味和消费上的独一无二的仲裁者的地位）宣称他们在审美观念上的精致和在社会地位上的优越（Clunas 1991）。他们这些行为所采取的特定形式不一定都是新的，倒毋宁说常常是由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文化实践组成的，通过对精致性和鉴赏力的不断述，说这种文化实践又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文人进行文化实践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形式就是建造或者拥有园林，这种形式在明代中后期非常引人瞩目。中国的园林历史悠久，可以上溯至汉代。到了唐代，人们已经普遍视园林为皇家场所的一部分，它要么是宫殿内部的围场，要么作为独立的实体供人远足游览（Owen 1995）。在唐代，朝廷的官员往往在首都长安或者陪都洛阳的家中建造园林。这些园林用途广泛，或者用做个人退隐之处，或者用做社交之所，或者作为经济的投资，或者作为显示身份的方式（Clunas 1996）。

有宋一代，中国的帝国政治文化有重大的转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宋代把儒家科举制作为政府行政机构招募人员的主要方式（Chafee 1985；Elman 2005）。从汉代一直到唐代占主导地位的贵族化的社会精英在9～10世纪的混乱年代中失去了势力，取而代之的则是以知识定义的精英进入了权力中心（Bol 1992；Hymes 1986）。文人学士变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以共同的文化理论和实践为核心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以

儒家科举制为其基础，并附以审美的和物质的层面以更进一步地加强他们共同的身份感。在宋代的首都开封、在洛阳和繁荣的江南城市中心，园林开始在士人文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当皇家宫殿和皇室成员的住处持续不断地和园林发生关系时，园林就逐渐被视为文人的文化环境的典型。作为个体的文人则通过有关园林的文学作品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观念，这些作品包括对特定地点的描述，游览著名园林的叙述，以及对城市（诸如苏州或者洛阳）园林的名字的详细记录。园林作为文人社会生活和个人隐退的场所，它在物质和文本方面的建构已经成为文人的精英身份和他们在社会和政治领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维度。

13 世纪晚期，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建立的元政府并不信任中国的士大夫，从而导致了文人士大夫的边缘化，在这一时期，回到私人生活和私人空间对当时的文人来说是一个相当诱人的选择，他们可以借此拒绝作为宋代特征的公众生活和公众身份。当明朝在 1368 年取代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中国后，文人作为文化和政治事务上拥有统治权的精英又重新占据了中心的地位。一直到 16 世纪，文人的文化霸权已经重新建立起来，但受到两方面势力的挑战：一方面是以皇室为后盾的宦官集团；另一方面是通过文化消费和文化展示与文人争夺权力和地位的富商家族。园林仍然在文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江南，园林的数量激增，著名的园林成为当地的骄傲和其他地方羡慕的对象。韩德琳（Joanna Handlin Smith）写道："一种对园林建造的名副其实的狂热席卷了繁荣的中心。"（Handlin Smith 1992，57）文人对园林的论述也多了起来，这要归因于两方面的刺激：一方面是印刷术和售书行业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是文人宣称自己拥有，并且有能力对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精英身份的价值作出裁决的渴望。

为了进一步理解明代园林及其在城市景观中的地位是如何被当时的文人所感知与表达出来的，我打算检阅士大夫王世贞（1526 ~ 1590 年）游览江南两个城市的园林后所写的作品（Hammond 1994，1999）。第一个城市是当时的陪都南京，另一个是太仓。太仓是王世贞的故乡，靠近重要的文化中心苏州。这些作品提供了对这两座城市的著名园林的总的看法，

包括高度概括的描述，并让读者了解园林在城市景观以及文化社会关联中的位置，还常常包括对园林的现任主人和最初建造者的细节描述。通过这些作品，并且通过对作为文学和文化价值裁决者的王世贞本人的活动的分析，我将逐步阐明一个有关园林在明代城市生活中的地位的综合的观点。

王世贞

王世贞于1526年底出生在江南一个富裕而颇具声望的仕宦之家。他的父亲和祖父都供职于朝廷，他父亲的生涯和他相似。1547年，王世贞未满21岁便中了进士。入京后开始仕途得意，但后来得罪了当时权势熏天的宰相严嵩。他们之间的仇恨导致王世贞的父亲王忬被弹劾并最终在1560年被处死。王世贞和弟弟世懋辞官回家服丧，在服丧期过后仍然呆在家乡太仓。1562年严嵩倒台，1567年隆庆皇帝即位，这让王世贞像他的很多朋友和盟友那样得以恢复官职。隆庆皇帝的统治期非常短，不久王世贞就和万历年间的首辅张居正产生了矛盾，他不得已再次退隐回家。之后尽管也被委派了一些官职，但王世贞几乎一直都呆在太仓，直到1588年他最终接受了南京兵部右侍郎的职位。1589年7月，任南京刑部尚书，这是他的最后一份官职。1590年4月王世贞称疾辞归，同年12月卒于家中。

虽然王世贞的仕途经常被帝国中心的强权人物所遮蔽而失去光芒，但作为文学复古运动领袖的他却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和尊敬。这场运动受到后人的批评，认为它助长了盲目模仿古代几种有限的文学风格的风气，但其实王世贞倡导的是广泛效法古代有价值的诗歌和散文的典范。文学复古运动的口号是“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但王世贞同样对宋代学者和诗人苏轼推崇有加，他还盛赞那些他认为体现了率真的品质并且把文章的内容和形式恰当结合在一起的作家。王世贞反对那些他认为服从某种哲理说教目的的作品，例如唐顺之的作品。有趣的是，唐顺之在政治上与严嵩有关联，因此在16世纪50年代通过他王世贞文学上和政治上的反

对者联结在一起了。

王世贞认为写出好的文章是文人的职责，并且把苏轼的个性视为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在北京，他的文学主张和他的政治生涯使他和皇权中心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对他来说，南京这一巨型的城市复合体作为文人政治文化中心的角色已经植根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他的文学作品当中。同时，由于辞官退隐他数次寄居在家乡太仓，这也使他成为这座江南小城的文化事务中的一个活跃的角色。

王世贞一出生就是几处园林的拥有者，他也经常游览其他人的园林。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他是文人圈子里公认的鉴赏趣味的裁决者之一，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他亲自造访过各处园林并收集了有关的诗文；另一方面则要归功于他写的这些有关鉴赏的作品的流通。王世贞关于园林的看法既体现在他在太仓建造的几处园林上，也体现在他为太仓、南京的园林写的一系列散文的文学表达上。对王世贞描写城市园林的历史情况进行了初步的交待后，我将首先考察王世贞有关太仓园林的作品，这些园林既有他本人的也有他的同乡的，接下来我们再考察他对南京的著名园林的叙述。

历史上的先例

在写到明代的这些城市之时，王世贞声称它们都是前朝都城洛阳的历史继承者。洛阳不仅作为前朝都城而闻名，它还是唐代和宋代文化生活的中心。园林在洛阳的形象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王世贞直接提到了李格非[1]写的名著《洛阳名园记》，这部作品描述了12世纪初洛阳的19处著名园林（Li 1954）。王世贞写过一篇散文——《太仓诸园小记》，在这篇散文里，他写道：

> 余治郧时，所部近洛阳，颇加询访。今郡城仅得四分之一，所见惟公署、□舍而已。城外亦有土圃十数种，牡丹、芍药二水既改徙而远，亦仅涓涓。于李文叔所记夹池、修竹之胜无一存者，然赖兹记而至今吐生

> 色,人读之尚犹有欲振展而从者。吾州诸园培塿耳,视吾郡故不能十一。三岁不垦,则牧地矣。然则兹记其可以已哉。(Wang 1990,60. 15a-17a)

根据王世贞的描述,当时的洛阳已经随着上个朝代的没落而衰败了。这座城市的面积已经缩减了大半,李格非所记述的胜景也已经不再存在了。接着王世贞说李格非写的《洛阳名园记》能够让读者想起这些已经消失了的过去。虽然王世贞谦虚地认为太仓的园林只是"培塿耳",无法与洛阳园林相比,但王世贞表明他为太仓的园林作记的动机是为自己的家乡创作一篇类似的记录。同时,他指出当时土地稀少,很难找到地方建造新园,这表明16世纪江南城市景观的发展十分兴盛。

在记述南京园林的散文里,王世贞同样提到了宋代的洛阳和李格非的记录:

> 李文叔记洛阳名园十有九,洛阳虽称故都,然当五季兵燹之后,生聚未尽复,而所置官司,自留守一二要势外,往往为倦宦之所寄秩,其居第亦多寓公之所托息,顾能以其完力致之于所谓园池者,皆极瑰丽宏博之观。
>
> 而至金陵为我高皇帝定鼎[2]之地,二圣[3]之号令万宇者将六十年,内外城之延袤,盖自古所创有,其所置官司皆与神京埒,吏卒亦危割其半,若江山之雄秀,与人物之妍雅,岂弱宋之故都可同日语?
>
> 而独园池不尽称于通人若李方叔者,何也?岂亦累洽全盛之代,士大夫重去其乡,于是金陵无寓公[4],且自步武而外,皆有天造之奇,宝刹琳宫,在在而足,即有余力,不必致之园池以相高胜故耶?

当不再提到自己的家乡太仓,而是提到明朝陪都南京时,王世贞在他的文章中就显得没那么谦虚了。他认为明朝的南京不如宋朝的洛阳,但是却能"累洽全盛之代"。这里,园林再一次被视为定义一座城市荣耀与否的重要标准。

王世贞和太仓诸园

王世贞的父亲因触怒当时的宰相严嵩而被处死，之后王世贞就结束了在首都北京踌躇满志的仕宦生涯，于1560年回到家乡太仓。在退隐期间，王世贞致力于家乡和更大范围的江南地区的文学和文化生活。他在太仓自己的住处建造了一座园林，并把它命名为“离赍园”，即政途险恶，不如远离的意思。“离赍园”扩建成为“弇山园”后，王世贞为这座园林写了一系列记述详实的散文。他在城外还有一座小一些的园林作为私人隐居之用。王世贞家族的其他成员在太仓城内也有属于自己的园林。王世贞对好友的园林也非常熟悉，其中包括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和其他一些同乡的园林。[5]

作为江南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太仓至少从元朝开始海运的时候就在粮食贸易上占据重要的地位(Marme 1993,25-26)。1368年，即明朝建立的第一年太仓在行政上被划定为“卫”；在1497年它又被重新设定为“州”，同时把昆山、常熟和嘉定的部分县划归太仓管理(《明史》1986,4.40:918-920)。王世贞家族的地产就属于由昆山划入太仓的那部分(Sato 1988)。根据归有光(1507～1571年)的看法，这次移交对昆山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

> 吴之属邑，昆山最大。异时割县之东以建州，则滨海膏沃之壤，敦朴之民，多归太仓，而县以贫敝。(归有光,1981,11:261-262)

虽然如此，这两个城市都是明帝国最富庶、最发达的辖区的一部分。由于坐落在长江下游巨形区域(macroregion)的中心地带[6]，苏州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十分发达的。根据《明史·地理志》记载，苏州的人口在1491年有535 409户，共2 048 097人，在1578年则达到600 755户，共2 011 985人(《明史》1986,4.40:918)。苏州是赋税最重的辖区之一，同时也是出进士(科举中的最高学位拥有者)最多的地区。它还长期是艺术和文学流

派、思潮的中心。

从宋代(960～1279年)开始,长江下游就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地区,但是到了明代中期粮食的重要性下降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商品作物的产量日益增加(Sato 1988)。太仓属于棉产量迅速增长的地区之一(Huang 1990,45;83)。贸易的扩大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对16世纪中晚期江南的日益发展的商业化和城市化作出了贡献。迈克尔·马姆(Michael Marme)总结了这一时期发展的特点:

> 明清时期的苏州居于城市体系的中心,在这个体系中商业已经取代了赋税和租金成为首要的因素。因此,就像其它达到这一重要阶段的城市一样,苏州改变了产生它的传统社会。假设它整合了帝国晚期政治和商业资本主义,那么它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的张力对工业革命来说就不是一个先例而是一种选择。(Marme 1984,41-42)

太仓不是苏州那样的大都市,但它们很相似,况且它们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相互作用意味着许多相同的变革力量在太仓这里一样能够感受得到。

对王世贞来说,园林是他家乡的城市景观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弇山园记》中,王世贞是从介绍弇山园在整个城市中的位置开始的:

> 自大桥稍南皆阛阓,可半里而杀,其西忽得径,曰:"铁猫弄",颇猥鄙。循而西三百步许,弄穷,稍折而南,复西,不及弄之半,为"隆福寺",其前有方池,延袤二十亩,左右旧圃夹之,池渺渺受烟月,令人有苕、霅间想。寺之右,即吾"弇山园"也,亦名"弇州园"。
>
> 前横清溪甚狭,而夹岸皆植垂柳,荫枝樛互如一本。溪南、张氏腴田数亩,至麦寒禾暖之日,黄云铺野,时时作饼饵香,令人有炊宜城饭想。
>
> 园之西,为宗氏墓,古松柏十余枝,其又西,则汉寿亭侯庙,碧瓦雕甍,嶒崒云表,此皆辅吾园之胜者也。(Chen 1983, 131)

这里,王世贞引导读者通过一条想象出来的路线穿过城镇,带领读者来到"弇山园"的门口,并且通过周围的景色和气味使读者注意邻人的生活。从太仓北边往南走,经过街市,进入一条安静的小巷,小巷两边有方池和园圃。王世贞把进入"弇山园"看做是一次远离喧闹的商业世界并进入宁静的、充满乡村气息场所的行程。"弇山园"的侧面是"隆福寺",西面为宗氏墓,更远一些则是汉寿亭侯庙,这样"弇山园"便把古代的遗迹和佛教精神结合起来了。王世贞说这些建筑"皆辅吾园之胜者也",再一次强调了由城市向私人空间的过渡。

在《太仓诸园小记》里,王世贞提供了一份太仓重要园林的目录:

> 吾州城睥睨得十八里,视他邑颇巨。阛阓之外三垂皆饶隙地,而自吾伯仲之为三园,余复有八园,郭外二之,废者二之,其可游者仅四园而已。
>
> 今世贵富之家往往藏镪至巨万而匿其名,不肯问居第。有居第者,不复能问园。而间有一问园者,亦多以润屋之久溢而及之。独余癖迂计必先园而后居第,以为居第足以适吾体而不能适吾耳目,其便私之一身及子孙而不及人。
>
> 又园之胜在乔木,而木未易乔,非若栋宇之材可以朝募而夕具也。于是余弇园最先成,最名为胜,而天下之癖迂亦无不归之余者。余记余园因次第记之。(Wang 1990,juan 60,9b-10a)

这里,王世贞在讨论园林之前再一次提到了园林所属的城市大环境,而且他让我们注意到商业经济的萌芽为城市的精英分子创造了财富。接着他又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宣称自己是当前园林建造热潮的发起者。他认为建造园林对提高一个家族的名望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园林的建造对显示那些只有像他这样的文人精英分子才能充分欣赏和评论的独特品质(包括道德上的和文化上的品质)也是不可或缺的。和那些隐藏财富的贵富家相比,这是一种更为可取的行为。在社会变迁中,当新兴的集团和旧有的文人精英已经积累了大量财富时,让那些名门望族显示他们的与生俱来

的财富就成为一件重要的事情。王世贞用"贵富家"来形容当时社会上的有教养的统治者。"富"这个字直接涉及财富,"贵"字包含有上流人士的含义,和贵族的意思差不多,但它指的是人的品质的高贵而非等级的高贵。如果这些真正的文人家族没有通过诸如园林建造这样的活动向公众展示自身的价值,那么取而代之的将是新兴富商们虚荣矫饰的文化活动。

确定了太仓诸园在城市的自然景观和社会景观中的位置,王世贞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园中的事物上。王世贞给予浓墨重彩描写的部分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但是在带领读者经历一段详细而虚拟的园林漫游的时候,王世贞不时发表的评论,这些评论进一步阐释了他对园林的理解以及园林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在《弇山园记》这篇散文里,王世贞概括描述了自己在园中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他把这些活动看做自己辞官归隐后的生活的一部分。有时他不得不招待一些有名望的客人,这让他偶尔想起外面的世界。他说:

> 守相达官,干旄过从,势不可却,摄衣冠而从之,呵殿之声,风景为杀。性畏烹宰,盘筵饾饤,竟夕不休。此吾居园之苦也。(Chen 1983,132)

这些社会义务是难以避免的,不管王世贞愿意与否,园外面的广阔世界都会介入他的隐居生活。王世贞仍然想在退隐期间保持着与外界的联系,因此园林作为隐居的理想之所必然会打折扣。但是在另一段,王世贞又用一种很不相同的语气强调了他的园林在当地发挥的作用:

> 自余园之以巨丽闻,诸与园邻者,游以日数,他友生以旬数,而今计余迹岁不能五、六过……(Chen 1983,132-133)

这里,王世贞再一次把园林视为文化权力的工具,视为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客观化积累以及经济成就的果实,并自豪地向朋友、邻居甚至是陌生人炫耀。私人园林定时开放以供游人游览,就像王世贞这里所说的"游以日

数,他友生以旬数”那样,这又进一步加强了园林作为它的拥有者以及广大公众的文化消费对象的角色。阶级界限的模糊使得向外——即使是对陌生的观众,即近世(early modern)的游览者——展示财富和精致艺术成为必要。在王世贞定时开放私人园林的期间到底有多少陌生人进出过他的园林呢?

此段还暗指把园林作为志同道合的士大夫的聚会之所,这些士大夫通常都用纯粹的文学语言讨论问题,但是他们也利用社会场所例如园林里面的聚会来进行一些另外的议程。文人们结社聚会、诗酒酬唱的现象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对文人来说这正是社会聚会的基本功能。政治上的党派主义和公开形式的政治联盟在晚期帝国政治生活中是不被允许的,但是在那些有共同观点或政治倾向的集团和个人当中,以及在那些利用非正式的聚会(如园林中的聚会)讨论他们的看法、陈述他们的计划以提高地位的人当中,实质性的派别和联盟还是存在的。在16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以宰相严嵩为核心的党派之争是王世贞的朋友圈和同僚圈关注的主要焦点,王世贞为此展开了一系列的文化实践,包括在家里写作、上演戏剧。当他在自己的园林中招待客人时,有关这些政治话题的讨论能够使谈话的气氛更加活跃。明代后期,公开的政治组织的活动比较活跃,像东林党和复社这些组织就经常在园林中聚会,成员们讨论观点并推行他们的计划(Xie 1982)。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考察了王世贞撰写的有关太仓的文人园林的作品。王世贞并不只是一个地方性或地域性的人物,他晚年主要仕于南方的都城——南京,他认为这里的城市园林文化比较复杂,和别处不大一样。

南　京

南京是中国历史上数个朝代的都城。在三国(220~265年)和南北朝(290~581年)时期,它是吴国、东晋、宋、齐、梁、陈的所在地。虽然距陈国覆亡已经8个世纪了,但在南京仍然能够强烈感受到皇室的遗风,当朱

元璋在 1368 年定都南京后,这些皇室的遗风就复活了。南京重新成为皇城,并重建了宫殿、祭坛、税仓,一整套的政府机关以及适合它的帝国中心地位的其他机构。

但是南京作为中国第一城市的地位并没有维持太久,明朝的第三任皇帝,即 1402 年篡夺皇位的朱棣,把首都迁回了北京。北京是辽、金、元诸朝的旧都,朱棣在元朝的基础上大举兴建北京。1420 年北京成为皇权的所在地,在明朝以后的岁月和接下来的清王朝(1644 ~ 1912 年),北京一直维持着首都的地位。

起初,南京因为迁都北京而变得黯然失色,但到了 16 世纪南京已经成为非常活跃的文人文化和政治的中心。这要部分地归功于它毗邻江南这个文人财富和权力中心地带的地理位置。南京同时还为那些想供职于朝廷却又想避开北京党派政治或脱离党派之争的士大夫们提供了理想之地。牟复礼(Fritz Mote)指出:

> 和北京相反,南京为那些有才能有雄心的人提供了另外一个颇富吸引力的选择,而在以前这些人却只能有一个合意的选择。在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这座伟大城市里的富有的生活几乎遭到政治上的颠覆和道德上的诽谤。(Mote 1977,152)

像北宋时期的洛阳一样,晚明的南京分享了皇权带来的一些荣耀,但它主要地还是一座文人城市,在这里士大夫文人精英分子在向朝廷表示必要的忠心的同时还可以维护他们在社会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

王世贞仕宦生涯的最后两年是在南京度过的。在这段时期他的官职相当高,而且他在文化活动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他写道:"既而获染指名园,若中山王诸邸,所见大小凡十。"他采用了在描写太仓诸园时所用的散文风格,即带领读者通过一条虚拟的旅游路线游览各个园林,在描写每一个园林之前总会先介绍该园在城市这个大风景中的位置,标出进入园林大门的街道或者附近的建筑。如上所述,王世贞认为南京继承并且超越了宋代洛阳的荣耀,他对南京诸园的记录就是要重整这些荣耀,并把

明代的丰功伟绩留传给后世。南京同时也是一个贵族化的城市,很适合作明帝国的第二都城和文人文化生活的中心。园林是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文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审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场所。王世贞写道,金陵诸园"尚未有记者,今幸而遇余,余亦幸而得一游,又安可无记也?"(Chen 1983,158)

结　论

明代中晚期的江南诸城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区域,在这里,文人精英长期建立起来的霸权正遭受两方面的挑战:新兴的商业富豪和随之而来的为地位和消费而展开的竞争。在城市生活的动态关系中,文人的私家园林是个人的退隐之所,但同时也是角逐声望的展示对象。园林还是志同道合的士绅们的聚会之处。为了使公众受到启迪并获得他们的敬仰,园林甚至还时不时地向公众开放。

作为16世纪的文坛领袖之一,同时也作为江南著名的文人家族中的一个成员,王世贞既是一个园林的鉴赏家,也是阐述园林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正确地位的代言人。在描写他的家乡太仓和南方的首都南京的时候,王世贞阐述了园林的多种用途,园林的自然美,以及园林如何融入一个更大的社会景观。正如他对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所作的评论那样,我们必须指出明代江南地区的园林大部分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很幸运还能读到王世贞的散文,这些散文提醒我们失去了什么。

参考书目

[1] Bol, Peter K.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Brook, Timothy.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3] Chaffee, John.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Cam-

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Chen Zhi et al, compilers. *Zhongguo lidai mingyuan ji xuanzhu* (Selected Texts on Famous Gardens in Chinese Dynasties). Hefei: Anhui kexue jishu chubanshe, 1983.

[5] Clunas, Craig.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Fruitful Sites: Garden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 Gui Youguang. "Ceng siyi Tang Jun xu" (Preface for Ceremonial Official Tang Jun) *Zhenchuan xiansheng ji* (Collected Writings of Mr. Zhenchuan).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1, 11: 261-262.

[8] Hammond, Kenneth J. *History and Literati Consciousness: Towards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Wang Shizhen.* PhD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1994.

[9] "Wang Shizhen's Yanshan Garden essays: narrating a literati landscap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s and Designed Landscapes.* 19. 3/4 (1999) 276-287.

[10] Handlin Smith, Joanna. "Gardens in Ch'i Piao—chia's Social Worl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LI: 1 (1992) 55-81.

[11] Huang, Philip C. C.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2] Hymes, Robert.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13] Johnson, Linda Cooke. *Cities in Ming-Qing Jiangna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14] Legge, James. *The Chinese Classics* VII. Reprint. Taibei: 1990.

[15] Li Gefei. *Luoyang Mingyuan ji* (Record of the Famous Gardens of Luoyang). Beijing: Wenxue guji kan, 1954.

[16] Little, Daniel.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New Haven: Yale U-

niversity Press, 1989.

[17] Marme, Michael. "Population and Possibility in Ming Suzhou: A Quantitative Model", *Ming Studies* 12(1984).

[18] "Heaven and Earth: The Rise of Suzhou, 1127-1550", in *Cities in Ming-Qing Jiangnan* edited by Linda Cooke John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19] *Mingshi*(History of the Mi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6.

[20] Mote, Frederick W.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 William Skinner, 101-153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1] Owen, Stephen. "The formation of the Tang estates po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LV. 1(1995)39-59.

[22] Sato Ichiro. "Dokyonin Ki Yuko to O Seitei", (Fellow Townsmen Gui Youguang and Wang Shizhen). *Chugoku bunshorun*. Tokyo: 1988.

[23] *Th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4] Skinner, G. William. "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 William Skinner, 211-2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25] *Songshi*(History of the Song).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90.

[26] Wang Shizhen. *Yanzhou shanren xugao* (Supplemental Collected Works of the Yanzhou Recluse).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0.

[27] Wyatt, Don. *The Recluse of Loya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28] Xie Guozhen. *Ming Qing zhiji dangshe yundong kao*(Examination of Factional Activities in the Ming Qing Transitio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2.

注释

[1] 李格非的传记详见《宋史》,北京: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3121 页。

[2] 定鼎象征一个朝代的建立。这个术语来自周朝早期,据推测当时的王者拥有一套青铜礼器以使其统治合法化。见《左传》宣公三年(Legge 1990, VII. 292-293)。

[3] 二圣指的是洪武和永乐二帝。虽然在这篇散文写作之时明朝第二代皇帝建文帝统治的合法性已经重新确定,但王世贞在这里并未将他包括进去。

[4] 相比之下,李格非所描述的北宋洛阳寄居着很多退隐的仕宦。有关洛阳作为文人退隐集中地的论述可参见怀亚特(Wyatt)的著作(Wyatt 1996)。

[5] 有关王世贞家族的园林,我要特别感谢阿里森·哈迪尔(Allison Hardie)。她对王世贞在园林这一领域的活动有诸多创见,特别要感谢的是她在"王世贞的世界:中国16世纪的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Massive Structure" or "Spacious Naturalness"?: Aesthetic Choices in the Gardens of the Wang Family in Taicang,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Leiden, The Netherlands, June 13-14, 2003。

[6] 关于中华帝国晚期的巨型区域范型,可参见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围绕施坚雅所说的范型的相关理论争论可参见丹尼尔·利托尔(Daniel Little)的《理解农业中国》(耶鲁大学1989年版)。尽管施坚雅所说的范型是建立在晚清的资料上的,但是它对晚明也有普遍的适用性,特别是对晚明的长江下游来说,似乎也是合乎情理的。在这个论点上,我依然会提到苏州的文化中心——王世贞的家乡太仓,以及周边的地带——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就是江南,王世贞本人用的也是这个术语。

(作者单位: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聂春华 译)

中国古典园林的美学精神

[中]陈望衡



陈望衡，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景观文化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国际应用美学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中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1993年录入英国剑桥传记中心所编的《世界名人录》和美国传记研究所所编的《世界500名人录》。主要从事美学研究。曾应邀在哈佛大学、康涅狄格学院、汉城大学、大阪大学、京都国家近代美术馆、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与研究机构讲学。出版学术专著25部，主要著作有：1.《中国美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2.《当代美学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版；3.《玄妙的太和之道——中国古代哲人的境界观》，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4.《20世纪中国美学本体论问题》，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5.《中国古典美学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译成英文境外出版的著作主要有：1.《孔子——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新加坡亚太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2.《中国青铜器：狞厉之美》，新加坡亚太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

中国古典园林在清代臻于成熟。这种成熟与中国古典美学在清代进入总结期是一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集中于园林。中国园林也可以视为中国古典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感性显现。

园林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感性显现与中国园林的综合性分不开。首先，中国的园林既具实用性，又具审美性，既具工作性，又具休闲性。中国古典园林造园一大原则是“可游可居”，“可游”是审美性、休闲性，“可居”则是实用性、工作性。这点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没有什么区别。其次，中国园林既具自然性，又具人工性。它是中国人为自己建造的比较理想的生活环境。再次，中国园林兼容各种艺术。正是因为园林具有这种综合性，使得园林有可能成为中华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的最佳载体，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艺术。

中国园林的美学精神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儒道兼得，取格“清雅”

中国古典文化的主体是儒家与道家。儒家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家庭文化本位。家庭是儒家文化的生发点。儒家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当成一个家来治理。儒家文化具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和合性，这种和合充满着家庭的温馨。儒家文化既讲和，又讲礼。礼是制度，制度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有所区别的基础上。这个区别最重要的是上下等级区别。在家庭，有上下嫡庶的区别，在社会上有尊卑贵贱的区别。

儒家的这种思想在园林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的园林总是营造出浓浓的家庭意味。园林中的厅堂，是家庭人员聚会的地所，也是会客的地方。这里宽敞、明亮，适宜于议事。家庭中那些身居高位的人士如父母、祖父母的房，除卧室外还有会客厅，便于儿孙辈探视、问礼。天井、后花园是家庭人员公用的游戏之所，这里相对显得自由、活泼，稍多变化。园林中的回廊曲径是家庭人员相互往来、交通之途，也是欣赏园林景致的地方，它就显得变化多端，摇曳多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气氛。儒家的等级思想以及由礼仪体现出来的法度井然，也从园林中

处处见出。私家园林中的主要建筑物为堂，它集中呈现出宗法的森严。园林中各色人等的身份与住房的方位、大小是相应的。

儒家文化的第二个基本点是：人生价值本位。儒家重视人生的价值。它讲的人生的价值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为国家为人民为民族做一番重要贡献，其体现为做官。这一方面的价值，儒家叫“外王”；另一方面，儒家很重视个人的品德的修养，称之为“内圣”。儒家认为，修身与事功是统一的。修身是事功的基础。儒家是尚事功的，但未必任何一个儒家知识分子都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因为种种原因，不少儒家知识分子不得一售其志，只得退而养其身，园林则是他们暂时退隐修身的好地方。为了励志，园林的风物总是体现出一种高洁的情怀。松、竹、梅、兰、菊等植物，由傲岸的假石构成的风景，还有各种励志的楹联匾额都体现儒家特有的清高。

虽然园林处处透出儒家的气息，但主流方面还是道家崇尚自然的意味。道家崇尚的“自然”有两个含义，一是自然而然，另一是自然界。就自然而然来说，它更多地体现在造园的法则上，强调“虽是人作，宛自天成”。道家多为隐士，为了体现这种隐的意味，在园林中不仅有意制造“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的意境，而且还人为地制造田园风光，取东晋大隐士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意象。除此以外，还多从道家或具道家意味的著作中创造出一些特殊的景点，如取庄子的“濠梁观鱼”典，无锡的寄畅园有知鱼槛，颐和园有知鱼桥，苏州留园有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亭。从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取意，北京紫禁城的宁寿宫和承德避暑山庄都有曲水流觞亭。

在中国的园林之中，自然风景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它占的面积最大，而且它的景象处处透出潇洒出尘的意味。在这点上，儒家与道家达成了默契。儒家虽然尚事功，但也尚自然。孔子就很推崇假日邀三五朋友游山玩水的这种生活。宋代的大学者欧阳修说有两种快乐，一种是富贵者之乐，一种是山林者之乐。前种快乐为事功之乐，属于儒家的人生理想；后种快乐为隐逸之乐，主要属于道家的人生理想。欧阳修慨叹两者不能得兼，园林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兼顾了这两种快乐。

中国的佛教禅宗也是很看重自然山水的。自古名山僧占多。禅宗将自己的爱好山水看成是“林下风流”。与此相应,中国的园林不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常引禅意入园。

从整体来看,中国的园林其文化精神是儒道释兼得,而重在“道”意。这个“道”意主要是道家的“自然之道”。从本质上看,园林是退隐的精神寄托物,尽管主人不一定是道家。从儒家的审美趣味来说,园林宜雅,雅而脱俗;从道家的审美趣味来说,园林宜清,清而出尘。两者结合,当得上“清雅”二字。“清雅”可以视为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品格。

二、气韵生动,重在“韵味”

“气韵生动”是中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绘画理论家谢赫提出的命题,后来广泛地应用到各种艺术。中国古典美学十分看重气韵。一般来说,中国古典美学说的“气韵生动”是指事物具有蓬勃的生命气息或生命意味。

中国的古典园林从整体格局上看,充满着生命的气息和生命的意味。园林具有生命意味主要指从园林的景物可以品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当然,更多地感受到人生的快乐。从审美的眼光来看园林,园林中的一切都是有情物,它们相互呼应,相互友爱,相互嬉戏。杜甫咏严郑公宅院里的竹子:“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色侵书帙晚,阴过酒樽凉。雨洗娟娟静,风吹细细香。但令无剪伐,会见拂云长。”这宅院中的新竹,清新得好像出浴的女孩。那清秀的姿态,那淡淡的清香,让人喜爱。长长的竹影侵入书房,将一片绿叶的倒影洒在书帙上,似是无意,又是有情。整个庭院就是这样充满着生命的意味。

中国古典美学虽然一般将“气”与“韵”都看成生命的形态,但也适当地将二者区别开来。“气”重在生命意味显露的一面、动态的一面、劲健的一面、发展的一面、可以明确把握的一面;“韵”则重在生命意味隐蔽的一面、静谧的一面、柔和的一面、精细的一面、无限发散的一面、难以明确把握的一面。将“气”与“韵”分成两个概念来看,大体如此。但是将“气”与“韵”组成一个概念时,“气韵”似是偏正结构,韵为正,气为偏。

这样，气韵更多地是指生命精神存在的阴性状态：静态的、深沉的、悠长的、绵远的、无限的、亲和的、精微的。

中国宋代理论家范温为“韵”下过两个定义：一是“有余意之谓韵”，另是“韵者美之极”。[1]前一个定义揭示了“韵”的本质，后一个定义揭示了“韵”的价值。园林的总体风格尚韵，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倾向于生命意味中静态的、深沉的、悠长的、绵远的、亲和的、精微的、无限的这种状态。这就是中国古典美学津津乐道的“含蓄”。

中国园林为了体现“含蓄”的风格，采取了各种方式：一是遮蔽，中国园林运用院墙、树林、山丘等多种手法，将一些景物遮蔽起来，不让人一眼看尽。二是曲折，让园内的溪流曲折地流去，又将园内的某些道路、院墙设计成曲折多变的迷宫。由于“隐”“曲”，景观不仅变得丰富起来，而且增加了神秘感和某种欣赏的难度，由是激发了审美主体的游园的兴趣，激活了游园者的想象与创造。

遮蔽与曲折，概而言之为“隐”。“隐”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隐”的目的是为了“美”或者说“韵”的开显。要开显须借助一定的手段，这就是“秀”。“秀”在园林多为“引景”。宋代叶绍翁的《游园不值》云：“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满园春色为柴扉所关，此为“隐”；一枝红杏出墙，此为“秀”。由于这一枝红杏的秀出，逗引了过路人对满园春色的无限遐想，激发起入园欣赏的欲望。

中国古典美学关于“隐秀”的理论最早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刘勰提出来的。他说：“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2]隐什么？隐的是“文外之重旨”，即文章之外的余意、多意、意外之意、味外之味，也就是“韵”。刘勰说的“秀”是“文中之独拔者”，即表露在文章之中的可以感受到的形象，它相当于园林中的“引景”。

园林景观建设要求处理好“虚”与“实”的关系。虚与实不仅体现在情与景的关系上，就是景与情本身也还有一个虚与实的关系问题。景有实与虚之别。天上的月亮为实，水中的月亮为虚；可视可听之景为实，想象、猜测之景为虚。情也有实与虚之别。可言之情为实，难言之情为虚。

状溢于外的情为实，而深藏于心的情为虚。如此等等，在园林审美中以特有的方式体现之。

“实”与“虚”的关系从哲学上看亦为有限与无限的关系，在中国的老子哲学中则为“有”与“无”的关系。老子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3]“无”是宇宙之终极，终极怎么会是“无”呢？老子的推论是：因为它不可能是“有”，如果为“有”它就应有边界，应再有源头，而宇宙不应有边界，不应有源头。这不应有，就是“无”。“无”即为无限。在老子看来，宇宙之本为“道”，道是“有”与“无”的统一。在中国人看来，有限的景观，如果悦耳悦目可以称为“美”；无限的余意（韵）能让人回味无穷，那才是“妙”。如果让人从有限景观领悟到景观外的无限的世界，那就是“道”，也就是中国古典美学最高范畴——境界。这种美学观不仅在诗、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也在园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座园林如果能让人百游不厌，韵味无穷，可以说就达到了中国哲学包括中国美学所极力推崇的“道”的境界。

三、众美荟萃，趋于乐境

中国的园林是一种综合的美。首先它有自然的美，其次它有人工的美。人工的美中，它有社会生活的美，集中地反映那个时代比较高雅的生活方式、礼仪典章；它体现特定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特别是建筑工艺，因而兼有科学美与技术美。当然，最为突出是艺术美。它将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艺术尽皆纳入园林中，主要有建筑、绘画、雕塑、诗文、音乐、舞蹈、戏曲，等等。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中国的造园艺术不是将上述的各种美堆放在一起，而是将它们有机地组织起来，组成一个美妙的整体。

如果我们将园林中的审美欣赏分出层次来，那么，它至少可以有如下四层：

第一，以视觉为主的绘画的美感。

中国园林过去大多是按照某一张画的构思来造园的，如画是造园的第一原则。画是视觉的艺术，如画的园林给人的美感也应是悦目的。中

国画构图用的透视法如郭熙的"三远"法——平远、高远、深远被搬上园林。[4]宋代画家韩拙有另外的"三远"法。他说:"有近岸广水,旷阔遥山者,谓之阔远;有烟雾溟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谓之迷远;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谓之幽远。"[5]这种构图在园林中也是常见的。由于中国园林以画为蓝本,所以也常取用画题作为景观名,有意创造出具有绘画范式的景观来。

第二,以听觉为主的音乐的美感。

中国美学很注重听觉的美感。在景观设置上有意加强"听景",如鸟声、溪流声、风声等。唐代诗人李商隐有诗句"留得枯荷听雨声",[6]表达了一种特具情调的音乐美。好些园林有意制造"枯荷"的景观,为的是获得听雨的审美享受。园林中,有时也安排有音乐演奏、歌舞表演等,这也造就了音乐的美。

第三, 想象兼理解为主的诗文的美感。

诗文进入中国园林有两种情况:一是园林在适当的地方陈设诗文,如厅堂、书房的墙上往往有以诗文为内容的书法作品,在建筑的廊柱上悬挂楹联,在园林空旷之地有碑,碑上有诗文等。这些诗文的内容与园林的自然景观、与园林的人文历史有某种内在关系。诗文进入园林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造园的总体理念,在某种意义上,一座园林是某一诗文的形象注解。岳阳楼是中国江南三大名楼之一。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为它写了一篇文章,此文表达了中国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极其卓越的思想加上美丽的文辞使这篇文章千古不朽。此文一出,岳阳楼园林此后的建设基本上就以它为理念。苏州的名园——沧浪亭不仅其园名而且园林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屈原《渔父》一诗的名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诗文入园增加了园林美的思想容量,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四, 心听兼心悟的超音乐的美感。

园林作为人们居住游冶的场所,是物质的;作为审美的艺术作品,它的灵魂是精神的。对于园林的灵魂,我的看法是具有音乐的意味却又超越音乐。中国园林造园的审美理念是音乐的。它将所有可能构成美的成

分,组织成一曲音乐。说是乐曲却又不是真的音乐,它只是具有音乐的韵味,而没有音乐的形体。这种音乐其实不是用耳来听而是用心来听的。在中国的美学中,音乐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7]乐是最高的。乐的好处,一是情与理统一,理在情中,二是礼与乐统一,礼在乐中。在这种让人心旷神怡的音乐欣赏中,达到了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相和谐的境界。中国先秦著名的美学著作《乐记》说:"大乐与天地同和。""与天地同和"也就进入了"道"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只属于儒家,也属于道家,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境界。中国古典美学十分看重"和"。这种"和"的境界是精神性的,它消泯了情感与理智的区分,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这种境界中国古典美学称之为"化境"。中国园林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类似于音乐又超越音乐的"化境"。

四、天人合一,人间仙境

中国园林最高精神是"天人合一"。这种"天人合一"精神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园林中的"天人合一"主要通过如下几个方面来体现:第一,整个造园理念讲究以造化(自然)为师,以自然天成为最高的美。明代园林大师计成说:"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功。"[8]任何违反自然本性包括违反生态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清代乾隆皇帝在《静明园记》中就描绘过这种自然生态之美:"若夫崇山峻岭,鹤鹿之游,鸢鱼之乐,加之岩亭溪阁,芳草古木,物有天然之趣,人忘尘世之怀。"第二,园林美是自然美与人工美的统一。中国园林强调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原有山水地势而造园。不仅如此,园林中的人造景观亦要与整体气氛相和谐,既合自然之势,也顺社会之理,切忌人力穿凿。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作品中的人物贾宝玉表达了这一思想:"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原无邻村,近不负廓,背山山无脉,邻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9]第三,园林的建造主张有法与无法的统一。造园有法,但亦无法。有法是规则,无法是创造。无法中有法,有法中无成法、死法。第四,中国园林在精神上要让人感受到一种自由,这种

自由就是与宇宙的精神相通，与神灵相通，与道相通。苏州拙政园中梧竹幽居亭的对联云："爽借清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借风借月，观水观山，人与自然，何等亲和。这种亲和，建立在人的移情之上。苏州沧浪亭有一副对联，联云："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不仅移情，而且移意。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10]水成为智慧的象征，山成为仁德的象征。在中国人看来，人之所以能从自然找到知音，是因为人与自然的本质统属一个本体——道。这就是"天人合一"。

中国园林通常不是太大，通过院墙将它与现实隔开。这种院墙除了便于管理外，还要借它营造一种虽在人间却又不在人间的意味，也就是说，在人世间营造出超越人间的仙境来。园林在物质上是现实的，在精神上却是理想的。许多园林主人喜欢用"桃源"、"蓬莱"品题，实际上在他们看来，园林就是人间的仙境。中国人是最务实的，但中国人也是最向往理想的，这一点在园林中也得到体现。

园林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包括美学精神是非常丰富的。总之，园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面，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园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化的卓越贡献，它的许多优秀的因子，在今天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1] 范温:《潜溪诗眼》，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原文是:"王偁定观好论书画，常诵山谷之言曰:'书画以韵为主。'予谓之曰:'夫书画文章，盖一理也。然而巧，吾知其为巧;奇，吾知其为奇;布置关合，皆有法度;高妙古淡，亦可指陈。独韵者，果何形貌耶?'定观曰:'不俗之谓韵。'余曰:'夫俗者，恶之先;韵者，美之极。书画之不俗，譬如人之不为恶。自不为恶至于圣贤，其间等级固多，则不俗之去韵也远矣。'定观曰:'潇洒之谓韵?'予曰:'夫潇洒者，清也，清乃一长，安得为尽美之韵乎?'定观曰:'古人谓气韵生动，若吴生笔势飞动，可以为韵乎?'予曰:'夫生动者，是得其神，曰神则尽之，不必谓之韵也。'定观曰:'如陆探微数笔作狻猊，可以为韵乎?'余曰:'夫数笔作狻猊，是简而穷其理，曰理则尽之，亦不必谓之韵也。'定观请予发其端，乃告之曰:'有余意之谓韵。'定观曰:'余得之矣。盖尝闻之撞钟，大声已去，余音复来，悠扬宛转，声外之音，其是之谓矣。'余曰:'予得其梗概而未得其详，且韵恶从生?'定观又不能答。"

[2]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

[3]《老子·第一章》。

[4] 郭熙、郭思:《林泉高致》,原文是:"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其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暗。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

[5] 韩拙:《山水纯全集》。

[6] 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全诗云:"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

[7]《论语·泰伯》。

[8] 计成:《园冶》。

[9] 曹雪芹:《红楼梦》十七回。

[10]《论语·雍也》。

(作者单位:中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热那亚园林:政治与娱乐的结合

[意]劳诺·玛格兰尼



劳诺·玛格兰尼(Lauro Magnani),热那亚大学近代艺术史教授。他的研究集中在16~18世纪的绘画和雕塑以及园林建筑方面。

他对热那亚花园和别墅的研究已出版为一本专著:*Il tempio di Venere. Giardino e villa nella cultura Genovese*(1987;1988;2005),在这本书里面,他在艺术和文学的文化背景下对花园进行了分析。在*The Rise and Fall of Gardens in the Republic of Genoa*,1528-1797和*Bourgeois and Aristocratic Culture in Garden Art*(2002)中,他强调了园林艺术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之间的联系。他在特兰托理事会后出版了关于热那亚艺术作品和16世纪画家Luca Cambiaso等方面的著述。

作为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欧洲最活跃的金融中心之一的贵族,热那亚共和政体的统治阶级旨在树立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形象[1]:因为这个目的,他们成了慷慨的艺术资助人,并且大规模投资于豪华官邸的建设(Gorse 1997,301页以下)和最好的收藏品的收集(Goldthwaite 2004,13-20)。在这种背景下,园林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它被当做别墅生

活方式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一种显示其居住者生活质量和贵族地位的证据(Magnani 2002)。

这种观点得到了16世纪下半叶热那亚统治阶级的公认,并催生大量的有重大意义的建筑区域的出现,最终使得郊外的别墅和它们的园林作为一个整体成为城市的最重要的象征物;这一象征物既为热那亚人所熟悉,也为外国游客所公认。[2]这种城市象征物最终形成这样一个集合:一种介于海与山之间的独特景观,一种舒适的气候,植物繁衍的便利环境,以及按照时尚改变景观的能力(这种能力根源于热那亚贵族特殊的财力,并将统治阶级的这种成功形象传达给国际金融网络中的金融与贸易伙伴)。别墅和园林是城市的一种完美"投影":尽管这个城市让人觉得它是被围墙包围着的,而别墅区域却是向景观敞开着的,并且扮演着其"伊甸园式"的角色(图1)。

别墅和它们的园林所形成的空间被当做"他者"而不是城市中心的商业交易场所。它以其契合了预期的现代"中产阶级"的选择特征而持续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些人愿意在城市居所与邻近郊区的别墅之间来回穿梭。

在中世纪已经具有重要意义的别墅/园林现象的发展导致16世纪上半叶费希(Fieschi)和多利阿(Doria)家族试图对当地政治施加他们的影响。这些家族的住所都有显赫的园林做装饰,占据了城市的近郊。费希家族居住于卡里格兰罗(Carignano)山的东边,而多利阿家族则占据了西边这一更靠近城区中心的战略位置。[3]这两个家族的居所通过面积、装饰技巧和它们的园林复杂程度暗示着一个事实:它们的主人是这个城市的"统治者";而无论这两处房子的主人是否真正达到这一点。费希家族的失败导致了多利阿家族对费希家族的宫殿和园林的彻底摧毁,而同时多利阿王朝雄心的挫败导致了安德列·多利阿——卡罗五世的海军上将和他的继承人乔凡尼·安德列一世(Giovanni Andrea I)(图2)所提议的"宏伟"模式的分崩离析。因此,这一种在郊区园林中建造别墅的模式扩散到整个寡头政治统治下的共和国,作为对这一等级的政治角色和身份的宣言,并最终对唯一的"领主"的至高无上表现出一种含蓄的拒绝和可

能的挑战的姿态。

带有园林的别墅的发展显示出自16世纪中期以来的最新时尚，成为当地城市规划的一种驱动力。一个作为"他者"的城市逐渐维护自身的存在，这类风格尤其扩张到里维埃拉（riviera）地区的勒万特（Levante 东部）和坡伦特（Ponente 西部）的一部分城市，从而与已有数世纪之久的在围墙之内的城市发展模式区分开来。它促进了一个与原来的城市类似的可以组织公众和私人生活的居住领域。市区中心与别墅区的结合呈现在参观者视野中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现代"城镇的形象："他们建造了……雅致的别墅，并以成片有益于健康的森林、雪松和以花点缀的绿色花圃极好地装饰它们。别墅是如此之多（占据着一个方圆四英里的区域）以至那些驶向这个海港的人……会产生一个印象，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连绵不断的大城镇。"（Cattaneo 1514）

这一印象甚至于被热那亚的纠斯廷尼安尼（Giustiniani）所强调，他声称："（它有一个）极好的远景视野……二十或二十五英里长，而我怀疑在欧洲其他地方是否也有像这样的景观。"（Giustiniani 1537）在它的西边（坡伦特），别墅和园林沿着海岸线呈线状分布于狭小的台面上（图3）；而到其东面（勒万特），它们则被建造在一片有小溪沿着陡峭的山坡斜泻而下、直入大海的风景中（图4）。在那儿，城市宫殿和园林的结构沿着在山脊上延伸的道路而设计，并在城墙的包夹中形成一些狭小的路径。16世纪中期，伽利佐·阿勒谢（Galeazzo Alessi）（Perugia，1512-1572）———个对罗马人的最近创新有着最新知识的建筑师（Maltese 1975），他对古典文本的现代阐释非常熟悉，尤其是关于维托维奥（Vitruvio）的论文（Pagliara 1986，III，3-85）——在这种背景下获得了参与的机会。他与卢卡·纠斯廷尼安尼之间的工作是在一种完美的相互理解中进行的。而纠斯廷尼安尼是热那亚统治阶级中最突出的名人之一。这位与其赞助人的意愿完全一致的建筑师，逐渐建立了一种新的建筑模式，这种模式使得当时的别墅（1548）成为一种庞大的立体建筑（Magnani 1987，59-80）（图5）。这一建筑学上的新出现个性鲜明，完美地契合了海与山互相关联的特殊景色。阿勒谢沿着一根中轴线组织建筑，这根中轴线将一个门廊向南边

的风景敞开，而一个凉廊则向北开放。因而当人们从宫殿里向外望时，景观是由建筑框成的并成为一个园林空间，雄心勃勃的赞助人对这一“收获”是很满意的。宫殿的主厅窗户朝向一个向下延伸至大海的小山谷（图6），勾勒出了厨房与充满情趣的园林的结合，如同与大海相邻的景色一样；而巨大的凉廊在宫殿的北边，与大量的古典时代的元素相配合——拱门由两个柱子支撑，上盖一个圆形的穹顶，并饰以古罗马雕像——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山景（图7）；这与南边的所见景色完全不同。这两个方向的景观都属于所有包容于园林内的事物中的相对简洁的一个部分，就像是自然天成的。当园林被定义为建筑学上的一个沿着视觉的中轴线安排好的空间时，那原本难以调和的景观就变得可欣赏了。

同时，其他与上述相类似的艺术家与赞助人之间的成功合作创造了人工洞室[4]（图8）——这体现了非常早熟的热那亚式流行时尚风格，后来作为一种时尚而流传到整个欧洲——和其他的一些人造景观，像体现了贵族化园林典型特征的鱼池或小湖，[5]它们旨在园林有限的自身空间内“捕获”自然的元素。在最重要的场合中，[6]利古里亚景观的构造使园林的建筑物通过一系列的水平面连接在一起（这常常通过建造阳台来实现）。根据它们的地基情况，这种建筑模式后来被其他后起的别墅追随并继续运用，首先运用的是阿列谢自己，然后是那些曾在真挪阿热那亚的设计中与他合作过的助理建筑师们。别墅被证实是测试城市的新发展之路的实验场所，它使得城市空间和郊区空间互相交错与渗透：为郊区别墅而创造出来的新建筑模式被很容易地应用到已经提到的城市空间的革新中，此后的半个世纪里，斯特拉达·诺瓦（Strada Nuova）的贵族地区也被应用了。[7]它被从那儿再次转移到萨皮尔达仁那的别墅中。实际上，萨皮尔达仁那的观赏园林（愉悦的园林）提供了一个象征性的例子（图9）：这个位于城市西郊的拥有愉悦的观赏园林采用了阿列谢的别墅模式，而它反映出的是由斯特拉达·诺瓦的城市附近地区的贵族统治者所引入的新居住组织方式。结果，就像斯特拉达·诺瓦的宫殿一样，萨皮尔达仁那的别墅是沿着一条专供贵族居民使用的主干道组织起来的（图10）；然而这些别墅被更加引人注目的园林所装饰，这些园林与前面的海滨和后面

的山峦有一种直接的交流,这就使得别墅不同于那些城市中心的市区建筑。这种类型也被坡伦特的“带园林的城市别墅”邻近地区所采用,并扩展到柯尼格车安罗(Cornigliano)、色斯特里·坡伦特(Sestri Ponente)、普拉(Pra)、佩格力(Pegli)和沃特里(Voltri)等城镇,这种扩展伴随着建筑的密度的缓慢的降低和园林外延的扩大,而同时别墅与城市中心的距离也在增加。到18世纪和19世纪初,这些地区被新进的有声望的统治贵族这类居民开发。[8]

鲁本斯(Rubens),[9]这位巴洛克时期伟大的佛兰德艺术家和“国际”外交官(Siegen 1577—Antwerpen 1640),认为这些别墅和新的城市宫殿是那些有教养的而不是直接受高贵的朝廷所左右的统治阶级中的“私人绅士”中的杰出人物的现代性和原创性的表征。[10]这一典型的17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精英的认识以其鲜明姿态强调了热那亚贵族所采用的居住模式的象征价值。在这种背景下,它是有资格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自我展示的符号,从而有策略地对内直接面对当地的寡头政治和对外直接面对欧洲的精英力量。

在国内舞台上,有重大意义的别墅居住方式的选择激发了贸易活动的支持者与寡头政治中正在上升的社会阶层的矛盾,所谓的“显赫人士”日益卷入到纯粹的经济活动中,即使别墅时尚被整个贵族政权所采用,但最具意义的别墅复合体的创造却是由最具经济实力的绅士群体率先推进的,他们投身于同样重要的金融投资和贷款活动中,并通过契约而联系在一起;虽然在寡头政治中他们既可以属于“旧”(很早就产生)的阵营,也可以属于“新”(“当时”正在产生)的力量。由城市中支持旧的贸易(而不是金融)行业的贵族组成的反对派,[11]则纵容另一种极为不同的园林理念。他们的立场在奥贝托(Oberto)和鲍罗佛格利塔(Foglietta)的文章中得到了明证,这两兄弟属于“新”(即最近产生)的贵族。奥贝托抨击了那些金融家的“极端富有”和在奢华别墅投资导致的资金停滞:“让我们少一些别墅多一些船只吧”,他这样劝诫与他同一职业的市民们。鲍罗以一种纯粹的都市园林视野来反对那些用大量资源建造带有园林的新别墅。在他的结束语中,他反对私人因为想十分完美地拥有某种景观而占

有热那亚的部分领土："我发现一个别墅是如此邻近热那亚以至我可以居住于其中而不用骡子(即不需要在城市和郊区之间穿梭)……而且这个别墅是在诺华广场(即正在城市的中心,靠近共和国总督官邸的宫殿)……而我的草地是在卡里格兰罗(城镇东部的第一座山),我的泉水就是大海,而我的果园就是比斯格罗草原(比斯格罗是一条流经城市镇东部的河流)……没有离开热那亚……我们的别墅就在屋顶上(即:从我们城市的宫殿顶上我们可以享受到在别墅中同样能享受到的景观),并且我们能说自己同时居住在别墅和家中。我有一个屋顶平台,它就在热那亚,就在别墅中,这个别墅有耕地、园林、森林和草地,一条小溪和一个河谷。"[12]

这一理想化的回归不越出城市的界限,这个以城市为中心的视野聚集于城市的港口、投资和贸易风险,这就与同时代的别墅区域的扩张形成了对照,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对城市宫殿的投资与对带园林的别墅的投资。

这种显示财富和奢华的最奢侈的实例给国际实力派的代表和宫廷贵族的参观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赞美往往为热那亚贵族政府过分的炫耀欲所支配,而这种炫耀欲对欢迎世袭贵族和新贵的共和国的统治阶级来说是不太恰当的,并且旧贵族认为他们(世袭贵族和新贵)的成员通过契约在贸易、借贷和放高利贷这些方面经常相互妥协。这种情绪于16世纪中期出现在由法恩勒斯家族中的一个绅士报告的相互矛盾的观念中。他对那些新的别墅所有者和他们的妻子们的欢迎方式感到神魂颠倒(他特别提到帕拉维希罗(Pallavicino)和纠斯廷尼安尼(Giustiniani)的别墅),但他也注意到了这种过度奢华和过多的财富,"园林是如此的富丽堂皇以至于我深深地爱上了它们……"[13]一个更坚决的、明晰的而没有被世俗所诱惑的意见在几十年后(1582年)由一个牧师(神职来宾波西欧阁下)表达出来了,他描述这些情结是"逾越了基督教的谦逊和一个统治秩序良好的共和国的正常状态"。[14]相近的关于园林的重要性的观点还可以从那些相同年份中出使热那亚并参观过它们的法恩勒斯(Farneses)、刚萨嘎(Gonzagas)或美第奇(Medicis)等宫廷使节的报告中找到。

这些由热那亚贵族们送出的信经常是由他们在自己的别墅中写成的，[15]它们保存在相同的档案中。热那亚人总是以一种可爱的冷淡强调，那些早期送出的与其他欧洲王子们沟通的园林产品很少有植物，而更多地是石头、酒石、珊瑚，都来自他们的园林，它们被装饰好并经常以其优雅的、古董的内涵同时无疑又是时尚的品位取悦于来宾。因此，当地贵族认为自己是在真正生产华贵的艺术品并且在创造最新的潮流和独特的样式，而不是简单地仿效欧洲贵族的用来炫耀的消费品。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7世纪初期，鲁本斯——作为一个习惯于宫廷但同时又是一个来自于安特卫普的对非常独特的热那亚生活方式有着个人体验的中产阶级者——认识到这种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并选择其作为一种佛兰德斯的天主教统治阶级的可能的生活模式的原因。到那个时候为止，"城镇宫殿和郊区别墅"并带有园林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确立起来了，并且园林与装饰城市居所内部的大面积壁画、丰富的收藏、鲁本斯和凡·代克(Van Dyck)(Antvwerp 1599—London 1641)[16]为热那亚画的宫廷肖像画(这些肖像画显示出与那些为欧洲大家族所作的作品相近的特征)都在创造热那亚贵族意欲树立的典范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显然，即使在城市的宫殿中，所有者也极尽奢华之能事；但他们完全建立在带有园林的房子所提供的可能性的基础上，由此他们产生了一个城市的理想样式——这个城市应该从社会差别中解脱出来并从对商业贸易的关心中摆脱出来(这些商业贸易会破坏他们走向贵族化的"自我展现"的努力)。

曼图亚公爵弗兰西斯科·刚萨嘎(Francesco Gonzaga)在他的侍从和鲁本斯的陪同下对热那亚进行了一次私人访问，在此期间，这一特点清楚地展示出来。这位尊贵的客人在别墅中度过的那段时间和由他的慷慨主人所组织的娱乐活动立即被报道，并且这些特征被强调："在参观过程中和与公爵大人的亲密对话中，每个人都非常愉快……实际上这种甜蜜来源于别墅的家庭气氛。"[17]

这个"另类的城市"(拥有娱乐园林的城市)提供了使下述这种行为得以可能的舞台：这个贵族政体的"代表物"与彼此相邻的别墅外观"英

雄的"背景相对抗,并且也与别墅的园林这种被怀疑人化了的自然价值的"讽刺的"背景相对抗。[18]时尚园林的基本要素的重要性(Lapi Ballerini and Medri 1999)通过半圆形状的建筑(ninfei)和人工洞室被突出,在热那亚通过大量的珍贵物质的运用获得了最大的装饰价值。在帕威斯的洞穴前刚萨嘎被一种充满诱惑的"美丽的少女"舞蹈所吸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舞蹈今天仍然保存——尽管在洞穴中他可以看到取材于奥维德的《变形记》中的人物形象,它们由大量的镶嵌好的珊瑚、水晶、陶器、贝壳、玻璃所表现,有一种透明光亮的效果(Magnani 1980 77-97)(图11)。

园林成为社会礼仪的场所,而这些礼仪可以更容易地以一种理想的形式举行:客人,一个外国的贵族,当他被这里的气氛品质所诱惑时,就会放弃宫廷严谨的礼节,因此主人能进入一种更融洽的态度纵情奢华。

然而,即使园林自身成为了被整个统治阶级所公认的生活质量的一个标志,一些带有园林的别墅所显示出的异常的豪华还是强调出它们主人在社会等级中和当地权力版图中的身份地位。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形象却由这些园林所决定,先是在文艺复兴晚期,再是在随后的巴罗克时代。在"别墅"的附近地区,任一单个的公园都分享到了邻近的园林群的存在所产生的好处,并且从一个充满人性关怀的空间的可靠维度中获利:园林当然由于它们的面积和个性而各不相同,但都为这个阶层式的独特风景的获得作出了贡献。在其中,传统的园林类型和创新性的模式相互共存:从由那些附属于房子的被分割成几何形状的花床、墙树、藤架等有组织的庭院绿地所组成的小型享乐园林,到更复杂的具有广阔阳台的园林;从这种发展方式中可以轻易发现自16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一种发展轨迹:从建筑到景观,从人化的自然到"荒野",而正是在这样一种睿智的观点的影响下,异质的景观也通常能像城市的背景和它的如同灯塔和城市围墙一样的地面标志而被欣赏。

拥有环绕市区周围的园林城市的"甜蜜"和17世纪30年代的从港口到山顶的新修围墙所造成的"可怕"确实是同时代的政治权力集团可供选择的策略,而这些是可以直接从景观上读出来的(图12)。这两个形象

都被共和国的参议院所采用以便提升国家在欧洲各国中的地位。

在这两种权力话语的表达——一方面是环绕着的围墙，另一方面是园林和别墅所带来的荣耀——之间，第二种表达方式作为权力最有效和持久的象征而出现。对于在城市中自然和建筑之间的关系的这种赞赏由于精致的园林建筑的存在被合理地得到了维护，并在整个17世纪是被支持的，并且到19世纪早期被进行"高贵的旅行"[19]的旅行者所确认，但在1684年那场热那亚被太阳王船队炮轰所招致的羞辱中已显示出看起来坚固的护城围墙的脆弱和不实用。[20]17世纪末期，巨大的变化发生了：这种热那亚共和国在国际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角色的理念已经不切实际了。从那时起，即使有作为艺术赞助人的别墅业主强有力的形象留存下来，但也仅仅是作为一种不同的私人别墅和园林的聚集为集体权力形象作贡献，而不再是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实体了（图13）。

然而，整个17世纪，园林的理念仍保持着生命力，而且作为文化刺激物的功能仍然存在。园林不只是作为领土上的有限区域而被保留，对那些感知并赞同园林是一个充满诱惑布景的异质之所并在内心认可它是一种非凡的景观的人们而言，它还是值得用文学语言描述的一个存在。居住在园林这片"永恒"的空间里，使得在神话空间的亲和与讽刺的气氛中建构和解构经典神话寓言场景成为可能，就如切尔贝勒拉所做的那样。[21]一个人可以看到寓言在园林中真实地发生，然后揭示它们欺骗性的本质。

对一个住所的园林的熟悉使得在乔·文森佐（Gio. Vincenzo）领主的诗歌中建构一个"语言的园林"得以可能，他是一个贵族、政治家，同时也作为一个绘画品的收藏家和作家而被人赞赏（Martinoni 1983）。他以其令人惊异的、巴罗克式的独创性描述了他在萨皮尔达仁那的富有意义的园林，园林就是他的诗歌《乡村政权》（1611年）中的主角（Magnani 1987，125-140）（图14）。

多门尼可·皮拉（Domenico Piola）和格雷高利奥·德·法拉利（Gregorio De Ferrari）创作的大件着色的装饰作品，给了内部对于自然的空间以想象的契机，并且热那亚居住区里面的园林也给对一段时间的政治危

机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可视的证据。这种装饰成为了巴罗克时期家庭空间理念的一个特色。对自然环境的敏感造就了内部装饰物,这在菲利普·帕罗蒂和他的儿子多门尼可的作品中可以见到,这种可感性创造出绘画、雕刻和建筑工艺在空间上的统一,并且即使这些装饰是在城市宫殿之内,也为人所熟知的园林空间中的对象提供了参考(图 15)。[22]

显然,在当时,热那亚人的设计不能与那些被设计用以作为欧洲君主权力的象征的大型园林相比。一些试图证明其具有国际水平的经济地位的重要的家族试图跟上大型园林潮流并扩大其园林,但并没有超出个人的奢华展示之上。[23]另一方面,这种被里古亚的特定的自然景观"熏陶"出来的敏感被证实更具原创性,它易被转化为二维的绘画或雕刻的形象和可塑的装饰。

这个容易理解的"伊甸园式"的共和国的象征在这块领土上被小心地保存了数个世纪,然而,这些象征暴露出了内在的缺陷,并在权力组织的更新和社会变革中崩溃了。在这个古老政权的最后一个世纪里,它确实不能自我革新了。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 18 世纪末期,园林是这个城市中最有能力和最杰出的统治阶级中的成员试图对这个城市进行文化革新的最后领域,以一个对新理念有所回应的有利于文化革新的个案为例——正如哲学家也是共和国总督的阿哥斯丁罗·洛美里尼(Doge Agostino Lomellini)所做的,他按照最新的安格—拆罗伊斯(Anglo-Chinois)的理念[24]改造了自己的园林——这其实表现出他对共和国的政治管理的不满。

在 1815 年的萨维伊(Savoy)君主专制政权出现之后,全新的要素出现了,诸如大规模的工业化,这是在前一阶段的大城市扩张和信息系统的革新之后出现的。直到 19 世纪中叶,这时已经适应了新的政治环境的统治阶级有能力以时尚的罗曼蒂克的风格构思和建造园林了(Maniglio Calcagno 1984),但同时在古老政权下的邻近城市的园林构造与这些新生事物相比就相形见细了(图 16)。它显出自身的脆弱并越来越屈服于一系列的深刻变革,而这些变革直到一个多世纪后才结束,它有一种颠覆传统的效果,并给战后的混乱的城市带来新的发展(Poleggi-Cevini 1981)。当

时,在意大利“经济奇迹”的整个时期以加速度的步伐持续发生的是土地的改革和消费,并且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有一些与工业化相逆行的经济特征在反对工业化的进程。

很少的一些园林空间仍然附着于别墅,但几乎没有一个比得上以前的规模,并且已被大量的城市居所包围(图 17)。留存在私人手中的园林是很少的,大量的历史上的园林已经变成了公共公园,并在改变成绿色的娱乐场所时受到了毁损。[25]

今天,许多古老的园林仅仅作为政治团体着力保存(至少在形式上是努力保存的)的片断保存下来了。热那亚城市一直在争辩——从 1992 年纪念热那亚人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纪念庆典到 2004 年被命名为欧洲文化之都——重要的城镇干涉规划和以城市修复作为手段改造自己的“形象”以刺激经济的增长。[26]

对于这个城市的历史形象的建构,园林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现在学者们的理解和包括大量居住在靠近古老园林的城市郊区的居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理解之间存在着冲突。有些有专门历史知识的学者仍然能感受到这里的伊甸园式的景观;从被现代建筑包围的某个历史上的园林残迹中,他们认识到园林的理念为这里的景观提供了一种帮助;从遗存的 16 世纪的人工洞室中,他们体验到通往认识自然的“直接通道”。而那些缺乏相关认识——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城市郊区(在这里,保存着在无序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园林片断)被边缘化的人们——不能认识到这些古老足迹的意义,也不能由此进入到对城市、园林和景观的综合欣赏中。

看起来,使用可利用的资金从整体上恢复这极少的现存园林以取代对这些碎片存在的忽视是比较容易的(图 18)。[27]这当然马上就可以获得回报,但城市园林的古代形象至今仍未复活,而且也不能使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园林幸存的部分成为现代城市结构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书目

[1] Barns, Susan J - Boccardo, Piero -Di Fabio, Claro and Tagliaferro,

Laura, *Van Dyck a Genova. Grande pittura e collezionismo*, exh. (Genova) cat., Milano: Electa 1997.

[2] Bianchi, Fulvio and Russo, Claudio. *La scelta della misura. Gabriello Chiabrera l'altro fuoco del barocco italiano.* Genova: Costa & Nolan 1997.

[3] Boccardo, Piero and Di Fabio, Clario, *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 e una lunga storia di Arte e Splendore nel Palazzo dei Dogi*, exh. cat., Milano: Electa 1999.

[4] Boccardo, Piero. *L'età di Rubens.*

[5] Braudel, Ferdinand. *La Me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l'époque de Philippe II*. Paris: Colin 1966.

[6] Brejon de Lavergnée, Arnauld. *Rubens.* Paris: E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4.

[7] Cattano, Giovanni Maria, *Genua (1514)*, edited by Giuseppe Bertolotto, *Atti della Società Ligure di Storia Patria*, XXIV, 2, 191, 727-781.

[8] Cazzato, Vincenzo. *La memoria, il tempo, la storia nel giardino italiano tra '800* e *'900.* Roma: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1999.

[9] Cazzato, Vincenzo - Fagiolo, Marcello - Giusti, Maria Adriana. *Atlante delle grotte, e dei ninfei in Italia*, I, *Toscana, Lazio, Italia Meridionale e Isole*. Milano: Electa, 2001.

[10] Cazzato, Vincenzo - Fagiolo, Marcello - Giusti, Maria Adriana. *Atlante delle grotte, e dei ninfei in Italia*, II, *Italia settentrionale, Umbria e Marche, Milano*: Electa 2002.

[11] Ciardi, Roberto Paolo. *Gian Paolo Lomazzo. Scritti sulle arti.* Firenze: Centro Di 1974.

[12] Conan, Michel. *Bourgeois and Aristocratic Cultural Encounters in Garden Art, 1550-1850*, Washington: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2.

[13] Costantini, Claudio. *La Repubblica di Genova nell'età moderna.* Torino: UTET 1978.

[14] *Dimore, committenti e collezionisti genovesi*, exh. (Genova) cat., Milano: Skira 2004.

[15] De Maddalena, Aldo and Kellebenz, Hermann, *La Repubblica internazionale del denaro tra XV e XVII secolo*, Bologna: Il Mulino 1986.

[16] De Seta, Cesare, L'Italia nello specchio del "Grand Tour", *Storia dell' arte italiana*, vol. I, *Questioni e metodi*. Torino: Einaudi 1979.

[17] Doria Giorgio, "Conoscenza del mercato e sistema informativo: il 'know - how' dei mercanti finanzieri genovesi nei secoli XVI - XVII", in *La Repubblica internazionale del denaro tra XV e XVII secolo* edited by Aldo De Maddalena and Hermann Kellebenz, 57 - 122, Bologna: Il Mulino 1986.

[18] Foglietta, Oberto. *La Repubblica di Genova*, Roma 1559.

[19] Foglietta, Paolo, *Rime diverse in lingua genovese*, Pavia: Gerolamo Bartoli 1583.

[20] *Francesco, Vescovo di Novara, visitatore appostolico, al Serenissimo Duce, all' Illustrissima Signoria, al Clero et Popolo di Genova, Milano 4 dicembre 1582*, published in *Synodi Diocesanae et Provinciales editae atque ineditae*, Genova 1833.

[21] Ghigino, Silvana. "Un' esperienza di restauro: il Parco Durazzo Pallavicini a Pegli e il Parco Serra a Comago", in *Parchi e giardini storici, Parchi letterari. Conoscenza tutela valorizzazione, Atti del II Convegno Nazionale*, Monza: Ministero per i Beni Culturali e Ambientali 1992, 501-508.

[22] Giustiniani, Agostino. *Castigatissimi Annali con la loro copiosa Tavola della Eccelsa et Illustrissima Repubblica di Genova. Genova*: A. Bellone 1537.

[23] Goldthwaite, Richard A. *L' economia del collezionismo*, in *L' età di Rubens. Dimore, committenti e collezionisti genovesi*, edited by Piero Boccardo, exh. (Genova) cat. 13-20, Milano: Skira 2004.

[24] Gavazza, Ezia-Magnani, Lauro. *Pittura e decorazione a Genova nel Settecento*. Genova: Sagep 2000.

[25] Gorse, George L. "Genoese Renaissance Villas. A tipological Introduction", *Journal of Garden History*, 4, 1983, 43-76.

[26] Gorse, George L. "A classical Stage for the Old Nobility: The Strada Nuova and Sixteenth-Century Genoa", *Art Bulletin*, June 1997, 301-327.

[27] Imperiale, Gio Vincenzo. *Lo Stato rustico*. Genova: Giuseppe Pavoni 1611.

[28] Lapi Ballerini, Isabella and Medri, Litta, *Artifici d' acque e giardini. La cultura delle grotte in Italia e in Europa, Atti del V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su Parchi e Giardini Storici, Firenze-Lucca 1998*. Firenze: Centro Di 1999.

[29] Leoncini, Luca. *Da Tintoretto a Rubens. Capolavori della Collezione Durazzo*, Exh. (Genova) Cat. Milano: Skira 2004.

[30] Lomazzo Gio Paolo. *Trattato dell' Arte de la Pittura*. Milano: G. Ponzio 1584.

[31] Magnani, Lauro. "Struttura e tecnica decorativa della grotta artificiale a Genova: la grotta del giardino di villa Pavese", *Studi di storia delle arti*, 3, 1980, 77-97.

[32] Magnani, Lauro. "Committenza e arte sacra dopo il Concilio di Trento: materiali di ricerca", *Studi di storia delle arti*, 5, 1983-1985.

[33] Magnani, Lauro. "'L' uso d' ornare i fonti'. Galeazzo Alessi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rottoes in Genoese Gardens", *Journal of Garden History*, 2, 1985, 135-153.

[34] Magnani, Lauro, "Residenze di villa e immagini di giardino tra realtà e mito", in *La scelta della misura. Gabriello Chiabrera l' altro fuoco del barocco italiano*, edited by Fulvio Bianchi and Claudio Russo, Genova: Costa & Nolan 1997, 467-486.

[35] Magnani, Lauro. "Natura e artificio decorativo", in Ezia Gavazza and Lauro Magnani, *Pittura e decorazione a Genova nel Settecento*. Genova: Sagep 2000, 137-206.

[36] Magnani, Lauro, *Il tempio di Venere. Giardino e villa nella cultura genovese. Genova: Sagep 1987; revised edition Genova: Sagep 2005.*

[37] Magnani, Lauro. *The Rise and Fall of Garden in the Republic of Genova, 1528-1797*, edited by Michel Conan, *Bourgeois and Aristocratic Cultural Encounters in Garden Art, 1550-1850*, Washington: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 2002.

[38] Magnani, Lauro. "Storia di un giardino", *Ricerche di storia dell' arte*, 82-83, 2004, 39-54.

[39] Maltese, Corrado. *Galeazzo Alessi e l' architettura del Cinquecento,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Genova 1974*. Genova: Sagep 1975. Pacini, Arturo. *La Genova di Andrea Doria nell' Impero di Carlo V.* Firenze: Leo Olschki, 1999.

[40] Maniglio Calcagno, Annalisa. *Giardini parchi e paesaggio nella Genova dell' Ottocent.* Genova: Sagep 1984.

[41] Martinoni, Renato, *Gian Vincenzo Imperiale politico, letterato e collezionista genovese del Seicento.* Padova: Antenore 1983.

[42] Olcese Spingardi, Caterina. "La cultura del giardino a Genova tra le due guerre", in *La memoria, il tempo, la storia nel giardino italiano tra '800 e '900*, edited by Vincenzo Cazzato. Roma: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dello Stato, 1999, 31-42.

[43] Poleggi, Ennio. *Strada Nuova, una lottizzazione del Cinquecento a Genova.* Genova: Sagep 1972.

[44] Poleggi Ennio-Cevini, Paolo, *Genova*. Bari: Laterza, 1981; Poleggi, Ennio and Caraceni, Fiorella. "Genova e Strada Nuova", in *Storia dell' arte italiana*, XII, *Momenti di architettura.* Torino: Einaudi 1983, 301-361.

[45] Rotta, Salvatore, "Genova e il Re Sole", in *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 e una lunga storia di Arte e Splendore nel Palazzo dei Dogi*, edited by Piero Boccardo and Clario Di Fabio, exh. (Genova) cat. 15-21, Milano: Electa 1999, 286-291.

[46] Savelli Rodolfo. *Il rovescio e il diritto. Immagini e problemi della storia di Genova in età moderna*, in *El siglo de los genoveses e una lunga storia di Arte e Splendore nel Palazzo dei Dogi*, edited by Piero Boccardo and Clario Di Fabio, exh. (Genova) cat. 15-21, Milano: Electa 1999.

[47] Stagno, Laura. *Palazzo del Principe. Villa di Andrea Doria. Genova.* Genova: Sagep 2005.

[48] Turchi, Marcello. *Opere di Gabriello Chiabrera e lirici del classicismo barocco.* Torino: UTET, 1984.

[49] Vazzoler, Franco. *Letterature dialettali e manierismo in Italia*, in *Manierismo e letteratura, Atti del Convegno.* Torino: A. Meynier 1983, 233-245.

[50] Zorzi, Ludovico. *Il teatro e la città. Saggi sulla scena teatrale italiana.* Torino: Einaudi 1977. + *Città. Urban Regeneration*, exh. (Genova) cat. Firenze: Alinea 2004.

注释

[1] 在20世纪50年代,"热那亚世纪"这一语词被创造用来定义热那亚商人在国际上的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时期,部分原因是因为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他们与哈布斯巴格君主国的享有特权的金融关系。自从1956年F. C. 斯波勒造出并限定这个词后,它就成为很多研究论文和出版物的主题(像Braudel 1996,454;Doria 1987,57-122;更近的是Pacini 1999)。一些出版并收录在热那亚历史和艺术的展览中的论文(像Savelli 1995,15-21)提供了一个关于这一研究主题的近年来研究的综览。

[2] 这一形象经常被人引证,如14世纪初参观过热那亚的大诗人彼特拉克,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领域的主将皮科拉米尼和乔维奥,以及英国贵族子女游历欧洲的旅行者(见注释19)和19世纪的参观者。

[3] 热那亚的别墅发展从多利阿和费希的居所开始(Gorse 1983;Magnani,1987,2005年修订)。

[4] 乔万·保罗·罗马佐(Giovan Paolo Lomazzo),一个重要的艺术论文的作者(Ciardi 1974,2:300),在16世纪末谈到热那亚是一个时尚中心,欧洲其他地方都受其影响。

[5] 阿勒谢非常强调纠斯廷尼安尼别墅和周围景观的关系,这种能力也在阿勒谢作为一个别墅建筑师的其他活动方面可以见出,就像人们所见到的阿尔巴尼亚的比萨哥罗的格雷玛蒂别墅,培谢尔列的帕拉维希尼别墅(他参加了其规划),多利阿·嘎林尼洞穴和为森特林那别墅设计的人工湖(Magnani 1987,59-92)。乔治·瓦萨里在其1568年版的《轻快如烟》(一部著名的艺术家的自传集)引证了在培格利的亚当·森特林那别墅的小湖,和稍后的多利阿别墅,后者在一种极恶劣的环境中到今天仍得以幸存。

[6] 这儿特别要提及的是广为人知的安德烈·多利阿的别墅园林,它在17世纪初由安德利亚的继承人完工(Magnani 1987,114-124),它原来围绕大约一公里的中轴组织建造,它的一部分仍然幸存(同上,125)。

[7] 在斯特拉达·诺瓦的与市区毗邻的地区的建筑中,一种与政治寡头的统治团体的意愿相适应的新贵族的居所模式首先被确立(Poleggi 1972;Poleggi 和 Caraceni 1983,301-361)。

[8] 在最值得注意的18世纪中期和后期的别墅例子中,有柯尼格力安罗的杜拉佐,其结构是以法国模式为基础的(Magnani,1987,199-208),培格力的洛美林尼(见注释24)和布立格洛勒或沃尔奇的"Duchessa di Galliera",它们拥有一个大的园林,其延续至今的"罗曼蒂克的"规划由建筑师安德烈·塔格利阿费希在1840年设计,并在19世纪后期仍然幸存。

[9] 关于这位伟大的艺术家,见其在里尔的近期展览(Brejon de Lavergnée 2004)。鲁本斯为其热那亚的赞助人画的肖像是热那亚近期举行的两个展览的焦点。(Boccardo 2004,Poleggi 2004)。

[10] 阿勒谢赋予热那亚统治阶级的欧洲语境中的建筑模式中的"现代性",已被一些学者注意到。有意义的是,形容词"现代"在鲁本斯的书(《一件热那亚现代的宽松女式套装》)的第二版的标题中就已经使用。瓦萨里的《轻快如烟》(Vasari 1568)也使用了相同的表达方式,并有了一个更确定和精确的意义:这位作者将热那亚宫殿定义为"按现代方式设计"。德国建筑师希克哈特和弗腾巴赫也在其著作中强调这一角度,他们引证了热那亚贵族宫殿典型的舒适度,技术和材料的现代性。

[11] 这一政治争论到17世纪上半叶仍然存在(Costantini 1978 ,65-73,232-244)。

[12] 见奥贝托·弗格里塔名为《热那亚共和制》(罗马 1559)的论文,和他的兄弟保罗·弗格里塔的诗歌集《热那亚语言的不同韵律》(Pavia:Gerolamo Bartoli 1583)。所有出自后一书的片断均引自F.瓦佐勒的意大利语译本。最初的版本用的是热那亚的方言(Vazzoler 1983)。

[13] 1557 年 9 月 13 日写给帕尔玛公爵的信,在帕尔玛政府档案"凡多·法恩勒斯"中(Magnani 1987,104)。

[14] 这封信出版于 19 世纪博希奥在其使徒视察任上颁布的教令集(Synodi Dioecesanae et Provinciales editae atque ineditae,1833)中。博希奥诅咒性的评论对热那亚贵族政治有着很大影响。

[15] 鲁卡·纠斯廷尼安尼和弗朗希斯科·帕拉维希尼从他们在阿尔布罗和莫尔特多的别墅送出的信在帕尔玛政府档案"凡多·法恩勒斯"中被发现;其他信件在曼图亚的政府档案"AG Busta 777"中,并有来自萨姆皮尔达仁那别墅的报告。一个关于热那亚贵族政权与美第奇的关系值得注意的证据是罗卡·玛廷尼的报告,这个绅士是柯西莫一世的随从,他描述了阿达姆·森特里昂这个查尔斯五世的大金融家的别墅。

[16] 安东·凡·代克,另一个弗兰德斯的大画家,在 1621 年和 1628 年之间在热那亚工作(Barns,Boccardo,Di Fabio 和 Laura Tagliaferro 1997)。

[17] 1607 年 7 月 8 日写给曼图亚公爵夫人的信,在曼图亚的政府档案"AG Busta 777"中。

[18] 当别墅被作为显示贵族政府的理想生活的完善设施看待之时,文艺复兴的影院惯例变得与此相关。园林是分享典型"讽刺的"场景元素的场所,即为了表现牧歌神话寓言所用的设置在自然界中的背景,而高贵的宫殿外观——例如帝国别墅,勒卡里别墅和格雷玛蒂别墅相互连贯在一起——按照古典的次序宫廷的装饰所提供的则是"悲剧的"场景所必需的背景类型,尤其是历史剧和英雄剧。与此同时,色里奥,这个建筑方面有大量有影响论文的作者,按照从维特鲁威和古典传统继承下来的所有戏剧表演的三种细分类型(Zorzi,1977)——喜剧,悲剧,讽刺剧——在其著作中使文艺复兴的场景建筑特点形成类似于法律的准则。

[19] 热那亚是被称之为"高贵的旅行"的过程中经常要参观到的一个地方,这种旅行行程很长,遍及欧洲各首都和艺术城市,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这种旅行被认为是能负担得起的年轻绅士和知识分子的教育一个重要部分。在 17 世纪,意大利路线的焦点一般放在北部城市和中部的乡村,而罗马则被当做欧洲最南端的目的地。后来南部意大利被"发现",并被纳入旅途之中,而只是在新古典主义时代,旅行者们因为对古典艺术的追求而将希腊加入到行程中(Pe Seta 1979)。

[20] 介于 1626 年和 1632 年之间的新墙规划和建筑是与萨维伊公爵在法国支持下的反对共和国的战争有关。1684 年热那亚的轰炸是由路易十四策划并由塞恩勒雷侯爵率领海军船队实施的(Costantini 1978,245-299 和 335-354;Rotta1999,246-249)。

[21] 嘎布利洛·切尔布雷那(Savona 1552-1638)是巴罗克时期在佛罗伦萨、都灵和曼图亚广为人知的一个古典主义诗人(Turchi 1984;Bianchi-Russo1999)。在其《全集》中经常提到利格里的园林和别墅:这是诗人首选的居住地,诗人也经常将其作为自己创作灵感的来源(Magnani 1997,467-486)。

[22] 两位画家多美尼柯·皮那(热那亚 1627-1703)和格雷高利·德·法拉利(Porto Maurizio 1647-Genova 1726),和雕刻家菲利普·帕拉迪(Genova 1630-1702)是 17 世纪后期热那亚的巴罗克艺术的后一阶段的主角。正是在这个世纪末,在其职业生涯决定性的几年中他们形成了注重对内外空间关系的处理特征(Magnani 2000,137-206)。

[23] 18 世纪多拉佐建成的别墅群——柯尼格力安罗已经提到的别墅,建于 1752 年,是为嘎比安罗家族的分支而建造的,它们建在里维埃拉西部的阿尔比梭那和坡斯维拉山谷的罗美罗莱,是由基洛拉谟二世和乔·洛卡·多拉佐的后代委托建造的——因其建筑和土地面积而特别著名(Leoncini 2004,113-123)。同样豪华的是 1743 ~ 1757 年间为共和国总督弗朗西斯科·玛利亚·德拉·洛维在阿尔比梭那建造的别墅(Magnani 1987,195-198)。

[24] 阿哥斯丁罗·洛美林尼——孟德斯鸠和达勒伯特的通信者(他将自己的《Esquinoxes 运动研究》题献给他,并且他的《演讲集》也是由其翻译的)——在 1710 年成为了共和国总督(热那亚共和政体政权的首领)(Magnani 1987,209-216)。

[25] 在 20 世纪初期,当城市风景被根本改变而导致许多有纪念价值的地区的丧失,一个新的对于历史上的园林的兴趣发展起来了,这使得当地权威人士制定了一个政策(Olcese Spingardi 1993,31-42)。

[26] 热那亚当地的主管当局的关于城镇计划的政策部分的在《城市的再生》中被举例说明,2004。

[27] 这种方式明显表现于 1992 年由地方主管当局为庆祝美洲发现五百周年而实行的修复上,在州保护利古亚风景和建筑办公室的监督下,佩里的多拉佐-帕拉维希尼别墅和柯玛哥的色拉别墅得到修复(Ghigino 1992,501-508)。这两栋在城市的近郊有大的花园的别墅在 19 世纪中期分别由景观设计师迈克·康吉欧和建筑师卡罗·柯桑尼设计。更近(1998 ~ 2000 年)的事实是,多利阿·帕姆菲利别墅的园林被它的私人拥有者修复:在这种情况下,对 16 世纪晚期的费用的现代诠释——通过历史性的研究和特定的考古学的活动来定义——在经历过许多复杂的变化、在 1944 年遭到炮击、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不到照顾的园林中得到实现(Magnani 2004;Stagno 2005,107-122)。最近的保护工作是针对萨姆皮尔达仁那的伊姆佩里阿勒·斯卡希别墅的园林的(2003):由市政当

局支付费用并且在已经提到的萨姆皮尔达仁那的监督之下实施，这次修复既没有修改植物的布局也没有改变园林的建筑结构，这座园林虽然保留了 16 世纪时的地面规划，但在 19 世纪 20 年代被改造成一个公园。更准确地说，此次修复只是巩固现存的结构并修整单一对象，例如雕像、泉水和洞穴。



图1　简·玛希斯，以花园与热那亚远景作为背景的花神（或维纳斯），帆布油画（1561年）。图片来自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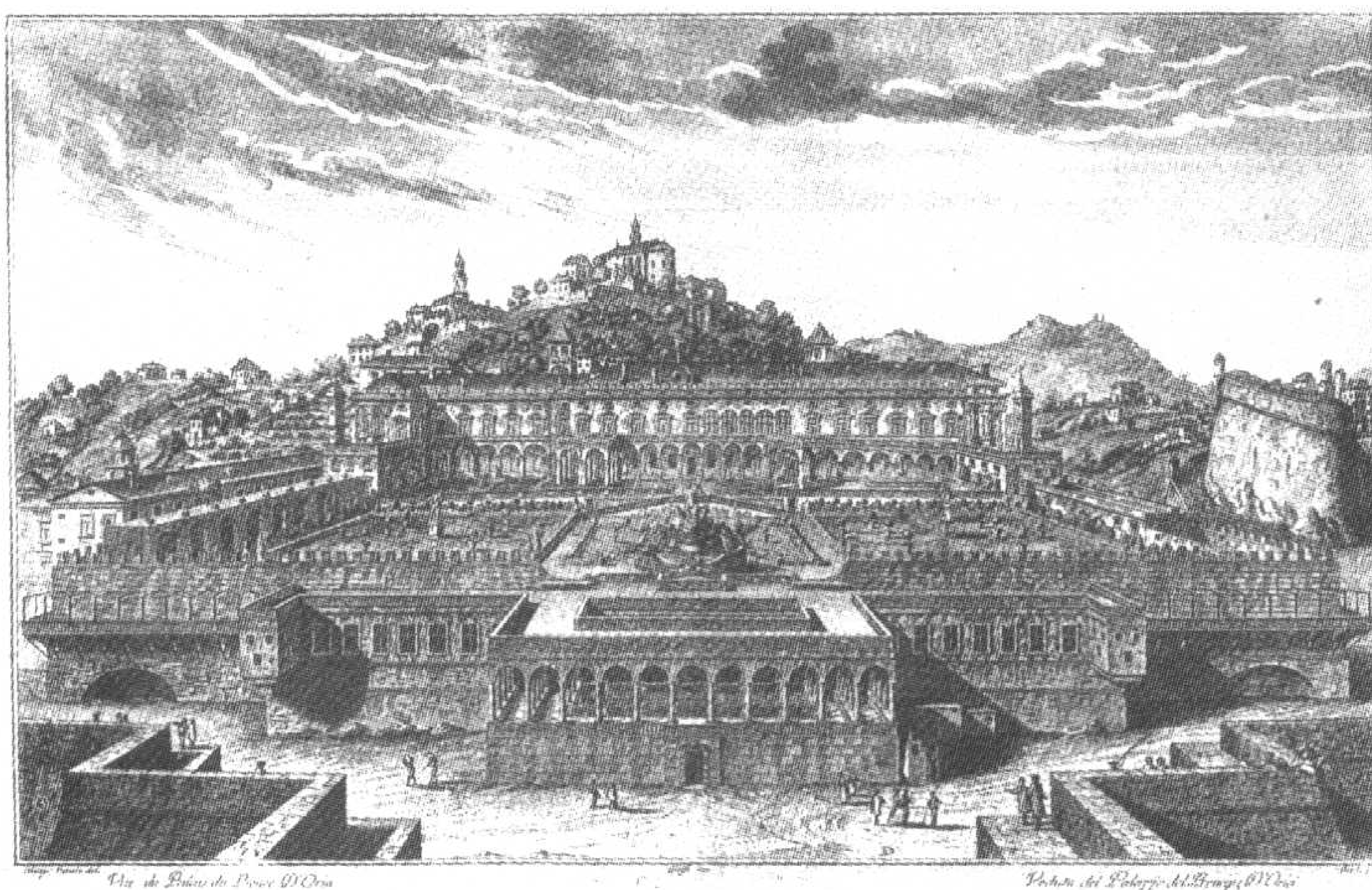


图2　A. 吉欧菲，G. 里维也拉，L. 贵多梯，《多利阿王子别墅远景》（1769年），雕版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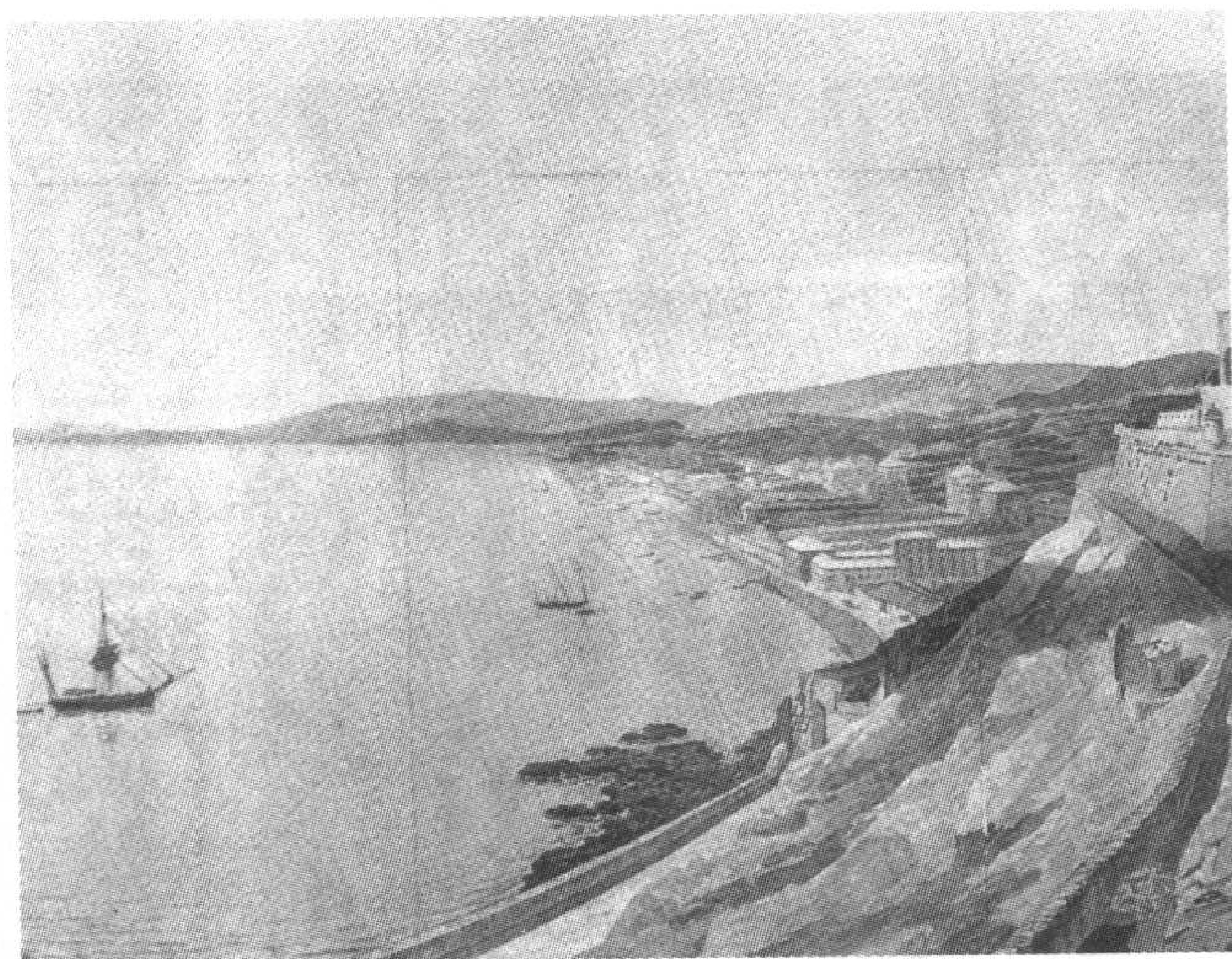


图 3　在热那亚灯塔所在的小山上所看到的萨皮尔达仁那的海滩和别墅，从圣·奔尼格罗山上看到的热那亚亨利公园的局部（1822 年），水彩画。图片来自热那亚储蓄银行的藏品。



图 4　卡罗·安东尼奥·差瓦拉（1668～1738 年），从普拉多海边的圣玛丽亚山看到的阿尔巴罗的别墅和景观。图片来自热那亚罗索宫殿邮票设计研究室，第 2948 号，素描。



图5 纠斯廷尼安尼·卡姆比亚索别墅(1548~1552年),南边的正面。图片来自劳诺·玛格兰尼。



图6 纠斯廷尼安尼·卡姆比亚索别墅(1548~1552年),从向海洋的主要门厅看。图片来自劳诺·玛格兰尼。



图7　纠斯廷尼安尼·卡姆比亚索别墅(1548～1552年),从北边的正面的凉廊看到的。图片来自劳诺·玛格兰尼。



图8　在热那亚的佩希列的帕拉维希尼的别墅花园中的洞穴(约1562年)。图片来自阿奇维奥·耐特·阿梯费希·U. 摩勒里。



图9　从罗仁堡的罗仁堡金苹果园的J. C. 小沙丘上看到的克利斯多夫·费里德里希·克里格的萨皮尔达仁那的景观,雕版画。



图10　热那亚的斯特拉达·洛瓦的宫殿和罗美里尼·坡德斯塔的宫殿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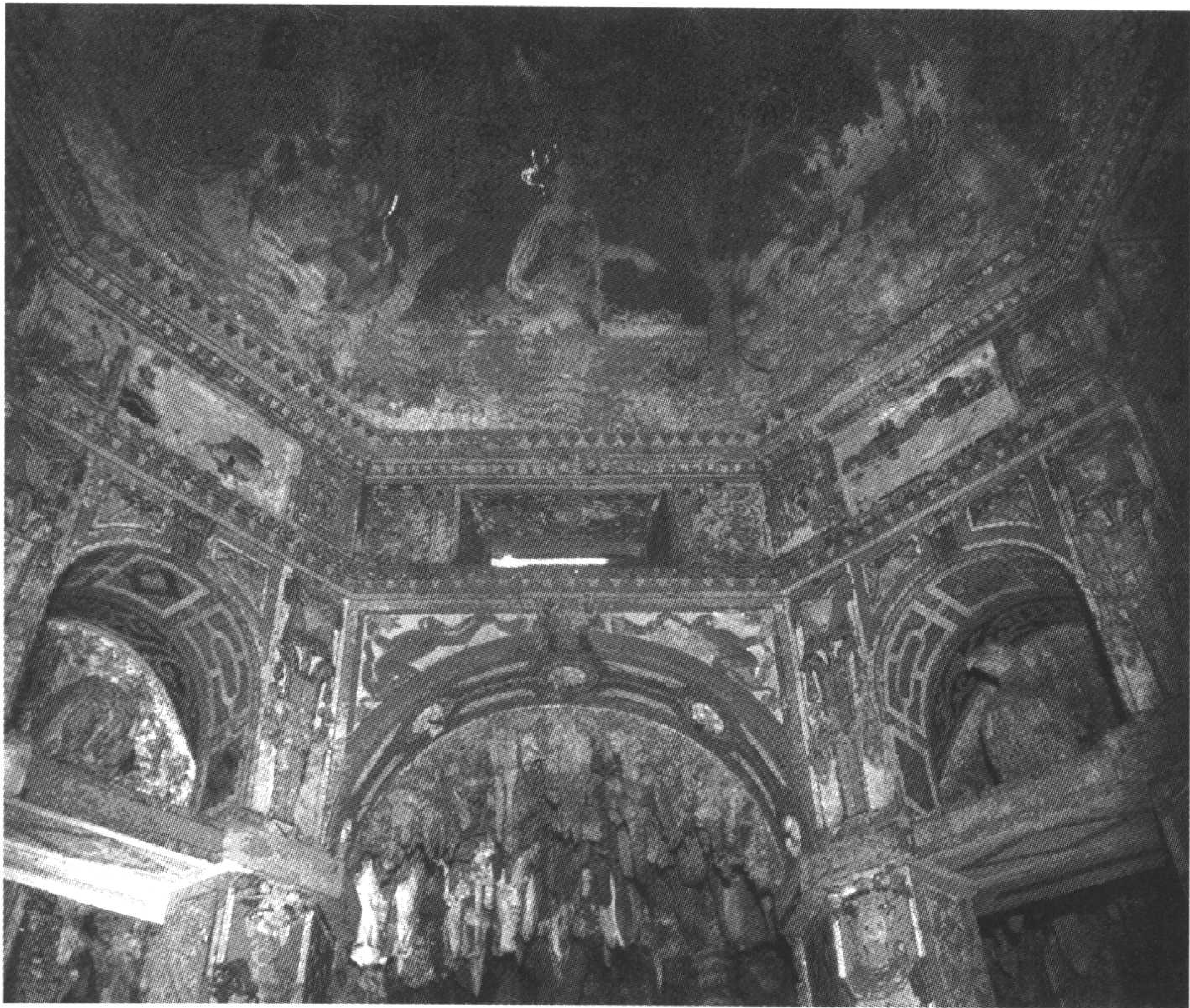


图 11　在热那亚-萨皮尔达仁那的帕华斯·多利阿别墅花园中的洞穴(约 1594 年)。图片来自阿奇维奥·耐特·阿梯费希·U. 摩勒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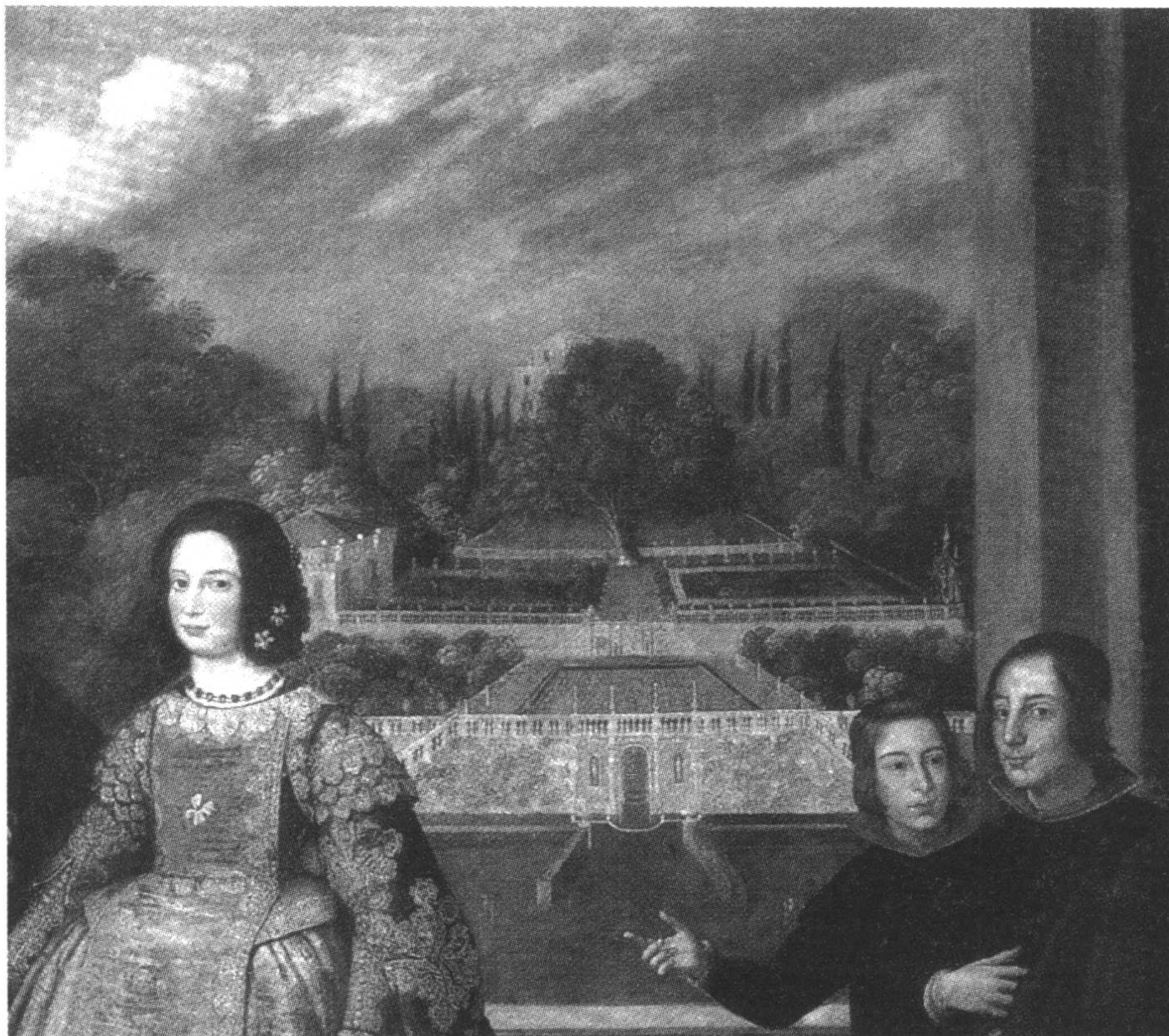


图 12　多门尼可·菲尔色拉的工作室，其背景是君主家庭和萨皮尔达仁那的别墅(1642 年)，帆布油画。图片来自热那亚的斯特拉达·洛瓦博物馆。



图 13　热那亚和它的新城墙及其环境(约 1635 年),壁画。图片来自罗马,梵蒂冈宫殿,洛基亚·德勒·卡特地图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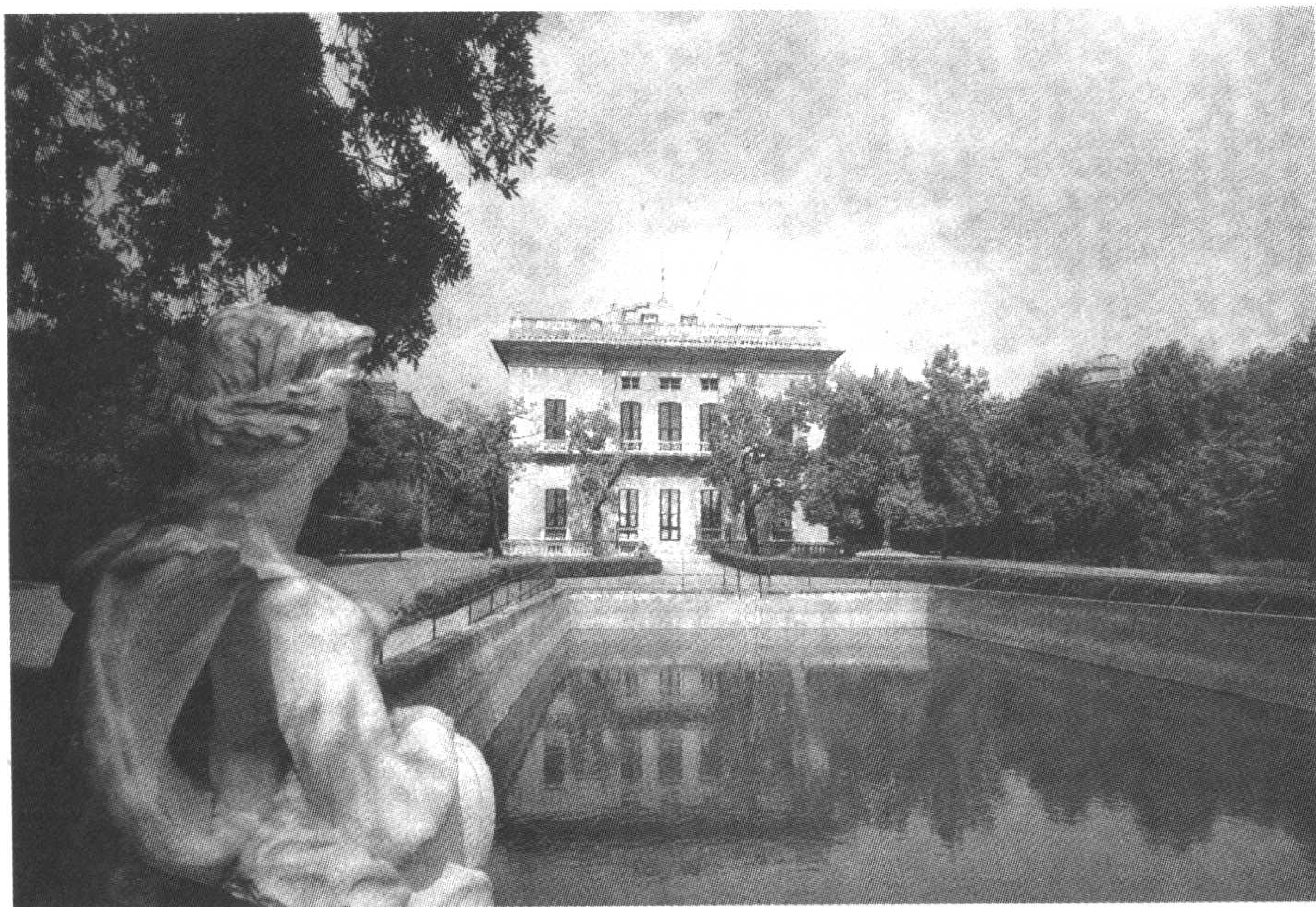


图14　热那亚的巴比别墅（被稍后的多拉佐和卡斯特巴克家庭所拥有）和它的花园。图片来自热那亚的恩里克·坡里多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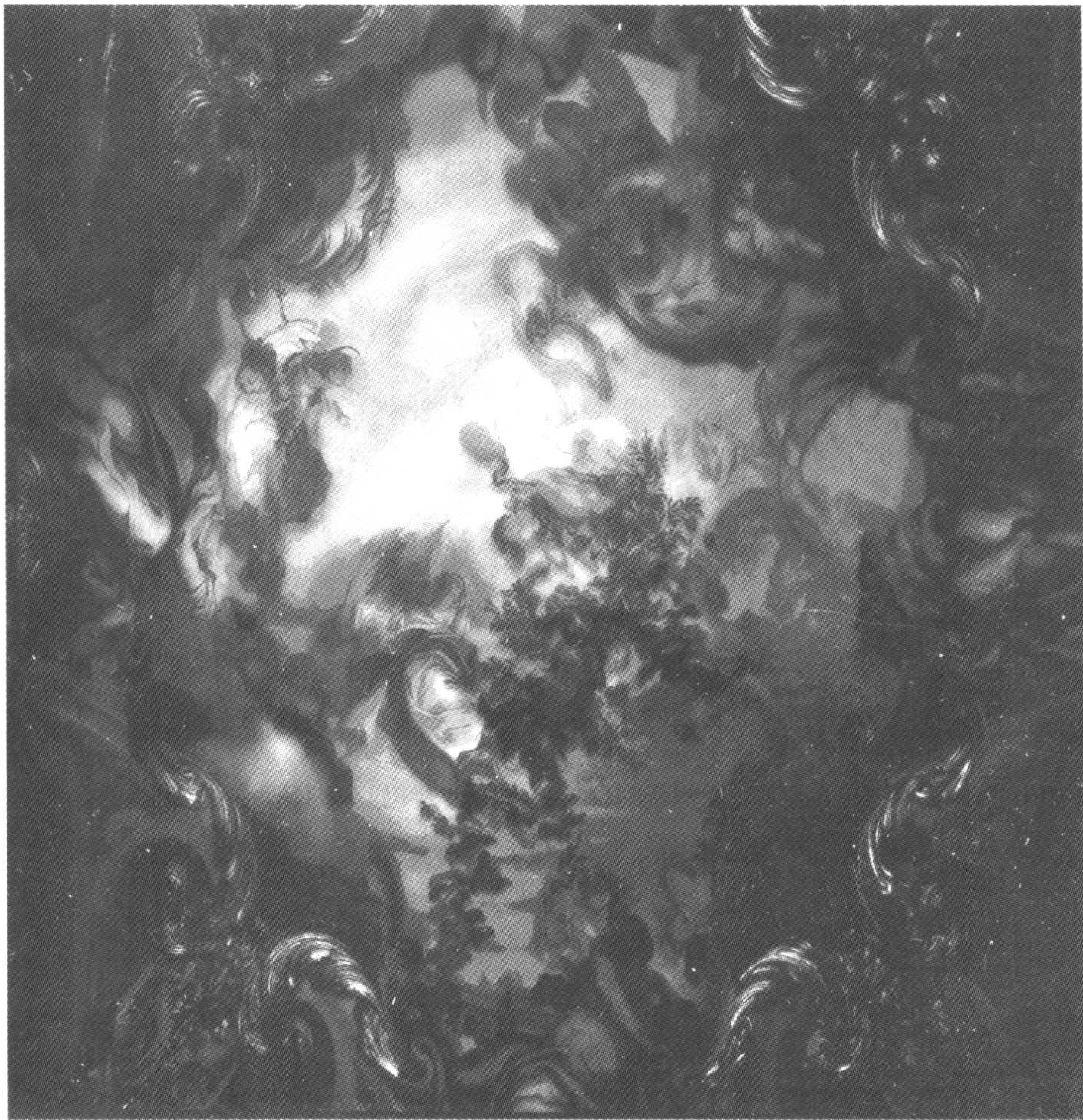


图 15　1689 年春天,格里高里·德·法拉利在热那亚的斯特拉达·洛瓦布林格宫殿(现在的罗索宫殿)房间天花板上的壁画。图片来自热那亚的弗里德里希·科拉克。



图 16 在帕拉维希尼的别墅的公园中的黛安娜的寺庙和人造的湖,佩格力。图片来自劳诺·玛格兰尼。



图 17 以“天堂”闻名的萨罗佐别墅(16 世纪末)在热那亚的阿尔巴罗社区的现代宫殿之中(鸟瞰图)。图片来自热那亚的照相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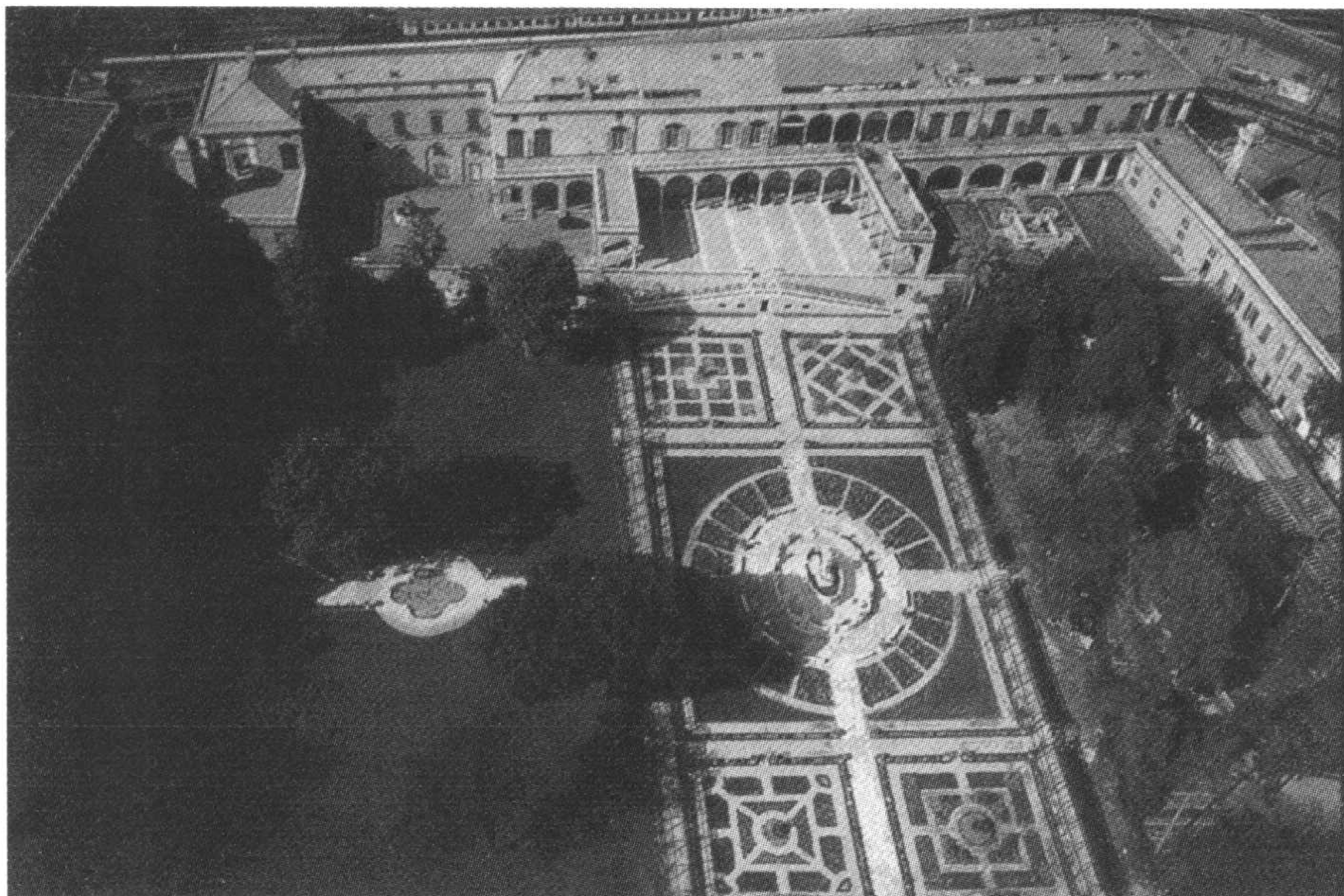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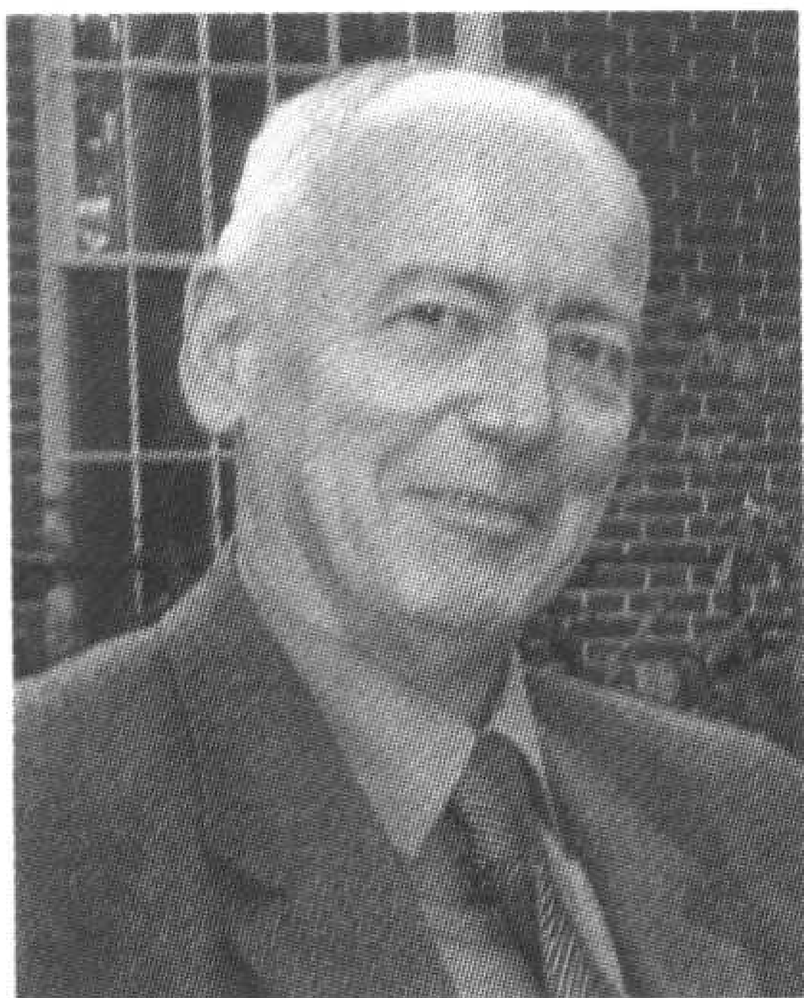
图 18 在最近修复(空中的视野)后的普林西比的多利阿别墅的海洋花园。图片来自热那亚的阿奇维欧·阿提·多利阿·帕姆菲利基。

(作者单位:意大利热那亚大学)

(张黔 陈国雄 译)

皇家花园与巴黎的城市生活
(1643~1789年)

[法]米歇尔·柯南



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敦巴顿橡树园园林与景观研究中心主任,当代设计收藏馆馆长,社会学家,研究兴趣集中在园林设计文化史上。他对19世纪70年代中期在法国兴起的园林史研究有重要贡献。他近几年出版了*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 Art des Jardins*(1997年)和*L' Invention des Lieux*(1997年),编辑了五本敦巴顿橡树园评论集:*Perspectives on Garden Histories*(1999年)、*Environmentalism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2000年12月)、*Aristocrats and Bourgeois Cultural Encounters in Garden Art*(2002年2月)、*Landscape Design and the Experience of Motion*(2003年5月)和*Baroque Garden Cultures, Emulation, Sublimation, Subversion*(2005年12月)。他最近出版了*The Quarries of Crazannes by Bernard Lassus, An Essay Analyzing the Creation of a Landscape*(Washington:Spacemaker press,2004);再版了一本介绍加百利耶·杜安(Gabriel Thouin)的著作:*Les Plans raisonnés de toutes les espèces de jardins*(Paris:Bibliothèque des Introuvables,2004)和*Es-*

sais de Poétique des Jardins(Firenze:Daniele Olschki,2004),此书荣获2005年意大利 Grinzani Hanbury 最佳园林图书奖。

17世纪早期,一些大型皇家花园对巴黎市富裕阶层开放,于是产生和发展了几种新的社交风俗和社会斗争形式。本文将对花园在1643~1789年间的文化转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提出一种诠释——从奥地利的安(Ann of Austria)的统治直至法国大革命的发生,此文化转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文中重点采用了那些曾对文化转变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实例,而略去那些大量的、偶然发生在园林中的事件。文中实例主要是引述巴黎的杜伊勒斯花园(Tuileries)——最早对公众开放的皇家花园,当然此重大变化也同时发生在巴黎市的其他花园和公共散步场所中[1]。

花园环境(The garden setting)

17世纪初,城市中马车、花园和社交圈的数量不可遏制地膨胀,这三种重大变化对巴黎人的生活造成了相互关联的巨大影响。马车的增多使富有的贵族可以频频游玩杜伊勒斯花园,也吸引好奇的资产阶级成群结队地游玩皇家花园。正如下文介绍的那样,这些活动在巴黎诱发了新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无尽的话题。与此同时,杜伊勒斯花园附近的拉·莱茵庭院(为玛丽王后所建)也曾吸引了许多资产阶级人士驾车前去观看贵族们如何炫耀财富,日益增多的富有的贵族、教士、资产阶级和罗宾斯们(即那些在16、17世纪之交,新被授予爵位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了以下这几处皇家花园的常客:杜伊勒斯花园、卢克斯堡园和阿森那庭院以及后来的帕里斯园(Palais Cardinal gardens,建于1624年)。在上述花园中,人们或在小路上漫步,或坐在椅子上、草地上,或靠在栏杆上观赏园中游人,新的生活方式促进了林阴道、新社交和一些窥探隐私模式的发展。1643~1661年间,即路易十三去世到预告法国专制统治第二阶段的路易十四政变期间,游览花园成为巴黎生活的重要方面,日益增长的游览者挤满了保存着皇室植物收藏品的杜伊勒斯花园(Tuileries)、拉·莱茵庭院(the

Cours La Reine)、卢克斯堡园(Luxembourg)、阿森那庭院(Cours de l' Arsenal)、杜·若易花园(the Jardin du Roi)。私人花园也被主人开放,例如 de Soubise 王子开放了有浓密的马栗树林和半月形画廊的花园[2],此外还有 la Folie-Rambouillet[3] 花园和女修道院花园(the garden of the Convent of Celestine monks),后来,科尔得利教堂于 1683 年修建的走廊成为又一处散步场所。由于城市的街道环境肮脏,并且来往的马、马车和手推车使步行变得危险,所以不利于人散步,而这些花园提供了方便、干净、优美的散步场所。17 世纪初,杜伊勒斯花园的道路相当狭窄,但是 Colbert 在 1664 年下令改建整个花园,园艺师勒·诺特(Le Nôtre)创造性地设计了一种在每条主干道两边各有三条侧径的花园,在著名的主林阴道上(Grande Allée),即使有一大群的游览者,也能方便地往返,该道路设计方案是法国古典式花园的共同模式。两名年轻的荷兰人描绘了 1657 年的一座女修道院花园:庭院在修道院后面,在那里,首先可以看见藤蔓覆盖的凉亭,然后是一条两侧种满修剪整齐的山毛榉树的大园径,还有小块珍稀花圃和摆放了漆木雕像的人造洞穴[4],花园(the gardens of the Arsenal)提供了一条长步行道(大约 670 米),从巴士底狱直通向塞纳河的城墙上。

创新风俗(Inventing New Mores)

我们可以统计出许多在巴黎文化生活的巨变中涌现的新风俗:每天行走在公共场所的人们的新行为风度、新性别关系、花哨的服饰和时尚的发展、新社交形式、新闻传播者和社会政治观点的发展变化,它们都受到杜伊勒斯花园中许多仪式化的行为习惯的促进。在园林中出现的新行为习惯被人们愉快地实施下去,除了享受无拘无束的与社会传统冲突的快乐,人们没有任何其他目的。花园设计的目的本不是为了鼓励人们自由革新公众生活,花园仅仅使创新风俗成为可能,却产生出了空前的集体行为。一个西西里岛游览者在 1692 年写道:“在这最迷人的地方,有人嘲弄,有人开玩笑,有人谈论爱情、新闻、公共事务和战争。人们下决心、批

判、激烈辩论、欺骗他人,每人通过这些活动获得许多乐趣。”[5]

新行为风度(New demeanors)

这时的杜伊勒斯花园中,经常可见游览者一群群沿着林阴道散步,别人则观赏她们。著名的主林阴路并不像现在这样宽阔,它过去是“复径”(指在主道的两边有种着树的林阴小道,这些树为小道和中间的大道投下阴凉)。“侧边小道上的六到七排座椅上,展示着只属于巴黎的妇女们,她们有最迷人的脸和最精美的服饰。中间供散步的妇女炫耀服饰的品位和富有,为这幅画面带来生机和美丽。”[6](ILL 03 The Grande Allée of the Tuileries)她们学习如何跳舞和行走、鞠躬、点头致意,或者用帽子致敬,这些是宫廷礼仪的组成部分,使她们具有与众不同的行为风度。[7]因为在花园中,中产阶级和朝臣混在一起,为竞争注目率,在男性中产阶级和罗宾斯们中开始形成了行走、微笑、将视线投向一边和向别的过客答礼等新的行为方式。贵夫人们在 17 世纪 30 年代开始去杜伊勒斯花园,寻找可摆脱在正式社交中、或与其他家族成员交往时的繁琐礼仪的自由时刻。她们狂热地追求自由的梦想,与一名选中的女伴畅所欲言,这种表面上无害的自由行为,却破坏了传统。一个贵夫人和她的丈夫被期望“依据身份行动”,就是说应该在整个的生活中去扮演正确的社会角色,或者接受他人的服从或者对他人表示顺从。[8]

新性别关系(New gender relationships)

一年年地过去,社会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这从 1709 年上演的一部喜剧《模糊的奥特尤尔》可得到例证,剧中夫妻在杜伊勒斯花园中一起行走会变得极为可笑(Bordelon 1709),而一名年轻的女士可能会和一名仆人、她的母亲,或者别的年轻的女孩及其母一起在花园漫步。在后一种情况下,女孩们将走到一起,在她们母亲们的前面并且保持恰当的距离,这样她们就可以轻松地闲聊和咯咯笑,引起邂逅的年轻男子的渴慕,男方被期

望向这些女孩鞠躬、投射多情的目光、朗诵谄媚的诗篇来引起她们的注意，女方都假装这是在向别的女孩致敬，并快乐地与男方进行柏拉图式的调情游戏。这类行为可能又一次显得无害，然而我们明白，这些行为在杜伊勒斯花园外是前所未闻的，少女们不可能见到非正式介绍到父母家中的青年男人，就是在教堂里偶遇，也不允许与女伴们一起吃吃地笑、或与轻浮的追求者进行玩笑般的调情，但这在花园中却很寻常。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游览杜伊勒斯花园，不用被介绍就加入对话、随意加入花园中任何站着或走动的群体并插入交谈，对于成年人、男人和妇女等变得司空见惯。[9]这种新习俗使妇女能够与在花园中散步的男人交谈，这无疑破坏了传统礼节，特别是小群的妇女可能上演各种假戏，假装与过路的陌生人一见钟情，花言巧语鼓励他加入交谈，骗他请这群女性吃便餐，在花园中的小吃店中消除口渴和满足对甜食的嗜好。在花园中可加入任何群体自由交谈，甚至产生了一种名为 le fâcheux 的新城市角色（闯入者，冒失出现并与他人交谈的男人），自从莫里哀（1661 年）创作了一部以 le fâheux 命名的喜剧，描写在花园中等候爱人的人被一系列这类角色骚扰，此绰号就流传开来。

跨阶级的着装（Class Cross-dressing）

在杜伊勒斯花园中禁止穿制服，任何男性游览者必须佩剑，因此，军官必须穿庄严而有礼貌的盛装而来，神职人员和地方官员必须脱下公务服换上礼服。中产阶级为了与贵族竞争人们的羡慕而身着华服，“中午过后，人们才能盛装进入杜伊勒斯”。[10]娱乐并没减少社会等级的差异，但是有助于模糊社会差异，这直接与社会理想（此理想社会要求每个人应依出生等级行动，而不应假装属于更高的阶层）相冲突，这种出乎想象的行为，严重违背了社会规则，却变得普遍起来，在一些冲突中又扩大成攻击性的行为。修道士或低等神职官员可能与优雅的妇女调情，这种行为绝对违反了教会规则，当这种行为降临到一个贵族女士身上时，她将以羞辱这个神职人员为乐，她假装乐意跟他一起出去，领着他来到花园门

口,这里将有穿着表明等级的制服的仆人们,围着她,把她送上四轮车,弃追求者而去。剧本《模糊的奥特尤尔》(Bordelon 1709)中的一个角色说:

> "太阳从来没有凝视到像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纪:世界的一半琢磨着如何捉弄另一半"。[11]

社会等级的模糊也导致另一市民类型的发展,"petit-maître"[12],一个与势利小人有些类似的角色,努力模仿贵族朝臣们,不过他们极为失败。朝臣属于戴剑贵族,"petits-maîtres"属于长袍贵族或富裕的中产阶级,年轻的朝臣们试着将他们的荒唐行为隐藏在有序的生活外表之下,然而模仿年轻朝臣的"petits-maîtres",刻意使他们的生活显得比以前更不受拘束;朝臣们在讲话之前经过深思熟虑, 然而,"petits-maîtres"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总之,"petits-maîtres"演出只是对对其渴望逾越的朝臣阶层的滑稽而拙劣的模仿,这仅能欺瞒中产阶级游客。我们明白,在等级分明的社会中,逾越社会差异将建立新身份,该身份如同被他人极力嘲笑一样,也被一些人异常渴望。

花哨的时装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Fashionable Dress)

"petits-maîtres"们因垂到耳朵的长帽子、庄严的外套、红跟鞋和不修边幅的外表而被人嘲笑,但是当谈论服装、发型、女帽等花哨的展示时,妇女更易成为攻击目标。妇女们相互攀比华丽的服装、珠宝、金银织物和高耸在头上的奢侈发式,[13]作家 Du Fresny 称呼她们为令人愉快的小鸟,能够一天换两到三次羽毛(Du Fresny 1702)。杜伊勒斯花园中著名的主林阴道就是新时尚优雅服饰的展示台,激起一排排坐在两侧林阴路上的观众的不停议论。让游客最惊讶的事是,当他们一步入花园,就失去了公共场所的正常行为,而不自觉地开始批判她人的行为和外貌,反过来,也成为她人嘲笑和批判的对象。[14]然而,我们不应被这些相互嘲笑所误

导，当时大多数游客很乐于欣赏杜伊勒斯花园林阴道上展示的时装，特别是看到最受欣赏的女帽，傍晚时分，妇女们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花园外的餐厅，这时，流动的飘带和帽子看起来像活动的花坛[15]（Mercier 1779）。这推动了时尚的发展和奢华消费，尽管每一位中产阶级应该遵守限制奢侈消费法。依据具体情况，请女士吃便餐和献花是一般的风俗；请一队音乐家和歌唱家在晚上来表演音乐，必然会引来包括心仪的女士在内的大量观众的注意，一旦该女士假装没听到的话，这将是相当昂贵的浪费。所有这些风俗与限制奢侈法中的公共消费限制原则相冲突，却促进了法国市场经济的增长，并推动法国公共场所时装展示仪式化和向资本经济方向发展。

公众监督和公众观点
（Public Scrutiny and Public Opinion）

人们可能徒然寻找一种新社会现象的诞生期，因为新形式的危机往往源于大量不相关联的习俗，它们以某种方式产生预料不到的后果。自1563年后，法国所有的出版业由皇室控制，随着时间流逝，限制和惩罚变得越来越严厉[16]，诸如严令禁止诽谤摄政王后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édicis）和她宠爱的康西尼 Concini 的诗歌，如果有人违反被皇家警察逮捕，将会被投入监狱并无限期监禁。17世纪的杜伊勒斯花园建有一堵圆形的墙，具有非同凡响的回音，可以重复任何站在中心的人大声说出的话的最后几个词。因此，过去歌手常用来衬托他们的歌声；恋爱者用于抒发情感和赞美他们追求的女士；希望自己对政府的评价能被听到的诗人也利用该墙的回音，即使他们声称从来没有单独说过这些词。我们能将此作为在17世纪早期已经具有政治谣言的一个例子，当时花园已经向公众开放了至少15年，虽然这并非散布谣言的唯一方式，但是没有其他方式的书面证据，直到“新闻人”的出现。“新闻人”（nouvellistes）是自称的，在一些花园中经常可以见到，如在杜伊勒斯花园，人们聚集在一个男人或一小群男人周围，后者发布一些非同寻常的新闻：上流社会的谣言、

来自文坛的新闻——在巴黎称为“诗坛”——或者散布关于边疆战争、国内政治冲突和政府的杰出措施等消息。

这些自任的信息首领们很快发现，为了吸引花园公众，将趣闻进行专业分类很有效，还发现发表一些内政评论可免受公众的反驳。所以，他们组成称为“佩洛通”(peloton)的小群体，新闻人聚集在一起，选出一个秘书长，或一个委员会，由“客可”(coq)主持，在新闻人分散到花园中发表高见前，客可先组织他们集中讨论当日新闻，传播新闻的最后阶段，在当时以咯咯饶舌(caquetage)而闻名。这类社会活动极为独特，从几个有闲的男新闻人中，产生出正式组织，同代许多人的空虚和好奇为其提供了动力，以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然而不能用目的论的哲学术语来估计的方式，使争论社会问题仪式化。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公众观点的建构，该建构并非导向民主讨论或交流，而是产生了野性的冲动、窥探隐私、妄想，大多新闻人追求成为一小群富人的注意中心后，具有的一种虚无的、自我实现的快乐，这类社会运动的权威获得来自公众的关注。

新闻散播者专于三条路线：1、老调重谈：他们看了六个月前的国外新闻出版物，但复述时仿佛是近期发生的。2、国家新闻者(nouvellistes d'Etat)，他们谈论政府事务和政府机密。业余新闻者(nouvellistes de Parnasse)，散布最新的诗篇，在巴黎的时尚沙龙里讨论或辩论文艺问题，评价公共建筑。流行歌曲传唱者(coureurs de chansons)，重复听过的新歌。3、小说娱乐者，他们用各种令人愉快的故事取悦听众。[17] (Donneau de Vizé 1663) 在1663年的杜伊勒斯花园中，他们已经开始让许多人注目，此关注经久不衰直到革命爆发。18世纪末在杜伊勒斯花园中，虽然法律严禁出版或散布任何关于国王隐私以及有关国王个人生活和所有政府事务和计划的消息[18]，但是议论政府改革的声音仍嗡嗡作响。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在他的《杜伊勒斯花园中的会话》一书的最后一章“杜伊勒斯花园的对话”中，巧妙地使自己与书中描写的演说者无关——作家略述了评论中的乌托邦，以显示对君主政体的嘲笑(Mercier 1779)。在杜伊勒斯花园，一名男人在作家的耳旁低语，说他已有关于国家社会组织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提议国王是所有事物的唯一拥有者，从食物、衣服、工

作、住房和健康保障到所有项目，都按等级来兑换，并对这些措施的结果，做了长长的描绘，认为必须建立饮食制度等级体系，依据家庭成员的身份和地位供给不同档次的菜单。[19]

“放列”与公众空间(Emplacements and Public Space)

杜伊勒斯花园激发了各种各样的新活动，这些活动还在全市的皇家花园、修道院和其他散步场所中呈网状散布，每项活动集中在花园的特定部分，因此花园使大量不同的活动得以同时发生，也包括在巴黎人的生活中不会起到任何文化转变作用的偶然活动。当这些新活动扩展到一些花园时，只需要占用任意花园中的一个或几个“放列”。[20]

在杜伊勒斯花园里，每一类新闻人都有自己的集会点，或者在塞纳河沿线的梯地，或者围着大圆形水池、喷泉和梯地，他们每晚六点后，或站或坐，形成一个圆圈谈论，周围围着热切的听众。在卢森堡市(Luxembourg)，新闻传播者过去常常被听众环绕，在花园的榆树下或沿着两条林阴道(Allée des Soupirs and Allée des Carmes)或站在很大的紫杉树下。在皇宫(Palais Royal)，主要的聚会场所也是在树下，一棵很大的马栗树。因为在这个花园的一些听众可能在另一花园成为新闻人，新闻就从一个花园散布到另一个花园。讲述者从不逐词复述新闻，而是依据自己的观点和迎合此花园群众的具体爱好作一些调整，这就使得为了听听城市中的闲言碎语是如何在花园里流布的念头得到满足，而从一个花园走到另一花园变得有趣。新闻从花园到花园，又从花园到私人住宅，由于更多的人——那些没有机会去花园的人被告知了最新消息后，也会谈论和复述它，于是在杜伊勒斯花园中发布的任何新闻，将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传遍整个城市并传回花园。

年轻人时髦的骑马表演、不拘礼节的殷勤举动、非法性行为、散布新闻等，每一件都是无字剧本，在各个花园里的固定地点每天变化着、重复着、无穷无尽延续着。各类仪式化活动的观众们，在花园里的具体时间段创造各自的“放列”，例如一个位置，下午被孩子们用来做集体游戏；晚些

时候,被新闻人利用;晚上又变成谈情说爱的地方。"放列"是一群人在花园中从事某类活动时形成的领地,通过这种方式,当某群城市居民们在花园中从事他们的活动时,"放列"就成为他们在这几个小时内存在的象征。然而,每类社会活动都由一群当地居民引起,他们从一个花园的"放列"流动到另一个花园,散播新的行为习惯、态度、观点,因此将不同花园的许多"放列"连接成为一个网络,覆盖了花园内外,影响延伸到整个城市。例如,这群新闻人形成了一场社会运动,即使运动内部有所分歧,他们也断言所有市民有被告知公众事务以及对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的权利。

社会运动和体制(Social Movements and Institutions)

发动革新的群体彼此差异很大,仅在作为群体身份的有限意义方面有共同点,这点类似于"新闻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由非正式的人群组成,这些人在花园中从事相似的仪式化活动,从而有助于在城市中散播他们的新习俗和他们需要的新文化观点。这些社会运动参入了现存体制的辩证转变过程:活动致力于制定新习俗和新观念——例如有权自由辩驳公众事务的观点——反对制约这些习俗和观念的现行旧体制,为此,他们利用属于皇室和教会的土地,控制了分布在花园或修道院庭院中的"放列"网络。为了充分评价花园空间,或作为一般意义的空间的重要性,假如我们将特定社会活动区域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所制定的规则或法则称为体制的话,将会发现城市的每一空间至少代表了某一种体制[21],任何体制都创造和维护着自己的空间,这些空间由物质结构和特定的功能形式组成,以有效实施制度和操纵处于该空间中的人。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打比方说:住宅是家庭的空间,法庭和监狱是法律的空间,教堂和修道院是属于教会的两种空间。这些空间制约了人的活动,让特定的来访者或使用者到被特定体制约束的地方去,为进入此制度空间的人定下期望其采取的具体言行,信徒一进入教堂就立刻认识到应该降低声音、在胸前画十字;穆斯林一进入清真寺,就知道要做洗礼并光着脚进入

祈祷室。每一体制化的空间都拥有相同行为和情感的成员、使用者和来访者,避免异类进入。体制空间与它具有的记忆、需求和共享的情感一起被称为场所,场所暗示了受空间限制的个人或集体的行为范围:既需要绝对禁止或强迫实施一些行为,也需要制度中的成员即席创作或想象许多行为。我们明白,制度的实施不是简单地划出城市的一些部分,声称它们是自己的地盘,而是创造出暗示制度感的媒介空间,空间体现了制度的力量。

这种对空间的理解受到经验主义空间观的反对,他们认为空间的概念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应按照笛卡儿所说的"人类的所有空间是几何空间"来理解。我们对空间的解释能够让人们理解:社会运动对转变制度化空间的作用,以及推动社会文化不断进步的革新与限制的辩证关系。皇家花园属于国王和宫廷的休闲领域,与贵族们喜欢的自然界中田园牧歌式的自由的梦想相一致,该著名的梦想为巴黎社会的文人所理解,花园至少不是拘束的制度空间。侵入花园的社会运动组织者发现自己摆脱了像城市警察、教堂等高压统治制度,可以自由运用"放列",花园成为他们探讨公众利益、提出新思想的地方:年轻男女约会的自由,男人与女人交谈的自由,消费昂贵衣服并公开展示来取乐的权利,以及城市居民们公开争论所有公众事务的权利。在花园外,这些新观念与教堂、家庭、警察和政府的规定相违背,假如统治制度在整个城市占主导,这些新观念将很难形成和传播。花园的"放列"网络,允许公众在其中进行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集体探险,终于在大革命后,把他们在花园中变革试验的一部分制定为社会体制的新法则,产生了新的社会运动和新的文化转变形式。

变化的风俗(Changing Mores)

让我来扼要复述从以上皇家花园文化变革的研究中得出的几条要点。首先,17 世纪和 18 世纪在公共花园中逐渐出现习惯行为仪式化,它们先在具有明确媒介感的特定"放列"处发生:在杜伊勒斯花园中的著名主林阴道上,它吸引人们来夸耀、传播英勇的消息;又一类似的园径,沿线

摆放了长椅子，供人们坐谈和嘲笑走过这里的人。正如梅西埃(Mercier)所记载[22]，许多“放列”似乎邀请谈论公共事务的嘉宾。在杜伊勒斯花园中著名的龙杜(rondeau)林阴道中的长椅子上、花园水池边、对着梯田的坡道和在草坪开端处非常长的椅子，仿佛要召集附近的小说家；在又一个类似的园径，很黑，看来极适合恋爱。[23]这些地方本不是为这些事而设计，其场所感源于在此处常发生的一些活动。这证实场所感既非来自物质外观，也非赞助人和设计师的意图，而首要是取决于该处发生的活动：场所感是一个用来描绘景观欣赏而不是景观创作的概念，新来者很快发现他们被期望遵从当地的习惯，在此意义上，花园中的每一“放列”要求特定类型的行为。因为环境和使用者促进人们采取某类行为，或至少认同一些反常的行为，所以研究新来者如何一步入花园，就能轻率地采取不寻常的行为是件很迷人的事情。因此，在花园中出现的习惯行为，与其他制度环境中的正常行为有很大差异，并将成长为花园中非常确定的习俗，这个过程培养起与园林中的特别位置相联系的行为规则，似乎这些行为规则在制定过程中，省略了宣布或提升其权威性的任何具体行为。

第二，我们观察到，不是花园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追随变革活动，可能会有人嘲笑或反对，在喜剧或诗篇中奚落，甚至用强力制止。在花园中的同一地点，一些人展示他们自己；其他人享受与心腹之交畅谈的亲密；年轻的女孩学习社交技巧、严格的谦虚和自律。许多活动(例如保龄球)，即使对最严厉的检查员而言，在花园中也将变得无伤大雅。当前在花园中发生的习惯行为赋予了花园诠释的视角，而不是如同教科书那样介绍一个意义世界，或者如同社会体制那样界定一种法则世界。[24]因此花园中的“放列”和作为整体的花园，充满了同代游览者不可忽略的天生能动作用，使新习俗对抗传统，并要求在花园外作进一步探讨，特别是一些“放列”充满了革新时尚的迫切欲望，激发起花园内外关于奢侈服饰消费的道德意义的热烈讨论。这些公共园林并没有被导向或被赋予某种意义，而是导入了一个模糊的能动意义(sense of agency)[25]，这可能就是值得将17世纪和18世纪花园视为对文化发展有特殊贡献的艺术品进行注意的原因：园林被超越内部界限而团结在一起的公众群体激发了创造效

应。

第三，我们发现，作为整体的杜伊勒斯花园，并不是一个恰当的，供我们分析花园在巴黎文化转变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单元。详细分析花园中的活动揭示了空间的异质性，该空间由发表不同的政见和采取不同能动作用形式(forms of agency)的“放列”拼凑而成，综合分析从事特定活动的巴黎人，可揭示不同花园中许多“放列”的相互依赖关系。这要求集中分析花园中的活动，以揭示这些活动如何、在哪里、为什么造成花园“放列”，这些花园“放列”如何与多个花园的另一个“放列”、与整个城市的其他地方相联系。

第四，一旦将自然视为自由的化身，向公众开放的花园就会成为交互世界[26]，它处于文化竞争群体的中间地位，让人们自由采取不同的行为。花园可以容纳几个“放列”，每一个“放列”强烈要求花园用途的模糊方向(ambiguous directions of agency)。因为作为整体的花园，被视为理想自然的化身，充满和谐，无拘无束，所以不同于受风俗和法律等行为规则限制的乡下和供狩猎的森林。[27]为了成为一个理想中的自然，花园必须与自然相区分，此自然是指城外的普通自然界，巴黎的皇家花园用园径、圆形水池、沟渠、洞穴、藤架凉亭、园林建筑、林阴道来体现对自然的设计。我在此想强调一点，假如注意在园中表演的少数有趣的游览者，设计将比它看起来能起的作用更重要，园林设计使脱俗的品质渗透场所，体现了上流社会的休闲生活和摆脱国王约束的虚构的自由世界，普通游客就被园林导入这个世界。因为设计所采用的形态特征被游览者视为皇家花园的标志，所以设计给偶然的自然赋予意义，这种文化自然欢迎游览者进入一个新的交互世界，发展不同于贵族休闲生活的世界。我强调区别研究花园的两种不同视角的差异：一种将园林作为文本、作为传达给游览者意义的场所来讨论，另一种把花园作为开发了集体能动作用的交互世界。第二种解读能帮我们理解园林如何能为文化转变作出杰出贡献，而第一种解读仅将园林视为文化在语言世界外的烙印，或最终图景。这就是梅诺·庞蒂所说的：“空间源于存在。”[28]

第五，这些年来，城市居民的生活与观点被解放的文明与粗野行为形

成了三类结果:道德家的蔑视,他们怀旧地描述已往岁月;被压制的风俗制度的发展;进而是对现有规则的逾越,第三种结果是前两种反应的综合。梅西埃(Sébastien Mercier 1740-1814)在他的"巴黎图卷"[29]中,举出了这些相联系的现象的一个形象例子,他刻画了18世纪末在杜伊勒斯花园中,妓女们新行为的发展过程。其口气明显是说教的,他大声疾呼:妓女不再是过去那样了,那时黄昏后才招徕顾客,然而在本书写作的时代,妓女们可能会穿着淑女的服装,坐在园林中的椅子上,等待某客人对她们的扫视作出回应,然后邀请他共进午餐。几个妓女可能有时强行组成所谓的"职业聚会""四边聚会",由此给那些训练眼神集中在刺绣或最近的椅子上[30]的年轻的女士们以最不道德的榜样。此例子提出了最有趣的视角,来洞察在文化转变的动态过程中园林所起的作用。花园看起来是一个文化传统和革新交战的地方,能够激起公众辩论何为道德与文明,只要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在城市居民头脑中潜伏的被压抑、禁止的需要,将在花园中浮现出来,并促使公众辩论。巴洛克时代的公共花园供大众参入,而不是个人,在花园试验性的实践中,现存的文明规则受到被压制的社会力量的挑战。然而,结果并不是产生在伦理意义上和解的新社会,而是围绕着公众行为的不同争端,用新方式来重新划分的社会。

结语(Conclusion)

因为巴黎的皇家花园吸引了类型迥异的人群,在花园某处发生的活动不是优先服从统治制度,而是允许不同群体自由体验,所以有助于发展公共事务交流空间。这些试验并非花园规划的目的,却在许多皇家花园和修道院花园的具体"放列"中实施,形成了一个社会变革的活动网络,吸引各式各样的、不断变化的支持者。因为可公开发表激进的观念和煽动辩论,所以向公众开放的巴黎大型花园,为集体的言行自由创造了可能性。花园对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双层的:提供了虚构的自由王国,把所有市民从城市和家庭生活的限制之中解放出来;允许"放列"存在,在其中人们探究社会运动、鉴别新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所有这些都在1789年大

革命后消失并发生急剧变化,复述这一历史并非企图复制这类城市现象,而只是回忆花园曾提供了追求文化自由变革的必需空间,"这关系到把唤醒的自由感引入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可能,该自由感否认天赋人性论,同时呼吁创建新人性。"[31]

参考文献

[1] Anon.. *Nouveau Traité de la Civilité qui se pratique en France parmi les Honnestes Gens*. Paris : chez Helie Josset, 1673.

[2] Berthoz, Alain and Roland Recht, eds. *Les Espaces de l' homme*. Paris: Odile Jacob, 2005.

[3] Blythe, Richard, ed. *Wild Cities/Urbane Wilderness*. Launceston, Tasmania: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t Launceston, 2002.

[4] Bordelon, Abbé Laurent. (1653-1730) *L'Ambigu d'Auteuil, ou Veritez historiques; composées du Joueur. De l' Inconnu. Du Nouveliste. Du Sincere. Du Financier. Du Subtil.*

[5] Du Critique. De l' Hypocrite. Et de plusieurs autres personnages de differens caracteres. Paris : chez la veuve de Courbe, 1709.

[6] Brillon, Pierre Jacques. *Le Théophraste moderne, ou Nouveaux caractères des moeurs*. Paris : M. Brunet, 1701.

[7] Dezallier d' Argenville, Antoine-Jospeh. *La théorie et la pratique du jardinage*. Paris : Pierre-Jean Mariette, 1747.

[8] Donneau de Vizé, Jean. *Nouvelles nouvelles*. Paris : P. Bienfaict, 1663.

[9] Du Fresny, Charles . *Entretiens ou Amusemens serieux et comiques*. Amsterdam : chez Estienne Roger, 1702.

[10] Foucault, Michel.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ed. James D. Faub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11] Funck-Brentano, Frantz . *Les Nouvellistes*. Paris : Hachette, 1905.

[12] Gell, Alfred. *Art and agency :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and New York : Clarendon Press, 1998.

[13] Hermant, Abel and Frantz Funck-Brentano, et al. *La Vie Parisien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 Payot, 1928.

[14] Mercier, Louis-Sébastien. *Tableau de Pari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msterdam: 1782-1788. Genève : Slatkine Reprints, 1979.

[15] Merleau-Ponty, Mauric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Gallimard, 1945.

[16] Merleau-Ponty, Maurice. *Sens et Non-sens.* Paris: Gallimard, 1996.

[17] Molière, *Les Fâcheux.* Paris : 1662.

[18] Mongin, Monsieur. *Les Promenades de Paris.* Paris : hôtel de Bourgogne, 10 juin 1695.

[19] Rustin, Jacques. *Le Vice à la mode, étude sur le roman francais du XVIIIé siècle de Manon Lescaut à l' apparition de la Nouvelle Héloise (1731-1761).* Paris : Ophrys, 1979.

[20] Philipon-La-Madelaine, Louis. *Manuel ou nouveau Guide du promeneur aux Tuileries.* Paris : Hautbout-Dumoulin, 1797.

[21] Poëte, Marcel. *Au Jardin des Tuileries.* Paris : Auguste Picard, 1924.

注释

[1] 此陈述基于我之前写的关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巴黎公共园林的几篇文章,我将一些分散的思想总结到一起。可查看:米歇尔·柯南《两个园林的传说:Tuileries 花园和圣詹姆士郊园的文雅荒野》,载理查德·布莱思(Richard Blythe)主编的《野蛮城市/文雅荒野》(朗塞斯顿建筑学院 2002 年版)第 12 ~ 20 页;《18 ~ 19 世纪巴黎的皇家园林空间》,载贝尔托和理查德(Berthoz and Btcht)主编的《Les Espaces de(homme)》(巴黎奥戴尔·雅各布 2005 年版)第 291 ~ 307 页。

[2] F·布伦塔诺:《短篇小说家》,巴黎桦榭 1905 年版,第 140 页。

[3] 园林设计师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贵族园林中,增加了对尽可能平坦的主园径建设的重视,主园径越长,能吸引来更多的群众,此外,主园径必须比较宽广,这点能在Dezallier d' Argenville1747 年版的书上看到。

[4] F·布伦塔诺:《短篇小说家》,巴黎桦榭 1905 年版,第 133 ~ 134 页。安东尼奥·派拉兹(Antonio Ptrez),菲利普二世的前任大臣,很成功的新闻圈首脑(Funck-Brentano 1905, 136)。

[5]F·布伦塔诺:《短篇小说家》,巴黎桦榭 1905 年版,第 172 ~ 173 页。

[6] 菲利普·拉·玛德莱纳:Manuel ou nouveau Guide du promeneur aux Tuileries,巴黎 Hautbout-Dumoulin1797 年版,第 68 ~ 69 页。

[7] 当与上流社会的女性同行时,被建议稍微走在她后面一点,同时用各种方式表示尊重。"如果发生在花园中,人们应该走到此人的左边,当她在园径上转身回走时,依然一点不做作地保有此位置。当有三个走在一起的人时,中间位置属于最尊贵的人,于是这位置被最有资格的人占有着。"载 Anon. 1673, Chap. X。

[8] 用法语说就是:"*tenir son rang.*" 这当然是期望所有贵族遵从的新坚忍的道德规范的表达。

[9] "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地方,人们可以不用介绍就轻易地与别人交谈起来,女王将高兴地与一个非常陌生的人展开交谈。"(Mercier 1979, 39)

[10] "穿粗放的便装出席的时尚(又叫做长袍或有尾外套),在革命前几年从英国传到法国,Chinon 王子,公爵的儿子,曾经穿着这种服装,在他父亲大型的优雅聚会中,穿过人群到达桌边。——儿子,你从哪里来? 公爵问道。——我,来自凡尔赛——在谁的马车后面?(寓意他穿得像跟在主人马车后的男仆)"(Philipon-La-Madelaine, 1797, 69 and note)

[11] 帕特(Poëte):《园林装饰》,巴黎奥古斯特华卡德出版社 1924 年版,第 300 页。

[12] "petit-maître"起源于 Condé 领导的 Fronde 时期。属于戴剑贵族阶层的年轻男子以夸张做作的方式列队行进,渐渐被称为 petit-maîtres,他们的行为被属于长袍贵族阶层的男子,以最做作和荒谬的方式模仿(Rustin 1979, 93-98)。

[13] 在一部喜剧中,向另一名进入著名的 Allée 园径的仆人解释说:"这里是上层社会显示骑马术的地方,这里是当太阳入息时(暗指国王的入睡仪式)有华丽马饰的地方,这里是穿戴项链、服装和绸带的黑发、金发女郎展示她们自己的地方。"(Mongin 1695, 140)

[14] 自 18 世纪初,作家们重复记录说,园林的游览者感到,当他们位于杜伊勒斯花

园的一些地方，就会被迫使从事一些他们不赞同或不想做的活动。

[15] 见布瑞隆(Brillon 1701, 17)和梅西埃(Mercier 1979, 19-20)。

[16] F. 布伦塔诺:《短篇小说家》,巴黎桦榭 1905 年版,第 8 ~9 页。

[17] Jean Donneau de Vizé 是权威期刊《风流信使》的出版商,他感到来自花园新闻传播者的竞争。所以,他的描写可能是不友好的造谣,却也提供了一些关于"新闻人"制造消息的机制,这是最有价值的信息(Donneau de Vizé 1663, 318-329)。

[18] 路易—塞巴斯蒂安 · 梅西埃在他的书中通过描绘在杜伊勒斯花园中的对公共事务的讨论,透露了这些禁忌如何被颠覆,在自称仅描写了园林中发生的事的一本书中,他描写道:"'没有帝权、没有社会、没有家族的地方不需要改革',两个学者风度的人用严肃的口气说道,这时我加入了他们的谈话。他们正沿着杜伊勒斯花园的 allees 园径行走,当他们谈论时,我发现话语中充满了机智和优雅。园林中一般的话题是社会变革问题,我像其他人一样克制不住要加入谈论。"(Mercier 1979, 3-4)

[19] 梅西埃(Mercier):《巴黎年鉴》,斯赖特科思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04 ~210 页。

[20] 我借用了米歇尔 · 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词。见米歇尔 · 福柯 1967 年 3 月发表的演讲稿"不同的空间"(Foucault 1998, 175-186)。

[21] 在 17 世纪的巴黎,教会、家族、法律、社会秩序等级、警察等新体制被一些园林革新活动者试验着。

[22] 见注释 17。

[23] F. 布伦塔诺:《短篇小说家》,巴黎桦榭 1905 年版,第 178 页。

[24] 我想强调,园林提供了极多的公开辩论政治行为或观点的条件。

[25] 阿尔佛雷特 · 杰尔(Alfred Gell)已提出了一个有趣的人类学方法用于研究艺术,认为在跨文化研究艺术品的时候,不应该从美学视角或从西方艺术的观点出发,而应将之看成充满了自身能动价值(a sense of agency)的工艺品,在它们被制造的文化中有明确的效果域。他甚至介绍西方艺术界如何以一种完全改变其文化意义的方式来收藏艺术品,因为不注意它们的原初意义。在此我建议游览者多体验这些公共园林的能动涵义,然而园林能动作用的价值不是事先计划的,而是模糊的,它们应服从于依园林每一地点而表现出的适当行为的不同意义。我不认为这与 Gell's 的观点冲突,而是指出园林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开放艺术品(Gell 1998)。

[26] 交互世界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使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依据他们没有意识到的、伴随着他们的幼年成长而获得的风俗,相互理解,相互交流。语言、肢体语言、想象和趣味是我们沉浸在交互世界的例子。

[27] 这些私人行为能受到赞美和磨灭,但是体现在此地的中介感不会改变。

[28] "我们说空间是有关存在的。我们假定存在是空间的……"(Merleau-Ponty 1945, 348-349)引自其专谈空间的一章的此段,能够作为注释来介绍本文所采用的视角的转变。它解释我们居住的空间,批判事物的几何描述,我们的理解只是赋予意义到我们感知事物的特征上。它反对这种将生活世界的客观对象化的方法,因为没有不显现在一定背景中的理解,任何人的理解都先据他自己的经历,预设了一种感知主题。所以我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依靠更私密的心理活动,其基于我们如何构想所置身其中的环境的思维方式。梅洛庞蒂(Mereau Ponty):《知觉现象学》,巴黎:伽里玛尔出版社 1945 年版,第 325 ~ 326 页。代替探究园林的物质描述或意义,我们必须从观点如何形成的视角来理解,这些感知如何形成? 我们是否要强调游览者、用户、设计师的观察。

[29] 梅西埃(Mercier):《巴黎年鉴》。斯赖特科思出版社 1979 年版。

[30] 这些"四面派"(*parties carrées*)成为巴黎中产阶级不言而明的生活方式。他们从没有因艺术出名,直到 1863 年马奈(Edouard Manet)画"草地上的午餐",它创作了丑闻,同时在巴黎市的文化遗产中导入了不正当习俗的形象,其由来可以追踪到杜伊勒斯花园。梅西埃对这类习俗进行了道德谴责,他含蓄地说:"这种厚颜无耻的行为,在太阳的注视下、在园林中如此显而易见,这里,诚实的中产阶级被迫转过脸去,这类故意嘲笑公共礼貌的表演,是最让公共道德的保护者讨厌的事。"

[33]梅洛庞蒂(Merleau-Ponty):《意义与无意义》,巴黎:伽里玛尔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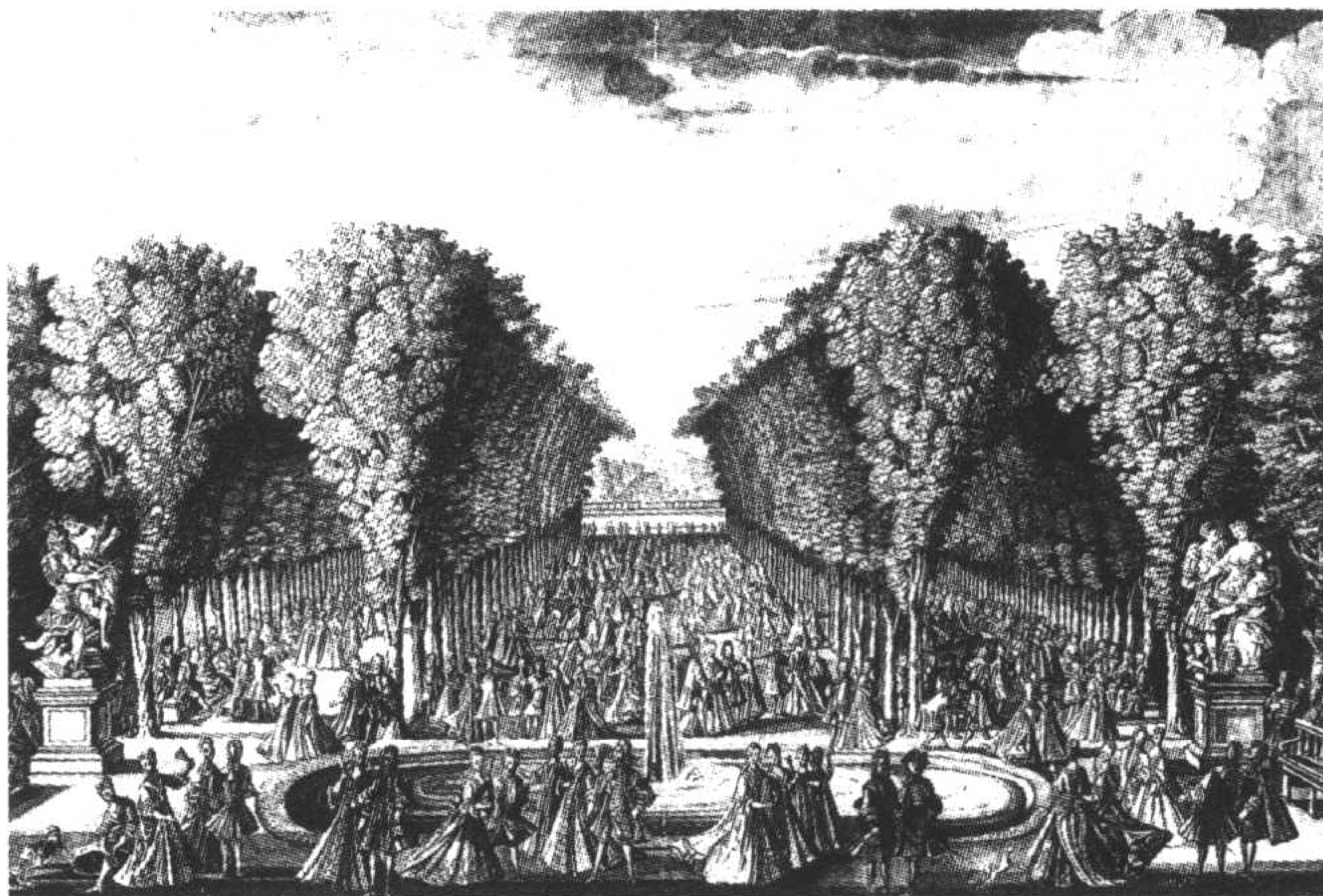


图1　描绘嘉乎赛尔和杜伊勒斯宫的布莱斯·包迪埃花园举行系列庆典活动的挂毯,这一幅表现了美第奇的嘉德琳娜在1573年9月14号接待波兰大使。



图2　嘉乎赛尔和杜伊勒斯宫的布莱斯·包迪埃花园中建于18世纪的林阴大道。

(作者单位: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

(李世葵　译)

18 世纪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园林社交

[美]席琳·哈马德



席琳·哈马德(Shirine Hamadeh),艺术史助教,1999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历史、理论与批评的课程并获得博士学位。接下来的两年,她先后在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和伊斯坦布尔做景观方面的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近世土耳其建筑和城市文化。席琳·哈马德 2003 年 1 月进入莱斯大学艺术史系任教,之前她任教于母校贝鲁特美国大学。她最近正在修订其学位论文《欢乐之城:18 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建筑感性》——1999 年中东研究协会授予此文 Malcom Kerr 学位论文奖——并准备将其出版成书。除了关注土耳其的视觉文化和现代化进程之外,她还关注穆斯林世界与欧洲的艺术交流、19 世纪的殖民城市和东方的绘画和文学。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地形学的现象,公共园林在近代欧洲城市里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地位上升和向现代性迈进的标志。在 18 世纪土耳其的首都,公共园林成为一种变革的重要尺度,因为它们打破了现有的社会秩序。那里成为人们上演新近的社会事件和休闲娱乐的主要舞台;同样这

些社会活动也对城市中生活习俗和地理位置形成承担了再造功能。公共园林是如何成为伊斯坦布尔自然和人文景观中的重要特色这一问题正是这篇文章所要考察的。如图中的库苏克苏(Küçüksu)园林和卡弗太纳(Kağıthane)园林(图1、图2),不断地被再现于书本中或明信片上,在今天仍持续给我们留下这些园林确实存在过的印象。它们是如何发生形成的是至今很少被论及的一个问题。[1]这些园林是如何成为社交性的地点和人们日常集会处则是我将研究涉及的另一问题。

当然,园林景观在伊斯坦布尔并不是新近产生的。在17世纪著名的旅行家爱维亚·瑟勒比(Evliya Çelebi)对这座城市的描述中,卡弗太纳园林是当时假日里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Evliya 1993年),作为与他同时代的人,美国的编年者瑟勒比·埃热亚(Çelebi Eremya)也说道,博斯普鲁斯(Bosphorus)海滨和金角湾(Golden Horn)给几乎整个伊斯坦布尔的人们提供了惬意的散步之所,尤其是在春季(Kömürciyam 1988,50-54)。但是到了18世纪,"公共"园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为公众提供的园林,在唤醒土耳其城市生活的新景观前已悄悄地渗入到大众文化里。在画家、诗人、编年史家和旅行者们留存的迄今可见的原文和记录里,公共园林代表了社会和休闲生活最热闹的集合地点,它迎合了来自各种社会阶层、地位和年龄的人们。而且如女人和孩子们,这些在传统上极少露面于诸如酒馆和咖啡屋等男人休闲场所的人群,也能在这里出现并引人注目(图1、图2和图3)。丰富的社会活动和图示的景象捕捉到普通人民愉悦生动的生活场景。这明显区别于先前的园林景象,在那里只有特定的人群进行尊严而有礼貌的社交,进行着一种几乎墨守成规的娱乐表演和仪式(图4)。正如诗中所描写的,园林作为社交体验和公众巢穴开始占主导地位。不同于16、17世纪古典诗歌中所描写的园林仅限于封闭的和排外的精英阶层的社交和私人娱乐,新诗中对园林的描述,提供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职业和文化的视角,并使用了一种新的敏感性和期望性的语言(参见哈马德即将出版的著作)。

在某种程度上,你也许会认为公共园林(和一般的户外公共场所)是诸如咖啡馆、小酒馆、影剧院和街头表演等萌芽中的城市文化的自然延

续，而这些文化从16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兴起了（Tietze1977；Kafadar即将出版著作；K ı rh，2002，18-66）。然而公共园林有别于其他之处在于城市生活的自身发展和自身抵抗在同时进行着。18世纪，公共园林扩建成为城市文化的主流，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家上层阶级鼓励它们的扩张与发展。在本文中，我将把18世纪前10年公共园林的发展缘由分为三个并列的部分：统治阶级对建筑的赞助行为源于其渴望重新树立自己岌岌可危的公众形象；中产阶级社交与消遣方式的转变；国家关心公共秩序。换句话说，当公众生活被既定的法规措施控制的同时，看似矛盾却的确如此的是，它也被造物主和国家精英们用新的空间滋养，在那里公众文化得以繁荣，而最明显的方式就是向大众开放古代的皇家园林。

土耳其统治精英的建筑赞助

回溯到1703年，在苏丹·艾哈迈德三世（Sultan Ahmed III）统治时期，从埃迪尔内（Edirne）到伊斯坦布尔，在长时间的沉寂之后出现了历史上最具爆发性的建筑赞助时期。这主要集中在特别的地区——沿着博斯普鲁斯和金角湾的偏远海岸。也许它显著的表现就是由苏丹及主要的维齐尔（维齐尔是伊斯兰国家元老、高官，译者注）、皇室成员和宫廷随从们建造并耸立在海岸边的许多新的、富丽堂皇的园林。毫无疑问，这些新建筑显示出的那不同寻常的极尽奢华的装饰风格只不过是土耳其空前没落的君主王权企图挽救其荣誉所树立的幻影罢了。这种新形象建立的部分原因是对1699年期间遭受到的来自欧洲，尤其是维也纳的严重军事打击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来自国内的改革压力的回应，亦即社会等级系统的逐渐腐化。在伊斯坦布尔，许多政治力量正致力于王朝的复辟。此时代表着权力和威信的展示、皇室华丽的象征纷纷出现。新的宫殿和富丽堂皇的园林星罗棋布地坐落于郊外的海滨边。然而这些逐渐增长的皇家新建筑却逐渐消弱了大量古代园林对宫廷生活的吸引力。许多古代园林后来被修复，也有一些停止使用以致年久失修而被荒废，还有一些则变成了公众闲聚的公园。

以上这些发展细节在文献记载中却相当模糊,我们也无法从当地的历史文献和编年史或国外游记里知道这些古园林遭遇发生的确切背景。在一些案例中我们看到一个君主或最高首领重建荒废的皇家园林并使它们中的一部分对公众开放。而翻新一座皇家园林的决定常常变为一种皇室的捐赠。典型的例子是,君主或某个统治阶级的精英建造一座新的清真寺并将其随同一些复杂的商贸和休闲设施捐赠,后者用以维持寺庙的香火。他们出租部分土地给商人——之后这些地方演变成一个个"集市",同时修复现存的亭阁等并在某种情况下把周围的园林开放给公众。例如16世纪晚期建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安那托利亚海滨(Anatolian)的坎地利(Kandilli)皇家园林正是沿承了这一传统。它修葺于1718年,但之后便遭遗弃,直至1749年。在那年苏丹·穆罕默德一世(sultan Mahmud I)把这块土地作为皇室的捐赠财产,附加一座清真寺,一个浴室和一些商店,并且尽可能按照要求租出足够的土地。他把荒废的亭阁修建一新,把曾经的隐秘会晤之所变成一个陈列皇室富贵的橱窗和供伊斯坦布尔人闲暇和好奇的观光之所(Œemdanizade 1976~1980;İncicyan 1831,257-258;1976,129-300;İzzi 1784,272-273;Raœid 1867)。

离坎地利不远的亚洲海岸下游处坐落着英希尔里克玉(İncirliköyü)小镇,它形成于17世纪晚期,包括一些百年的古老皇家楼阁和英希尔里巴瑟西(İncirli Bağçesi)园林,园林后来曾租给国家高级官员做官邸。穆斯塔法三世(Mustafa III)时期的一个朝官于1760年恢复了小镇的面貌,同时把它扩展到海岸边,延伸至海岬。这一曾经消失在皇家园林史册[2]中的古老花园极尽可能地展示其自身,并被部分地开放给大众。事实上,这座小镇如今自豪地拥有了一个公众散步之所,正如其名字——"布伦巴瑟西"(Burun Bahçesi)或"海角花园"所暗示的,它围绕着滨水区的海角,穿过了古老皇族的古迹。在大约20年间布伦巴瑟西都是城市居民的时髦场所,之后因为园林参观者不断的恶作剧行为和不雅举止,首席皇家园丁开始对园林进行严厉的安全检测。至20世纪末美国编年者英希亚恩(İncicyan)把此城记录进编年史时,布伦巴瑟西已被废弃,"她那古老的欢笑被遗忘了"(İncicyan 1976,127;2000,171-172)。

在记录伊斯坦布尔的另一本文献中，英希亚恩将英希尔里克玉以南帕塞巴瑟(Paœabahçe)的苏丹尼耶(Sultaniye)皇家园林称为"公众的娱乐之所"("luogo di pubblico divertimento")(İncicyan1831,269)。到了16世纪晚期这个古老的城郊别墅——曾由巴耶赛特二世(Bayezid II)创建并庆祝为苏莱曼(Süleyman)最喜爱的地方，已经被荒废。1763~1764年间为了复兴帕塞巴瑟的城郊小镇，穆斯塔法三世为它建了一座清真寺、一个浴室、一所男童学校、一个户外祷告广场和纳玛加尬失(namazgah)集市，和一座迈丹(meydan)式喷泉(一种大型的修饰成立方体的带有18世纪显著风格的喷泉)(Ayvansarayî 1864)。当代文献条文中没有记录这个新皇家集合体的具体地点，而考古学证据显示这项工程延伸至苏丹尼耶园林。事实上对已消失的皇家园林的记载主要是围绕迈丹喷泉和纳玛加尬失集市(Eldem 1976,9~14;Gökbilgin 1976,685;Gökyay 1976,8)，它们已经成为公众休闲的中心，这可以从对伊斯坦布尔18世纪的无数描述中猜测到。

所谓的自18世纪开始的由土耳其皇家产业向公众领域的"交接"描绘了一种广泛的现象，它延伸并超越出皇室的财产，涉及国家土地。基此理解上最值得庆祝的是由国家土地变为公众领域的贝尔格莱德(Belgrad)森林，这片国有土地位于首府以南的边界因其出现在孟塔古夫人(Lady Montagu)于1717年6月写给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的一封信中而闻名。就像一些绘画作品中表现的一样，她对森林的描述说明当时贝尔格莱德的确是伊斯坦布尔真正的公众森林和最时髦的休闲地。

> 君士坦丁堡的狂热把我吸引至此，这里印证了天堂般乐土的描述。我立于树林中间，被果树环绕，脚下流淌的清澈泉水在短短的草地上投下阴凉的足迹。对我而言这些看上去像是人工而造，但我更相信这是自然纯粹的作品。望眼黑海，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享受于这凉爽的微风中而暂离了那酷热的夏季。(Montagu 1993,102-106)

同样,位于博斯普鲁斯的欧洲边界的埃米尔甘(Emirgan)园林在威廉·巴利特(William Bartlett)的雕刻画中名垂千古(图5),它建于18世纪的最后25年中。根据百科辞典《清真寺园林》(*The Garden of Mosques*)的作者阿凡萨拉伊(Ayvansarayî)所言,这块土地以前是赠与宗教首领的礼物,但在1779年宗教人士不再得宠于君主的时候被苏丹·阿布杜勒哈米德(Sultan Abdülhamid)收回。征用和收回国家财产的举措在当时带有极大的强迫性。两年后的1781年,苏丹在这些国有财产边上建立起清真寺、浴室、一些店铺和一个公众喷泉,直至今日它还矗立在那儿(Ayvansarayî 1864,137-138,286-287;Gökbilgin,679)(图6)。像其他迈丹喷泉一样,阿布杜勒哈米德喷泉必须从所建之时就为大众提供一个活动聚会的中心。19世纪初叶当英国旅行家朱丽亚·帕多(Julia Pardoe)途经这座城市时,喷泉的周围已经新建了许多公共园林,她用以下的话描述了这种景象:

> 一条长长的街道终结在水的边缘,延伸向远方。街道的中心被一个摩尔人风格的白色大理石喷泉占据,并掩映在古罗马城墙与阿拉伯树胶间。城墙下是露天咖啡馆,常聚集着成群的土耳其人,坐在离地不到半英尺的矮凳上,抽着土耳其烟管,品着穆哈咖啡。(Pardoe1838,111;1837,167)

虽然在《清真寺园林》中未提及埃米尔甘的咖啡馆,不过,它们是作者想指出的赢利性商店形成的最初始的状态。

而在巴黎、伦敦、柏林和维也纳(由于不同的原因和环境),土耳其公共园林的历史展开得很慢,并且不是沿着发展和线型的趋势。诚然,土耳其公共园林的产生时间远早于1860年第一座西方现代的泰克斯姆(Taksim)和布育克(Büyük Çamlıca)城市公园。[3]如果我们认为皇家园林在18世纪一个接着一个迅速地被废弃,而在1700年后又被满怀热情地重新建起,那么很容易设想其他的园林是沿袭着最具代表性的埃米尔甘、坎地利和苏丹尼耶[4]园林的路线。

社交礼节的转变和"公共"空间问题

无论发展公地还是对古园林的修复都仅仅是发展市郊滨水地区的一步,不可否认,这是继新的公共空间出现之后随之发生的。然而显然新的公共园林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生活新的需求和欲望的的回应。不过不容置疑的是,从宫廷到城市,从"私人"到"公共"的转变始于市民文化的影响,后来在某种新喷泉边,或在园丁们注视的目光下所发生的事情则是这些影响与社会需求、公共礼节相遇的结果。公共园林的显著之处在当代观察者的眼中是其自身所暗示的发生在空闲和娱乐领域的显著变化。然而变化不是突如其来的。自由职业者的逐渐灵活,社交和财政方面的热切渴望,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都导致了这场变革。它们是超过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外在表现,是土耳其知识分子中的已有腐败等级制度的垮台,是对秩序和稳定的颠覆。如果说18世纪伊斯坦布尔的这些发展比其他时期和其他地方更加明显可见的话,那是因为这座城市处于特定历史交叉点,此时帝国君权正企图被活跃和彻底地复兴。

基于对18世纪土耳其休闲和社交礼仪的彻底讨论,即使可以指出一些迹象,但对社会和公众生活中男女社交方式的一些转变仍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喷泉的普遍兴建及伊斯坦布尔广场和园林中咖啡馆的兴起无疑是城市生活中休闲要求渐增的迹象。18世纪,城市喷泉逐渐从以前的次要身份,即隐藏于寺院的庭院中转变为公共消费的对象和中心场所的主要标志物。这一转变主要是夸大的尺度与华丽的风格的象征,这也是园林喷泉从传统上与宗教机构制度脱离关系的结果(图7、图8)。它们现在明显地矗立在开放的草地上、园林里、商场边、广场和散步之处,并作为18世纪与公众生活紧密联系的主导性元素(Hamadeh 2002)"我们聚集在这喷泉之地",法国菲尔蒂-蒙-德(de la Ferté-Meun)女伯爵说:"就像置身于法国的杜乐丽(Tuileries)花园和冈之大街(Boulevard de Gand),周六是在卡林德尔(Kalinder),周一在盖尔莱克布尔努(Kerelek Bournou)。这个国家的人们说:这是盖尔莱克布尔努之日,我们不能忘记它。"(Ferté-Me-

un 1821)

穆罕默德一世建立的位于博斯普鲁斯欧洲海岸的托普哈纳广场(Square of Tophane)中心有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喷泉,它之所以受到极大欢迎要归因于它所贡献给人们的一切。壮丽的喷泉,其外表按照当时的艺术风格精雕细刻,成排的咖啡馆在悬铃树的树阴下,所有这些都把人们带入舒适愉快的户外活动——洁净的水,成片的树阴,咖啡和水烟筒(图9)中。咖啡馆、喷泉、服务生端来的洁净的水、街头音乐家、糖果小贩和穿梭于人群中叫卖饮料、馅饼和果汁的商人们……所有这些成为人们在像托普哈纳和埃米尔甘等地方渴望找到的感觉,他们使逐渐发展起来的休闲方式生机勃勃(İcicyan 1976,95、112;Allom、Walsh 1838,17、21;Pertusier 1815,328-331)。18世纪晚期,尤其是在阿布杜勒哈米德时期,咖啡馆像喷泉一样成为园林和广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作为新的皇室捐赠的通常之所。在他统治的前几年中,君主在金角湾艾郁普(Eyüp)小镇的清真寺旁建起咖啡馆和其他的商店,作为维持寺庙的主要收入来源。这些新的店铺和设施排列在码头的两侧,毗邻清真寺,由此围出一个圈,在圈外则是一个公共的广场,很快这里便有了市场集市的特征(Ayuansarayî 1864,286-287;2000,305)。露天咖啡屋似乎在贝勒贝伊(Beylerbeyi)、别别克(Bebek)和奥塔科伊(Ortaköy)的水边码头区仍然兴盛,而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两侧依次而立的清真寺也已经在那时开始成形了。

另一个象征18世纪园林显著特点和公众生活转变的特征则是沿着博斯普鲁斯海湾的金角湾、别别克或费札巴德(Feyzabad)的许多新建皇家奢华园林在何种程度上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娱乐相联系。当这些园林被冠以宫廷的气派和建筑的辉煌时,它们也是公众愉悦的荣誉象征。在这些地方我们曾习惯于它皇族的傲慢和保守,许多土耳其和别国同时代的人如今在此却看到了都市生活的丰富多彩,以至于我们无法确定“私人”和“公共”这两个概念是如何被阐述出来的。虽然这个问题在此无法追溯,这涉及法律、社会甚至语言学的课题,不过,我们可以深入地探索。“皇家园林”一词在18世纪是否已经有了“私人”的意义,还是仅指与宫廷和精英相关的事物呢?梅宁斯吉(Meninski)的著名词典中认为前一种

意义在 17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5]但是有什么法律的或类似法律的条文机制定义与协商了私人和公共空间的边界问题吗？在 18 世纪的思想中，在伊斯兰教法定义的闺房和家庭空间之外是否存在另一个广义的私人和公共空间的二元对立呢(Murphey 1990,126)？

然而一些当代学者则明确表现出一种狂热的意见，即新建的皇家园林是属于"私人"范围，人们一定也记得 18 世纪皇家奢华园林偏爱坐落在许多城镇的中心地带，并且沿着繁华的城市入口(博斯普鲁斯海峡)，这已暗示出这些园林的"私密"与"排外"是相对而言的。这种边界的模糊性透露出这一时期的宫廷建筑以它们不寻常的"开放"和"透明"来展示自身的本性。而在为贵族消遣所建造的充满神秘气息的园林盛行时期，公共园林难以兴盛。相反，皇家园林与公共园林在所处地理位置与可观赏性方面的相似正是它们发展和活力的关键。乡村古老式的散步在艾哈迈德三世高官 1721 年建立萨阿达巴德(SaÆdabad)园林后颇受欢迎(图 1、图 10)。辉煌的宫殿和它的景色，还有穆罕默德一世 20 年后在园林楼阁上加上的闪闪光亮的圆屋顶，是人们闲游于邻近时可以享受的美景和谈论的焦点。艾斯皮纳瑟餐厅(l' Espinasse)里道松(d' Ohsson)的《奥托曼帝国图卷》(*Tableau de l' empire othoman*)(图 11)雕版图展现出人们闲逛于皇家园林围栏内外的景象，并且这一景象总被旅行家们记载得丰富而清晰(d' Ohsson 1788 ~ 1824,4:1850;Ferté - Meun 1788,63)。

18 世纪给公众以视觉享受的皇家园林不应该被荒废。固执己见的历史学家艾姆达尼扎德(Œemdanizade)尖酸刻薄地对艾哈迈德三世的维齐尔达马德·伊布拉汗·帕沙(Damad Ibrahim Pasha)在萨阿达巴德、苏布克鲁(Çubuklu)、别别克、多尔马巴赫切(Dolmabahçe)、格克孙(Göksu)、贝廓兹(Beykoz)和乌斯库达(Üsküdar)的园林里的频繁的盛宴予以恶评，而这也揭示了这些盛会的参与者包括了上层阶级和平民百姓(Œemdanizade 2001,3-4)。玛德林·兹尔弗(Madeline Zilfi)的观察表明平民参与皇家盛宴在土耳其历史的官方生活中还属首次，不能被过重强调(Zilfi 1996,297-297)。而艾姆达尼扎德评价如此的奢华娱乐意味着帝国的堕落，不过表现出这一亲和力的举动也是为试图挽回贵族的公众形

象，为了向民众显示皇族不可动摇的地位和财产。

公共空间和公共秩序

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于当代的研究中，即在公共空间的进化过程中国家角色的本质。统治阶层在某些时候积极营造公共空间的行动似乎是对繁荣公众领域的“认可”，正如一些历史学家所猜测的，我们是否应该把这种行为看做是统治阶级对于社会秩序崩溃的畏惧感在消退呢？我将阐述的是这项运动所包含的是统治阶级对社会变革迹象的预防；并且在此它自相矛盾地显示出，国家也试图保持民众生活。国家和皇族的财产向民众的开放提供了官方可操纵的集会点和一个被很好描绘的都市自然环境，在此环境中，都市生活能够实现。我并不是用任何一个观点来暗示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对立。我想说的是18世纪的公众生活事件和公众秩序从未停止交迭。

这一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讲述方面是对首席皇家园丁(bostancfbaöf)角色的管理职能的重新定义——一段我们对其拥有有限知识的发展。然而直至17世纪晚期，园丁的管理职能只被限于维持古城和郊外的皇家园林，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它扩展到维持从博斯普鲁斯、金角湾到马尔马拉(Marmara)海域和王子岛(Princes' Islands)的所有公众园林和森林、草地的秩序。这些转变似乎始于17世纪皇室在伊斯坦布尔消失的时期，但是在这一点上很难判断它们的出现是某一特定的历史点还是一系列事件逐渐发展变化的结果。从18世纪开始，皇家园丁们便像巡警和道德纠察一样服务于大众。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判断力，限制某个园林的开放，或是在另一些时候允许适当的开放。此外，他们严惩违反公共行为规范标准的人。他们也在开放古代皇家园林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事实上，当代编年史家们认为向公众开放皇家园林有时候是国家对反复出现的公众混乱现象的有效解决方式。这里有两个园林的案例，它们是博斯普鲁斯安那托利亚海岸的库苏克苏(Küçüksu)园林和欧洲海滨的卡林德尔(Kalender)园林。18世纪40年代这些地方曾是城市

中乌合之众的巢穴。在这两个案例中君主命令授权给皇家首席园丁（分别由穆罕默德一世和穆斯塔法三世），他们可以在园林中管理皇家园林的护卫队。之后不久正如我们所知的，部分园林向普通民众开放。这一发展在后一张图片（图2）的库苏克苏园林得到详尽的肯定。

如今关于民众的公众行为中禁止奢华的法令颁布也是由首席园丁（在警队官员和合法权威人士中间）执行。就像早期现代的法国、英国、中国和日本，这些法律所关注的是现存社会和宗教体制的保存，甚至更重要的是对等级差异制度的可视化维护。这些规范在控制城市秩序时，也定义了公共生活的标准领域。禁止奢华的法律至少起于16世纪下半叶，并且植根于伊斯兰教教法和先古的法规中用来限制非穆斯林教徒的公众行为的规则。它们以君主或国家元老的法令形式发布，经常用于诸如浴室、咖啡馆等这些公众生活和活动的场所（Ahmet Pefik 1931，38-41，141-142）。尤其是咖啡馆自1551年进入都市之后就成了法律限定的主要对象，因为社会权威们认识并察觉到咖啡馆是聚集社会动荡人员、散布谣言、进行煽动性演讲、谈论政治闲话和批评的焦点之地。在伊斯坦布尔，清教徒的演讲常常倾向于对咖啡馆的抨击，认为咖啡是邪恶的新生物，也抵制对它的日常消费。17世纪时国家曾多次禁止或关闭咖啡馆，尤其在社会动荡与兵变期间。

但是即使与国家早期的动荡不安相比，18世纪禁止奢侈的强制率仍然很高。你可以认为随着社交圈的扩大，规则自身被加强。但是更重要的是，争论的轨迹似乎已经超越咖啡馆而涉足整个园林，也就是说，问题不仅局限于发生社会和政治动荡的场所，而是不同年龄、性别、职业、阶层的人过于自由的集会和由此产生的对现有等级制度的威胁。这并非说交际群的差异性被排除于园林之外。在50年间随着咖啡馆文化的传入已经吸引了一大批跨阶级、跨职业和跨宗教信仰的客户群，这被统治阶级视为是现有社会稳定秩序的威胁物。然而对这些管辖地的持续的中伤最终导致了主流顾客群的下降和乌合之所的聚集。并且整个世纪中，正是基于对咖啡馆是政治言论和批评场所的察觉，成为了国家保留它们和对其采取惩治、监管、控制手段的主要原因。到了18世纪，争论的问题由此改

变。禁止奢侈的法令更尖锐地指向这些展示着社会流动和不稳定因素的场所，他们新的焦点是公共服饰和园林娱乐。

整个世纪里反复出现的针对公共园林休闲的法令条款带有命令和强迫性。禁令有时候会实施于一些特定形式的活动，如乘坐四轮马车或游艇游览。一些法规还禁止某些人群参观特定的园林，另一些表现为性别歧视。如1751年的法令禁止女性参观博斯普鲁斯安那托利亚海滨的乌斯库达(Üsküdar)和贝廓兹(Beykoz)地区的远郊园林。在1758年举办穆斯塔法三世的女儿，即公主出生庆典期间女性再次被禁止参与园林游览、散步和市场集会。园林定期作出性别隔离的约束，如一天几次或一周几天，这是特别针对女性的。法国旅行家佩尔图瑟尔(Pertusier)写道："(周五)和周二是妇女们参加社交访问、散步或去公共浴室的日子。"(Pertusier 2002,7)旅行家们继续描述道："当去聚餐舞会时，家庭成员甚至也不是一起前行……女人们集合在喷泉的一侧，男人们则在另一侧的树下"(Allom. Walsh 2001,33-34)；当时土耳其官绅们活跃地工作着以确保这种分离做到位。在下面一首优美的诗中卡弗太纳园林被比喻成一颗爱人的心，它如此广博以至于可以容下伊斯坦布尔所有青年男子，18世纪晚期诗人苏尔乌日(Süruri)也许正在为此喝彩，或者同时也是对公共园林里各种对社交形式及时间、地点的法规表示谦恭的抗议：

> 我爱上了一个英俊的墨水销售员，如果他回应了我的祈祷，
> 我将会寄去一封信，邀请他来卡弗太纳园林，
> ……
> 如果所有的伊斯坦布尔青年聚集于此，
> 他们的数量将会盛在爱人的心房。
> 哦！苏尔乌日，假如这是女人的禁忌，
> 我们将与青年们一起在卡弗太纳园林里将它颠覆。(Süruri n. d.,3:45)

由于公共休闲规范的继续执行，园林里特定场合的穿着也成为被关

注的焦点之一。政府开始强制执行以前的裁缝法并且颁布新的着装法令。1702~1748年间,又是在奥斯曼三世、穆斯塔法三世和谢里姆三世时期,帝国法令规定了一些人群的穿着要求和义务——大多数是针对女性、犹太人和基督教少数民族的,他们必须遵守土耳其着装规则。这些法令和关于人们穿着的评价不仅呼吁道德和财政上的关心,也强调保留视觉上的差异,无论是对其他社会阶层还是少数民族或是对来自国外移民的敬意。1758年一项新的着装法开始关注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倾向于法兰西风格的穿着并穿着黄色鞋子的潮流,而这些通常只是穆斯林教徒的着装。两年前一项皇家法律责难一群穆斯林妇女在大街上游行,穿着基督教女性配有奢华耀眼装饰的服装,并称这些服装"挑动了欲望的神经"。衣着革命的潮流兴起,如鞋子的颜色、衣服的风格、裁剪和设计或是领口的长度和宽度(所有这些有时在法令里被精确的规定过)模糊了不同等级、职业、种族和信仰人群的外表差异。

对着装的规定的关注的确早于18世纪(Ahmet Pefik 1931,51-52;Tietze 1982,580-582),虽然在这一时期创新的衣饰已经获得了一个新的意义。经过两个世纪着装几乎一成不变的时代之后,人们的户外服装突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国外商人和旅行家的记载里我们可以证实在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人群里逐渐兴起的织品和色彩流行的意识。在莱夫尼(Levni)和布哈里(Buhari)的近代肖像画中可以明显看到妇女们服饰解放的潮流,如增多的饰物,宽大的领口,透明而柔软的面纱,夸张的头饰和松散的发型等(图12)。诸如此类的革新从未失去其吸引力:"没有女性会遮掩她的胸部",穆哈热亚·道松(Mouradgea d'Ohsson)写道,"尤其在夏季,只穿一件薄纱质的宽松上衫"(d'Ohsson,4:152)。如果说国家开始日益严峻地实施着装制度了,那么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对衣饰的新式样的尝试,并且这些新式样比以前更多的在公众场合中出现。新的款式、色彩、帽子和发型已经大大背离了传统着装的观念。这些规范的持续暗示了社会性、职业性、种族性和宗教性等方面的差异消溶之后带来的持续影响。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中上升的这种流行意识与由此暗示出的服饰与自我形象和公众形象间的关系在土耳其和国外对此记载的文本和绘

画中给人以深刻印象。在诗人安德鲁卢·法扎伊(Enderunlu Fazfl)的优美叙事性的诗篇《女性之书》(Zenânnâme)中,他直接描绘了18世纪末的景象:

哦,生命之灵魂,如果你希望
把形形色色的女人吸引至你面前
上帝会赞许你,主赐予你美的迷人力量
在玫瑰盛开的季节里去郊游
漫步于卡林德尔园林
给眉毛涂上装饰,披上你那拉哈尔的围巾
……
穿上珊瑚红的内衣,着上金色刺绣的长袍
腰间别上中意的短剑
……
喝上一两杯酒,让眼神充满热情
朝女人们聚集的地方出发吧
哦,走吧！摇曳的柏树
别像年迈之人一样蹒跚而行
让你的步伐如狮子般坚实
……
在你的毡帽下露出一缕头发
向她们显出鲁斯特姆(Rüstem)般的体格吧
……
她们被那最英俊的小伙子吸引了
为他献出了心房
到处散发出龙涎香的芬芳,我的爱人
……
一个姑娘在面纱后偷笑
一个姑娘红着脸望向地面

还有那些吃吃笑着的，调情的，和那含情脉脉的一瞥
当她用眼角的余光注视着你，我的天啊！
她们中的一个开始歌唱
用才艺打动你
也有人急促地想诱惑你
斗篷从她肩上滑落
时而，微风拂过松柏
两个穿着金色衣服的女孩坐于其下
一个妩媚地轻摆身躯
另一个吟诵着可爱的曲子
把她们的每一点滴都向你展示
展示着她们年轻的躯体，展示着少女秘密的花园

法扎伊的诗篇是当时描写卡林德尔园林的最受欢迎的诗篇。诗中细腻地描写了人们的衣着、社交、恋爱和礼仪，一定曾被当做公共园林言行指南来读。虽然法扎伊的描写只是诗人的想象，但诗中青年男女相会的场景，相约于私人空间的谈情说爱，的确也是他诗中欲表达的目的。不过法扎伊在诗中大篇幅地描写的是公共园林里男女邂逅时的相互诱惑。这属于新生代的诗歌，其中园林不再是为培养宫廷社交礼节而设的有序、孤立的世界。在此意义上，它可被看做是土耳其政府热切重建园林制度的诗意想象。在间接地指出政府干预民众生活的无能无力的同时，它描绘了作为城市生活一部分的园林如何有效地展现人们的生活方式、流行服饰和休闲活动等以挑战当时既定的社会秩序。并且实际上新的差异的发生会带来新的社会身份的群体。本诗在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捕捉到性别的界限竟可以轻易地被一个轻佻的目光或摇曳的身姿完全打破。

注释

* 我要感谢敦巴顿橡树园景观研究院的主任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邀请我参与这一期撰稿，并感谢他慷慨接待我在1990～2000年作为访问学者在敦巴顿的研究。

许多同事和朋友都在我开始写作时，对我的文章提出宝贵的意见。我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感激。

[1] 克雷斯(Cerasi)，1994；1986；1985，就我所知是调查18世纪伊斯坦布尔公共园林的唯一尝试。然而这些著作都是基于西方文献。

[2] 根据艾尔多扬(Erdoğan) 1958 年：最后有记录的皇家园林出现在1679年。

[3] 泰克斯姆公共园林(Taksim)建成于1869年，与德国、法国城市规划家、建筑师和工程师合作设计并且沿其艺术指导方针建造。(Çelik 1987, 46, 64, 69-70; Evyapan, 72)。

[4] 对新建筑捐赠行为的彻底考察是弄清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也是我今年将开始的一个分支研究。

[5]"私人的"一词在梅宁斯吉的17世纪语言词典中被译成拉丁文 *proprius*, *private*, *speculiaris*；意大利文 *proprio*, *privato*, *particolare* 和法文 *proper*, *privé*, *particulier*, Meninski 2000。到19世纪后半叶意思是"特别的，独特的，对君主和国家来说特别"，也是"私人的，个人的"。



图1　托马斯·阿罗姆:卡弗太纳园林的户外消遣。图片来自托马斯·阿罗姆和罗伯特·沃什:《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七座教堂风光》卷1,伦敦,18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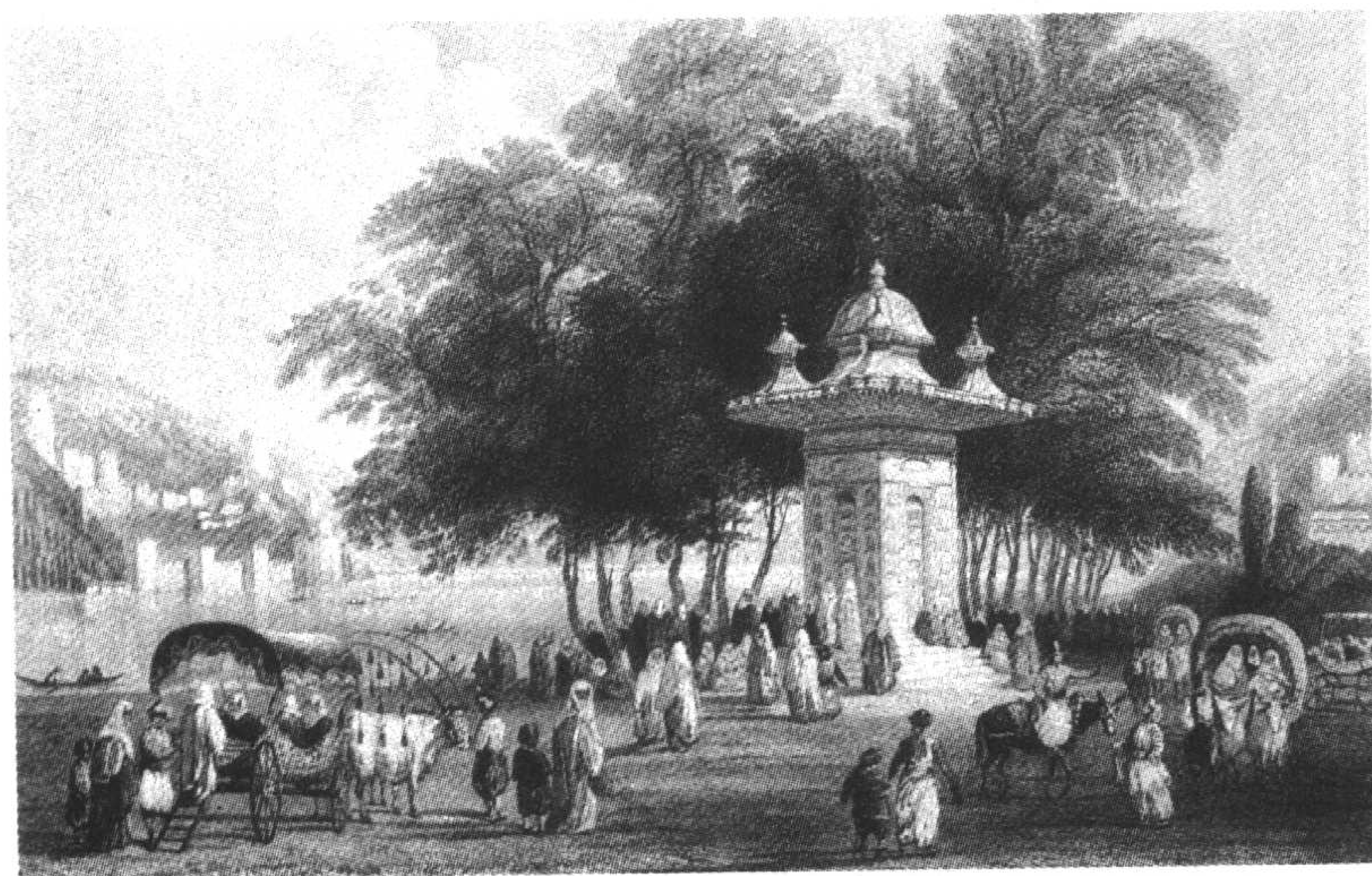


图2　威廉·巴利特:漫步风景与库苏克苏喷泉。图片来自朱丽亚·帕多:《博斯普鲁斯之美》,伦敦,183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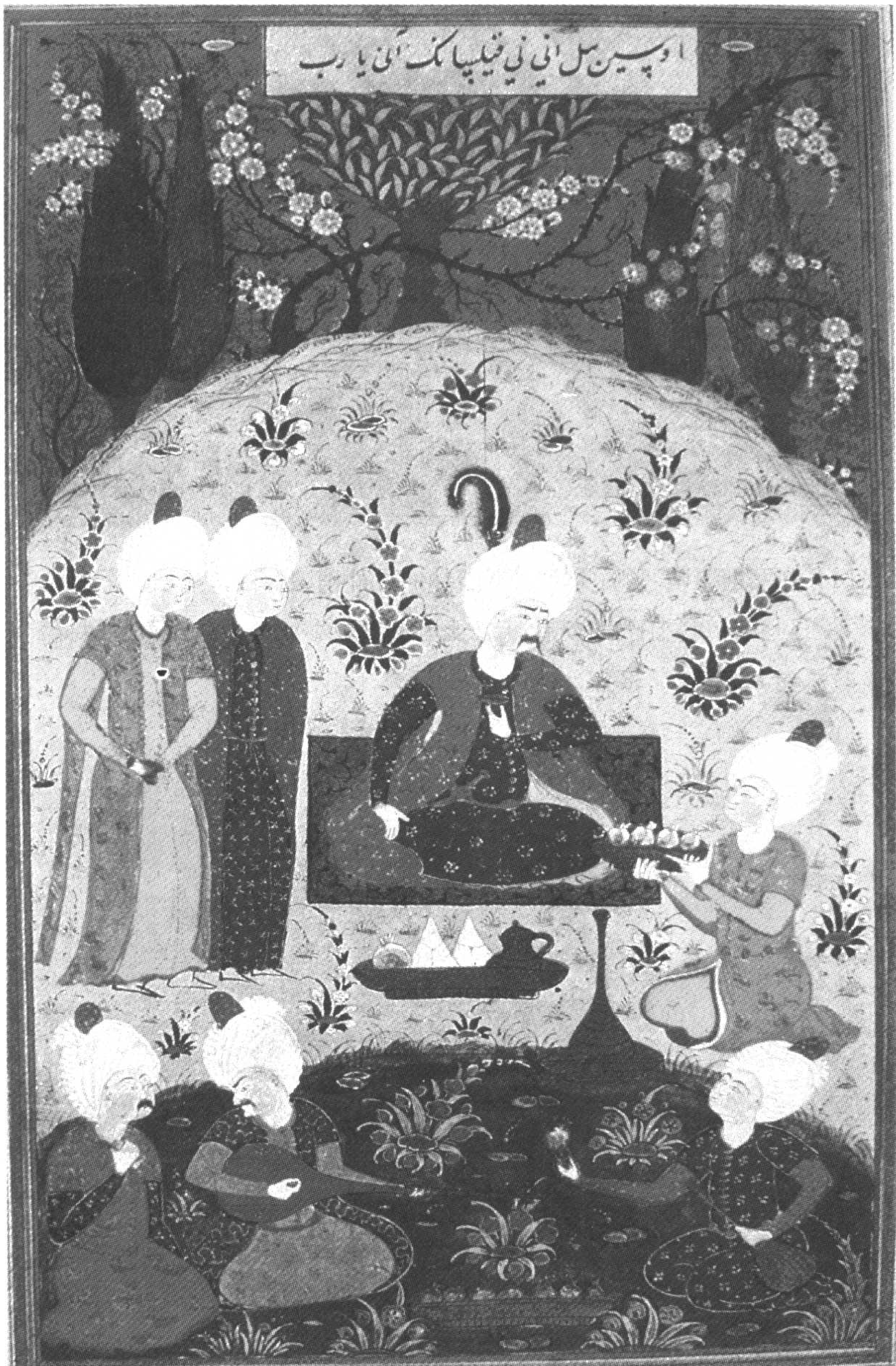


图3 匿名者:园林里的高贵娱乐。图片来自 Ali Œîr Nevâ'î'ʼs 宫廷会议插图副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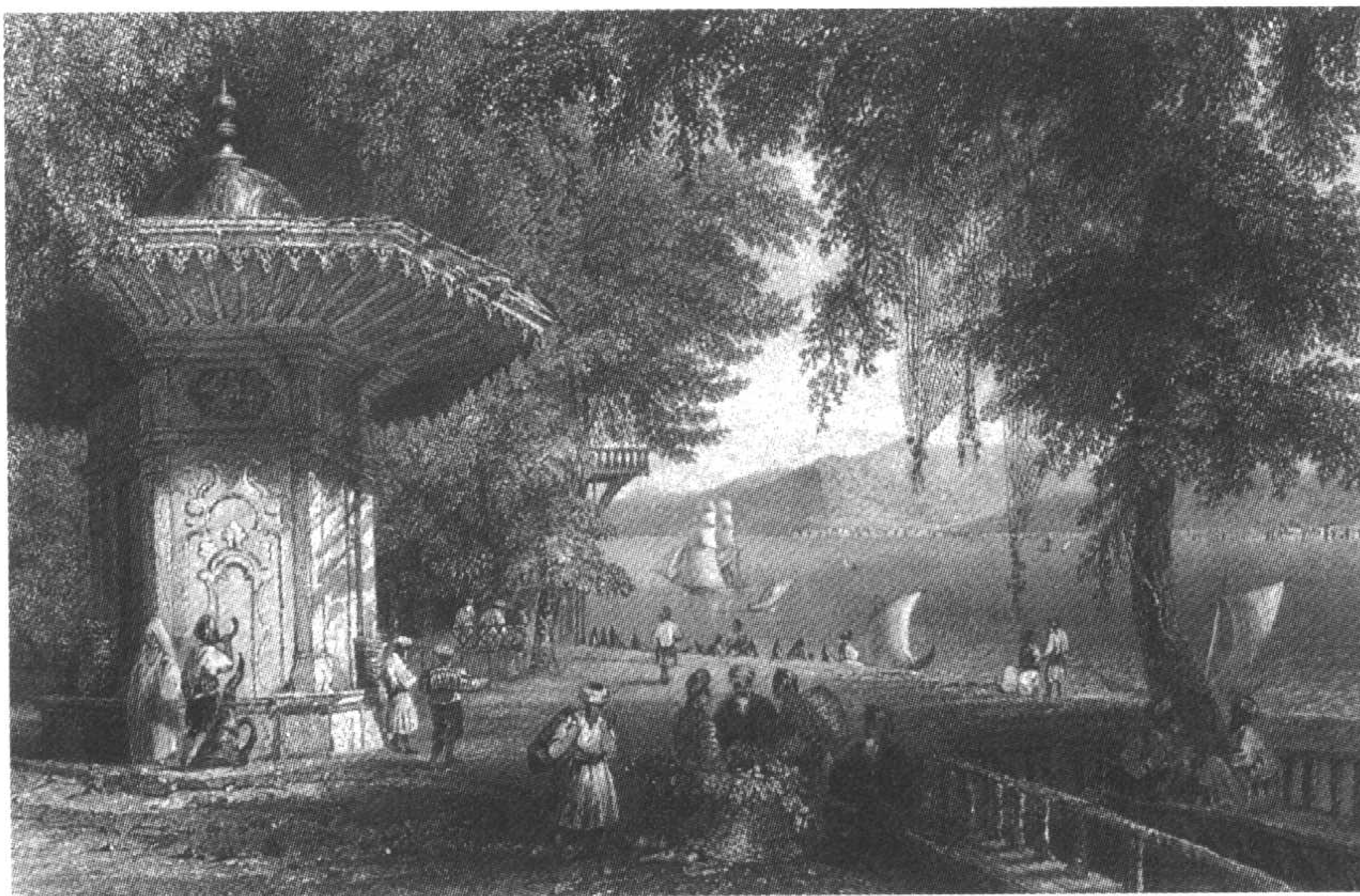


图4　威廉·巴利特模仿 J. Cousen 的一幅雕版图：埃米尔甘的园林、咖啡馆和喷泉。图片来自朱丽亚·帕多：《博斯普鲁斯之美》，伦敦，183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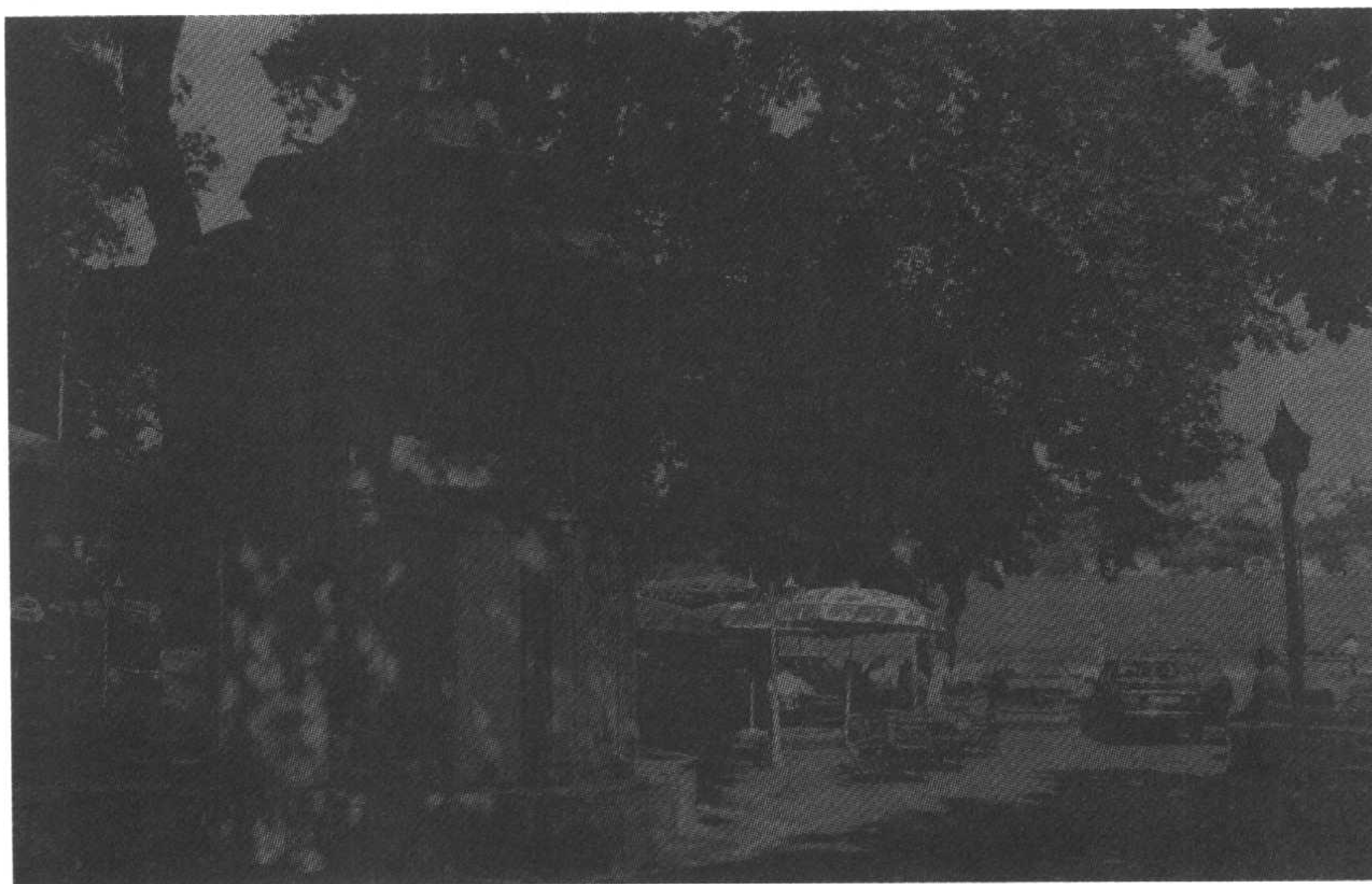


图5　埃米尔甘园林阿布杜勒哈米德的迈丹喷泉。图片来自席琳·哈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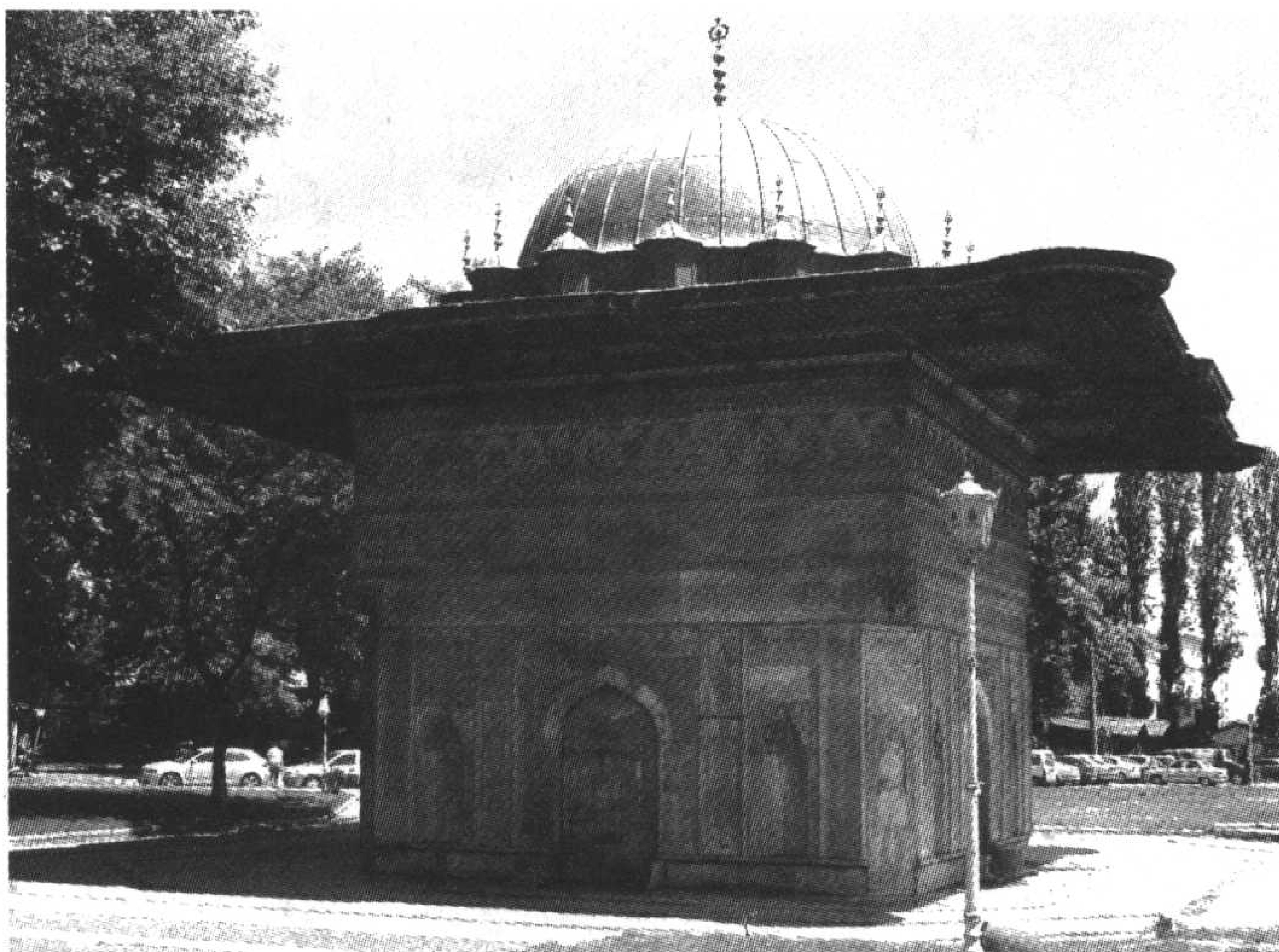


图 6　托普哈内的穆罕默德一世迈丹喷泉。图片来自席琳·哈马德。



图 7　巴布-伊-胡玛云:艾哈迈德三世的迈丹喷泉。图片来自席琳·哈马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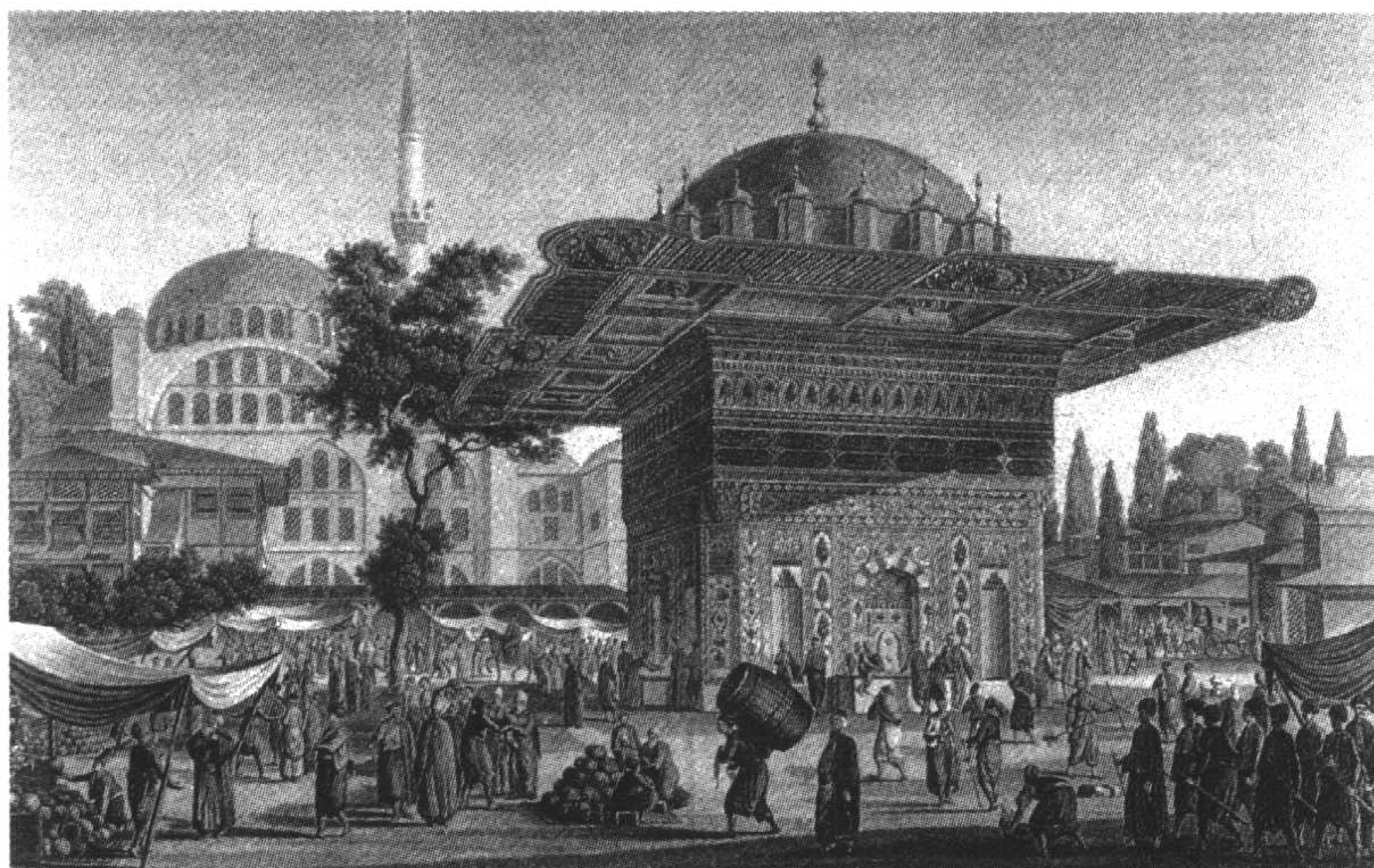


图8 安东尼—伊格纳茨米尔林:托普哈内的穆罕默德一世喷泉风景。图片来自安东尼—伊格纳茨米尔林:《君士坦丁堡和波斯佛尔河滨地区绮丽的旅途风光》,1819年版重印本,伊斯坦布尔,未注明出版日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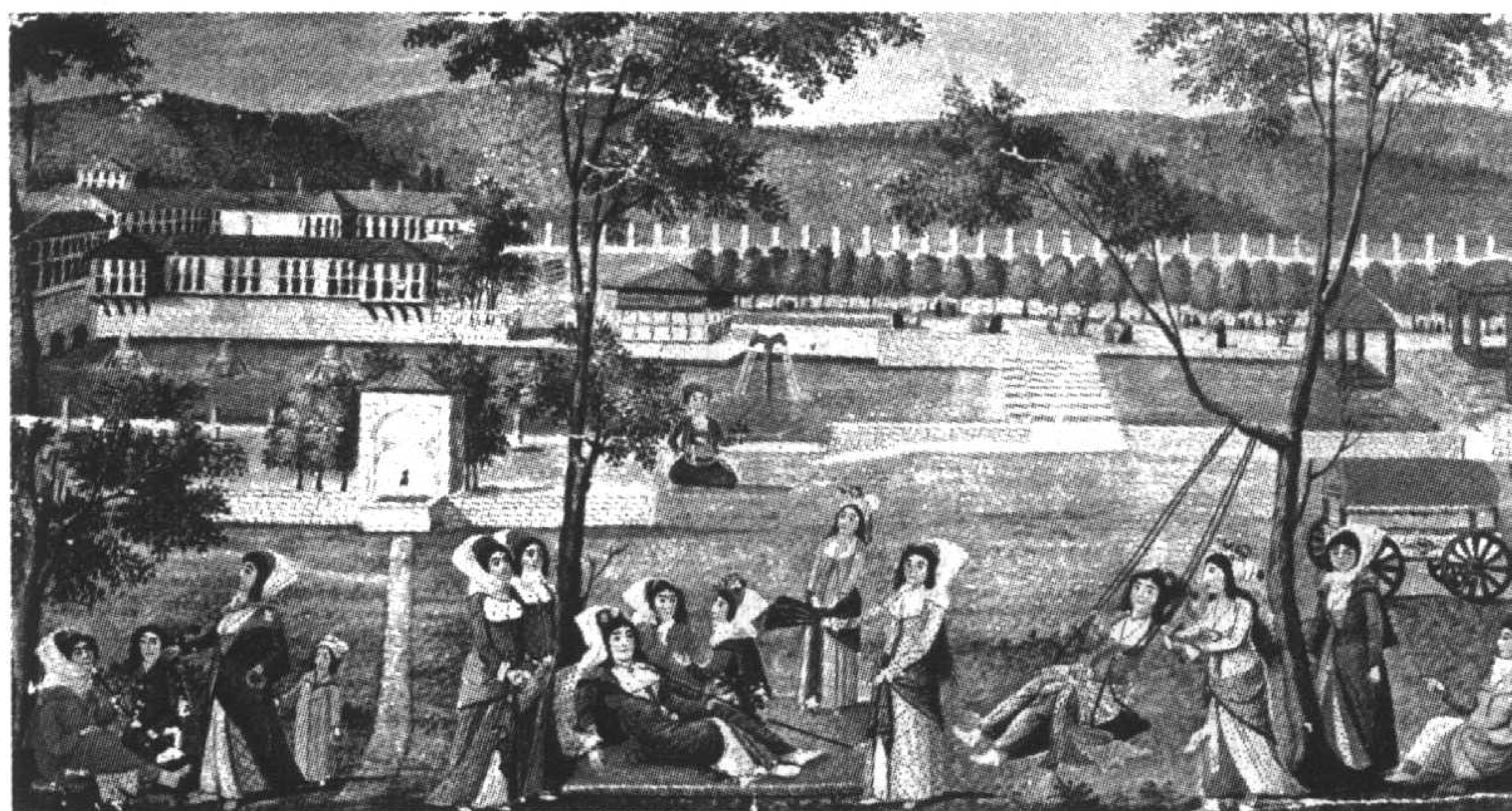


图9 安德鲁卢法扎伊《女性之书》副本:萨阿达巴德无名花园景色。图片来自伊斯坦布尔库图法纳西大学(Üniversitesi Kütüphanesi),Ty 5502,fol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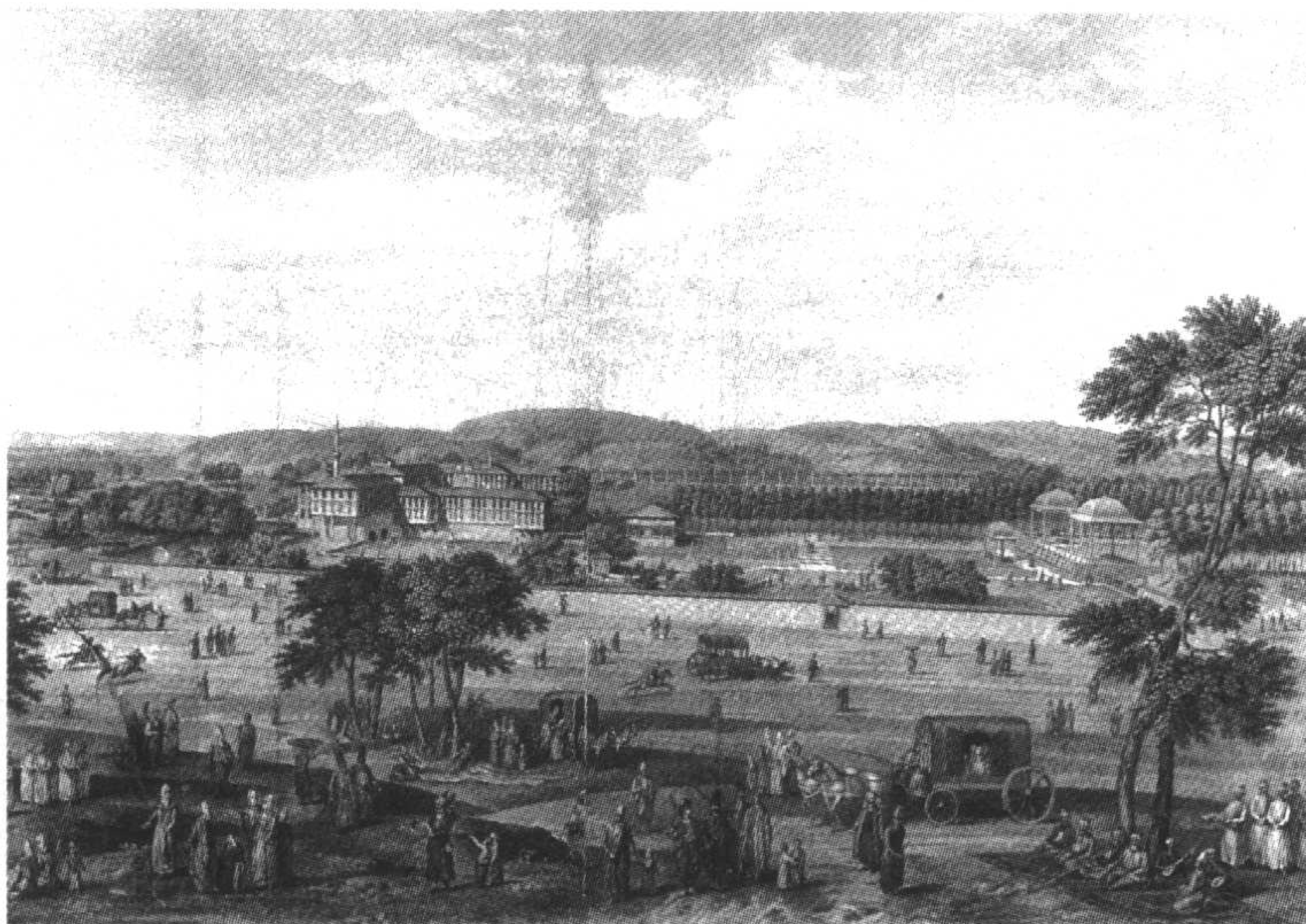


图 10　列丝琵娜丝关于卡弗太纳园林与萨阿达巴德皇家宫殿的雕版图。图片来自穆哈热亚道松:《奥托曼帝国图卷》,巴黎,1788～1824 年。



图 11　莱夫尼的肖像画(大约 18 世纪 20 年代)。图片来自托普卡普宫殿,H. 804;H. 2164,fols 8b,12b and 15a。

(作者单位:美国莱斯大学)

(王靖　译)

维也纳彼德麦式园林与中产阶级身份的自我塑造

[美]罗伯特·罗滕博格



罗伯特·罗滕博格(Robert Rotenberg),1978年获马萨诸塞州大学阿默斯特校区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1979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德宝大学。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现代都市内的符号经济以及物体的非功利意义上的交换。他的主要著作包括:*Time and Order in Metropolitan Vienna* 和 *Landscape and Power in Vienna*,后者曾获得美国斯拉夫研究学会,都市、民族和跨国人类学研究会及奥地利文化协会的奖励。他还与人合编了一部从人类学观点透视城市景观的文集:*The Cultural Meaning of Urban Space*。此外,他也是 *The Art and Craft of College Teaching:A Guide for New Professors and Graduate Students* 一书的作者。

18与19世纪交替之际的维也纳见证了一个都市新阶级的出现。这个新的阶级从之前存在的商人、军人和奥匈帝国官僚中分离出来,与贵族统治相抗衡,它影响和指引了维也纳城市特征的出现,而这些特征使维也纳可以与巴黎、伦敦和罗马相匹敌。模仿这三个大都市的特征后,维也纳

最终为自己提供了独特的展示舞台——别墅园林(the villa garden)。在以前的一个世纪里宫殿园林是贵族阶层时代与财富的象征,而别墅园林提供了这样一个探讨:谁能代表新兴阶级的价值观、财产、家庭生活和思想智慧。我计划通过从维也纳文学中提到的彼德麦式园林(the Biedermeier garden)来描述由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园林传统。

历史学家早已把彼德麦式园林视为园林建筑的一种特殊风格。它既指一个时期(从1812年维也纳会议到1848年革命),也指一种设计模式(各式鲜艳的花朵、曲线造型的花坛、轻巧的装饰、被房屋附近高高的灌木篱墙围绕),这种风格与贵族园林采用的两种现有模式——巴洛克式和英国式以及小住户和工匠们的实用园林形成了鲜明对比。此风格是从苗圃拥有者那里传播开的,他们创造了城市内部社区最美园林之典范。人们可以随意游览这些园林,可以停车,可以在小路上徘徊,观赏各色鲜花和灌木。人们还可以与苗圃主约定,将植物运到他们的家庭花园里,并按照苗圃中典范园林的式样进行同样的组合安排。这是将景观产品行销到城市新兴中产阶级的第一次尝试。在这一时期晚期,样品书籍和园艺杂志将取代典范园林,苗圃也搬到了更远的市郊。在这里我们提供了一种分析,即新兴的中产阶级身份与园林风格是如何被他们自己和敌对阶级视为一体的。

19世纪维也纳的阶级阵营

资产阶级和贵族这两个词并没有太大的关联。作为一个对1700年后欧洲精英人群的社会组织的简短描述,这是一个太粗糙的区分。在这个社会急遽变化的时期,一个贵族家庭拥有财产的平均时长是三代。新的贵族上升取代旧的贵族并确立新的头衔。资产阶级也一样,他们从长短途贸易的组织者的角色转变为还未占据主导的财富生产方式和制造体系的拥有者。在维也纳,这种转变通过百余年的时间才完成。在这段时间,那些自认为是(并被别人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人们从事各种营生并常常得到可观的利润。对他们来说,他们和贵族的区分如同他们和工匠们

的区分一样,没什么大不了。

阶级成员涉及不同层次的财产税义务(Boyer 1981)。那些得到君主授权的可征税财产的成员通过遗产继承和婚姻转移财产,有时则直接购买。贵族分为世袭贵族和终身准男爵,世袭贵族通过实物支付(一种与贵族财产创造的市场利益关系甚微的礼节性交付)、军中服役(与军队、也与政府公职相关)和现金的方式向君主缴税。现金是一种新的缴税方式,自从1592年的沃木斯(Worms)会议后,为了维持常备军,所有的贵族有义务向国王缴纳现金。资产阶级也要支付财产税,但是他们是在不同的基础上支付,在这一时期,他们通常也缴纳现金。他们的财产不仅包括房产,也包括货栈里所有的存货的价值。资产阶级需要记录详细的清单,皇家税官常常被专职指派到大的商行任会计师,这两个阶级在财政与最终的社会上的成就是通过缴税额的增长来衡量的。直到1848年,手工业者阶级没有缴税,因此他们在公共事务中没有发言权。

此外,贵族和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分裂,贵族内部有世袭和终身的明显区分,甚至在世袭贵族之中,家族支配主要财产的时间长短、财产的规模、祖先的军事成就、与皇族的通婚关系等都是在贵族层级上提升家庭势力的主要因素。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成员中那些创造了惊人财富(并且将大量份额出借给君主),或那些为君主提供非凡军事或政府公职服务的人被授予世袭或非世袭头衔的现象也在迅速增加。以上这些都集中在重要城市,而在乡村,旧的土地所有者仍有存留,他们中的大多数数代保有头衔。

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拥有一些财产,它们可以是土地、工厂、货栈或存货。在经济上最为成功的人们将被授予准男爵的头衔,头衔不是世袭的,但是的确赋予了他们贵族所特有的一些权力和特别待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土地所有权。头衔可以带来社会尊重和荣誉,但同时也伴随高的税收。尽管如此,没有头衔的资产阶级对这些准男爵头衔充满热望。他们还有其他的彼此相互衡量的标准:家族企业运作的代数(越久越好);商业运作完全由家族控制(积极),或由公开贸易控制(消极);家族拥有皇家专利和贵族资助(优质商品的标志);家族成员进入政府担任公职和在

军队中担任军官的数量与级别;最后,是否使用家族内部银行进行远距离交易(最高地位)或不通过内部银行远距离交易,短途贸易或制造业(最低地位)。在商业运作中将这些多样特征结合起来的家族就形成了资产阶级这个阶层。处于上层的人们拥有土地,他们的消费能力与贵族没有什么区别。而处于较低层的人们丧失财产,在物质上并不比手工业者富裕。

最后,在维也纳要把园林设置为不动产需要土地。1683 年以前维也纳周边的大部分土地或归君主所有而用于军事防御的目的,或在宗教命令之下用于支持宗教团体(Bobek、Lichtenberger 1978)。非贵族的维也纳人、资产阶级、手工业者们住在城墙内的出租房或阁楼里,或住在维也纳森林脚下郊区小片树丛中的排屋或小屋中。极少的资产者能够在菜园之外还拥有自己足够的土地。贵族们在拜访宫殿的时候住在宗教和军事设施中,直到 1683 年国王命令他们在城市建立永久住宅并参与政府事务。实际上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时期就是园林艺术在维也纳作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日用品的时期。这两个群体在他们自身卷入到新的公众、经济和文化角色的同时也在创造大城市的园林艺术传统。这一时期贵族和资产阶级传统对园林艺术的交互作用,相适于与二者在土地所有权因素上的积极对话。

遭遇园林

在维也纳,资产阶级投资园林艺术的选择混合了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公民政治、对家庭生活的态度、时尚等。对于公民政治,园林代表了一种赞助商关系,这种关系首先是对他的阶级,最后是对广大的社会。投资园林就是对自己政治忠诚和理想的声明。当我们开始问这样的声明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便突然置身于设计环境中。正是在这个环境中维也纳贵族和资产阶级园林艺术之间的遭遇战发生了。

维也纳人的特色园林形式可以帮助赞助人向左向右或向中心结盟。18 世纪的专制贵族用巴洛克整体的设计特征来代表他们特定的观点。

启蒙贵族和一些富有的资产阶级在18世纪末效仿了这种对园林艺术的政治利用。这种政治利用于19世纪初在新兴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那里再次被使用,在19世纪下半叶的工业精英新阶级的园林中也是如此。把园林艺术作为政治语言在20世纪仍在继续,但那不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范围。

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园林艺术方面的冲突中也有阶级间的相互影响的痕迹。资产阶级用与众不同的方式改造了贵族形式。例如贵族的军旗被改为在风中随意飘舞的彩色旗帜,不再是为了纪念过去的战争。底座上的玻璃球和四足框内的摇摆来源于对英雄的追忆和马术投掷比赛,而那些贵族含义已经被去掉了。其他的元素也被整合成整体,原尺寸的瑞士村庄或隐士小屋被缩小,大量制造并适合于最小的花床的摆放。园林侏儒形象本源自于贵族乡间居所仆人的农民装束,现在变成了一个木刻的带有古怪面部表情的园林装饰物。资产阶级使这些贵族形式成为拥有更高名望、财产和家庭舒适度的阶级的象征性满足。贵族采用的世界大同的几何平面图案被资产阶级的地方风尚的有机形状花床取代,贵族对进口植物品种的精选变为资产阶级对本土植物的偏爱。资产阶级还将贵族园林中的常绿植物换为活跃的一年生花卉。

17世纪奥地利反改革运动造成了拥有土地的贵族和城市商人之间的一个社会和文化的隔阂。绝对的奢侈与财产的有效管理,更不用说二者的宗教差异,使两个阶级的交互作用大为受挫。1683年土耳其大举围攻维也纳之后,维也纳出现了建筑业的繁荣。为重建王权,国王利奥波德一世(Emperor Leopold I 1658-1705)要求更多贵族加入帝国政府,他下令他们必须在维也纳建立永久住处,城墙外面开始建造宫殿。那时,意大利和德国风格的倡导者们展开了颇具政治意味的竞争,这场竞争将会支配维也纳下个世纪的建筑和园林设计风格。面对这场艺术战争,王室成员选择了第三种风格——法国式,并建筑了许多的物业:美泉宫(Schönbrunn 1704)、阿加顿宫(Augarten 1705)和普拉德游乐场(Prater pleasure grounds)。最后,安德烈·勒·诺特(Andre Le Nôtre 1613-1700)设计的凡尔赛(Versailles)园林开始主导当地贵族园林的趣味。在

1683～1720年间,863处贵族房屋都建筑在市郊(Bermann 1881)。

在这贵族建筑繁荣期,资产阶级的建筑被限制在市郊的偏僻地区。虽没有可靠的统计,但是建筑物的数量一定相当繁多。在1683～1720年间城市人口翻倍,贵族家庭成员和他们的扈从数量庞大并不是造成此种状况的唯一原因。资产阶级的小屋几乎不采用巴洛克的景观形式,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

贵族阶级在18世纪中期开始转变,市场需求的增长和农产品价格的不稳定造成的紧张状态改变了贵族经营财产的方式。这些改变同时也有政治上的含义。"新"或启蒙贵族开始以大陆标准衡量自己,视自己为农业生产者,在经济约束和政治惯性的迫使下自我嘲讽。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 1717-1780)和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发布的许多改革措施旨在为这部分贵族激进分子解放劳动力和资本。其他贵族视这些变化为他们生活方式的威胁并加以阻挠。两大阵营的极端派别在政治上开始活跃。在这些激进分子中,进步社会哲学特别是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 - 1778)的著作被阅读和讨论,所谓的"启蒙"贵族试图通过使自己宫殿园林反映出英国园景设计风格来远离自己阶级内部的保守分子。在城市建造了最具影响力的英式园林的莫里兹·兰西伯爵(Moritz Count Lacy 1725-1801)就是贵族哲学阅读团体"五王子沙龙"(Salon of the Five Princes)的成员之一。

根据赫纳伯(Hennebo)的说法,在贵族建筑采用流线形式和自然装饰的英国风格方面,维也纳并不落后于其他日耳曼城市。他把它们的第一次出现设定在大约1760年的德国北部(Hennebo 1980,15-41)。维也纳英式园林设计的规范是基于两位军事指挥官的建筑风格设立的。兰西伯爵1766年采用此种风格重建了诺伊凡德格(Neuwaldegg)园林。资产阶级的基迪奥·冯·罗登男爵(Gideon von Loudon 1716-1790)1789年重建了他在哈的斯多夫-凡德林高(Hadersdorf-Weidlingau)(维也纳附近的一个小镇,译者注)的房产。他们的军事威力和与约瑟夫二世的私人友谊使得社会对他们对君主和国家的效忠的关注远超过对他们打破勒·诺特设计风格的责备。

新的英式园林与它们之前的法式目标有所不同，它依赖视角。新的园林形式所提供的自由幻想所达到的艺术和精神的顶点替代了规则几何图形的绝对中心，这些改变包括一些乡村景观的视角与呈现：哥特式遗迹、帕拉迪奥式神庙、中国式桥梁、庙宇、洞穴、渔棚、木屋、陵墓、纪念碑和纪念馆。这些建筑如此受欢迎以至整个杂志界都在刊登最新的设计。如《勒卢热的中英混合风格花园》（LeRouge's Les jardins anglo-chinois 1787）和《格罗曼理念杂志》（Grohmann's Ideemagazin 1796-1802），发行量很大。园林中的每一个结构都在叙述着园林的故事。常常只有园林的主人和他的沙龙知道这些景点和文本的关系。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些景点常常会有公认的含义（Mosser 1990）。

同时，富有的资产阶级也开始用英式园林设计装点他们的新屋。由于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改革促成的贸易增长，他们拥有更多的金钱来建造更大的房产与园林。然而，现在他们在专制的巴洛克式与共和的英式两种风格之间作出了选择。开始只是一小股，到了1820年资产阶级采用英式风格成为了一股急流。

格米勒（Geymueller）银行家庭这时在资产阶级中扮演了一代人以前兰西伯爵在启蒙贵族那里扮演的角色。他们在1799年于伯兹莱斯多夫（Pötzleinsdorf，维也纳地名，译者注）建立了一个33公顷的英式园林。由诺伊凡德格的宫廷园丁康拉德·罗森塔尔（Konrad Rosenthal）和弗朗兹·伊尔纳（Franz Illner）完成。在19世纪上半叶，该园林成为广受富有资产阶级欢迎的公园，同时代人把它形容为拥有高耸树木、绽放的花圃和阵阵清风的园林，在今日依然受欢迎，以大量今日可见的小景点为特色。在这些景点中，装点有古希腊风格的雕塑、神庙、洞穴和架上水壶。

格扎·哈裘斯（Geza Hajós）研究了这一时期围绕着维也纳的景点，发现相当大的部分都有着同样的含义。中国式桥梁、宝塔和寺庙表达了对以中央王国哲学为基础的儒家哲学的崇敬。这股中国风开始于英格兰并迅速传播到这个大陆启蒙思想的中心。圆形的帕拉迪奥神庙被称为“夜之庙宇”或“知识之庙宇”。它们与这些贵族归属的共济会据点和睿智者集体有紧密联系，象征着所罗门神庙——上帝自己作为设计师的唯

一世俗的建筑。洞穴是阴凉的,里面有共济会授意的古埃及神雕像。哥特式遗迹比古希腊遗迹更受人喜爱是因为哥特式使人们的回忆经过时间的流逝后达到的精神的完满。而希腊遗址使人们回想的是野蛮人对欧洲最早启蒙文明的战胜。同样地,罗马遗址使人回想的是对所有事物最终死亡的忧郁沉思。捕鱼的棚屋、小木屋和洞穴也是从军事、商业和市民生活中隐退出来的偏僻之地,园林投资商们从中获得力量,然而投资商人决不是独居的隐士。这种僻静之所是与完全世俗化的巴洛克风格全然对抗的社会形态。神庙在宫廷建筑的园林中尤为显著,它传达了建造者对自然的真实热爱之情,一个文明人寻求一种新的自由的秩序(Hajós 1989)。陵墓、墓碑和纪念馆则呈现出灵魂在死亡中的安宁,而对那些在死亡中获得永生者的铭记被铭刻在园林最高处的纪念物和墓碑上。

这些园景的日益流行极大丰富了关于徒步旅行于维也纳周边的导游指南的内容。1790 年后开始出现向导(Gaheis 1794,widermann 1805,Oehler 1807,Pezzl 1823),旅游手册在 1850 年时还在被生产。向导们鼓励资产阶级家庭在周日做一次全家的城郊长途步行,去寻找受到祝福的园林的最高点,从那儿,俯瞰的景色美不胜收。贵族们的公园景观式的园林深深地吸引了漫游于此的商人们。

伯兹莱斯多夫的格米勒公园景观呈现的是英式风格,表达了一种由贵族阶层向土地拥有者的资产阶级转变的渴求。从某方面来说,贵族中的进步因素转入至占政治统治地位的古典风格中,例如虽然风格上仍残留了巴洛克的几何抽象的形式美,但已没有了专制主义的色彩。事实上,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派风格仍占主导。然而整个资产阶级并不附庸这种潮流。贵族特权与崛起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矛盾最终导致了约瑟夫二世的死。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政治热情高涨,维也纳国会和早期工业化变革在 1848 年的革命中走向终结。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彼德麦时期,它对奥地利资产阶级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1]资产阶级多年来首次意识到自身反抗贵族皇权获得独立的潜在力量。玛丽亚·特蕾莎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已经威胁到建基于庞大贵族阶层的传统势力。他们关注资产阶级的需

求，在经济和政治上鼓励资产阶级发展，消除他们与贵族间的差异。约瑟夫二世死后，他的许多改革政策被废除。在国王弗朗兹一世（the Emperor FranzI 1768-1835）打击所有社会改革形式的高压统治下，任何一个被怀疑有共和国行为的资产阶级者都要被检举，各项政策由国家总理梅特涅王子（Metternich 1773-1858）执行。君主政府视有产阶级的出现为威胁，并派遣秘密警察和告密者进行扰乱和煽动。在国内人们无视于前人的共和主义理想，对政治的辩论已变得不可能了。财产被没收，有名望的商人被逮捕，密谋和诡计被公开，威胁在所难免。

这种镇压的统治持续了近 50 年。期间资产阶级和贵族的交战始终不能压抑资产阶级的政治热情和两个阶级间的象征的互相影响。

在此氛围中资产阶级大都撤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和园林，这一受压迫时期的园林风格多样而复杂化，它们大都怀有复古怀旧和家园的情结。流行式的园林设计充斥着情感的流露，这一资产阶级园林的设计理念来源于兰西和其他赞助商们的公园景观设计，但与此同时设计也要适合于城市内部和郊区的小规模土地。

对于专制主义论者的贵族们来说，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在园林中的体现应该是对自然的征服和强迫性力量的施加。而对于资产阶级园林中崇尚的文明来说，自然是艺术创造中独特的组成部分，他们在园林中寻求自然与文化的共存。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来说，园林的核心理念是表现文明的秩序与自然的混乱之间的和谐，因为自然助长了植物的无节制生长和多种生物的自由繁殖，而文明培育了园林的形式，并且精心培植了不同的物种。正如《新园林杂志》（*Neues Allgemeine Gartenmagazine*）中指出的主要观点："置自然于外的艺术是不存在的。而未艺术化的自然是散乱的。至少后者能够带给享乐主义者们充分的完美感。"Althöfer 1956 彼德麦式园林中的植物各显其自然的本性，于其中创造出一幅反映自然中不同物种价值的宇宙图卷。1836 年在为园林建筑协会的首次花展致词时，总统巴隆·冯·胡格尔（Baron von Hügel）称赞了鲜花在园林设计中的作用：

> 如此繁荣、葱郁和盛开的鲜花植物带给我们舒适的享受,同时也体现自然与艺术魔术般结合的完美,它带给我们光明和祝福。目光与感觉不由自主转向这些朴素而具有贵族气质般的情感,使人置身于灵感中而忘却了自我。[2]

这一人工设计和制作的自然美的庆典提供了一个通向与法式和英式风格截然不同的途径。在形式上,它们各具特色。阿尔瑟弗(Althöfer)概括出这种新风格与它者的不同之处:

> 他们不规则地栽种种子,让各种品种和颜色的植物自由生长。[3]低矮的铁护栏或灌木丛覆盖在上面。这些园林为激情的业余园艺家所种植,并经常带有一个巨大的玻璃混合物质建筑的房子。它们是最早出现操场设施的园林,也是适合温暖气候的园林。它需要阳光展现其妩媚:花床里细小并置的色彩,家族中私人摆设的古董,代表着阶级象征的颂歌,和忧伤的自然主义纪念物。(Althöfer 1956)

在约瑟夫·古尔克(Josef Gurk)的一幅卢森堡园林局部的平版画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些踪迹(图1)。[4]

弗里德里希·菲舍尔(Friedrich Fischer)指出四所私人苗圃是致使这种贵族设计理念广泛传播的发源地(Fischer 1971)。兰西的一个来自诺伊凡德格的园林师卢森堡(Rosenbaum)在5世纪时的施特拉门博格(Strahemberg)家族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苗圃和公共园林。他出身于传统的艺术世家。之后相继建起了另三个带有现代花园的苗圃:席津(Hietzing)的巴隆·冯·胡格尔园林(1824年)位于郊外的资产阶级管区;在卢森堡的园林旁古姆本道夫(Gumpendorf)的另一座巴洛克风格的鲁普莱希特(Dr. J. P. Rupprecht)园林(1822年);和海岑多夫(Hetzendorf)的巴隆米勒(Baron Müller-Pronay)园林,它是美泉宫附近的另一个郊外资产阶级居所(1817年),路德维希·冯·贝多芬(Ludwig von Beethoven)在1821

年写作第九交响曲时曾居住于此别墅。

彼德麦式风格的确代表了一些新的理念。拥有小花园的主人们也渐渐跟上潮流改建自己的房子。1830～1840年，德布林(Döbling)、海里根施塔特(Heiligenstadt)、浩禾瓦特(Hohe Warte)、特别是席津(Hietzing)等新的市郊成为新园林发展的中心区。园林风格的交替在当时的平面设计画中尤为明显。1820年平版印刷的《法国地籍方案》(*franziszeische Katasterplan*)揭示了变化的园林风格，一些有类似于卢森堡和鲁普莱希特式的不规则形花坛，而另一些使用老式的十字拼花图案镶嵌有四个或更多瓣，在交叉处常使用圆形的图案。这些更老的花园形式开始于中世纪，那是一个毫无个性的时代。私人花园在这种设计风格上往往承袭前人，并未做出很大创新。而彼德麦式突然增添了园林的多样性。这种丰富的灵感来源于模仿代表阶级身份的其他资产阶级家族的平面图。模仿者再添加进个性的元素赋予园林独一无二的特征。

随着彼德麦样式的发展，到了1840年间，新的建筑被大量建造起来。这些从彼德麦样式出发设计平面图的园林从中获益匪浅，其中展现出房屋周围及延伸出去的弯曲的小路。[5]然而道路必须规则地符合商业设计者的曲线规范。伯兹莱斯多夫的诺伊凡德格和卢森堡园林中自由延伸的小径已经从它们中消失(图2)。

在把园林建造成独立的私人庇护所之后，维也纳人又从19世纪最初的彼德麦典范园林中借来一些小元素填充园林。原本英式的风格如中国的桥、罗马遗迹和哥特式城堡消失了踪迹。在他们的土地上，园艺家们支起了条纹图案的帆布休闲篷、摆置雕像和架在底座上的玻璃球、摇摆、小鱼缸，种植了数百种不同种类的鲜花。这些元素传达出不同的意义，但首先是嬉戏的、孩童般的和无私的情感。贵族们对英式风格的喜爱胜于古典风格，这是对共和国理想的不那么细微的附庸立场的表现。鲜花是贵族的象征。他们把彼德麦式与巴洛克、英式区分，将其作为维也纳园林未来发展趋势的第三种建筑风格。

梅特涅(Metternich)发动的反对改革的行动表示了1848年发生在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巨变。革命后资产阶级首次获得了选举权。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政权的胜利使他们获得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随着资产阶级在城市政治中日益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一种机械的、功能化的园林艺术开始在城市萌芽。在50年间彼德麦风格高度盛行的时代,英式风格里唯一牢牢引起资产阶级兴趣和注意的是它那整齐的玫瑰园。如今呈现的则是完全的功能主义设计,玫瑰不再能唤起嗅觉的灵敏或彼德麦式的忧思。相反,正如一位当代的园林家对我所宣称的,它们只是“户外空间的活的墙纸”,目的只是装饰着社会交际的场所而已。

结论:生产的园林知识

园林被资产阶级建造起来并成为他们强烈要求与贵族拥有平等社会地位的标志。虽然容易猜测在如此背景下任何资产阶级者都会建造园林来显露他们对自己阶级的热爱,然而实际建造起来的园林显示了从最阿谀奉承的形式化设计到最激进的英国园景的一系列风格。一些因素的确影响了某些园林的设计。大型资产阶级园林公司的出现说明了这些特定的规划在新阶层高度集中的区域内流行。急剧增长的土地拥有者的数量给景观工业提出了新的要求。暴发户也显示出渴望对他们财产进行高度保护的意识。房屋周围的土地被设计成保留和提高价值的样式而不让其作为土地的自身价值显现出来。[6]很快,技术专家们开始为新的消费者提供多种模式的流行设计。现在我重新回到在导言中指出的关于消费的对话本性问题。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提醒我们消费是一种多产且得益的过程(Certtau 1984)。一座园林的设计需求能引起赞助商、园林、设计领域的制作者及各种构成元素间的诸多变化。园林艺术注入了赞助商的特性,虽然实际实现的要比他期望的少,但这提供给他们一个自我认同的机会。赞助商们也依靠改造园林变成一个行动主义者。设计风格的变化则是来自人们对园林强行改变的尝试。对设计元素的重构一方面满足了创意感,另一方面也是对既有设计规则的冒险性拓展。每一次的重新设计都会破坏第一次的创作原义。园林设施的增长极大改变了园林设计的体制,例如设计的程序化,并且体现在细节方面,如工厂

出产的大量产品等。维持设计的整一性法则慢慢发展成一种教条,最后变成毫无特色的相似。

有一段时期整个资产阶级或部分看上去都在跟随贵族的园林艺术品位,而又有一段时期两个阶级的设计风格又是如此大相径庭。关键的因素是看以供个人或团体风格的参考的社会流行的风格,赞助商的风格理念及其政治立场。赞助商代表设计业者发言,设计者必须听从于赞助商。必须要使赞助商确信是他投资了按他风格设计的园林,并且用物质和文化的手段支撑蕴涵其中的物理和象征的意味。如果未在其中凸显代表赞助商特性的东西,那么他不会有兴趣投资这一建设,而无论园林对偶尔的来访者的吸引力有多大。园林艺术的赞助商们首先把自己看做社会结构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以便在特殊的园林风格中瞥见其象征,他就在这些象征中实现自我的肯定。

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动消解了贵族和资产阶级消费方式的传统界限,即使在 19 世纪初期通过政治镇压企图强化这种界限时。每个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场对立运动的影响。那些想要用符号的手段来反抗的资产阶级家庭可以寄托于那些描述彼德麦园林的诗歌。另一些家庭则掺进更多人工调和的巴洛克风格来凸显身份。仍有其他的一些人一丝不苟地完全保留前巴洛克设计风格的园林,避免一切显露其政治倾向的痕迹。生活物质条件决定了每个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而那些暴发户们也被逼无奈遭到更大的曝光。市郊地区比旧的老城区受到更多的监管,这些地方被轮流地向公众开放来让人们瞻观彼德麦式的园林艺术。

参考书目

[1] Althöfer, Heinz. *Der Biedermeiergarte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unich. 1956.

[2] Anonymous. *Neues Allgemeine Gartenmagazine* 2:(1826) 25.

[3] Auböck, Maria. *Die Gärten der Wiener.* Vienna: Jugend and Volk. 1975.

[4] Bermann. *Moritz Maria Theresa and Josef II: In Ihrem Leben und*

Wirken. Vienna: n. p. 1881.

[5] Bobek, Hans and Elizabeth Lichtenberger. *Wien: Bauliche Gestalt und Entwicklung seit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Graz-Köln, Verlag Böhlau. 1978.

[6] Boyer, John. *Political Radicalism in Late Imperial Vien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7] Bürgerstein, A. *Die K. u. K. Gartenbaugesellschaft in Wien* (1837-1907). Vienna: n. p. 1907.

[8]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9] Du Gay, Paul. , Stuart. Hall, et al. *Doing Cultural Studies: 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10] Fischer, Friedrich. *Die Grünflächenpolitik Wiens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s.* Vienna: Springer Verlag. 1971.

[11] Gaheis, Ferdinand. *Spazierfahren in der Gegenden um Wien.* Vienna: n. p. 1794.

[12] Hajos, Geza. Romantische Gärten der Aufkläung: *Englischer Landschaftskultur des* 18. *Jahrhunderts in und um Wien.* Vienna: Bählau. 1989.

[13] Hampel, Carl. *Die Deutsche Garternkunst.* Leipzig: H. Voigt. 1902.

[14] Hennebo, Dieter. *Gartenkünstlerische Tendenzen in Deutschland um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In M. Auböck, et al. *Historische Gärten in Donauraum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Vienna: Institut für Landschaftsplanung und Gartenkunst. 1:15-41. 1980.

[15] Hösl, Wolfgang. and Gottfried. Pirhofer. *Wohnen Wien*, 1848-1938: *Studien zur Konstitutionen des Massenwohnens.* Vienna, Franz Deuticke. 1988.

[16] Johnston, William. M. *The Austria Mind.* Berkeley, CA: Univer-

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17] Kluckholm, Paul. "Biedermeier als literarische Epochenzeichnung", *Deutsche Vierteljahress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Geistesgeschichte* 13(1935):(1923) 1-43.

[18] Mosser, Monique. *Paradox in the Garden: A Brief Account of Fabriques.* In M. Mosser and. G. Teyssot. *The Architecture of Western Gardens: A design History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Da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0.

[19] Oehler, Johann. *Panorama von Wien.* Vienna: n. p. 1807.

[20] Pezzl, Johann. *Neueste Beschreibungen von Wien.* Vienna: n. p. 1823.

[21] Weidmann, Josef. *Die Rosenbaum' sche Gartenanlage.* Vienna: Strauss. 1824.

[22] Widemann, Johann. *Malerische Streifzüge durch die interesantesten Gegenden um Wien.* Vienna: n. p. 1805.

注释

[1] 根据威廉·M. 约翰斯通(William M. Johnston),"彼德麦式的"一词的首次使用是在斯瓦比亚幽默小说家路德维西·艾希罗特(Ludwig Eichrodt)时期。他在1850年塑造了一个虔诚的不关心政治的校长高特利普·彼德麦(Gottlieb Biedermeier)。这一名字于1812~1850年间与设计领域相联系,1906年在维也纳举办了一次来自那一时期的家具展览(Johnston 1972)。之后保罗·克鲁克霍姆(Paul Kluckholm)又把它运用于文学创作的风格中(1923,1-43)。

[2] 参见布尔格斯坦(Bürgerstein)1907年著作,这一章由作者本人翻译。

[3] 彼德麦式风格曾有一段时期表现为对花卉的狂热爱好(Cf. Auböck 1975)。许多人用花来抒发情感,不仅仅是园林苗圃中的鲜花。以花为题材的绘画售价很高并且为擅长花卉绘画的约翰·克纳普(Johann Knapp)(1778~1883年)和弗朗兹·夏维尔·古鲁勃(Franz Xavier Gruber)(1801~1862年)赢得了荣誉。花卉也成为瓷器、玻璃、珠宝、家具和壁纸的最受欢迎的题材。这样的装饰使得园林外部和房屋内部相称统一。

[4] 古尔克(Gurk)的平版画是与1824年的论文集同时出版的(Weidmann 1824)。

这些是现存的关于彼德麦式园林的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5] 设计图的复制显示了这些平面图如何发展为适合任何尺度(Hampel 1902)的。

[6] 赫塞(Hösl)和 皮尔霍弗尔(Pirhofer)称之为“房屋思想”,把房子视为以货物形式存在的固定资产(Hösl and Pirhofer 1988)。保留建筑物的质量和范围也就是保护了投资。花园不得不建成美化环境的样子,但它也必须是构成房屋的一部分,以最可能的方式显示其自身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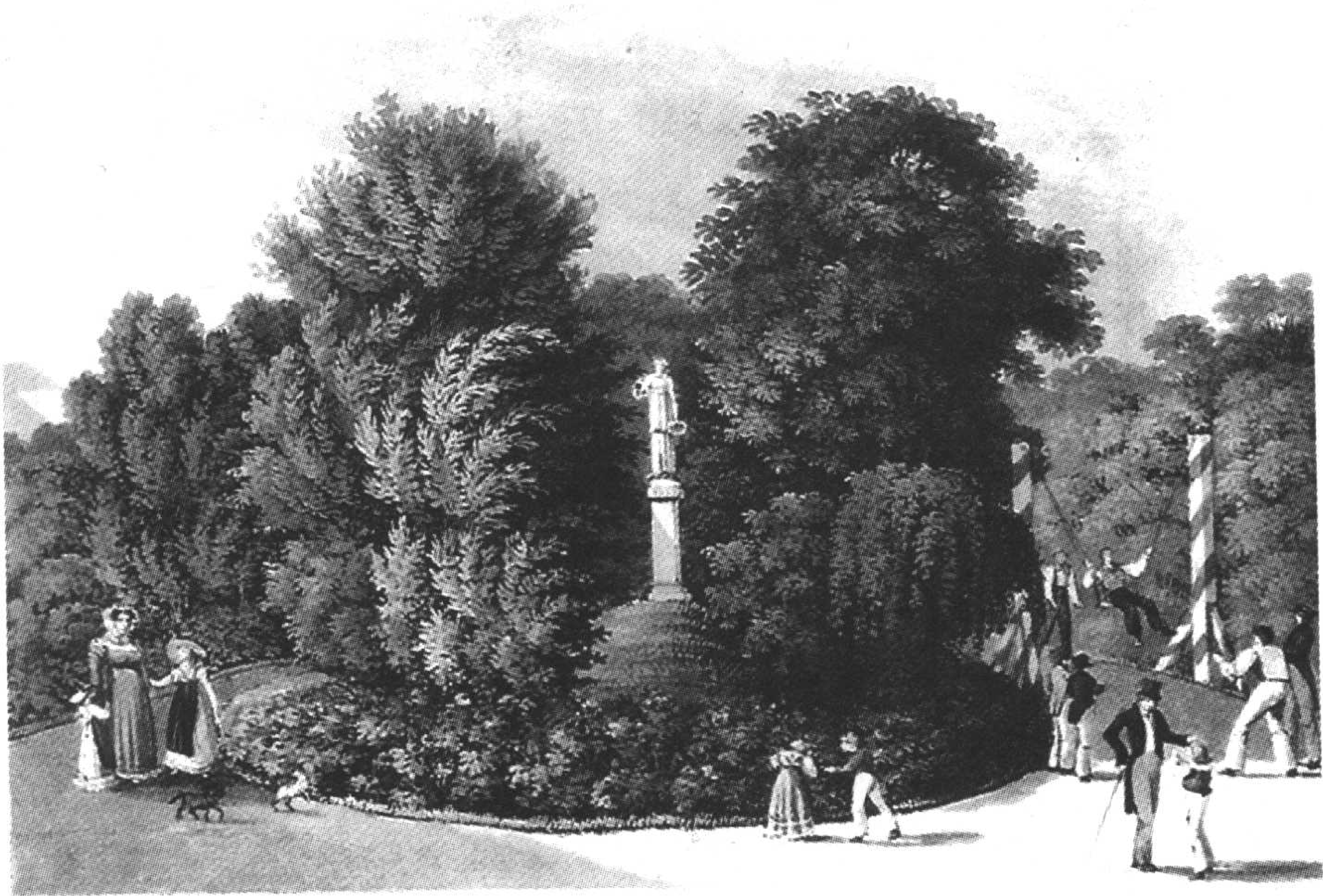


图 1　约瑟夫·古尔克(Josef Gurk)的一幅 1824 年的卢森堡园林局部的平版画(参看尾注 4)。注意环绕圆形花床的边界和右边的秋千。图片来自怀特曼·约瑟夫:《卢森堡园林》,维也纳:斯特劳斯出版社 1824 年版。插图由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收集并允许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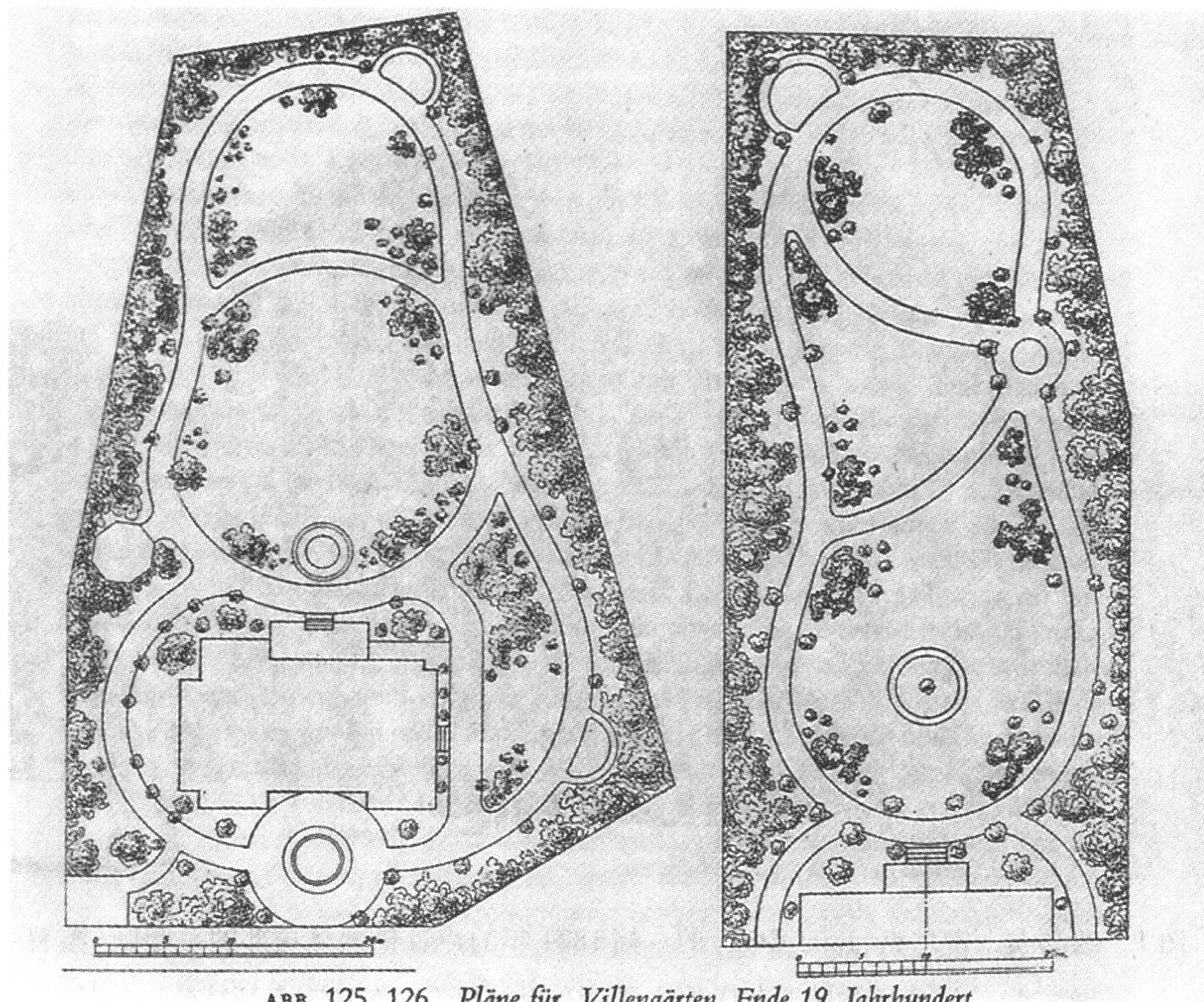


图2　韩普尔(Hampel)1902年记录的19世纪末的新罗曼蒂克别墅花园(参看尾注5)。这一规划反映了家园感的设计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主流。法式的曲线路径和开放式的中心花床在Hausdenken景观中十分典型。赞助商们提供了稳定的投资,他们希望自己的房产对最广阔的市场来说充满吸引力(参看尾注6)。图片来自汉普·卡尔:《德国园林艺术》,莱比锡:H. Voigt 1902年版。插图为公开使用的图片。

(作者单位:美国德宝大学)

(王婧　译)

公园、园林大道与市郊社区：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现代大都市

[美]大卫·斯凯勒



大卫·斯凯勒(David Schuyler)，Arthur and Katherine Shadek人文学科教授及富兰克林马绍尔大学教授。纽约州纽堡(Newburgh)人，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获理查德·B. 莫里斯奖。斯凯勒教授的著述包括：*A City Transformed: Redevelopment, Race, and Suburbanization in Lancaster, Pennsylvania* 1940-1980(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postle of Taste: Andrew Jackson Downing* 1815-1852(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和 *The New Urban Landscape: The Redefinition of City 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Johns Hopkins, 1986)，并与人合编了 *From Garden City to Green City: The Legacy of Ebenezer Howard*(Johns Hopkins, 2002)和三本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其中最近的一本是 *The Years of Olmsted, Vaux & Company*, 1865-1874(Johns Hopkins, 1992)，在各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

多篇。

斯凯勒教授以其卓越的教学贡献获得多项殊荣,包括:the Christian R. and Mary F. Lindback Foundation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teaching (1994),the Bradley R. Dewey Award for scholarship at Franklin & Marshall (2003),and the Lawrence C. Gerckens Award of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City and Regional Planning History for distinguished teaching (2003)。

1868 年,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准备了一系列的方案来描绘他关于现代大都市的概念。旋即,奥姆斯特德就描绘了一种城市景观:通过宽广的公园将居民区与相距遥远的休闲区连接起来,通过树阴成排的、宽阔的园林大道勾勒出都市发展的趋势。对他而言,大都市概念的本质就是市郊,即一个通过交通技术与基础设施与城市相连的邻近居住区域。在 1868 年,奥姆斯特德在他所写的报告中从三个原则方面表述了新的城市形式的框架。尽管是由奥姆斯特德、沃克和公司(Olmosted,Vaux& Company)所共同签署,而实际上完全或者大部分上是奥姆斯特德所写,并且,这份报告代表了他的大都市区域的观念,即城市由于不同的功能被分为不同的区域,并且体现了不同的目的 ——居住、商业、制造、文化——对于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他提交布鲁克林和布法罗公园委员会和河畔发展公司的报告中,作为一个现代都市形式的缔造者,奥姆斯特德为现代大都市的全面规划奠定了基础并扮演着景观建筑师的角色。[1]

布鲁克林公园和园林大道

奥姆斯特德和他的搭档卡尔沃特·沃克共享着纽约园林系统中布鲁克林的中心装饰品——展望公园(Prospect)的设计者的原创者身份。事实上,沃克已经说服了展望公园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圣·斯坦汉恩(James S. T. Stranahan),为埃尔伯特(Elbert)所筹备的公园作一个更早

的方案,并为一个更大的绿化带作重新设计。委员会又授权他设计这个公园,并且邀请奥姆斯特德从加利福尼亚返回东部合作创建布鲁克林公园。在奥姆斯特德回到纽约的两个月后,他和沃克合作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报告,即勾勒出展望公园的大概轮廓(图1)。他们于1866年1月作的报告广泛地借鉴沃克早先关于园区界限的报告,此报告中肯地声称那已经获得的南区和西区的公园用地(现已成为湖址)、以怡人远景著称的山地、广袤的牧地的南端、绵延不绝的草原,都构成了这座公园景观的独一无二的魅力。沃克还建议委员们在弗莱特布什(Flatbush)、范德比(Vanderbilt)和第九大道(Ninth avenues)的交汇处建一个引人注目的入口,它以一个椭圆形的广场,既可以直接进入公园,也可以环绕在公园四周。1866年报告中的其他部分仍可解释沃克的其他早先的文件。很显然,沃克要对争取委员会规划展望公园和重新划分其边界负有责任,这证明对园区发展更为有利的地点不在纽约中央公园;而且他深深相信奥姆斯特德已抛开疑虑,并开始了其景观设计。[2]

关键是尽管沃克的努力有委员会的庇护,然而,他的作用很快在他的搭档面前黯然失色。当1866年7月展望(Prospect)公园开始建设时,奥姆斯特德就已经成为主要负责人,并且沃克开始设计桥梁和建筑物了。在这个月内,奥姆斯特德动用了400人在公园工作。在1867年的夏季,参加建设的人达到了1 800人之多,大部分的人仅限于在公园的北部和东部工作,因为南部和西部的土地还不属于公园委员会所有。[3]

同年,展望公园委员会还承担了布鲁克林其他公园的工作,并使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有机会设计一套园林系统,以满足这个城市不同地区不同功能的需要。委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在格林尼(Greene)堡(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一座堡垒)上设计华盛顿公园的方案。在他们的报告和方案中,包括一座因在战争中死于英国监狱的11 000美国人的遗址上修建的纪念馆、一个巨大的公众集会场所、一个用于升旗仪式的广场,和为来自于人口密集的附近工薪阶层的子女们而修建的运动场,他们认为这些都可以作为一个城市的基本的居住要素,但在展望公园中却显得不相称。当布鲁克林公园委员会在展望公园南面争取到了一块用于作为阅兵场的

用地时，奥姆斯特德却认为将公园用地用于运动项目和军事展览并不适宜。他们设计了一些其他的小型广场，包括卡罗尔公园（Carroll），即一个位于史密斯、科特、卡罗尔以及总统大街（Smith, Court, Carroll and President ）之间的公共广场，在那里奥姆斯特德为孩子们提供了玩耍的场所，为方便公园使用者而提供了步行道、长凳、小木屋和其他设备。更富有创意的是他们设计的汤姆金斯公园（Tompkins Park），该公园坐落在由格林尼、拉斐特、马休和汤姆金斯诸大街（Greene, Lafayette, Marcy and Tompkins Avenues）围绕而成的两个街区上。奥姆斯特德建议将这个历史悠久的广场的内部清除干净，在广场的中心植上大量的树木，在树林和街道的中间形成一个雅致的装饰性的公园。这样一个设计将会创建一个小巧却别致的公园，一个适于漫步、社交休闲的场所，它能提高广场的安全性（尤其是在晚上），并能吸引附近居民的注意力。

展望公园、阅兵场（Parade Ground）、华盛顿公园和卡罗尔公园，以及汤姆金斯广场，它们一起开创了一个开放的园林系统，这是奥姆斯特德所创造的众多的园林系统的第一次尝试。奥姆斯特德和沃克在布鲁克林公园的作品的最富有创意的一面就是设计园林大道系统，以此将公园的效用延伸到离城市遥远的区域，从而促成布鲁克林的住宅的不断成长。[4]

布鲁克林公园和园林大道极富创见地适应 19 世纪城市持续发展的需要。在 19 世纪之初，布鲁克林只是一个仅拥有 2 378 人的小村庄，那里的商人只不过为周围的农业地区提供商品和服务。但是在这个世纪接下来的日子，布鲁克林呈几何指数增长，远比纽约的发展速度快得多。它在 1855 年与威廉斯堡（Williamsburg ）和弗莱特布什（Flatbush）合并之后，成为一个巨大的城市，但却缺乏与之相称的街道系统。每一个小镇都被设计为一个矩形的“橄榄球场”，虽然都朝向易斯特河（East），但那蜿蜒而曲折的海岸线使得小镇的街道都与邻近市区以不规则的角度交错纵横地相连着。[5]

当布鲁克林公园委员会让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来研究展望公园的入口时，他们俩发现除了利用现有的公园和园林大道来建构现代大都市，想另外创建一些宽阔的街道是极为困难的。在为旧金山的一个公园提交的发

展建议的报告中,奥姆斯特德首次提出通过创建宽阔的马路和绿阴大道来扩大公园效用的可能性。1866 年奥姆斯特德和沃克就已经勾勒出一套从展望公园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公路系统,而在他们于 1867 年所作的报告中,再次呼吁建立一个线性延伸的公园,从公园的东部扩充一条休闲之用的林阴大路,一直延伸到里奇伍德(Ridgewood)的一个水库那里。这条沿着乡村的轮廓的蜿蜒的马路将"把公园实际上延伸到威廉斯堡的附近",一个曾经遥远的山村已在 1855 年成为布鲁克林的一部分。[6]

在 1868 年 1 月向展望公园委员会递交的报告中,奥姆斯特德第一次全面阐释了一套园林和园林大道系统对城市发展建设的重要性。像大多数的城市和乡镇一样,布鲁克林的街道系统像一个矩形的"棒球场"。奥姆斯特德认为尽管"它在图纸上显得十分简单",但是,这个"棒球场"对于一个城市的规划是不合适宜的,因为它需要区分等级而后再进行填补,从而抬高了开发的成本,还可能造成交通堵塞等不便,从而降低了城市生活的质量。这个"棒球场"是过去的遗留物,已经过时了,并不再适应现代都市的需要,那些从城市还被城墙包围时代遗留下来的密集的建筑物,也是如此。奥姆斯特德将这种早期城市的形式与军事和政治专制联系起来,认为它是"建立在过分压抑人格独立和个性化倾向"的基础之上的,这在美国已没有立足之地。[7]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奥姆斯特德追述了从中世纪到 19 世纪街道方案的演化轨迹。随着城市人口的膨胀,街道和人行道变得越来越拥挤:那些在中世纪"适宜的步行路"已经演化为"不适用的马车路",困扰着城市生活。幸运的是,欧洲大陆的几条重要的公路都预示着解决城市拥挤的替代方案的浮现,特别是巴黎第一帝国大道(Avenue de l'Imperatrice)和柏林的菩提树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第一帝国大道从凯旋门一直延伸到布劳涅森林公园(Bois de Boulogne),在奥尔曼男爵(Baron Haussmann)统治时期已成为改造巴黎的一部分。它的中间是汽车道,其两侧一边是人行道一边是马车道,在每一侧的中间都植有大量的花草和树木。此外,还有一条辅助性的公路,其中间植有更为浓密的植被。这条林阴道大约有 460 英尺宽,是作为一个"中央休闲广场",而非"一般的街道系统

的一部分”。菩提树下大道一直延伸到了皇宫和席尔花园酒店（Thiergarten）之间，是一条夹在四排树之间的中央行车道。[8]

奥姆斯特德认为考虑到街道对于城市的健康和财产的重要性，因而急需一套更新、更安全的新的城市马路系统，而且城区的增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他并不因此而忧虑不安，因为就公众健康、社会制度及教育和文化研究方面来看，“平均而言，城市发展得越大，它所获得的也就越多”。因此一个全新的空间范式的发展，即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分离，显得尤为重要。奥姆斯特德预测到这将导致城市将按照功能来创建不同的区域。[9]

欧洲的林阴道可以作为现代都市发展的典型，即园林大道，它对于美国城市的发展壮大是极为适宜的（图 2）。奥姆斯特德力促布鲁克林公园委员会的委员们建造这样“一系列的道路，以传达休闲娱乐的主题，它们能适于散步、骑车、开车兜风；适于休憩、消遣、放松和社交活动等”。园林大道，标志着都市形式发展演化的新的纪元：它将极大地巩固城市在健康、财产方面的最新成果，建立起新的居住社区的主干，并将公园的效用贯穿于整个城市之中。[10]

奥姆斯特德和沃克提议，布鲁克林的园林大道将有 260 英寸宽，有一条主干道，是从两侧有一排树木的人行道的中间分离出来的。而另一排树将这两条人行道从旁的公路分离出来，那些公路则连着附近社区的房屋的入口处。这是一套全新的街道系统，它同时满足机动和步行两种不同的交通方式，创建了林阴环绕的人行道和汽车道 ，并大大增强了毗邻的为中产阶层而修建的大厦的吸引力。奥姆斯特德和沃克还为布鲁克林两个主要的园林大道设计了路线：大洋大道（Ocean），它从展望公园南向延伸到科尼岛（Coney Island）；东方大道（Easten）从陆军大广场一直延伸到东纽约。由于大洋大道的路径超出了布鲁克林的限度，因此，这也尝试性地开创了对大都市的规划。该市已要求洲议会授权批准为大洋大道购买一些土地，而东方大道将延伸到昆斯洲（Queens）的边界，在那里它将和另一条公路相连。很显然，奥姆斯特德已经想到有必要为大都市做全面规划了。[11]

布法罗(Buffalo)公园系统

布鲁克林公园系统逐渐发展为几个不同的片区。这个公园有不同的服务功能,很显然,当园林大道完成的时候,它将作为一处别致的都市风景,并为它所穿过的附近街区带来开阔的空间。但是,公园系统的各个因素,在最初并没有被视为一个完整的公园系统。在1868年8月,奥姆斯特德刚旅行到布法罗,他就第一次得到创建一个全面的公园系统的机会。在为三块潜在的公园用地作了一个仓促的初步调查之后,8月25日,奥姆斯特德在一次公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并发表了他对公园的建议。《布法罗商业广告人》(The Buffalo Advertiser)报道了这位景观设计师和他的想法:

> 他建议在附近区域的一块棒球场大小的场地上,着手修建一个辅助性的公园,公园前面,应有一条美丽的小河,沿着这条小河将铺设一条林阴道和商务及休闲旅行用的公路,这些都将通向公墓以北的特立华大街(Delaware)北侧的土地;在那里,将修建一座中央公园。因此,通过一条与最初提到的类似的公路或者林阴道以延伸到海尔大街(High)和杰斐逊大街(Jefferson)附近区域的高地上,在那里,可能修建一座大约30英亩见方的小型公园,以方便附近的居民;如果布鲁克林计划提高城市供水能力的话,那里还将修建一座水塔。

因此,奥姆斯特德在其最初的访问中,就为布法罗公园系统建立了主要的框架:一座毗邻伊利(Erie)湖巨大的自然主义的公园,在其前面有一条步行商业街,一个散步用的场所和一座市民广场,所有的这些都将由宽阔的园林大道和林阴道连接起来(图3)。[12]

回到纽约以后,奥姆斯特德准备了一份报告,对其口头上提出的一些建议进行了详尽的阐释。他认为,建造一个公园的目的,"就是要其成为一个市民希望能常常去的场所,它最能发挥健康、休闲消遣的功用"。考

虑到建筑物的密集，特别是城市的新兴建筑，他解释道，布法罗公园必须为市民呈现"一种与他们日常条件下大相径庭的特性，即在最大程度上便于亲近自然"。一座公园最适宜的地址，是"与城市环境相对的自然化的环境，它能利用一切可能的优势"，同时拥有理想的地形特征以及全部的空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唯一合适的地址是远离城市建筑的地区——在1855年才并入布法罗的一片土地。奥姆斯特德建议，在城市发展和投机买卖抬高地价以前，应立即为公园的发展获取适当的土地。[13]

随即奥姆斯特德提议将毗邻弗雷斯特·雷恩(Forest Lawn)公墓的一块350英亩的土地作为公园的发展用地。这片广阔的区域有着广袤的牧场和郁郁的古树丛，斯卡加科达河(Scajaquada)如漫步般地穿越这片区域，若将其拦腰筑坝即可形成一个湖泊。奥姆斯特德和沃克在1868年向展望公园提交的报告中，就有一个创建园林式和乡村化的景观的想法，他们将其描述为：树木的王国，树木或孤零零地矗立着，或三五成群。空旷而平坦的草地上投影着它们的身姿，平静的水潭摇曳着它们的倒影，倍加美丽。其最为引人注目之处乃是它们美到极致的宁静与幽雅，就像希伯来(Hebrew)的诗里所描述的："它让我平躺在这片草地上"，"它指引着我徜徉于静静的水畔"，这清清的水、碧绿的草坪、郁郁葱葱的森林加在一起正构成了一种景观，相对于城市里笔直、拥堵的特征，这是一个开放而宁静的选择。[14]

基于在纽约和布鲁克林园林规划方面的经验，奥姆斯特德认为，一座自然主义的公园，尽管很大，却不应仅作为一个正在成长的城市的休闲广场。这样一个公园只表明了"明确而坚定的休闲消遣特性，而不涉及其他时间段的日常需求"。因此这并不能满足大多数工人除星期天和节假日之外，或城市中不同区域居民的需要。布法罗还需要一些更小的更便于亲近的公园，"在不同的社区它便于作短暂的散步、兜风和娱乐消遣之用，在那里他们可以立即享受由于经常性的工作变动而带来的明显的景色变换的快乐"。[15]

奥姆斯特德为这些类型的娱乐休闲设施而推荐购置了两块额外的用地，一个就是福隆特片区(Front)，即处在高原上的32英亩的区域，可以

俯瞰尼亚加拉河(Niagara)与伊利湖;另一个就是伯雷德广场(Parade),该市东部边缘的一片56英亩的土地。前一片区域长久以来就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休闲广场,当其开发后,奥姆斯特德就预测到它将具有"宏伟的气质,能很好地适应于庄严的仪式、公众游客的娱乐以及提供其他市内展览的场合"。伯雷德广场占据着该市最高的地段,这种典型的德国式工薪阶层的社区对公园的发展尤为有利,因为它"相对其他地址拥有不同的自然优势,它更接近于该市人口更为稠密的地区"。毫无疑问,奥姆斯特德意欲使伯雷德广场具备用于放松休闲和军事展览的能力。[16]

除了提出以上三个公园的选址外,奥姆斯特德还提出了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和该市其他建筑区域之间的联系方式。在此,他利用他和沃克早先的报告力促建设园林大道,以此来连接罗斯福·艾利科特(Joseph Ellicott),为布法罗最初规划一些辐射性的街道。他建议从公园的东南和西南角来拓宽约200英尺宽的树木成排的林阴道"专门用于休闲散步"。其中一条将沿着西南方已有的街道,以此将"福隆特"区规划中的公园连接起来,而其他的将转向东南方向,从而将伯雷德公园连接起来。其他的主干道,如缅因大街(Maine)和特立华大道(Delaware)将会被拓宽,并以一些装饰性的园林来点缀,以使其"适合于安装喷泉、雕塑、纪念馆和公众纪念碑"。这些辐射性的大道由于它们更宽且更直接地通向公园,使其比那些"棒球场式"的大街更有利于园林大道的发展。其结果将形成一种新的景观:这种景观园林大道将为居住区增添一点乡村气息,并成为城市街道的主干道,沿着这些主干道新的发展区域将会形成,因为都会城市逐渐分化的进程将会持续下去。[17]

布法罗公园委员会的委员们在1870年获得奥姆斯特德所推荐的土地之后,他们授权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其公司担任景观设计,该公司很快就为公园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方案。沃克和该公司的建筑师弗雷德里克·C.怀特滋(Vaux and Frederick C. Withers)为那些将要矗立在公园各处的建筑物作好了设计,那些建筑物包括:一个位于伯雷德广场的巨大的餐厅、一个避暑山庄、食堂、船坞和公园其他的建筑物以及在福隆片区为游客修建的阳台和避雨棚。在18世纪70年代奥姆斯特德还为尼亚加拉

广场和其他在公园委员会管辖下的公共区域重新作了规划。奥姆斯特德在1868年8月指出,园林大道太过于遵循一般的框架,就像用老城区的街道的宽度去连接新城区的发展一样。[18]

由于公园和园林大道都已定型,该地区的所有者授权奥姆斯特德在公园北部和东部的边界规划一个居住区。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至少从他在1850年访问伯肯黑德(Birkenhead,利物浦的一个郊区)后,奥姆斯特德已经认识到公园的发展将会提升邻近地区的价值,他在中央公园和展望公园的经验也证实了他的信念。不过园畔酒店(Parkside)只是奥姆斯特德建造一个具备完全公园自然景观的社区的第一次尝试。他设计了许多曲曲折折的林阴环绕的街道,并将该片区域分成若干小区域。园畔酒店建筑内空宽敞,接近于公园,且方便进入商业区的特点,使它将会发展成为该市的城市次中心。[19]

芝加哥邻近河畔的郊外村庄

奥姆斯特德在1868年8月间曾去过芝加哥以评估其发展市郊社区的适宜性,他所作的报告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描绘了市郊社区的构成部分。这块地约有600英亩见方,其大部分作为河畔农场——位于芝加哥以西9英里处的德斯·普兰斯(Des Plaines)河畔。在1868年7月,艾米·E.蔡(Emery E. Childs)就已经购买了这片土地,大约是为了投资者的利益,河畔开发公司(Riverside Improvement Company)直到1869年3月11日才组建。组建后创立了一个股份公司,该公司得到授权设计和开发河畔之地,以及修建一条河畔地区与芝加哥之间的园林大道。[20]

奥姆斯特德在1868年8月考察了河畔地区。他对该地区的第一印象保守不失乐观。他在给玛丽·伯金斯·奥姆斯特德(Mary Perkins Olmsted)的信中写道,"动机是这样的":

> 芝加哥在一片死寂的荒原上。最近的有着最微弱的自然吸引力的地点位于西部正后面9英里处。它是一条200英尺宽的小河(Aux

> Plaines)或者小溪,它缓缓流淌在石灰岩的河床之上,河岸逐渐沙化,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这片草地的海拔,其带着沙化的斜坡约高于浅水处10英尺,而在水下则是石灰岩碎片。作为一条河流,它并不非常吸引人,但是两三尺深的干净的水,河岸与斜坡绵延起伏而又十分荒芜,凸显出很小却能承受相当压力的树木——有些是十分好的榆树,但一般是相当矮的橡树。这片沙化的土地向后不规则地延伸着,于是那儿有着大片的粗砺的丛树林覆盖的土地——相对于大草原来说显得极为美丽而富有魅力。这1 600英亩的土地中有一大部分是这种树林,但主要的还是富饶的草地,它们被保存下来,这片土地的所有者正在秘密地保护那片狭长的土地上所有通向芝加哥的道路——作为一个连续的街道线路——园林大道。我建议通过一条有人行道的公路将这片树林和河岸作为主要公共广场,并规划一些乡村街区,那里有公园和包括在该广场上的一些分散的小型户外空间 。一条优质的轻轨(R. R,railroad)由此穿过,而且与该园林大道相匹配的一条街区轻轨正在规划中。

当奥姆斯特德返回纽约以后,他必须疯狂地工作来准备《关于构想芝加哥附近河畔区域的村镇的初步报告》,该报告显示着1868年9月1日由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所签署。[21]

奥姆斯特德的河畔设计理念源自他最初的两次社区设计尝试中形成的思想。在1868年,他和沃克被任命为“景观建筑师和设计师”,去位于曼哈顿北部第115大街委员会所指定的地方为那里的街道和马路规划位置。在那些那项工程完工后残存的不完整的文件中,奥姆斯特德明确地指出,交通线路作为一种手段来指导和掌控地区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在1855年到1856年,当奥姆斯特德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设计广场时,他就在公共社区(路旁、公园和公共设施)范围内的公共空间和私人装饰景观之间建立了一条清晰的分界线。河畔计划的第三个因素:园林大道,它推动了奥姆斯特德之前在景观设计方面的工作。[22]

尽管这些早期的经历促成了河畔地区的设计(图4),然而奥姆斯特

德对河畔开发公司的报告仍是他第一次对现代大都市全面的陈述,在此,作为一个精心设计了的空间,其中"城市与乡村完美地结合着"。就像他为布鲁克林和布法罗设想的园林大道一样,郊区成为了大都市景观进化发展的一部分,成为了"移民浪潮"(从城市到市郊外围)的另一因素。奥姆斯特德非常欢迎这种技术化的优势:由于交通使得工作区与居住区的分离成为可能,并因此促进一个城市的开放性建设。他预言像河畔地区这样的市郊如果建设得当,将会被证明是"国内最具吸引力、最雅致的和符合卫生的生活形式,是艺术应用于人类文明所能达到的最佳典范"。[23]

奥姆斯特德的河畔地区报告强调了发展现代基础设施,或者他称之为创造"充分人工便利"的重要性。他认为高速公路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对芝加哥而言,即使拥有高效的铁路交通,优质的(和昂贵的)公路对于河畔开发公司和社区自身的成功来说都将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的发展还包括:干净水的供应、细心冲洗过的人行道和一些公共设施的建设(包括一座非教会所有的小教堂和一幢商业大楼,这些都是由弗雷德·C. 怀特滋(Frederick C. Withers)所建造)。[24]

奥姆斯特德在河畔地区所设计的街道和公路框定和建构了这个社区的轮廓,就像他对那些早在8年前规划北曼哈顿的街道的委员们所做的建议那样。首先,他设计了一条导引公路,这是一片从芝加哥通向市郊的200~600英尺宽的狭长的区域。这条园林大道对于连接城市具有无可限量的价值,但是,奥姆斯特德认为这样一条导引公路还将带来其他的好处:它将为商务通道和运输通道以及为骑马者和行人准备的小路的分离做好准备。这条园林大道将十分适于休闲兜风,奥姆斯特德还沿途设有许多的"庇护所和加水站"。作为一个休闲场所,园林大道将具有露天集会的功能,可以用于轻松、友好、不拘形式的问候;可以用于享受景色的变化;享受快乐和令人兴奋的景致和声音;享受小镇上人们各种友好的欢呼。所有的人都遵循一个众人皆知的规则和谐平等地相处。规划中的园林大道和铁路一起,使得河畔的居民能够享受"基本的、有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方面的优越性,特别是大都市条件下社会的优越性"。到1871

年,已经有7英里的园林大道和另一条奥姆斯特德所规划设计的长度相当的大道还在建设之中。[25]

在市郊,街道将以宽敞、弯道舒缓而著称,而不同于城市,在后者那里,街道如矩形般的整齐,好像有种"强迫向前的感觉"。奥姆斯特德认为市郊公路应该使人联想和想象到"闲适、沉思和愉快的宁静"。就像园林大道那样,市郊街道系统也要给居民一种和谐感。为了满足休闲娱乐,奥姆斯特德在公路的中间留置了大量的空地用于建造有着喷泉、庇护所和其他公用设施的"非正式的公用绿地和市民休闲广场"。为了推动另一个休闲场所的建设,奥姆斯特德建议在德斯・普兰斯(Das Plaines)河邻近的土地开辟一座公园,并建一些乡村船坞、凉亭和阳台,用于提升该河畔地区的吸引力。[26]

奥姆斯特德认为"家居生活是乡村的一项基本功能",和这些公共场所一样重要,他在公园和社区之间清楚地划了一道界线。例如,在展望公园的隆梅德草坪(Long Meadow)的设计中,奥姆斯特德和沃克创造了一处巨大的草坪,让其被树木和排水系统所围绕。公园的功能是要给游客传达一种宽敞感,而不是大城市所具有的其他感觉。相反像河畔之地这样的市郊能给人们提供乡居生活的幽静。奥姆斯特德认为家庭应能在室内室外充分享有隐私。在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的《锡巴里斯和其他家庭》(*Sybaris and other Homes*,1869)问世后不久,一系列虚构的故事美化了乡村生活的公共性方面,奥姆斯特德认为作者的观点是要将睦邻友好置于家居生活之上,对此他稍存疑义:他给黑尔写信道,"没有任何房子适合一个家庭,如果那里没有公共与私人的户外空间",后者由一个篱笆所圈定,奥姆斯特德称其为"一道房外之墙"。[27]

河畔计划的最终影响因素(其在地图上明显标出,却在最初报告中没有提及)是邻近火车站的面积很小的房屋用地的备用地。奥姆斯特德于1871年为一个公司在纽约的塔利顿・赫滋(Tarrytown Heights)开发的一个市郊的报告中,他命名了许多类似的市郊用地。他打算用这些地为那些十分现代化的人建房,因为他们想住在市郊的环境中,却不愿意支付高昂的汽车费用。在这两种设计中,奥姆斯特德都在乡村用地的附近留

置了小型公园。[28]

对奥姆斯特德而言,在河畔地区和塔利顿·赫滋地区范围内提供许多小块的建筑用地是相当重要的。他敏锐地察觉到大部分受益于市郊便利的人将会是那些富人,他们能支付往返城市的交通费用,并能够购买一块宽阔的地皮和房子。尽管他的专业义务让他原则上为富人工作,但他希望能将市郊生活的便利扩大到整个社会阶层。例如,在形成他的河畔计划的理念时,他试图为市郊次级地区的工薪阶层家庭争取到支持。奥姆斯特德于 1869 年写信给埃弗里特·黑尔,无论是在他的作品还是在其设计中,都"强烈要求那些原则、计划和手段能将所有的城市人口趋于乡村化"。他的最终目标是"大型城镇居住区的郊区化,房屋自由活动的空间不要进入农村,不要牺牲屠夫、面包师和剧院的利益"。因此奥姆斯特德为市郊社区设计的典型是设想他的公园能在相同的程度上为每一个市民服务。在中央公园和展望公园,奥姆斯特德在《公共公园和城镇的拓展》(*Public Parks and the Enlargement of Towns*)一书中写道:"所有的阶层大部分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他们)并不全是知识分子,他们与世无争,任何人都不轻易嫉妒和恃才傲物 ,每一个人的存在都能为其他所有的人传递快乐,所有的帮助都是为了更大的幸福。你可以经常看到不计其数的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无论是贫是富,是年轻还是年长,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29]

奥姆斯特德为河畔方案勾勒了一个理想的社区:一个漂亮的景观,它有着大量的公共空间和僻静的住宅用地。但是在建设的过程中一直都是问题重重。在 1869 年秋奥姆斯特德得出结论,认为河畔(方案)实际上"是一个十足的不切实际的投机买卖"。随着设计师们与投机开发商的分歧日益加深,他们只能悄无声息地走开:1870 年 10 月 30 日,该公司在与河畔开发公司的协议中放弃了一项权利。然而奥姆斯特德在德斯·普兰斯(Des Plaines)河以东位于河畔之处的约 1000 英亩地块所设计的居住街区,事实上都是依照该方案实施的,并且河畔已经成为奥姆斯特德所设想的成功的市郊社区。而今,由于长久以来为大都市的扩张所吞噬,"河畔"那些绿树成阴、蜿蜒曲折的街道置身于毫无计划的扩张之中,它

的外形成为19世纪市郊建设理念的一个实证。[30]

公共公园与城镇的拓展

奥姆斯特德在1855年的报告中所倡导的园林大道、园林系统和市郊的建设，体现了一个极连贯的有抱负的意图，它决定着现代大都市成长的方向。他的观点超越了城市的界线，将大都市作为一个整体，城市与市郊相互依赖，每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生命力的延续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观念是奥姆斯特德于1870年2月在波士顿的罗威尔(Lowell)研究所总结而出，并被美国社会科学联合会(ASSA)以《公共公园与城镇的拓展》为题结集出版。奥姆斯特德应邀出访波士顿，那儿的支持者也赞同在那里修建一座公园。奥姆斯特德演讲的大部分内容也作为经验用于其他城市公园的发展之中。为解释一个公园能满足未来若干年和目前需要的必要性，他告知其听众他所思考的一个公共公园、一个景观的与众不同的特性，这种特性能形成“与街道、酒店、商店以及城市住房的最大可能的反差”。奥姆斯特德所描述的这种情形是就一片宽阔的草地而言，它将传递给游客一种景致尽收眼底之感，并且树林和茂密的植被带能将城市的视域与声音排除在外。[31]

然而，奥姆斯特德的建议最与众不同的是，他在这项公园运动中所设置的语境：中央公园和展望公园(Central and Prospect)在本质上创造性地反映了城市化(的进程)。在《公共公园与城镇的拓展》一书的前半部分中，奥姆斯特德将城市的急剧发展描述为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并且解释他之所以肯定城市的飞速发展和“乡村生活条件下的人口的流失”是必要的、不可逆转的原因。事实上他认识到“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取决于“生活在大城镇中给人的思想和性格所带来的影响”。但是，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发现大城市的发展前景令人担忧，然而奥姆斯特德却依然乐观：他断定大城市人口必将增长，因为城市所提供的教育和文化研究的机会在小城镇和乡村中是难以获得的。而且城市基础设施——交通技术、排污和供水服务以及其他革新都提升公众的健康水平——“增强了城镇居住

的相对优势，尤其是更开放的市郊集镇”。总之，企业和发明的进展必将“促进经济的起飞和城镇生活的便利，并且因此而提升城镇的相对吸引力”。[32]

奥姆斯特德以波士顿及其郊区的发展来阐发他的这种观点。他向他的听众保证“事实上波士顿的今天只是波士顿应当成为的一个核心部分”，“实际上，波士顿城区完全能够向在今天还完全是农村的地方适当地延伸若干英里”。即使像奥姆斯特德所说的，农民正在使公路变直，投资商正在就“一个方案”来规划乡村街道，这些都只会肯定一点：波士顿未来若干年后的居住质量将会减损。奥姆斯特德提出的解决方案需要有一个不同的计划，那就是将大都市地区整合为一个整体。他所设想的现代都市将重新调整工作区与住宅区的分区，这使得铁路、水路和街区轨道所组成的网络的功能将发挥到极致。大都市将由建筑密集的商业中心和由树木与花园环绕在房屋四周的乡村和市郊所构成。园林大道将把公园的便利扩展到整个城市，并将作为城市的主干，新的居民区将围绕其来形成，市郊社区将与城市相连。新的城市生活使得智力、社会与文化上的经验得到完美的安排成为可能，但是实际上奥姆斯特德认为，如果城市继续在老路上发展，以上这些将只是空中楼阁。只有建立一个新的都市模式，才能确保市民能尽享生活在现代大都市中的优越[33]。

参考书目

[1] Beveridge, Charles E. "The California Origins of Olmsted's Landscape Design Principles for the Semiarid American West", in Ranney 1990, pp. 49-73.

[2] Beveridge, Charles E., and Carolyn F. Hoffman, eds. The Papers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 Supplementary Series 1: Writings on Public Parks, Parkways, and Park System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Beveridge, Charles E., and David Schuyler, eds. The Papers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 vol. 3: Creating Central Park, 1857-1861. Balti-

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4] Brooklyn Park Commissioners, Annual Reports, 1861-1873. Brooklyn: Brooklyn Park Commission, 1873.

[5] Buffalo Commercial Advertiser, Aug. 26, 1868.

[6] Buffalo Park Commissioners,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Buffalo Park Commissioners, January, 1871 (Buffalo, 1871).

[7] Hammack, David. "Comprehensive Planning Before the Comprehensive Plan", in Daniel Schaffer, ed.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 Plann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8] Jackson, Kenneth T.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9] Kowsky, Francis R. , ed. The Best Planned City: The Olmsted Legacy in Buffalo. Buffalo: Burchfield Art Center, 1992.

[10] Kowsky, Francis R. The Architecture and Life of Frederick Clarke Withers.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0.

[11] Kowsky, Francis R. "Municipal Parks and City Planning: Frederick Law Olmsted's Buffalo Park and Parkway System",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46 (Mar. 1987): pp. 49-64.

[12] Olmsted, Frederick Law, "The Future of New York," New-York Tribune, 31 Dec. 1879.

[13] Peterson, Jon A. The Birth of City Plan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1840-1917.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 Ranney, Victoria Post et al. , eds. The Papers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 vol. 5: The California Frontier, 1863-1865.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 Riverside in 1871, with a Description of Its Improvements. Together with Some Engravings of Views and Buildings. Chicago: D. & C. H. Blakely, 1871.

[16] Schultz, Stanley K. Constructing City Culture: American Cities and

City Planning, 1800-1920.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9.

[17] Schuyler, David. The New Urban Landscape: The Redefinition of City 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18] Schuyler, David, and Jane Turner Censer, eds. The Papers of Frederick Law Olmsted, Vol. 6: The Years of Olmsted, Vaux & Company, 1865-187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 Vaux, Calvert. "Preliminary Report on Boundaries", Feb. 1865, in Brooklyn Park Commissioners, Annual Reports of the Brooklyn Park Commissioners, 1861-1873. (Brooklyn: Brooklyn Park Commission, 1873).

注释

[1]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德文集卷 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8~27,29~32 页。

历史学家们仍在继续探讨城市规划的起源。例如,斯坦利·斯科尔斯认为,早在 1820 年,律师们、工程师们、物理学家们和公众健康官员以及其他人员都预感到了在规划专业出现之前广泛而全面规划的必要性了。戴维· C. 汉马克(David C. Hammack)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安德鲁·H. 格林所做的相似的论述上。相反,乔· A. 彼德森(Jon A. Peterson)追寻自 1840 年以来的城市规划的起源,在那些健康改革者、景观设计师以及工程师的作品里,仅仅只将这些解释为对于全面规划的经历而已 。参见斯科尔斯(Schultz):《建构城市文化:美国城市与城市规划,1800~1920》,宾夕法尼亚:坦布尔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汉马克(Hammack):《综合方案之前的全面规划》,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彼得森(Peterson):《美国城市规划的诞生,1840~1917 》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2] 沃克:《关于边界的初步报告》,第 80~84 页。参见布鲁克林公园委员会委员在 1865 年 2 月的《1861~1873 年间的年度报告》(布鲁克林:布鲁克林园林委员会,1873);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0~106 页;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 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

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1页。

[3]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2、99~100页。

[4] 参见布鲁克林园林委员会委员的《1861~1873年间的年度报告》,第165~167,22~31,235~239页;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208、309~312、333~334、339、395~399页。

[5] 杰克逊:《荒野之滨:美国的乡村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2页。

[6] 兰尼:《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5:加利福尼亚1863~1865年的荒野》,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542页;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文集,续集第1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6、114~141页;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159页。

[7]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1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4、112~146页;斯凯勒:《新城市景观:19世纪美国城市形式的重新诠释》,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9~171、174~175页。

[8]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1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124、134页;贝弗里奇、斯凯勒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3:创建中央公园,1857~1861》,,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8~349页。

[9]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1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130页。

[10]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1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132页。

[11]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1卷:公共园

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34~140 页。

[12]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 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6~273 页;《布法罗商业广告人》1986 年 2 月 26 日。

[13]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0~161 页。尽管他写这份报告只是为了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利益,但是奥姆斯特德才是唯一的作者。沃克在布法罗访问与书写报告之时正在英格兰。

[14]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2~166、90~91 页。

[15]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4、161 页。

[16]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2 页。

[17] 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5~166 页。

[18]考茨基:《市政园林与城市规划: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布法罗及其园林系统》,载《建筑史学家的社会》1987 年 3 月第 46 期,第 49~64 页;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0 页。

[19] 考茨基:《市政园林与城市规划: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布法罗及其园林系统》,载《建筑史学家的社会》1987 年 3 月第 46 期,第 62~63 页。

[20]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 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66~273、289 页;参见奥姆斯特德于 1868 年 11 月 0 日给 E·C. 纳德以及福雷德里克·C. 怀特于 1868 年 11 月 16 日给奥姆斯特德的信件,均收藏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里的奥姆斯特德的文集的残稿之中。

[21]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289页。而且,奥姆斯特德是该报告的唯一作者,就像欧洲的沃克之于该方案一样。

[22]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73页;贝弗里奇、斯凯勒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3:创建中央公园,1857～1861》,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269页;贝弗里奇:《奥姆斯特德关于美国半干旱的西部的景观的设计原则》。参见兰尼:《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5:加利福尼亚1863～1865年的荒野》,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3页、第546～573页。

[23]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275页。

[24]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280～286页;考茨基:《福雷德里克·克拉克·怀特兹的建筑与生活》,康乃迪克州,中州镇:威斯廉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6页。

[25] 贝弗里奇、斯凯勒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3:创建中央公园,1857～1861》,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269页;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278页。参见1871年关于河畔地区(方案)的改进的记录,以及一些风景与建筑的版画。

[26]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288页。

[27]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7、346～349页;斯凯勒:《新城市景观:19世纪美国城市形式的重新诠释》,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2～163页。

[28]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6:1865－

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03 ~ 522 页;参见《奥姆斯特德文集》奥姆斯特德于 1871 年给卡尔维特·沃克的信。

[29]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 6:1865 - 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46 ~ 349 页;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6 页。

[30] 斯凯勒、简·特纳·香炉:《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卷 6:1865 - 1874,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年代》,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1 ~ 32、291 ~ 293、343 ~ 350 页;《奥姆斯特德文集》中沃克于 1870 年 4 月 11 日给奥姆斯特德的信;斯凯勒:《新城市景观:19 世纪美国城市形式的重新诠释》,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5 页。

[31]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8 ~ 190 页。

[32]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79、177 页。

[33]贝弗里奇、霍夫曼:《 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文集,续集第 1 卷:公共园林,园林大道及园林系统》,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81 ~ 18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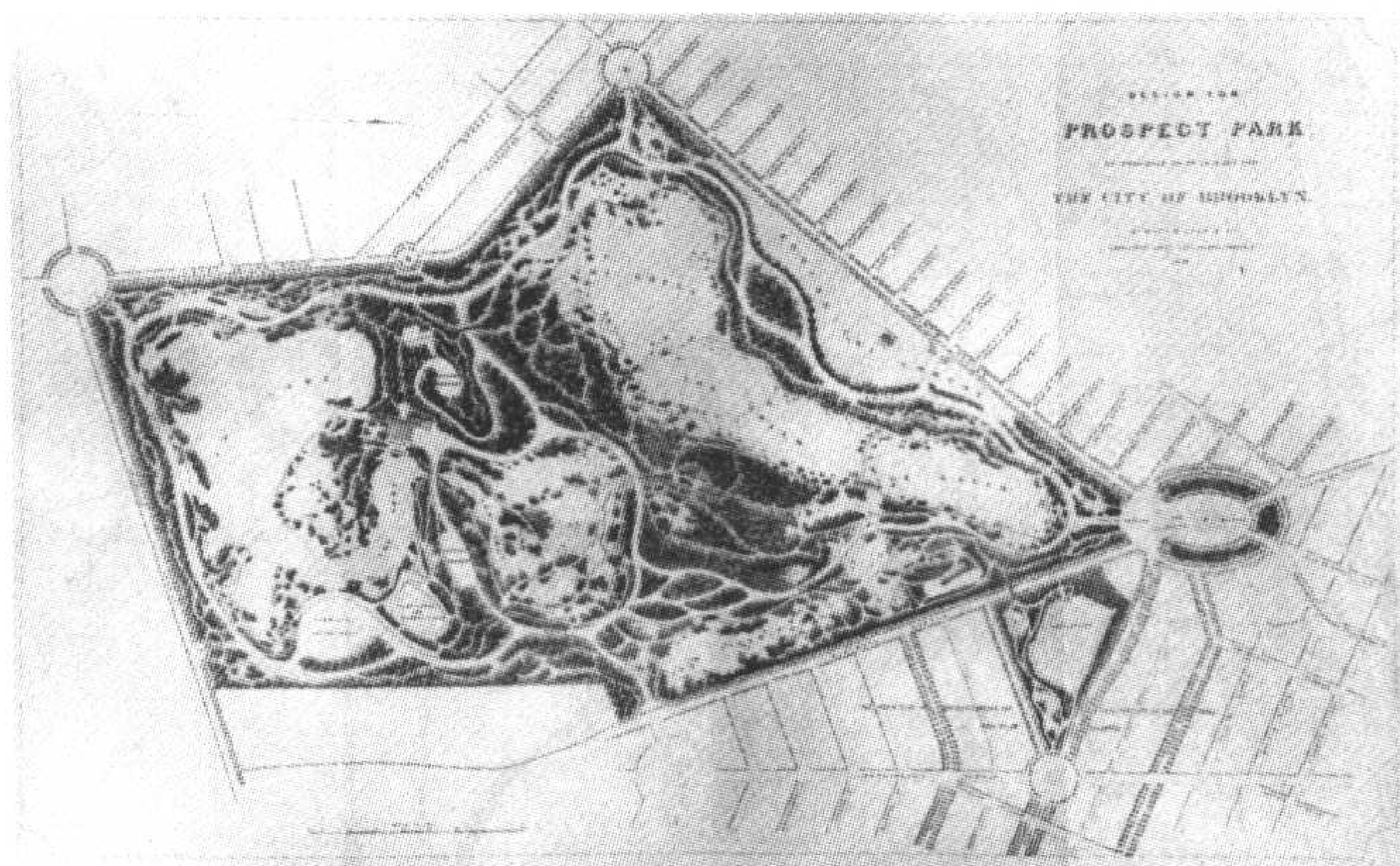


图 1　引自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展望公园计划(Prospect Park),纽约:布鲁克林出版社,第 1866 ~ 1867 页。(National Park Service, Frederick Law Olmsted National Historic Site, Brookline, Ma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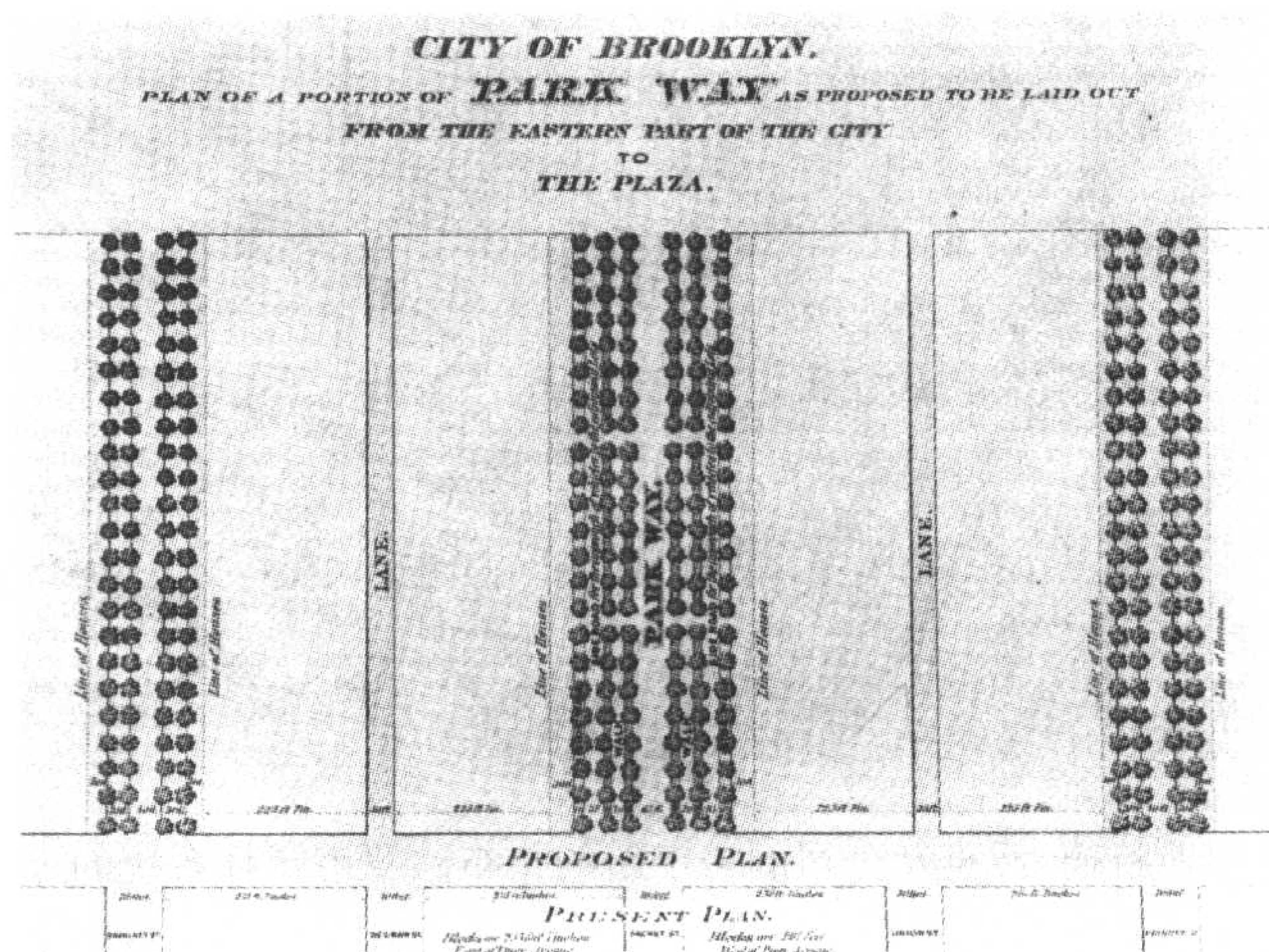


图 2　引自奥姆斯德特、沃克及公司向布鲁克林公园委员会提交的园林大道方案,1868 年。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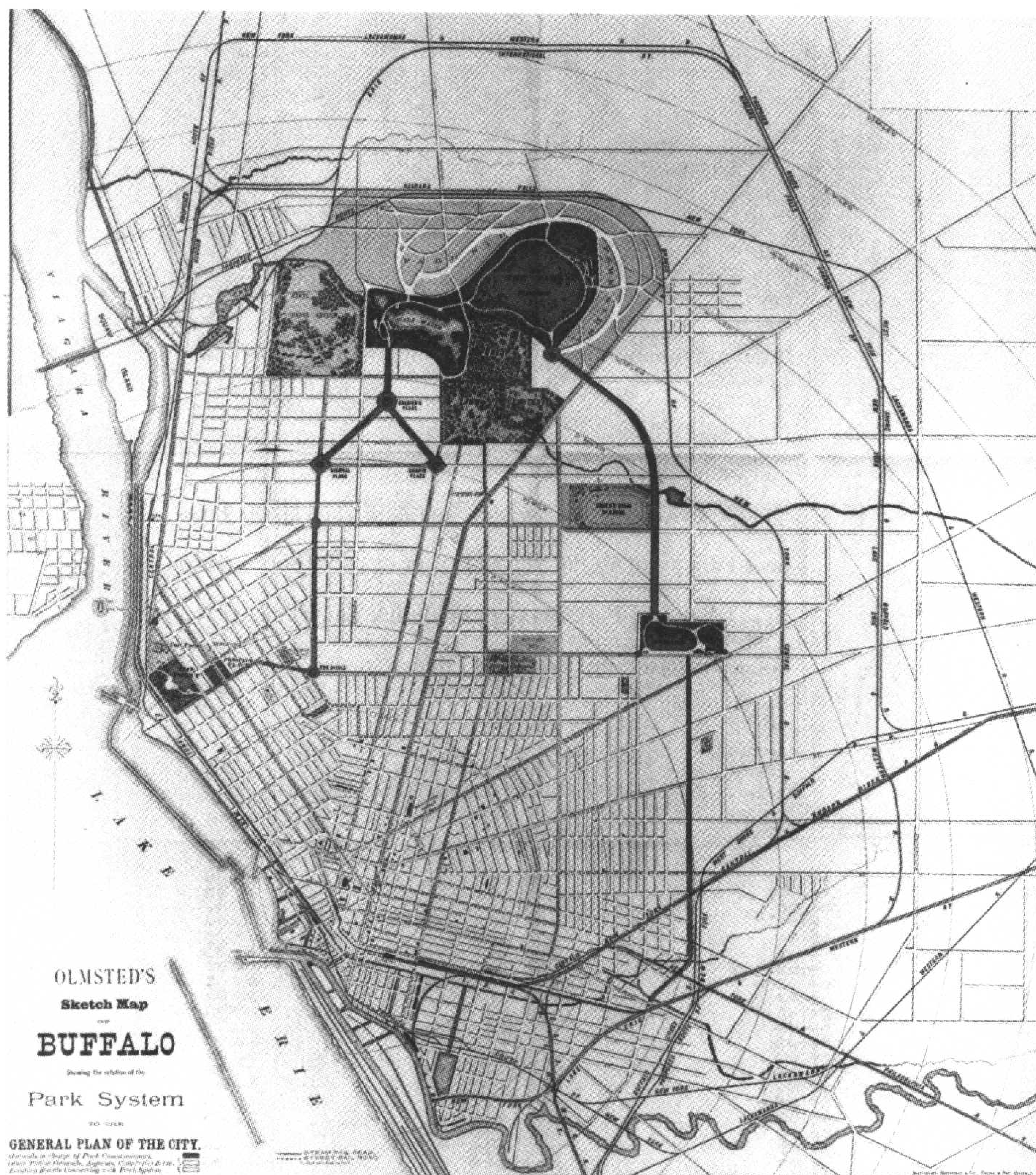


图 3　引自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的关于纽约州布法罗市园林系统的方案。1876 年的地图显示公园及园林大道与城市的街道系统密切相关。福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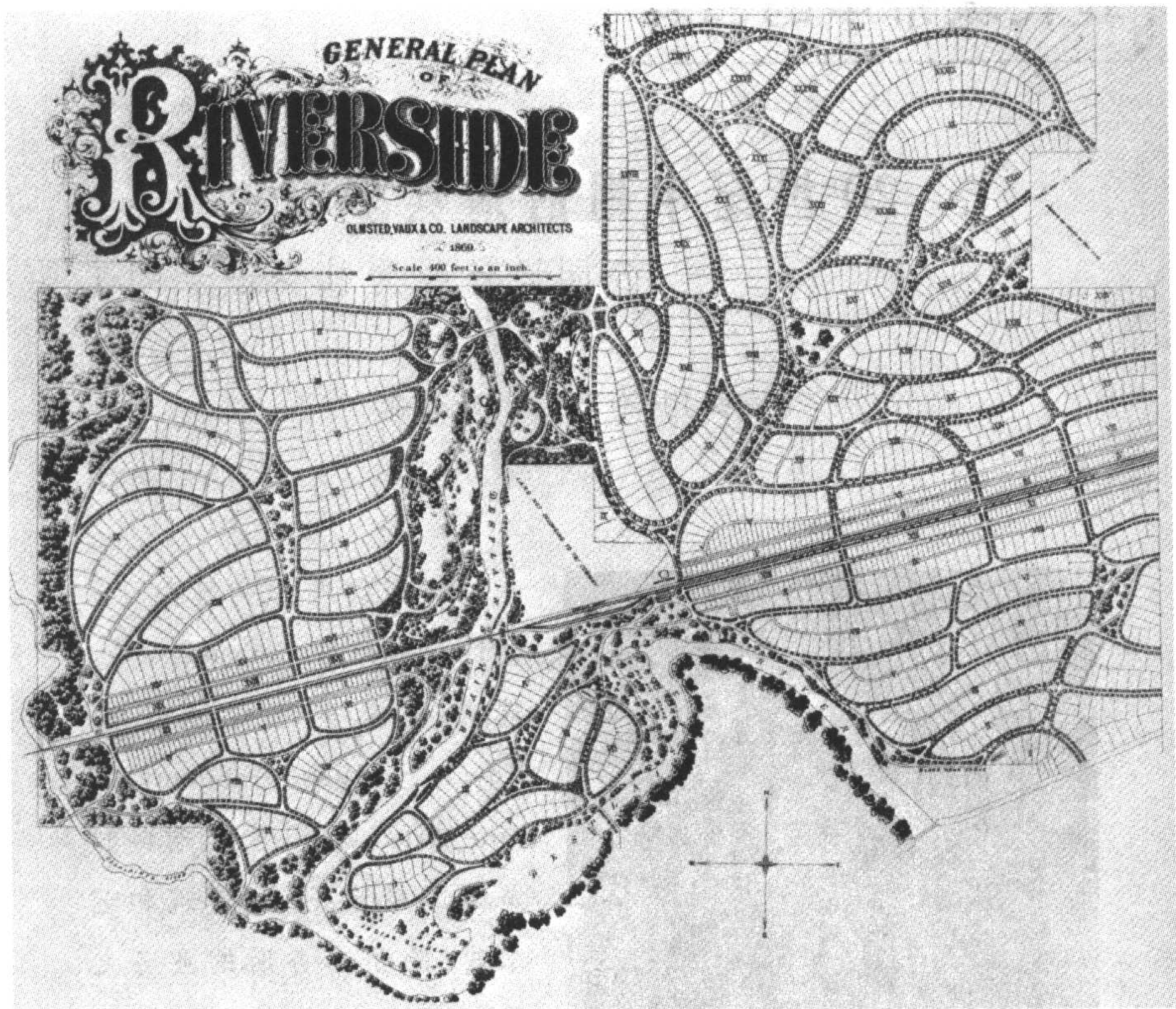


图4　引自奥姆斯特德、沃克及公司，河畔计划（Plan of Riverside），伊利诺斯州（Illinois），1868 年。（National Park Service, Frederick Law Olmsted National Historic Site, Brookline, Ma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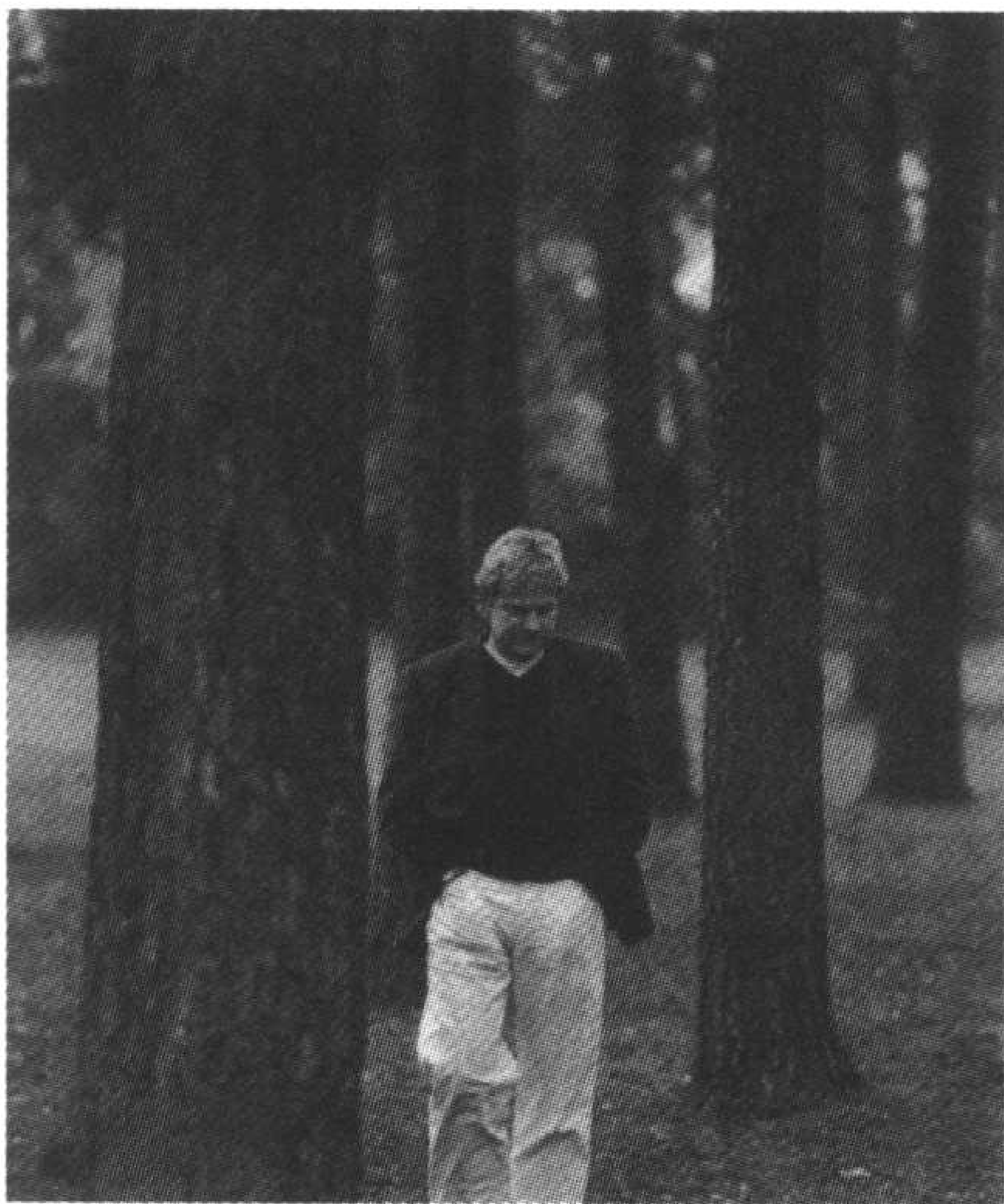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美国富兰克林马绍尔大学）

（胡国民　译）

现代城市中的园林

20世纪中期的瑞典梦想
——公园设计作为社会进步的工具

[瑞典]托布约恩·安德森



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瑞典皇家美术学院(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Fine Arts)成员,研究瑞典和美国的景观设计、建筑和艺术史,除了事务所的业务之外他现在还是瑞典农业大学(SLU)的教授。曾在2001年和2004年担任瑞士洛桑EPFL-ENAC和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特邀教授。多年来,托布约恩·安德森完成了许多项目,但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在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与设计方面的工作。作为瑞典最杰出的景观设计家之一,他的工作获得多项殊荣并引起国际性的关注。*Platser/Places* 是他所做项目的一个精选集。他是期刊 *Utblick Landskap* 的创办人和编辑,他还撰写了大量著作,最近的一本是 *The Architecture of Landscape* 1940-1960。他最近的作品包括:*the Dania Park in Malmö*(入选欧洲 Rosa Barbara 奖决赛的作品),*the park and plaza of Hjalmar*

Branting in Gothenburg, the plaza and streetscape of Östra Boulevarden, Kristianstad, the sculpture centre and park in Vinterviken, Stockholm 和 *the waterfront plaza Södertull in Malmö*。

1952年,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第一次,迄今为止也是唯一一次举办了国际园林设计家联盟世界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作为斯德哥尔摩园林部门的负责人,霍根·布洛姆(Holger Blom)不无自豪地展示了他的成果:斯德哥尔摩,一个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公园政策的城市。作为将瑞典景观设计带入一个崭新时代的众多专业设计人员中最重要的一位,布洛姆改变了公园的形式和功能。在形式上,公园现在由一个渗入城市各个角落的网络构成;绿地已经成了城市结构中主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以前,公园被视为繁华的绿洲,拥有长期以来属于城市的空地;更恰当地说是充当城市环境的解毒剂。与之相反,公园现在已经成了日常的户外活动场所,成了单元住宅生活的重要补充。在20世纪50年代,园林的这些新功能已臻于成熟,并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些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努力正在收获回报(图1)。公园成功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在一项综合计划中所发挥的作用——这项计划致力于推进整个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而这正是一个在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正在逐渐成形的20世纪中期的瑞典梦想。我们必须对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进行相当详尽的解释,因为它为这个时代多个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景观规划设计在内)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

一个旨在推动社会发生根本改变的梦想

20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里,瑞典向世人展示了如何通过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这些重要的手段成功地贯彻实现政治理念。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到70年代,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种对未来社会崭新而现代化的共同构想,使政治家与公务员、思想家与专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这种努力使瑞典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特性。这项雄心勃勃的社会

与政治改革实验，最后被称之为瑞典模式，它展示了处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的中间道路。[1]

这种发展是被早期的灾难性的处境所触发的。20 世纪 30 年代，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使瑞典陷入瘫痪状态。工厂里的机器停止了运转，失去了工作的人们聚集在紧闭的厂门外。仍在开工的工厂与车间里，工人的工资被降至原来的 10% ~20% 。因为妇女对工资的要求较低，她们通常成为首先招聘的对象。而男人们常常不得不通过所谓的失业委员会，从事政府提供的工作，其实就是到远离家乡的北方筑路。这无疑不利于养育家庭。

正因为如此，瑞典当时只有很少的孩子出生，属于欧洲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此外，据估计，当时瑞典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营养不良。瑞典婴儿的死亡率在欧洲也属于最高的国家之列。右翼人士担心瑞典人口将会被毁掉，国家将失去所有生产资本。他们将出生率过低视为瑞典人道德堕落的标志，或者确切地说，是人们使用了避孕用具。

而左翼人士的看法则截然不同。社会民主党人认为，人口出生率过低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过于糟糕。他们强调了社会改革的重要性：在工作时间内，向所有儿童提供免费的卫生保健、免费的学校午餐、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儿童保育是必要的。在劳动力市场，妇女比男人更有吸引力的事实意味着妇女要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家庭之外，这也就使得她们更加难以照看孩子。

20 世纪 30 年代是罢工频繁发生的十年。据统计，1932 年罢工日多达二百万个，1933 年则超过了五百万个。1932 年，社会民主党赢得议会选举，在首相皮尔·阿尔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的领导下掌握了政权。许多正式的委员会成立并开始工作，如 1933 年的社会住房供给委员会和 1935 年的所谓的人口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不得不调查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发现一些重要问题的深层次的答案，这些问题包括：为什么瑞典出生率这么低？怎么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2]

出生率过低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人们的身体状况不佳。自 19 世纪

90 年代以来,TBC① 对首都斯德哥尔摩危害尤深;在与之抗争的过程中,人们急需阳光、照明和新鲜的空气。20 世纪 30 年代是进行清理的十年。人们的居住状况也很重要。为了给工人阶级建造高质量的住房,社会民主运动创建了几个地产持有机构。为了提高就业率和使国家经济恢复好转,建筑业也被当成了政治活动的工具。[3]

1930 年夏天,在斯德哥尔摩展览会上,一种新型的建筑式样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用于展示的建筑有如下特征:窗户宽大便于采光,屋顶平台开放便于直接接触清新空气,可以充分接触园林和景观。这些建筑就像堆叠在一起的白色盒子,为防止细菌的聚集,其正面没有任何装饰,色彩主要取洁净的白色,房屋内部也给人以干净卫生的印象。这次展览会有个名为《接受》的成文宣言(图 2)。

20 世纪 30 年代,在斯德哥尔摩各处兴建了第一批具有这种崭新理念的住宅区。为了使气流从正面通过,并便于两面采光,这些住房都建得细长细长的。为便于屋顶平台接收阳光和微风,房顶都是平的。日间托儿所位于通往阳台的顶层。[4] 日间托儿所建在公立的公园里,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在受过培训的教员的监护下参加各种活动。这项服务是义务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社会性的日托遍布斯德哥尔摩绝大部分公园。

对下一代的教育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很明显,这一问题与社会等级是有关联的。上层阶级早就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其成员拥有工厂,他们的孩子因此接受教育以继承财产。而缺乏政治与经济权利的工人阶级只有向工厂主出卖自己的劳动。工人阶级也怀有各种理想:普选权、大众教育和一个民主社会。渐渐地,劳动价值、受教育的权利和集体精神这三个基础性的问题凸显在社会民主党人如何培养下一代的视野中。[5]

政府委员会不少与家庭、孩子、儿童保育问题有关的成果,都是通过劳工培训组织 ABF (*Arbetarnas Bildningsförbund*)传播的。一开始,有关信

---

① TBC:(对二叔丁基邻苯二酚),一种有毒的化合物,对皮肤和眼睛有较大刺激。——译者注

息都集中在保健问题与生理健康上，不过，心理方面的问题很快也被补充进来。在德国及其他地方迅速传播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心理学遗传学派提出遗传基因决定人的行为的理论，这种新创立的心理分析理论被认为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1931 年，ABF 建立了一个儿童心理研究组织，这个组织的指导者阿尔瓦·米达，是一个年轻而又满怀抱负的社会民主党人，她和同事从一开始就反对遗传学派。[6]

阿尔瓦·米达(Alva Myrdal)认为，未来妇女应有自己的职业，并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养育孩子的新法规应该将家庭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脱出来，使她们有机会参加工作获取报酬，而不是去照看孩子。为了体验一种"健康的孤独"，她提倡孩子在一天中应该有一段时间独处。她说，为了使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免受不幸的折磨，应该教他们学会自立。阿尔瓦·米达是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并且在 1966 ~ 1973 年间成为瑞典政府内阁的一员。[7]

为妇女创造现代化生活是早期的说法，而现在被称为性别体系或者性别等级。这种努力是瑞典推行福利政治的强大动力。在农业社会里，男人与女人在家庭中分担责任，联合为工作出力。[8]农业社会里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这种性别平衡，被工业化彻底毁灭。现在，为了养活整个家庭，丈夫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妻子被紧紧束缚在家务上，这就造成了妻子在经济上对丈夫的依赖。[9]在瑞典，这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图 3)。

寻求改变瑞典社会的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他们要弥合乌托邦式的蓝图与计划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还得缩小梦想与福利国家建设实践之间的差距。他们明确把重点放在"小生活"——平民的日常生活条件上，从而使瑞典式的社会主义有别于其他同时代的社会主义。[10]

首相皮尔·阿尔宾·汉森造了一个词——人民之家(*folkhemmet*)，这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方法和目标。人民之家是国家的一个象征，它被看成是一幅放大了的图像，象征着亲密无间的家庭以及居住在以幸福生活为目标而建造的房屋中的快乐生活。工业化的欧洲不仅产生了工人阶级，同时也产生了资产阶级。[11]工厂主与劳工之间的紧张状态使各个地

方都出现了阶级对立。然而，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以惊人的速度将社会从工厂化的社会改造成家庭化的社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工厂是一个重要的虚拟场所。在稍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中，它将政治问题与男性世界，以及与私人活动相对应的公共行为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为政治利益而想象出来的参照物，人民之家脱离了传统的性别等级制度，也完全颠覆了左派和右派的政治议程。瑞典式的社会主义集中考虑女性（因为妇女照顾家庭）与私人生活（因为家庭相对于作为公众舞台的工厂而言是私人的）。从保守的观点来看，私人生活应该完全排除政府的干预，因为为了使个人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国家必须让个人有主动权和自由。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部分瑞典家庭的命运完全不能被社会民主党人所接受，解决有关核心家庭日常生活的问题也因此成了他们行动的中心任务。从历史上看，家庭问题与所有的私人问题，一直是个人主义保守观念的家庭基础。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干预进入了私人领域，使之充满了激进的崭新内容。[12]

瑞典的住房供给标准远远低于其他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与英国。这种状况给极左运动在政治上留下了很多施展手段的空间，也会使人民选择其他的社会主义道路。[13]建设人民之家作为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引起了瑞典福利国家各方面的反响。阿尔瓦·米达经常使用“家庭”一词来描绘她理想的社会模式。宽大的住宅区建起来了；在对家庭生活与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建筑业的质量规则也得以确立。[14]我们还将会看到，政府开始主动地提倡新的家庭生活管理方式。

在那个几乎可以说是改革英雄年代的岁月里，阿尔瓦与她的丈夫贡纳·米达（Gunnar Myrdal）是典型的活跃的社会工程师，他们睿智、激进而时尚。在给家庭朋友伊夫（Eve）与亚瑟·伯恩斯（Arthur Byrnes）的一封信里，阿尔瓦写道，我们看到这个与众不同的团体的自我形象：“希望可以毫无顾忌进行批判的年轻人……聚集在这里，因为他们都想有助于社会的建设。他们都是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在各自领域里声名卓著，但他们同时又是好朋友，并且很可能是这个国家最默默无闻的团体……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我爱这些人们。尤其是我们的建筑师朋友们……他

们构成了颇富建设性的社会激进主义先锋派，他们还远远脱离了贫乏的美学理论……"[15]在这封信的稍后部分，阿尔瓦用粗体字母写道："我正在建设一个家园。"

这个比喻甚至变成了现实。在同一封信中，阿尔瓦·米达写道："我们（阿尔瓦·米达与马克利乌斯（Sven Markelius））提出了建立集体住宅的想法，这是一个理想的家庭旅馆，一个合作机构。这里不仅负责满足你所有的物质需要，还负责照料你的后代；中心厨房的升降机可以运送食品，这里还有餐馆、图书馆、健身房、俱乐部、社交活动室、文印部、合作洗衣房，你还可以在阳台上做日光浴。幼儿园在住宅的侧边，网球场则在公园里面——总之，在斯德哥尔摩，你能想到的每件事都能租得到，而租金能使我们节省一半的日常开支。所有的事情都是从母亲与妻子的角度来考虑与设计的，并且对那些最需要这样一种住宅而不是一套单元房的人们来说，工作正在使设想变成现实。"[16][17]

经济学家与建筑师之间的协作，有助于在全国推行瑞典模式。这在政治管理、经济与技术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关系，事实证明这种关系具有异常强大的力量（图4）。此前政治体制中健康而民主的措施，已经无法解决迫在眉睫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因此已经变得陈旧过时。社会工程学意味着在经济、技术、科学与政治管理之间有种新的联系。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信念，即改革社会甚至于改革国家都是可能的。[18]这个充满希望的生活观在《人口问题的危机》（*Kris i befolkningsfrågan*）中得到系统的阐述；这本书可能是米达夫妇最有影响的著作，它也是一本政治畅销书。1934年深秋，该书出版，只过了几个星期，米达生了一个孩子。一个朋友写信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凡的思想，它在产生一本书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个小孩子。"[19]

政府深入研究了1935年人口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于1936年开始对最隐密的家庭问题，即性生活展开调查（Public investigation no 1936:59）。在调查报告中，贡纳·米达非常出色地将枯燥乏味的经济语言传送到计划生育这个最隐密的领域。[20]时不时地，总有人提议，应该就那些以前仅属于教会的问题，制定出一部世俗的道德法规来。[21]科学研究

的结果表明,如果没有生育孩子,夫妻之间有可能出现感情问题,双方的满意度也会下降,这一研究结果在报告中有详尽的说明。报告还认为,应该避免只生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孤独的孩子经常会出现"情绪波动、身体不适、容易亢奋、自以为是和自我依恋等症状"。

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相互关联,它们都是为了在经济基础上努力重新建立一种家庭制度;这个制度与包括结婚、生育和教育在内所有时期的家庭生活都相关。住房供给使建立一个家庭变得相对容易,医院免费的照料刺激了人口的繁衍,孩子的月度津贴以及学校免费的午餐,都弥补了养育后代所造成的经济负担。但是这些"馈赠"是有代价的。贡纳·米达反复强调,现代人必须接受新的生活方式,必须教瑞典人民学会如何生活、恋爱、吃饭、着装,尤其重要的是如何抚养孩子。[22]

米达的著作《人口问题的危机》旨在扭转出生率下降的局面,但最终的目标是对社会进行彻底的改造。为了使人类生活更有效率,生产与生育两者不得不结成一种新的模式。其口号就是"理性控制下的社会规划"。[23]正如在前面提到的宣言《接受》中所表达的那样,新型的公民应该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开放的社会以及诸如餐馆、影院、公园、音乐厅、百货大楼这样的公众场所里。[24]为了不妨碍父母将空闲时间用于个人娱乐和额外的工作,孩子最好放在寄宿学校里抚养。[25]

米达夫妇给了社会民主党理性的荣光,贡纳和阿尔瓦都获得了诺贝尔奖,1982 年阿尔瓦得到诺贝尔和平奖,1974 年,贡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而言之,贡纳·缪达尔的论点是政府应该以强大的公共财政干预来阻止国家经济的衰退。到获得诺贝尔奖时,他的以建筑业作为经济平衡工具的思想,在瑞典社会已经施行了大约四十年。

米达一家住在布洛玛(Bromma,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以西约六公里的一个郊区),房子是前面提到的马克利乌斯(1889 ~ 1972 年)设计的。马克利乌斯是米达夫妇的私人朋友,也是一位著名的现代派建筑设计师;他还是宣言的合作者之一,在 1944 ~ 1954 年间,担任斯德哥尔摩城市规划部门的主管。马克利乌斯与米达夫妇实际上合作完成了房屋供给计划,他们以各自在建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长,设计出现代家庭的生活空

间。在一个不承认专家和政治家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的社会里，阿尔瓦夫妇与马克利乌斯的密切合作是一个典型的范例。那时，科学家与政治家站在同一立场，建筑设计师也站在这一立场上。米达夫妇被认为是瑞典福利模式最重要的“建筑设计师”中的两位，这表明建筑师的称号不仅适用于那些设计建筑以及设计我们将会看到的公园和花园的人，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开创社会或经济规划的人。

梦想变成现实：斯德哥尔摩的公园和散步场所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像瑞典那样，将现代社会观念与建筑观念结合得如此紧密。过去意味着无足轻重，不可能从中学到什么。人们相信，每个崭新的一天，都要比刚刚过去的那一天要好一些，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人们开始在瑞典鼓吹这种现代性。国家与首都的重建，不仅是想像力的结果，也是对社会强烈需求所作的反应，时间与思想合奏了一曲完美的和音。20 世纪中期为瑞典的庞大工程提供了必要条件，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幸免于难，能够建立稳定的政治与繁荣的经济。瑞典人民普遍相信未来是光明的，他们虚心投身于改革与创新。对于社会各行各业（包括景观设计规划）来说，这一切都是确凿无疑的。[26]

对明确以自然景致作为花园或公园的做法，瑞典的景观设计者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改进，从而抛弃了古怪或刻板的景观设计方法（图 5）。瑞典景观设计上的这种明显变化，还是由城市的健康危机引发的。新鲜空气与身体锻炼是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为满足新政策的需求，公园设计不再采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形式，而代之以建立在更加现代的观念基础上的形式。现在，自然的康复功能，比中产阶级散步带来的快乐还要重要。与其刻板的形式一样，散步在其内容与社会作用上同样过于呆板。这种公园以自然作为它们形式的来源，同时强调在以前仅仅起装饰作用的草坪与树林的娱乐功能。对于方兴未艾的公园建设运动来说，玩乐、健身和社交成了它的关键词。在梅拉伦（Mälaren）湖与首都斯德哥尔

摩一带有着丰富的景观资源,包含了足够多的变化类型与有价值的成分,这些都为一种新型的景观设计的产生提供了原型。在瑞典的景观设计史上,思维方式第一次不是受到来自欧洲大陆或国际流行样式的影响,而是来自于当地的景观以及独特的瑞典理念。

斯德哥尔摩建在一组群岛上,群岛是梅拉伦湖湖水流入波罗的海时冲击形成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悬崖绝壁冰冷滑溜、空地半封半闭、草地和湖滨绵延开阔、林间小湖隐密幽深、松林芳香馥郁,这些都是梅拉伦湖一带为人所知的特征。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美学计划就建立在这些前提之上。因此,在斯德哥尔摩地区,当地风景的许多片断就被加以艺术阐释,而后被改造浓缩成花园和公园。[27]

马克利乌斯在凯文格(Kevinge)的住宅呈现出这样一个自然的片断,这个住宅是1945年设计师从米达夫妇亦在那里生活过的布洛姆迁居过来时建造的(图6)。特别是马克利乌斯别墅的一张照片,对当时瑞典的景观设计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这里,传统形式的花园已经消失了,一种新的构思产生了。在这张照片里,房子没有像通常那样支配着家居环境;相反,只是充当了花园的一个背景。在摄影师的背后,一片桦树林暗示着这个花园面积极大,绵延甚广。或者可以说,这里没有花园。从它处于照片的中心位置来看,这个小水池只被当做积聚岩石裂缝渗水的水坑。那个年轻的女孩背向我们,她并没有摆姿势,但在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园林里,她看上去自然得体。她属于第一代将享受完全现代生活的人;她站在一片风景里,这片风景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经过设计的园林,而更像森林里的一片空地。在这种新的花园构想里,还能看到一些历史的痕迹。这幅图片表明,在瑞典的景观中有一种从未间断的对大自然进行某种感知的传统:人类在旷野中占有一席之地,与自然有种意味深远的联系。[28]

在马克利乌斯别墅的照片中,这个年轻女孩朝着自然,朝着属于她也属于瑞典现代主义园林的光明未来,展开了双臂,因此这张照片具有一种强烈的宣传效果。第二张由摄影师 K. W. 格拉斯(K. W. Gullers)拍摄的照片,表现了斯德哥尔摩福莱德豪尔(Fredhäll)公园里孩子们的池塘,这张照片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图7)。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环境平

静安谧,孩子们在湖泊入口或溪流中玩耍。古老的橡树与灰树自由生长,枝叶在牧场上空舒展着,它们构成了整幅照片的框架。假如照片后面不出现公寓大楼,人们很可能以为这是瑞典乡下某个地方,因为这两者的氛围与景色大致相同。

但是福莱德豪尔位于斯德哥尔摩市的中心,湖的入口是一个用混凝土砌成的供孩子们玩耍的池塘。在瑞典景观设计中,福莱德豪尔公园仍然是园林规划新观念另一个有力的代表。市园林局以这种风格高质量地设计了许多园林,这些园林后来被一起印上了斯德哥尔摩景观设计学派的烙印。

这个学派把梅拉伦湖畔地域性的景色纳入一个美学计划,将其作为创造景观形式的起点,提取其精华并使之形成一定的风格,或者有时在那些缺乏自然优势的地方创造出这种景观。[29]新的市立公园,依然不仅在设计上而且在计划上,与传统园林相去甚远。现在,公园已经被视为城市中活跃的、令人愉悦的去处,而不仅仅是绿色的保护区。公园被看做是社会住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和抽水马桶、阳台、热水与冷水一样重要。在历史上,景观规划的目的第一次在于让人们享用它,在于使普通大众可以在绿草上行走,可以沐浴在阳光中,可以在野外共进午餐。虽然这也是第一次,政府任命一个对公园设计几乎一无所知的人担任斯德哥尔摩市公园的主管,但上述这一切的确成了现实(图 8)。

这个人就是霍格·布洛姆(Holger Blom,1906 ~ 1996 年),1938 ~ 1971 年 30 多年里,他一直担任公职。他被培养成一个城市规划者,先后在斯德哥尔摩与拉尔斯·以色列·瓦曼(Lars Israel Wahlman)、在阿姆斯特丹与托尔(Krüger & Toll)、在巴黎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一道工作过。城市规划方面的训练,给了布洛姆必要的知识,使他可以将公园设计战略改造成人民之家计划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布洛姆的贡献是双重的:首先他确立了一个公园计划,展示了一种强大的战略思想并将之应用于公园政策的问题上;其次,他推行了这项计划,建起了一个几乎渗透至市中心所有地方的公园体系。[30]

布洛姆的公园计划简单明了、成效显著(图 9)。它由几个层面构成,

每个层面包含着程度不等的细节。这些细节可以浓缩成一幅简洁有效的画面,在与政治家、同僚与普通民众交流时可以再三使用。布洛姆的四个主要观点是:

1. 公园使整个城市丰富多彩。
（城市规划方面）
2. 公园为户外娱乐活动提供场所。
（环境卫生与民众健康方面）
3. 公园为公众聚会提供场所。
（社交方面）
4. 公园保护了自然与文化。
（生态方面）[31]

建于 1941 ~ 1943 年的诺尔梅拉史传德（Norr Mälarstrand）及其扩建部分,最能体现斯德哥尔摩将都市自然景观与娱乐设施相结合的理念。这个公园建在国王岛（Kungsholmen）上,沿着梅拉伦湖南滨伸展,像个狭长的绿色手指:长 3 000 米,多数地方只有 20 米宽（图 10）。公园始于市政大厅前面的市中心,止于城郊,贯穿了整个市中心。今天的斯德哥尔摩居民普遍相信,诺尔梅拉史传德是个风景绝美的自然保护区,事实上,它完全出自人工建造。在环境美化之前,这片地方是一片荒无人烟的狭长沼泽,到处搭建着仓库,绝对称不上赏心悦目,对人们的健康也无丝毫益处。在斯德哥尔摩学派兴盛的时期,斯德哥尔摩绝大多数园林都是由多才多艺的艾利克·格莱姆（Erik Glemme）建筑设计的。他在园林局为布洛姆工作,是诺尔梅拉史传德主要设计者。沿着绵延逶迤的湖岸线前行,人们可以体验到精巧细致、层出不穷的建筑设计,而这要归功于格莱姆。

诺尔梅拉史传德几乎具体而微地体现了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理念。一条人行道自始至终柔美而曲折蜿蜒地经过座位、充满阳光的地方、码头、瞭望台、小池塘、运动场、小花圃、雕塑、水上小酒吧。在某个点上,只是为了营造跨越的快感和与湖水亲近的感觉,湖滩才被挖出一个小水湾（图 11）。

公园规划设计的时候（1941 ~ 1943 年）,正值世界大战,瑞典与世隔

绝。因此,公园建设只能依靠地域及当地特色。由于不能进口任何东西,所以公园里只能种植瑞典植物。

梅拉伦湖的许多风景,如白桦林环绕着的牧场、灌木丛生的榛树林、长着桤木的湿地,都经过重新设计。人类对风景的影响,主要通过一个由干垒石墙围起来的庭院、一间涂白了的渔民小木屋和一个爬满蛇麻草的小屋(Humlehyddan①)体现出来(图 12)。它为传统观念和新生观念的结合提供了一个实例:内部花园被低矮结实的石墙圈了起来,棚屋状的上部建筑爬满了用来通风的蛇麻草。[32] 诺尔梅拉史传德至今仍然是斯德哥尔摩居民十分喜欢的地方。夏天,人们既可以享受阳光,还可以在水里游泳,在湖面上冲浪、驾船,并欣赏湖光山色,在小酒吧里用餐;冬天,人们不仅可以在冰封的湖面上漫步并欣赏令人叫绝的城市美景,还可以在上面溜冰滑雪。艾利克·格莱姆认为,湖面与湖岸本身一样,都是公园里面起积极作用的部分,只不过绿色的湖滨换成了蓝色的湖水(图 13)。

布洛姆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有能力制定一种新的公园设计理念,艾利克·格莱姆则是一个为众多园林设计外形的人。在斯德哥尔摩,大约有几百个地方打上了艾利克·格莱姆的艺术印记。市中心的许多新公园不是建立在未开发的土地上,而是在改造旧公园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建造方式没有感伤,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现代主义运动的特征。被布洛姆的公园计划催生的其他文化机构之一就是公园戏剧团,这群被城市所号召的表演者在夏天从一个公园到另一个公园免费为观众表演。公园戏剧团在六十年后仍然存在,它们表演从五月持续到九月,每天晚上他们把舞台设备运往一个公园。在公园里,为了给观众提供座位,许多的露天的戏剧院被设计并且建造起来了(图 14)。如前所述,在面对公众的日间托儿所里,这个社会计划也为孩子们提供经过审查的戏剧。孩子们可以在幼儿园老师的指导下看戏,也可以与父母一起参与各种活动。在其他的令人愉快的事物中,公园还举办公开的雕塑展,这些雕塑都是由瑞典第一流的艺术家们创造的。它们是由一个特别的政府部门所主办的,并被放在

① Humlehyddan(瑞典语),指爬满蛇麻草的小屋。——译者注

一个合适园林环境里以便提高公园与广场的美学品格。布洛姆认为有必要雇用有能力的职员;还有必要让在编的艺术家们组成团队,与园林设计人员一道工作。例如,这种合作就产生了一个为在公园展览而设计的可以使雕塑上下攀爬滑动的建筑,这是尼尔森(Egon Möller Nielsen)的杰作;卡乐·罗德(Kalle Lodén)设计了一个在冬季喂鸟的台子,他还设计了瑞典传统仲夏庆典上用的庆典旗杆(图15、图16)。当局还制定了绘画计划,以标明、介绍公园,艺术家们还被要求设计出篱笆与栏杆以保护公园里的楼梯。公园剧团与公众艺术计划可以看做是精心设想的政治决策的表达物,其目的在于,将高雅的文化活动搬出戏剧沙龙或艺术博物馆这类工薪阶层感到浑身不自在的地方,并使之更加普及。

在斯德哥尔摩,公园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更加远大目标的一部分,这个目标就是:最终建设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得到最大幸福的民主社会。不过,20世纪中期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梦想,只有予以一定的批判质疑才能为人们所接受。即使整个计划毫无疑问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它也在暗示并鼓励被推选的代表们行使广泛的权力。在这些年份里,瑞典社会虽然经历着剧烈的变革,却从未造成社会的分裂,这一点令国际观察家们非常吃惊。始终如一的团结也显示出所谓的权谋政治,尽管它是在一个民主透明的社会制度下进行的。根据一份规划详细的蓝图来追求现代生活——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就应当如此——将会在多个方面影响个体发展的可能性。人类最基本的特征——自由意志,常常被置之不顾。这在后来导致了民主党内左派思想的发展,而这种思想是由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席卷西方世界的学生动乱和相关改革浪潮所引发的,这最终促成了瑞典式梦想的破灭。

在霍根·布拉姆的领导下,斯德哥尔摩学派在斯德哥尔摩公园中追求并发展出一种景观设计的传统(图17)。这一传统可以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的历史遗产。应该说,这是个悖论,因为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师再三拒绝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依恋。也许,斯德哥尔摩学派确实在联接过去与未来方面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在政治理想和社会同情的共同驱使下,它使形式与功能密不可分。设计与内容现在遵循协调的原则,从而形成一种

完全来源于社会环境的景观设计类型;这种类型的设计,不是像通常情况那样,来源于形式或者时尚。半个世纪以来,瑞典尽管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在斯德哥尔摩的公园里,这种让公园为日常生活服务,并从当地风景的精华中汲取灵感的传统,却在许多方面一直维持着。公园剧团夏天仍然在各个公园巡回演出。公众艺术计划仍在继续进行,市立公园里增加了新的雕塑。那些配有职员的游乐场仍然吸引着来自多元家庭住宅的小孩子。最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人继续轻松愉快地使用公园,好像公园就是他们共享的起居室。游戏、庆祝、集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赋予斯德哥尔摩的城市生活一种特别的和十分原始的精神(图 18)。

注释

[1] 安德森(Andersson)2002,2。

[2] 汉森(Henschen)1991,179。

[3] 汉森(Henschen)1991,229。

[4] 汉森(Henschen)1991,229。

[5] 汉森(Henschen)1991,93。

[6] 汉森(Henschen)1991,235。

[7] 1972 年,因为阿尔瓦·米达(Alva Myrdal)在社会问题上的活动与著作,她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在她的活动与著作中,她总是把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的单位。

[8] 希曼(Hirdman)1989,13。

[9] 希曼(Hirdman)1989,106。

[10] 这里也必须指出,瑞典社会主义运动是在一个完全的民主体制中发生与发展的。

[11] 希曼(Hirdman)1989,81。

[12] 希曼(Hirdman)1989,16。

[13] 希曼(Hirdman)1989,93。

[14] 希曼(Hirdman)1989,93。

[15] 尽管阿尔瓦·米达(Alva Myrdal)没有提到她那些朋友们的名字,但不难推测,他们是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在所谓的经济学家俱乐部里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另一个群体是策划斯德哥尔摩展览会与成文的宣言《接受》的设计师们。这些设计师们包括 Sven

Wallander, Uno Åhrén,乔治·保尔逊(Gregor Paulsson)和贡纳·阿斯普朗德(Gunnar Asplund)。除了这些,马克利乌斯是米达最好的设计师朋友之一,他设计了米达家的住宅。

[16] 米达(Myrdal)书信集。

[17] 一些集体住宅在斯德哥尔摩被修建。位于约翰·爱立信大街的集体住宅是最著名的;尽管它们在内容上与想象中的不再相符,但在结构上仍然完整。

[18] 希曼(Hirdman)1989,99。

[19] 希曼(Hirdman)1989,99。

[20] 1945~1947年间,贡纳·米达(Gunnar Myrdal)担任瑞典政府的商务部长。

[21] 希曼(Hirdman)1989,131。

[22] 希曼(Hirdman)1989,123。

[23] 希曼(Hirdman)1989,122。

[24] 阿斯普伦德(Asplund)1931,72。

[25] 阿斯普伦德(Asplund)1931,67。

[26] 安德森(Andersson)2002,4。

[27] 安德森(Andersson)1998,238。

[28] 安德森(Andersson)1998,227。

[29] 安德森(Andersson)1998,228。

[30] 安德森(Andersson)2002,22。

[31] 希洛姆 1946,第1页及其后。

[32] 安德森(Andersson)1993,122。



图 1　在现代主义时期，城市设计师们认为公园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诺尔梅拉史传德(Norr Mälarstrand)。图片来自 C. G. 罗森博格。



图 2　新的公园强调其适用于各个年龄阶段的人。诺尔梅拉史传德(Norr Mälarstrand)的游乐场。图片来自 C. G. 罗森博格。



图 3　在瑞典,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引发了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诺尔梅拉史传德(Norr Mälarstrand)。图片来自 C. G. 罗森博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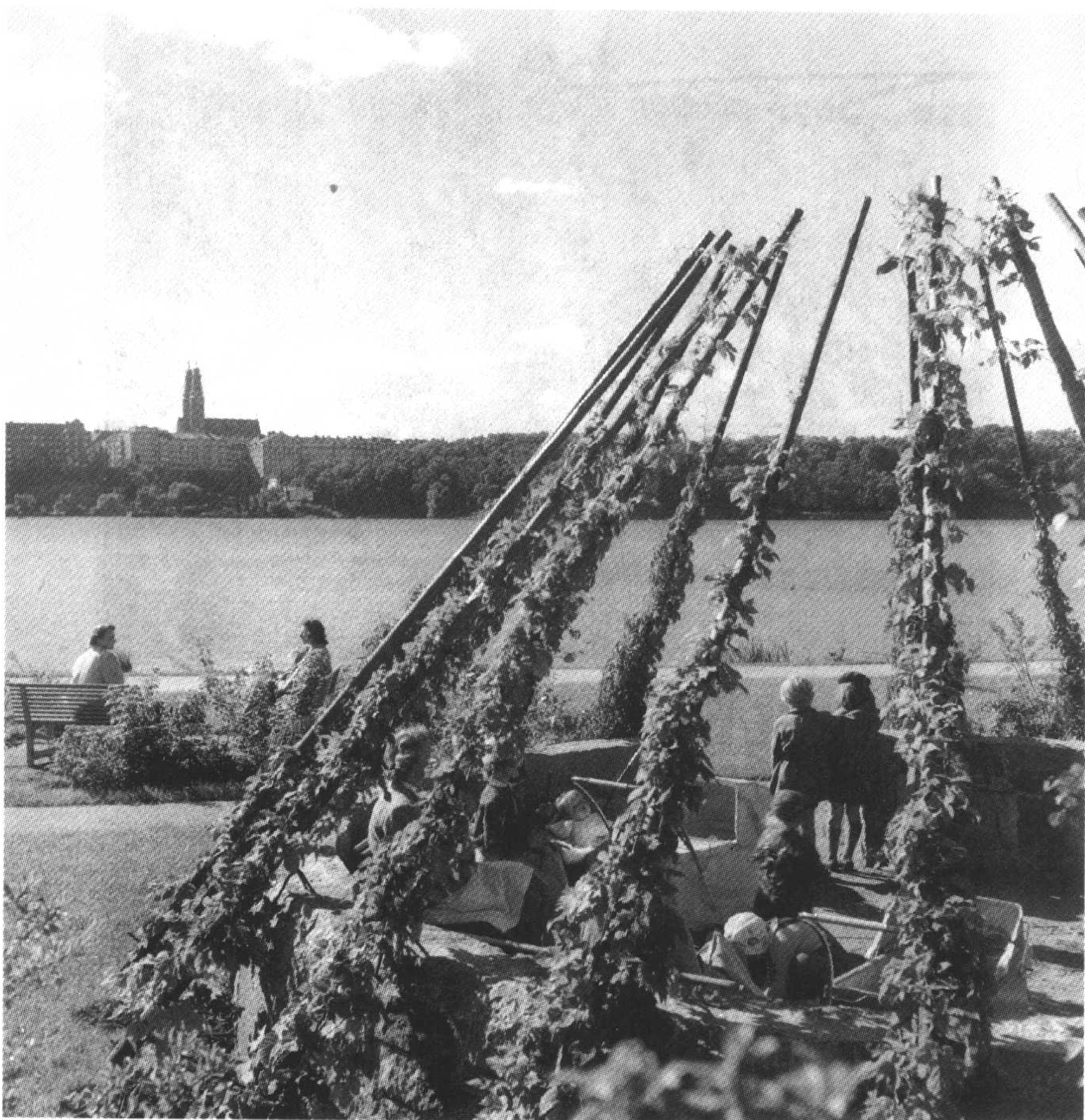


图 4　公园被设计用来提供娱乐与各种社会用途。诺尔梅拉史传德(Norr Mälarstrand)。图片来自 C. G. 罗森博格。



图 5　在形成现代主义公园的过程中，自然景观被用来作为基调。诺尔梅拉史传德(Norr Mälarstrand)。图片来自 C. G. 罗森博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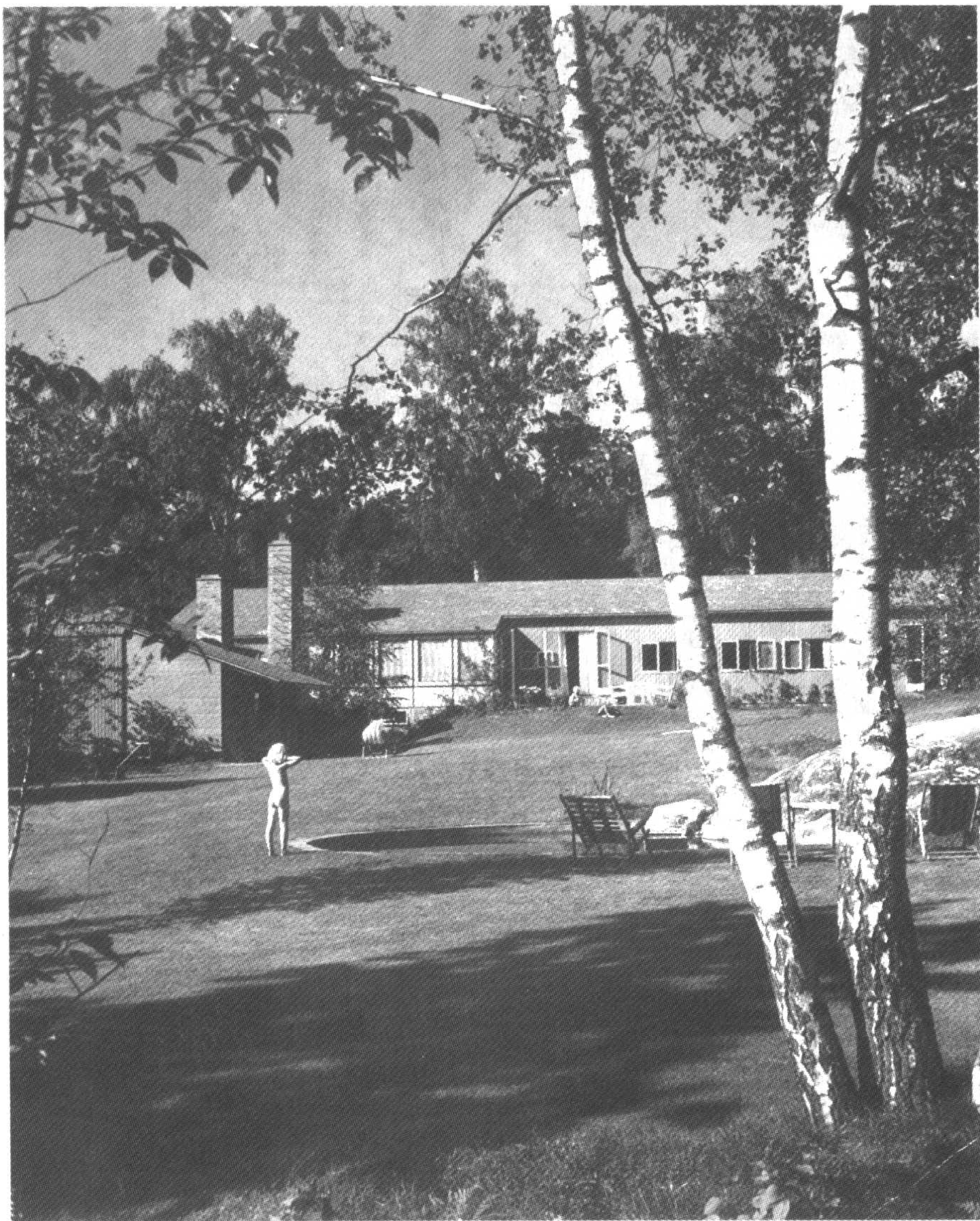


图6　当地优美纯净的景观影响了瑞典的现代主义思潮。马克利乌斯(Markelius)别野,凯文格(Kevinge)。图片来自建筑博物馆,斯德哥尔摩(Stockholm)。



图7　孩子们在福莱德豪尔（Fredhäll）的池塘。图片来自 K. W. 格拉斯（K. W. Gullers）。



图 8　公园被看做和设计成单元住宅起居室的延伸。图片来自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



图 9　霍格·布洛姆(Holger Blon)的公园计划能够被浓缩成一张图片,并且具有很强的宣传效果。卡尔·罗德(Kalle Lodén)绘。



图 10 诺尔梅拉史传德(Norr Mälarstrand)在人工环境与自然风景之间创建了一种过渡。图片来自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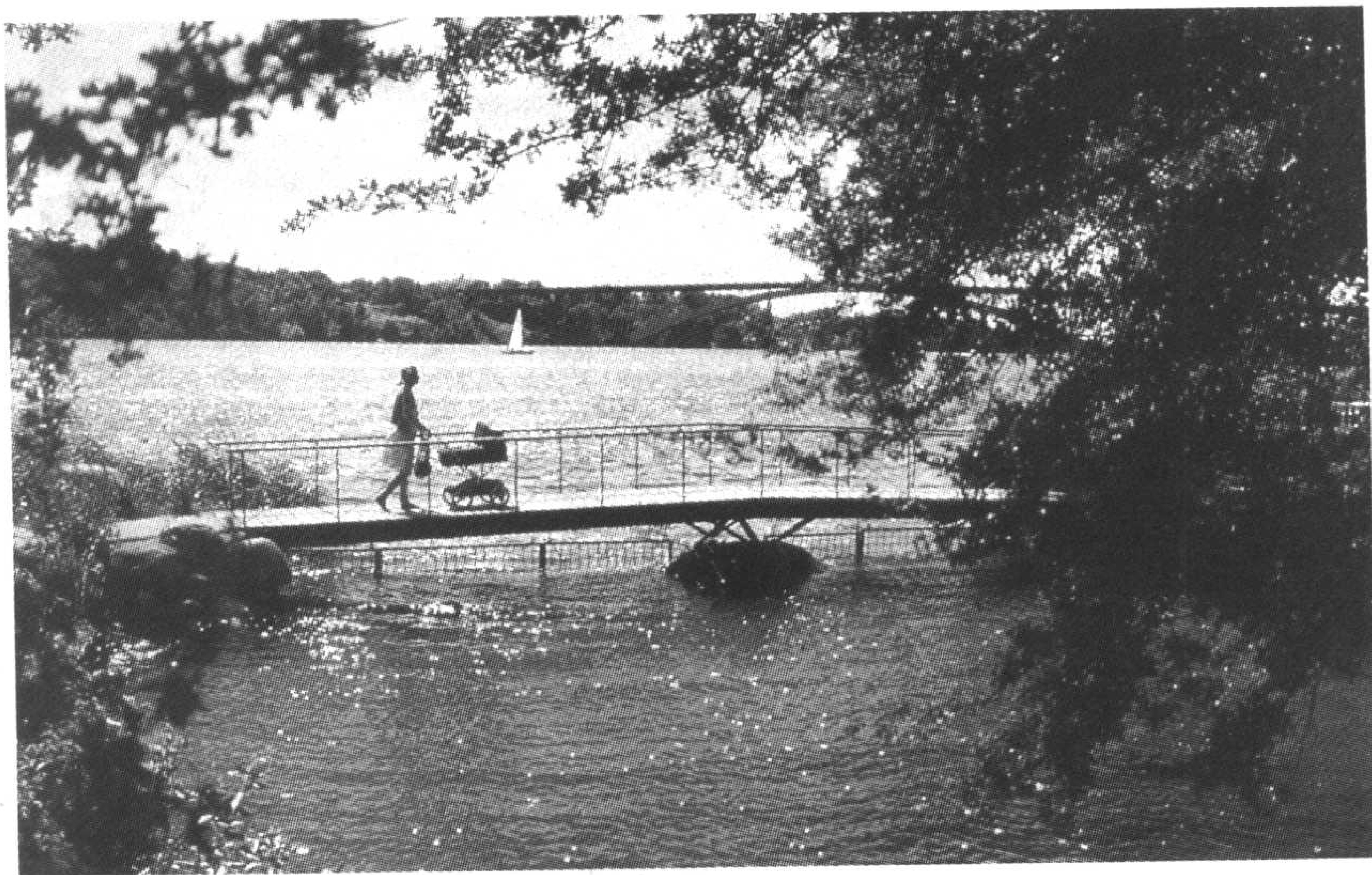


图 11　为了能够欣赏湖的风景，在公园理念中，视野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图片来自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



图 12　这个爬满蛇麻草的小屋，它是一个四周有围栏的小场地，它放置在诺尔梅拉史传德（Norr Mälarstrand）湖滨散步场所中一个没被使用的平坦的空地上。图片来自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



图 13　阳光码头扩展了公园，使之延伸至梅拉伦湖（Malaren）水面上。诺尔梅拉史传德（Norr Mälarstrand）。图片来自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



图 14　为公众生活而建立的露天剧院：音乐会，集会，戏剧表演。图片来自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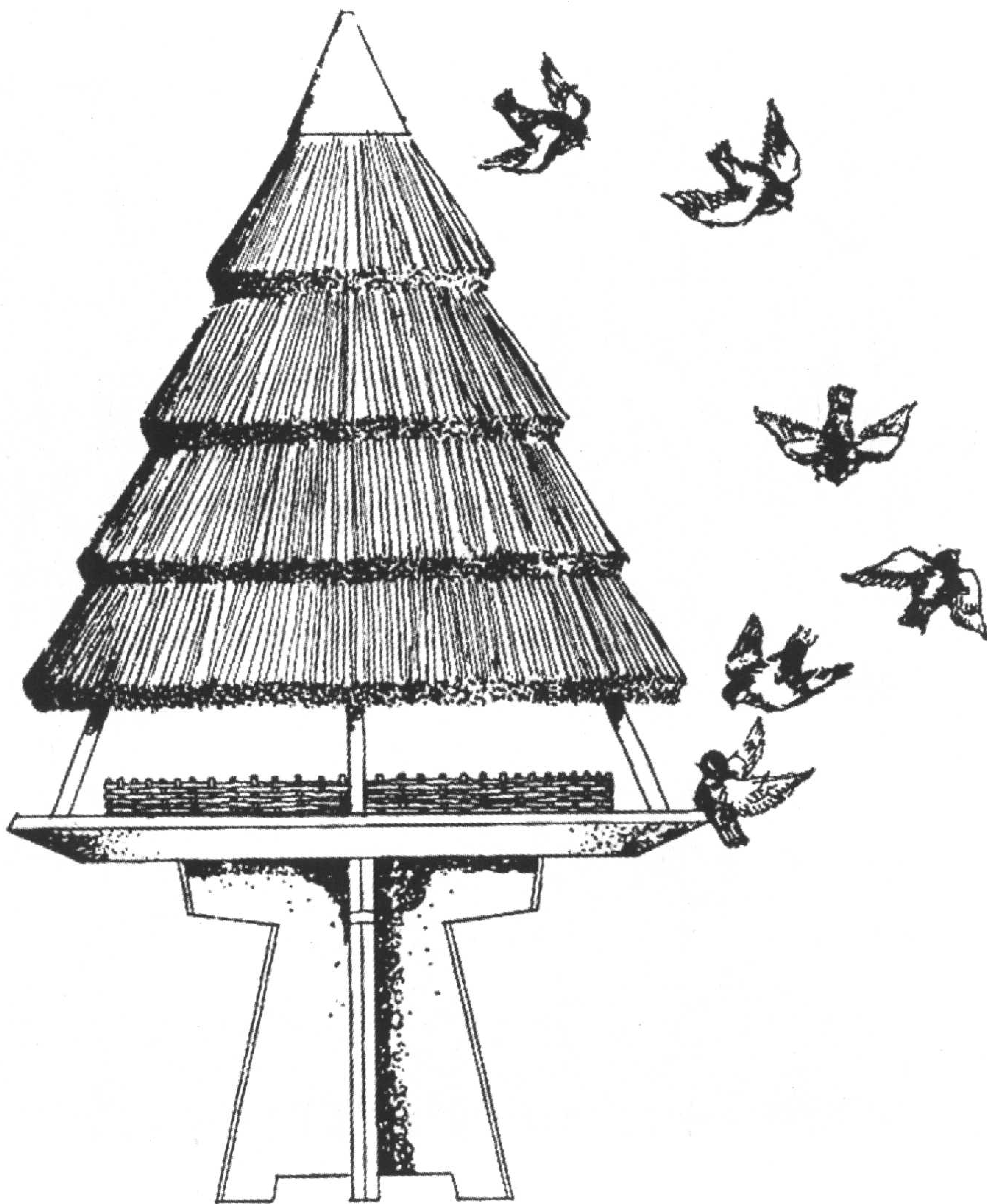


图15 冬季留鸟的进料台。卡尔·罗德(Kalle Lodén)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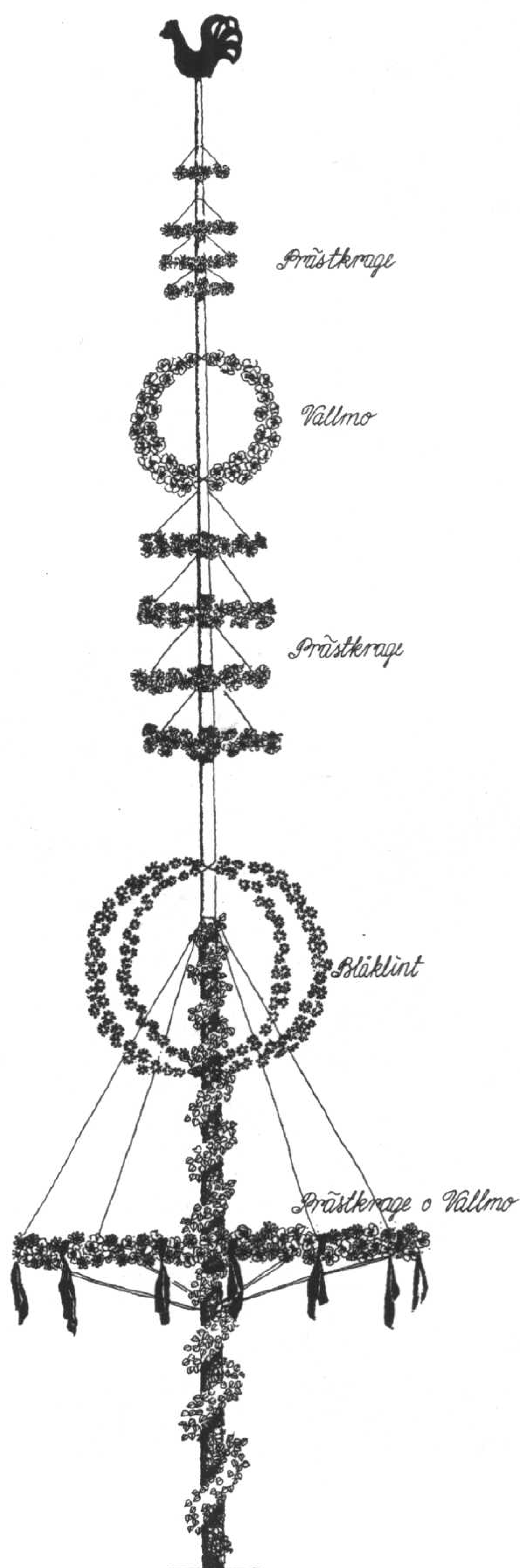


图16　在一年中最长的一天的传统庆典上使用的仲夏旗杆。卡尔·罗德(Kalle Lodén)绘。



图 17　为了使公园整年都有可能使用，设计者考虑到了季节的改变与冬季娱乐。图片来自托布约恩·安德森（Thorbjörn Anders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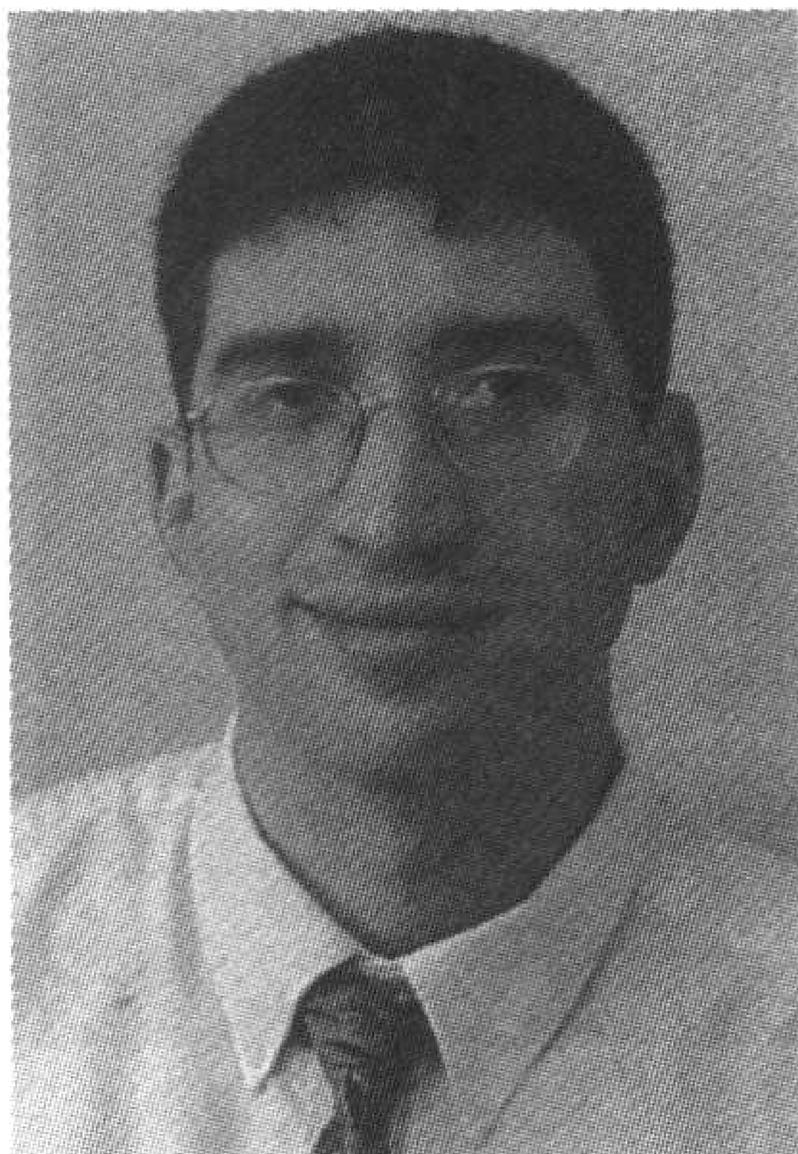
图 18　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空中鸟瞰图。在图中,这个时期所建立的公园被重点突出。图片来自斯德哥尔摩园林局。

(作者单位:瑞典 SWECO FFNS 建筑师事务所)

(陈国雄　译)

园林城市:美国新城镇与景观规划

[美]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Nicholas Dagen Bloom),1999年获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理工学院美国史助教。他的著述包括:《郊区的魅力》(2001年),《幻觉的商人》(2004年)和《墨西哥奇遇》(2006年)。他现在正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撰写一本纽约公共住宅史方面的书。

街道模式经过精心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交通流量;即使是那些不太繁忙的街道也建有地下人行通道。有这样的街道模式作保护,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新城里徜徉。他们可以在溪流涉水,可以在林间探幽,可以在自行车道上骑行,还可以在正规的运动场、秋千、滑道以及完全未加整饬的原野和草地上嬉戏玩耍。

哥伦比亚(马里兰州)与社会的关系
(Rouse Company 1968,4)

马里兰州(Maryland)的哥伦比亚(Columbia)、弗吉尼亚州(Virginia)

的雷斯顿(Reston)和加利福尼亚州(Columbia)的埃尔文(Irvine)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最主要的新城镇,它们开启了大规模环境规划的先河;其规模之大,很少有城镇能再去效仿。基本完工的这三个城镇,都拥有数千英亩的露天保护区、人工湖、自然保护中心、社区园林、大面积经过修饰的植被和利用率较高的公用空地。这充裕而用途广泛的空地不仅仅反映了当初规划方面所作的努力,也是当地居民持续不断行动的结果。这些新城镇有将近五十年的实践作基础,它们就是研究景观规划长期成效的最为理想的实验场所。正如本文指出的那样,"好的"景观规划在有规划的社区里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这个问题,只有在对规划的长期成效进行严格审验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出判断。

19世纪60年代美国新城镇的规划者可能已经设计出了新的景观体系,不过在其他方面,他们只不过回归了美国城郊早期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环境美化传统。美国第一个有规划的城郊——新泽西(New Jersey)的卢埃林公园(Llewellyn Park,1857),其中保存了大量的自然景观,并使之变得更加迷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一些更加出色的城郊如伊利诺斯(Illinois)州的里佛塞(Riverside,1868)、俄亥俄(Ohio)州的夏克黑慈(Shaker Heights,1912),都热衷于保护其境内的自然风貌。不过,以后的大部分城郊,要么没有面积广阔的保护区,要么干脆就忽略了对大自然的保护。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城郊,还是以精心培植的草坪、篱笆、树林混合而成的景观来替代自然区域。对家庭来说,整修过的私人空间,就成了令人愉悦的环境,很少有居民或开发商重视过自然景致。即使是今天的美国城郊,自然环境的保护,也主要集中在富裕的郊区,只有它们才有财力使土地免于公开上市交易(Jackson 1985)。

雷斯顿、哥伦比亚、埃尔文等城镇的设计者不仅借鉴了美国郊区比较好的传统,还借鉴了在欧洲业已成型的园林城市或新城镇传统。对自然景观进行保护的宏大构想,包括建设绿化带的理念,就诞生在这些城镇里。早期的新城镇,例如1903年的莱其华斯(Letchworth)和1919年的卫尔温园林城(Welwyn Garden City),将经过精心美化、供居民使用的公园和园林与大面积的空地(包括自然区域和农田)合为一体。尚未完工的

园林城市雷德伯恩(Radburn,1929),对现代美国新城镇接受立交路的设计理念,以及发展车辆禁行的住宅区(住宅后面有大片绿地和娱乐设施)都有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新城镇,包括1951年的塔皮奥拉(Tapiola)和1947年的哈洛(Harlow),继续留出尚未开发的区域;同时仍然为主动和被动的娱乐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斯堪的纳维亚人(Scandinavian)的城镇,如塔皮奥拉,由于将自然景观和建筑有机地融合到一起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早期的规划阶段,美国新城镇的开发者与规划者对雷德伯恩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不少人还参观过欧洲新城镇(例如塔皮奥拉)。最终,他们制定的计划直接反映了业已确立的新城镇建设的传统——通过精心的景观美化和保留空地使自然环境变得更美。不过,与欧洲的新城镇相比,美国的新城镇一般密度较低(单一家庭住宅居多)(Bloom 2001)。

随着环境保护运动日趋高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新城镇开始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在美国民众中,特别是那些中产阶级,享受自然正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19世纪在自然环境方面努力,促成了城市、国家公园与国家森林的形成,城市居民之所以对大自然青睐有加,原因皆在于此。美国人保存并创造这些早期的园林不仅是为了保护自然资源,同时也是为了它们在文化上的重要性:通过它们,人们追忆美国的伟大之处;坚信大自然能激发市民和艺术家的灵感,并且能使人摆脱城市生活的压力。尽管美国的中产阶级应该为环境的破坏负相当责任,但在环境保护与教育方面,他们也起了很大的带头作用。

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出版,反主流文化的不断壮大,还有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与大自然相亲近的、日益流行的观光旅游,这一切都使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保活动生机勃勃(Rome 2001;Rosenzweig 1998;Marx 1999;Shabecoff 1993)。

环境伦理的出现对新城镇产生了影响,新城镇也吸引了许多将自然环境视为文化资源的美国人。开发者承诺通过对运输线路、当地就业机会和便利的商场进行规划,以减少汽车的使用量。他们还开始将自然保护作为开发郊区居民市场的手段。如果精心的景观规划能为高收入的郊

区居民带来上佳的“产品”，那么可以预料，未来保留地带的销售就能带来更大的利润。

雷斯顿的环境开拓者

1962年雷斯顿(Reston)的总体规划为美国郊区居民描绘了一幅新颖大胆的图景。开发者与规划者将雷斯顿设计成一个极为复杂的、面向成年人的城郊住宅群；它位于弗吉尼亚(Virginia)北部农村(在华盛顿特区之外)，居民将近75 000人，占地6 800英亩。规划人员以新城镇的建设传统为基础，并希望通过使用高密度的单元住宅和城内住宅走廊来界定景观；而不仅仅以单个家庭的住宅来界定。居住在高度集中的住宅里的市民，还有在少量单个家庭住宅中居住的市民，都可以沿着立体交叉、绿树成荫的小径，漫步前往便利而颇具吸引力的“乡村”中心，也可以经由美化过的驾车专用道驱车前往那里。那里不仅有商场，还有银行营业厅、剧院、美术馆、休闲设施和会议厅。通过设计，每个村庄都有一个突出的主题，比如划船、骑马或打高尔夫。著名建筑师最初设计的这些住宅群落极好地反映了早年的建设构想，也反映出其与欧洲新城镇建设运动之间的联系(图1)。

多年来，虽然新城镇的建设发生了一些变化——单个家庭的住宅比最初预想的多，建筑风格比较保守，主题村庄的想法被抛弃；但基本上还是实现了早期的构想(2005年)。大约有56 000人住在雷斯顿，他们享有大片空地。通过在山脊线上建设密度更高的住宅群来为空地和人工湖保留山谷，规划者将此地的自然美景作为一个整体精心地保存了下来。在单一家庭住宅居住的市民有自己的院子；但是，即使住在排屋与公寓集中区的居民也有权使用经由私人美化、由当地社区与众多协会维持的公共区域。与这些私人美化的公共区域毗邻的是许多空地和娱乐设施，它们由市民管理的雷斯顿协会——一个私营的社区管理机构来维护(图2)。

开发者罗伯特·西蒙(Robert Simon)20世纪60年代购入数千英亩

土地,繁茂的森林覆盖着这片土地。雷斯顿协会(the Reston Association)现在仍然管理着这1 100英亩空地上的森林、溪流、湖泊、原野和湿地(图3)。立体交叉的道路让那些散步和跑步的人可以深入到浓阴覆盖的河谷、湖滨和高尔夫球场(图4)。约瑟夫·斯托沃(Joseph Stowers)是雷斯顿社区协会资深的活动家;他与这个独立的市民组织中其他成员一道,为扩大并联接雷斯顿的人行道/自行车道系统而不断奔走呼号。这个系统现在包括55英里长的道路、立体交叉的地下通道和95座桥梁。雷斯顿协会也在空地上给花园留下了地方,这一创新并非原计划的一部分。协会使用了不同的环境管理技巧:用鲤鱼来控制水草,用黄蜂抑制舞毒蛾的虫卵;以大自然自身的变化过程来帮助保护河床;鼓励种植本地的植物品种(Reston Land 1989)。

在开发者的帮助下,协会努力熟悉与鉴赏四周保留下来的自然风景。在20世纪60年代,雷斯顿逐渐形成了一种创新的环境教育计划。被西蒙(Simon)雇请来管理一个自然中心的弗农·沃克(Vernon Walker),从纽约来到了雷斯顿。他曾被培训为一个科学教育者,并在纽约已经与美国户外教育的先驱L. B. 夏普(L. B. Sharp)相识。沃克使西蒙深信:最好的环境教育老师就是大自然本身。1969年,沃克对雷斯顿空地的价值进行了描述:"在雷斯顿,空地的作用是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懂得,不要在漫滩上建造永久性建筑。这就是希望!这地方是用于行走……骑马、孩子们玩耍和其他娱乐活动的。"(Bloom 2001,271)为了照料它们各自的空地和通过散步和其他方式来教育孩子们,沃克帮助现有的两个村庄建立了环境管理委员会。多年来,沃克(Vernon Walker)一直管理这个中心。1982年,五十岁的沃克与世长辞(Rathburn 1987,6)。

1987年,社区创建了沃克自然中心(Walker Nature Center)。有着森林、小径、溪流与野生动物的70英亩土地被奉献出来,用以实现弗农·沃克的梦想;那梦想就是把雷斯顿的空地作为四季皆宜的教育实践之地。这个中心包括穿越森林的小径、一个用于野餐的小亭、开满野花的花园、一片用以静默沉思的地方、户外陈列和一个用来示范的天然草场。1989年,为推动一个范围更广的计划,雷斯顿环境教育基金成立了。在雷斯顿

协会的支持下，基金会现在提出，每年开展 200 项计划，参与者要达到 7 000人。自然教育活动包括学前教育计划、在校教育计划、夏令营、青少年计划、教师研讨会、服务项目、家庭计划、演讲及其他更多的活动（Bloom 2001，271）。

尽管道路系统的负担不大；但由于雷斯顿居民很多，因此道路也很少有空闲的时候。虽然在偏僻的路段，偶尔有罪案发生，而且不少立交地下通道既潮湿又阴暗；不过天气好的时候，还是有许多居民外出，一边散步一边欣赏迷人的自然风光。在自然区域外面，雷斯顿的交通状况已变得越来越差了，因为居民与游客（包括成千上万在办公区上班的人员）为了争夺路面和车位而纷争不断。区内的公交系统已跟不上社区的发展变化，只能勉为其难地为它所联接的不同的商业中心提供服务。日常往返或购物的时候，居民不愿经人行道步行或骑车。就是到附近的乡村中心和学校，他们也要驱车前往。设计者原先希望通过规划设计来改变居民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改变对汽车的依赖；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能实现这一目标。

哥伦比亚丰富的自然资源

1963 年，马里兰州（Maryland）哥伦比亚（Columbia）的开发者詹姆士·罗斯（James Rouse），将他的社区设想成一连串紧密联系的小城镇；目标人口为 10 万，分居多个乡村，每个村庄约 12 000 人。各个村庄都将有自己的中心，在此聚集着银行营业厅、商店、一所高级中学或中等学校、社区活动中心、教堂与娱乐设施。这些村庄被再分成一系列的住宅区，它们类型各不相同。哥伦比亚将以居住区为主，强调以学校和社区设施为生活和社区的中心。在住宅及其他社区设施的周围，未来的居民将会看到一个由布满森林、原野和湖泊的数千亩空地创造的绿色的帐篷。小径和经过美化的车道将蜿蜒曲折地通过这些地带。

尽管计划的结构、规模和细节有些变动，但在很大程度上，社区最初的构想今天还是变成了现实。如果哥伦比亚没有因其景观规划而像其他

城市那样受到广泛的赞许，原因可能是：在城镇建筑风格的确定上，建筑投机商所起的作用比专业的建筑师更大。在一个更大的规划框架内，开发者确立了单元房和住宅的标准样式。与以城镇作为一个整体不同，在住宅这一层面上，设计并未将设计和美化精心地融合为一体（图 5）。

20 世纪 60 年代，哥伦比亚的规划者很少对住宅发表看法，不过他们的确对环境规划情有独钟。他们仔细调查了 14 000 英亩配给城镇的土地，提出了一系列的“覆盖”图，以期最好地保护自然区域：“在有意不考虑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这些覆盖图将诸如森林覆盖区、河道、分水岭等既有的地貌，单独进行清点”，这些地方将作为最终位置图的一部分被保留下来。规划人员“决心保留农田上下起伏的大体地貌，在实际可行的地方永远保留那些森林”。到 1970 年时，规划者甚至已经完成了更加详细的环境规划：“在总体规划中不再采用 5 英尺的等高线，而代之以 1 英尺的等高线；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地貌的切削、填充，在最终坡度确定之前公路必须仔细检测；依据其大小和品种来确定是否保留树木，道路也有可能分作两叉以保护一棵 30 英寸高的橡树。”规划者同意进行文化保护，甚至把比较古老的农庄建筑与乡村中心和其他社区设施的规划融合到了一起（图 6）（Tennenbaum 1965）。

规划理念如此精心细致地关注细节问题，从而使之抛弃了抽象的理念；这些抽象的理念认为一个花园城市中的时髦绿化带可以使城市保持整齐不至于杂乱无序。拟议中的 3 900 英亩绿化带被放弃了，因为规划者认为：“在这片有着三条河谷的土地上，大自然已经进行了更好的规划。”规划人员认为：“每条河谷……都给了这片土地一个天然的界限，并且也能给村庄天然的界限。”此外，到规划人员为所有使用频率较低的区域（包括高尔夫球场、湖泊、公园、骑马道及其他娱乐区）做好规划时，留作绿化带的地方已经都被使用了（图 7）（Hamilton 1964）。

花这么大的力气保留自然原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开发者詹姆士·罗斯（James Rouse）——这位在美国城市事务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想法。他记得 1977 年，在购入这片土地之后，“我们第一次与本县人民进行沟通交流时就对他们说过，我们相信在提供一个人类居住地的

同时，完全有可能建设一个能尊重土地和保存河谷及漫滩的城市社区”。罗斯不仅仅看重自然本身，还非常崇信大自然对人类心灵的积极影响：“看到一只麝鼠游过湖泊，你如何衡量它的价值呢？一只鸣叫的天鹅，它的价值又如何衡量呢？当轻松自然地与大自然亲密相处时，不必费心思量，就能明白那些非凡的事物对人类心灵、精神和思想产生的影响。”罗斯相信环境能影响人们的性格，并且这一观念从未动摇过（Rouse 1977）。

现在，哥伦比亚有些空地已经加以整饬了，然而其他空地仍然是森林和长满树木的河谷。罗斯公司（the Rouse Company）不仅保留了数千株大树，还栽植了成千上万的树木，其中许多树已经接近成熟。美丽清澈的溪流和至今仍然覆盖着社区的厚厚植被，都让人叹为观止。自然区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建筑风格上的平淡乏味，这一点在夏天表现得尤为突出。哥伦比亚协会——这个城镇民营自治的管理机构，维护着 3 400 英亩空地和 93 英里的人行道（包括人工湖泊、数百座人行桥，为数众多的地下通道和天桥）。多数居民要求一年至少使用一次人行道（近来一次调查发现，75% 的人每年要用一次或一次以上）；不过，人行道主要还是用于娱乐，这与规划者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Kellner 2005）。为了保护环境，协会极少使用杀虫剂和化肥，刈草区也比最初的规划小得多（Winieweski 1978，50）。一位全职的生态专家负责空地，并为当地社团的环境教育计划提供正规的指导。协会在湖泊中养了好多鱼（图 8），并尽力对水质进行监控，以便确保“空地适于鸟类和其他野生动物生存”（Columbia Association 1998，8－10）。

过去的数十年里，环境保护一直是协会和居民们优先考虑的事情。1984 年由市民领导的哥伦比亚论坛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反映了开发者和居民们在环保上付出的巨大努力：“就对土地的尊重而言，哥伦比亚为其他地方大规模的开发确立了一个很高的标准。哥伦比亚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是永久性空地；与开发之前相比，这片土地上生存着更多的野生动物和树木。绝大多数水道得到了保护，这对这一地区的美观起到了很大作用。通过哥伦比亚协会、其他州级和地方性组织，包括众多志愿人员在内的共同努力，空地、林木和野生动物得到了保护，从而使富有鉴赏

力的人们可以与之相处。"(Columbia Forum 1984,4) 一个常驻组织——水禽和栖息地顾问委员会——一直留意哥伦比亚的空地,确保生活在那里的动物得到保护。这个委员会还组织人们定期对当地湖泊进行清理;协会成员努力使空地系统免受垃圾的污染。当地的学校、巡视团和环境团体负责各自的计划。虽然哥伦比亚没有像雷斯顿那样的环境教育,但这一情况在未来几年就会发生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地人民的努力之下,帕塔克森特中部野生动物区(the Middle Patuxent Wildlife Area)已经得以建立。

居民们极力游说,希望建立野生动物区,这是霍华德(Howard)县保存空地中最大的一片土地之一。艾尔雷德·盖斯(Aelred Geis)博士与其他居民一道,带头为保护哥伦比亚最后一个村庄里佛山(River Hill)的1 000英亩土地而四处奔走。这块土地上有森林、草地、湿地、河流,还有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人们对这块土地已经作了仔细研究;专业人士和市民提出了八份报告,在报告中他们对这块土地作为空地所蕴含的潜力进行了集中考察。最初的设想是将这块谷地淹没,然后变成一个湖滨社区;不过盖斯(Aelred Geis)说服了罗斯(James Rouse):这块地应该保留下来,因为这里的环境实在太好了。1967 年,有一次察看这块地时,罗斯(James Rouse)"身着一身套装……趴在一条沟渠上观看鸟鹬在飞舞中交配,鸟儿高超的飞翔技巧让他着了迷,他随即宣布不许推土机进入这片土地"。一直到罗斯死的时候,这个保护区都未建立起来,不过这片土地还是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人们还提出了好多计划,呼吁建设林间小道和一个自然中心,从而可以就动植物栖息地方面的知识对社区进行教育(Bloom 2001,273)。

哥伦比亚扩展了初始计划中构想的野生自然区域。保留的自然区域规模巨大,再加上环境保护者积极的行动,这一切使得这个社区与其试图取代的市郊迥然不同。不过,在规划上还是有些瑕疵。林间蜿蜒绕行的小径有时会成为犯罪的场所,而且这个城镇某些地方已经声名狼藉,有些地方的确如此,但有些却是名不副实的。我的印象是,就城镇不断增长的人口来说,道路的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哥伦比亚单调的绿色(以及乏味

的城郊建筑风格)让人很难打起精神,整个社区都是这样。对汽车的依赖和保护区外不断恶化的交通状况,也在影响着社区的生活质量。哥伦比亚也许有由四通八达的道路相连接的学校、商店和娱乐区,但这并不一定会减少汽车的使用量。在交通方面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内部公交系统不胜负荷。88 000 市民和当地办公区数千雇员的汽车所造成的空气及噪音污染极其明显,甚至许多自然保护区也是如此。就像雷斯顿的情况那样,这个计划没有减少美国人对汽车的迷恋。

天堂埃尔文

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的埃尔文(Irvine)市对最初规划所作的改动,比雷斯顿和哥伦比亚要大得多,但这些改动确实加强了景观规划。20 世纪 60 年代初埃尔文公司就开始为 9 万英亩的埃尔文大农场进行规划,在最初的规划中,构想中的大学城有十万居民,分成几个地区,环绕着加利福尼亚大学新的校园。1970 年,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替代了早期的想法,目标人口被提高到 40 万。1970 年,按照这个更富雄心也更雅致的计划,埃尔文被整合为一体。这项规模更大的计划仍将未来的人口分散到几个互不关联的地区,这些地区围绕大学而建;不过现在包含一种线条型的城市风格,这种风格以拥有众多的商业和社区设施为特色。从一开始,埃尔文就被定位为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郊区城市,在这里可以玩乐、工作,还可以学习研究;很大程度上,对现状心满意足的 17.5 万居民来说,那个目标已经实现了。

最早的住宅区以狭窄的“绿化带”、单个家庭以及连在一起的高档住宅、众多的娱乐设施和一种乡村观念为特征,并为后来的住宅确立了模式。与雷斯顿和哥伦比亚不同,城市设计技巧被用以将各个乡村区分开来。埃尔文的规划者对规划理论家凯文·林奇(Kevin Lynch)非常感激,因为他鼓励规划人员集中精力考虑人们的实际生活需要,反对他们只是抽象地考虑城市的形式。举例来说,具有多重功能的乡村中心,在雷斯顿和哥伦比亚可能是规划的核心所在,但在埃尔文却无足轻重。埃尔文的

乡村中心只是精心设计的购物中心,没有其他新城镇里构想的那些多元功能。不过,就美化、规划和建筑风格来说,埃尔文的乡村主题更加鲜明。

林奇(Kevin Lynch)强调"边界"、"道路"、"区域"和"地标",这些明显的特色贯穿了整个埃尔文。有些埃尔文的乡村面朝海洋,有些面向内陆丘陵,还有些则对着大学。宽阔的街道确定了乡村之间的界线,主要的交通环绕着较小的区域。一个村庄可能具有地中海风格,而另一个则在细部上具有教堂风情。不像雷斯顿和哥伦比亚的大部分地方所做的那样,埃尔文公司还特别注意使用建筑师来处理大多数项目,而不是依赖于那些只有一成不变的计划的建筑投机商。

为了突出城镇的主题,花草树木的栽植也经过全盘考虑:棕榈树适合于地中海风格的村庄,悬铃树则用来美化其他风格的村庄(图 9)。城镇一位主要的规划者承认,"景致比建筑物更重要"(Watson 1998)。雇来的设计人员像修正调色板那样对环境进行修整,以突出村庄的特色,使之更加美丽。虽然在市民的压力下,自然保护区被预留,但它们并不是住宅规划的主要部分。相反,在哥伦比亚和雷斯顿,充裕的自然植被和水体与野生区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东部新城镇的开发者为区域内的道路和周围的美化预留了大片空地。

不过,埃尔文公司建设了很有吸引力的、适于行人步行的绿化带(狭长的空地),这些绿化带穿过绝大多数住宅区。与哥伦比亚、雷斯顿的空地相比,埃尔文的空地比较狭窄;不过,它们还是给居民提供了优美的风光,也给孩子们提供了漫步、奔跑、溜冰的地方。因为这些绿化带贯穿居住区,并且许多住宅视线良好,居民们能轻易地监管到绿化带,这一点比雷斯顿和哥伦比亚的林阴道强。埃尔文绿化带无数的花草树木助长了城镇的奢华;这一地区本来雨量就十分稀少,现在却需要大量地使用水资源(图 10)。70 年代末期,埃尔文大农场水区启动了一项"水资源全面管理计划",所有污水都要循环利用,用来浇灌绿化带和农田(Scott and O'Donnel 1980,11-36)。

在 1970 年雄心勃勃的城市计划中,人们的确试图以多用途的城市走廊将一些不同的乡村和绿化带联接起来。这条多功能走廊,像一条多功

能的束带,沿着在城市里迂回绕行的排水渠前行;因为其多功能,所以特别引人注意。规划人员将这些走廊看做是未来的威尼斯运河,可以用来作为“骑马道、自行车道、人行道与娱乐休闲中心”。这条活动走廊现在被赋予了包括商店、社区中心、学校、机关和教堂在内的多种用途,不过只有自行车道、排水渠、线型道路系统这几样用途是一致的;它既不符合最初设定的标准,也未反映出对城镇其余部分的景观的关注(Bloom 2001,62)。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埃尔文公司继续增添新的村庄。埃尔文的规划者仍然用景观美化突出新的住宅区,他们还增加了更容易监控的道路系统、较小的公园和丰富的娱乐场所。

过去的三十年里,为了使自然区域变成社区更大、更持久的一个部分,埃尔文的居民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埃尔文公司为绿化带保留了空地,还将一个尘土飞扬的农场改造得繁荣宜人;但它未开展像哥伦比亚或雷斯顿那样规模宏大的环保计划。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社区和公司现在已经达成了协议。虽然埃尔文公司方面经常不大愿意合作,但由于缓慢增长的环保运动,社区还是从农场最初的 9 万英亩土地中成功地保存了 4.5 万英亩荒野。这种对原规划所作的根本性的变动,使埃尔文的环保规划与其他新的城镇保持一致——甚至有可能超出了其他城镇。

20 世纪 70 年代初,社区居民通过批准建设公园和自行车道,开始扩大对空地的保护。由有着显眼标记、沿大路而行的小径和一些立交路共同组成的自行车道系统,贯穿了整个城市。到 1988 年,这个城市已创建了 1 000 多英亩的公园空地和 900 多英亩的保留空地。他们还在远离市中心的海龟岩公园(Turtle Rock Park)启动了一个自然教育计划。居民们的行动也证明了,将大农场一批旧的农业建筑再次加以适应性利用是很有作用的(City of Irvine 1998,18)。

1989 年,在把开发转向城市其他地方的同时,城市同意对城内与城外未加开发的 9 500 英亩土地实行保护。埃尔文公司、周围的自治市和埃尔文市,都对一项非同一般的方案表示赞同,那就是埃尔文市和周围的自治市无偿获得大量空地,公司放弃对某些地段的开发;作为交换,可以在别的地方扩建更高密度的住宅和工业区。这项方案现在已经扩大到保

护以前属于农场所有的约44 000英亩土地，这也同时包括在北部丘陵的主要区域，甚至包括水晶湾州立公园“3.2英里风景怡人的太平洋海岸”。大部分保留地位于农场南北两端之间一块保留空地上，这由自然保护区和州及当地政府管理。管理内容包括恢复土生的动植物、空地的长期规划、观光游览安排等。如何将管理延伸到这些空地，谁来管理它们，空地到底是什么性质，这些问题尚待解决（Bloom 2001，275）。

保留区其他的地方，如纽波特白克海湾（Newport Back Bay）、水晶湾州立公园（Crystal Cove State Park）、彼特斯山谷地方公园（Peters Canyon Regional Park），还有原野公园（Wilderness Park），都已经是保护系统的一部分。以水晶湾来说，它对公众开放，有极好的海滩、悬崖、田地和丘陵。对周围的社区来说，保留区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因为它们不仅给人们提供了小憩的场所，让人们受到文化熏陶；还让人们想起被埃尔文大农场的发展、美化所取代的沉闷荒凉而崎岖不平的景观。没有这些保护，早期的自然风貌就会完全消失掉。

在自然保护和交通方面，埃尔文存在的问题与其他新的城镇一样严重，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埃尔文的办公区成了南加利福尼亚重要的工作中心）。这里没有像雷斯顿和哥伦比亚那样的内部公交系统，奥兰治（Orange）县的公共汽车也很少到这个社区里来。便利的学校、商店和社区设施，主要是那些驾车来的人光顾。自行车道到处都是，但是实际上很少看到有人使用。小汽车主宰着埃尔文的道路。其他新的城镇也是如此，环境伦理并未明显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

新城镇的启示

经过差不多五十年的发展，新城镇给那些寻求规划市郊或远郊大片区域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规划经验。在所有这些社区中，大自然都是多数居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新城镇引人注目地将城郊的传统特点融入林木繁茂的美景之中。越来越多的活跃的居民既欣赏经过整饬美化的社区，也喜欢社区中自然野生的区域；许多人还寻求对这些区域进行扩展改

进。开发者和居民给城郊景观增添了新的元素,这种元素通常保留在偏远的公园和森林里:这是一种充满野趣的、从城郊常见的秩序井然的园林体系中解脱出来的感觉。对空地的投资和精心规划,使这些空地变成令人神往的城镇;同时也给开发者带来了可观的回报。

从景观规划的角度来看,新城镇提供了不少虽然简单但很重要的启示。首先,从本质上来讲,保留空地并不比进行特定的景观美化更加重要。片面地考虑土地的面积(超出科学的生活环境规划之外),可能并不比居民如何保护、维持和利用土地更重要。这一点看上去似乎显而易见,但许多规划者至今仍然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埃尔文的居民大概比哥伦比亚和雷斯顿的居民从邻近的空地上所获更多。贴近埃尔文住宅区的空地被精心建设成安全的娱乐区。很少有人担心,这些经过美化的狭长的绿化带会与自然空地不相协调。住宅到空地之间的良好视线,可以使人随时监控到绿化带。诚然,埃尔文也有自然区域,但这些区域与村庄截然不同,要么是州立公园,要么就是不得随意进入的生态园。景观规划以及不同的景观色彩的运用,首先是为了给(遍及广大区域的)埃尔文的社区定位,在此基础上使各个社区各有特色。

在雷斯顿和哥伦比亚,较大的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偏僻河谷,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区域(对那些寻求宁静安谧的人来说,这些地方也令人心旷神怡);不过那些区域也是易发生危险、易出现不法行为的地方。从人口规模、住宅联合体与自然空间结合的紧密度来说,空地的利用率还是很低的。未开发的自然和田园牧歌式的城郊风景,似乎与困扰今日美国城郊的安全问题不相协调。不过,一个社会越是较少受犯罪、诱拐、少年犯罪问题的困扰,市民居所周边的自然区域也越少威胁。

城市设计无助于增加雷斯顿和哥伦比亚的安全感。位于浓阴遮蔽下的立交路和(或)单独的道路,从步行安全的角度来说合乎需要的;但是实际上,在一个警力比较薄弱的自然环境里,这却是根本无法接受的。埃尔文只有极少的地下通道,地下通道的稀少是埃尔文具有安全感的一个因素。哥伦比亚和雷斯顿的地下人行道通常阴暗潮湿,对个人安全构成

了潜在的威胁。即使在道路和地下通道上很少发生袭击行人的事件，这些道路的结构也让居民们不敢去冒险。未来的设计者必须找到更富创造性的方式，将行人和汽车隔离开来。鉴于这些城镇里居住着这么多的居民，加上保留空地使之免于开发的成本，雷斯顿和哥伦比亚的道路系统在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上似乎所费不值。举例来说，像运动场这样用得较多的娱乐场地，负荷就太沉重了。

虽然人工湖对于提升这些地区的价值、使之更加美丽是有益的，但在雷斯顿和哥伦比亚，高质量地维护这些湖泊是非常困难的。淤泥和超营养物质损害了水质，费用的高昂也使补救措施捉襟见肘。这类问题——水坝损害新湖泊下面溪流的水质——也被提了出来。不过，在未来的城镇里不建湖泊是不明智的。在所有这些新城镇里，不管湖水质量如何，最受欢迎的道路就是环绕湖泊的道路。水体还给街区提供了欣赏风景的好地方，湖滨住宅仍然是受人青睐的抢手货。在社区协会的规章制度里，支持协会负责照管湖泊的法律机制本应该产生良好的效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由埃尔文城来承担这一职责。埃尔文在伍德布里奇（Woodbridge）的湖泊并非那么“天然”，因此得到了较好的维护。它有坚硬的水泥或石头边界，与周围环境也没有明显的生态关系——就像一个硕大无朋的游泳池——作为一个娱乐设施它反而更有魅力。

在维护美化空地方面，市民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正是所有这些社区的特点；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帮助保护、扩展了空地。有组织的清扫、自然教育以及为改善环境而进行的游说活动，这一切在空地保存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在雷斯顿和哥伦比亚，民营社区协会管理着空地，它们的支持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埃尔文的市政当局和当地社区协会非常注意公用空地和环境方面的问题。

一旦市民们把空地看成是他们共有的财产，那么土地也会得到持续不断的维护，甚至被竭力美化。社区协会共同持有公共财产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空地能够得到保护，甚至在房地产市场过热时也是如此。人们曾经认为有些土地将永远荒凉、价值低微；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全美的私房屋主，都狂热地购入并开发这些土地。但在上述城镇并未

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这些空地的规划中，唯一重大的缺陷应该是空地对外界的排斥。因为这些城镇中多数地方，从理论上讲是属于社区协会所有的“私有”地，其他城镇的居民未能普遍加以利用，它们也未对外做过广告宣传（并且不时有标示宣称这些地方仅供社区居民使用）。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人口密度很大，而空地的利用率却相对很低。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利用率低也有助于保护这些地方生态的完整性。

最后，规划者希望，环境伦理要越出自然区域的范围，并成为重整美国人民郊外生活这项更加雄心勃勃的活动的一部分。在所有的城镇里，规划者可能已经提供了高速路、购物中心、小胡同和泊车的地方，但他们还是努力使购物区和学校建在通过立交道步行或骑车即可前往的范围内。自然形成的小路，将成为学生、购物者和运动员日常路线中的一部分。开发者甚至将其他的创新用于促进新颖别致的环保实践。在哥伦比亚，规划人员设想让一辆往返巴士，在其特定的轨道上在城镇里快速穿梭。即使当实践证明这一系统代价太高而放弃使用时，当地社区协会还是使内部公交系统在乘客稀少的情况下保持运营了几十年。雷斯顿那些理想主义的长期居民发展形成了自己的内部交通系统和通勤公交服务；多年来，这些服务深受居民的欢迎。埃尔文市政当局开创了引人注目的自行车道路系统，这一系统延伸至整个城市。

不过，这些创新对汽车使用的影响仍是微不足道的。1976 年，规划人员柏比（Burby）和威斯（Weiss）发现，虽然生活在新城镇的居民比生活在传统区域的人们更多地使用公交系统，但“社区居民绝大多数还是乘自己的汽车上班、去便利店、超市和购物中心”。生活习惯里唯一看得到的变化是，孩子们通过小道步行去上学（Burby and Weiss 1976，28）。随着时间的推移，汽车的主导地位有增无减，这一点在最近一份研究通勤者行为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Forsyth 2005，267 - 268）。少数对此忧心忡忡的市民试图寄希望于早期规划者所做的工作，他们支持开辟道路、发展公共交通和多重功能的新社区；但是即使是他们也未能使强大的生活习惯出现明显的改观。像新城镇生活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设计与服务并不

一定总会引起人们行为方式的变革。

参考书目

[1] Bender, Thomas. *Toward an Urban Vision: Ideas and Institution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2] Bloom, Nicholas. *Suburban Alchemy*: 1960*s New Tow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Bloom, Nicholas. *Merchant of Illusion: James Rouse, America's Salesman of the Businessman's Utopia.*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4] Burby, Raymond and Shirley Weiss. *New Communities, U. S. A.* Lexington,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976.

[5] City of Irvine. "Irvine Community Services", 1998.

[6] Columbia Association. "The Columbia Association", 1998, Columbia Archives.

[7] Columbia Forum. "A Planning Process for Columbia", 1984, Columbia Archives.

[8] Forsyth, Ann. *Reforming Suburb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9] Hamilton, Wallace. "The Physical Plan", Howar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ompany, 17 September 1964, Columbia Archive.

[10] Jackson, Kenneth T.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 Kellner, Barbara (Director, Columbia Archive).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11 November 2005.

[12] Marx, Leo.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Olsen, Josua. *Better Places, Better Lives: A Biography of James*

Rouse, Washington, D. C. , Urban Land Institute, 2004.

[14] Rathburn, Robin. "Nature Center Opens in Reston", [Reston] *Connection*, 21 October 1987.

[15] Reston Land Corporation. "Reston", ca. 1989, George Mason Special Collections.

[16] Rome, Adam. *The Bulldozer in the Countryside: Suburban Sprawl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 Roslenzweig, Roy and Elizabeth Blackmar. *The Park and the Peopl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18] Rouse Company. "Youth in Columbia", *Columbia*, September 1968, Columbia Archive.

[19] Rouse, James. "The Value of Wildlif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Urban Community", 18 June 1977, Columbia Archive.

[20] Scott, Louise and Frank O'Donnel. "Irvine: Ten Years into a Fifty Year Plan", *New Worlds*, April 1980.

[21] Shabecoff, Philip. *A Fierce Green Fire: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3.

[22] Tennenbaum, Robert. "Planning Determinants for Columbia", *Urban Land*, April 1965.

[23] Watson, Raymond. Interview by the author, 18 November 1998.

[24] Winieweski, Kay. "Water Quality in Columbia's Lakes: A $ 40,000 Question", *Columbia Flier*, 2 February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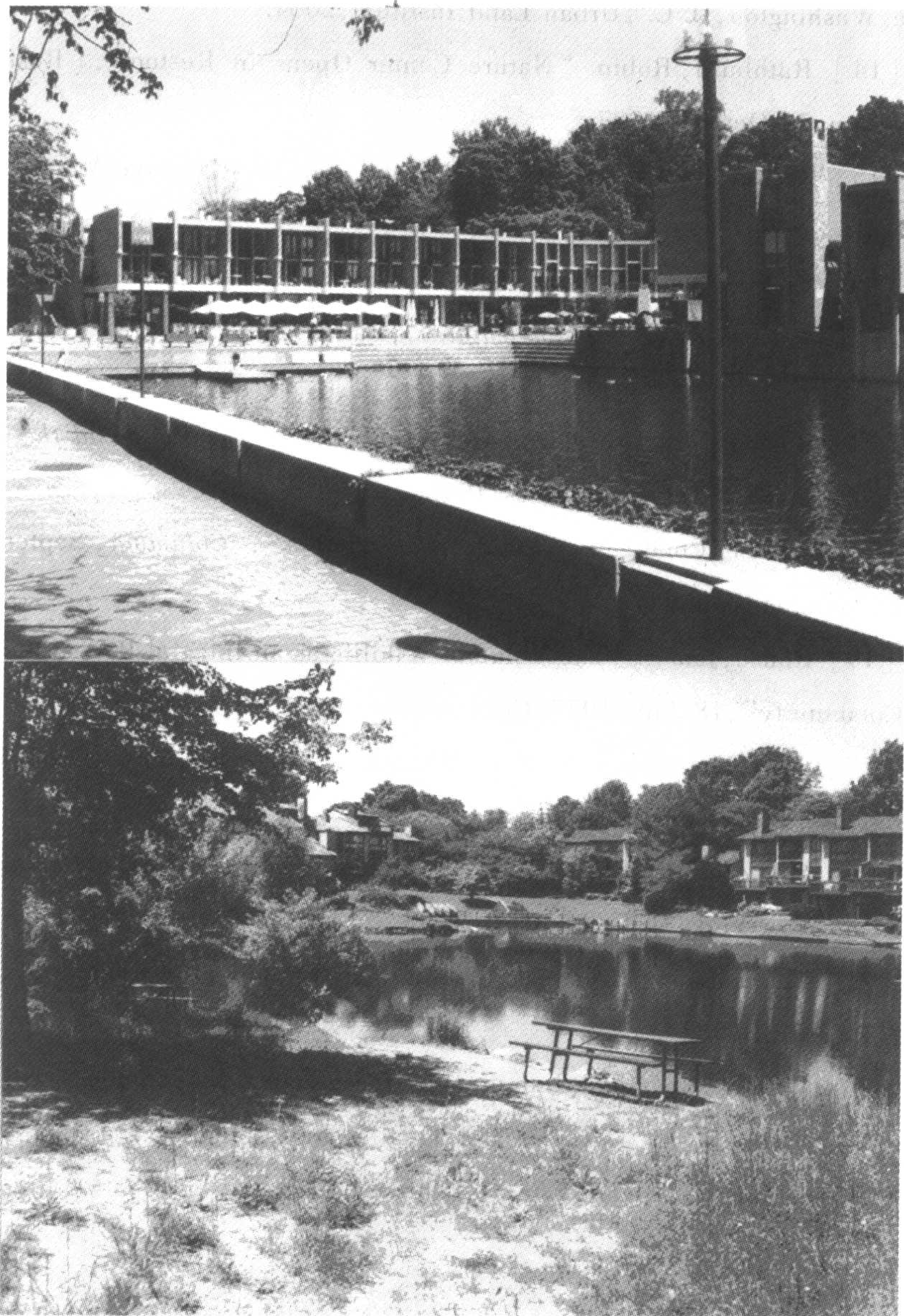


图 1　这些图片表现了雷斯顿(Reston)景观设计风格的多元化。大体模仿地中海港口的莱克·安妮村庄中心(上图所示)反映了早期开发者们的主题设想。湖景(下图所示)反映了更典型的雷斯顿(Reston)的湖泊模糊的边线。图片来自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图 2　深入至雷斯顿(Reston)森林深处的道路系统(上图所示)。雷斯顿(Reston)保存区域中的一处草地(下图所示)。图片来自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图3　体现了雷斯顿(Reston)的空地的地图。图片来自《雷斯顿(Reston)的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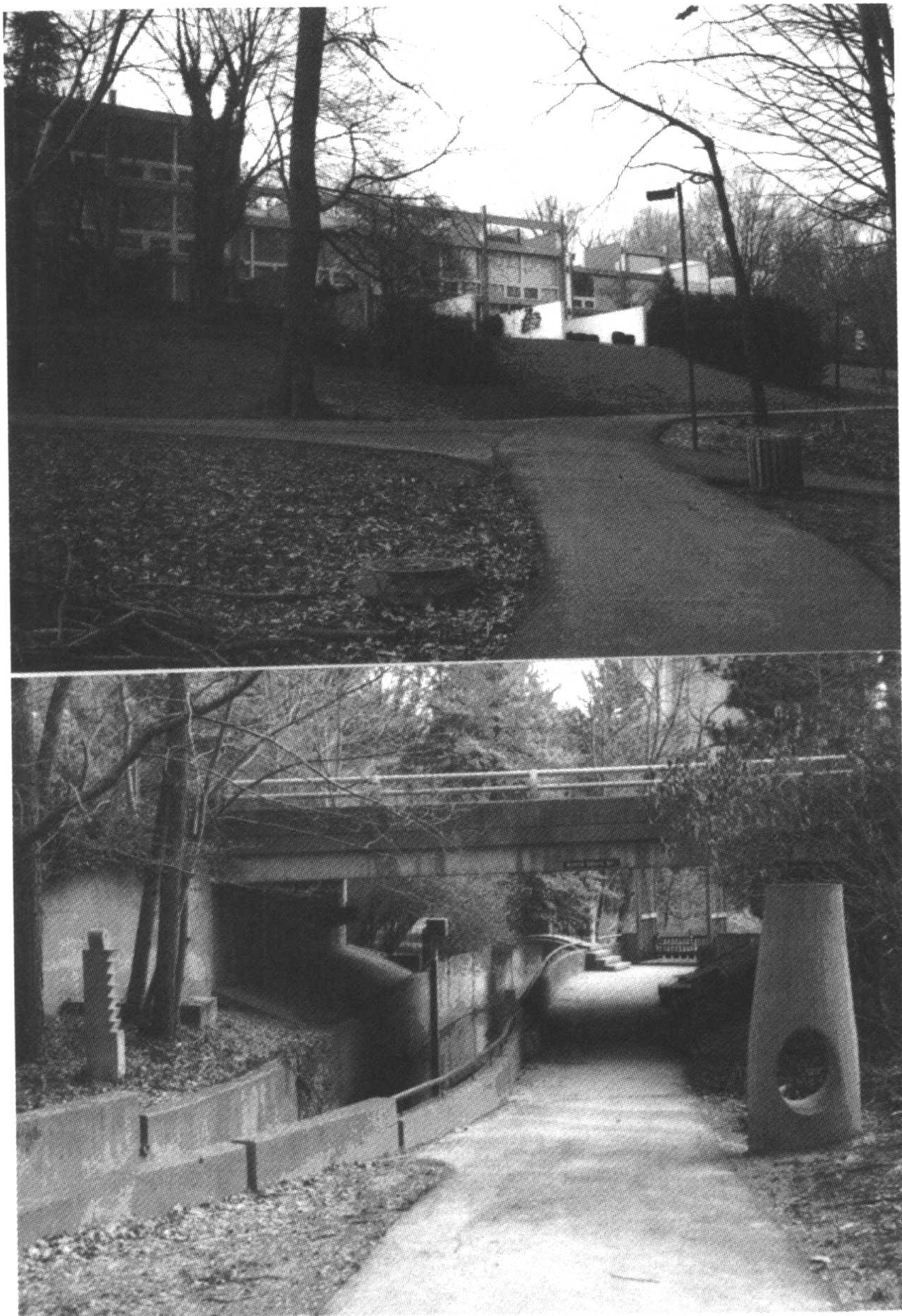


图 4　上图展示的是一个古老村庄里的现代多用户住宅,众多协会的土地与社区空地在此交汇。下图展示的是雷斯顿(Reston)一个比较古老区域的地下通道以及公众艺术品。图片来自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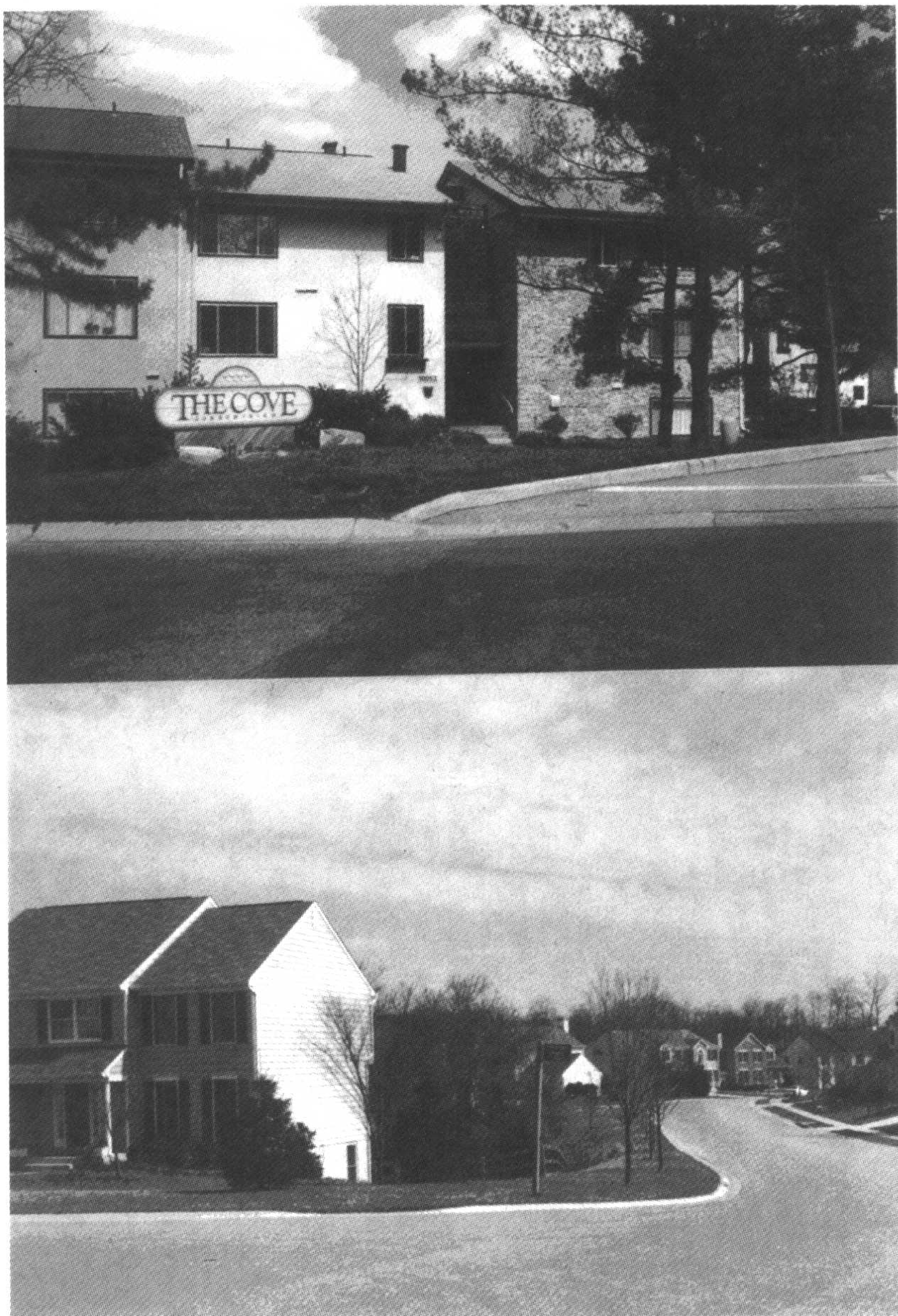


图 5 这是哥伦比亚(Columbia)的典型建筑,它体现了在大部分居民区常规的设计方法。通过多户家庭的住宅群(上图所示)与单个家庭住宅群(下图所示)的开发,空地交织在一起。图片来自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图 6　一个位于哥伦比亚(Columbia)比较古老的谷仓建筑被重新使用,现在它被用做宗教设施。图片来自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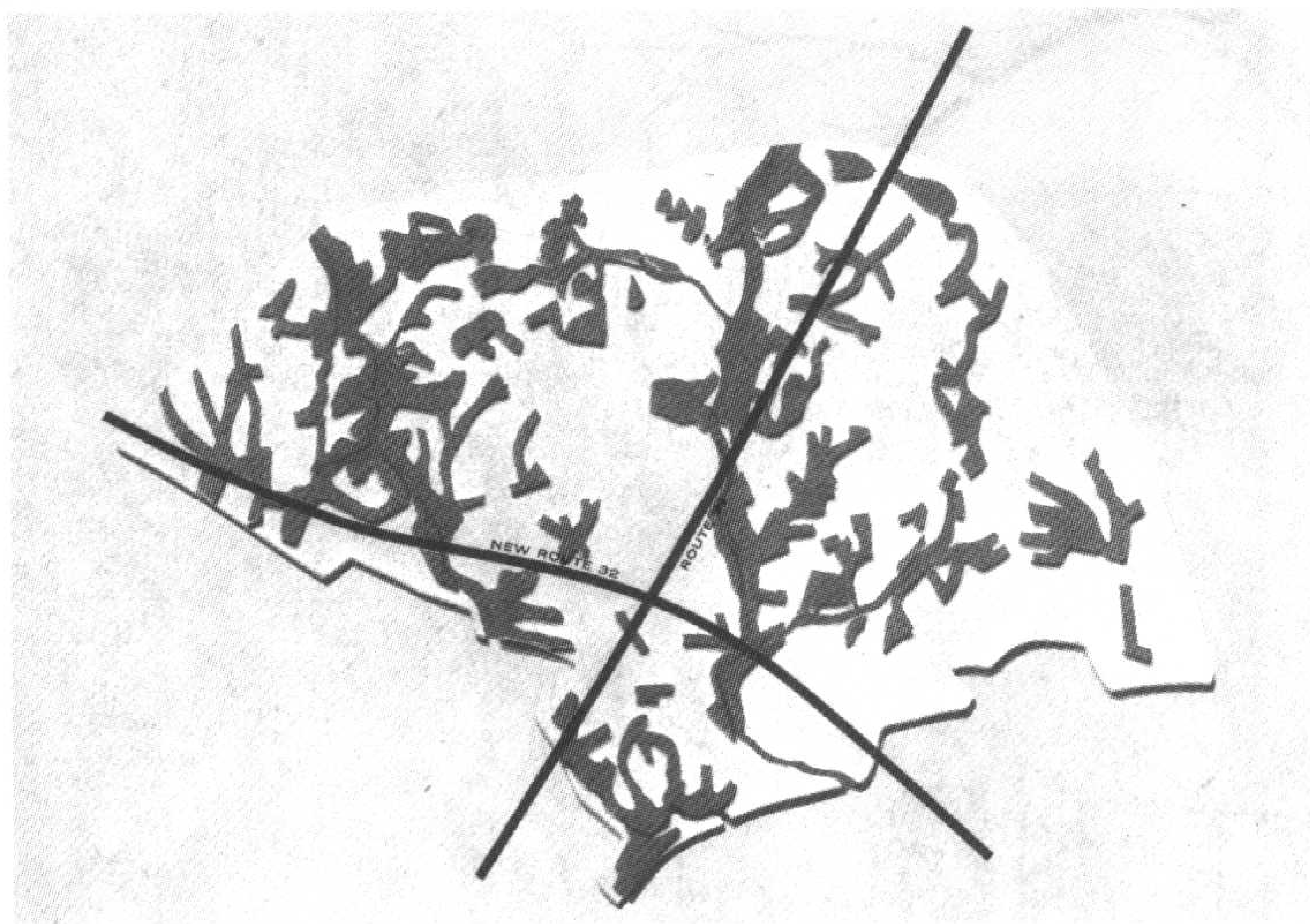


图 7　一张早期规划时期的地图,它体现了在哥伦比亚(Columbia)境内对溪谷与河谷的保存。图片来自哥伦比亚(Columbia):《一个新城市》,罗斯公司,ca. 1969。



图8　哥伦比亚(Columbia)境内的湖滨地带体现了湖泊周边模糊的边线和建筑物与水的结合。许多湖泊的水质都存在问题。图片来自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图 9　在埃尔文(Irvine),两个村庄通过主题景观规划能够彼此区分。这种形成对照的规划风格(包括景观要素与体系结构)为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一个定位。图片来自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图 10　在埃尔文(Irvine)的村庄里,精巧的景观美化设计使得污水循环利用成为可能。图片来自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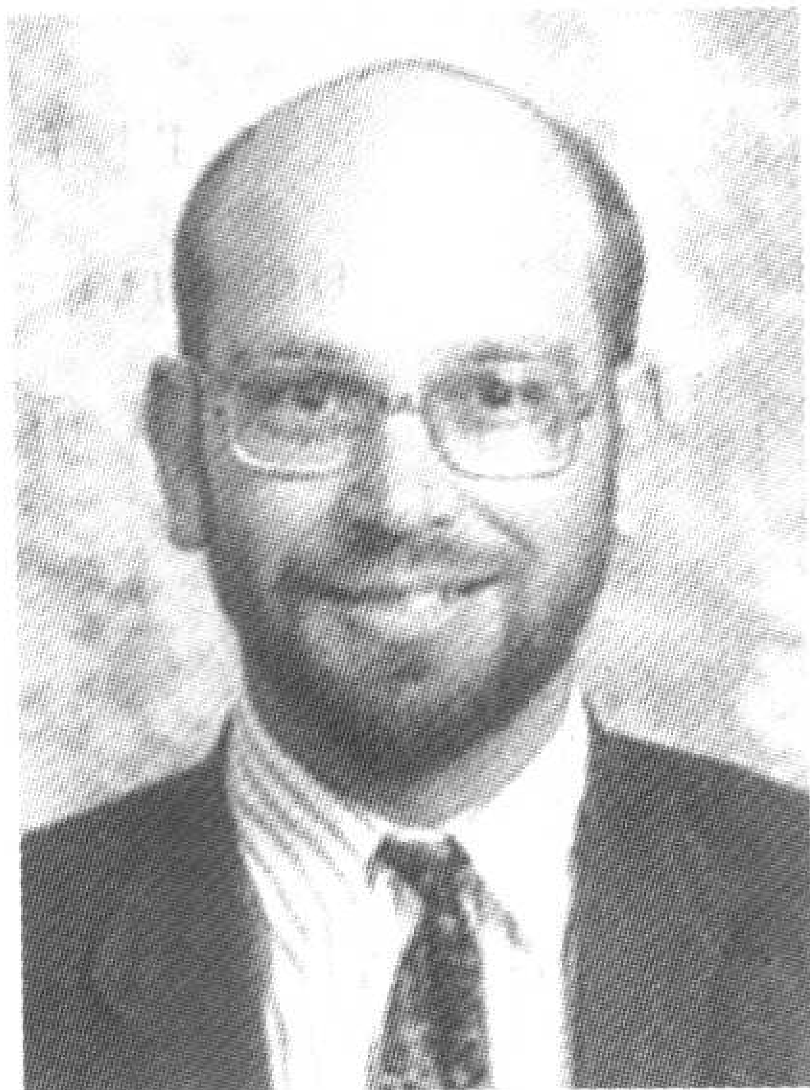
图 11 在埃尔文(Irvine),线型的市区走廊沿着排水渠成行。尽管它包括骑马道与人行道,并且对城区而言,具有多种用途;但还是没能实现最初的理想。图片来自尼可拉斯·达根·布鲁姆。

(作者单位:美国纽约理工学院)

(陈国雄 译)

北京：迷失于转型之中？

[美]埃里克·J. 赫吉拉



埃里克·J. 赫吉拉(Eric J. Heikkila)，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和SPPD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主任，太平洋地区都市发展协会的创办者之一并任该协会执行秘书。他的研究集中在探讨影响城市发展的经济、文化、历史和地理等因素方面，特别是在东亚的背景之下。在方法论方面，他最近撰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城市模糊集合(fuzzy urban sets)的概念及其应用。

摘要：

本文是对三种假设的深层挖掘：

1. 城市的物质外型是一个媒介，文化通过它传达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最恰当的，(这个媒介)对于语言暗喻来说，也是如此。

2. 北京胡同群和庭院房屋构成一种语言形式或是习性，内在地传递与表达着传统文化。

3. 随着胡同群被日趋现代化的城市形式所取代，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正逐步迷失在转型之中。

本论文之独特之处是假设一个语言学的理论框架,以此来分析发生在北京城市形式上的变化,也只有在语言模式下才能确定源语言中提到的一些重要事情。从这个角度看,转型问题立即、自然而然而又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

致谢词

基于对这项工作的早期描述的极富帮助性的鼓励以及极富洞见的评论,作者在此感谢米歇尔·柯南(Michel Conan)、吴良镛、毛奇智、安德鲁·李(Andrew Li)、大·马色 (Dan Abramson)、崔相哲(Sang-Chuel Choe)、吉尔·李姆(Gill Lim)、杰弗雷·科迪(Jeffrey Cody)、鸠山由仓(Yukio Oguri),约翰·科特尼(John Courtney)、孟晓晨、格伦·西福(Glenn Shive)、克雷格·坎宁(Craig Canning)、马丁·理(Martin Krieger)、特迪·班勒吉(Tridib Banerjee)等。作为作者,本文内容由我一人负责。

导　言

在来势汹汹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北京正经历着迅速的转型。这次转型的广度和特点意味着,北京正在被取代。城市的古典外形特征,即那由传统的小胡同群和封闭的四合院房屋围绕的豪华的帝国结构,凭什么由像亚特兰大或达拉斯这些代表着现代意象性的建筑形式的城市所取代呢? 在城市改造的进程中这种紧迫感变得日趋明显、易被察觉,尤其是随着北京作为东道主的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而带来的对北京的设计工作的即将开展,更加突出。

在第一章是验证在这个转型中是否有一些东西不可挽回地遗失了。理论的模型 I 是适用于这个目的的,它受语言学的启发,尤其是乔姆斯基的天赋语法观点,乔治·斯丁(George Sting)的体形语法环境和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习性概念能明晰地说明。语言视角的明显优势是在意义传递中组织语言。而且我期望这个理论模型能够展示它广

阔的应用能力。在这里我把北京的胡同群作为特殊案例来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这种独特的有“胡同话”[1]的特点的城市形式构成了唯一能表达中国文化内在方面的一种特别性的语法或者习性。不是所有语言都同等地适合表达所有方式；以北京为例，它面临着的由日趋现代化的城市形式取代北京胡同群的置换，正迅速而悄无声息地表演着原始的哑剧。

我继续探讨三种相关联的假设：

1. 城市的物质外型是一个媒介，文化通过它传达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最恰当的，（这个媒介）对于语言暗喻来说，也是如此；

2. 北京的小巷和四合院聚落体现了一种语言形式，内在地传递与表达着传统文化；

3. 由于胡同和四合院被日趋现代化的都市形式所取代，北京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转型之中彻底迷失。

这个探讨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一个更正式的重申，即将城市比成一篇文本的都市方案，这在城市规划理论中得到了普遍的阐述。另外，我将在特殊案例研究的背景下揭示语言暗喻是如何来进行的，这个背景即北京传统的庭院胡同和邻近社区。

第一种假设：物态化城市形式的语言

将城市视为语言

城市符号学

城市规划文献已作为原始文献，对城市和城市所固有的语言特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巴尔特（Barthes）那里我们可以得知：

> 城市是一种阐述……这种阐述是一种真实的语言：城市与它的居民对话，我们仅仅是居住在其中，漫步于其中，匆匆一瞥，就可以与我们的城市交流。[2]

巴尔特的引文是城市的符号学领域的象征，或者是在一个城市背景下，对于作为表意的符号象征的研究。然而，符号学与语言的联系是明晰的，但与紧凑语言结构的联系却不是。如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 2000,3)所声称，符号学像其目标要求一样，有一系列的阐述——“这种阐述是一种综合的、公开可观察的产物，它依赖于文化进展的过程，尽管一个人不能推测出他所承认、使用或发展其思想意识的存在(这正是我强调的)”。

巴尔特关于在城市中漫步的文献也启发了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s 1984,97)的通俗演讲艺术理念:“散步是对于城市系统(正如演讲艺术对于语言和陈述)的声明……散步的修辞学……关于散步的长诗掌控着空间的组织。”通过强调对散步的修辞方面，德·塞都指出了在语言系统(在一个我们特定设置的长诗空间里)和演讲艺术自身之间的区别。引起德·塞都的兴趣的不是空间形式的繁缛的文法，而是个体如何选择措辞，以在充满变数的一切即定的遵循原则系统里如何表达他们自身。当然，即使是最具风格的、阐明最清楚的策略也会被包含它们的语言结构所塑造。[3]

模式语言

在城市规划学中另一个联系城市形式和语言的是图案语言，这由克里斯托福·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 1977)提出，但是由应用数学家尼克斯·塞林加罗斯(Nikos Salingaros 2000)给予最明晰的定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图案代表了一些抽象的东西，如同图表里的节点，是语言把节点连接起来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框架，如图1所示。

有人猜测，图表中对节点的一些模糊翻译就是对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一个概括性表现，这对于克里斯托福·亚历山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抽象水平在广度上增强了本身潜在的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它引发了在任何既定的特殊问题的背景下，对概念的应用能力的置疑。然而，我们随即关注的却是唤起语言概念的方式。事实上，塞林加罗斯在这点上是非常

清楚的 。

“图案语言远不是一个图案目录……(一个目录)没有手稿;它没有关于流程、内部结构或秩序基础的原则……语词如果没有连接规则就不能构成语言……语言会告诉你哪些可以相连,并以何种方式来创造出一个更高层的式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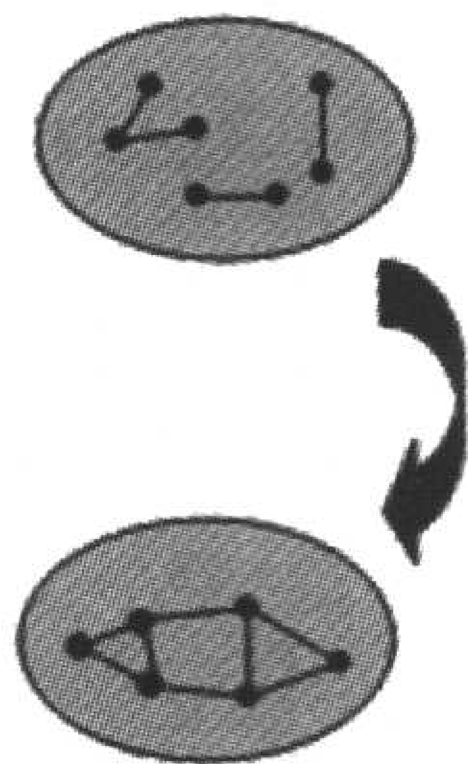


图 1 较低水平的模式与较高水平的模式相连,引自塞林加罗斯(2000),在亚历山大等人之后(1977)。

塞林加罗斯继续描述这概括性的流程,那些学术性的图案语言通过它被编辑成宗教信仰、神话以及文学史诗,这些经过数代人的积累成为公共的智慧宝库。将类似的储藏功能归因于城市形式并不困难。塞林加罗斯用他自己的方法,重申带修辞色彩的可能性存在于任何一个夸大的拱形设计的框架里:

“一组连贯的图案提供了一个框架,在此之上任何设计都可以抛锚中断。图案并不决定设计。通过加强约束,他们淘汰了大量的可能性,但仍然接受无穷可能的设计。”

它不仅重现了德·塞都的修辞性强调,也完全吻合于语言学的基本问题,即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文法系统的限制里,我们如何选择话题。

空间句法

城市规划学的另一根明显连接着都市形式和语言的线是空间句法(Hillier and Hanson 1984;Hillier 2000)。在语言学语境中,句法功能是“描述句子的结构,并界定它”(Palmer 1981) 。在类似的脉络里,空间句法寻求描绘空间上的固有的相互作用。席勒的方法很大程度是经验性的,在此,社会性的相互作用,比如行人的流动和犯罪事件的数据资料,在

系统的方式上与包含这些作用的图案或空间形式相关联。这种经验性的调查结果是结论性的，能通过有意识的设计来建构社会的相互作用。虽然这个方法可能对它所着重的目的非常有用，但它并没有使我在这里强调的空间形式的语言特性变得清晰。

习性

皮埃尔·布尔迪厄（1977，2002）将习性定义为一个持续的排列系统，我们可能把它解释为社会实践和与其意义联系密切的公共系统。布尔迪厄用卡比利亚（阿尔及利亚）[Kabylia（Algeria）]的例子精辟地说明，习性也可能包括空间惯例，但它也同样适用于北京四合院房屋的背景中：

> 居住空间……所有房屋之上……是生产方案对象化的主要集中地；并且，通过分配和等级差异这个中介，在事情、人物和惯例之间，习性建立起来，这一明确的归类系统反复灌输和强化这些分类学的原则，是造成这一独断性文化条款的原因。（Bourdieu 1977，89）

习性的空间方面由科塞（Casey）清楚地阐明了，他认为"习性是位于地点和其本性之间一个居中的术语，并且尤其是在居住地点和具有地域特点的本性之间"。我发现，将习性视为身份和空间的交叉点是大有裨益的。或者，用另一种方法解释，习性就是把房子变成家的东西。

语言学

乔姆斯基语言学

诺曼·乔姆斯基（Noam Chomsky 1979）将语言能力定义为"知识由于使用者的语言而内在化，这种语言曾经为人所学习和拥有，它下意识地让人理解并制造出无数新的句子"。与之相对，流程模式就是行为模式。能力模式指导我们如何说话；行为模式集中于我们选择什么来说。这种语言能力和表现上的区分与德·塞都提出的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他对乔

姆斯基将步行修辞学描述为一种行为模式作出了回应。布尔迪厄也从乔姆斯基的关于社会/空间语言习俗之后的生成原则的理念中找到一个重要的区别：

> 作为气质互相影响的一个动态系统，它拥有生成能力，即一个创造性的结构化的原则，与生成语法相似，能依据即定的式样和既定的限制制造出无穷的新的句子。习性是一种生成语法规则，但它在乔姆斯基传统里不是天生的生成语法。(Bourdieu 2002,46)

按照乔姆斯基的观点，生成语法是一种明晰的理论，其目的是解释语言能力；生成语法描述了一种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在深层结构的语言能力很明显地显现在语言的表层结构中。语言的深层结构与其内在表达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人类心理发展而言，语言能力是天生固有的。在其最近的研究著作中[4]，乔姆斯基重申心理语言涉及从深层结构内部到具体表面结构转化的流程。然而，从这一角度看，表层语法间的差异对深层内在的语言结构来说却不是本身所固有的。比尔斯威仕(Bierswish 1999)实施了这种方法以明确地形成空间概念，并依据乔姆斯基的第一语言假设了一个相应的第一空间。按照比尔斯威仕的观点，"就通过严格的空间概念解释原始人类而言，第一空间是由语义形式所安排的"。

模型语法

一个能拓展乔姆斯基空间语言领域里的语言概念的新兴研究线路，就是乔治·斯丁所引进的模型语法。依据斯丁(1980,347)的观点：

> 在模型语法里，模型为字母 S，符号为 L，它们为模型规则 R 和原始模型 I 的意义提供建筑街区，在模型语法中，就这些原始义素而言……一般用于形成模型语法的模型也已经建立起来了。

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个原始形态的模型或许是一个简单的线形片段，模型规则可能通过在先前的任意线形片段后面增加不同长度

的、角度正确的线形片段,来允许一系列的模型产生。或者,一个原始模型可能是一个圆环,那么,模型规则就是允许将一个圆环置于另一个圆环之中。如图2所示:这些基本的模型语法规则容易产生大量、形态各异的式样,所有的这些通过形成它们的一般语法,统一在与它们一一对应的"模型家族"之中。

图2　模型语法

为了清楚地看到从模型文法到口语的语言类推法,(需要)在既定的模态语言里,把"模型家族"视为句子,并且规则R作为引起产生这种句子的语法规则。在任意建立R的规则里发现,特定的规则群类似于任意即定的E语言下的特定原则和参数。

安德鲁·李(Andrew Li 2001)已经成功地应用这个概念来复制《营造法式》,一个11世纪的中国经典的建筑文本里的建筑风格的某些元素。这些不规则碎片形式,也或许被认为是通过对既定的模型规则的复制而重新产生的模型家族。如下我们将看到,北京胡同也同样具有不规则碎片形式的特性。

建构空间句子

在转到北京案例研究之前,有必要再次回应第一种前提:对于分析物质和城市形式而言,语言是一种指导性的暗喻。如果城市形式的确是一种语言,那么,难道就没有可能用这种语言来构造有意义的句子吗?或者如果不能的话,那它作为一种语言又说明什么呢?在试图构建一些简单空间句子之前,我想再次利用乔姆斯基的援助。对于语义学上的"根词"的有争议的概念,乔姆斯基说道:

> 至少传统理念如"动力因"、"工具"、"目标"、"源泉"等等,将这些假设一般语义学的一部分是合理的,而且这种理念将使用于作为语义学的代表。

如上文所示，或许比尔斯威仕的第一空间理念，也依赖于属于空间概念和关系的根深蒂固的语义学上的根词。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乔姆斯基的推测是正确的，那么，语义根词就应该是所有语言能表达的，甚至是空间的形式。这里我引进三个简单的"空间句子"，一个是源于东京的传统日本式花园，一个源于位于东京新宿（地区）首都政府大楼，第三个源于普通的交通环线。

图 3 是我曾经在靠近东京的一个小山顶上观察到的禅园（Zen）的一个图样。此花园的杰出设计源于"借景"（Shakkei）理念（又名"借来的风景"）。[5] 该花园的观景平台的特征是一面墙敞开而三面墙关闭，因此在乔姆斯基引文中，主题、"动力因"和暗含行为都能够非常清楚地被识别。当一个人坐在"榻榻米"席子上，面朝敞开的花园，他的视线会立即移向一个深谷对面的山上。这就是"借景"过来的山的景象，并纳入花园的设计之中，就像是它置于此就是为了这个效果。山很清楚地是这个句子的宾语，暗含的观光行为是一个及物动词，连接主语和宾语。这个宾语是一个名词，被作为形容词的植物以及灌木装饰得极为漂亮，正好修饰了这个借来的名词。最后，观光行为本身由景观化的地表所修饰着，它扮演着一个副词，指引人的视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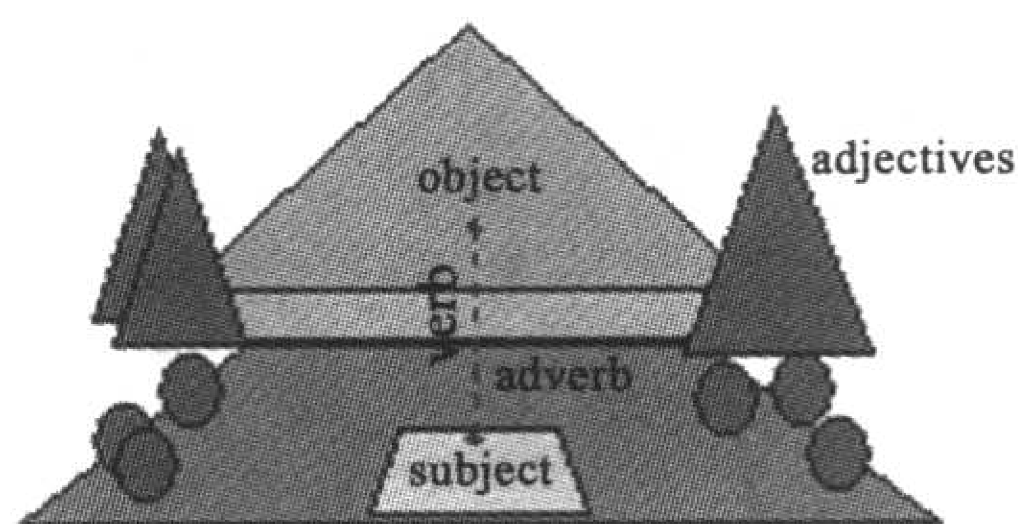


图 3 "借来的风景"

日本也是一个启发空间句子的源泉，如图 4 所示。东京首都政府大楼是由丹下建三所设计，它支配着新宿周围的景观。由于有雄厚的根基所支撑，大楼的两个塔分别有一个独特的构造，如图 4 所描绘的，在第一正方形里有一个旋转了 45°的正方形。因此，每个塔有八个面。这种设计的效果是：你在新宿行走时，摆脱不了被这种"结构所审视的感受。这种印象由这种意识所放大，即坐落在此东京首都政府大楼极具威严。那么，这里它也是一个充满语境语义学的空间句子。我最后的一个例子是不是无所不在的交通环线，如图 5 所示。而且，我将指出的是，隐含是动力因被非常清楚地解释为"我们"，即所有的进入者。我们相互之间的关

系高度对称，并且我们迅速地集中在一起的功能性目的也清楚地为设计所指明了。交通环线也是一个汇合点，它负有连接和指令的任务，连接着我们，也禁锢着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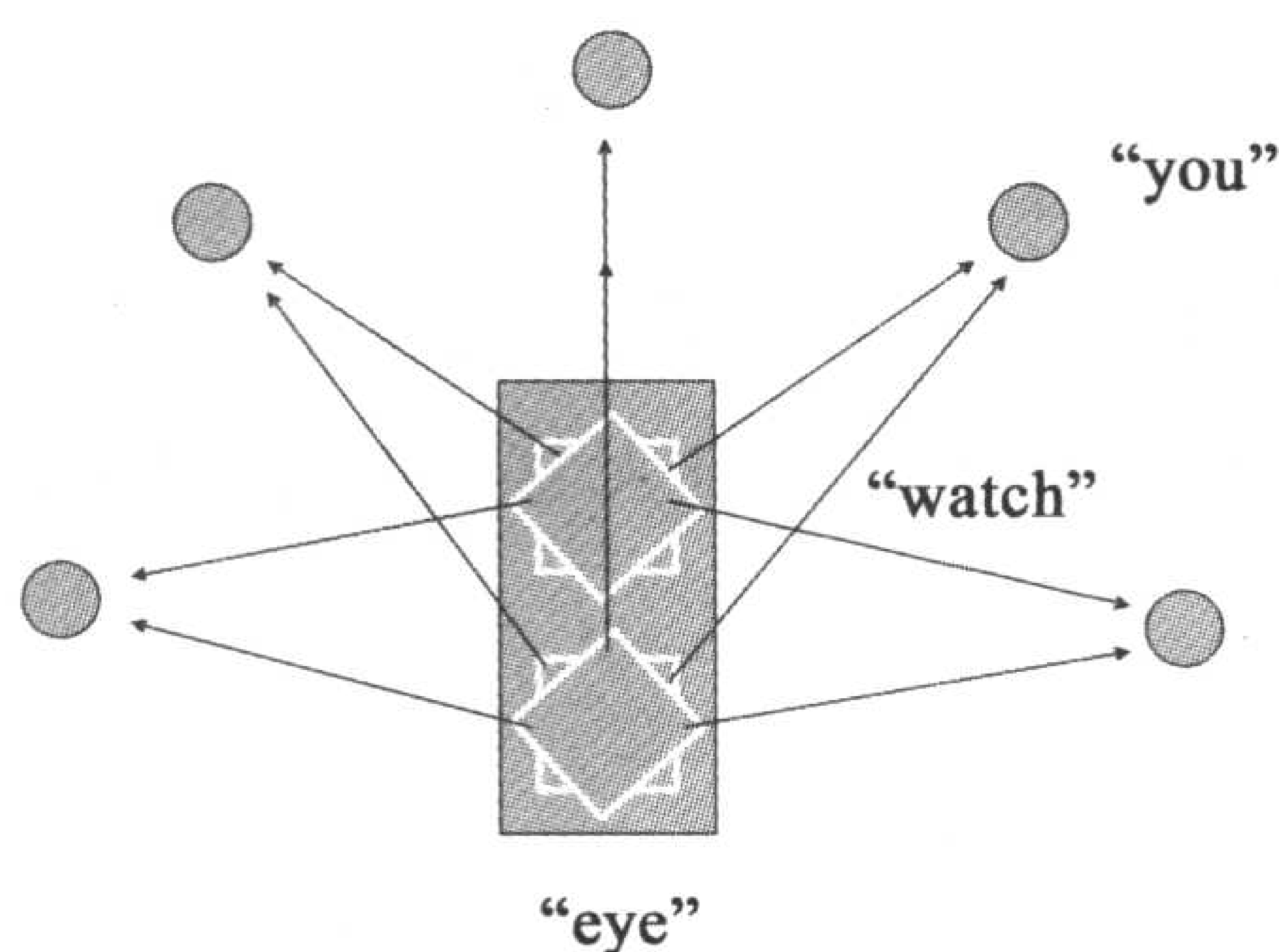


图 4 “全景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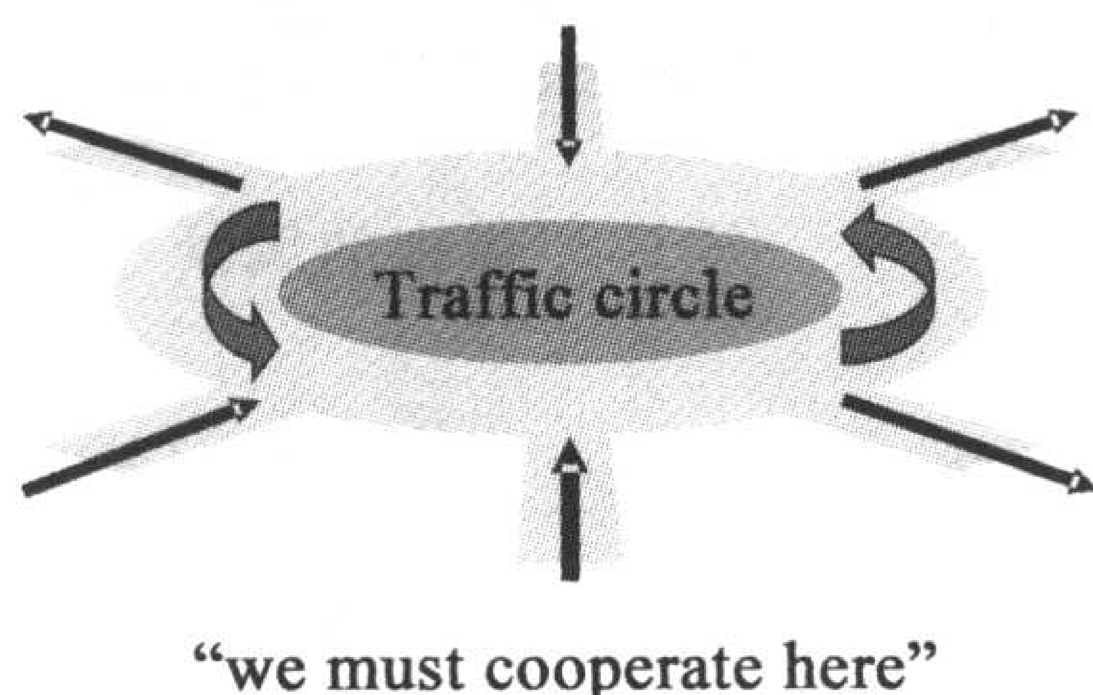


图 5 交界处作为连接词(或指令)

重访第一种假设

回顾必定要为了城市形式而对语言暗喻赋予信任和支持，甚至联想到能让句子从包含我们的空间排置里，在字面上和修辞上得到塑造的根本文法。从城市规划学中，这种支持直接来源于城市符号学及其相关的将城市当成文本来阅读的劝告。它也来源于建筑设计的视角，直接抓住图样和形式，有意识地、清晰地用于传达语义。从语言学中，第一种假设也受到乔姆斯基语法观的支持，即从固有的内在语言表述到外在表述的转化受到特定形式的阻碍。

第二种假设:从普通话到胡同话

语义学进程

那难以计数的令人犯迷糊却又熟悉亲切的胡同巷的迷宫，迂回环绕于传统的四合院，是老北京的一大特色，如图 6 和图 7 所示。当一个人深入观察狭小的胡同内部庭院时，这种传统外形被定义为“我们”和“它们”，这是亲昵程度提升的表现。

这些空间的设计展示了一个语义性的进展，它与中国书面语言里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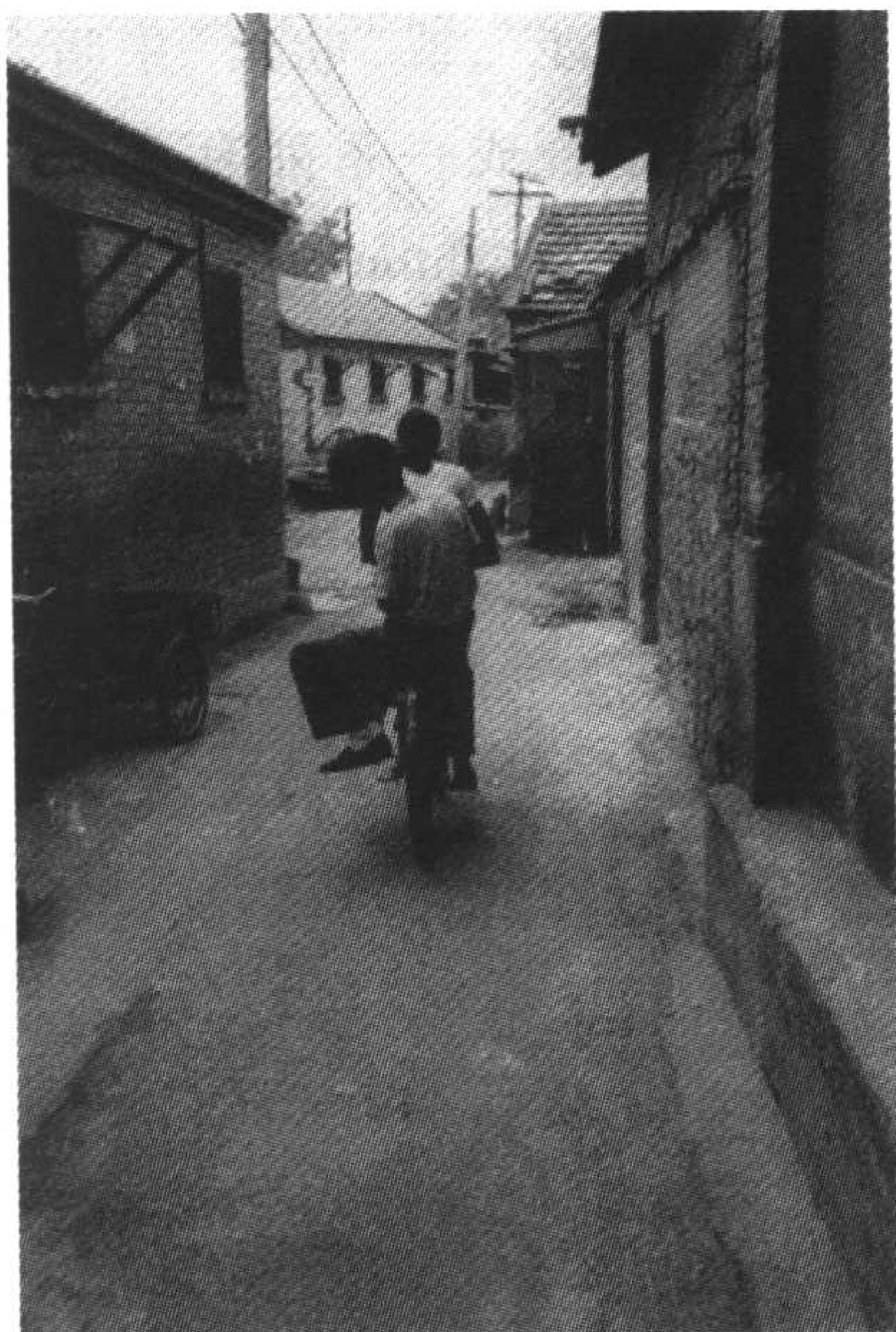


图 6　胡同巷(作者所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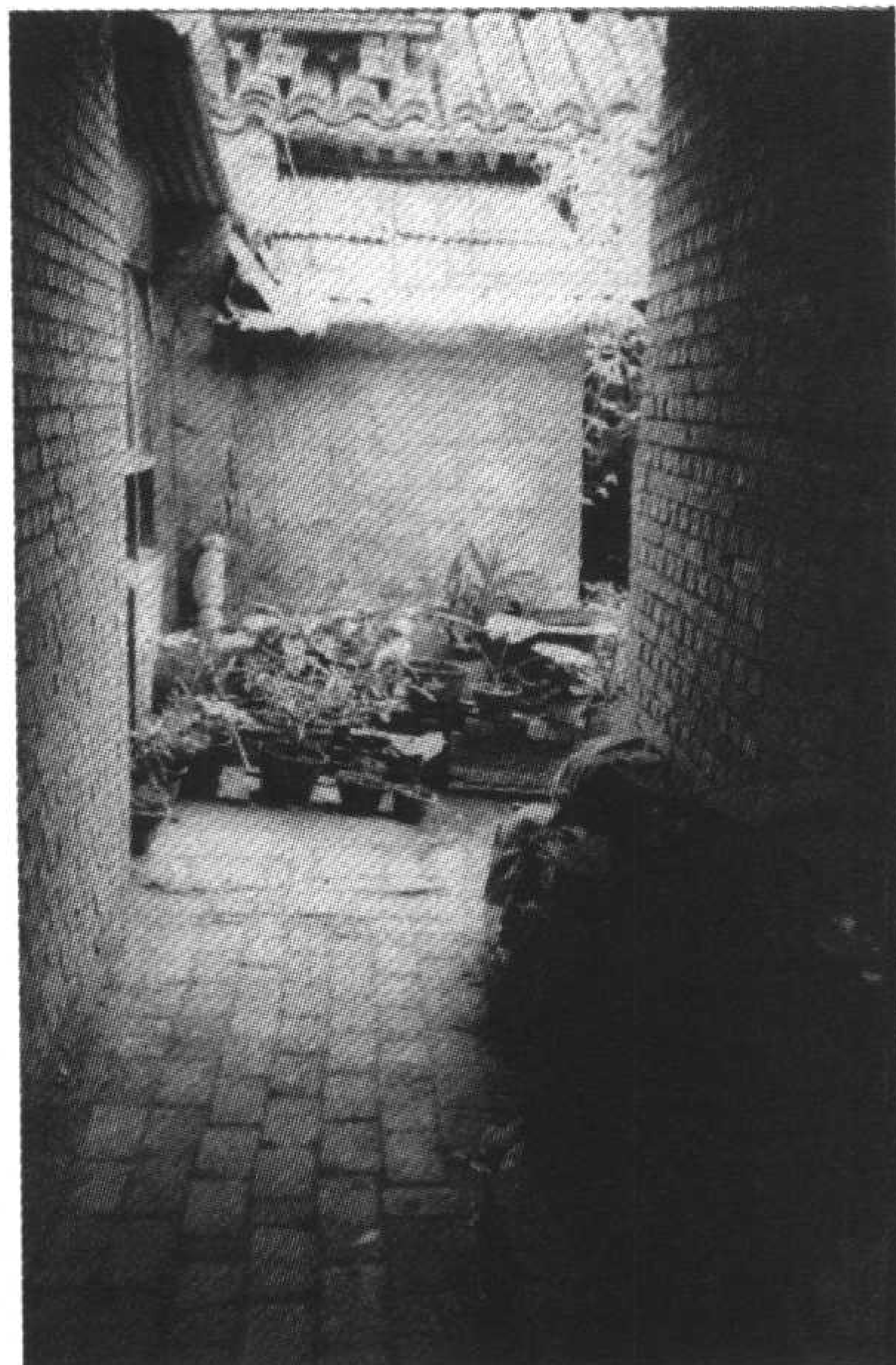


图 7　庭院房屋(作者所摄)

现的类似进展有惊人的相似。为了解释清楚,图 8 里显示了书面字符连续的相互作用合成汉字“累”的形式,意为劳累。可以看到这简单却精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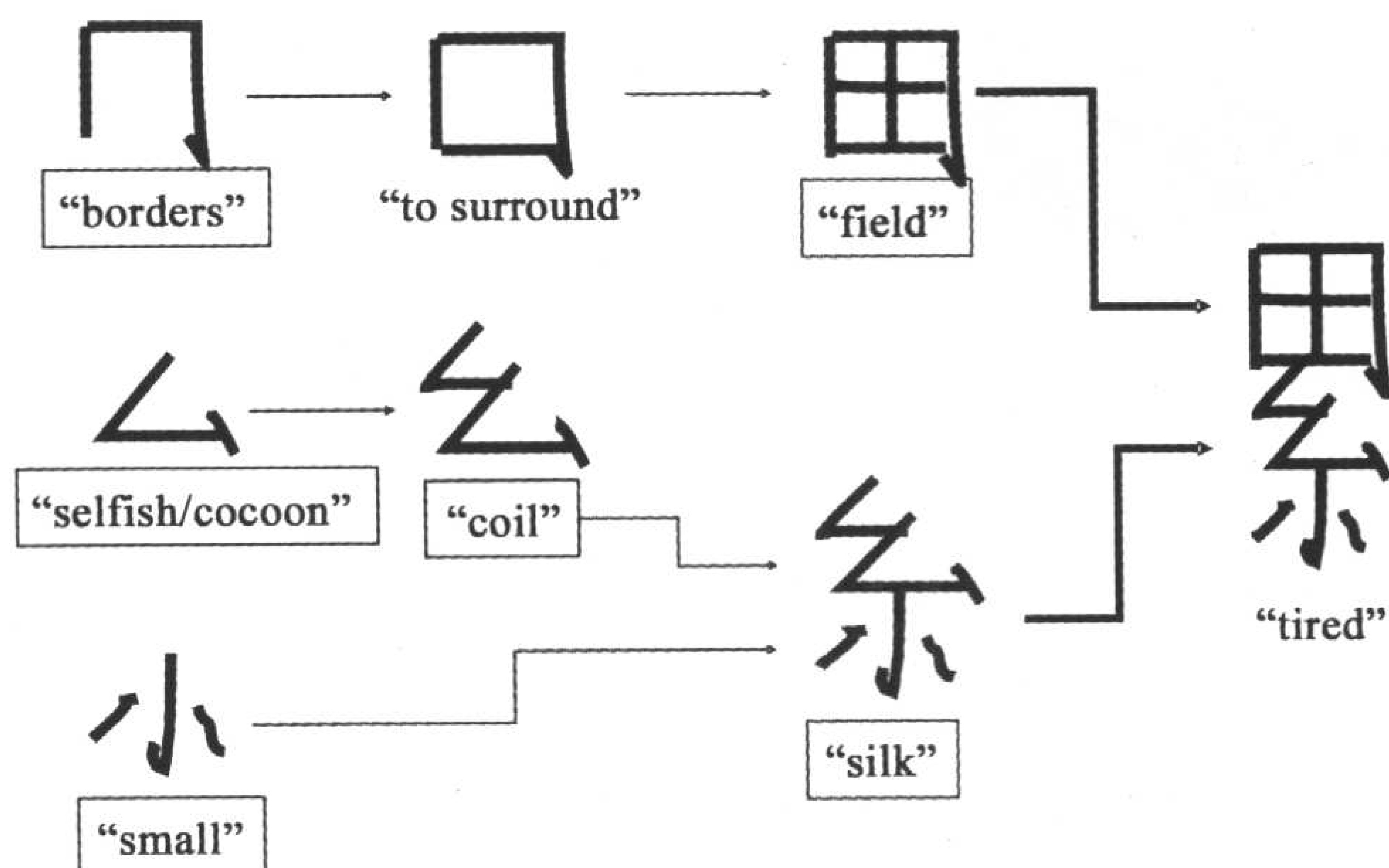


图 8　书面语中的语义学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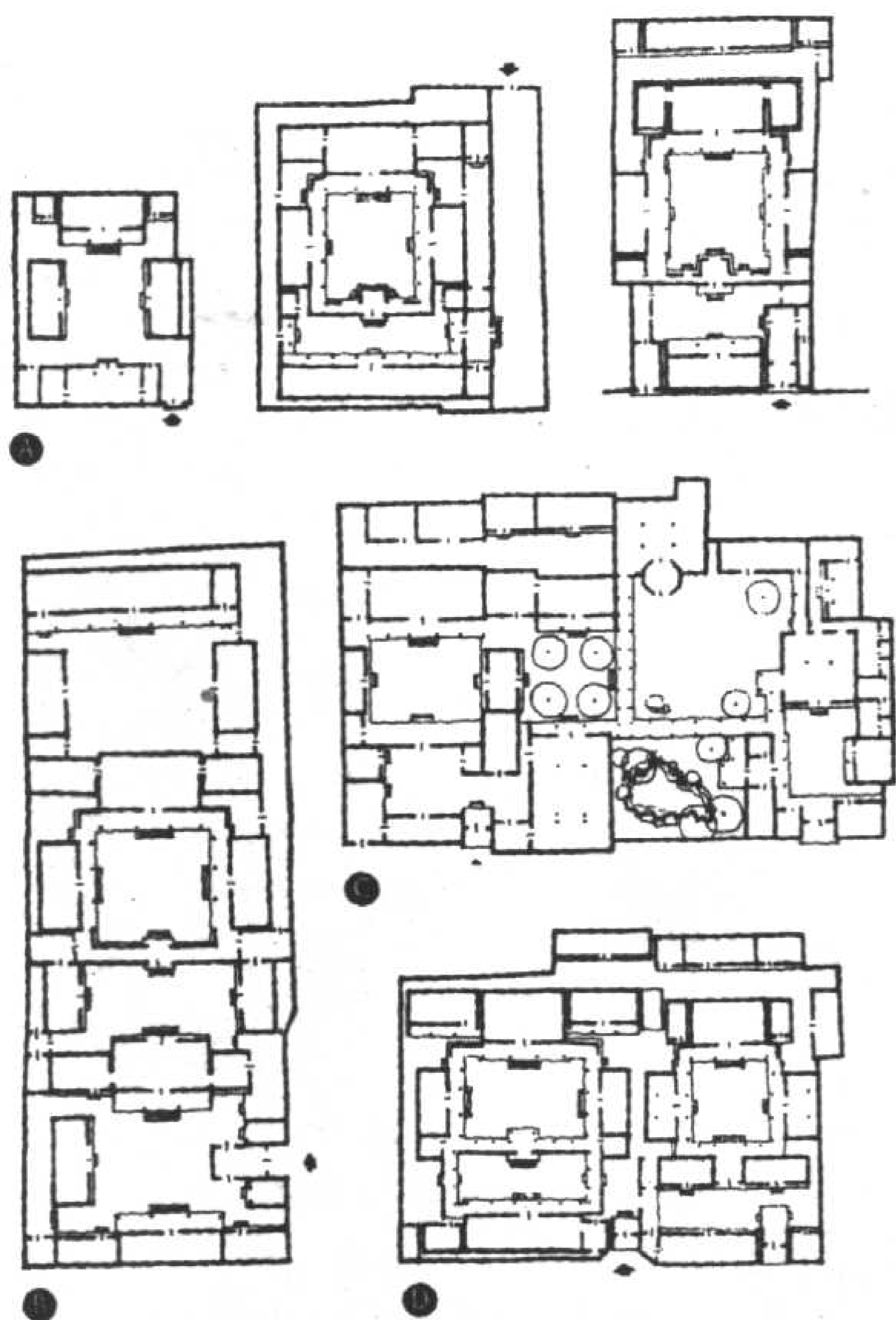


图 9　庭院房屋的语义学进程(吴良镛 1999)

的语义性进展是最高境界,"田野里跋涉",或"吐丝"中暗含的艰辛组合成一系列有意义的笔画(McNaughton1979),这就是中国汉字的特性。在庭院房屋设计中贯穿其间的相似思想倾向是明显的,简单的因素集合起来,构成了形式复杂的表达,如图 9 所示。这种概念的统一取决于习性的核心内涵,在此,一些配置要经受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的转变(Bourdieu 2002,44)。此外如吴良镛所指出的传统庭院有一个自我复制看起来不规则的特性,这导致了从小规模(个人房间)到大规模(城市)里产生了封闭而有限的连环相扣形式。图 10 中的图表描画了老北京城市的庭院性的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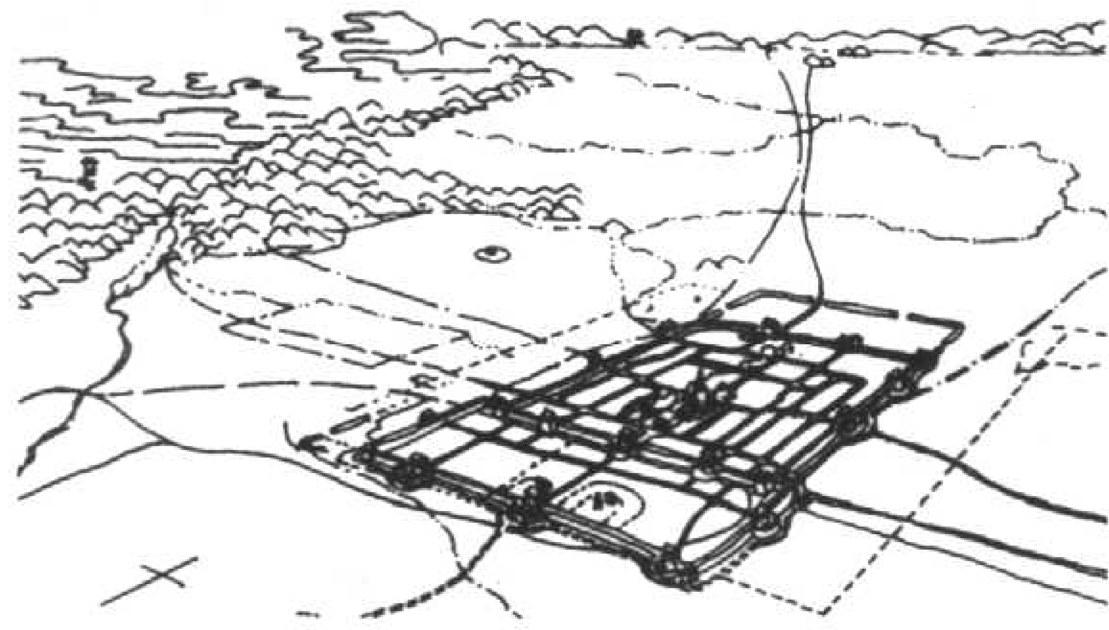


图 10　老北京的庭院房屋(吴良镛 1999)

北方理念

如果说四合院的城市形式的确是一种语言,按照它的话语,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在我们进展到第三假设时我要对此再作些说明,关于转型,要不是时间的缘故,我们或许能认为它是一种文化思维设置的一种表达。它也是一种概念的表达,即我们所称之为的"北方理念"。

北方理念是北京特征的内在体现,当然,这是最明显的,它的名字意为"北(北方的)京(首都)"。而且,一条宽阔的南北朝向的中轴线支配着北京的布局。吴良镛教授将其描述为"前现代化世界中最雄伟的都市

中轴线”(图 11)。南北走向的中轴线能让游客感受到帝王般的雄伟、壮丽,与之相邻的大厅、甬道和其他建筑,无不让人在接近时感受到一种节奏感及高潮(吴良镛 1999)。中国古人把帝王与北极星联系起来,并强调天上所有的星星都围绕着它天上的君主旋转。

著名的加拿大银行家格伦·古尔德(Glenn Gould)为“北方理念”谱了一首深情的曲子,并以此为题,为加拿大广播公司制作了一系列的“对位广播”。

或许是作为引领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风格的键盘音乐的代言人,格伦·古尔德对对位结构有着强烈的爱好,这种结构可以让几个声音同时发音,每一种都带有自己的特性,以此组成一个超越的整体。在“北方理念”中,当叙述者用他们特有的加拿大鼻音阐明他们自身对北方理念的想法时(当然是按照格伦的原稿宣读),他让四个人的声音同时发声。结果是一个同位音的合奏曲,“一个关于北方的诗情画意的合奏曲”(Friedrich 1990, 174),古尔德作品中的有声记事,在德·塞都的意识里就是“轨迹”。从这种观点来看,北京最华丽的乐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轨迹”,每一个都阐述着自己的“北方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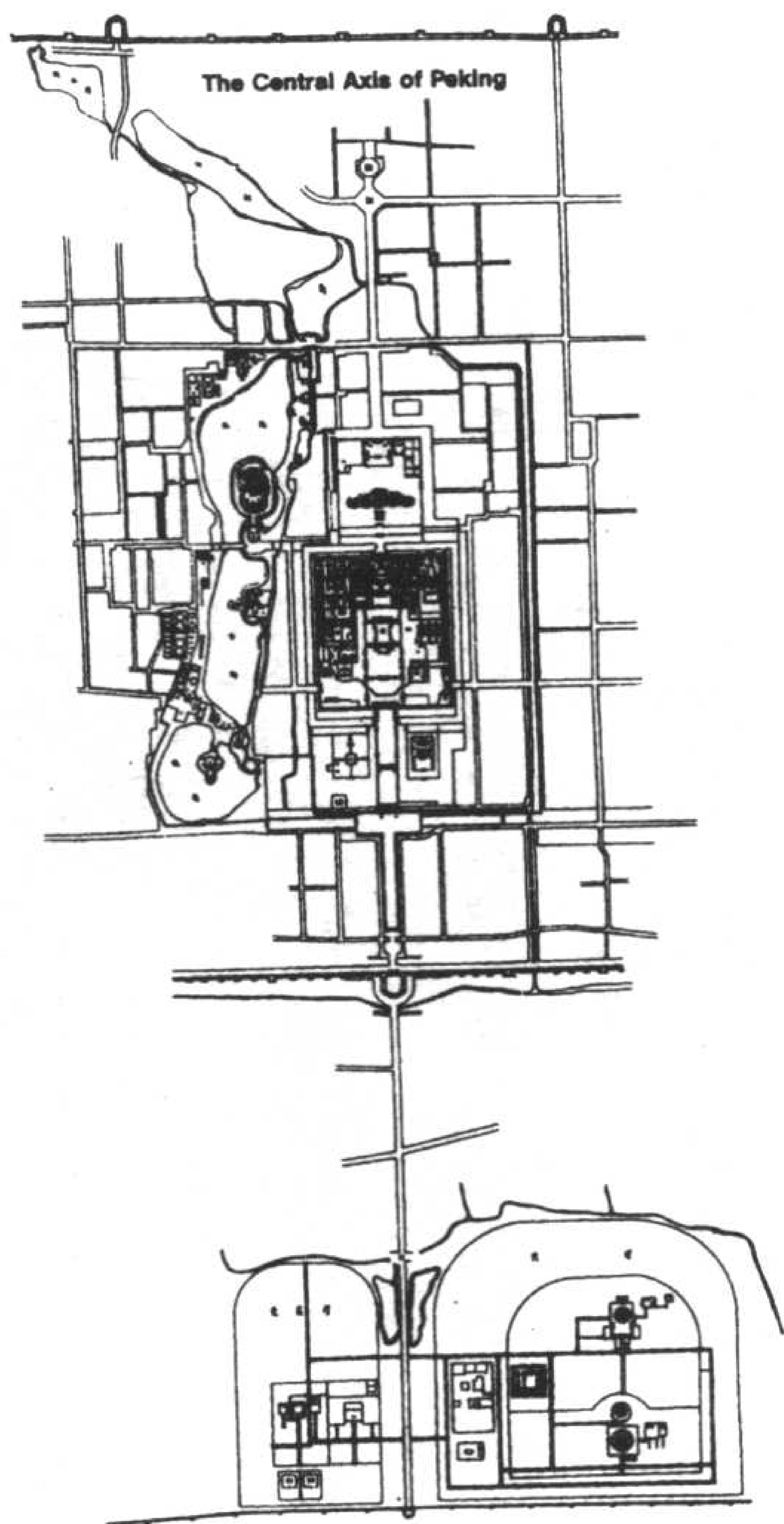


图 11 北京的中央南北轴线(吴良镛 1999)

重访第二种假设

如果城市形式的确构成一种语言,如第一种假设所示,那么“胡同话”肯定会成为一种语言,它恰到好处地“剪裁”着北京。其基本设计的主旨与中国汉字有着惊人的相似,其特征是那些基本样式的一个有规律

的语义进程，与不断增加的复杂性相连，产生大量有意义的构型。这在斯丁看来的确是一种图式文法，并且北京的胡同群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而又有质感的图式家族。

第三种假设：迷失于转型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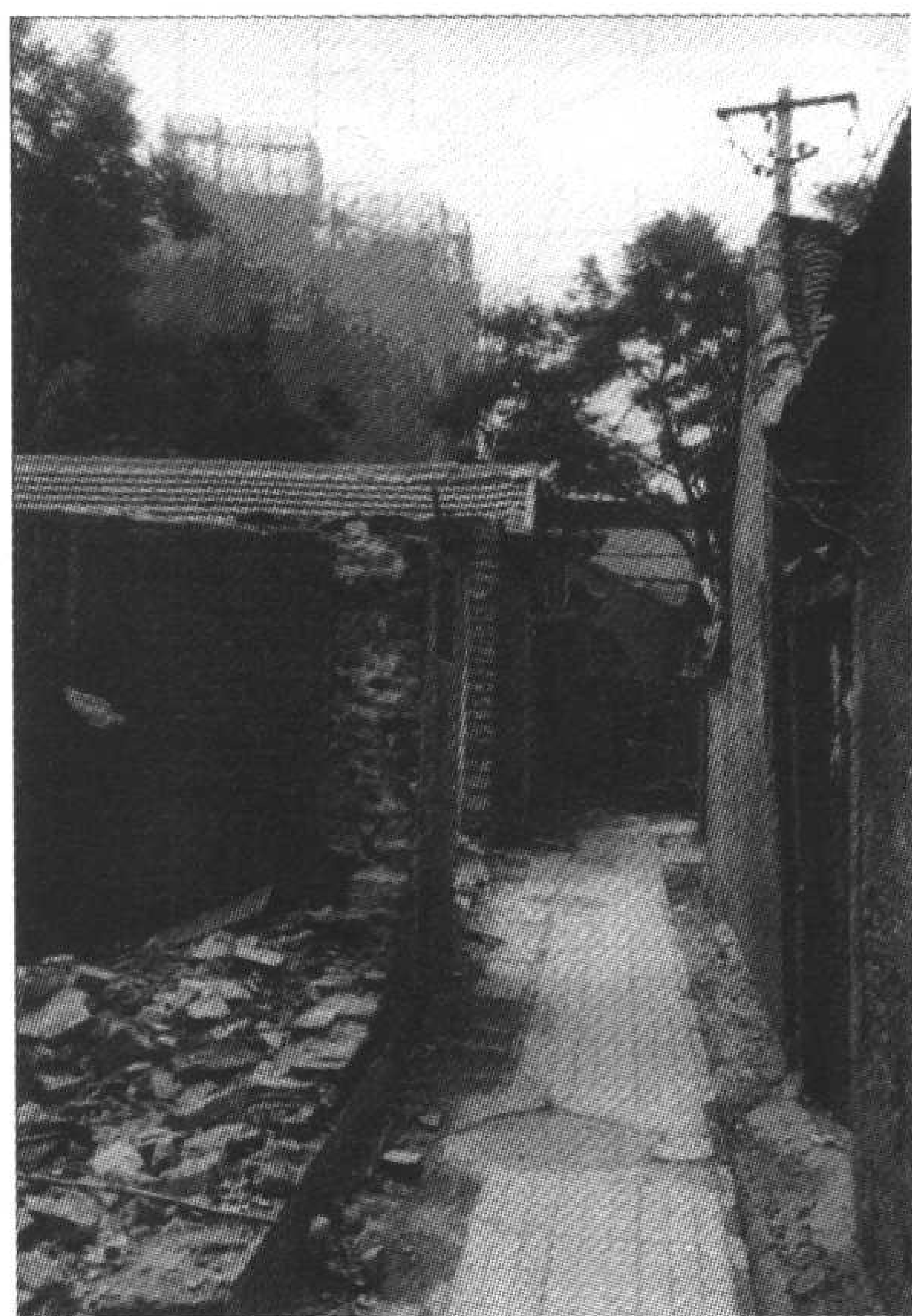


图 12　若隐若现的现代性（作者所摄）



图 13　奥林匹克的现代性（作者所摄）

新北京

新北京的改建速度确实惊人。传统的四合院群落正在无情地流逝着，而那些剩下的也逐渐孤立，与周围格格不入。图 12 中的照片是吴教授（1999，60）对这种风格的萦绕于心的描述的追忆，在这种风格中，“少数高层建筑杂乱地隐现于混乱、破旧的平房之中，在提醒着它们，仿佛这是它们命中注定了的。”图 13 中的三块广告牌是新北京的缩影：其中一块刊登着现代国际公寓的广告，公寓单元就在其背后；另一块标牌上是身着性感服饰的摩登女郎；第三块公示着即将到来的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确，如果说新的意识形态支配着现代中国，那它就是“2-0-0-8”，因为无论是谁担负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首次正式亮相的准备活动，那它就决定着这个民族的政治议程。这个议程清楚地号召一个迅速而

彻底的置换，即以崭新的、干净的、现代化的以及宽敞的摩天大楼取代那些破旧、脏乱不堪、臭气熏天、东倒西歪以及拥挤不堪的胡同社区。谁又会反对呢？

转型的模式

图 14 是转型流程的一个模型，摘自罗杰·T. 贝尔（Roger T. Bell）的文章。当然，这个过程不是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直接传承。事实上，源语言首先是通过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分析以达到一个语义上的陈述（引自贝尔教授，亦可再参阅图 14），因为模糊性抓住了在源语言语境下表述的本质含义。如果有人愿意，可采取一个相反的流程，即运用重建来造一个句法上的、语义学的以及语法上的合成体，其最终结果是在目标语言中形成一个翻译过了的文本。

贝尔特别指出，“一种非语言特征”的已经讲过的语义上的表述，这种模糊形式取决于它的转换模式的支点。这个与我们早期对乔姆斯基语言模式的回顾有着极为惊人的相似之处，在此，从一个表层结构到另一个的转换是通过深层结构传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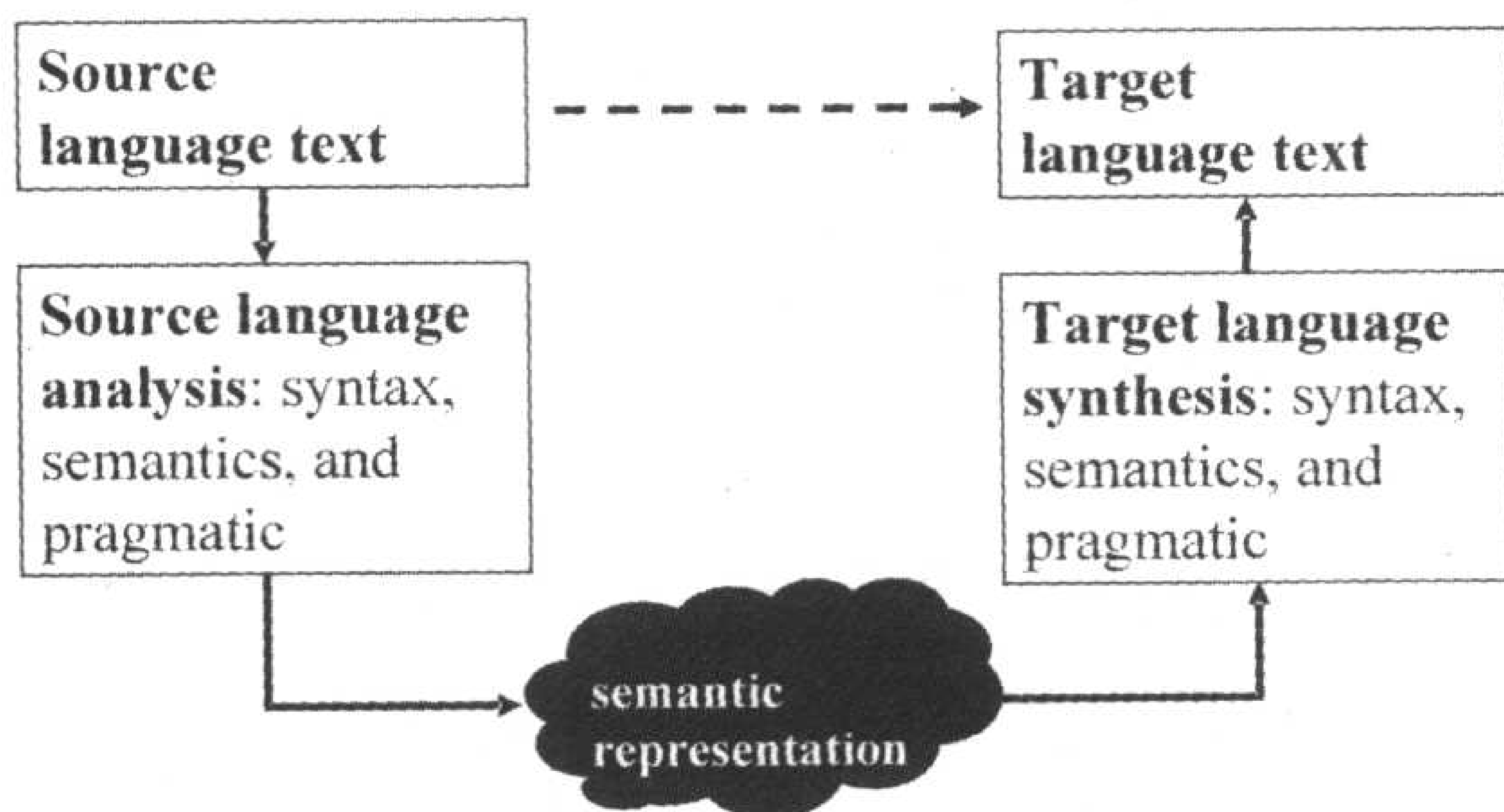


图 14　贝尔的转换模式

什么是迷失于转型之中？

依据艾柯（Eco 2000，12），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符号学中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们是否和如何使用符号指代某物……（它不能）避免另外一个问题：那诱导我们创造符号的是什么东西呢？”根据艾柯的观

点,即是那些存在的东西。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把艾柯的反应与古尔德的联系起来,并因此得出结论:它就是北京的本位理念,正如起初在"胡同话"这一章里所阐述的,它正消逝于转译之中。这个本源理念超越了语言,但又通过语言来表达。(用)极为现代的形式来传达北京的本位理念是极不相称的;就好像把日常生活的诗歌翻译成机械语言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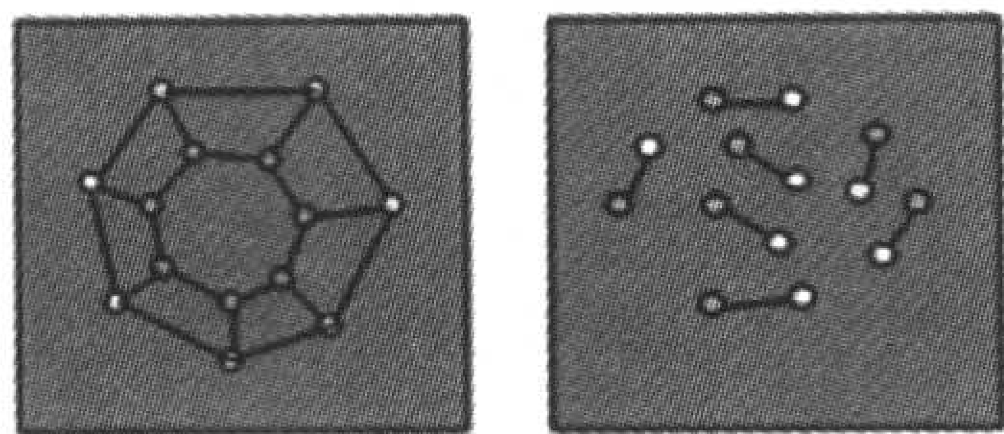


图 15 模型与反模型
(Salingaros 2000)

塞林加罗斯用图 15 中的资料简洁地阐明了现代化形式在传统格局中的问题。传统的建筑式样与相应的社会形式相连,形成更为有序的图样,正如左图所示。依据塞林加罗斯的观点,现代风格的建筑是不同于传统的,因为它是一个"反图案",它的功能基本上是解释性的。在他的观点里,现代风格的形式本质上是如同病毒般在运转。

"在要求彻底革新的欲望驱使下,现有的规则有时候乐意通过语言规则来取代它们的模式。这些是完全随意的,然而它源自于时尚或信条……由风格化的规则繁衍的机制与(电脑)病毒的复制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一种风格化规则的成功不是由它对人类希望多么有用来衡量,而是通过有多少副本可以产生来衡量。"

它将"胡同话"的困境置于中国现代性的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20世纪的作家们对这个议题进行过激烈地争论,以寻求传统规范与现代使命的和谐。

相反论调

到目前为止,对此论点进行评估,即通过对一些令人信服的相反论调进行再评估,德·塞都提醒(我们)回想起,是语言的使用而不是它的语法构成了文化的内容。正如他所表达的,"说话的艺术(包括所有暗含的

发音清楚的策略）不会还原为语言的一种知识。”更为笼统地说，我们不能低估人类的创造性，或高估拱型（语言学）系统的决定性。同样地，海外中国人同期的研究表明，“中国”是难以把握的，就像它是健康和多样性的一样。叶文鑫（Yeh Wen-Hsin，音译）的《成为中国人》一书中指出：现代性和未来的变迁，涉及“文化上界定的有争议的中国领域”，其中“中国”的特征不是文化上是永恒和预定的，而是一个前进中历史的进程的产物。

学术界的一个易犯的毛病（特别是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就是假设那些起源于西方的规划原则自然适合于中国或者其他孔子文化的背景（Heikkila 1994）。一个不同但是相关的错误就是劝告中国人放弃现代化的福利，以保留传统习俗的特性。爱德华·塞德（Edward Said 1979）指出，这样一个神气十足的主旨在本质上是文化帝国主义。

语言范式对于评估这些相反论调是相当有用的。当然，任何人不能否认语言能够维持静态。它将激发对所有内在和外在的刺激方式的反应。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可能的进化方式都同样有效。在这里，斯丁的模型家族的概念再次帮了忙。模型家族在潜在的多样性上是无效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包括所有的模型。那些衍生于转化的模型，并与基本的模型语法相一致的模型是有效的。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要扩大传统的模型语法来包含一种现代的词汇。这将我们带到了菊儿胡同。

菊儿“胡同”

图 16 显示了一项更新的老北京城中环绕菊儿胡同的方圆 8.2 公顷的土地的规划（吴良镛，图 5.45，1999）。依据一个“系统更新……反映现代精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征”的要求，吴良镛教授、毛奇智教授和其他清华大学的教授已经率先担负着论证北京胡同群落如何重新发展的重任。

菊儿胡同工程是一个模型家庭如何扩展以涵盖一个新的词汇的意义深远的典型。吴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正忙着把传统设计理念转化成一个现代化的作品，因此，创造了有现代化管道和设施的胡同样式的社区。菊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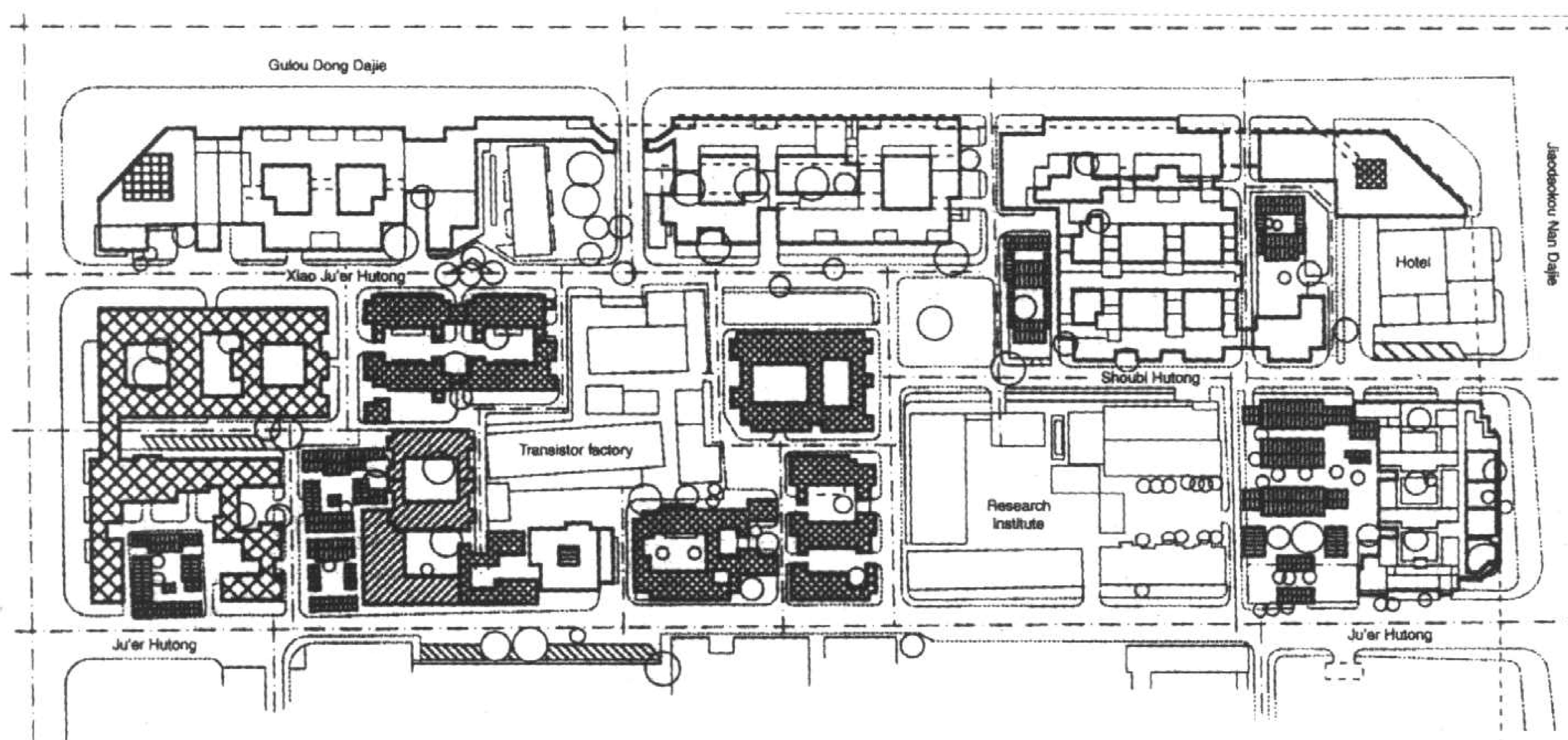


图 16　菊儿胡同方案(吴良镛 1999)

胡同工程获得国内和国际的赞扬,并且,吴教授因为这个作品当之无愧地获得了 1993 年“世界人居奖”。吴教授自己承认,虽然得到了评论家们的褒奖,但是这个工程是一个综合的成功,因为传统设计理念的采用是为了呼应北京当前的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现实和发展前景(Heikkila 2001)。吴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所面临的挑战本质上是转型,而若要成功地阐释,则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上都要流畅。如果他和他的同事们失败了,将面临一个实实在在的危险,即北京的基本因素将会迷失于转型当中。

重访第三种假设

关于中国和其他的地域在面临现代化之时,之前的传统城市格局的消逝,已经有人写了很多很多。这里的新亮点是,以一个明晰的语言学模型的阐述作为我们的研究案例:北京采用的院落和花园房屋,提供了理论框架。那么如果通过参照这个框架而获得了一切,那又会是怎样的呢?——问这个问题是明智的。在一个语言模型的缺失中,留下来的仅仅是一个表面结构(在乔姆斯基的意义上)被另一个所取代。然而有人可能会为隐含的消逝而悲叹,但只有在一个语言模型下,才能够明确地断

定有些重要的东西在源语言之中被言说到。从这个视角来看,转型能力的问题将会马上、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

因此,最迫切的一个需要就是着手一项额外的工作,即扩大语言学的领域以涵盖空间形式的语言。在此,这项主要是回顾城市符号学、模型语言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修辞的工作,必定会指朝这个方向,但是常常也会减缩为一个正式的语言学的范例样式。这一章节讨论了除将语言使用为一个类推外,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更需要的是对语言自身的概念的延伸。

参考书目

[1] Abramson, Daniel. *Neighborhood Redevelopment as a Cultural Problem: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Current Plans for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Beij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Qinghua University, 1998.

[2] Alexander, Christopher, et al. *A Patter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3] Barthes, Roland. "The Semiology of the Urban", In *The City and the Sign An Introduction to Urban Semiotics*, edited by M. Gottdiener & A. Lagopoulo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4] Bell, Roger T.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1.

[5] Bierwisch, Manfred. "How Much Space Gets Into Language?" In *Language and Space*, edited by Paul Bloom et al.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6] Bloom, Paul, Mary Patterson, Lynn Nadel, and Merril Garrett, eds. *Language and Spa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7]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ichard Nice, 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8] Bourdieu, Pierre. "Habitus", In *Habitus: A Sense of Place*,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Hillier and Rooksby. Hants: Ashgate, 2005.

[9] Casey, Edward S. "Between Geography and Philosophy: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in the Place-World?"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91(4) (2001):683-693.*

[10] Chomsky, Noam. *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New York: Pantheon Press, 1979. Reprinted in *On Language.*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11] Chomsky, Noam. *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 de Certeau, Miche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3] Eco, Umberto. *Kant and the Platypus.* London: Vintage, 2000.

[14] Friedrich, Otto. *Glenn Gould: A Life and Variations.* Toronto: Lester & Orpen Dennys, 1990.

[15] Gould, Glenn. *The Idea of North.* Toronto: Canada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1967.

[16] Heikkila, Eric J. Book Review: "Rehabilitating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by Wu Liangyong. Vancouver: UBC Press, 2001. Reviewed in *China Information.* The Netherlands: Sinological Institute and Leiden University, forthcoming.

[17] Heikkila, Eric J. "Confucian Planning or Planning Confusion?"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Vol. 14 (1994).

[18] Hillier, Bill and Juliette Hanson.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 Hillier, Bill. *The Common Language of Space.* London: Space Syntax Laboratory and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2001. http://www.spacesyntax.com/publications/commonlang.html

[20] Kim, Won-Bae, Mike Douglass, Sang-Chuel Choe, and Kong Chong Ho, eds. *Culture and the City in East Asi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21] Lee, Leo Ou-Fan.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2] Li, Andrew I-Kang. *A Shape Grammar for Teaching the Architectural Style of the Yingzao fashi.* MIT: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2001.

[23] McNaughton, William. *Reading and Writing Chinese: A Guide to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Rutland: Cave Books, 1979.

[24] Palmer, F. R. *Semantic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25] Said, Edwar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9.

[26] Salingaros, Nikos A. "The Structure of Pattern Language", *Architectural Review Quarterly* Vol. 4 (2000): 149 – 161.

[27] Sit, Victor. *Beijing: 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95.

[28] Stiny, George. "Introduction to Shape and Shape Grammar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Vol. 7 (1980): 343 – 351.

[29] Wu, Liangyong. *Rehabilitating the Old City of Beijing.*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9.

[30] Yeh, Wen-Hsin, ed. *Becoming Chinese: Passages to Modernity and Beyon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31] Zhu, Zixuan and Reginald Yin-Wang Kwok. "Beijing: The Expression of National Political Ideology", In *Culture and the City in East Asia*, edited by Won-Bae Kim, et a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注释

[1] 我用"胡同话"这个术语是特指与胡同有关的语言(话)或者模型语法。为方便起见,它与"普通话"以及"官方汉语"语义双关。在此,我对该术语的使用将不会与那些生活在胡同群落里的人所说的口头方言混为一谈。

[2] 转引自 http://www.mclavoie.com/projects/urbanmemoryscape/content2.htm

[3] 德·塞都在其作品的英文版的序言中清楚地确认了这一点:"由另一种语言和文化所强加的弹性范围内,艺术的转型悄悄进入了上千个创意之中,这些创意在作者的

迷茫的眼神之前,已将他的书转变为一个新的创造。

[4] 其正确的标题应为: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5] 我要感谢乔纳森·雷诺帮助我将这些专有的术语还原为日语。

(作者单位: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胡国民　译)

马拉克奇：一个生态学的奇迹及它的惨遭破坏（1071～2000年）

［摩洛哥］穆罕默德－埃－法耶兹



穆罕默德－埃－法耶兹（Mohammed El Faïz）教授，农艺学和阿拉伯园林方面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目前任教于摩洛哥马拉克奇卡迪·阿亚德大学。他在保护马拉克奇历史景观、园林和绿洲景观方面作出的贡献使其享誉国际。他的著述主要关注阿拉伯－穆斯林文明中的水资源、农艺学和园林，其中最重要的有：《古代美索布达米亚的农艺学：库塔玛的那巴提安人农业状况分析》（édition J. Brill, Leiden-Köln-New-York, 1995）；《马拉克奇的古典园林：一座帝王之都的生态学记录》（édition Edifir, Florence, 1996）；《马拉克奇的花园》（édition Actes Sud, Arles, 2000）；《农书〈奇塔·阿尔－菲拉哈〉》（édition revue et corrig é e avec introduction de Mohammed El Faïz, édition Sindbad/Actes-Sud, 2000）；《马拉克奇：消亡中的遗产》（édition Actes-Sud/ Eddif, 2002）；《摩洛哥、西班牙和葡萄牙园林：一种共生共荣的艺术》（édition Malika/Actes Sud, Madrid, 2003）；《阿拉伯水利史：找回一门被遗忘的学问》［édition Actes Sud, Paris（à

paraître mai 2004)]。

几个世纪以来,马拉克奇一直以它的工程学成就和河流文化而闻名于世。然而,这座城市丰富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正日渐被忽视,并且正受到房地产开发、城市化以及其他人类灾难的威胁。[1]从它11世纪建城伊始直至20世纪初,马拉克奇代表着摩洛哥城市花园的典范。这个美地那[2]城市的中心是一个以果园和菜地所构成的圆环,城墙以外则遍布棕榈园,有1.7万公顷[3]的棕榈树,以及其他各类果树及相间作物。这些绿色圆环层层排列,一系列的耕地和果园一直延伸到作为城市西部边界的尼菲斯季节河(图1)。

在介绍这个典型城市花园的特点后,我们将研究城市化进程对它的影响并就它未来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一个由花园艺术引发生成的典范城市

考察它的起源把我们带回到11世纪,那正是阿莫拉维德王朝(1061~1147年)和古代城市创立时期。在这之前,平原遍布茂密的枣树、阿月混子树、棕榈树和野橄榄树构成的野生植物群落。高阿特拉季节河在汇入滕斯福河前消融于洼地沼泽。

阿莫拉维德人选择在这片荒野中建立他们的住所。只要对其长期的发展过程进行回顾,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个城市的选位不仅合理,甚至是完美地适应于环境及地形条件。马拉克奇建立在一个远离滕斯福河和其周边干涸河汊的地方,非常接近伊斯乐季节河,并利用它构成一个对过溢河流的天然排洪渠,同时它与山地保持适中距离,这样就能吸收从高阿特拉顺势而下的季节河的主要水利资源。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些优势并不是一开始就显现在当时规划者的面前的,但辉煌的阿乌兹的历史可以由果溯因地推断出,处于丰厚水利资源汇聚地区的阿莫拉维德人选址的正确性。[4]

马拉克奇在它9个世纪的历史内积累了一份惊人的绿色财富,在12

世纪，新型优美花园艺术出现在这个城市。一种“阿莫哈德式花园”的新风格也在这个时代出现，它拥有大片的果园、巨大的下沉式广场、宏伟的水利建筑、楼阁（蒙斯）、城垣和围墙。[5]这些花园的创造者在这片“鸟都会渴死”的荒漠之地勾画出一片田园风光，创造了一个人间天堂（图 2）。除了作为威权标志的皇家花园外，这个撒哈拉式的城市还拥有其他风格的花园（阿尔萨、热那、利雅得……），范围虽小一点，但更为精致，是由室外水景、彩釉建筑装饰、绿树和花卉构成的精细而耐人品味的作品。

阿拉伯城市的建筑师们（其中有像马拉克奇这样的大都市），似乎乐于将花园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概念。而历史学家在对这些中世纪城市进行描绘时，对那些散步场所、果园和围绕着城市的各种特色植被群落亦毫不吝惜赞美之辞。典型的城市花园的优越性随处可见。从大马斯到巴格达，从高督到马拉克奇，房屋就像淹没在绿色海洋里的立方体。而直到13 世纪，地理学家阿尔 - 卡兹维尼（生于 1275 年前后）才以他出生的城市（位于伊朗的卡兹文）为例，给我们带来了有关城市花园的图解。我们从中可以发现精心设计的 3 个同心圆，中间是一个由果园和作物围绕的骨架核心（图 3）。[6]阿拉伯人懂得将花园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这种思想在很久以后仍一直延续，并在印度的蒙高东的穆斯林王朝（1526 ~ 1857 年）得到了最显著的说明。作为国王和一部园艺专著的作者，巴布尔（1483 ~ 1530 年）在构建城市时，先以花园的设计开始，并据此来建设城市（图 4）。这样，花园艺术就被归属于阿拉伯文明中最珍贵的城市文化财产，它伴随着城市化运动，并作为穆斯林的安达卢斯[7]和北非著名城市的构思起源。

今天的马拉克奇以其富裕和花园风格的多样性而闻名。我们已经在别处描绘了阿格达、阿尔萨、热那和利雅得风格，并同时研究了它们的演变及其在世界花园历史上的贡献。[8]必须指出的是，使这些生态财富的创造成为可能，全赖于对水利技术的掌握。地下排水道（坎大哈）[9]和引水渠的发展保证了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并从而保证了在干旱国家实现花园建设目标的成功条件。而一个强大政权的存在，以及对意识形态宣扬的现实需要，则构成了促使典型的“阿莫哈德式花园”诞生的另外因素

(图 5)。

中世纪所有的作品(水坝、桥梁、引水渠、清真寺……)都拥有同一种风格:简约、坚实和唯美。它并不涉及征服、主宰、改造或毁灭自然等概念。相对于征服的观念而言,"慎重"的态度随时随地都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艺术应该为自然服务,而不应一味追求奴役、束缚自然。归功于这种哲学观念的传播,我们才能在今天欣赏到数世纪前的建设成就(如马拉克奇的古桥),它们是如此含蓄、内敛,好像与环绕在周围的景色融为一体。另外,这就是让·克洛德尼古拉斯·弗莱斯第(1861 ~ 1930 年)于 1913 年出乎意料而惊喜地发现的花园城市的景象,他当时在马拉克奇考察。他写道:

> 没有能比出现在眼前的景色更激动人心的了,从卡萨巴伦萨出发,我们在到达马拉克奇几公里前就突然看到一片意外的、丰沛的绿色出现在广袤的沙原之中,这片绿原在南部被覆盖着白雪的阿特拉山的蓝白轮廓所阻挡,那绿清新而令人舒畅,这片广阔的绿洲完全异化了古老的柏柏尔城。在漫长的穿越这片光秃秃的荒原的 200 公里行程之后,为靠近城市而长距离横穿绿油油的棕榈园是一种意想不到的快乐,尽管它已略见稀疏,部分地段也已残损不堪。现在已经采取的措施很可能将使这个奇观得以完整再现。往日的土地投机,特别是土地分块建设行为对其整体保护和发展的损害实在是令人遗憾,它的棕榈树和棕榈园的美丽甚至超过了著名的西班牙的爱尔克。[10]

即便自 1929 年颁布的法令能成功拯救棕榈园和城市特色景观,最近 20 年以来的城市化趋势对这片生态财富而言也是致命的。它不但动摇了马拉克奇的生态系统的根基,而且还在短时间内对它进行着毁灭性的破坏。

二、生态财富经受城市化的摧残

我们从《城市绿地》听说了美地那,所有外露的地表都自然孳生或人工种植着各种植物,它们为居住者提供了休闲、娱乐的最优环境条件。这样,城市绿地从伴随个人房屋或集中住宅区的孤立树木开始,经过各种中间形式,如广场中心的小花园,大的公共花园,城郊公园和林地,直至大片自然空间。总而言之,它涉及各种配置植物的城市土地形式。若要简单地了解美地那的城市绿地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只需回到城市花园的起源,认识一遍它的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但是,为了进一步进行思考,我们不能只停留在感知层面,无论这种感知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是应该开出一份对这片空间现状问题的详细诊断书,并以此为始,设想一些拯救与进一步发展美地那生态财富的必要的措施。

我们先要分析三个马拉克奇城市绿地演变的典型阶段:前殖民时期(1071～1912年),殖民时期(1913～1956年)和独立时期(1956年至今)。

城市花园的时代:从建立至1912年

前殖民时期突出的特点为:被城市绿地环绕的城市花园的出现,城市绿化带超出了城墙,同时构成了巨大的园艺生产中心。即使技术经济上的进步不可否定,我们也应看到,一直以来,城市化对这片植物空间的生态威胁,比如,我们知道,12世纪阿尔姆阿德的卡斯巴[11]的城区就是建立在一个名为阿尔－沙利阿的巨大花园的一部分之上的。沙德亚娜(16世纪)时代的扩张则以古老果园的毁坏为代价。但也不得不指出,城市化的代价因为建立在王室花园基础上的新花园的扩张与发展而多多少少获得了一些补偿。

我们可以证实,直至20世纪初始,马拉克奇还是一个绿色的城市。他的6.5万居民生活在一片三分之二都由古老果园构成的空间里。从19世纪外国游客的描述中可以体会到对连绵阴密的城市绿地的感受。[12]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绿化密度的增加并不限于在美地那城内(图6)。

紧邻的周边地区和相隔较远的城市都遍布着棕榈园、王室花园、热那蔬菜作物,[13]以及巨大的色拉利亚王室橄榄园。所有这些绿色空间都被阿布(宗教机构)、国家或社会上的权贵所占有,他们带给美地那的马拉克奇一种"乡村面貌"(阿·芒勒尔[14])。这种乡村特色一直保持完整,直至保护领地殖民地的建立,它仍以城市化风格来表明自己的领地特点。

保护国时代:现代城市公园发展,但传统城市绿地渐被忽视

保护国制度时期以在老城城墙以外建立新兴城市,而让美地那城市承担传统空间角色为标志。即使殖民规划者的态度可以解释为一种保护古代摩洛哥文化的意愿,事实上它导致了社会空间的分裂和传统精英们的自由放任,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它表现为对美地那生态平衡的破坏。另一方面,在深受经济大危机(如 1929 年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影响的情势下,所有经济上的努力其目的都是为建立欧洲城市,这消耗了它们在这片相对贫瘠地区(1 万居民)的大部分建设投资预算。我们可以说,被称之为戈利兹的新欧洲城市模式的微弱的城市化活动,按照殖民城市规划者的计划,以扩展的花园和城市绿化带对城建项目进行大量补偿。

至于美地那,它没有机会得益于此拯救计划,它形成一个吸收农村居民的极地,他们大量地相继定居到那里,从 1910 年到 1930 年,居民人口增长了 6 万人。在 1950 年,相对于 1912 年而言,穆斯林人口翻了 1 倍,农村人口外流在 1935 ~ 1945 年间达到了顶峰。这个原来容纳 10 万居民的城市,在半世纪内容纳了超过这个数值 1 倍的人口,人口增长的结果是无秩序的城市化的扩张和美地那城市绿地的消失。[15]

借助于逐渐增长的大众对于住房建设的要求,倡导者们毫不犹豫地将耕作区和果园分成若干份出卖。这种促使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的行为,导致了几年内对大量城市花园系统造成毁坏的投机狂热,而建立起来的则是空间令人窒息的美地那。为了非理性的建设利益,传统的整体协调被打破,也没有了任何对原有空地的政府管理。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城市的北部、东部和沿着古城墙的众多条块分割的区域,那些对于马拉克奇居民有着特殊意义的作为散步场所的古老果园已被破坏殆

尽。时至今日，只有留存的那些地名向我们指示出在那古老的时代美地那发生的事情：美丽的空地和欢愉的生活。

独立以来城市花园的状况：走向衰落

独立以后，城市绿地的情况取决于人口变化和郊区城市化的大趋势。从1960年起，马拉克奇经历了人口的复苏，这种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在30年中（从1960年到1982年）人口从24.3万人增长到44万人。根据城市化计划，在东南（西第-约瑟夫-本-阿利）、北部（穆罕默德亚-达乌地亚城）和西部（度阿-拉斯加，度阿-伊兹基）发展了卫星城市，并增加了周围的居民点。[16]据2000年初的预测将达到大约100万居住人口和与之相当的巨大的城市建成区面积。对于这并不乐观的趋势，我们不禁要寻思城市花园典范的结局又如何呢？我们可以通过地图资料的对比研究找到初步答案。以马拉克奇1953年的计划为例，美地那传统建筑群布局稠密，但一些长有绿草的岛状地带仍然继续存在。人们还注意到在东部有"阿格达-巴马德"，和部分的"热娜-拉飞亚"、"热娜-布斯奇"、"阿萨-阿乐巴哈达"、"阿萨-布阿西德"的遗迹，在西部，有"阿萨-阿乐玛木利亚"和"阿萨-米阿布德斯兰"，古度比亚的花园，以及公园和城市旅馆的果园组成的花园走廊的遗迹（图7）。在这个并不详尽的清单中，还应添加扩展到更南边的大阿格达-阿乐莫拉德的果园和油橄榄园。在美地那之外，一条茂草绿带覆盖了整个壁垒街（从巴博-纪德到巴博-勒高博），并延伸到西部环绕伊威那热地区的实验田和美地那式的历史花园。只有空军基地的建筑阻隔了这大自然景观的进一步延展。围绕吉贝尔-归里滋周围和沿着卡萨布兰卡大街的城市基底上好像浮现出一片绿色海洋。事实上，如果美地那给人以城市化进程是以牺牲原始生态遗产为代价的印象，那么此处的欧洲化城市所呈现的情况正相反，整体形象更为平衡，所环绕的大自然更为开放。

对1953年计划的研究结论显现：对古老城市风景的破坏皆因为商业竞争的利益而失去了城市花园的特点，而那些新的欧洲化城市反而表现了这个特点并将其保持下来。现在采取马拉克奇1986年版本的计划（农

业部长,哈巴)。通过对比这两个计划,我们可以形成对城市绿地近况的大致概念。[17]除了阿哥达的公园,阿萨-米阿布德斯兰和一些由遗留的城市旅馆和古度比亚的花园组成的小绿地,美地那已停止侵害这些构成世纪遗产的所有传统城市绿地。有趣的是,制图员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使得阿哥达的公园里一块20公顷绿地得以保留,而实际上这仍然被当做花园的小块土地已差不多变成了废墟。这不禁让人对于尚留有惹人关注的林木的阿哥达-巴马德产生同样的担心。

这些由文献和图表数据对照得出的评价结果,若伴以包含着城市绿地情况的统计分析,其结论将更为清晰。最近的马拉克奇统计年鉴(SDAU,1988年)的开场报告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绿地面积与城市人口关系一览表:[18]

城市	人口	城市绿地面积(公顷)	城市人均占有绿地面积(平方米)
Médina 美地那	235 000	49	2
Guéliz 盖里兹	12 000	14.2	12
Hivernage 伊威那热	6 600	199	301
Mohammedia-Safi 莫罕美迪亚-萨非	58 000	2	0.34
Extension-ouest 西部开发区	29 000	2.5	0.86
Sidi Youssef b. Ali 西迪-约瑟夫-本-阿利	77 000	……	……
Total 总计	417 600	266.7	6.4

资料来源:法以兹,历史花园,54。

根据每人10平方米的绿地面积的国际标准,我们可以发现除了盖里兹和伊威那热,其他部分(95%的人口)的绿地面积大量短缺。[19]情况特别令人不安的是美地那和西迪-约瑟夫-本-阿利,它们包含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点。这些在绘制图表中给出的评注数字,从感性的层面让人们

注意到现实的倒退和绿地生态破坏的不可逆转性。

通过简短的历史回顾,我们得出两方面的重要结论:马拉克奇的美地那,在其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同时在既保证人口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又保持必要的建筑与自然环境的平衡两方面获得了成功。直到上世纪初,马拉克奇的居民每人还占有至少60平方米的绿地,是现代居民按国际标准的6倍。这就意味着马拉克奇的居民只需走几米就可以进入给他们带来乐趣的花园和果园的中心地带。

花园城典范的危机和出路

根据近五十年来的演变推测,状况如下:

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与自然界之间数百年来的平衡状况遭到终止。在美地那历史上第一次以牺牲绿地为代价,不考虑过去遗留的生态财富的循环利益而推进城市化。因此,今天的居民们不仅被剥夺了传统花园和果园,而且要经过好几公里才能找到一片宁静的让人愉悦的绿地。

美地那(坎大哈)传统供水系统的紊乱和水价的上涨,迫使大量的城市花园占有者们(特别是在西亚德和庭院里)选择铺石板地面的解决方法,这对城市生态是没什么益处的。[20]

最近的行政划分,通过限制美地那大区的城内空地,增加了外部自由空地的建设压力。这种政策标准常常是有利于公园和地方行政或是旅游景点,而很少考虑到特定区域的特殊要求,显得是一种奢华的和非必备性的城市绿地的规划。

在路面和一些地方铺设沥青,造成植物根系的窒息,也是大片树木消失的原因之一。这些因素并不是涉及美地那城市绿地衰退的全部原因,但不管怎样,它们在城市生态方面对马拉克奇历史中心的巨大衰退产生了足够的作用。最近的空中拍摄照片和它们的重建数据结果,更加剧了这种紧张气氛(图8)。它证明了过去组成城内绿化带的花园空地仍在继续消失。残酷的现实是,在一些人口相当密集的地区最缺乏的恰恰是城市绿地(北部、中部、东部)(图9)。[21]

今天遍布美地那的定居者们再也没有机会遇见往日那些供城市环境

通风,并提供园艺需求的围合式的园林了。他们所能希望的,只是找到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零星的绿地,或者,更好一点,小规模的树林。总之,只剩几处遗迹能让人们回想起美地那的昨天:处于大自然中的花园城市。但是考虑到人口和旅游的压力,这些能够组成未来园林计划支撑点的重要古迹,却呈现出封闭存在的外表,忍受着窄小的空间、乏力的保护和某些人为的破坏。

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到现在,我们数不清有多少园地被毁坏,或是由于人类的忽视,或是由于不可控制的城市化因素。为了停止这种毁坏,每个人都应开始将整个星球视为花园,与自然共同发展,而不是毁坏她。马拉克奇,只有当它在各方面受到毁坏和侵蚀之后,才隐约使人感觉到应该在"全球花园"[22]的未来建构中扮演一个特殊角色。它的城市花园的过去,它的景点和它的潜在价值,赋予它这个权利并激励它扮演这个角色。给它一个恢复理智和重新出发的机会就足够了。然而,为了这种复兴成为可能,我们应毫不迟疑地发起广泛而大胆的计划来保存和修复这些历史花园。我觉得这个计划应该及时落实并享有优先执行权。因为,虽然有很多同样令人担忧的现象,如大量的失业和贫穷等,但可以找到近期或长远的解决办法,而遗产的丢失则是不可逆转的,世上没有任何药剂能够治疗冷漠的国民意识而使失去的古老花园艺术重现光芒。

注释

[1] 马拉克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所认定的摩洛哥唯一同时享有物质(1985)和非物质(2001)人类遗产称号的城市。

[2] 对摩洛哥和其他北非国家的相对于那些在法国保护国期间建立的欧洲城市而言的伊斯兰历史城的称呼。

[3] 1 公顷相当于 2.47 英亩。

[4] 埃-法耶兹-穆罕默德:《关于阿乌兹地区漫长的农田水利整治历程》;安·马利耶·M、邦什克·A:《地中海地区伟大的水利工程与社会发展》,巴黎:ENPC 报业集团 1994 年版,第 28~29 页。

[5] 阿莫哈德王朝在 1130 年至 1269 年执政。摩洛哥皇帝将这个时期延展到西班牙的大部分(阿拉伯阿乐-昂达路国家),北非和撒哈拉。

[6] 埃-法耶兹-穆罕默德,马拉克奇:《危难中的遗产》,巴黎:南方行动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86 页。

[7] 阿拉伯在 18 世纪攻占了西班牙。他们的这个国家被称做阿拉伯阿乐-昂达路(穆斯林西班牙),一直持续到 1492 年。

[8] 埃-法耶兹-穆罕默德:《马拉克奇的花园》,巴黎:南方行动出版社 2000 年版。阿格达是和 17 世纪庞大的国家花园相关,具有辽阔的盆地的柏柏尔人的一个起源。阿尔萨的花园类型比阿格达延伸的少,包括一些有收益的种植园和一些楼阁。热娜坐落在历史城的壁垒内的果树和棕榈树种植空间。至于利雅得,是一些坐落在城内的拥有花园庭院和美丽建筑的大房子。

[9] 坎大哈是输水通道,使水在地下流通并提供给农业和城市用水。这门技术在贝尔司发明并流传到古代的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在土尔番绿洲和中国找到这些地下水道的例证。

[10] 佛雷斯迪埃、让-克罗德・尼克拉:《伟大的城市和公园系统》,诺尔玛出版社,巴黎:法国建筑学院(1997),第 206~207 页。

[11] 卡思巴代表苏丹生活的那些筑有防御工事的国王城地区。

[12] 埃-法耶兹-穆罕默德:《马拉克奇的古老花园:帝国城市的生态记忆》,佛罗伦萨:EDIFIR 出版社 1996 年版。

[13] Jnânât 是 jnân 的复数。

[14] 埃-法耶兹-穆罕默德:《马拉克奇的古老花园:帝国城市的生态记忆》,佛罗伦萨:EDIFIR 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1 页。

[15] 埃-法耶兹-穆罕默德:《马拉克奇的古老花园:帝国城市的生态记忆》,佛罗伦萨:EDIFIR 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1 页。

[16] 这些村镇是生活着一些农民和园丁的乡村居民点,纳入城市区域后,沦为贫民窟。

[17] 来源:农业部,拉巴特。

[18] 此表格以"马拉克奇城市发展计划预报(SDAW1988)"为根据。

[19] 这些与克里兹和伊威那热相关的数字,在近来建立的大楼、地区空地发生变化之后,应从基础进行复查。从 2000 年到 2005 年,这个著名的欧洲城市的面貌因为高层建筑的原因已完全改变了。

[20] 美地那的房屋花园庭院的石板地面剥夺了历史城的植物遗产。

[21] 它们是位于中部、北部和东部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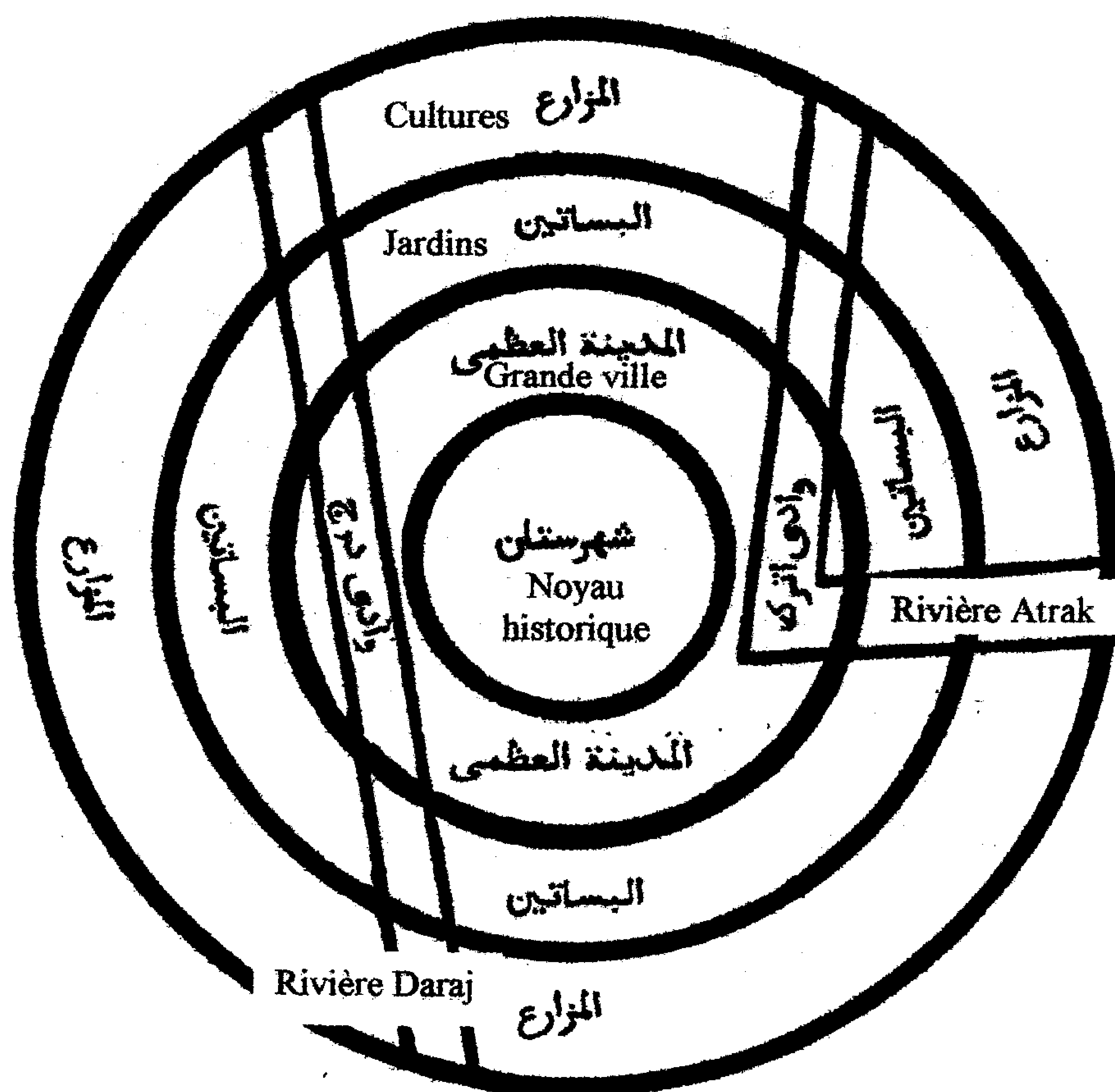
[22] 艾弗诺、克罗德和克雷蒙,季耶:《全球花园》,沙托瓦龙:黎明出版社 1997 年版。



图 1　卫星影像图



图 2　拉格达的航拍图



Qazwin (XIIIe s.)

图 3　卡兹维尼时期的卡兹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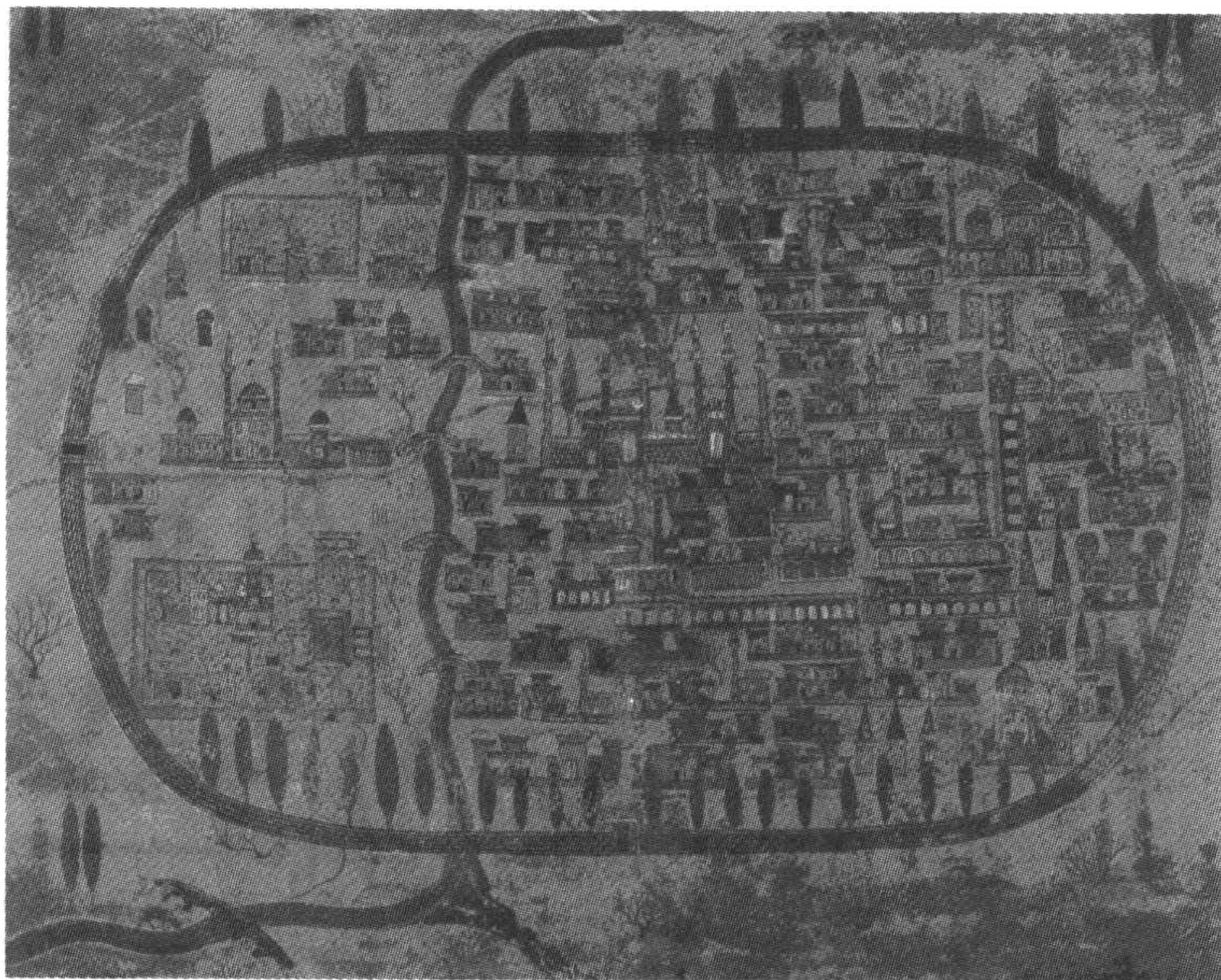


图 4　马特拉克西十六世时代的卡兹文



图 5　从空中看坎大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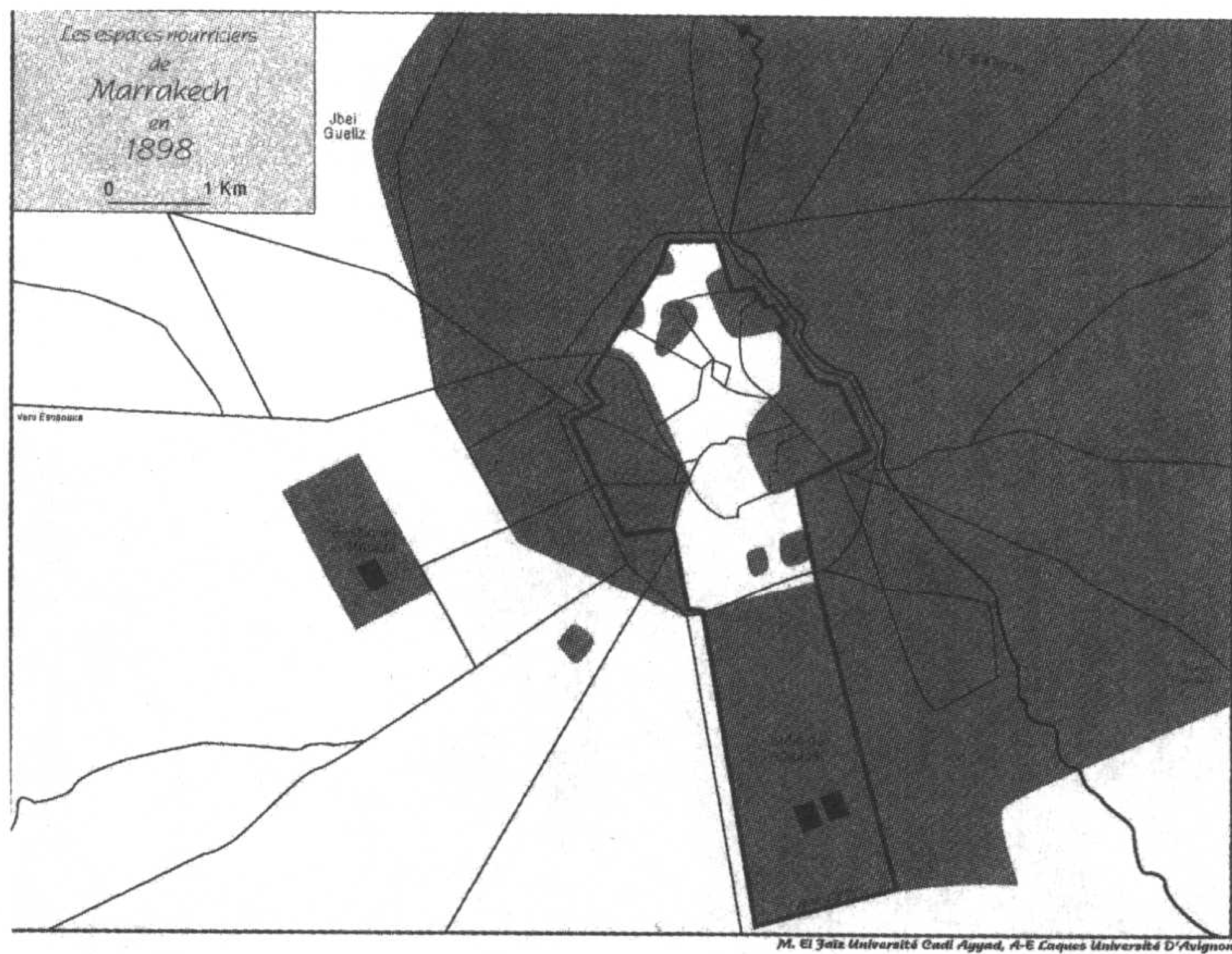


图 6　根据郎贝尔的平面图复原的城市公园



图 7　独立以来城市公园的衰落



图 8　荒漠中的凯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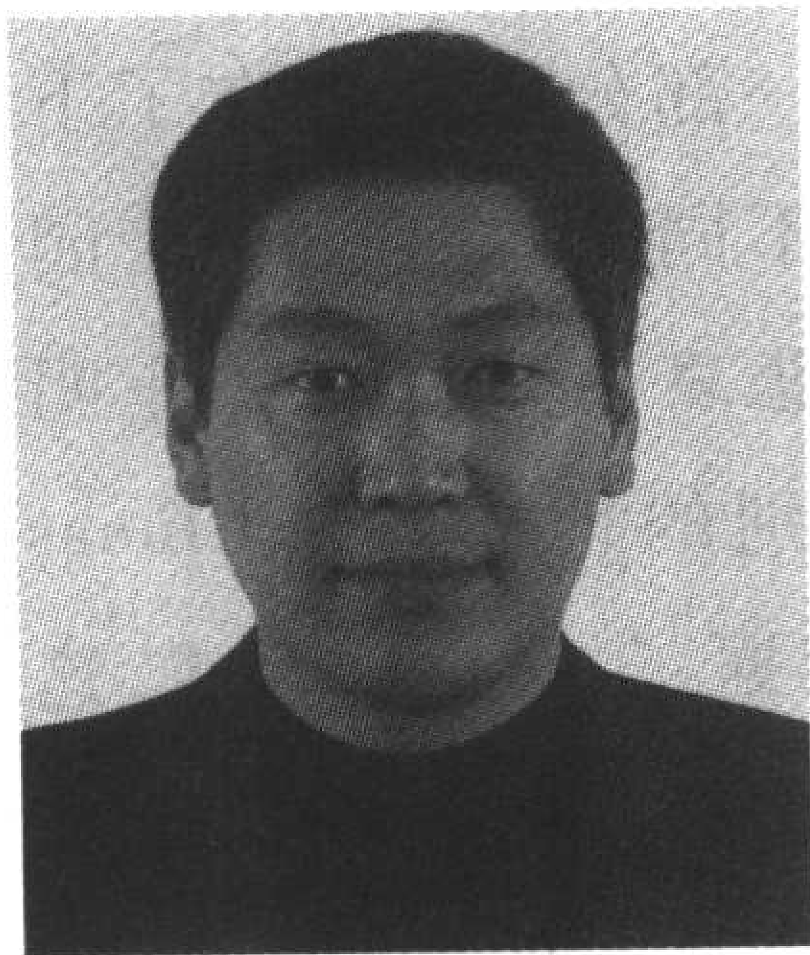


图 9　肆意践踏文物的时代

（作者单位：摩洛哥马拉克奇卡迪·阿亚德大学）
（吕宁兴　译）

作为文化记忆的苏州园林
（11～19世纪）

［澳］许亦农



许亦农（Yinong Xu），新南威尔士大学建筑学高级讲师。爱丁堡大学建筑与城市史博士。曾出版专著 *The Chinese City in Space and Tim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Form in Suzhou*（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0）。研究兴趣集中在城市史、园林史和建筑环境的时间与记忆上。

本文的标题隐含了两个引人入胜的分命题[1]，一个命题着重论述历史上如何保护苏州园林；另一个命题集中分析园林保护能为城市文化生活作何贡献。这篇短文主要集中论述在苏州历史上不同园林保护模式中的文化寓意，主要以沧浪亭和绣谷园为例，不过为了扩大分析范围，还将简析其他几个苏州名园。苏州园林的过去，就像斯蒂芬·欧文曾经考察描述的金陵的过去一样："其中，历史的过去和文学的过去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Owen 1990, 421）在讨论过程中读者将发现，语言、词汇和源于文学诗词的研究方法经常被运用到园林中。[2]文末简短地考察了这些园林在苏州可能起过了哪些作用，然而，由于能得到的原始材料有限，从而使本研究双重受限：1. 文章只是对问题进行界定，而不是找到确定答案；2. 虽然探求现象变化的历时性分析方法更好，但本文只能采用共

时性的方法。

童寯在他的著作《江南园林志》(1937 年完成,1963 年出版)中相当全面地描绘了江南园林,童寯分析江南园林史的一个观点是:"江南园林,创自宋者,今欲寻其所在,十无一二。独明构经清代迄今,易主重修之余,存者尚多,苏州拙政园,其最著者也……江南园林,论质论量,今日无出苏州之右者。"(童寯 1984, 24, 27)这里,我们除了可认识到在研究私人园林过程中苏州园林的重要性外,还可从童寯的话中推出一个特别的观点:童寯显然承认园林为了能够长时间保存下来,它必须经过修复,但是修复不一定就保证这些园林的流存,往往只能保留相当一部分园林,而不是全部,因此任何无批判地、无差别地用"修复"一词,势必模糊园林变迁的复杂图景。

但是所有讨论基于这样的假设:明代或之前的一部分园林存在了下来。关于这点,克雷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有不同的思考:"尽管园名保持一致,但是,这只是我们可理解的一种愿望,悲哀的是没有一座明代园林以最初的'形式'存在下来,不论在苏州或别的地方。"(Clunas 1995, 40)这里他运用的"一致"和"存在"的概念依据了一系列标准,这些标准看来与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许多园林小品家的标准并不完全一样,虽然历史性和真实性对于宋代以前的作家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欧洲的角度研究此论点,Clunas 运用天性模糊的术语"形式"(form)似乎不能使观点变得清楚,如同在西方思想中,一方面它意味着"形态"(shape),另一方面意指"观念"(idea)或"本质"(essence)[3],研究园林时,问题的关键是园林物质方面的变化与人们对它设想的变化一样多。在物质方面,我们在以下的部分将看到,Clunas 的结论得出得过于匆忙,方式也过于简单,他似乎忽略了这一事实:空间的布局和园林的整体配置在许多情况下被当做修复和拨款的关键凭据,在概念上也构成了园林景观和特征的主要或者决定性的部分。

不过重修和一定程度的干预模式的确保存了大量苏州园林;"重修"(restoration)一词让我们追问,在每一起干预园林的事件中"重修"是何含义。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通过强调三种特别的模式,来重点分析一些在

旧园林景观基础上的园林建设事件:1. 强调重修甚至重建,表达对园林历时的连贯性的敏感;2. 建造一座在物质形态上与旧园林协调的新园林,严肃寻求新旧园林部分在概念上的共鸣;3. 彻底地取代旧园林,因此面临着不适应和文化断裂。在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的渗透下,即使研究了不同的园林或一个园林史的不同时期,这三种重要模式依然代表了园林保护方面理念和实践的连贯,但是并不能够从其中得出清晰牢固的准则。

一

证实园林持续性的最突出的修复案例是沧浪亭[4],最早由北宋苏舜钦建造(1008～1048 年)。庆历 1043～1045 年间,苏舜钦受政治改良运动的反对者陷害,被削去官职,1045 年早春,他南返途中逗留苏州,两年后购买了苏州城南昔日吴越权贵孙承祐(936～985 年)的废园,在园中的溪流旁边建亭,名"沧浪",作《沧浪亭记》,之后历史上赋颂沧浪亭的诗文无数。[5]

北宋(960～1126 年)时期,园林艺术和诗文一样是学术界熏陶和表达自我的方式。苏舜钦在沧浪亭休憩,借沧浪亭抒发对中国文人经常谈论的人生哲学的感慨:人与天地万物的基本关系、往事兴衰和王朝更替。他在《沧浪亭记》诗文中,叙述了这些关系,探讨了人性和自由问题,这也是苏舜钦在命运转折的关头必须解决的问题。

人们常误认为沧浪亭的命名揭示了苏舜钦归隐的意图[6],"沧浪"一词的确来自孟子和楚辞文选的意味深远的名句:"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浊我足。"[7]这隐喻了现实社会中文人的政治理想:政治清明时,儒家的文人就应该出仕;政局腐败,就应该归隐山林。[8]正是这种在两极的摇摆中相互对比、相互补充的生活方式,给苏舜钦提供了建沧浪亭的思想基础,后来还吸引了其他文人官员和清朝皇帝前来凭吊。苏舜钦并不想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他如此哀叹其不幸遭遇、悲恸名誉和财富的丧失。沧浪亭提供了他反思昔日兴衰枯荣的场所,让

他找到了山水“至乐”，达到人生的新境界，从而最终帮助他超越了自我。[9]苏舜钦从被动地逃避现实，转向积极等待，在他看来，虽然1040年的政局浑浊，但是，总有一天，政府会变得正直和诚实。[10]

通过沧浪亭的建造、命名和赋诗，苏舜钦改变了旧园林的意义。园林的结构像文学作品，它清晰地说出建造者或园主人的思想，表达他的价值观和理想，激发其诗文创作。同样，园林结构再现了诗文的精神、表达其新思想、体现其价值观和丰富涵义。苏舜钦写《沧浪亭记》不只是描述了一座亭子[11]，而是随着他在旧园址上增加了这一单体建筑，他命名并重塑了一件艺术作品，传达了旧园没有的重要信息，创造一座新园林，突出与旧园林在概念上的断裂。然而从相反的观点来看，池塘、假山和植物的配置给他难得的宁静，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该园因此既是环境，也是文学作品的主题，在这里，他从旧园址关涉到的自然、历史和社会的范畴，进行了两方面的创作。

苏舜钦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他于1048年被任命为湖州府衙助理，但是他还没到任，就于当年12月病逝。之后沧浪亭数移其主，元朝（1260～1368年）沧浪亭为佛教徒所有，苏舜钦建的亭子便不复存在了。

1546年，僧人文瑛在大云寺的旁边建造了一个新亭子，名之“沧浪”。文瑛请归有光（1506～1571年）著《沧浪亭记》以记载此事。归有光在文中描绘了此亭的毁建经过：先是沧浪亭变成大云庵，然后大云庵又变回沧浪亭。然而归有光并没有真实记录文瑛的建亭经过，他用艺术性的修辞归结了文瑛重修沧浪亭的原因。据文瑛自己所说，他根据苏舜钦的典故才在苏舜钦建亭的位置重修沧浪亭，文瑛重建一个新沧浪亭，并让归有光记下建亭的意图。然而，归有光坚持认为文瑛只不过重建了过去曾有的园林，他所建的亭子不仅只是受苏舜钦的影响，其实就是苏舜钦沧浪亭的延续，文瑛的亭子归因于苏舜钦。

归有光总结重修沧浪亭的潜在原因来自明朝社会一贯的特性：是文士传承了文化和声誉。归有光引用苏州现在和过去杰出的政治人物来说明此观点，由于他们不是归有光所认可的文人，也没有留下重要园林文化遗址。因此沧浪亭的历史主要是一件文学事件：苏舜钦的名字能够流传

至今是因为他是文人，因为有具有和他一样价值观和理想的后继者[12]。但是为了说明为什么是由一个和尚重构沧浪亭并恢复其名，归有光在文末特意点明文瑛其人："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归有光把文瑛确定为士，他仿佛在对文瑛说：如果你希望你建园有意义，你的亭子值得记载，你就得成为我们的一员，赞成我们的文化。

归有光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间接却广泛，在袁宏道（1568～1610年）的"园亭记略"中，他不认为沧浪亭经过重修：

> 吴中园亭，旧日知名者，有钱氏南园，苏子美沧浪亭，朱长文（1041～1098年）乐圃，范成大石湖旧隐，今皆荒废。所谓崇岗清池，幽峦翠筱者，已为牧儿樵竖，斩草拾砾之场矣。（袁宏道1981，180－181）

自此以后，文瑛和归有光的名字记入地方志，在沧浪亭条目下，记录着："文瑛重修沧浪亭和归有光作记。"沧浪亭的文化连续性就这样创造出来了。

1695年，沧浪亭再度重建，当时宋荦任江苏巡抚，他在山顶新建一亭，还是保持了沧浪亭的名称。同时，他根据苏舜钦的文章（图1）在园址上建造了大量的建筑，自此沧浪亭成为政府产业，用于招待来访官员。宋荦对沧浪亭是如此感兴趣，以致除了写作有关旧园的大量诗篇，还捐款修复园林，修复工作达6个月之久。1696年，他作《重修沧浪亭记》，接着编辑了两章的《历代沧浪诗选》，两年以后他又编撰苏子美作品集，并为之作序。

宋荦在他记载自己活动的传记中，清晰地表达了强烈的时间延续感和他让沧浪亭恢复旧观的努力（宋荦1884，B. 1a-2b）。虽然对于沧浪亭只是介绍了其地形部署，没有描述具体的外观平面图，然而，从苏舜钦到宋荦，沧浪亭不仅是历史事实更是苏舜钦的行为和理想的永恒象征，重建的其实是"沧浪亭"一名所蕴涵的价值。不过，宋荦特别提及苏舜钦，他似乎着迷于重修与苏舜钦有关的所有景点。

苏舜钦的生活是中国古代文人悲剧——怀才不遇的典型。他具有同代人称道的文学天赋、政治理想、正直人品等所有预示前途光明的素质。但是当他在贬谪四年后英年早逝,梦想破灭了。人们普遍同情苏舜钦的命运,正是这种理想未实现的遗憾激发了宋荦重建沧浪亭和为它赋诗的行为。而且,苏舜钦遭受的困厄并不是他个人特有的不幸,任何立志在文章和仕途上有作为的士人官员都难以幸免,这是社会普遍现象,宋荦也不例外。在此意义上,宋荦对苏舜钦不只是同情感,简直就是移情,这种移情化成行动。

宋荦在他的《重修沧浪亭记》中,不仅在风格上部分模仿苏舜钦的《沧浪亭记》,还故意重复一些细节,乍一看,宋荦的文章简直就是简单的模仿。宋荦重写了历史,因为苏舜钦的园记既吸引他又令他不安。通过增删、变更,他更改了历史,修订了令他不安的源泉,再造了一些想象的古今情节,建造了从理想的过去指向理想的未来的园林。由此宋荦的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修正:将园林从无奈的归隐变成积极出仕。

宋荦不认为重修沧浪亭是一次性的工程,而是将园林未来的维护也加以考虑。实际上,在以后封建帝国的两个世纪里,沧浪亭数次维修和重建(图 2),其中,1827 年和 1872 年 3 月,江苏总督梁章钜(1775 ~ 1849 年)和张树声(1824 ~ 1884 年)主持的两次大规模的重修格外引人注目。梁章钜重修沧浪亭时,苏州仍然特别繁荣,梁章钜就像宋荦一样被苏舜钦的经历鼓舞,他不仅以同样的题名写了一篇游记,同年还编纂了四章《沧浪亭历史文集》[13],甚至他写的《重修沧浪亭记》的部分记述也与宋荦的文章相似[14]。然而,仔细阅读梁章钜的游记,可以发现在记述重点上有微妙变化:一方面,认为是摈弃了声誉、等级、权力、财富的文学传统保持了沧浪亭的不朽。在这一点上,比起宋荦的观点梁章钜的观念更接近归有光。另一方面,梁章钜在一定程度上巧妙平衡了宋荦强调的沧浪亭的涵义,默默地为园址增加梁鸿(第一世纪,CE)的光辉(梁鸿因品行正直和博学著名,他也还有归隐山林的渴望)[15]。梁章钜还在园址中寄托了他自己的愿望,通过在他后来的著述中选摘苏舜钦早期的一些次要的、表面上渴望退隐的诗作来表现。所以,梁章钜微妙但深刻地再次调整了宋荦

改写过的苏舜钦的沧浪亭的历史。

梁章钜重修沧浪亭不到35年,苏州在1860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遭受广泛的毁坏,两年以后,苏州再次被封建帝国军队占领,随后苏州作为地方省会的地位被上海取代。张树声在他的《重修沧浪亭记》中围绕新的主题——恢复园林曾有的光彩——进行了叙述(张树声 1929,2.4b-2.5b)。通过重新整理园址上的主要建筑,他再造了一个新的沧浪亭(图3),此亭与最近的沧浪亭,而不是很久以前的沧浪亭保持一致。如果说宋荦和梁章钜的重修沧浪亭围绕再造理想中的园林场景,因此指向未来,张树声主持的重建则面向过去。宋荦和梁章钜也重视过去,但是,他们要模仿的过去太久远了,相比之下,可供张树声参考的时间很近,因此是可见的、可回归的真实的过去。然而,回归历史的主题又开启了深刻的意义:沧浪亭被张树声视为苏州和整个区域的命运标志,它的修复象征苏州经济在太平天国战争后的恢复。它之所以具有这一象征涵义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是当地政府的产业。[16]苏州由太平天国革命引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混乱并没有被张树声当成偶然的事件,而是看做事物内在的发展趋势、事物的发展和衰颓的必然周期。这种转化并不是偶然发生,而是应时而变,因此,通过重修沧浪亭来象征苏州的康复,不是张树声的不得已的举措,而是事物相互联系发展过程中的不可避免的启示。

每一起与沧浪亭相关的事件,从文瑛和尚到张树声,均被记入地方志中,列在"重修"条目下,暗示对生命循环和园林的文化传承的一般理解和期望。这种一般理解基于假设的园址不变性,基于命名所承载的广泛含义的延续性,基于几乎在每一篇文章中强调的空间部署和地形结构的连续性。然而,我论证了由于一些特别的原因,强迫私人承担起重修的任务,和完成此项事业的具体日程。每一次修复就是一次关于园林含义的新思想的汇集。苏舜钦在园林和文字两方面的创作,产生了最初有关沧浪亭的传说,随之是归有光的、宋荦的、梁章钜的故事和张树声的重写,这些丰富了沧浪亭的历史含义。园林为文字提供了图解,文字成为园林的脚注,文字和园林因此相互作用,每一方将对方作为它自己存在意义的前提。通过园名的寓意,新观念在园林和文字间川流不息,因此,沧浪亭没

有变成固定的一个园林模式或法则;园林的主题思想穿越历史,但是不同的要素和阐释在不断地增加,这些形成了它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渊源。与之有关的物质园林和文化作品聚集成为有机的、整体的、一个自身不断生长和丰富的"概念上的古墓"[17],从中折射出更加生动、难忘的园林效果史(图4、图5)。

二

不可否认,在苏州文人园林中,沧浪亭的例子是独一无二的。1695年,它成为地方政府的财产,因此在其发展的轨道中,重修的理念——或者建造或者感知——文化传承的不变价值特别显著。然而这并不意味沧浪亭园林的重修理念独一无二。我曾经在文章的开始引用童寯的观察,认为每一次园林的重修整饬往往发生在主人变更之后,具体变化方向取决于新主人的社会背景、个人经历和建造时的思想原则,当其中一项与前任主人一致时,外在的重修条件就极有可能具备,绣谷园是典型的例子。

1647年,苏州学者蒋垓在城西北购买了一小块地,建了一座园林。然而直到一块旧石从园林中挖出后,才为之命名。该石用"绣谷"描写园林的两个性质,从石上的书法风格判断,蒋垓相信一定是在北宋时期或之前写下的,并对石头表面的这两个汉字石刻感到惊奇,蒋垓将石头植入墙中,以这两个汉字作为园林的名称,1660年著《记绣谷》(蒋垓 1970,39A. 40b)。文中提出的三点值得具体讨论:首先,蒋垓声明建园是为了其父退休后读书学习,在说明此高尚的目的后,园林的意义被设定下来。第二,虽然蒋垓创造了绣谷园,却是建基于他购买土地的现存的物质部署之上,它曾有的主人并没提及。第三,在园林的命名上,蒋垓运用了名字的内涵——包括与之相关的文学渊源[18],首先它的书法的特征和它雕琢精美的外表,其次它与园林景观的呼应。因此,通过运用一个石头表面上奇迹般的词汇作为园林的名字,和根据匿名旧园主的园林部署,在蒋垓新建的园林和它的文学前辈间造成了概念的断裂。

蒋垓死后,园林三移其主,到17世纪晚期,他的孙子蒋深(1668 ~

1737 年)再次购得此园。应蒋深的邀请,严虞惇(蒋氏家族的远房亲戚,1650~1713 年)写《重修绣谷园记》(严虞惇 1970,39A. 40b-41a),重述蒋垓获得园名的经过后,严虞惇写道:

"孝廉(即蒋垓)捐馆舍,园属之何人?绣谷之名,若灭若没者四十余年。孝廉之嗣孙曰:深,字树存,博学好古,哀先世之文,得向之所为《绣谷记》者,求其处,则园已三易主矣。慨然于堂构之弗荷,乃复迁之,苏秽芟荒,崇峭决深,莳植益蕃,丹垩益新。顾瞻亭庑,旧石具存。于是树存曰:'嘻!此王父之遗志也。'遂以《记》书而镵之石,而与旧石俱陷之壁。"

园林的重修首先以恢复园名为标志,进而严虞惇列举蒋深修复过程,例如"苏秽芟荒,崇峭决深"读起来很像蒋垓的叙述;这强化了重复性和持续感。但是,蒋深在绣谷园上更多是主观地改建,而不只是重建。从 1729 年其外甥孙天寅著"西畴阁记"中可知,他扩大了园林面积,增加了许多新景点,他于 1710 年间在园林中建西畴阁[19]。类似宋荦强调的沧浪亭的历史延续性,严虞惇对绣谷园延续性的理解,也不看重园林外观的修复,而是牢牢地建基于继承家族产业的涵义上。由此可见,园名的重要性仅仅只是所有重要文化意义中的较次要的部分,但是假如仅仅在园林的物质方面解释蒋深对园林的重修,那么也只是肤浅的理解。

"于是树存读书其中,仰咏尧舜言,俯追姬孔辙,扬清芬,怀骏烈,而'绣谷'遂复为蒋氏业矣。"

是否蒋深的重修工程真的有助于保持园林持续性,有赖于他的个性和拥有的文化生活。然而如果没有永恒的文字媒介,这种持续性也不会保持下来,严虞惇强调了这一点:

"夫天下之物,显晦有时,而废兴有数。绣谷之石,晦数百年,而

孝廉得之;孝廉之园,废数十年,而树存复之。以是知天下无物可久,而惟文字可以传于无穷。树存之汲汲于《记》之不朽也,思深哉!"

严虞惇认为重修的园林终究也是短暂的,园林的功能得以建立,在于蒋深的孝心、诗文传家的延续,最重要的是体现了园记在文化记忆方面的价值。为了确证他的观点,严虞惇在文章结尾谈论园林赖以保存的途径:

"树存既请王君石谷为之图,海内士大夫皆歌诗以纪其事,园之胜概,隐隐心目间。余他日得脱尘网,归故乡,逍遥琴书,亲戚道故,园中之草木泉石,尚能一一为树存赋之矣。"

在蒋氏失去此园后,绣谷园真的依然很好地存在着,关于它的记载直到19世纪晚期还出现在一些学者的笔记小说中,特别是在钱泳(1759~1844年)、梁章钜和黄体芳的著作中。[20]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学者和严虞惇、孙天寅之辈看待园林的视角是不同的。两派有许多相同的兴趣特征,例如园林史中石刻的外观和王翚的参入,也有不同的一些特征——对严虞惇和孙天寅之后的一些史实的记述,包括园林主人变迁的经过:从蒋氏到1797~1820年被叶氏所有,然后19世纪30年代又被谢家拥有,最后19世纪40年代归属王家。然而,有一条见闻本应被严虞惇和孙天寅在文中提及,但是却被忽略,相比之下,后来的学者们对之很感兴趣并对其津津乐道。

康熙(1662~1722年)己卯年(1699年),蒋深在园中举行了一次送春会,有大量名士参加,包括尤侗(1618~1704年)、朱彝尊(1629~1709年)、惠士奇(1671~1741年)和时满26岁、地位还很低下的沈德潜(1673~1728年);王翚和他的学生杨晋(1644~1728年)等应邀为聚会作画。60年后,又是一个己卯年(1759年),这时已是乾隆(1736~1795年)年间,蒋深的儿子蒋仙根筹备了第二次送春会,此时86岁高龄的沈德潜已经从大阁士职务退休,是参会人员的最尊贵者。钱泳、梁章钜、黄体芳都用大量的篇幅记述了这两次事件,不过,这些学者的文字中都没有园

林修建的记载。考虑到历史的交替，严虞惇和孙天寅至少应该提及1699年的聚会，从聚会的重要的文化意义来看，他们文中没有丝毫相关记述似乎显得有些奇怪。

假如从另外的角度看，两类文本的差异又是符合逻辑的。对于严虞惇和孙天寅而言，作为蒋氏的亲戚，必须强调重修的主题，园林的延续体现了家族事业的延续。1699年的聚会虽然是苏州文化盛事，却会转移严虞惇和孙天寅文章的重点，然而乾隆、梁章钜和黄体芳却从外人的角度将此园放到大的社会背景中。园名的延续主要因为石刻汉字，但是这个名称仿佛使兴趣中心从蒋氏家族转移到当地文化历史。据记载，蒋家以后园林的拥有者频繁变更，他们看重的不是园林作为家庭财富的象征，而是重视园林作为场所的功能，在其中当地历史得以展开，在自然无情的循环中交织着人类功绩成败的有情轮回。

因而，我们这里区分了学者们具有的两类园林文化记忆，每类出于不同的视角。和沧浪亭的例子一样，绣谷园的名称和园址不变、蒋家重获所有权、园林空间部署和景观性质的一致，证明了严虞惇和孙天寅所说的家族血脉的延续性在园林外观上的体现。然而从更宽阔的视角看，蒋家以后所有权的频频变更和园林中性的命名，使得旁观者的诠释焦点从家族业绩转向社会和自然的交互作用，园林史凭此得以丰富。这种现象与沧浪亭一比较就显出差别，沧浪亭成为政府的单独产业，能够看成不变的实体，名称承载了很大的涵义。在沧浪亭的例子中，中心人物和谈论者都有同样的思维方向；然后在不同的分支点上深入发展，使园址聚集并体现多元价值[21]。

三

详述沧浪亭和绣谷园的例子，仅仅强调了园林的一些特征，没有界定园林具有的文人性。四个关键性的园林因素——园名、园址、园主人、空间部署——从不同的方向持续促成了苏州园林的卓越成就。为了扩大我们对苏州园林保存（garden conservation）研究的视角，让我们简评其他苏

州著名园林的一些事迹。

首先是关于艺圃(图6)的小插曲。17世纪末,该园在所有者和名称上发生了三次以上的变更,从袁祖庚(1519～1590年)命名为"城市山林"和1560年后称"醉颖堂",到文震孟(1574～1636年)1620～1640年间称之为"药圃",再到姜埰(1607～1673年)称"颐圃",清初时称"敬亭山房",姜埰死后,他的第二个儿子姜实节(1647～1709年)称"艺圃",这么多名称隐含着园主人对于出仕的不同姿态;大多数名称与表示相同类属的文字"圃"相连。姜实节的园林名称与其父的命名发音接近,但是园主人有不同的人格,文化经历和社会背景也不一样。在近乎一个半世纪里,园内的建筑也被变更了,据汪琬(1624～1691年)列举的园林主要景点,可知姜家在园址上增建了许多建筑(汪琬 1933a, 39A:26b)。

为了显出园址的文化传承,把不同时期的园主人串成相互呼应的历史链,归庄(1613～1673年)、魏禧(1624～1680年)和汪琬分别被姜实节邀请写园记,他们虽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实际上这些文章却相互呼应。汪琬强调尽管反复更换园主人,园址却非常奇妙,具有持久的名望,因为与其他园林相比,许多不知名的园林只是提供享乐和炫耀财富的场所,都将"行且荡为冷风,化为蔓草也"。他简洁地总结了每一届园主人与众不同的人格特性,通过互补,园主人的不同特质在园林史中集聚,分离的园主人仿佛变成了一个人(汪琬 1933b,39A:26a-b),园林的场所性因为园主人的整体特性而得以识别。

魏禧承认了园林的山林溪流之美,同样,追踪了1560年以来的历史,强调园林的连续的三个主人:袁祖庚、文震孟、姜埰都是有德行的人。然后类比说:"园林配得上柳学士的山水赞。"(魏禧 1943, 33-34)809年柳宗元(773～819年)在永州八记之一中讲述他如何在西山的钴鉧湖旁购得一片山地,强调说只有当物得其主时事物才最有价值(柳宗元 1979, 765-766)。魏禧的赞美并不能得出结论:园林历史可被分解为不同拥有者和兴衰模式的不同阶段——通过间接提到柳宗元的诗文,时间在这里延缓。凭借袁祖庚、文震孟、姜埰共同成为他们喜爱的艺圃的主人,艺圃成为著名园林。

现在我们来看归庄写的两篇小品文，归庄是归有光的孙子(归庄1984,284,360－361)，在两篇文章中归庄坚持说姜埰的园林景观与文震孟的没有两样。但是他的观点，受到一篇作为“城市山林”(这是艺圃第一任主人袁祖庚曾用的园名)匾额的后记的反对。与归有光在大云庵和沧浪亭找到发展的关联一样，归庄也从历史循环中反思艺圃：“城市山林变为药圃，这事发生在明朝灭亡的历史转折点上；药圃变成城市山林，是在王朝更替很久之后。”然而，描绘此循环再次否认了景观结构的变化：“虽然世界经历了剧变，池塘、山坡、花木和竹子依然如同过去一样”——因此，园林被描写成在社会和政治剧变后，景观依然维持了原样，场所的文化持续性正是建立于时间的悬置和外在世界无情变化的基础上。

园址、园名和空间部署是我们的第二个简评的中心。位于沧浪亭东600米的网师园(图7、图8)，最初建造和命名于18世纪50年代晚期，园主人是宋宗元(1710～1779年)，但是很快就失修。1790年后，瞿兆骙(1741～1808年)拥有并重建该园，1795年，钱大昕(1728～1804年)作《网师园记》记载此事。[22]对钱大昕而言，园林从宋宗元到瞿兆骙，关键的一点是场所的连贯性，钱大昕写后者道：“瞿君远村，偶过其地，惧其鞠为茂草也，为之太息。”瞿兆骙接着购买了此园，并且：

> “因其规模，别为结构，叠石种木，布置得宜，增建亭宇，易旧为新……园固非昔，而犹存网师之名，不忘旧也。”

因此，瞿兆骙的干涉不是重修而是重建一座园林。然而人们依然能说它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并期望延续到将来，如果“犹存网师之名”就能“不忘旧也”。这再一次证实古人园林的传承较少地依赖建筑、山水的物质外观，而是依靠其名称蕴涵的意义，以前的园林要被保存，则要靠它持久的名称而存在。这并不表明在园林的延续性上，要忽略园林整体物质属性，而是必须依据“因其规模，别为结构”来新建，换句话说：对于网师园的保存而言，园址的一般构造必须可以继续辨认，如同沧浪亭的延续，萦绕的溪流和小丘必须继续界定着园林场所的物质特征。

曾有的物质部署在拙政园(图 9、图 10)的重修中起同样的作用——我们的第三个简评——但是园名让修复者明显地不安。1509 年,与文徵明(1470～1559 年)齐名的王献臣(进士,1493 年)始建拙政园,拙政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23],史料说明到 17 世纪上半年,拙政园已经长期荒弃。1631 年,王心一(1572～1647 年)购下旧园的西部[24]并建了一座名为"归田园居"的新园。一百年后,旧园的中心部分被苏州官员蒋棨所获,在旧址上建复园。在他 1747 年写的小品文中记录了蒋棨重建园林的事实。沈德潜很注意园林的命名:

"吴中娄齐二门之间,有名园焉,园以复名,蒋司马其旧地为园而名之者也。……百余年来,废为秽区,既已丛榛莽而穴狐兔矣(王献臣时期),主人得其地而有之,谓荒宴可戒,而名区不容弃捐也,(蒋棨)于是与客商略,因阜垒山,因洼疏池,集宾有堂……旧观仍复,即以复名其园。"

引用名园的例子后,沈德潜接着说道:

"今因拙政废园而复之,虽林庐息影,栖精颐神,……而不欲自标其名,恐使前此之殚心规画者,因我而遽归乌有之乡……"(沈德潜 1986,81－82)

园林重修可以通过新建或者在现有的规划上建造,但是哪一种是真正的重修?在沈德潜的文章中,名词"之"替代了"重修"一事;因此含义很模糊。我们必须知道该园因与名人相关,故有许多著名的文艺作品描绘它,因为它岁月悠长,所以很著名。然而从蒋棨的观点看,盛名基于这里曾是一处著名园址。因此,如果该地用做园林以外的目的将是难以容忍的,在此观点下,蒋棨所重修的园林,和沈德潜构思的园林一样是一种类属意义而不是特定意义的园林:即园址被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或"景观",因此,新园林取名"复"——恢复。值得注意一个适用于苏州的许多

园林的有趣的观点：可感知的自然兴衰的轮回和浮沉，使园林重修多元化，在具体情况下，或者指个别园林自身的连贯性，或者指园址的连续性，或者指研究历史或文化意义的延续性。

通过沈德潜的文章得知，就像沧浪亭、绣谷园和网师园一样，蒋棨为园林命名是整个工程的关键。共同的目标——为过去的事物赋予价值然后延续下去——贯穿了他们的诗文，但是蒋棨对园名的推理相当引人注目，我们在此被告知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想法，可能蒋棨相当了解园林不复是以前的园林，园址是旧园不可替代的三个要素之一，所以园林不能用旧园的名称。另一方面，他应该知道他的园林也不是完全不同的新园林，而是重修的园林，结果是他的园林没有新的、独立的的身份。因此他将园林命名"复园"，对他而言，这并不是园林的真名，因为在这种背景下，它只传达了表面的含义。可能蒋棨仅将其园视为拙政园在自然界兴衰轮回中的一个短暂阶段，或者他想以他自己的头衔建一座新园林并取了一个不为众人所知其意的园名，他的行为却被沈德潜从其他方面进行了诠释？能够确信，蒋棨和沈德潜都知道命名的功效——它能改变对现实的理解并改变现实自身，因此在园林形式和变化中起轴心作用。

蒋棨复园东墙的另一边的园林将是我们的第四个简评——王心一在1631～1634年间建造的"归田园居"，依然归王家所有。且不说该园经历了作为一个家族财产的漫长时期[25]，它显露的原创性简直就是蒋棨建构园林的鲜明对比。王心一不仅给园林取了新名，而且在他1642年写的"归田园居记"中，没有提及旧园及历史上这里曾有的任何景点。他说购买的园地是一片荒田（寓意所有旧园景点的消失），之后他告诉我们他如何在旧址上进行空间布置和规划：

> "地可池，则池之；取土于池，积而成高，可山，则山之；池之上，山之间，可屋，则屋之。"

如果可以确定园址是王献臣的拙政园的东部，王心一的建园就传达给我们重造一座新园林的清晰案例，新园声称与旧园毫无关联。[26]

王心一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与苏舜钦建沧浪亭时的心情相呼应。当苏舜钦购买园址时,“面对的是旧园林的观念”,虽然在苏舜钦的园记中,提起孙承祐的姓名,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引出他自己作为平民与作为官员的孙承祐的地位反差。同样,朱长文在《乐圃记》中解释说,他的园居于1070年后建于金谷园旧址,归钱元僚(887~942年)的一个后辈所有,这给我们的印象,如同当地著名学者与军队下僚的身份反差。[27]换句话说,苏舜钦和朱长文都坦白承认他们各自的园林替代了曾有的园林,在这些案例中,他们提及前任园主的独特方式,毫不惭愧地以牺牲旧园林为代价,促进他们的文化成就。王心一的办法是不管园址过去的情况,让王献臣和拙政园走出历史,然后他的园林就强调了创作新园林的建造活动,而不是在旧园景观上重新改建。

正如史蒂文·科拿普提醒我们所说:“名著的痕迹总是会显现,为了促进和强化伦理和政治部署,我们用过去的因素来对应强加给我们的对现状的理解。”(Steven Knapp 1989, 131)这些学者对过去生动记忆的精心选择,证实他们并没有奴隶般地依从过去,而是小心翼翼地借用过去来服务现在,换句话说,学者们永恒的集体记忆是园林创造的演变过程。园名、园址、布局、园主人,这四个至关紧要的不同因素以不同方式在一起发挥作用,在园林的历史中,既造成文化的断裂,也促进了文化的延续性。

四

在《留园记》的结尾,俞樾(1821~1907年)写道:“吾知留园之名,常留天地间矣。因为之记,俾后之志吴下名园者,有可考焉。”(俞樾 1970, 39C. 18a-b)这最后一句逐字读来像宋荦的“重修沧浪亭记”结尾的一句。写作目的使读者很清晰:文章用为将来的研究,他们的读者是有能力和兴趣来进行学术研究的人。他们实际和潜在的读者当然是比曾经申明的要广,其他学者(包括当地记者)的有关苏州园林的著作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考虑该区域的总人口的话,人数依然相当有限。由此,当我们用词组“作为集体记忆的园林”,我们一方面在探索总体范围密切相关的问题,

另一方面，探求记忆的详细内容。

我曾经在别的文章中说过，沧浪亭园址的集体解读，应该从社会群体和不同诠释背景的公众接受方面进行限定。大多数评论家知道这种多元性，在受到专业教育的人和普通大众中进行清晰的区分（Xu 2005，43-50）。例如宋荦著的苏子美文集的序言中，他代表那些作者们的观点进行了区分。在简要告诉我们为什么和如何修复沧浪亭后，宋荦写道：

> “而吴中之人雅好事，春秋佳日，游屐尘集，遂擅郡中名胜。我辈凭吊古迹，履其地则思其人，思其人则必慨想其生平，求其文章词翰，以仿佛其万一，盖尚友之道然耳。”（苏舜钦 1961，299）

这里所强调的大众与宋荦这两类人对沧浪亭的不同解读，既是启迪也是误导：差异如此显著以至于被强调出来，然而它也误导我们认为这是对园林复杂解读中的唯一不同。

即使宋荦认可的这些同类人：有坚实的传统教育的背景、有相近的文化史和传统的渊博知识，他们对园林的解读也各不一样。依据社会背景和个人经验的不同，他们的观点各有差异：从嗜好古物和冥想过去、崇尚作为世俗的对立面的“雅”、留恋自然兴衰循环，发展到标榜正直人品、培养美德、羡慕归隐和玄思、以及赞美孝廉品行。然而，他们关于单个园林的思考的观念通常趋向明确化：在天地万物、人类历史和社会时代变更的背景下，来理解园林的特定涵义，大多园林还为他们提供了无数雅集的理想环境，就像在绣谷园举办的送春会一样。例如，钱大昕如此看重与园林相联系的聚会的重要，以至于他在《寒碧山庄宴集序》中申明“园亭显名士，诗酒传天下”（钱大昕 1998，139），反过来，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珍藏了这些文化事件。

雅集很高级，受中等教育和不是当地文化精英圈内的人，都没有机会参加，参观园林时，他们试着欣赏旧诗文、匾额、对联、镶板刻字和观赏美景。实际上，大量的游览者没受什么教育，在学者眼中，他们将混淆王心一的归园田居和拙政园，比起“寒碧山庄”他们更喜爱“刘园”，而不是“留

园"(吴一峰 1994,7;俞樾 1970, 39C.18b)。他们游园,往往与春游习俗和特殊事件相关。19世纪的当地学者许起说:"苏州园林在阳春和夏日全部开放,邀请人们游园赏景。"(许起 1939,21)钱泳说:"寒碧山庄道光三年(1823年)始开园门,来游者无虚日,倾动一时。"(钱泳 1979,529)究竟是什么吸引普通人游园?钱泳提供了一个原因:

> "狮子林和拙政园,皆为郡中名胜。每当春二三月,桃花齐放,菜花又开,合城士女出游,宛如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也"(钱泳 1979,523)

顾録1830年出版的《清嘉录》,也许讲得最好。此后不到20年,袁学澜著《吴中名胜记》。关于春游习俗,顾録写道:

> "春暖,园林百花竞放,阍人索扫花钱少许,纵人流览,士女杂遝,罗绮如云,园中畜养珍禽异卉,妆点一新。
>
> 贩糕售玩,宛然市井。
>
> 苏南苏北,园花遍开,北园尤盛,轻风五彩,金翠炫目。草庐凉亭,热酒香茗迎客,入暮,喧嚣阔论之声尤闻。"(顾録 1986, 73-74)[28]

顾録还提到苏州西北郊的虎丘、西部的天平山、灵岩都是郊游的好去处。这里提到的是观景和享乐,普通人来游园首先因为这些是园林,是本地名胜,比起远处的名山胜地更方便游玩,他们受名气、建筑、花竹山池等美景的吸引来观赏园林,他们到狮子林看"巧峰深壑"或"岩上五株古松",到拙政园看江南独一无二的茶花,到留园看"十二奇峰假山"[29](顾録 1986,75-76)。仿佛观者将园林视为季节出游习俗的场所,对于他们,园林的价值在于感性愉悦,而不考虑园林是否具有突出的文化意义。另一方面,一些园林的主人仿佛也有意与季节性出游的习俗合拍,届时将稀有动植物、名贵书画古器展示出来,以吸引游客、引得众人惊异,增加园

林的文化意义。换句话说,园林享乐的场所感,受到有文化意义的场所感的调和,这些现象并没有任何消极寓意,正如马克·揣布在当代的讨论中,说到景观设计的意义:"享乐是有价值的追求,和探求意义一样有效。"(Marc Treib 2002, 101)

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情景下,解读和接受园林的差异并不让人惊讶。"意义不仅存在于场所中还与旁观者紧密相连。"(Marc Treib 2002,99)换句话说,价值不是内在于园林自身,而是在场所与客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被赋予场所的。园林史根本上就是文学史,任何对园林意义的体悟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这与苏州社会现实并不总是一致;然而园林史同时也是享乐论,故园林共同的解读就能穿越不同的社会群体;此外,因为"意义被文化限制,最终由个人决定"(Marc Treib 2002,97),在苏州特有的文化、生活下,园林意义注定是复杂的,园林的保存也是如此。园林的历史、文化和物质财富,使人们具有跨阶层的多元价值观,对于受古典教育的人,园林的建造和重建与自然兴衰循环相对应,它们能将文化的延续或断裂具体化,指向理想的将来或者实际的过去,从而解读园址时,记忆与历史相结合。[30]对一般大众,园林存在保证了他们季节性的观赏,象征现在和不久的将来所拥有的生活条件,在记忆中是比历史事实更长久的形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引证作为文化记忆的苏州园林,来探讨我们的主题。

参考文献

[1] 白居易:《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2] 曹林娣:《苏州园林匾额楹联鉴赏(增补版)》,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3] 陈从周:《园林谈丛》,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0 年版。

[4] 陈从周:《园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

[5]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4 年版。

[6] 陈植、张公驰:《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年版。

[7] Clunas, Craig. "The Gift and the Garden", *Orientations* 26, No. 2 (1995): 38-45.

[8] 范成大:《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9]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10] 弗提・阿德瑞(Forty, Adrian):《语言与建筑:现代艺术词汇》,伦敦:泰姆斯 - 哈德勋出版社 2000 年版。

[11] 顾公燮:《小峡仙集摘抄序 1785》,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7 年版。

[12] 顾録:《清嘉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13] 顾震涛:《午门表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14] 关成交:《归震川诗文选》,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15]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四部丛刊版。

[16] 归庄:《归庄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

[17] 大卫・哈克斯:《南方之歌:屈原和其他诗人的古中国诗词选集》,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5。

[18] 洪兴祖(1090-1155 年):《楚辞补注》,白话文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19] 黄体芳:《醉乡琐志》,苏州: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 1940 年版。

[20] 蒋垓:《休归记》。

[21] 蒋瀚澄:《沧浪亭新志》,1929 年。

[22] 卡普・斯迪文:《集体记忆和真实的过去》,*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123-149。

[23] LAU, D. C. :《老子:道德经》,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3。

[24] 梁章钜:《沧浪亭志》,1827 年。

[25] 梁章钜:《归田琐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6] 梁章钜:《浪迹续谈》,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27] 刘敦桢:《苏州古典园林》,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79 年版。

[28] 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29] 孟子:《十三经注疏版》,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30] Mote, F. W: "A Millennium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Form, Time, and Space Concepts in Soochow", *Rice University Studies* LIX, No. 4 (Fall 1973): 35-65.

[31]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7-24.

[32] Owen, Stephen. "Place: Meditation on the Past at Chin-l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 No. 2 (December 1990): 417-457.

[33] 钱大昕:《寒碧庄宴集序》。

[34] 钱翼:《拙政园纸稿》,限制发行。苏州:1986 年。

[35] 钱泳:《履园丛话》,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36] 沈德潜:《复园记》。

[37] 宋荦:《沧浪小志》,1884 年。

[38] Strassberg, Richard. *Inscribed Landscapes: Travel Writing from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39] 苏舜钦:《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傅平骧、胡问陶校注,成都:巴蜀书社 1991 年版。

[40] 苏舜钦:《苏舜钦集》,沈文倬校点,北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41] 童寯:《江南园林志》(第二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4 年版。

[42] Treib, Marc. "Must Landscapes Mean?" In *Theory in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 Reader*. Edited by Simon Swaffield.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2. This essay originally appeared in *Landscape Journal* 14, no. 1 (1995): 47-62.

[43] 汪琬:《艺圃后记》。

[44] 汪琬:《艺圃记》。

[45] 王心一:《归田园居记》。

[46] 王逸:《楚辞章句》(*fl.* 1st half of the 2nd century CE),四部丛刊

版。

[47] 魏禧:《敬亭山房集》。

[48] 吴休志和曹云元(Wu Xiuzhi and Cao Yunyuan):《吴县志》,1933 年版。台北:承文出版社 1970 年版。

[49] 吴一峰:《登窗丛录》,上海:商务印书馆 1917 年版。

[50] 吴一峰:《循志堂丛考》,北京: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51] 吴一峰:《吴下名园记》,苏州: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 1943 年版。

[52] 许齐:《珊瑚舍雕堂摘抄》,序,1883 年,苏州: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 1939 年版。

[53] 许亦农:《中国园林中的边界、中心和外围:以 11 世纪的苏州园林为例》,《园林史研究与景观设计》2004 年 3 月第 1 期,第 21 ~ 37 页。

[54] 许亦农:《沧浪亭的建造和重建:表明在苏州园址史上的一种对历史的态度》,《园林保护史:案例研究和批判的争论》,编辑:hel Conan, José Tito Rojo, and Luigi Zangheri. Firenze, Italy: Leo S. Olschki, 2005。

[55] 俞樾:《留园记》。

[56] 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注》,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

[57] 袁学澜:《吴郡繁华纪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58] 张树声:《重修沧浪亭记》。

[59] 赵翼:《陔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60] 周正:《留园》,苏州:古物轩出版社 1998 年版。

[61]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注释

[1] 感谢米歇尔·柯南和两名匿名评委为此论文的草稿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2] 实际上,陈从周(1999,200)很清楚地说:“中国园林的研究应该从研究中国文学入手。”

[3] 关于“形式”的概念发展的概要载《西方建筑史》,见 40,2000,149 - 172。

[4] 以下沧浪亭的讨论摘录自:许亦农 2005,3 - 63。

[5] 一些现代作者根据苏舜钦的作品,认为他在 1045 年夏,建沧浪亭作为住所。例如,陈植和张公驰选注,1983,17;苏舜钦 1991,627。然而内外证据有力证实,一方面,沧浪亭早于 1046 年夏,另一方面,苏舜钦从没有住在此地。关于苏舜钦的《沧浪亭记》,见上书 1961,183 - 184。

[6] 见曹林娣 1999,2 - 3。

[7] 孟子 1980,7A. 55; 洪兴祖 1983,180 - 81。Hawkes 译 1985,206 - 2077,有小调整。

[8] 见王毅 7. 2b - 3a。

[9] 术语"自胜",用于"沧浪亭记"中,暗指老子《道德经》:"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此短语也见《吕氏春秋》。

[10] 苏舜钦在诗词中重复强调"有所待也……";这是他微贬即使"大遇时"也绝食而死的伯夷、叔齐,嘲笑屈原一遭放逐就自杀。

[11] 傅平骧、胡问陶(苏舜钦 1991,300,注 1)推测苏舜钦在园址上建了几处建筑,但是结合我们关于苏州 11 世纪的知识,深入分析文章,放弃了这类模糊的推测。

[12] 例如:章惇(1035 ~ 1106 年)和韩世忠(1089 ~ 1151 年)在苏舜钦后,分别拥有此园,归有光的记中遗漏了他们。在一连串园址拥有者的名单中,这个脱漏使文化持续性的主张更有效。

[13] 见梁章钜《沧浪亭志》。

[14] 比较梁章钜 1827,5a - 6b;宋荦 1884,B. 1a - 2b。

[15] 关于梁鸿传记,见范晔 1965,83. 2765 - 68。

[16] 沧浪亭的标志作用,可能发展自感觉到的集体园林命运与区域的兴衰循环的一致性——这一点最早被北宋学者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强调提出。

[17] 此短语首先被采用于牟复礼(Mote E. W 1973,53),针对苏州。

[18] 蒋垓在他的记末猜想,"绣谷"一词可能源于苏轼(1037 ~ 1101 年)诗文中的一句,或白居易(772 ~ 845 年)《草堂集》。该文英译见理查德 · 斯查斯伯格(Richard Strassberg):《雕刻的景观:中华帝国书法巡礼》,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34 ~ 137 页。

[19] 孙天寅,《西畴阁记》。

[20] 比较钱泳 1979,525;梁章钜 1981b,221;黄体芳 1940,5。园林彻底毁于 1860 年战火。

[21] 例如,比较以下人提出的观点:张汝湖,17 世纪学者,在关成交 2002,129 中引用;赵翼 (1727 ~ 1814 年) 1963,909 - 10;尤侗,载宋荦 1884 序;和归有光,宋荦,梁章钜,张树声。

[22] 钱大昕:《网师园记》。为了给宋宗元的建筑和瞿兆骙的重建增加历史文化份量,钱大昕用详细的语词,建立了与史正志 (1151 年进士)1170 年的万卷堂在地理名称上的联系。关于此点更充足的表述,见许 2005,51 - 53。

[23] 关于此园林的历史介绍见钱翼《拙政园纸稿》。

[24] 见刘敦桢 1979,53;陈从周 1980,22;钱翼 1986,3。

[25] 至少持续到 19 世纪上半叶。

[26] 王心一的观点被许多学者认同,包括沈德潜,同样写了一篇有关蒋棨的归田园居的记,强调它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借鉴拙政园。见沈德潜《兰雪堂记》。

[27] 见朱长文:《乐圃记》。关于此园的详细讨论,见许亦农 2004。

[28] 比较袁学澜 1998,92,104 - 8,124。据袁学澜,园林将从清明开放到初夏。

[29] 有趣的是,在他列举的曾经游览的地方,顾録仅分两类识别苏州园林——沧浪亭和拙政园置于"古迹"条目下,其他著名园林被列于园林条目下。沧浪亭的这种分类,在理解上符合宋荦、梁章钜和张树声对沧浪亭的解读。

[30] 我用的是诺拉(Nora)1989 年提出的历史和记忆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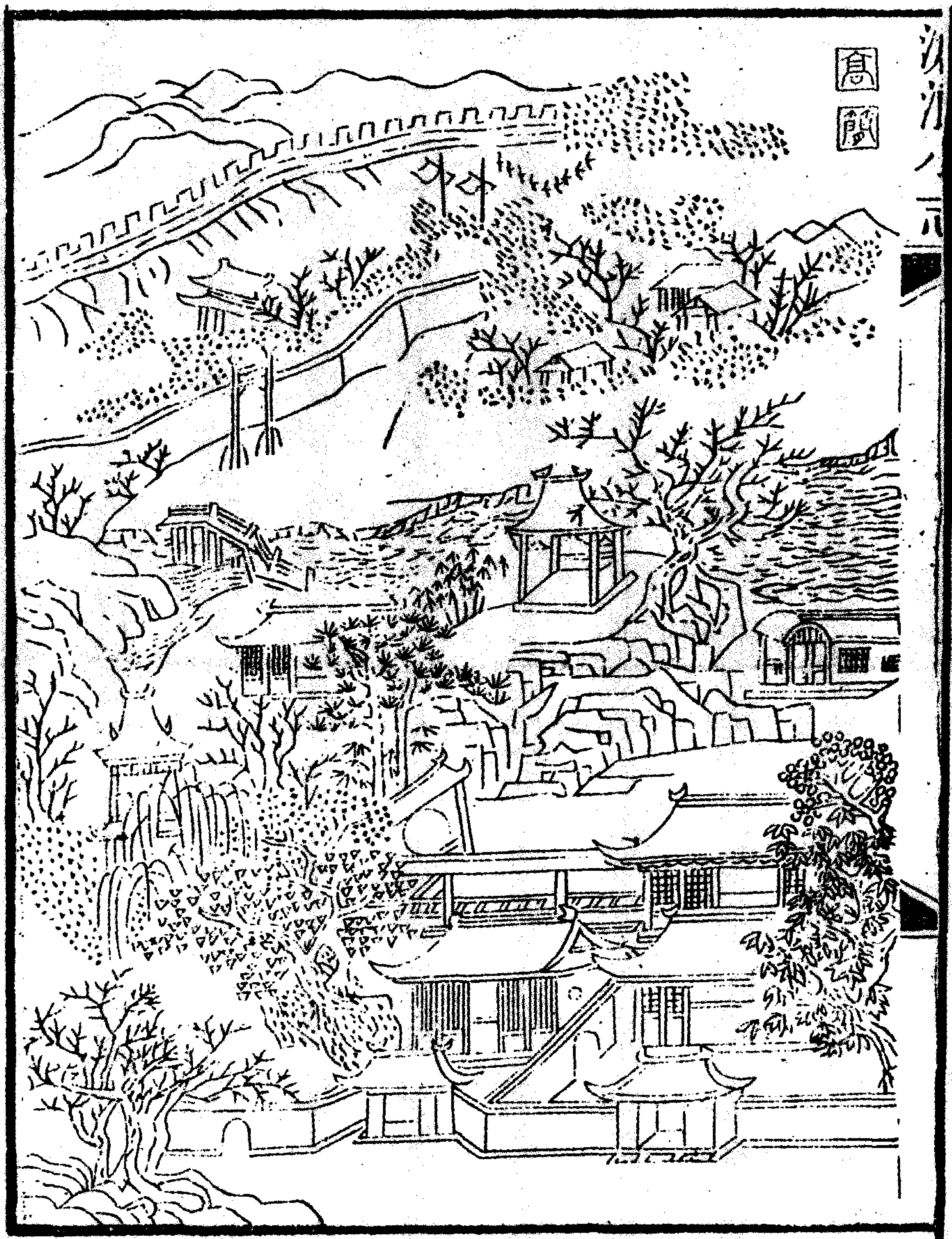


图 1　沧浪亭，图片来自宋荦《沧浪小志》，16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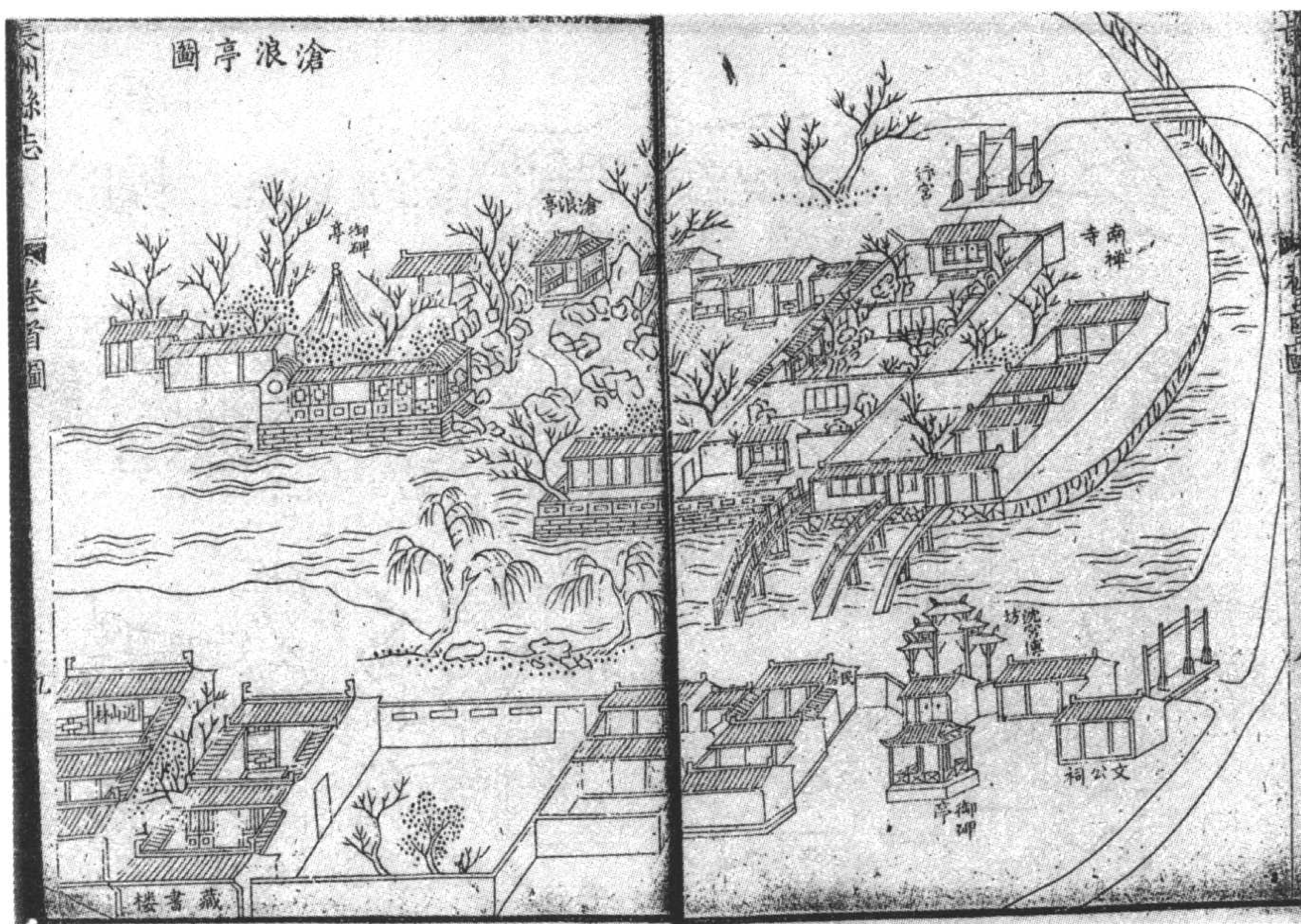


图2 沧浪亭图,图片来自李光祚(进士,1733年)《乾隆长洲县志》,顾诒禄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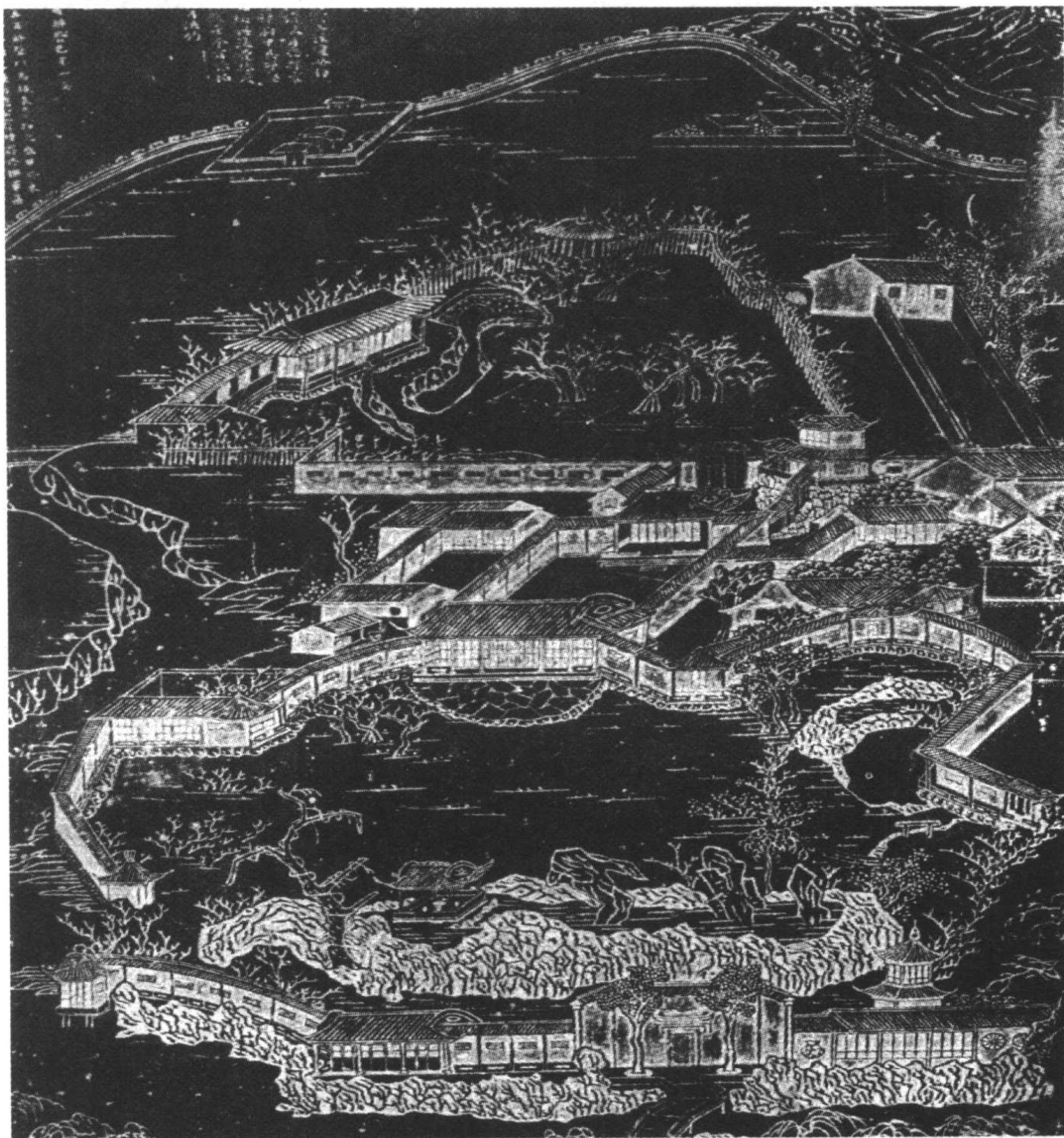


图3　刻于石头上的沧浪亭图,1883。



图4　由小溪对面向东南方向望去的沧浪亭。



图5　沧浪亭明道堂后的石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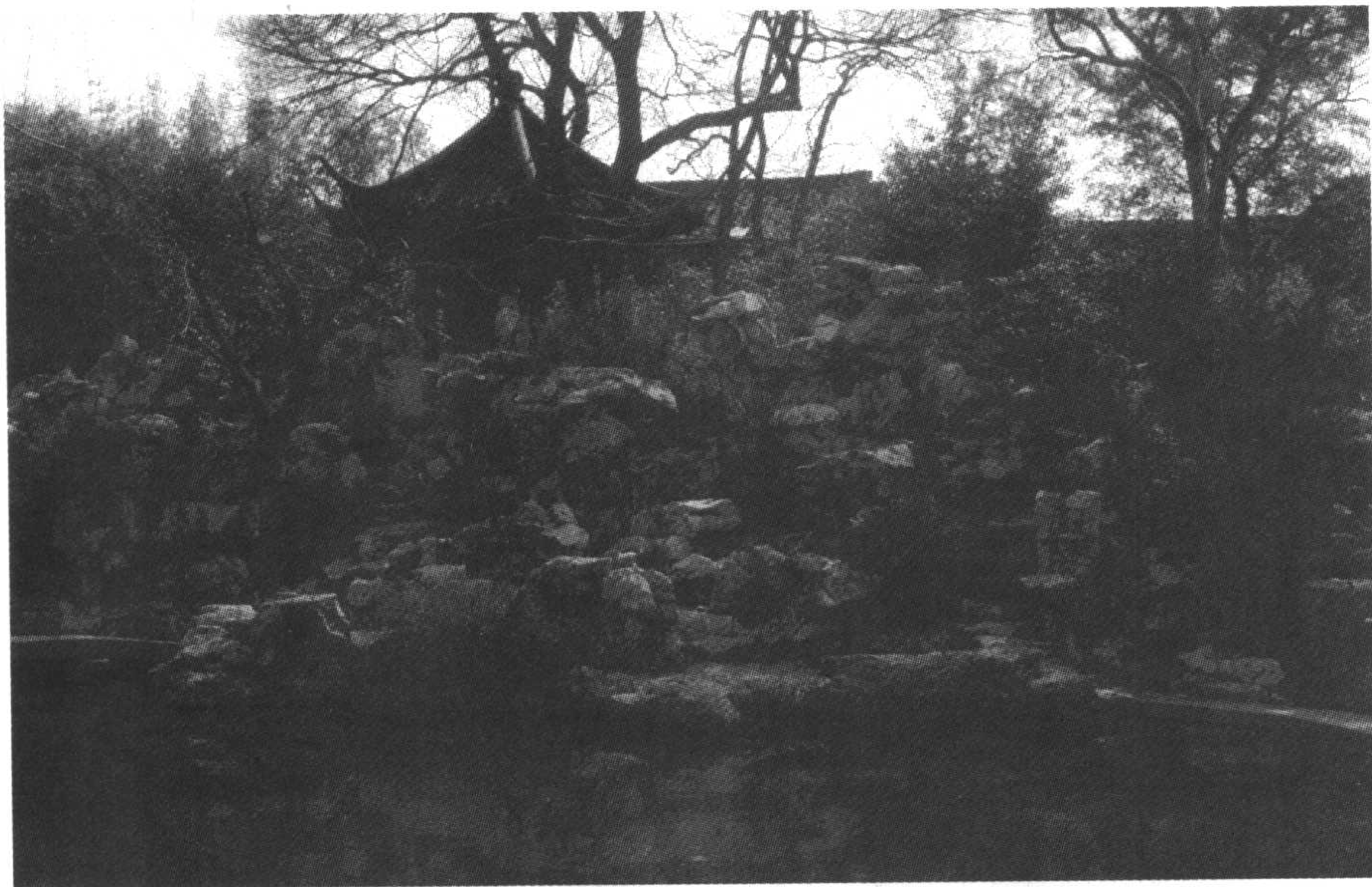


图6　艺圃里的假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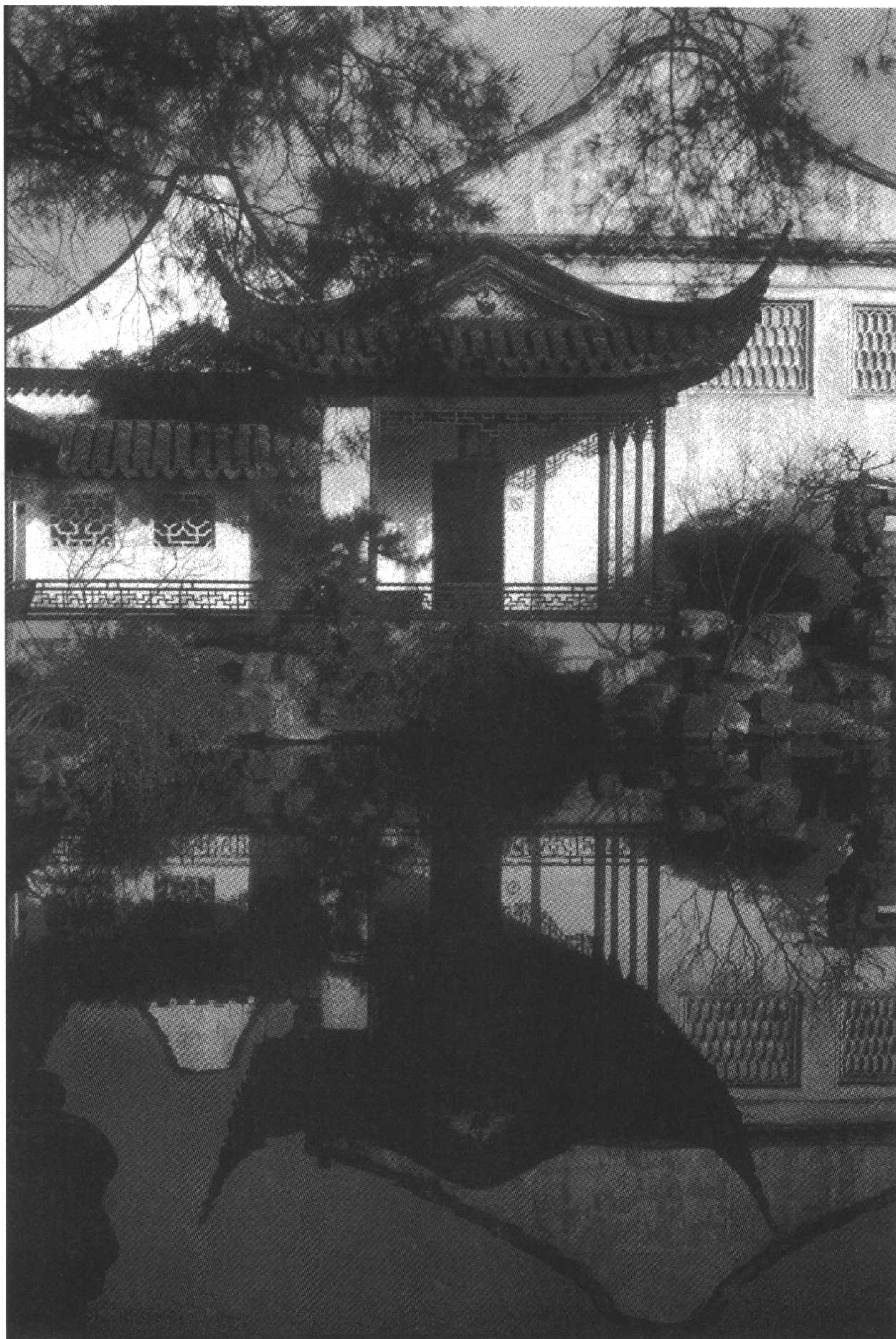


图 7　由池塘对面望去的网师园射鸭廊。



图 8　网师园池塘东岸。



图 9　拙政园的“别有洞天”和远处的报恩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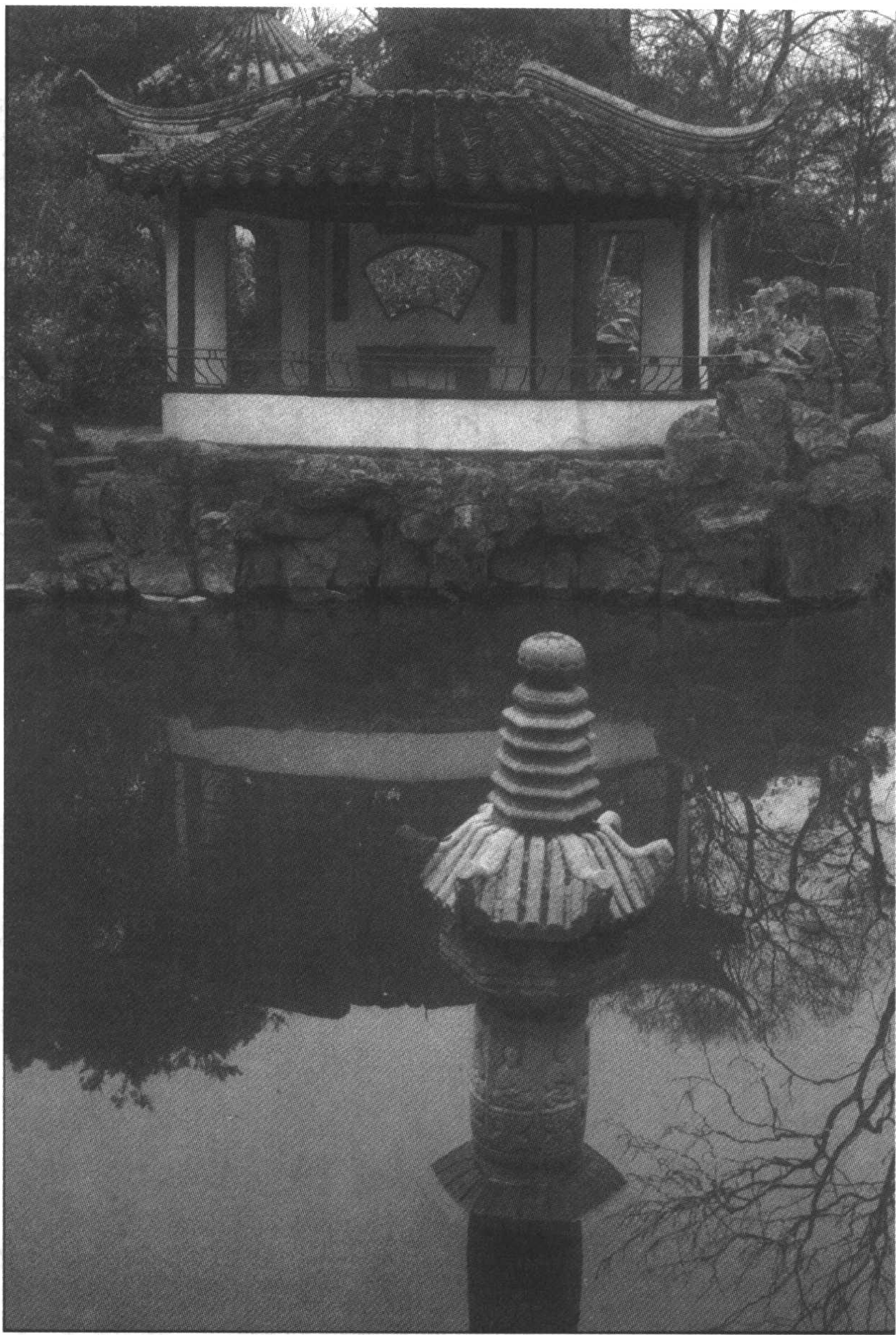


图 10　拙政园的“与谁同坐”亭。

（作者单位：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李世葵　译）

东京的散步场所和公园:传统的永久变革

[日本]S. 博苏



S. 博苏(Sylvie Brosseau),早稻田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1988年,在巴黎取得建筑学和城市规划文凭后赴日本并先后在东京工学院建筑部和东京大学学习研究。她早期研究日本19世纪晚期对西方城市模式的引介和城市空间的更新。之后她研究公共花园:它们的创造和目的及条件、它们的规划和特征、它们在城市规划和社会功能中的地位。这一兴趣让她进入到历史的考察当中,即研究日本人感知自然、建造景观以及在自然和城市空间之间建立特殊关系的方式。

在日本历史上,日本文化通过许多途径建立了一种对自然环境的情感和意识,它们融合了地方特色和外来影响,这种外来影响首先是来自于中国。这种"自然"观已经成为多种艺术表现的中心,在自然景观和园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江户,古代的东京,经过江户人精雕细琢的自然物在当时对于环境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是基本的,与对社会生活所起的作用一样大。在东京,自然景观和与之相关的社会活动对江户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综合起

来有两个特征:多样性和巨大的扩散性;直到现在仍然"把现在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上,是过去记忆的积淀"(Conan 2005, 67)。

江户古代人行道系统:建筑物和社会功能

德川将军统治的幕府时代(1603~1867年)有段较长的和平稳定期(尽管在后期有局部的饥荒和动荡),这个时期的社会秩序是严格按照一个等级制度和道德原则建立的。武士阶层是最主要的阶层,它在农民和工匠阶层之上,商人阶层之下。为了控制诸侯,德川将军制定了轮流议政制:大名(*daimyô*)和有权势的军事领地主必须轮流到东京定居,他们的妻子和后嗣必须住在东京当人质。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刺激了以货币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工艺品生产和城镇消费使富有商人阶层得以壮大,德川幕府通过禁止奢侈品的法律和社会阶层化的制度使这个强大的阶层保持中立(至少他们想这样)。[1]这些法令包括限制富有平民使用或支配某些物品。但与之相反的是,他们为大名承担着大量费用。然而,这些限制更激发了工匠和城市居民的想像力。

作为这个国家政治和经济首府的江户,其发展是个例外,据估计在18世纪初这个城市的人口就超过了100万人。大多数人是商人和城镇居民,虽然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力,但在发展市区文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将军容忍由这种文化产生的各种"有组织的侵犯"的可能性。[2]

市区文化建立在对物质世界的详察和感官对当下感知的基础上,这种自然欣赏又在这种文化中(即无限的自然力和现象及它们的永恒变化)占主导地位。随着庙宇、教堂的发展,私人园林和公共园林的创建,沿公路、河流、沟渠及大海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在整个江户时代,这些自然资源被编织进整个城市的框架中。虽然公共设施是由政府决定建造的,但百姓是各种拨款样式的最终来源。上野的形成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例证。

1624年(德川)幕府时代初期,在一个僧侣的提议下德川家光决定建造一个大型的佛教寺庙以保佑这个城市的安全。[3]在上野池塘的周围和

种满树的小山上建造了许多寺庙，种上了樱花，作为帝王和历史上的首都，京都周围聚集了许多有纪念价值的地方。[4]上野很快成为了最有名的地方，到那儿可以欣赏开放的樱花和可供模仿的名所（*meisho*），名所意即"一个有名字的地方"，就是有名的地方。有樱花树和寺庙的上野景观意味着财富和合法性向新政权的历史性与象征性的转移。在德川家康之前，江户就不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港。将军通过在古代帝国中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和新的政治首都之间建立象征性的联系，以壮大他们的势力（他们采纳的奈良和平安时代统治者的制度是汲取中国的先例）。

在上野，江户时代的人们沉醉于春天的樱花（图1），夏天池塘里的莲花，秋天的满月，冬天的雪景。因此，这些走道依照四季的自然节律和大众的活动全年被使用着，而不是去服从于将军的期望。人们迷恋于游览上野，发起成为真正大众庆典的樱花节，樱花节指的是"赏花"，更为明确的是赏樱花。樱花节是伴随着新市区景观的演变而发展成为一种大众活动的。在江户这个熔炉中，乡下神圣的仪式和贵族的审美文化一起融入到大众活动中，樱花节就提供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模式。樱花节原来是一个农业仪式，后来成为宫廷的一个仪式，江户人民给它加入了乐观主义的情感，最后成为了一个大众和集体性的庆典。樱花节的一部分是庆祝春天的更新，在一年的开始预祝有个丰收年，在享受这个短暂的花开时分的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世界的无常。这是一个欢庆而不容错过的好时节。

江户时代中期（约1716～1736年）是城市高度发展和建设的顶峰时期，用来观赏景观和自然的小径及场所变得数不胜数。[5]能够发起一个地方社会活动的一系列自然和人文因素很多：欣赏花的开放（春天的李树花、樱花或桃花，杜鹃花或虹膜，夏天的柴藤或莲花），在夏末捕捉萤火虫、蜻蜓或听昆虫的歌唱，观赏满月，接着看向冬天过渡时节的叶子染红的壮观景象，怀着敬畏之情站在雪前，等等。这里的季节和景观和谐一致，在这里还可以尽情地吃、喝、玩，在欢乐的集体气氛中开展各种活动和分享集体形式的情感和真正的刺激，把时间和空间融合并分享它们的同一性。樱花节与其他很多仪式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它能引起集体真正的休闲活动而又不耗尽其象征性内容和审美价值。这些用于游览和

聚会的地方，或是为了在寺庙内发展培养一种更深层次的季节性主题而不是出于宗教的意图吸引游客，或是为控制市区的发展和民间活动由幕府官方开放，[6]有时也包括一些私人的花园或果园。这些美丽的景点或名胜叫名所，因出版物上的影像和木板印刷的集子得以传播，这些出版物有些类似于历史上的旅行指南（图2）。

这些景点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市区景观及远处的背景——一座小山或高地，茂盛的树木和水（池塘、河流、运河或海洋），这些都有益于某些观赏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发展。历史事件和真实或想象的形象创造了叙述象征的层面并增加了每一个地方的气氛。作为一个具象和抽象的地理城市，它通过人们适当的活动，各种各样和多感觉并用的行为，发展成为一个网络场所和富于唤起情感和意义的景观。因此，美丽的景点通过文化的传播和转型，把新城区及景观的组合和消融在大都市（江户）的大众活动里的传播连接起来。

在江户的日常生活中就有许多人来参观各种寺庙、避难所或其他名胜，这是根据四季的节律来安排的。江户人沉浸在一个空间和时间、自然与文化已内在深深地联系起来的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交织渗透到社会日常生活和规定的仪式化行为中。甚至在今天，在大都市的中心，日常生活反映、引导和提供了各种关于季节性现象的信息。日常生活表明了对自然不仅是一种默观的态度，而是鼓励通过仪式积极地参与社会事件。剧院和令人愉快的场所通常被认为是江户独特文化的中心，在江户这个有限的空间里，商人和工匠阶层感到放松并能展现自我。这里有人行道、名胜和社会活动，在整个江户时代它们均得以发展并相互影响，展现不同中心的文化，这些地方对每一个人都完全开放，包括妇女、孩子或没有钱的人。

在明治时期（1868～1912年）公园是文化转型的工具。

明治时代是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快速和重要的转型期。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是这个过程是被意识到的，我们可以作如下表述：明治时代是一个断裂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每个人都无法置身事外，都和整个国家的现代性和前进有关。

然而,在最开始,不同宗派和现代化不同方法之间的斗争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源头。深层次的社会动荡导致人口迅速地减到原来的一半。经过明治时期前二十年的重大剧变后,日本专注于建立一个有宪法秩序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并启动一个坚定的附着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政策。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及吸收西方的观念和技术,日本展开了紧密的学习计划以便形成一套开放的政策。许多日本人由政府派遣到国外去旅游和深造,许多国外专业人士也被邀请到日本来做专家和教师。

东京城有许多江户时代就有名的地方被动乱破坏和侵扰。许多佛教遗址被破坏,这些是作为与古代体系断裂的一个标记,(为什么?)与此同时大量领地很快被用于做其他用途。大型的现代化企业要求彻底的市区重建(加宽的马路,运输建设或网络技术);政府部门,主要是军队和教育部门征用了大量的土地去建设军用设施和学校,这些被认为是不可缺少和拥有优先权的。接下来,由于工业场所数量翻番,很快如隅田川的河堤遭到破坏并消失。虽然日本文明在现代性的冲击下获得一种文化更新的活力,但这种转型并非一帆风顺。

西方的城市规划提供了一种新的市区模式。1840 年后欧洲公园被看成是一件宜人的事物,它首先出现在英格兰,然后它们以其独特的外观、功能和体制遍及欧洲的其他城市和更远的地方。明治政府认为首都应以西方城市为标准,需要这样一个"宜人"的地方去表达和促成它的现代化。1873 年(明治六年),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关于东京公共公园的管理制度。事实上,由于工业化和建立强大而现代的军队具有优先权,为了补偿公园优先权的缺乏,政府用一个新的词汇"*kôen*"(意为"公共公园")特指江户五个最为有名和最经常提到的名所。这个法令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公园的西方模式的(准确地说是伦敦、巴黎、柏林和维也纳[7])现代城市,提供一个安全的娱乐场所并保存一些江户时代的遗迹。现代性在真正实现自身之前,其对自身存在的表达也是有意义的。

因此,尽管明治政府想割断过去,但许多连续性仍是可见的:因为新公园在江户时代都曾是有名的地方,所以空间是连续的;活动是连续的;在决策和控制方面由中央当局决定这也是连续的。如德川幕府政府一

样，现代管理部门决定新公园的位置、名字及其后的设计，同样都是为了控制市区的发展和保留大众活动。明治时代没有与过去断裂但是对优先的机会有所限制。尽管有这些限制，大多数仪式化的社会活动仍然有铸造一种适当文化意识的力量，对自然的感受在积累过程和记忆中部分地流失但也有部分仍保存了下来。

1882 年这个城市人口数量恢复到明治时代重建之前，政府发布了一个关于革新东京的法令，这个法令倡导建立 49 个公园，它们在大小和位置的选择上效仿伦敦和巴黎的公园。它们中的 70% 在幕府时代就是美景了，50% 是神道教的神殿。曾是古代大名住处（德川时代封臣的领土）的少数列在公园名单上的花园很快被分割并破坏。因此，由于经济的原因和东京田园特征仍然很明显，东京的革新法令进一步地促成了古迹的再使用和再定义，使这个真正和重要的作品——日比谷公园，它在城市的中心并且临近宫殿——运转。这个公园与其要规划满足城区对绿色空间一定的需要不如反映生活方式和城市规划的变化；在完全的调查后证明商业区的现代化并且证明新政府有能力给工程做一个成功的结论。[8] 这个赌注是非常大的。

然而负责市政府委托工程的人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一个现代公园的定义既要符合西方的观念又要适合东京。犹豫不决的结果是这个工作直到 1902 年才动工，1903 年举行落成典礼。1900 年由本田静六（1866～1952 年）这个年轻的农艺学家负责这个工程，他曾在德国的大学（德勒斯登和慕尼黑）学习了两年。他既不是一个建筑师也不是景观园林学家，为了避免批评，他搜集了来自不同专家（植物学家、园丁、医生和工程师等）的不同意见和委托专家的报告。得益于在欧洲的经历和德国人在花园和公园方面的作品集，他结合各种元素并把他们的许多要求和功能整合从而达成一致。他的工程取得了成功，创造了一个彻底革新和复兴城市的范例。这个公园是一种新的空间模式，同时展现日本人和西方人的特征，但是根本上是源于它的结构，致使借助于各种来源的景观元素能合谐地配置。

在 19 世纪的欧洲，公园不仅仅是市区的一个装饰物或对所有人开放

的公共娱乐场所,也给上层社会提供了一个试图去传授或提倡他们生活方式、休闲活动、拥护中产阶级差别的地方。公园规章的建立是为了规范市民的态度和行为,使普通民众在这里可以更多地了解文明的举止和良好的市区礼节。此外,这时在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个中心的道德主题,尤其在德国这种道德主题已充分渗透到国家统一的建设中。正是因为景观、雕像、场所支持了官方活动,公园提供了一个允许个人发展或维持民族认同感的空间。日比谷公园作为一个例子,体现了日本明治时代对国家中心主题的接受和国家对景观的审慎使用以及景观在促进国家现代身份建立上的潜力。

日比谷公园计划分为四个主体部分(图 3):大草坪和邻近的日式花园占据了公园的中心;西南角入口处是形状规整的花圃;与之相对的东北角是幕府时代的防御工事和城堡遗迹。宽阔的人行道把这些不同的地方连接起来。公园最大的空间是由主草坪构成,即在原计划指定的运动场地(*undôjô*)上,至于它的形状,本田静六直接借用了一个市政府普鲁士(prussian)公园的计划。[9] 当时这里用于所有聚会、各种庆典或官方检阅。很快,公园不但是官方事务的城市中心市区广场,也是反对现行政治或无诚意政治行为的活动场所。[10] 本田静六认为巨大的中心草坪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但是在幕府时代这个城市就已经有空地和草地了。草地已经被用做马术训练的场地,而且也用于散步、玩耍和采集植物。引进这种空间和适合它的新功能,对本田静六以及后来的东京居民来说的确更容易一些。自从创建了日比谷公园,所有大型的公园都有一个准许集体或个人使用的大型中心草场。这个方案的引进源于一个选择过程,它允许对有复兴意味预先存在的宜人的事物的欣赏,[11] 并引进一个符合象征现代日本建设的新公共词汇。日式花园委托给技术熟练的园丁,它构成了日比谷公园的另一个中心和重要旗标。这一点在工程的开始就决定了。花园中的作品在园林景观风格上遵循幕府时代大名花园的模式。这种类型的花园(kaiyûshiki-teien)的特点显而易见:花园中心的池塘由小径环绕;有小溪和瀑布,岩窗,各种人行道,修剪整齐的灌木丛和沿着小径成行的小树林。暗景(涉及其他公园或名所和不同情调)在池塘周围呈

现，(随着不同的观赏角度)出现或消失，通过漫步者的移动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整体。

这个几何形的花圃又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本田静六是一个林学专家，他不仅仅着迷于花卉，也有创造具有异国情调花圃的压力。公园开放时这里是最能引起参观者好奇心的地方。[12]

与之相对的角落，幕府时代城堡的防御墙和现在变成池塘的壕沟仍保存着。其意图是在现代城市中保护一处可追述的重要历史遗迹，这个想法最初不是来自本田静六。正如所有的名所，日比谷公园连接起过去和现在，并且作为其结果参与构成城市和居民的文化认同。[13]日比谷公园的实例成为现代性日本的导言，不是源于泰布拉·娜莎(tabula rasa)，而是源自试验与过失的选择和积累过程。

宽阔的道路适合于马车或脚踏车，它作为现代性的宣言能很快到达公园的中心。在这里，有一个奢侈的西式饭店，它便于日本精英们邀请外国来宾时有一个合适的场所。它同时提供了一个发现餐桌礼仪、新的体态的场所。甚至到今天，这家饭店(叫做 Bois de Boulogne[14])仍然不时地扮演正式商业接待中心场所的角色。"像在法国"，人们可以在面对户外的露台上饮酒，这在东京是非常罕见的。[15]游览欧洲的公园大多数是为了走进自然，然而东京的居民来到日比谷是为了"呼吸城市的香味，因为在这里建有咖啡馆；饭店里有放置户外插着花束的餐桌，在这里人们可以像在国外一样用刀叉进餐、喝咖啡"(Suzuki and Sawada 1997, 91)。在日比谷，所有新的行为模式都会很快得到传播和散布，例如傍晚在第一盏灯亮时开始散步，在亭子里听西方音乐(1905 年安装)，打网球(1920 年日本三个球场第一次对妇女开放)。

日比谷作为日本第一个现代公园很快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名所，成为日本公园模式的典型。它拥有无数的装备设施，各种景观和氛围，这个公园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具有衔接过去和新的感知模式(物质本体、文化表现和社会行为的感知)的重要空间。漫步使任何一个参观者把可能的路线连接起来，它们中的任何一条，都是日本现代特性叙述的组成部分，并且把自然、历史、传统和革新的大众活动彼此联系起来。公园为向大众

展示审美价值和意义效果提供了支持,它们以对自然的情感和唤起过去及现在记忆的能力为条件(图4、图5)。

从日比谷公园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明治时代的文化变迁不是简单地模仿一些西方的模式。“现代性”和“传统”似乎总是合成物并且以动态方式提升及再定义永恒。

战后的公园:一个政策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东京大多数房子、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遭到毁坏。这些公园转变为一个临时的墓地、无家可归者的庇护所或农田。快速重建工业和基础设施而不是建设城市环境和公共娱乐设施拥有优先权。

1955年以后城市发展加快,当所谓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开始时,污染也随之加剧,与此同时自然资源逐渐消失。文化与自然的融合变得越来越珍贵,如六月看萤火虫或在河里钓鱼,这些地方在他们看来只有成了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居民才对这些变化作出反应。战前东京的自然环境降级就已经异常迅速。[16]现在东京的人均绿地面积是所有工业化城市中最少的。[17]这些公园很快在提高环境质量上变得不可或缺,同时“也适应了公众的需要”。1971年政府环境机构制定了许多提高环境、保护自然和再次绿化城市的计划。1981年东京绿地面积计划中出现了第一份委托书。第二年制定了一个在21世纪初人均绿地面积达到6平方米目标的长期规划;但1997年作出了2015年人均绿地面积达到7平方米的新目标的长期规划,它取代了1982年的规划,这个新规划在2000年修订完成。结果,政治中心东京的公园的总面积是过去25年的3倍,但是仍然离目标很远。长期的人口下降以后,东京人口重新增长是很难的。然而,直接受困于全球经济发展和大都市贸易之中的东京城市规划署直接指出:“水体美化迷人的城市空间,草木代表着珍贵的社会资本,它们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Bureau of City Planning 2002, 37)现在,环境质量反映了一个地方生活质量。

计划和统计表除了关心数量外也关心质量,不仅仅是美学上的也包

括自然环境的质量。这是对自然生命呈现的欣赏的复苏，通过各种日常生命活动它被嵌入到城市组织中，与自然循环的具体和特殊的表现相联系。

首先在20世纪70年代，首都东京政府许诺在废弃的古代军用场所的基础上建设大型市区公园（图6、图7）。[18]到80年代，这个城市保护和开发首都西部多树木的山坡。在对一般公众开放之前就建立并及时提出森林保护措施（图8、图9）。在城市中心，以前在首都能欣赏到的自然已经消失了，罕见的树阵被有意识地保护起来并环绕着城市种植。同时这些保护自然空间的工程大多数在西部，随着东京海湾的海上公园的创建，自然区域的恢复工程首先主要从城市的东部开始。

一个借鉴社会和文化的例证：东京海上公园

在古代，从16世纪开始东京港口就在江户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近在1941年它又获得国际港口的地位。[19]它是城市历史和形成的中心地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同样备受各方面的困扰，如城市生活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和城市发展之间的失衡。

东京的居民怨恨这种局面。他们发现海港工业的发展把他们与大海完全隔绝。大型垃圾填埋场从幕府时代就开始有了，在20世纪60年代加速发展。现在东京总开垦的海洋面积相当于4 500公顷的陆地，相当于这个城市的三个防卫中心。[20]除此以外，为保护都市免受洪水的侵袭，沿海岸建造了一个水坝，它更进一步把居民与大海隔绝。海洋被看做是一种潜在灾难的源头，而不再是有利条件。海湾成为了一个有建设价值的地方，而不是宜人之所。城市和海港的平衡被破坏。居民们指责垃圾场是制造麻烦事的东西，事实证明城市发展总是要与对生活质量有害的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海上景观总是很赏心悦目，沿海的马路提供了一个非凡的观景场所，这里种有松树和其他树木。沿着海岸线从江户到京都一路上有很多庙宇和避难所，这些都提供了美妙的海景图，图中还有开放的樱花或绚烂的秋叶。人们沿着海岸线欣赏大海，如果在阳光或月光下，在小船上旅行或举行宴会就更美妙了。其他美景名所，以作为最佳看

海鸟点而著名。尤其是在迁徙季节,当跋涉者绕着沙质的堤岸漫步,在河的入口处可以看到无数的鸭子和其他水栖鸟类。春天在海滩拾贝壳是一日游和团队休闲的最好方式。假定大海既具有重要的审美功能又有娱乐功能,那么由于可以钓鱼、搜集贝壳或海藻它又是一种经济资源。我们应该承认从幕府时代开始,为了开展海港贸易、商业的、工业的和与住宅有关的活动而进行的土地开垦,以及如散步、野餐、钓鱼或拾贝壳、划船和游泳等休闲活动,东京的港湾就总是被用来倾倒液体和固体废弃物。然而,入侵者的强度和数量,对环境和景观的影响范围,与经济和休闲活动之间的冲突程度现在同样得到巨大改观。公众关于海湾及其未来的争论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东京海湾被认为是世界上生物群落最多样化的群落之一。浅滩的破坏改变了河流,水的富营养化受到严厉的抨击。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对经济发展、物质财富增长与市区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提高之间的不平衡已经形成了共识。然而,如果直到20世纪70年代工业活动占用超过一半的开垦土地,那么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部分工业就要从东京海上区域中被排除出去。

地方协会和"居民运动"表达了对这些具体问题的担忧。这些抗议没有形成强大的运动,但是散布到了整个首都。居民动员民众反对工业征用海上领地,并号召使用沿海的公共领地来建造公园,这种运动长久以来已经广为人知。由于规模小和分散,这些抗议看起来很微弱,但是它们的合力却能影响公众的选择。

1970年首都权威人士制定了创建海上公园的原则。根据地点和各种需求的综合数据,委员会在1972年提出三个要求:使东京沿海的更多区域能更易到达大海;重视由海洋、堤岸与陆地边缘所形成的环境的连续性,以生态平衡和易接近为出发点使得各种活动得到充分展开;把居民的参与整合到具体的模式中,以及把他们的知识和体验作为管理公园的一个理念。

创建海上公园工程当务之急有两件事:一是为了缓解海港和城市活动的冲突要使开垦的土地使用多样化,减少工业化。二是重建环境和建设公园。负责海上公园建造的委员会在1975年提交了一个方案,20世

纪 80 年代初第一个公园对大众开放，但是由于公共运输没有跟上，直到十年后它才变得有意义。现在，在东京所有的填海领土上，港务局已建成 42 座公园，它们占据了 310 公顷的陆地和 474 公顷的水面，其中四个首都公园占地 170 公顷，由东京政府管理的绿地面积应该大大增加了。[21] 因此，总面积达 480 公顷，另有 200 公顷被计划用来修建 57 个公园（图 10、图 11 和图 12）。

这些“海上公园”根据它们的规划、位置、用途和景观特色被分成三类：沿海公园、海港花园和直线通道。

一共有七个沿海公园，它们的面积在 7 公顷 ~ 86 公顷之间，意在找回用于休闲活动的海岸线。它们中有三个被重新改造，其他各处是由粗糙的石头建成，易于到达堤岸。这些公园可以钓鱼、观鸟和看水生生物、烤肉甚至是露营。公园的设施可以进行许多体育运动，例如帆板运动、航海甚至有 45 公顷的高尔夫球场而且花费很少。有 19 个海港花园，它们的面积在 0.5 公顷 ~ 5 公顷之间，意在改善市区环境的质量并使居民更易接近海港。沿着这些海港设施的是绵延不断的缓冲地带，或者是一些林阴环绕的码头，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船行海上。这些地方为海港职工提供了一个放松的场所，也为海港的城市居民打开了一扇窗户。

由 16 条直线型的人行道或树阴成排的马路形成了一个步行网，意在把不同的公园和花园连接起来。城市和港口连接的格局强调了建立公园和绿色空间网络的目标。现在人们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穿过整个海岸领土，在城市的另一面，在平坦的地面或人工岛屿上穿行，穿过公园以及沿途植有树木的人行道。这促成了一种新的市区徒步旅行。

公园没有陆地，人工美化使接近自然和海洋成为可能，像采集贝壳、钓鱼、欣赏海上景观或发现新的海边活动如帆板运动、在海滩奢华的休闲处所休养等。这些古代活动的复兴都是允许的，例如现在醉心于观看鸟就是复兴古代幕府时期欣赏鸟类的迁徙或垒巢的活动。同样，现在烤肉活动也复兴起来并成为根深蒂固的活动和礼仪。在这些公园中，多条路线相互交叉，为各种体育或休闲活动提供了可能，为文化或历史的回顾提供了选择。因此通过各种景观和风景的网络以及确保自然保护和休闲活

动相统一,把各种各样有趣的事物联接在一起。这个创意满足了现代人关心环境的心态,确保他们的成功。

从首都这个范畴来说,东京海上公园计划从前是一个环境工程现在也是一个城市工程。它不是依照个人利益发展垃圾场的无政府主义,也超出了仅仅为改善城市面貌的表面意图,而是意在为整个城市创造一个公共空间。正如我们最初看到的那样,社会生活仪式中渗入了对景观与自然的感知和欣赏模式,即集体感和多种感觉,这种生活仪式扎根于日本文化,并对它们的社会整合做出了贡献。海湾,它曾对江户城市文化繁荣至关重要,但已经永远消失不再存在。然而,海上公园的作品促进了新的自然进程的发展,生物群落正在再生,城市和环境之间空前的平衡也正在形成。自然现象和象征性的意义相互丰富;自然和文化间不确定地重组并创造新的景观。

公园作为表达现代性和一致性的场所

东京现代与历史之间平衡的断裂和大都市发展明显的无序,证明使城市获得新生的能力来自于根深蒂固的连续空间和自然的文化矩阵原则。这些原则产生于长长的历史阶层化过程,东京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伟大城市在这方面的原则尤其充足。

现在公园为开展多种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设施,临时性设施主要取决于季节。这许多活动使居民全年可以分享想法、价值和情感。共同的文化一致性和社会契约两者之间相互肯定。鉴于其他城市有纪念碑,东京过去的记忆没有保留在有形的遗迹里,但是在活动中它从未停止过发生并且总是唤起回忆,它把个人或团体的现在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联系起来。

即使在东京这样的超级大城市,这些活动也使当地的公众得到娱乐。它们暴露了日本社会的价值和基本问题,如整合欲望、自然感受和审美感知等。有些批评家声称,在日本,自然情感已经成为一部小说,庆典的保存或场所的重建只是一个幻想。然而在这个"虚构的"自然中,每个人都是演员,他们扮演着角色而不仅是被动的观众。大众文化不允许自己完

全被消费主义操纵，通过组织参与新活动成功地再塑自身。"为了引导大众走同样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只是"一个精确的过程更是一个有效的构思"（Pelletier 1998, 72）。[22]

社会礼仪在公园中的发展，使公众团体形成一个自己的住处。由于社交的复兴：人们重新集合起来，在户外、在自然景观中分享食物、饮酒，分享情感、快乐和心愿，地方团体或各种类型的团体尽情享受自然。愉快的景观成为一个难忘的地方并且成为一个团体再度统一的象征。由于整体景观和海上环境的和谐再造，地方团体形成一个保护运动。通过新领地，他们有了重新发现自身、全身心地投入理解环境并改变被动观察者心境的机会。

日本文化仍然重视分享感知和欣赏自然。尽管城市历经变迁，在东京的广大区域，通过各种创造性的表达，居民仍与自然保持密切的关系。在概念化和景观化的自然景色中，活生生的元素和自然更替现象是数不胜数的，并且将生活的气息散发到空间中。自然季节性的完整循环使景观的许多具体方面变得易于感知。给每个居民一个变革低绿地比率的文化，其重要性看起来也许是荒谬的，但这种文化变革来源于有一个世纪的古老观念和日本人对自然系统化的表达。公园是重新发现自然的空间，这种引进的行为关涉世界的根本存在方式并使生活变得有意义。

参考书目

[1] Berque, Augustin. *Le sauvage et l' artifice.* Paris: Gallimard, 1986.

[2] Berque, Augustin, Michel Conan, Pierre Donadieu, Bernard Lassus and Alain Roger. *Mouvance, cinquante mots pour le paysage.* Paris: Editions de la Villette, 1999.

[3] Bureau of City Planning, ed. *Tokyo no toshikeikaku no hyakunen* (*100 years of city planning in Tokyo*). Tokyo: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1996.

[4] Bureau of City Planning, ed. *Planning of Tokyo.* Tokyo: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2002.

[5] Bureau of Construction, ed. *Tôkyô no kôen-ryokuchi mappu* (*Map of Tokyo's parks and greenery*). Tokyo: Tokyo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2004.

[6] Conan, Michel. "Les paysages de l'eau: pour une poétique de la présence", *Urbanisme* 343. (juillet/août 2005): 67-71.

[7] Debié, Franck. *Jardins de capitales*. Paris: Editions du CNRS, 1992.

[8] Fiévé, Nicolas and Paul Waley ed. *Japanese Capital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9] Gluck, Carol. "Re-présenter Meiji", *La nation en marche. Etudes sur le Japon impérial de Meiji*, edited by Jean-Jacques Tshudin and Claude Hamon, Arles: Philippe Picquier, 1999, 9-39.

[10] Higuchi, Tadahirô. *Kôenzukuri wo kangaeru* (*Thinking about park planning*). Tokyo: Gijôdô, 1996.

[11] Hiwatashi, Tetsuya. *Tôkyô no minato to umi no kôen* (*The port of Tokyo and the marine parks*). Tokyo: Tôkyôto kôen kyôkai, 1994.

[12] Iinuma, Jirô and Shirahata Yôzaburô. *Nihon bunka toshite kôen* (*Parks as Japanese culture*). Tokyo: Yazakashobô, 1994.

[13] Kawazoe, Noboru. *Tôkyô no genfûkei* (*Tokyo's original landscape*. Tokyo: Nihon Hôsô Shuppankyôkai, 1983.

[14] Kita, Sandy. "From Shadow to Substance. Redefining Ukiyo-e", *The floating World of Ukiyo-e: Shadows, Dreams, and Substance*, New-york: Abrams and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2001, 27-79.

[15] Edo Tokyo Museum ed. *Ô-Edo Happyakuya chô*, (*Great Edo hundred eight quarters*). Tokyo: Edo Tokyo Museum, 2003.

[16] Ooms, Herman. "Forms and Norms in Edo Arts and Society", *Edo, Art in Japan 1615-1868*, edited by Robert T. Singer, 23-47. Washington: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1998.

[17] Parutenon Tama Rekishi Museum ed. *Kôgaikôrakuchi no Tanjô* (*Birth of tourist sites in the suburb*). Tokyo: Historical Museum of Parutenon

Tama, 2002.

[18] Pelletier, Philippe. "Glocal Tokyo. Trois exemples d'évolution socio-spatiale à Tokyo", *Daruma* 3 (printemps 1998): 69-81.

[19] Pons, Philippe. "La culture urbaine à l'époque Edo: une incubation de la modernité", In *Images du Monde flottant. Peintures et estampes japonaises XVIIe-XVIIIe siècles*, edited by Editions de la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Paris: Réunion des Musées Nationaux, 2004, 30-39.

[20] Pons, Philippe. "Un attachement sélectif à la nature", In *Les sentiments de la nature*, edited by Dominique Bourg, 31-46. Paris: La Découverte, 1993.

[21] Rouvière, Christian. "La nature dans la ville et la qualité de l'environnement au Japon", In *La qualité de la ville*, edited by Augustin Berque, Tokyo: Maison Franco-Japonaise, 1987, 150-157.

[22] Sawada, Seichirô and Suzuki Satoshi. *Kôen no hanashi* (*Narrations on parks*). Tokyo: Gihôdô, 1997.

[23] Shimizu, Makio. *Kasairinkai no kôen to suizokôen* (*Kasai marine park and its aquarium*). Tokyo: Tôkyôto Kôen Kyôkai, 1996.

[24] Short, Kevin. *Nature in Tokyo.* Tokyo, New York, London: Kodansha International, 2000.

[25] Tanaka, Seidai. *Nihon no kôen* (*Public parks of Japan*). Tokyo: Kashima Shuppankai, 1993.

[26] Waley, Paul. *Tokyo, City of Stories.* New York: Weatherhill, 1991.

注释

[1] 当然在长期的江户时代，即使社会分层的形式持续了，但它的真实内容已经改变。没有战争就没有了荣耀，战士成为了武士(他们中有些人对从事园艺很有热情)，大客商控制了国家的财富，变得越来越有权力。

[2] 最有名的是剧院和娱乐处所，吉原有很多归庙、大众娱乐和名所，有名的场所在整个城市遍地开花。

[3] 上野在城市的东北极点叫做 kimon，也就是："地狱之门"，因此被认为是不吉利的。Kan' ei-ji 是第一幢大厦，成为了将军幕府寺庙的保卫者。

[4] 这些站点，琵琶湖和比睿山，紧挨皇家首府，在 Ômi 省，提到的中国景观和诗的主题，夏江和湘江的八个看法。这是关于中国最早的主题，变成了对 Ômi 省的八种观点(Ômi hakkei)，从 13 世纪在日本传播并且在以后成为了浮世绘的一个普遍题材。

[5] 在上野流行的居所是沿着车道木质结构的大厦，叫做长屋，就像公寓住宅。一个家庭会有六个榻榻米共 9.7 平方米。长屋区占都市领地的 16%，但在 18 世纪初有 600 000个居民区，比总人口最多时的一倍还多。这种集中和混乱毫无疑问部分地解释了露天公共场所对上野人的重要性。

[6] 在将军幕府时期(德川吉宗，1716 ~ 1745 年)，公共娱乐场所的建造，为大名形成了壮美的海景图，富士山或筑波山始于秀吉的发展计划。第八位将军允许市民进入他的几个狩猎保护区，森林环绕着上野。当财政压力增加到市民身上时，他利用禁止奢侈品的法律促使节省，他把其城市的南部一处花园御殿山对公众开放，种植樱花树和槭树，从整体看花园是一片树海。在城市的东部为了建造走道，沿隅田川种植了樱花树，沿神田川种植杨柳。Nakano Momozono 在西部一个公园种桃树。他也建造了毗邻一家慈善医院(Koishikawa YÃ' jÃ' sho)的植物园。

[7] 负责东京公园的新部门精确地测算表面地区，在四个城市中制定出一个工程以改变公园的比率和位置。

[8] 城市中心有几个部门的建筑、办公楼和一个叫 Rokumeikan(1883 年)的外宾豪华住所在完全修复中，那是明治时期上层社会组织招待会的地方。在公园前面的皇家旅馆，是在日本建造的第一个西式风格的建筑，于 1890 年开放，1922 年被美国建筑师赖特重建。1914 年东京的中央驻地扩大，在广场上举行官方检阅仪式。

[9] 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政府(1912 ~ 1925 年)，为了鼓励民众成为体格健壮的国民，为成为好士兵准备好条件，在东京和它附近的郊区鼓励开展例如远足、登山、骑脚踏车兜风等体育活动。

[10] 例如，1905 年发生反对日俄战争结束后签订的和平条约的暴乱(明治 35 年)；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期间发生学生反对警察的抗议运动；每年"五一"企业联合组织的一个仪式在这里举行。日比谷至今仍然是所有影响较大的抗议游行的出发点。

[11] 例如现在的赏花。赏花有一个重要的集体意义，它标志着新的一年的开始(在日本，4 月是学校、企业、议会、新的电视节目、棒球赛等开学开业开赛的时间)。庆祝樱花开放有不同的方式：孤零零地步行、一个家庭或一群朋友庆祝。具体的例子有，在年前

和3月毕业期间吸收的新雇员，在4月就职，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为他们的部门的同事组织有关赏花的活动。新成员进入公园，择一个好地点，用塑料板料或纸盒做标记。他们中有些人整天守住这些点，以等待所有同事的到来，其他的人买饮料和吃的。在这种情况下，赏花这种形式成为了一个仪式，在这个活动中，新雇员明确其在企业中的角色和地位。因此，一种最初神圣的、耕地的仪式成为了在当代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仪式并且在城市中发生。

[12] 事实上，这个几何形的花圃的使用是为了达到一种反讽的效果，因为它在欧洲是旧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但在明治人的眼中，西方意味着文明与现代，这正好表明现代主义和它的美学表达物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不同的表述(Gluck 1999,11,16)。

[13] 本田静六自己参与保护江户时代的另一个遗迹。一棵银杏树，有着同种树罕见的高度，它是大名住所花园的一部分，是整修的一个部分。树在一条新路的右侧，并且因此被砍了下来。本田静六承担安置和移植它到日比谷公园的任务，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任务。移植成功，本田静六保住了面子，并且树存活下来了。在大树根部，立了一块匾，上面记述了相关的轶事。

[14] 巴黎19世纪后半期一个高度时尚的公共森林景观。

[15] 1872年在上野公园开放第一家西式餐馆，做法国菜。1873年江户五个高级公园也换发新证，这是园主让步的结果，公园设有豪华西餐厅。在日比谷开始禁止在公园随意吃喝，仅允许以传统方式坐在地面，在被指定的地方吃东西，也就是说在餐馆。不过，人们的日常习惯禁而不绝，结果形成两种餐饮方式并存的局面。

[16] 江户的人口超过了100万人，但自然景观保存良好。大名的居民有他们广大的花园，花园占城市领地的60%；寺庙和避难的庭院或花园同样也被用来种植树木。森林、陡峭的堤坝上也种了许多树。

[17] 每个居民占有绿色空间的比率为：东京大都会:5.46平方米；东京(仅23个区):4.45平方米；巴黎:11.8平方米；汉城:17.4平方米；洛杉矶:17.8平方米；温哥华:26.5平方米；伦敦:26.9平方米；柏林:27.4平方米；纽约:29.3平方米(东京编辑大都会,2004)。

[18] 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地区实际上是在东京修建的一个绿化带的遗存。

[19] 海湾实际上包括六个大口岸:东京(1590年)，横须贺海军基地(1850年)，横滨(1859年)，川崎(1927年)，千叶(1954年)，新鲜(1955年)。在这一段中，我们提到独一无二的东京大都市的海上领域。东京海湾的所有海岸都被进行了大修整。

[20] 1958年一个填海项目被严肃提出。委员会研究了它的可行性。这种方案在

20 世纪 80 年代再度被提出。

[21] 在日本别处的港口，由市政府直接管理。

[22] 地理学家皮尔特(Pelletier)和其他许多学者的想法一样，从当前的发展看，目前垃圾建筑地的发展仅仅只是城市中心(那里土地价格最高)的延伸，它也是一个很容易达到一种共识(美学、社会和文化)的地方。我们不能完全地同意这种独树一帜的对极度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批评，不是因为它的天真而是因为用户不是“文化的白痴”，这些海上公园从整体上构成慷慨、自由和开放的空间。东京江边不再只是“消费者的空间”。



图 1 《Ueno Kiyomizudô Shinobazunoike》(《View of Ueno with the pond Shinobazunoike and the temple Kiyomizudô》),Hiroshige, Meisho Edo Hyakkei,(江户百个著名景点之一),1856。



图 2 《Goten-Yama, Hanazakari》(御殿山樱花景观),Hiroshige, Meisho Edo Hyakkei,(江户百个著名景点之一),1845。御殿山是将军对公众开放的私有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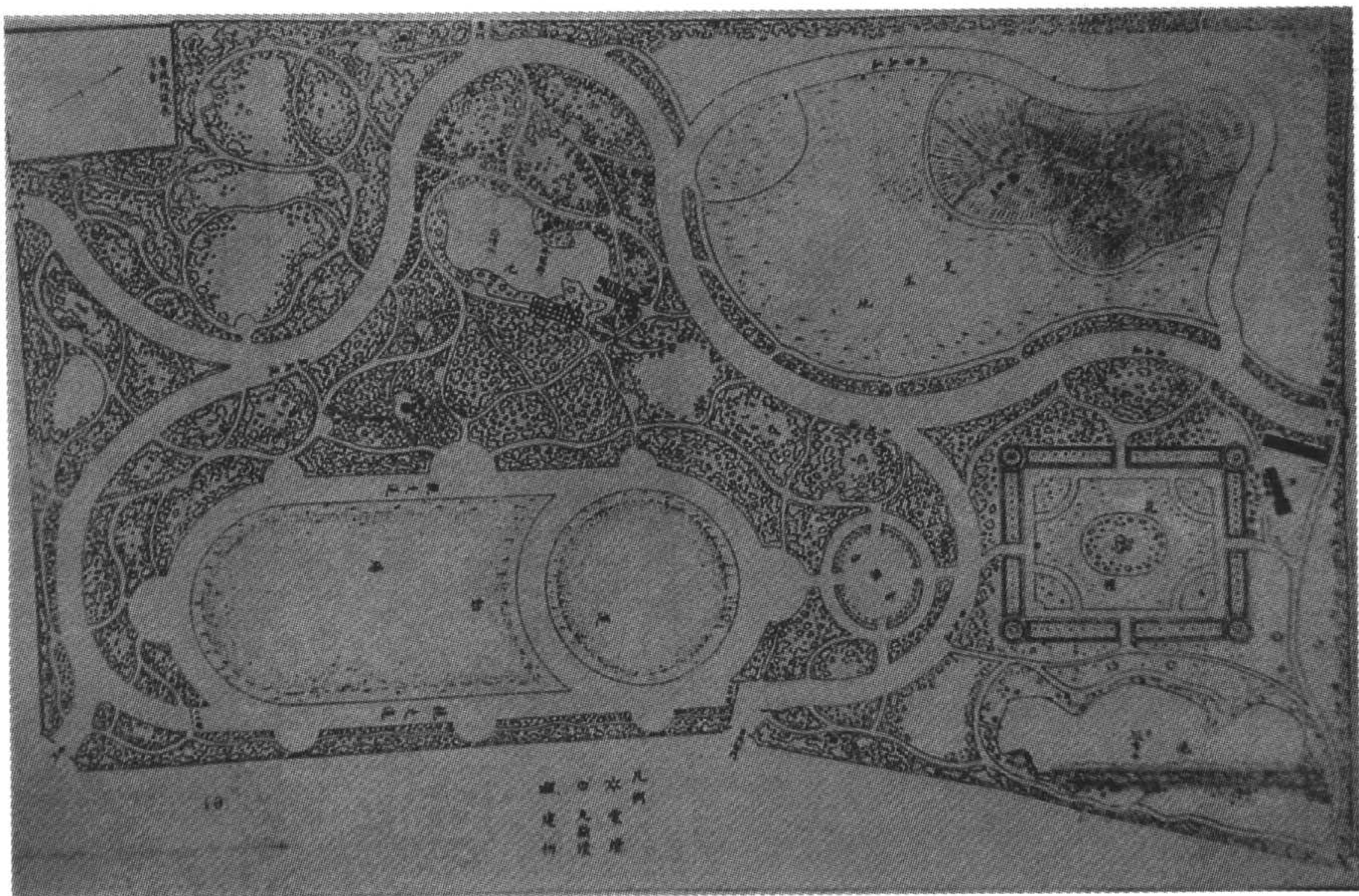


图 3 日比谷公园,1900 年的原计划。



图 4　樱花节，《观赏樱花》上野公园现景。



图 5　樱花节，《观赏樱花》深大寺公园现景，此处从前是一个军事场所。



图 6　深大寺公园观赏秋天树叶变红，此处从前是一个军事场所。



图 7　夏季，Mizunomoto 公园，此处从前是一个军事场所。



图8 西部山区的多摩森林公园樱花开放期间。



图9 西部的山丘森林公园，秋天。



图 10　台场海滨公园,野餐区。



图 11　神户海滨公园,海滨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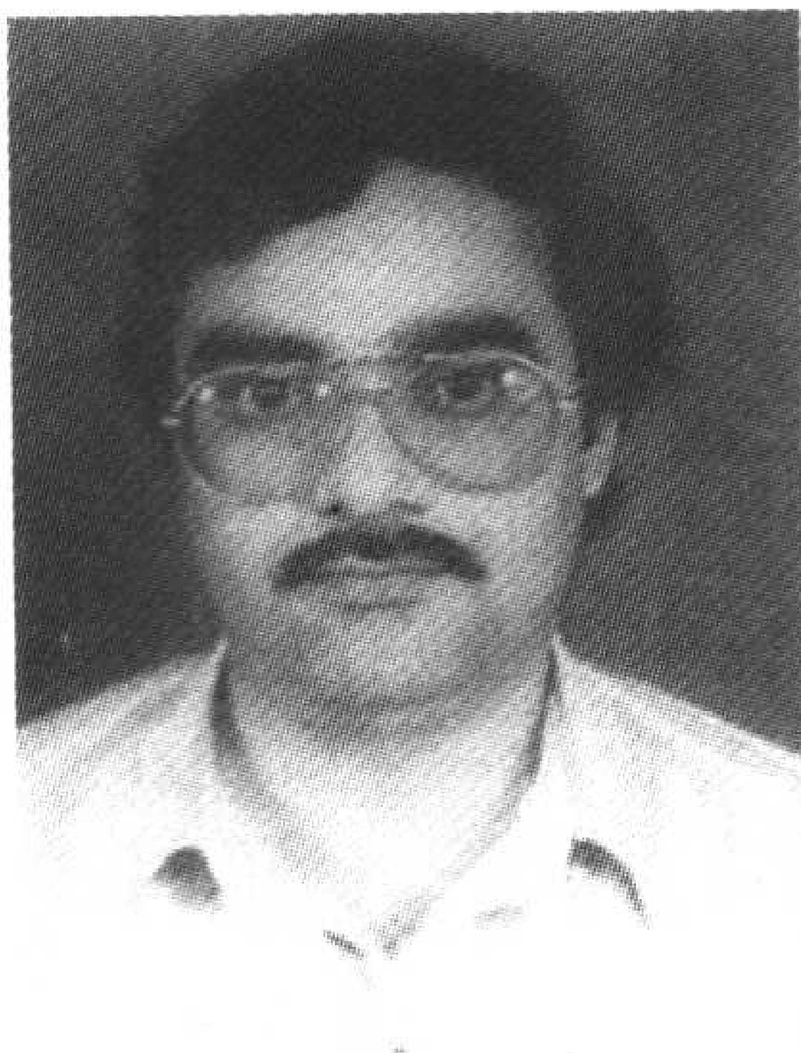
图 12 台场海滨公园,海滨长廊。

(作者单位:日本早稻田大学)

(李珊 译)

从生态学和社会经济学的维度看印度喀拉拉邦宅园

[印度]U. M. 查得拉塞卡拉[1]　S. 珊卡



U. M. 查得拉塞卡拉(U. M. Chandrashekara)博士,印度喀拉拉邦森林研究所生态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土地使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地区如圣林的生物群落、农林系统和不同森林类型的影响评估等。他已经发表超过45篇学术论文并与人合编了4本著作。他最近在研究印度尼尔吉里(Nilgiri)生物圈保护区内的宅园和其他土地使用系统的地面多样性和地下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关系。

S. 珊卡(S. Sankar)博士,印度喀拉拉邦森林研究所资深科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土壤质量评估、天然林和人工林管理、可持续林业管理的标准与指标、喀拉拉邦不同农业气候地带的农林模式和喀拉拉邦不同地区利用自然资源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前　言

喀拉拉邦州位于印度的西南部，在北纬 8°18′到 12°48′、东经 74°22′到 77°22′之间。该州面积是 38.863 平方千米，人口超过 320 万人，人口密度为 819 人/平方千米。平均每头牲畜耕地只有 0.11 公顷，至少占总人口 80%以上的人部分依靠农业和 70%以上的人占有的农业用地低于 0.2 公顷(KSLUB 1995)。与印度其他州相比，喀拉拉邦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它的村庄系统。每一个农民在他的领地上都有自己的住处，然而其他州住宅区成群地聚集在一个地方，不管其拥有多少土地，耕地都在住宅区之外。因此在喀拉拉邦，家园耕作是土地使用体系中最普遍的类型，家园耕作的土地占这个州总土地使用面积的 88%、总耕地面积的 41%。从自然、构成类型划分，这个州的大多数宅园可视为由草本植物、多年生木本植物和动物组成的混农林牧系统。有些宅园是由前两种组成的混农林系统。这篇论文强调了以宅园大小划分的等级、植物品种的分布和多样性、社会文化同市场和非市场的价值，包括在管理系统中给性别以平等的机会。

宅园面积

和其他一些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一样，喀拉拉邦宅园平均面积远远少于 1 公顷(0.5 公顷;Nair and Sreedharan 1986; Babu *et al.* 1992; Kumar *et al.* 1994; Sankar and Chandrashekara 1997)，这是它的基本状况。此外，据报道在这个州，小宅园(小于 0.4 公顷)占 53%，中等宅园(0.41 ~ 1.2 公顷)和大宅园(大于 1.2 公顷)分别占 28%和 19%(Sankar and Chandrashekara 2002)。这里也许就要提及，如此小的单一作物制土地利用系统是不可行的，尤其在农村生态系统中(Jose and Shanmugaratnam 1993)。因此在本质上多层和多种结构是主要特征，它区分了社会经济学适应性和稳定性、生物平衡和适应力，以及在低水平的平衡下持续保持的生产力。

宅园的水平结构

喀拉拉邦被认为至少有4 000年的历史(Kumar and Nair 2004)。几个世纪前,外国旅行者就有关于喀拉拉邦宅园存在的记载。例如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览喀拉拉邦时就写道:“我们接下来进入黑胡椒的国家——马拉巴尔海岸。从Sindabar到Kawlam的路程要旅行两个月。整条陆路都在树阴下……两个月旅途所经过的所有土地都用来耕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果园,果园的中心是用木栅栏围着的房子。”(Batuta 1929)管理宅园的活动是一个包含耕作的、半耕作或伺弄植物的复杂系统,在这个州主要种植多年生和半年生植物。然而,宅园构成呈现的水平布局似乎根据园子的面积大小而改变。一般说来,椰子树(*Cocos nucifera*)构成了宅园建筑的基本要素,宅园的其他要素是果园(Jose 1991)。由于独特的生长方式、树冠和根部在不同的生长阶段的特征,椰子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间混作。有足够的阳光到达椰园的林下叶层,从而使椰子间作作物得以成长,不过,这并不包括8~25年的椰林(Nair 1983)。椰树和间作作物根系重叠的机会是很小的,正如发现大多数椰树根靠近树干一样。椰树种在一个5m×5m到7.5m×7.5m的独立空间。然而,小、中等农场主并没有遵循任何精确的间隔规则,也没有根据可用空间来种植。椰子占主导地位的宅园和混合类花园,这种布局一眼看去似乎是偶然的,但是靠近仔细地审视后可能会发现每个整体都占有一个具体的小环境。半数种类包括番木瓜、人心果、番石榴、丁香、辣木等,它们只种在宅园的里面。许多中等和小树冠的果树如:面包树、橙、芒果,多年生草本植物、野芭蕉、槟榔青和一年生木薯、姜、姜黄,这些种在宅园的边缘和中心。有大树冠的高树和竹子经常种在接近边缘的地方。蔓生农作物如胡椒、山药、眉豆等种在接近树的地方以便节省原料的费用。然而小果树如蒲桃、番荔枝、硬毛猕猴桃等种植在家附近。观赏植物大多数被限制种在庭院、小路和邻近空地。

种类组合及其多样性

喀拉拉邦宅园在栽培和管理植物生物群落物种的多样性上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从这个州所有的宅园中随意选出的228个中，有记载的植物种类就超过170种（附录一）。在60个宅园防护带中植物总量达到68种（Chandrashekara *et al.* 1997），Jose（1991）在一个村庄的80个宅园中列出了179种，其中包括71种树、6种多年生草本农作物、23种一年生作物、18种药用植物和61种观赏植物。在这个州中心1公顷农业气候区进行调查活动期间，发现124种植物，其中60种是树木（Chandrashekara 1995）。所有这些观察表明宅园是永久的"试验者"，总是在不停地尝试和测验着新种类（Ninez 1987）。喀拉拉邦和在别处观察到的结果一样，没有特定的种植和引进新植物到花园的时间（Rico-Gray *et al.* 1990；Yamamoto *et al.* 1991）。在喀拉拉邦的研究表明，宅园的多样性指数范围在0.251～0.739之间，暗示其植物的多样性与种类丰富评价与超过0.90的绿色森林相比处于中等和偏低的位置（KAU 1994）。然而，测量物种多样性，亚种和特定农作物的多样性要分开来考虑，宅园中物种多样性的价值常与给定的农业气候带中的常绿和半常绿森林相比（Chandrashekara 1995）。密度式多样性指数的改变也许是基于宅园面积的反馈，这个指数对大宅园（1.1187）的价值大于对小宅园（1.0469）和中等宅园（1.0084）的价值。这也许归于一个事实，有限空间迫使人们去适应相关小区域的不同物种，而大空间为了优化作物产量尝试种植更多的品种，并从大块土地上获得各个种类的作物。乔斯（1991）报道：喀拉拉邦南部村庄的小宅园比大宅园作物密度要高。类似的观察结果在喀拉拉邦南部和北部农业气候区域存在（Sankar and chandrashekara 2002）。因此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小农场主尽管只有小面积的持有地，但对产量最大值有强烈的追求。然而，由于对特定小领地主来说，下层植被的重要性比林业大，所以小宅园的树的密度比大宅园要低，这有记录为证。

宅园的水平结构

喀拉拉邦的宅园由于作物的多样性在立体结构上也是多层的。高度和建构类型不同的植物,尽管没有明显有序地种植,但在平面和立面上完美地占有可利用空间(Chandrashekara 1997)。这个州大多数农业气候区的宅园中可辨认出五个灌木层。第一层是地面往上两米的高度,由植物、块茎作物、青草和其他草本植物构成。第二层和第三层(从地面 2 米到 10 米的高度)几乎是相互连续和重叠的。这两层有一些共同的植物如香蕉树、肉豆蔻、番木瓜树、芒果、可可、小椰子树和树苗。上层灌木层几乎由椰子树、槟榔树、柚木、菠萝树、桃花心木和其他从 10 米到 25 米高的树组成。作物种类的选择取决于农业气候和农场主的社会经济条件。通过分析占领树冠层的不同组成部分表明:至少有 40 ~ 45 年历史的传统宅园其树冠空间与土地面积的比例是210% 到888% (Sankar and Chandrashekara 2002)。

宅园种类的总量

喀拉拉邦宅园植物的多样性和植物种类总量显示:一般的宅园在保存保护区外种类多样性上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然而,它们是植物迁移、试验和驯化以及适应的非正式实验站。同样地,这些宅园代表"genetic backstop",保存物种及多样性不属于生产领域的问题,并且由于口味上的偏好、传统或栽培原料的实用性使得宅园植物在一个小范围内被栽培。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受世界欢迎的大约 300 种主要植物,有 200 种在这些宅园中生长,但只有 20 种在这里栽培(Ninez 1987)。这个分析同样适用喀拉拉邦指定的庄园中。

妇女在宅园管理中的作用

妇女在引进许多作物中起重要作用,特别在宅园附近作物的引进上。然而一般说来,男人在引进经济作物和四季常绿树的决策中决定权高于妇女。妇女在宅园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以下因素:职业、宅园的面积、获得离开土地从事城里工作的机会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例如,珊卡和查得拉塞卡拉(2002)记载,妇女在60%的小宅园(小于0.4公顷)系统管理中有突出贡献。他们也同样记载着:在中等(0.41～0.12公顷)和大宅园(大于1.2公顷)的管理上妇女的作用分别只有22%和12%。一般说来,在宅园中妇女比男人付出的劳作要多。据估计家庭工作量的94%由妇女完成。一年中这个94%的妇女工作量(家庭劳作)构成了宅园总雇用工作量的41%。因为她们的劳动没有报酬,并且不计入任何统计表中,因此她们的劳动变得不可见了。正在兴起的农业景观和喀拉拉邦庄稼种植模式——大规模地从生存资料向单一经济作物转变——这可能使妇女更加边缘化。妇女工作更繁重和更缺乏社会价值(Dunkelman and Davidson 1998)。这个边缘化的进程可能在加快,以不顾一切地满足家庭对金钱的需要。如果这些需要只能由市场补给,不计报酬的传统角色便不再受到尊重,因此妇女被廉价出售(Huston 1985)。

喀拉拉邦宅园和其他地区一样很少能满足家庭的全部主食需求。然而,它们能对其他庄稼提供补充。因此,宅园是家庭大农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确实,如果宅园是家庭的唯一可用地,粮食作物如木薯将在宅园组合物种中占主要地位(Kumar and Nair 2004)。据估计,50%的宅园的收入不到家庭总收入的25%(Sankar and Chandrashekara 2002)。另一方面,32%和20%的宅园分别只占家庭收入的25%～50%或大于50%。然而,宅园对国家木材和竹子的经济贡献有重要意义。例如,Krishnankutty(1990)田产提供了喀拉拉邦木材需求的74%～84%。同样地,传统宅园成为了农村家庭生物燃料的基本来源。例如从各地域搜集来的燃料,有51%来自宅园((Shanavas and Kumar 2003)。据对喀拉拉邦州竹子的供

应和需求的分析，估计该州在 1993 ~ 1994 年期间对竹子的需求量是 169 000立方米/吨。宅园在这个州竹子的总供给量中占 63%，森林占 37%。喀拉拉邦宅园被看成是一个储藏库，有药用和芬芳的植物、观赏植物、树脂、化学提取物和绿叶肥料。值得一提的是，一个特定宅园的庄稼产量比家庭的消耗要多，超出的部分不够在市场中卖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之间相互交换粮食，互通有无。在喀拉拉邦的某些地方，也记载着在 12 月和 1 月之间，宅园中种有竹子的宅园主砍下竹子的枝叶，用这些枝叶做成他们庄稼地的栅栏。出于同样的目的，他们也把竹子的枝叶提供给他们的亲戚和朋友。除此以外，喀拉拉邦的几种宅园作物，在城镇生态系统的生物群落中起作用。例如，竹子编织社团从宅园中获得合适的竹竿，编织成如竹垫子、篮子、渔网等产品。有些产品给原料供应者，其他的由编织者卖出。因此，像其他的作物一样，宅园的竹子是农村复杂关系系统的一个元素，人在这个系统中仍然是主角。

维持庄稼多样性管理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事实上，许多热带和亚热带国家传统社团的一些传统知识和实践都有益于保存自然生态系统和相关联生物的多样性(Chandrashekara and Sankar 1998; Ramakrishnan *et. al.* 2000)。许多农业社团也有管理作物多样性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传统知识和实践。宅园农业也不例外。例如，竹子作为喀拉拉邦的宅园中农作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强大的传统生态基础，有一定传统实践，并且它们对农民有诸多好处(见表 1)，这些都被记录了下来(Chandrashekara 1996)，这同样也能解释在这个系统中作物多样性的管理。

因此，传统喀拉拉邦的宅园是气候农业系统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个农业系统毫无疑问富有气候农业生态、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特征。在这种情形下，农业实践与宅园联系起来，与农业活动相关的宅园，在森林部和当地团体的共同努力下导向经济—生态的均衡发展、生态系统复原和生态系统的恢复。由于把种树和相关活动单独地看做是复原邻近种族属

地，防止森林退化的一种努力，所以从长远看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过另一方面，一旦物种多样、作物多样和多层次的系统采用田间耕作的方式，这就提供了保证当地种族团体的粮食安全、促进它们经济发展、社会地位提高以及改进生态环境的一个机会。同样地，宅园被当做是发展完整社会林地的一个模式。利用农民在管理和合理利用植物多样性上的技能，种植生态的、社会和文化上公认的品种，这使得社会林地规划即使在艰难的地方也变得更完善。

表 1　　宅园竹子栽培的传统实践以及它们对农民的好处

（以 Chandrashekara 1996 为基础）

实　践	好　处
1. 在宅园的角落栽培竹子	在宅园内自由的移动，为其他植物提供更多有用空间
2. 在竹子的周边挖沟	限制竹子根系的水平伸展，减少与其他作物的竞争
3. 在竹子周边堆土堤	刺激新竹竿的生长
4. 修剪竹子	减少对其他作物的阴影；产生对围栅栏有用的腋枝
5. 间混作能适应阴暗、生长周期短的作物	更小地影响间作作物的产量；在竹子枝叶砍伐季节之前能丰收，以避免这个过程中有受损失的危险。这些作物同样适合于培养苗床，从而减少与竹子根系的竞争。

结　论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喀拉拉邦的宅园有利于作物多样性的保存，减轻当地森林资源作为食物、木材、燃料、饲料和药材来源等的压力。像已经表明的那样，农作物来自于宅园，它是农村复杂关系系统的一个要素，在这个系统中人仍然是主角。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宅园的种植模式已经转向单一作物轮作模式。随着偏好上的根本改变，农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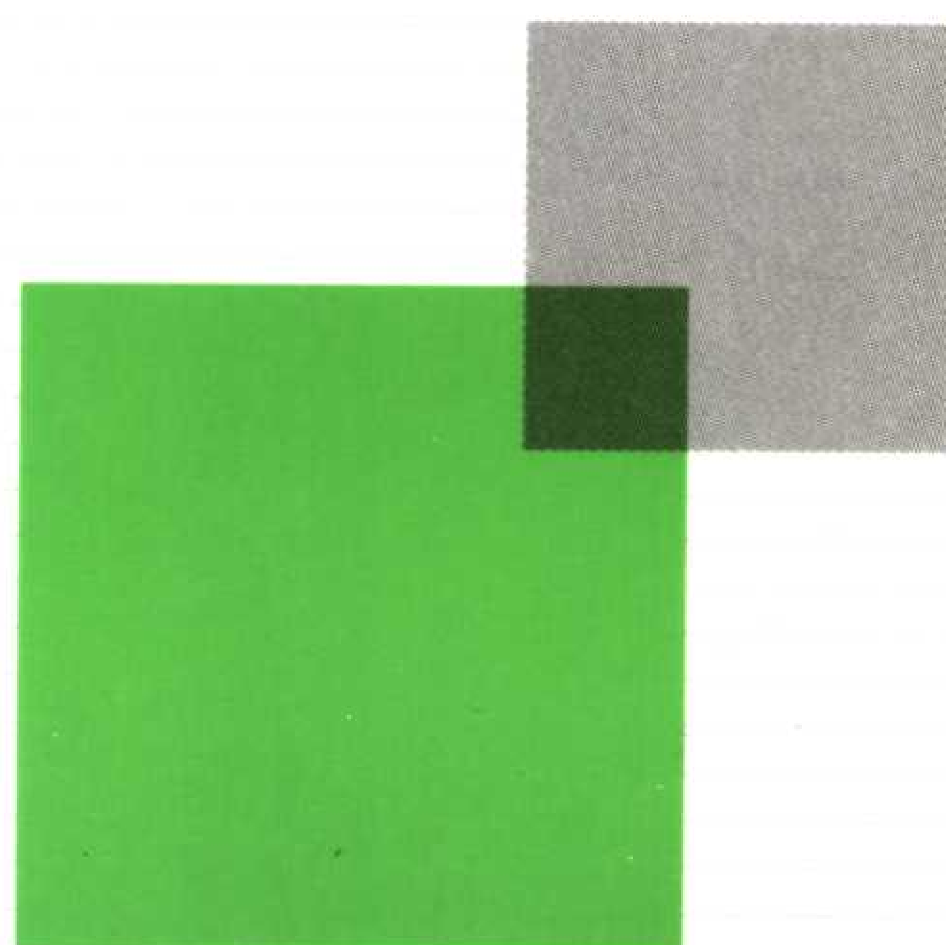
主对生长周期长的庄稼变得漠不关心了。市场不稳定和不可解决的疾病比如:椰子枯萎、胡椒快速枯萎等,这些都带来了风险,反复无常的季风雨气候也导致长期的病理反应。此外大多数家庭的收入有多种渠道,农业的地位降到不显著的位置。人口的增长和随之发生的家庭的解体,也是导致家庭所属小块领地分崩离析,宅园不能支持下去的一个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所有的团体被要求承诺,在宅园耕作足可支撑的情况下尽可能利用可用土地。为了使农场主能在他们的宅园中种植各种作物,我们有理由期待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如:气候农业区外围活动的下水道的修建疏通、气候农业区农场主的教育和培训、提供高品质的庄稼种苗以及技术上的指导。可以指出,我们各级学习机构没有开设关于气候农业宅园系统课程。宅园农业所强调的作物混作缺乏可靠的研究数据,这是新生传统宅园农业实践的另一个局限。植物之间的数量与种类的平衡、宅园农业的经济学、资源的管理和利用以及其他方面仍然都需要有系统地去研究。当对宅园的管理研究被强化,同时控制危害经济作物的害虫和疾病,栽培水稻新的品种等研究都变得同样重要的时候,这种研究才有可能。

注释

[1] 通信地址:Dr. U. M. Chandrashekara, Scientist in charge, Kerala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Sub Centre, Nilambur, Chandakunnu-679342, Malappuram District, Kerala, India; E-mail: umchandra@ rediffmail. com

(作者单位:印度喀拉拉邦森林研究所)

(李珊　译)



■ 责任编辑：朱凌云

■ 责任校对：黄添生

■ 版式设计：杜　枚

■ 封面设计：王荆强

